



前言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1895年，清廷依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此一變局對臺民，尤其是傳統文人的影響極為深遠。所謂傳統文人係指曾受漢學教育，以傳統漢詩文為主要創作者。清道光年間臺灣的文人階層即已崛起，此處所謂的「傳統」，係與1920年代起以白話詩文為創作方式的新文人有所區隔。

傳統文人深受「嚴夷夏之防」、「漢賊不兩立」的儒家思想薰陶，並以科舉為晉身之階，但日治之後遭受異族統治，傳統上升流動的管道突然斷絕，加以殖民當局以漸進的方式推行日語，使漢文化的延續面臨危機，因而造成其文化認同（中國）與政治認同（日本）的分歧。另一方面，隨著日本的現代化建設，各種西洋的新科技及新思潮傳入臺灣，他們「老眼驚看新世界」，¹遭逢前所未有的衝擊。在新／舊、中國／日本／西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勢力並存的時空下，傳統文人如何回應和自處，實為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

向來提及傳統文人，常會與堅守民族大義、義不臣倭、排斥西洋文明等刻板印象相連結，特別是洪棄生堅不剪辮、拒穿洋服、拒講日語、反對讓子女至公學校就讀，終身以遺民自居的形象已深入人心。²但若仔細耙梳文獻，會發現有許多文人呈現出與洪棄生截然不同的面貌。首先，進入統治體系擔任基層公職者甚眾，例如洪以南曾任臺北廳參事、林維朝曾任嘉義廳參事及臺南州協議員、陳梅峰曾任澎湖湖西庄長等。其次，有不少接受新式教育進而嫻熟日語者，例如謝汝銓、魏清德、陳貫、莊雲從均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

¹ 「老眼驚看新世界」出自張麗俊〈六十感懷〉之四，詳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頁263。

² 關於洪棄生的生平事蹟，可參見程玉鳳，《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2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語」係指日語，因係學校名，故因襲之），特別是謝汝銓，據載於日治之初便勤習日本語言文字，汲汲於當時之學。³

在未接受新式教育者中，有透過中國報刊吸收新思想者，林幼春私下嗜讀清末鼓吹新知的報紙雜誌，因而擔任霧峰區長期間，舉辦解纏足會，以其母何德珠等林家女眷放足為表率。⁴此外，西方新科技對傳統文人也有極大的吸引力，張麗俊在日記中即不厭其煩地紀錄他搭乘火車、參觀工廠新式機械及接觸電燈的新體驗；⁵電扇、望遠鏡、飛行機、摩托車等西方新事務也常成為傳統文人吟詠的素材。⁶

另一方面，日治中期以後，輿論每認為傳統文人是一群對執政者奉承阿諛的諂媚之徒，與前述反日的刻板印象正好截然對立。蓋日本當局為便利統治，自始即對傳統文人採取籠絡的政策，除舉辦揚文會、饗老典、頒授紳章外，對於詩社亦採取扶植的態度，造成全臺詩社大興，其數多達 370 個以上，⁷文人亦常與日本官紳唱和。⁸1920 年代的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乃遭新文學者批評

³ 王松，〈《臺陽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68。謝汝銓自稱：「年二十二入泮，為欲試秋闈，仍攻八比試帖不懈，蓋科場重此也。甲午歲版圖易色，為應時急策，力習帝國語言文字，嚮所讀經書，悉束高閣，供飽蠹魚。」謝汝銓，〈奎府樓詩草自序〉，收於謝汝銓，《雪漁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3。

⁴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470，許雪姬撰，「林幼春」條。

⁵ 林蘭芳，〈傳統士紳與新科技的對話—豐原張麗俊的近代化體驗（1906-1936）〉，收於《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 335-368。

⁶ 黃美娥，〈實踐與轉化—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4），頁 165-168。

⁷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3（1997年9月），頁 43-88。其後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183-227。

⁸ 關於傳統文人與日本官紳唱和的情形，可參見施懿琳，〈從《采詩集》看臺日漢詩人的互動模式與書寫話語〉，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頁 363-402。

成詩作中缺乏真感情，鎮日只知對督憲逢迎諂媚、周旋於青樓鶯燕的墮落學士。⁹葉榮鐘更以諷刺性的筆調消遣道：「請設想這班墮落詩人，一旦嗚呼哀哉，第一、迫在眼前的總督閣下的〈年頭感賦〉要叫什麼人去『敬和瑤韻』呢？……第二、對著以『九間仔』為中心而散布於全島的所謂『鶯鶯燕燕』叫誰去贈詩呢？」¹⁰舊文人的形象可說已敗壞至極。然而，與總督敬和瑤韻、贈詩與美人，是否真是如此不堪，該受千夫所指，則有待深究。

綜上所述，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樣貌可說相當複雜，他們飽讀儒家詩書，與新文學者相較，雖在寫作形式上堅持傳統，但不乏接觸西方新思想及新科技的機會，部分人士且接受過新式教育。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其思想內涵有何變化？在日本統治下又如何進退？對於執政者的漸進同化政策如何回應？漢文要如何堅持？對於文化上的母國—中國存在何種感情？在社會與文化變遷下其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娛樂及宗教活動呈顯出何種特色？在在均是本論文所擬解答的課題。

同時，傳統文人在日治時期是一個透過漢詩文以凝聚彼此的獨特群體，對於漢文的延續有所貢獻；在社會上不少人位居名望要職，其舉止動見觀瞻。是以，研究此群體有其一定的意義。

有鑑於此，本論文旨在討論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對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態度和認同，進而解明臺灣淪為殖民地，但在日本主導下邁入現代社會時，各種文化衝突與認同糾葛纏繞不清的複雜現象。

二、文獻回顧與評述

⁹ 關於新文學者對舊文人的批評及雙方論戰過程，可參見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臺灣古典詩壇的影響〉，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 229-269。

¹⁰ 葉天籟，〈墮落的詩人〉，《臺灣民報》，242 號，1929 年 1 月 8 日。

4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目前學界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的傳統文人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最早是 Harry J. Lamley (藍厚理) “The Taiwan Literati And Japanese Rule, 1895-1915” (臺灣文人與早期日本統治)¹¹，討論傳統文人之形成及其於日治初期的肆應與轉變。然因作者對日文基本史料未能加以掌握及利用，造成內容有不少錯誤，加上分析稍欠深入，研究斷限又僅至 1915 年為止，實為可惜。其後研究者大多將範圍擴大，探討日治時期地方菁英 (local elites) 或領導階層之角色及功能，如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一書，敘及乙未之變後領導階層的因應，及其後在殖民地方行政、放足斷髮及日語普及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¹²楊永彬與王興安的碩士論文則觸及殖民統治者懷柔及籠絡地方菁英的手段及方法；¹³呂紹理則以《臺灣人士鑑》為場域，分析領導階層的休閒活動。¹⁴不過，雖然傳統文人亦是領導階層或地方菁英之一員，然依 Joseph Esherick 與 Mary Rankin 之定義，凡能夠在地方上支配一些事務的個人或家族，即可算是地方菁英，包括政治、經濟、文教、參與訴訟或領導地方建醮等祭祀活動之功能者，¹⁵顯示菁英中實包括不具備詩文寫作能力但地位重要的富豪有力者，故仍應與傳統文人有所區隔，不能一概而論。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一書，述及詩社、文社、善社、鸞堂等各類儒教結社的起源與發展，並討論儒教社群對新文化運動的回應和漢文復興運動等儒教運動。¹⁶基本上，儒教社群與傳統文人這兩個群體有所重疊，

¹¹ Harry J. Lamley, “The Taiwan Literati And Japanese Rule, 1895-191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h.D., 1964.

¹²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

¹³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 1895~190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為中心 (1895 年—193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¹⁴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頁 155-166。

¹⁵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24.

¹⁶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不少傳統文人由於接受漢學教育，而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亦屬於儒教社群。然而，李氏將所有與漢文相關的活動均歸類為儒教活動，甚且連旨在掖雅揚風雅的詩社亦歸類為儒教結社，是否合宜，頗值得深思。其次，在漢文振興運動一節，參考前人研究成果頗多，不無可議之處。

近年致力於傳統文人研究者，首推黃美娥。黃氏在《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中，以中文系出身者對漢詩掌握的優勢，結合社會科學理論，討論臺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等諸問題。認為傳統文人普遍對新式科學文明感覺新奇，但部分人士對西方的精神文化出現抗拒和排斥；而新舊文學論戰則隱含有新學與漢學、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大和精神與漢族精神、國（日）文與漢文的較勁之意味。其後，發表〈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一文，¹⁷更將研究範疇擴大到斷髮、解纏足、著新裝、講日語等現代性身體經驗，跳脫出一般文學研究者的窠臼。不過，黃氏所使用的資料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較少徵引近年出版的日記。其次，書中雖已觸及傳統文人對現代文明的看法和回應，卻將之置於新舊文學論戰的架構下，著重於文學史的討論，與史學研究者的視角仍有所不同，故關於日治時期傳統文人與社會文化變遷的課題，仍有繼續研究的空間。

除了現代文明的體驗，另一個受到研究者重視的是傳統文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早期研究者喜歡強調傳統文人的氣節，常以連橫為對象，對其歌功頌德一番。¹⁸但近年來學界的著眼點多在披露文人與日本當局合作的一面。例如施懿琳曾探討吳德功對日本由反抗到傾斜的過程；¹⁹黃美娥則指出櫟社詩人王石鵬的

¹⁷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2006年3月），頁81-119。

¹⁸ 鄭喜夫，《連雅堂傳》（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曾迺碩，《連橫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¹⁹ 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中國學術年刊》18

6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國家認同對象應是日本，因此向來予人具有抗日色彩印象的櫟社，其成員的民族意識應是因人而異。²⁰在關於王松的論文中，黃氏亦指出王松雖被稱為遺民詩人，但與日人仍有良好的互動，只是其舉止自有分寸。²¹凡此在在均已破除向來一般的既定觀念，而更貼近歷史事實。

至於張靜茹之論著《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則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四人為例，敘述其因對文化母國—中國懷抱夢想而前往上海，卻因目睹實況而夢想幻滅，重新安頓自我的過程。不過該書對四位文人由幻滅到調適，進而重新出發的闡述，有些似為作者個人的主觀推論，略嫌牽強。例如張氏提及林癡仙目睹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後，採用流連酒館貪歡飲醉、狎妓出遊的方式遣懷。²²然而，癡仙的生活方式向來就是如此，這是當時文人普遍的餘興，若將其解釋為祖國夢碎後的自我沈溺，與事實恐有出入。其次，將擅長新文學創作的周定山與其他四人並列，亦不妥當。再者，作者認為文人之所以前往上海，乃是受其現代性吸引，也值得再仔細推敲。因為，傳統文人之所以前往中國，主要是因故國情懷而產生的孺慕與嚮往，現代性的追求並非是最關鍵的原因。

基本上，過去學界多以反抗及傾斜兩個極端來討論傳統文人的認同問題，然而大多數文人應是屬於中間的妥協派，在妥協中有多少抵抗意識？有多少順應逢迎？有多少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均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絕不可用「非黑

（1997年3月），頁317-344。後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363-404。

²⁰ 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2003年7月），頁222-246。其後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中，作為附錄。

²¹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遺民詩人的應世之道—以新竹王松為例〉，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233-260。

²²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6），頁337-343。

即白」、「非正即邪」予以標籤化，²³而應再做更深入的分析。擅長後殖民論述的巴巴（Homi K. Bhabha，1949-）²⁴曾提出「含混」（ambivalence）概念，來解釋認同問題。主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不全然是單純的依從或對立關係，而是有著一種含混而充滿張力的互動關係，使得被殖民者的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呈顯出含混矛盾的樣態。²⁵乃是本計畫擬援引的概念。

近年來隨著本土意識的勃興，臺灣文學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各大學紛紛設立相關的系所，有關傳統詩社及分析詩人詩作的篇章遂大量出現。在詩社方面，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一文，具體分析了當時全臺詩社林立的原因及其活動樣態，推翻過去學者認為詩社蓬勃全因民族意識及保存漢文的說法，主張日人的推波助瀾及當時社會崇尚文雅的風尚亦為重要的原因。²⁶

截至目前，日治時期瀛社、櫟社、南社等臺灣三大詩社均有研究者撰專文探討，使讀者對三大詩社的發展歷程及參與成員有基本的認識。²⁷值得一提的

²³ 參見廖振富，〈傅錫祺鶴亭詩集所反映的人生抉擇〉，收於陳嘉瑞、廖振富主編，《中臺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2年），頁140-141。

²⁴ 巴巴（Homi K. Bhabha，1949-）：為伊朗裔印度人，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曾主編 *Nation and Narration*（1990），其論文集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於1994年出版，是研究法農（Fanon）最有心得的文化理論家。廖炳惠，〈後殖民與後現代—Homi K. Bhabha 的訪談〉，收於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1994），頁25。

²⁵ 廖炳惠，〈後殖民與後現代—Homi K. Bhabha 的訪談〉，收於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1994），頁25-32；廖千惠、許智香，〈Homi K. Bhabha 後殖民論述初探及其在教育上之啟發〉，《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1（2004年7月），頁171-191。

²⁶ 黃美娥指出，日治時期全臺詩社林立的原因，可分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兩方面討論。外在因素包括日人的推波助瀾、社會環境的安定、報紙雜誌的傳播，內在因素包括文人沈溺詩歌以自遣、維繫漢文於一線、風雅唱和切磋詩文、抬高身份博取美名、溝通聲息敦睦情誼。亦與當時社會「文學化」與文學「社會化」有關。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頁63-86。其後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204-226。

²⁷ 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收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主

8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是，廖振富關注櫟社的相關議題，其博士論文係以櫟社三位詩人一林癡仙、林幼春及林獻堂的詩作為論析主題，²⁸其後，更彙集多篇論文而成《櫟社研究新論》一書，²⁹書中利用由林家頂厝後人捐出、現藏於臺大圖書館的櫟社及萊園詩會詩稿，校勘了過去記載的錯誤或缺漏；並從連橫遭櫟社除名事件，重新評估櫟社的抗日屬性；對於櫟社與鹿港的淵源及賴紹堯、莊雲從、陳瑚等人的詩作內涵亦有專章探析。除了三大詩社，栗社、天籟吟社等一些中小型的地方性詩社亦不乏人研究。³⁰

此外，以區域為著眼點、研究某一特定地區傳統詩社活動的論文亦日漸增多，北港、新竹、雲林等地已有相關篇章出現，³¹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廖一瑾教授指導多名研究生撰寫此類論文，使研究成果更為豐碩；³²以某一漢詩人為主角，研究其詩作的篇章也所在多有。³³

編，《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中文系所，2000），頁 341-379；其後收於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183-273；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003）；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

²⁸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²⁹ 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

³⁰ 曾絢煜，〈栗社研究〉（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1）；陳芳萍，〈彰化應社及其詩作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王玉輝，〈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和詩人之研究—以旗津吟社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潘玉蘭，〈天籟吟社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張瑞和，〈雲林興賢吟社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³¹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武麗芳，〈日據時期竹塹地區詩社研究〉（新竹：私立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鄭定國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里仁，2005）。

³² 張淑玲，〈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由上所述，日治時期傳統漢詩的研究已日趨細緻化，並已進入百花齊放的階段。然而，前述文學研究者的傳統文人研究，大多是簡略敘述詩社的發展或詩人的生平後即進行詩作主題的分類，再探討其詩作的特色及文學技巧，重點置於文學的討論，異於歷史學將漢詩當成史料還原歷史事實的方法。

近年來，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陸續出版，開始有一些研究者利用這些資料，研究林獻堂、張麗俊兩位傳統文人的事蹟，例如許雪姬探討林獻堂任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命、與楊雲萍的關係、對櫟社的貢獻等。³⁴在張麗俊方面，亦有數篇關於其宗教活動、生活中的女性、漢文書寫、日常娛樂的論文。³⁵不過，日記涵蓋的面向極廣，可供研究的課題仍不少。

整體而言，目前關於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研究，多偏向其詩作的分析，並將其面對現代文明的衝擊，置於文學史的脈絡中討論；在探討其身份認同時，大多以抗日及親日兩端概括，顯然欠缺適切性；在史料上，日記等一手資料的運用仍有所不足，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空間可說仍頗為寬廣。

班碩士論文，2003）；吳淑娟，〈臺灣基隆地區古典詩歌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高雪卿，〈臺灣苗栗地區古典詩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³³ 賴郁文，〈吳景箕及其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張滿花，〈張達修及其詩研究—以《醉草園詩集》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2004）；吳怡慧，〈陳貫《豁軒詩草》析論〉（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³⁴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2002年5月），259-296頁；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1期（2006年3月），頁109-151；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2006年12月），頁27-65。

³⁵ 以上文章詳見，《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5）。

三、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本論文係利用臺灣總督府所留下的各種官方文獻，當時的報章雜誌、調查報告、人名錄（如《臺灣列紳傳》、《臺灣人士鑑》），加上傳統文人的日記、回憶錄、年譜及詩集，私人收藏的族譜、文稿，全面蒐集傳統文人的相關資料，以還原其在日治時期的樣貌。

在報章雜誌方面，《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臺灣文藝叢誌》、《三六九小報》、《詩報》、《風月報》等均有不少關於傳統文人的記述。《臺灣日日新報》與瀛社關係密切，瀛社成員林湘沅、謝汝銓、林佛國、楊仲佐、魏清德等人均為記者，該報常登載臺灣詩界活動的消息，魏清德之〈南清遊覽記錄〉、〈旅閩雜感〉、〈東遊紀略〉亦均於《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臺灣民報》及其後的《臺灣新民報》則由櫟社主幹蔡惠如、林獻堂、林幼春出資創辦，其前身《臺灣》及《臺灣青年》均曾辦理徵詩活動，而《臺灣新民報》自 1930 年 8 月 9 日第 325 號起開闢「漢詩界」專欄，成為傳統文人發表的園地。

《臺灣文藝叢誌》係由櫟社所倡組的「臺灣文社」於 1919 年出刊，迄 1926 年共發行七年。該雜誌詩文並刊，除收錄得獎的徵文、徵詩作品外，又有介紹歐美歷史文化的譯文及介紹當前新知的作品，可略窺傳統文人對西洋文明的認識，現收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惜缺漏甚多，並不完整。³⁶《三六九小報》則由臺南地區傳統文人於 1930 年 9 月出刊，為期兩年。該報創刊於談笑之間，致力託意於詼諧語中、寄諷刺於荒唐言外，有收錄較小型詩社作品及品評名妓的專欄，是了解傳統文人生活實況的憑藉。³⁷由桃園周石輝創刊，盧纘祥、

³⁶ 關於《臺灣文藝叢誌》的介紹，可參閱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8—9 日。

³⁷ 關於《三六九小報》的介紹，可參閱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6（2004 年 12 月），頁 159-222。

邱筱園等人協助的《詩報》，創刊於 1930 年，內容以登載當時臺灣各地詩社的漢詩作品為主，也闢有藝苑消息、徵詩啓事、翰墨因緣、騷壇韻事等專欄，頗具參考價值。《風月報》的前身《風月》，創刊於 1935 年 5 月，內容以藝旦、女給（關於女給的說明詳見第五章）的贈詠及寫真為多，表現出舊文人的文化趣味。之後歷經《南方》、《南方雜誌》等數次改名，成為戰爭時期少數獲准發行的漢文刊物，³⁸是研究戰爭時期傳統文人動態的重要資料。

在文人自身的著作方面，可分詩文集與日記兩部分。詩文集的數量相當龐大，情況非但零散，且蒐羅匪易，不過近年來龍文出版社出版一系列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含括林癡仙、林獻堂、林仲衡、林耀亭、謝汝銓、黃純青等人的詩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及各縣立文化中心亦積極整理日治時期傳統文人之著作，且編為全集付梓，例如《洪棄生先生全集》、³⁹《連雅堂先生全集》、⁴⁰《吳德功先生全集》、⁴¹《張純甫全集》、⁴²《詹作舟全集》⁴³等；日治時期編輯的漢詩選集，例如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除詩作外，還附有文人的照片及簡介，亦是不可或缺的資料，最近亦陸續重刊；臺灣文學研究者近年亦積極將漢詩數位化，提供網路檢索的功能，⁴⁴此類史料整理工作，帶給本論文不少方便。此外，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

³⁸ 戰爭時期獲准發行的漢文刊物尚有《崇聖道德報》，發行時間為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8 月，發行人為許澤文，由「崇聖會」出版。內容多刊載善惡報應故事，幾近於善書；而其發行，也採善書式方式，索閱者完全免費。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頁 312-314。

³⁹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⁴⁰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⁴¹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吳德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⁴² 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

⁴³ 張瑞和編，《詹作舟全集》（彰化縣永靖鄉：詹作舟全集出版委員會，2001）。

⁴⁴ 與傳統漢詩有關的網站，包含「臺灣文學辭典試用版」<http://taipedia.literature.tw:8090/>、「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140.138.172.55/TWP/index.asp>、「臺灣古典漢詩」<http://140.138.172.55/cp/Home.htm>、「國家文化資料庫漢詩部分」<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等。

書館南都藏書室藏有不少尚未重刊的詩集，例如楊仲佐《網溪詩集》，也是本論文參閱的文獻。

日記是近年來極受重視的史料，因它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別於事後追記可迴護自己的回憶錄及口述歷史；同時寫日記者未必有死後出版的打算，其記載較為直接無隱諱，且常鉅細靡遺地反映出個人心態的變化。目前除較為人熟知的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和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外，林維朝〈勞生略歷〉已收錄於其詩文集中出版，⁴⁵〈林癡仙日記〉、〈林紀堂日記〉、⁴⁶林獻堂夫人〈楊水心日記〉、〈傅錫祺日記〉等均尚未刊行，茲介紹如下。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現存 27 冊，始於 1927 年，止於 1955 年，其中 1928 和 1936 年缺。以工整的筆跡要言不煩地紀錄每天發生的事，甚至當天的天氣、起床和上床的時間、服用的藥物都一一記下。其內容包含林獻堂參與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與家族其他成員的互動等，亦有許多櫟社詩會和林獻堂與社友往來的記載，猶如日治時期台灣史的縮影。目前 1 到 14 冊（1927-1942）已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其餘各冊也將陸續刊行。⁴⁷

林獻堂之妻楊水心，也留下三本日記，年代分別為 1928、1934、1942 年，其中，1928 年的日記多以羅馬字母拼音的白話字寫成。楊水心以女性的觀點，記錄了林家大小的瑣事，殊為難得。在日記中，她稱林獻堂為「主人」，與林獻堂日記可互相參照。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始於 1906 年 1 月 24 日，止於 1937 年 2 月 4 日，以農曆的一年為單位裝訂為一冊，共 27 本。其中缺少 1922 年，而 1918、

⁴⁵ 陳素雲主編，《林維朝詩文集》（新店：國史館，2006）。

⁴⁶ 關於〈林癡仙日記〉及〈林紀堂日記〉的內容及價值，請參閱筆者，〈林紀堂日記與林癡仙日記的史料價值〉，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2006 年 12 月 22-23 日。

⁴⁷ 關於《灌園先生日記》的資料價值，可參閱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17。

1919、1920 這三年因繫獄及其他因素，以致內容較少，故合訂成一冊。係張麗俊以毛筆謄錄於十一行簿上，因此日記上盡是秀麗的小楷。此套日記經許雪姬、洪秋芬及筆者解讀後，編成 10 冊，自 2000 年起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陸續出版，至 2005 年已完成全套日記的出版工作。

日記內容十分豐富，涵蓋張麗俊個人家族史、宗教活動、地方產業、年中行事及休閒生活、公共衛生、民變等各個層面。此外，並提供了下列三種資料，可供研究者利用：（一）政治運動史資料，日記中提及張麗俊捐款台中中學並參與同化會成立大會，也敘及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在豐原活動的情形，是目前少見的有關社會運動之地方性史料。（二）保甲制度相關資料，日記詳述保正的日常工作，如參加保甲會議、迎送官府人員、報導相關慣習、指揮公工等，是目前臺灣唯一由保正當事人留下的資料。（三）文學史資料，由於張麗俊參加詩會後，常詳細記載開會地點、出席人員、活動概況，甚且詩題用韻、律絕亦有記載，因此在櫟社的活動方面，即使《櫟社沿革志略》、《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某些部分都還不及日記詳細。其次，向為研究者忽略的豐原吟社，從日記中亦可了解其成員及活動梗概。⁴⁸

〈林癡仙日記〉，起自 1906 年，迄於 1915 年，1 年 1 本，但中間缺漏甚多，並不完整。例如 1907、1910、1911、1912 年完全沒有記載；而有留下日記的數年中，也是斷簡殘篇，1 年 365 天中，大約只有 100 天有寫日記，而 1913 年的日記，更分別寫於 2 本不同的日記本上，使得整理更為困難。⁴⁹其次，每篇日記平均只有 20 至 30 字，內容簡要異常。顯示林癡仙寫日記極為隨興，不似林獻堂及張麗俊般持之以恆，亦不像林、張兩人將每日發生的大小事一一記下。在此情形下，讀者甚難從日記中窺探林癡仙生活的全貌及其內心想法。然而雖僅有寥寥數語，其內容卻呈現許多癡仙較不為人知的一面，例如他為了確

⁴⁸ 關於《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資料價值，可參閱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0），頁 1-51。

⁴⁹ 一本記載 3 月 19 日至 5 月 21 日，另一本記載 6 月 8 日至 12 月 6 日。

實管控金錢流向而勤於記帳，甚至要求自己隨身攜帶小冊子將開銷一一記下，⁵⁰流露出務實的一面，與以往感時傷懷的詩人形象有所出入。其次，日記記載櫟社 1913 年 3 月 29-30 日於大里詹厝園癡仙宅無悶草堂舉行的春會，以及 10 月 18-19 日於鹿港陳槐庭聚星樓舉行的秋會。此外，亦有許多與同化會和臺中中學設立有關的資料，極為珍貴。

〈林紀堂日記〉現存有兩冊，⁵¹分別為 1915、1916 年，惜不完整，僅各自紀錄了 6 個多月。日記內容可分為三個重點：（一）紀堂日常作息及休閒活動的記述，如種花養鳥、閱報觀書等；（二）與日籍臺中廳長及霧峰警部補的互動，如與警部補討論「同化會」的發展等；（三）對留學東京的長子林魁梧的憂慮及關懷。雖然數量不多，仍可使讀者一窺紀堂的生活模式及政治立場，尤其述及「同化會」的部分，為其他資料所未見。

林維朝〈勞生略歷〉採編年體，起自 1868 年，迄於 1896 年為止，前後 29 年。所述為其前半生之經歷，內容包含臺灣士子的漢學養成、清末的社會治安狀況、官紳間的互動等。雖僅記錄至日治後第二年，但可看出乙未割台對他的衝擊與反應。⁵²

目前學界對於上述日記的引用仍極為有限，筆者有幸自 2000 年起即參與中研院臺史所的「灌園先生日記解讀班」，迄今不輟，亦為《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註解者之一，因此在本論文所需史料的掌握上遂擁有一些優勢。

資料蒐集之後，接著須進行解讀。事實上，要確實掌握傳統文人詩文中所要表達的含意，具有一定的難度，其漢詩作品經常援引儒家典籍或中國歷史中的典故，若不知其出處，常難明其意。例如林癡仙〈讀洪月樵秀才一枝送悅秋

⁵⁰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 年 6 月 21 日，未刊稿。

⁵¹ 林紀堂之妻陳岑亦留有一本日記，寫於出版社發行的日記本上，年代為 1924 年（當時林紀堂已亡故），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上階層婦女的第一手資料。林紀堂和陳岑之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均計畫解讀後予以出版。

⁵²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22。

歸唐詩有感次和〉，其第一首有「變徵移宮又幾秋，南冠相遇總含愁」之句，⁵³此處的「南冠」典出春秋時代楚囚鍾儀被鄭人獻給晉侯，卻猶操南音，不忘舊本。癡仙將自己與鍾儀相比，表露出遺民詩人的志節。

而在日記方面，由於內容包羅萬象，有許多人名、商號會社、特殊名詞（如吹春、開眠路）等需要查考，如此才能對日記主人的日常生活與人際網絡有適切的認識。

不過，本論文在資料上的使用仍受到一些限制。最讓人遺憾的是，大多數傳統文人均已故去，而無法進行口述訪問，以補文字資料的不足，先前亦未有訪問記錄留下；有日記流傳的，亦只有少數幾位，故僅憑詩文難以全盤窺探其內心世界。而在詩文方面，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留下與日籍官員酬唱互詠的詩作為數頗多，此類作品多為送往迎來或宴會雅集時的應酬之作，詩句中對殖民者的讚美到底是出於文人的真心，或是受限於環境的不得已，或是交差了事的場面話，著實難以探究。相對地，不少傳統文人在詩句中也會流露出對中國或是清代臺灣的緬懷，但這是文人的真情流露，或是情溢乎辭的文字堆砌，也無法辨明。

筆者的原則是，傳統文人的詩作既經其署名同意發表，或編入詩集中，他們自然要對自己所寫的文字負責。因此，除非有其他相關資料可以證明詩作中所述的並非事實，否則還是予以採用，而不憑空任意懷疑。

期望透過上述方法和步驟，能得出超越前人的成果。

四、章節安排

爲了能夠充分瞭解臺灣傳統文人在日治時期的肆應與表現，本論文擬擺脫過去視角，丟開向來對傳統文人的刻板印象，仔細從歷史脈絡中重新呈現其定

⁵³ 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66。

位，藉以適切掌握他們的心態和處境。職是之故，本研究除緒論、結論外，預計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先敘述清代臺灣文人階層崛起的原因和經過，並描繪其文學活動的樣貌，作為本研究的背景。第二節對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加以定義及分類。⁵⁴

第二章旨在呈現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出處。傳統文人既飽受儒家思想薰陶，嚴夷夏之防的觀念早已根深柢固，甚至日治時期仍持續漢詩的書寫，因此他們與日本執政當局的關係頗為耐人尋味。本章試圖透過他們對斷髮易服、推行日語、普及公學校等總督府施政的回應，瞭解其對殖民施政的評價；再從日記及相關詩文中，探究傳統文人與日籍人士日常交往的情形，藉以釐清其對日人的觀感。這裡所指的日籍人士，除統治體系中的官員、警察外，亦包含記者、商人、醫生等在臺居留者。由於傳統文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力，總督府若要有效控制地方，必須得其協助，因此有不少傳統文人被籠絡而擔任基層公職。第三節乃是探討擔任公職的傳統文人之態度與角色。

雖然傳統文人已接受被日本統治的政治現實，但在他們心中對文化上的母國—中國仍有孺慕之情，第三章主要在探討傳統文人的中國情懷。這種中國情懷首先表現在對於清代臺灣的緬懷，例如有許多詩作均以劉銘傳為題材，熱烈讚頌其建設臺灣之功。其次，是對中國時事的關注，戊戌政變、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等中國近代史上的大變革，均成為臺灣傳統文人吟詠感嘆的題材。然而，理想中的中國與實際的中國之間不免存在著落差，因此，第三節以曾赴中國者的實際體驗，了解其對中國的觀感。

第四章旨在論述傳統文人對西洋新文明的迎拒。西洋文明之進入臺灣，始於清末的開港，乙未之役後，日本殖民者更以強制的方式將臺灣社會推入現代化的漩渦。傳統舊學出身的文人，對這些西洋新鮮玩意有何看法，是頗耐人尋

⁵⁴ 本論文所欲探討的傳統文人，不包含日治時期居住於臺灣並參與詩社活動的中國人，也不包括長期定居於海外的臺灣文人，如莊玉波。因前者並非臺籍，而後者並未與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發生互動。

味的課題。本章分為器物及思想兩部分討論，器物方面，從張麗俊《水竹居日記》留下的接觸新科技的體驗和文人詩作中對西洋新式發明的描述，探討其對西方物質文明的接受度。思想方面，從史地知識、兩性關係、科學新知、自由民主學說等角度切入，討論傳統文人對西方精神文明的看法。

前述三章多在敘述傳統文人與日本、中國及西方文化互相碰撞的外部情況，第五章轉而探討其內在觀念與生活習慣的改變，藉以呈現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其生活的複雜面相。第一節先以婦女角度切入，看看坐擁三妻四妾、詩會時喜招藝妓侑酒、踏青時常狎妓出遊的傳統文人，其對婦女的觀感後來有何轉變。第二節則觸及傳統文人多元的日常休閒娛樂，敘述西式的休閒活動如何豐富了傳統文人的生活。第三節則辯析傳統文人最常參與的詩會聯吟，其屬性是否皆為保存漢文化，抑或具有娛樂聯誼性質。

第六章則探討傳統文人如何啓迪民智，將新知與漢學推廣於一般民眾，擬以林獻堂主導的「霧峰一新會」為例，管窺傳統文人對社會教化的努力。

然而，若欲全面探討傳統文人在日治時期的肆應，經濟、文藝等領域亦是必須討論的課題，但筆者一方面受限於學力，一方面要使論文的焦點集中，故著重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探究。此外，關於傳統文人的寫作技巧、作品評價等文學方面之分析，亦非筆者的能力所能處理。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除姓名外，尚有字、號，且不少人是字行、以號行。因此行文時選擇以該文人最為人所知的稱號來稱呼，不一定稱呼其名。例如林資修，字南強，號幼春，因幼春最為人熟知，故筆者稱其為林幼春；林朝崧，字俊堂，號癡仙，因學界稱其癡仙者最多，故筆者亦沿用之；林大椿，譜名朝琛，字獻堂，號灌園，因以字行，故筆者亦從眾。

第一章 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第一節 清領時期文人的活動

一、文人階層的形成

據學者研究指出，早期的臺灣是個「豪強稱雄，文化落後」的社會，男女比例懸殊，家族制度未普遍建立，羅漢腳（流浪漢）充斥，一般人重經濟而輕文教，以致械鬥叛亂時起，參加科舉考試取得科舉功名的人亦不多，紳士階層無法建立。因此，社會領導階層多為義氣自雄的豪強之士，主要是領導土地開墾活動的墾首、隘首和經營商業的富商。迨清中葉以降，隨著經濟的開發，豪商地主在累積財富後，開始培養子弟讀書，士人階層漸次崛起，士紳成為地方公務及文教事業的中心，社會領導階層轉變成為經濟型、政治型和文教型三類人物的多元領導。¹社會也開始出現轉型，轉向有文化基礎的文治社會發展。²

雖然前述「內地化」的理論忽略了族群和地區性的差異，與現代化、漢化、儒家教化和土著化等概念的差別也須進一步釐清，³但已粗略勾勒出清代臺灣社會的轉變。以書院的設立而言，自康熙征臺至乙未割臺 212 年間，臺灣有名可考的書院約有 60 所。其中嘉慶、道光兩朝 55 年之間，新建書院共 19 所，平均每年新設 0.35 所，相對於康、雍、乾三朝平均每年新建 0.21 所，呈現快速

¹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頁 114-115、138-139。

² 此種社會轉型的過程即學者李國祁所稱的「內地化」，或陳其南的「土著化」時期。所謂「內地化」是指漢人移民在政治和社會組織型態上與中國本土同化，或在臺原住民族逐漸漢化的過程。「土著化」是指漢人移民社會在地緣意識上認同臺灣的過程。陳其南，〈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收於中國海洋史論文集編委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頁 350。

³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1987），頁 178。

成長的趨勢。再以書院分佈的範圍觀之，乾隆以前大部集中於臺南，乾隆以後，擴大得極為迅速，光是乾隆一朝已分布到嘉義、雲林、彰化、新竹、臺北，嘉慶時更已到達宜蘭，此一路線說明了臺灣文教開發的進程。⁴

由於清代臺灣儒學的設置，往往距府廳縣的設治已有相當時間，或根本未設，無法滿足各行政區域住民向學的需要，因此可以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的書院，遂成爲主持地方文運的中心。⁵加以其時臺灣的書院，在學額上似無所限制，成爲生童準備應舉的場所，且是讀書人定期聚會之處。⁶由其設置的多寡，實可略窺文風的興衰。

表 1-1 清代臺灣書院設置情形表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總計
宜蘭				1					1
基隆								1	1
臺北			1		1	1		2	5
桃園									0
新竹			1						1
苗栗					1				1
臺中					1			2	3
彰化		1	1	2	2	1			7
南投					2			2	4
雲林			1	1	3				5

⁴ 王啓宗，〈臺灣的書院〉（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頁 18-24。

⁵ 黃秀政，〈清代臺灣的書院—以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地方才俊的培育爲中心〉，收於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105-143。

⁶ 張勝彥，〈清代臺灣書院制度初探（下）〉，《食貨》6（1976年7月），頁 144-154。

嘉義		1	1		2	1			5
臺南	11	3	2	1				1	18
高雄		1	2	2					5
屏東			1	1				1	3
澎湖			1					1	1
總計	11	6	11	7	12	3	0	10	60

資料來源：王啟宗，《臺灣的書院》，頁 20-23。

在儒學學額的設立方面，儒學係崇祀文廟、考課生員之所，為地方最高教育行政機構，清代臺灣先後共設立 13 所儒學。隨著儒學的設立，臺灣各地的學額也逐漸設立。1686 年全臺歲科兩試文生員名額僅 56 名，到 1828 年增加幾近一倍，此後增加更快，至 1888 年又增加將近一倍。⁷可知 19 世紀以降，臺地文風開始振興。其次，早期臺灣的歲考與科考，多外籍人士冒籍應試，特別是福建福、興、泉、漳四府之人，若稍通文墨，不得志於本籍，便指同姓在臺居住者為其弟姪，公然赴考。乾隆年間清廷乃下令禁止冒籍，自是而後，本籍中式者漸多，地方之教化，亦漸趨繁盛。⁸

以舉人和進士的名額而言，1735 年時，臺灣舉人中式的名額依規定於閩省解額內另編字號加取，以 2 名為常額。後因應鄉試者眾，約達 500 人，至 1818 年，臺灣鄉試中式，增為以閩籍為至字號定額 3 名，粵籍為田字號定額一名，合 4 名為例。咸豐初年，又將臺籍名額增至 6 名，合粵籍 1 名，計中式正榜 7 名。在會試方面，早期臺灣舉人會試不另編字號，無錄取定額。1738 年巡臺御史諾穆布乃奏請：「臺士會試照鄉試例，於福建卷中另編字號，額取一名。」

⁷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史聯雜誌》3（1983 年 6 月），頁 42。

⁸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頁 34-35。

然當時因應試者少，不足編字號。至 1823 年，由於赴京會試舉人，已滿 10 名，乃准取中一名。⁹

此外，清初臺灣應科舉登第者，多為武舉人、武進士，文學人、文進士為數甚少，道光以後，文科中式人數才超過武科中式人數。¹⁰

再從文學的表現上來看，康熙、雍正年間，臺灣本土培養的文人作家尚未出現，著名的作品均出自來臺任官或平亂的大陸人士之手，例如郁永河的《裨海紀遊》、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藍鼎元的《平臺紀略》和《東征集》等。乾嘉之後，來臺宦遊的人士激增，采風觀光的詩作和散文也漸多，例如朱士玠、張湄、范咸等人的詩文。直至道咸時期，姚瑩、周凱、徐宗幹、劉家謀等宦遊人士的作品雖仍佔一定比例，但本土出身的文人已佔文壇的大宗，著名的本土作家，包含澎湖出身的蔡廷蘭，臺北的陳維英，彰化的曾維楨和陳肇興，新竹的鄭用錫和林占梅等人。¹¹

據學者研究，臺灣南部地區及澎湖廳之文人階層最遲於 19 世紀前期即已形成；中部地區則嘉道以後文教漸盛，北部文人階層的建立則在咸同時期。¹²以下擇要略述其文學活動。

二、文人的活動

（一）陳維英與板橋林家

陳維英（1811-1869），字實之（一作碩芝），號迂谷，臺北大龍峒人。1838 年獲取為一等第二名補廩兼舉優行生，1845 年任閩縣教諭，1851 年選孝廉

⁹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33-38。

¹⁰ 王惠琛，〈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頁 181、183。

¹¹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93），頁 4-7。

¹²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頁 48-62。

方正，1859年考取恩科舉人。秩滿，捐內閣中書，任內廷國史館分校，尋改主事，分部學習，後辭官返鄉。1862年戴潮春之役，與紳士合辦團練，以功賞戴花翎。其間曾掌教仰山、學海兩書院。¹³

維英在同治初期築室於劍潭之左岸，曰「太古巢」（故址在今臺北市美術館附近），製聯榜之。其一曰：「嘗觀城市富豪家，簞山沼水，籠鳥盆魚，縱繁華整飭，究無活潑潑機，似雅而俗；幸得林泉幽僻地，屏嶂襟江，茵花幄樹，祇潦草安排，便成坦蕩蕩境，宜酒與詩。」其二曰：「三頓飯，數杯茗，一爐香，萬卷書，何必向塵寰外求真仙佛；曉露花，午風竹，晚山霞，夜江月，都於無字句處寓大文章。」二聯一出，騷壇爭傳，四方文士皆以一謁太古巢為榮。¹⁴除其門生屢屢造訪外，也吸引區天民觀察、王藹亭太守、鄭用錫等多位官員及名流前來，彼此文酒聚會、吟和唱酬，使得臺北地區的文學活動增色不少，維英可說是清代臺北最重要的文壇領袖。¹⁵

維英兼善詩文、聯語，其詩，大抵措辭平易，老嫗能解；而聯文，所獲評價尤高，張純甫認為有得古人立言垂世之旨。¹⁶曾於大龍峒保安宮內創設「樹人書院」，另外又與子侄學生多人創辦書房。¹⁷自道光至光緒年間，整個陳氏家族

¹³ 連橫，《臺灣通史》（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九版），頁746；曾迺碩總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10-11；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77-91。

¹⁴ 曾迺碩總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頁11-12。

¹⁵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82。

¹⁶ 張純甫曰：「迂谷之文，似淺而深，似俗而雅，蓋有得古人立言垂世之旨。故質實可味，非徒以隸事、賦物、練句、裁對見長也。」張純甫，〈陳迂谷先生聯文序〉，收於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文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頁31-32。

¹⁷ 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頁160-163。

擁有科舉功名者，有 22 人。¹⁸一時之間大龍峒之文風冠於各地，而有「五步一秀（才），十步一舉（人）」之諺語，以形容其門下人材之盛也。¹⁹

清季許多活躍於臺北文壇的文人亦出自陳維英門下，例如曹敬、張書紳、陳樹藍、陳儒林等均是。²⁰其中，曹敬為八芝蘭（士林）人，1842 年入泮，翌年試府學，取一名，為增補生。1845 年設教於大龍峒港仔墘，以敦行為本，游門者皆達才。張書紳為大龍峒港仔墘人，於 1864 年中舉，以教職候選，因不慣仕，託言親老歸養。於所居闢池館，環植松竹，嘯詠其中。淡北讀書人，無不佩服其高雅。²¹

在淡水干豆莊地區，另有文人名黃敬，為 1854 年歲貢生，後授福清縣學教諭，以母老辭不就。在莊中天后宮設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鄉里咸尊稱其為關渡先生而不名。蓋關渡，為干豆之別稱也。由於黃敬擅易經，淡北乃成北臺易學中心之一，與曹敬合稱淡北二敬先生。²²

除大龍峒陳家之外，板橋林家也在臺北文壇扮演一定的角色。咸豐之後板橋林本源宅邸落成，林家當時雖未見以正途獲得科舉功名者，但透過延聘呂世宜、謝瑄樵等多位文人來臺，與林國華、林國芳兄弟研摩金石書畫，疊詠敲詩，也使林家酷愛文藝的形象浮現，進而得以與陳家相抗衡。²³

呂世宜，字可合，晚稱髯可，號西村，本籍金門，後遷廈門，1822 年中舉。後經興泉永道周凱之介，1837-1838 年間入居板橋，國華與國芳以師事之。世宜書法以篆隸著名，性愛金石，經考證，若見有碑版及名人真跡，雖傾囊亦

¹⁸ 周宗賢，〈大龍峒陳悅記小史〉，《臺北文獻》105（1993 年 9 月），頁 37。

¹⁹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29。

²⁰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80-82。

²¹ 曾迺碩總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頁 14-15、42。

²² 曾迺碩總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頁 26-27。

²³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61-116。

必求之。國華兄弟乃供給其蒐集碑版之資，於是造詣彌深，購得數萬卷書籍及千餘種金石拓本，立下台灣金石學基礎。謝瑄樵，名穎蘇，初字采山，後改瑄樵，福建詔安人。曾參加科考，未中試。約於 1857 至 1860 年間旅居臺灣，先入主臺南磚仔橋吳家，再到林家。其書法從顏真卿、米芾風格而出，圓潤秀勁行書著名；畫作多係 18 世紀揚州八怪遺風演變而出的四君子、花鳥畫，影響後代臺灣書畫家甚鉅。²⁴

國華、國芳兩兄弟均擅長書畫，據云國芳之書法瘦硬通神，類其風骨。國華之書法亦卓然成家，平日收藏古董頗多，臺南進士黃裳華稱其收藏勝過聚書三十乘的張廣武、爐觚稱四海的黃黃石。²⁵由於兄弟兩人的努力，北臺的文風乃日漸濃厚。

（二）鄭用錫和林占梅

鄭用錫（1788-1858），字在中，號祉亭，竹塹人。1810 年中秀才，取進彰化縣學附生，1818 年中恩科舉人，1823 年成進士，為臺灣臺字號首位進士。²⁶1834 年往北京供職，籤分兵部武選司，補授禮部鑄印局員外郎，但 1837 年春即辭官歸里，講學於明志書院，提攜後進。²⁷

1826 年用錫曾協助建造竹塹城，1929 年完工後，授同知銜；1840 年鴉片戰爭起，英艦犯臺灣中部大安港，用錫募勇協防，因功賞戴花翎；繼獲土地公港

²⁴ 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79-80；郭承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21-58。

²⁵ 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頁 80-81。

²⁶ 鄭用錫之前，臺灣已有兩位進士，分別是 1758 年登第之諸羅縣附生王克捷，以及 1766 年中式之鳳山籍莊文進。鄭用錫則是 1823 年臺灣另編字號後的第一位進士。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38。

²⁷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頁 16-20。

洋匪，加四品銜；1854年奉旨與施瓊芳進士等協辦團練，並勸捐運津米糧，恩給二品封典。²⁸在學術文化方面，曾主講明志書院講席前後八年，又因淡水廳素無專志，撰《淡水廳初志稿》，其內容為陳培桂修志時採用。²⁹

晚年斷絕宦心，希望找一塊風景清幽的地方歸隱，自娛養老，故於1851年在竹塹北門築「北郭園」，由其次子鄭如梁耗費鉅資，聘請名師著手營造，至1854年落成。由於此園在北門城外，地勢平坦遼闊，可遠眺竹北的翠綠丘陵，景觀與李白〈送友人〉中的「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巧妙相合，故有此名。北郭園之美，吸引各地達官顯要及文人雅士紛沓而至，淡水同知丁曰健、臺灣總兵曾玉明、竹塹許蔭庭明經、粵籍曾驥茂才、劉星槎茂才等人均是座上賓，鄭用錫常與其詩酒酬唱，文學活動乃日趨熱絡。³⁰

家族中除用錫外，鄭用鑑（1789-1867）亦以學術聞名。用鑑字明卿，號藻亭，22歲時成為彰化縣學生員，1825年乙酉科拔貢，以教職選用，後於1856以捐輸津米捐請內閣中書銜，1862年詔舉孝廉方正。曾掌明志書院垂30年，栽培不少弟子，亦倡勸重修文廟、文昌宮、明倫堂，並且親自監督工程的進行。³¹

用錫長孫鄭景南則於1857年成立「斯盛社」，用錫為實際指導者，以科考為目的，勉勵社員攜手努力、寒窗苦讀。³²由於鄭家的提倡，吸引許多莘莘學子前來受教，竹塹地區科舉縉紳數遂高居北臺之冠。鄭氏家族以正途考試獲得功名者即有21人，以捐納方式取得官銜者也有53人。竹塹文風遂臻於高潮，從此領袖風騷。

²⁸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頁21-23。

²⁹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臺北：國史館，1995），頁75。

³⁰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頁36、292。

³¹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頁77；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71-72、131-133。

³²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295。

約略同時，位於竹塹西門，由林占梅（1821-1868）所建的「潛園」在 1855 年落成。林占梅，字雪邨，號鶴山（一作鶴珊），又號巢松道人。少年時曾隨岳父黃驥雲³³至北京，勾留年餘，鎮日走馬擊劍，聽曲唱戲，並至山東、揚州、蘇州、洞庭湖、西湖、南京旅遊，生活備極風雅。³⁴回臺後，為維繫家族的地位，持續以捐款、募勇的方式，取得功名。1841 年因捐防雞籠英軍之犯，獲貢生加道銜；1843 年因捐防八里坌，獲知府即選；1844 年募勇扼守大甲溪，絕嘉、彰各邑漳泉械鬥蔓延，賞戴花翎；1853 年林恭事變，協辦全臺團練，經奏准准簡用浙江道，但辭而未赴任；1858 年因積功加鹽運使銜；戴潮春事件發生後，因率領練勇，幫助官軍，於 1864 年獲賞加布政使銜。³⁵

占梅雖屢立戰功，但平素亦以書畫、絲竹、騎射諸藝色色精絕而馳名，而潛園係以江南園林為藍圖，巧妙結合人文與自然，以水池為中心，四周亭臺樓閣林立，並以幽徑迴廊相連。完工後，占梅便在此主持雅集。據徐慧鈺研究，潛園雅集的次數多達 38 次多，從道光年間，迄 1867 年為止。集會日期多選除夕、元旦、元宵、中秋等節日，或是花開時節、建築物落成等特殊日子。活動的內容則以擊鉢分韻、撫琴弄箏、賞花玩月、飲酒品茗等風雅的遊興為主，有時也高談闊論，並有編謎之活動，往往通宵達旦，成為全臺享負盛名的盛會。無論是達官顯要、詩人騷客，甚至方外道友均匯集於此，臺灣道徐宗幹、周懋琦，淡水同知秋曰覲，鹿港同知宜泉，流寓文士曾爾雲、陸翰芬、林豪、林薇臣，臺籍菁英鄭貞甫、彭廷選、蕭國香、陳尙惠，佛門中人漱石山人、蓮汀上

³³ 黃驥雲（1801-1841）：字雨生，中港頭份莊人，參將清泰子。1829 年成進士，籤分工部。1832 年張丙事件時，剛好省親在籍，因此巡道平慶（1830-1833 在任）命其作書諭閩粵莊民勿生事。事平之後，因有功補都水司主事，游升營繕司員外郎。1837 年，分校京闈，取士多得人。連橫，《臺灣通史》，頁 744。

³⁴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頁 25-26。

³⁵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頁 159-165；林文龍，《林占梅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人、若顛上人等人均是與林占梅歌詩相和、鳴琴互彈的知音。³⁶

據黃美娥的研究，清代竹塹地區的竹城社、潛園吟社、斯盛社、竹社、梅社、北郭園吟社、竹梅吟社等傳統詩社，其成立皆與鄭、林兩家有關，³⁷可見其對竹塹文壇的影響。

（三）筱雲山莊呂家

神岡三角仔呂世芳（1806-1855），以務農起家，善積蓄，能理財，終成富戶。³⁸其子呂炳南（1829-1870），未弱冠即補弟子員，平素關心文教事業，除繼續掌理其父設立的「文英社」³⁹，延請名士至文祠設教外，並發放花紅銀，鼓勵具有功名者前來拜謁、掛匾，以達到與文人交遊的目的。⁴⁰

由於呂家住宅在戴潮春事件中遭到破壞，呂炳南乃於 1866 年興建一座防禦性更強的宅邸，命名為「筱雲山莊」，在其中收藏經、史、子、集書籍，共 21,334 卷，⁴¹不僅造福自家子弟，也將重文之風傳佈到鄉梓鄰里間。呂炳南因此被譽為是台灣第一位藏書家。⁴²

³⁶ 徐慧鈺，〈高吟四座互飛觴—話潛園詩酒盛會〉，《竹塹文獻》6（1998 年 1 月），頁 88-103；徐慧鈺，〈林占梅潛園雅集及其文化義涵—清中葉臺灣文士生活之一例〉，《兩岸發展史研究》4（2007 年 12 月），頁 1-33。

³⁷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 291-306。

³⁸ 吳子光，〈候補訓導呂庠生呂公傳〉，吳子光，《一肚皮集二》（臺北：龍文書局，2001），頁 249-250。

³⁹ 文英社約成立於道光中期，乃呂世芳邀集一些文士集資創立，為以祭祀文昌帝君為主的神明會組織。世芳在極短時間內就購進數百畝田地，每年更有八百多石的稻穀收入，原先計畫興建廟宇，但因過世作罷。陳珮羚，〈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 123。

⁴⁰ 陳珮羚，〈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 140-145。

⁴¹ 呂炳南的藏書中，經部 4,514 卷，史部 6,260 卷，子部 3,675 卷，集部 5,142 卷，其他 1,590 卷，共計 21,334 卷。吳子光，《一肚皮集二》，頁 444-446。

⁴² 莊永明，〈第一位藏書名家—呂炳南〉，收於莊永明，《臺灣第一》（臺北：時報文化，

因家道中落而渡海來臺發展的嘉應州舉人吳子光，於 1878 年起即受聘於「筱雲山莊」，其及門弟子多一時俊彥，包括丘逢甲、謝道隆和呂炳南三子等。特別是呂炳南三子汝玉（1851-1925）、汝修（1855-1889）、汝誠（1860-1929），皆以能文稱於當時。呂汝玉 1881 年被舉為博士弟子員，入邑庠為生員；呂汝修 1875 年獲臺灣府學紅榜第 15 名，1888 年中式舉人；呂汝誠則為光緒年間廩生，故吳子光譽之為「海東三鳳」。此外，臺南進士施士洁、彰化舉人陳肇興、烏日貢生楊馨蘭也講學於呂家，他們以筱雲山莊為活動中心，吟詠酬唱，為葫蘆墩地區帶來蓬勃的文學生命。⁴³

（四）曾維楨和陳肇興

曾維楨，號雲崧，彰化燕霧堡白沙坑莊（今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人，祖籍泉州府晉江縣。1818 年由臺灣府學附生中鄉試第三名舉人，1826 年登丙戌科進士，殿試中式二甲，授翰林院庶吉士。彰化有進士自其始。後任湖南澧州石門縣知縣，再調巴陵、衡陽等縣令。⁴⁴告老返鄉後，參與道光年間《彰化縣志》的編纂；亦擅寫詩，其鍊字用句俱見功力。自維楨之後，彰化地區的本土文人才相繼而起。⁴⁵

陳肇興（1831-?），字伯康，號陶村。彰化人。少入邑庠，涉獵文史，工詩。早年就讀白沙書院，1853 年考上秀才，1859 年中舉，題所居為「古香樓」，以讀書詠歌為樂。1862 年戴潮春之變起，曾「破產購錐，謀刺逆首」，後又豎義旗，事件終獲底定。事平後，不仕，掌教於白沙書院，及門之士多成

1995），頁 40。

⁴³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 45、54；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 69-75。

⁴⁴ 林文龍，〈開臺翰林曾維楨與白沙坑福神〉，《臺灣文獻》27：4（1976 年 12 月），頁 103-104。

⁴⁵ 施懿琳，《彰化文學圖像》（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49-52。

材，弟子著名者有吳德功、楊馨蘭、楊春華、許尚賢等。著有《陶村詩稿》，採編年方式分 8 卷，收錄許多以農民生活為主的佳作。透過詩歌，表達他對鄉土的關懷與愛戀，也傳達其忠君保鄉的執著與付出。⁴⁶

（五）施瓊芳

施瓊芳（1815-1868），初名龍文，字見田，一字昭德，號珠垣。原籍泉州府晉江縣，其父時始來臺，居臺灣府治（今臺南市）大西門外之南河。1837 年舉拔貢，旋中舉人，1845 年登恩科進士，銓選六部主事，久駐京曹。嗣補江蘇知縣，未就職，乞養回籍。返臺後，擔任海東書院山長，教育英才無數。著有《石蘭山館遺稿》，凡 22 卷。⁴⁷

其次子施士洁（1855-1922），自幼聰穎，弱冠舉茂才，1876 年 21 歲時登鄉薦，1877 年成二甲進士，故稱「聯捷進士」。歸里後，每與諸名士唱和，先後掌教白沙、崇文、海東三書院，極力栽植後進。⁴⁸又與許南英、汪春源、丘逢甲等人合組「崇正社」，取崇尚正義之意，為清代臺南詩社之濫觴，府城詩風遂逐漸形成。⁴⁹

（六）蔡廷蘭

⁴⁶ 連橫，《臺灣通史》，頁 747；施懿琳，《彰化文學圖像》，頁 53-56；施懿琳，〈清領中葉在地詩人的本土關懷與現實書寫〉，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 136-141；林翠鳳，〈陳肇興《陶村詩稿》的文學表現與詩史價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1（2000 年 7 月），頁 115-116。

⁴⁷ 向麗頻，〈清代臺南詩人施瓊芳近體詩用韻考察〉，《東海中文學報》13（2001 年 7 月），頁 183-193。

⁴⁸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頁 572-573，徐慧鈺撰，「施士洁」條；謝碧連，〈府城臺南父子雙進士—施瓊芳、施士洁〉，《臺南文化》53（2002 年 10 月），頁 51-55。

⁴⁹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48-49。

蔡廷蘭(1802-1859)為澎湖雙頭鄉人，13歲補博士弟子員。1832年澎湖飢饉，乃作〈請急賑歌〉，描寫因風災瀕臨飢餓的庶民疾苦，從此當道名流咸知澎湖之有蔡生。1835年鄉試罷歸，由廈門渡海回澎時遭遇颶風，飄抵越南，次年才由陸返閩，遂將見聞所及，撰成《海南雜著》，乃一關於越南風土民情之實地調查紀錄。⁵⁰1844年成進士，為澎湖第一位進士，被稱為「開澎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江西。平生著述尚有《惕園遺詩》。⁵¹

由前所述，道咸時期臺灣的文風已頗盛，特別是竹塹鄭用錫的北郭園和林占梅的潛園均有詩酒盛會的舉行，全臺文人藉此得以與大陸來臺官紳互相酬唱、交流，替往後臺灣詩社的運作模式奠定了基礎。其次，陳維英、陳肇興、施瓊芳等人或掌教於書院，或設教於里，作育英才無數，亦有助於文風的振興。

三、唐景崧與斐亭吟社、牡丹詩社

清末福建臺灣道唐景崧的來臺，又將臺灣的文人聚會推至另一高峰。早先隨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來臺的幕賓中，熱衷詩文韻事者已頗多，例如李振唐、方澍、陳季同等人均是，陳衍更將同光體詩派⁵²延伸至臺灣，⁵³使臺灣文壇呈現欣欣向榮之景，迨唐景崧蒞臺，更有一番新氣象。

1887年唐景崧因在清法戰爭期間招撫黑旗軍劉永福有功，升任福建分巡臺

⁵⁰ 蔡廷蘭《海南雜著》曾譯成俄文刊行，詳見湯熙勇，〈海難與海外歷險經驗：以清代臺、閩往返船隻漂流越南為中心〉，發表於中洋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週二演講」，2008年4月15日，頁19。

⁵¹ 蔡主賓，《蔡廷蘭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高啓進，〈「開澎進士」蔡廷蘭〉，收於高啓進，《西瀛人物志》（澎湖馬公：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27-64。

⁵² 同光體詩派：「同」和「光」分別指清代「同治」和「光緒」這兩個年號，以鄭孝胥和陳衍為代表人物，主張作詩不墨守盛唐。

⁵³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84。

灣兵備道。由於景崧出身翰林，喜歡舞文弄墨，將府城道署舊有斐亭，葺而新之，自撰楹聯懸掛亭柱，題曰：「聽百丈濤聲，最難忘鐵馬金戈，萬里游蹤真臘棹；揮滿堂豪翰，果然是錦袍紅燭，千秋高會斐亭鐘。」⁵⁴因往昔道署地近臺江，在其尚未淤積前，常可聞洶湧濤聲。並創「斐亭吟社」，公餘時輒邀幕客僚屬、文人雅士為詩鐘雅集，施士洁、丘逢甲等臺人之能詩者皆在其列。

所謂詩鐘，即拈題伊始，綴錢縷端，繫寸許之線香團爇之，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墜盤鳴，一響鏘然，而構思當成矣。或刻紅燭以限時，時限屆而鳴鐘，鐘鳴而百卷並呈，卷呈而優劣立判者。道咸年間創於八閩詩人，其後漸播於百粵，⁵⁵同治初年由閩籍文人傳入臺灣，但並不盛行。1874年牡丹社事件起，清廷詔沈葆楨巡臺，由於其幕中十餘人皆詩鐘健將，暇輒作局，詩鐘漸普遍引起臺灣文人的注目。⁵⁶迨唐景崧接任臺灣道，廣發詩鐘文帖，才蔚為一股風潮。臺南府知府唐贊袞曾回憶斐亭詩社的盛況云：

唐薇卿方伯在道任時，於斐亭判牘、觀書、見賓、課子，三載有餘。公暇，招客賦詩，如閩所謂詩鐘故事者。蓋仿古人「日辦公事、夜接詞人」之意。一時賓朋文字之盛，為海外二百年來所未有。⁵⁷

1891年景崧升任福建臺灣布政使，駐臺北，仍不減雅興，於官廳重張旗鼓，邀集臺士百數十人，召開文酒之會，號為「牡丹詩社」。其名稱之由來，乃因1892年林鶴年來臺榷辦茶釐時，也參與布政使衙署內的詩鐘盛會，並餽贈所得之曹州牡丹若干種與景崧，故有是名。此外，林鶴年之子林輅存因曾與其父參與「牡丹詩社」的雅集，心頗羨慕，故也與三五好友，仿「牡丹詩社」之

⁵⁴ 此聯今保存於臺南市延平郡王祠地下室。

⁵⁵ 許俊雅，〈光復前臺灣詩鐘史話〉，《國文學報》18（1989年6月），頁231-286。

⁵⁶ 黃典權，〈斐亭詩鐘原件的學術價值〉，《成大歷史學報》8（1981年），頁113-141。

⁵⁷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127-128。

例，立一「海東吟社」。1895年臺灣淪日時，此兩詩社均匆匆被迫終止。⁵⁸

曾參與斐亭及牡丹吟社者的詩鐘作品，後被唐景崧編入《詩畸》⁵⁹一書，參與的臺人包括施士洁、丘逢甲、黃宗鼎、劉雍、林啓東、汪春源等人，他們均常在唐景崧的官舍與景崧及其他中國游宦文士相唱和。文人得以與行政首長詩酒交際，無異是己身社會地位的最佳證明，此種官紳聯吟的模式，日治之後仍被沿用，只是臺灣文人酬唱的對象已轉換為日本官紳。其次，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社舉辦的聯吟大會也常標榜紹繼斐亭鐘吟，模仿《詩畸》格例徵詩競技，可見斐亭詩社已替日治時期臺灣詩社運作的模式奠定了基礎。⁶⁰

四、小結

早期的臺灣為一移墾型社會，但隨著經濟日益發達，豪商開始培養子弟讀書，求取功名，以維持家業於不贅。依開發先後，臺灣南部及澎湖廳之文人階層最遲於19世紀前期即已成形；中部地區則嘉道以後文教漸盛，北部文人階層的建立則在咸同時期。此由各地書院數量加速成長，科舉中式的人數及學額大幅增加，由本地文人書寫的文學作品亦大幅出現可證。

在知名的文人中，竹塹的鄭用錫建築「北郭園」，林占梅則興建「潛園」，每逢佳節或花開時分輒於園中舉辦集會，全臺文人雅士及來臺官員遂絡繹不絕到訪，立下官紳酬唱的先河。此外，大龍峒的陳維英、筱雲山莊呂家、臺南施瓊芳等人均致力於書院教育，提攜後進，培育弟子無數，以致當地文風

⁵⁸ 林輅存，〈臺陽詩話跋〉，收於王松，《臺陽詩話》，頁91。

⁵⁹ 《詩畸》為唐景崧在臺任職時所輯之詩鐘作品，經重加刪汰，分門編輯，成正編八卷、外編兩卷。所以命名為《詩畸》，乃因「正字通曰：『零田不可為畸』」，該書除第八卷錄七律外，其餘各卷皆屬零句無片段的對句，「亦詩之畸而已」。唐景崧，《詩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⁶⁰ 向麗頻，〈唐景崧《詩畸》研究〉，《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7（2006年7月），頁117-154。

34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大興。

清末唐景崧來臺後，更將臺灣詩社的發展推向高峰。先後在府城和臺北組織「斐亭吟社」、「牡丹詩社」，由於其具有官職，臺灣文人樂於藉著詩文與其相交，以提升自己的地位，故詩鐘雅集蔚為風潮。此種詩會模式，可說是日治時期官紳同吟的雛形。

第二節 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定義與分類

一、傳統文人的定義

何謂傳統文人？目前一般研究者對於臺灣傳統文人多以舊文人、舊儒或漢儒稱之，視為一個沒有疑義的舊知識階級的統稱，而未明確定義。在少數的定義者中，李泰德認為傳統文人很難有標準的定說，大抵為出身士紳、地主世家或世族，曾受傳統儒教倫理或私塾教育者，因此多屬雅好漢學，甚至從事研究者。⁶¹張靜茹則指稱傳統文人是以儒家正統知識為學習內容，接受儒家思想、倫理、政治、歷史、文學、經濟、法律、聖賢言行洗禮，將心力用在鑽研儒家的四書五經，旁及諸子百家思想，並研究闡發其中義理，學作科學文章及詩詞歌賦者；亦即深受儒家價值體系影響，並且內化成為生命主要基調的一個群體。⁶²

前述兩種定義均有值得商榷之處。李泰德的定義指明成為傳統文人有兩大條件：一是出生世家或世族，二是曾受漢學教育。如此一來，顯然將家境清寒的寒儒排除在外，實欠妥當；而家庭的權勢和財力到達何種程度才能稱為世家、世族，也應闡明。至於受過私塾教育就是傳統文人的說法，實過於籠統。

張靜茹的定義用來闡釋清代之前遍覽儒家經典，並以參加科舉為人生標的之文士或許頗為適合，不過用來形容日治時期臺灣的舊文人實有不足之處。因為日治時期是新舊思想交替的時代，即使是飽讀漢學的舊文人也不乏接觸新知識的機會，所以其定義恐怕無法斷然判別誰是純粹的傳統文人。為此張靜茹再加補充，以是否受過儒學教育及作品類型作為區別標準，並不排除自學或因時空環境影響而吸收新知者。⁶³由此可見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多少均有接觸過新

⁶¹ 李泰德，〈文化變遷下的臺灣傳統文人—黃得時評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2。

⁶²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3。

⁶³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3。

學，其知識來源已不限於傳統漢籍，故其樣貌遠較前代複雜，導致難以精確定義。

尤其 1920 年代臺灣新文學出現後，傳統文人不只書寫傳統文學，傳統文學的作者不盡然是傳統文人，許多鼓吹新文學者，例如賴和、陳虛谷、吳蘅秋、吳濁流、葉榮鐘等人，均曾接受過漢文教育，受過儒家思想薰陶，也會作漢詩，並加入詩社，這些擅長新文學，也發表舊文學作品者可稱為傳統文人嗎？如果依照張靜茹的分類，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在其著作中將致力於新文學創作、但晚期投入漢詩領域的周定山也歸入傳統文人的範疇。

亦有研究者將黃得時視為最典型的傳統文人代表。⁶⁴然而，雖然黃氏幼時曾入私塾修習漢文，而會作漢詩，但其文學作品主要以白話文，甚至是日文書寫，並曾加入日人西川滿等發起的「臺灣文藝家協會」，且其專長為中日比較文學、臺灣文學史和鄉土文學研究。在其身上似乎難以找到太多與傳統有關的連結。

是以，將會作漢詩的新文學大將也納入傳統文人的作法，難免讓人產生質疑。畢竟他們仍以新文學作品為創作主力，且在新舊文學論戰時，陳虛谷、葉榮鐘等人均曾為文抨擊舊文學者，若只因其會作漢詩，即將其納入傳統文人的陣營，顯然不夠周延。會作漢詩的漢詩人⁶⁵與傳統文人兩者之間，應該不是一個全然對等的等號。

針對此疑問，黃美娥提出畢生文學創作主要為傳統文學（文言文、漢詩、文言小說……）的文人方為傳統文人的看法。認為：「這些人的文學成績，儘管可能不乏維新思想的言論而與新文學家近似，如連橫、魏清德、謝雪漁、鄭

⁶⁴ 李泰德，〈文化變遷下的臺灣傳統文人—黃得時評傳〉，頁 2。

⁶⁵ 關於漢詩人，施懿琳定義如下：凡是經常從事詩作，且已被肯定者，始可謂之詩人。而所謂被肯定，可以下列兩點作為衡量的尺度：其一，必須是詩社的成員。其二，必須有個人的詩集，或者其詩作必須見於詩會的徵詩或課卷，或是收錄於時人及後人所編纂的詩集中。施懿琳，〈日治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 93-94。

坤五……等，但在目前仍以其舊文學的成果而作為其一生評斷所繫，故在臺灣文學史中依然被視為傳統文人群；相對地，某些文人雖然一生中曾經寫過傳統文學作品，如張我軍、賴和、林荆南……等，但是由於其人對於新文學（白話文、新詩、白話小說）的強力支持與創作實踐，甚至在新、舊文學論戰中站在支持新文學的一方，對於傳統文學多所批判，因此仍被視為代表新文學家一方。」⁶⁶綜合前述，黃美娥係以創作時主要的文體及文人對其自身身份的認知，作為新舊文人的區隔。

柳書琴則採用「文化世代」的概念，對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加以定義。柳氏認為唯有經歷過 1895 年臺灣割讓的重大歷史變局，以及 19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引發的文化領導權失落之雙重衝擊及雙重舊化者，方有資格稱得上「舊文人」。此處所謂的「舊」來自兩方面，一個是內在心理層面上舊國文化遺民的「舊」，一個是文化公共領域中相對於西學／新學、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舊」；前者是一種自我選擇，後者則是一種被迫的裁定。

依柳書琴的說法，傳統文人世代出生於 1860-1885 年間，自幼即接受以科舉考試為目標的漢學教育，具備儒學教養。他們之中不少人曾參與科考，經歷過割臺戰爭中的憤怒和驚恐，也經歷過國籍選擇，有人內渡中國大陸，有人以漢詩與第一代日本官僚交往，也有人終身以棄民自我認同。雖有諸多歧異，但「維繫斯文於一線」的使命感使他們共同締造一個漢文共同體，成為日治時期詩社、文社的創辦人或靈魂人物。

至於清法戰爭（1883-1885）結束後，至乙未之變前後或之後出生，在 1920-30 年代，仍選擇從事傳統漢詩寫作者，即被柳書琴排除於傳統文人之外。柳氏認為此世代是日治時期接受雙軌教育的第一代，割臺之際他們正值預備接受書房教育或初入書房學習之齡，有相當的漢學素養，但其素養已不如上一個世代深厚，多半曾接受公學校以上的現代教育，其教育背景與所處環境與上一

⁶⁶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14-15。

個世代有所不同，故稱其為傳統文人的衍生世代，此一衍生世代長期徘徊於不同知識體系與價值之間，苦惱抉擇和適應。⁶⁷

雖然，在西方世界應用世代概念的論著不少，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曾說：「大約同時生在同樣環境中的人，必然受到類似的影響，尤其是在他們的成長期。經驗證實：拿這樣的一群人來與比他們年老許多或年輕許多的團體相比較的話，他們的行為顯示出某些一般而言相當清楚的特徵。即使是就他們最不一致的地方而言，也是如此。……這種來自同一年代的共同烙印正是造成一個世代的東西。」⁶⁸在臺灣史學界，周婉窈亦注意不同世代的差異，其研究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發覺主導運動的新興知識份子的心態和世界觀不同於前後兩個世代，稱之為「乙未戰後新生代」。從事皇民化運動研究時，又注意到年輕一代和前兩代的差異，而提出「戰爭世代」的說法，即出生於1920至1930年的臺灣人。⁶⁹然而，若援引此概念來定義日治時期臺灣的傳統文人，恐有不盡妥當之處。⁷⁰

首先，1885年之前出生的傳統文人不乏曾受現代教育者，例如謝汝銓（1871-1953）、王石鵬（1877-1942）、陳貫（1882-1936）、黃春潮（1884-1959）、莊雲從（1884-1925）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黃旭東（1854-1913）、林玉書（1882-1964）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⁷¹林子瑾（1878-

⁶⁷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史研究》14:12（2007年6月），頁41-88。

⁶⁸ Marc Bloch 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頁171-172。

⁶⁹ 周婉窈，〈「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頁1-2。

⁷⁰ 施懿琳將賴和、陳虛谷、吳蘅秋等應社諸子稱為「二世文人」，主要是強調兼擅新舊文學者多為乙未前後出生的世代，與洪棄生、吳德功等純粹書寫傳統文學的一世文人有別。施懿琳，〈日治中晚期二世文人的詩社活動與作品特色—以彰化「應社」為分析對象〉，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313-361。然而，乙未前後出生的世代，以傳統漢詩文為主要書寫形式者亦為數不少，例如施廉、施江西、許幼漁等，故不宜以世代來劃分。

⁷¹ 景福基金會編，《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臺北：景福基金會，1992），頁1。

1954) 則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⁷²反之，絕大多數乙未前後出生的文人亦受過書房教育，例如施廉(1900-1967) 公學校畢業後，向叔父施梅樵習漢文，⁷³詹作舟(1891-1980) 自幼入黃倬其的書房就讀，⁷⁴連德賢(1907-1986) 早年師事莊嵩。⁷⁵兩個世代的文人均有同時接受新舊教育者，在教育背景上並非截然有別。

其次，臺灣詩社於 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大興，各種大大小小的詩社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出現，當時正是文學社會化的時期，擊鉢吟詩是一種社會交際的手段，亦是一種生活風雅。當時活躍於詩社者多半為乙未前後出生的年輕一輩，其中不乏終身以傳統詩文為主要創作對象者，相對於新文學者而言，顯然是較為傳統的一個群體，不宜將之排除於傳統文人之外。雖然這些年輕一輩的文人多半擁有新式學歷，但其漢學也有相當基礎。以師範學校畢業者而言，早期的師範生入學前絕大多數受過書房教育，1911 年之前，漢文一直是師範學校入學考試科目之一，書房由是兼具補習教育之功能，足以吸引有志升學的公學校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至書房進修。⁷⁶

此外，柳書琴認為必須要經歷過 1895 年臺灣割讓和 1920 年代的新舊文學論戰，即所謂雙重衝擊和雙重舊化者，方能稱為傳統文人。不過，許多知名的舊文人於 1920 年代之前或初期即已凋零，例如謝頌臣(1852-1915)、黃旭東、蔡啓運(1855-1911)、袁炳修(1862-1910)、鄭毓臣(1862-1915)、林癡仙、陳瑚(1875-1922)、呂厚菴(-1908) 等人，若因其未經歷論戰，便將其排除在傳統文人之外，顯然並不妥當，這是柳氏未注意之處。

⁷²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頁 122。

⁷³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250。

⁷⁴ 張瑞和編，《詹作舟全集》，書前作者介紹。

⁷⁵ 簡榮聰，〈典型在夙昔—連德賢先生詩集序〉，收於連德賢，《連德賢先生百年冥誕紀念集》(南投：連學堯，2006)，頁 9。

⁷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頁 94-95。

日治時期臺灣的傳統文人係指曾受漢學教育，並以傳統漢詩文為主要創作者。亦即以書寫的文體為判定標準，即使曾接受新式教育，或具備新思想者，只要堅持以漢詩文寫作，亦屬傳統文人陣營。不過，文人身份的認定，除了當事人的自我認同外，亦需獲得當時社會輿論的承認，至少需具備下列條件之一：1、是詩社或文社的成員，或曾參與詩、文社的活動。2、漢詩文作品曾刊登於報章，或收錄於時人編纂的詩集，或見於詩會的徵詩或課卷。

目前被學界視為傳統文人者，許多人擁有公學校、國語學校、甚至總督府醫學校的文憑。透過學校教育，他們學習日語，並接收各式新知，其思想觀念和知識水準均已超脫出傳統的範疇。以公學校教授科目而言，修身、日語、算術、體操始終是固定的科目，理科、圖畫、實科於 1912 年出現，地理於 1919 年出現，唱歌於 1919 年成為固定科目，日本歷史則於 1922 年開設。⁷⁷其中，算術、理科屬於近代科學，體操注重運動與健康，唱歌和圖畫屬於美學範疇，均為過去私塾教育所無。至於培養臺籍師資的公學師範部乙科，最初總督府訂定的課程重點在日語、漢文、理科、數學、美術、音樂、體操等一般教育科目，除漢文外，其餘的均為新興學科。⁷⁸因此，受過新教育者，其日語應該具有一定的程度，也擁有現代科學的觀念，也可能在修身、日本歷史等課程中，培養出對日本的認同。凡此，均與僅受書房教育者有一定的差異。

然而，日治時期臺灣的漢詩社群，似乎無法以接受新教育之有無作為劃分的依據。例如林癡仙與莊雲從私交甚篤，雖然兩人年齡相差 9 歲，莊雲從又出身國語學校，但仍經常結伴飲酒唱和狎妓。⁷⁹可知兩人因喜愛作詩和同樣具有文人習氣而臭味相投，不因教育背景不同而存在重大差異。林獻堂亦曾和總督府醫學校出身的黃旭東於 1913 年同遊中國和日本，⁸⁰顯示兩人交誼頗深，並非不

⁷⁷ 周婉窈、許佩賢，〈臺灣公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總說〉，《臺灣風物》53：4（2003 年 12 月），頁 134-137。

⁷⁸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118-122。

⁷⁹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7 月 15 日、21 日，8 月 20 日、26 日，9 月 4 日，未刊稿。

⁸⁰ 1913 年 3 月 29 日櫟社同人在詹厝園林癡仙之無悶草堂舉辦雅集，替林獻堂和黃旭東餞行，惜回

同的群體。再以櫟社於 1910 年 4 月 24 至 25 日舉行的全島聯吟詩會來看，出席者中莊嵩、鄭汝南、林仲衡、王石鵬等人或受過新教育，或有留日經驗，但依舊與眾人一同酬唱。因此，將接受新式教育者從漢詩團體中完全抽離出來，實非妥當。⁸¹再次，嘉義的林玉書雖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後，返鄉行醫，為受過高等教育的新知識份子。但他曾籌組茗香吟社、羅山吟社等詩社，並多次舉辦聯吟大會，在舊文壇有一定的地位。曾先後擔任北臺最大詩社瀛社社長的謝汝銓和魏清德均畢業於國語學校，故無法因其學歷，而認定其不屬於舊文學陣營。由此可見，漢詩社群是基於對漢文的共同喜愛而聚集的團體，成員中教育背景或許有別，但並不影響彼此在文學上的切磋。

事實上，一如「傳統」只是與「現代」相對的字眼。之所以稱呼日治時期堅持漢詩文創作者為「傳統文人」，主要是與以白話文、白話詩寫作為主的「新文人」作一區隔。因此，傳統文人並不代表其一定只受過書房教育，或未接觸過現代事物，或思想觀念保守，只是強調他們選擇以傳統的漢詩文為創作的對象，有別於新文人。

不過，同時兼擅新舊文學創作，而難以歸類者，便不宜稱為傳統文人。例如謝國文雖為南社成員，但其白話小說亦有一定的成就，尤以諷刺林獻堂為御用紳士的〈犬羊禍〉最為著名，⁸²故與傳統文人有別。

關於傳統文人身份的認定，傳統文人若依字面意義，會讓人以為其多半以設帳授徒為業，閒暇時則參與詩社吟詠，或將作品投諸報刊，而以文人的身份終其生。雖然林述三、林竹山、呂喬南、施梅樵、莊嵩等人確實終身以授徒為業，然而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職業樣貌實遠較想像寬廣。

許多文人擔任報社的漢文版記者，例如瀛社社員林佛國、楊仲佐、魏清德、林湘沅、謝汝銓均是《臺灣日日新報》記者；⁸³櫟社社員王石鵬、傅錫祺、

程時黃旭東於同年 11 月 14 日客死東京。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5、9。

⁸¹ 出席者名單，詳見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6。

⁸² 吳毓琪，《南社研究》，頁 199-202。

莊雲從、鄭汝南、陳瑚、陳貫均是《臺灣新聞》記者或藝文欄主編；⁸⁴南社社員連橫、胡南溟、黃得眾、謝石秋曾為《臺南新報》記者。⁸⁵也有人在日本的教育設施從事教職，例如陳廷植為大稻埕公學校教師；⁸⁶李種玉 1900 年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擔任教務囑託，教授漢文、習字。1920 年參加日本文部省中學教師漢文科檢定考試及格，改聘為助教授。⁸⁷至於創立樹林造酒公司的黃純青、⁸⁸經營大和拓殖株式會社的邱雲興、⁸⁹與蔡惠如等人創立協和製糖株式會社，並開辦牛罵頭信用組合的王學潛則兼具商人的身份。⁹⁰此外，許多傳統文人身兼地方基層公職，例如洪以南為淡水區長，蔡啓運為苑裡區長，林獻堂、林幼春為霧峰區長，蔡惠如為臺中區長等均是。

事實上，許多傳統文人同時身兼數職，謝道隆雖以教書為業，但因精岐黃之術又開設泰和藥舖；⁹¹傅錫祺於割臺後曾於潭仔墘、葫蘆墩開館授徒，後又任

⁸³ 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頁 209。

⁸⁴ 廖振富，〈緒論：櫟社文學史料的蒐集與研究〉，收於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41-42。可惜早期的《臺灣新聞》已不可得見，今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為 1940 年以後發行者，如能重新尋獲早年的《臺灣新聞》，將大有助於日治前期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

⁸⁵ 連橫於 1899 年在臺南創辦《台澎日報》，翌年改組為《臺南新報》，並延攬多名南社社員任漢文部記者。一時之間，《臺南新報》主筆者幾乎為南社社員。吳毓琪，《南社研究》，頁 136-137。

⁸⁶ 鷹取田一郎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10。

⁸⁷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9 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 197。

⁸⁸ 黃純青，《晴園詩草》（臺北：龍文，1992），書前作者介紹。

⁸⁹ 邱雲興：1887 年生，苗栗人。1910 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隨任公學校訓導。1914 年任內湖區長及該區土地整理委員，1918 年任銅鑼灣區長，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仍任同區庄長。栗社成員，曾出席 1930 年 2 月在臺中舉行的全島聯合吟會。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11；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頁 163。

⁹⁰ 陳瑤塘主編，《清水鎮志增編本》（臺中縣清水鎮：清水鎮公所，1998），頁 479。

⁹¹ 由於謝道隆開設泰和藥舖，其門生張麗俊之母親和子女若有疾病，常請他來看診，或向其請教用藥之方。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57、64、192、

《臺灣新聞》漢文欄主筆長達 18 年，並擔任潭子庄長達 17 年；⁹²黃純青從商之餘，又任樹林區長、鶯歌庄長、臺北州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等職。⁹³

在具有多重身份的文人中，有些人其實並不以文人的身份而為時人所重，例如林獻堂最為人所知的是其在民族運動上的角色，並不以文字謀生。然而，林獻堂多年持續參與櫟社的活動不輟，1940 年代更是領導櫟社復興的重要人物，向來提攜新進社友不遺餘力，⁹⁴且極為重視文教，積極維繫漢文的延續（詳見第六章第三節），並有《海上唱和集》和《東遊吟草》兩部詩集行世，因此他屬於傳統文人，殆無疑義。至於黃欣，曾歷任臺南市西區長、臺南州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等職，又在嘉義廳下竹圍庄經營農業及魚塢，亦任有限責任學甲漁業信用組合監事和嘉義銀行取締役，縱橫於政商兩界。⁹⁵同時，黃欣亦是南社的成員，黃洪炎譽之為「於漢學漢詩造詣亦頗深，其名且著於全島。」⁹⁶故其雖縱橫於政商界，亦在傳統文人陣營中佔有一席之地。

反之，曾創設鷺音吟社、籌組羅山吟社的林維朝，文人的色彩向來鮮明，也在新港街經營德美煉瓦窯和舊式糖廊，1910 年任打北輕鐵春龍公司長，1911 年又任嘉義銀行頭取，1914 年升為頭取。1916 年成立公司制的嘉昌商行，經營

220；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0），頁 1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1），頁 141。

⁹²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369-383。

⁹³ 黃純青，《晴園詩草》，書前作者介紹。

⁹⁴ 關於林獻堂在櫟社中的角色，可參閱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2006 年 12 月），頁 27-65。

⁹⁵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頁 124。

⁹⁶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344。

酒類、糖粉、穀類等雜貨買賣。1928 年又成立新隆益商行。⁹⁷因此，林維朝亦具有商人及實業家的身份，但這並不與他傳統文人的角色相衝突。

此外，由於吟詩唱和是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能文之士普遍的餘興，因此諸如礦業鉅子顏雲年等名流也會作漢詩，並參與詩社；⁹⁸霧峰林家的林烈堂、林階堂也出席過櫟社詩會，⁹⁹林瑞騰¹⁰⁰雖非櫟社成員，但曾多次提供其臺中宅邸瑞軒作為櫟社集會地點；¹⁰¹甚至連不以詩聞名的林紀堂在《烏松閣唱和集》和《臺灣日日新報》上也可找到其漢詩作品。¹⁰²那麼，這些偶爾附庸風雅的社會名流也屬於傳統文人的範疇嗎？又如蔡惠如為櫟社成員，也有詩作流傳，但據葉榮鐘指稱，他生平不以詩見稱，也未嘗以詩人自命，漢詩僅是他順應當時的風尚，

⁹⁷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33-36。

⁹⁸ 顏雲年為瀛社成員，且在瀛社的發展史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舉凡社內組織之改革、社外聯吟會之結盟、全島詩人聯吟大會之召開，均為強而有力的推手。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頁 195-196、212-213。

⁹⁹ 林階堂曾出席 1909 年 4 月 3 日的櫟社春會及 1911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的櫟社春會及梁任公歡迎會；林烈堂則曾出席 1911 年 4 月的櫟社春會及梁任公歡迎會。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5、7。

¹⁰⁰ 林瑞騰：林季商第五子，名資鑣。1926 年創立瑞裕拓殖株式會社，主要做土地、建物買賣借貸、開拓土地等事業。杉浦和作編，《第八版臺灣會社銀行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1927），頁 199。

¹⁰¹ 1909 至 1911 年的櫟社集會，多在林瑞騰瑞軒舉行。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5-7。

¹⁰² 林紀堂在《烏松閣唱和集》有詩兩首，其一「蘭臺遊集盡豪雄，下馬登門氣吐虹。爭折松枝當談麈，花迎冠劍綠蔭中。」其二「虬枝擎起半隅天，自有風霜歷試權。解賞後凋雙翠蓋，知君勁節似松然。」尾崎秀真編，《烏松閣唱和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頁 70。林紀堂刊於《臺灣日日新報》之詩為〈敬和佐藤太守祝紀元節瑤韻〉，其一「紀元令節祝春晴，民俗維新頌聖明。衽席同登瘠樂只，囂氛靜後尚心驚。」其二「宏施樾蔭延臺島，懋著奇勛達帝京。樽酒交酌逢此日，詩歌權當鳳凰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2 年 2 月 23 日，第 3242 號，頁 4。

作為一個士紳所應具的修養而已。¹⁰³若果如是，也應將蔡惠如歸為傳統文人嗎？

依筆者之見，只要有漢詩文作品刊登於報章、收錄於時人編纂的詩集，或曾參與詩社活動，即代表當時輿論承認其具有文人的身份，即可歸屬於傳統文人的陣營，而不必去細究其是否該稱為文人，畢竟當時傳統文人多具有多重角色。特別是顏雲年，1912年在其豪宅「環鏡樓」（位於今之基隆火車站附近的忠二路，毀於二次大戰）落成後，曾舉辦全島詩人聯吟大會，盛況空前。聯吟所得之詩 486 首，更於 1920 年集結成《環鏡樓唱和集》出版。顏雲年之別墅「陋園」（位於今基隆信二路建國新村一帶）於 1919 年竣工後，亦舉辦全臺第二次詩人大會，紀念詩集《陋園吟集》則於 1924 年出版。¹⁰⁴因此，顏雲年在古典詩壇亦有其一定的地位。

二、傳統文人與社會領導階層

關於傳統文人與社會領導階層的區別究竟何在？

何炳棣研究明清社會的社會流動，利用進士名冊、登科錄、同年齒錄、地方志等資料，以計量方法，說明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為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一般人可以利用科舉成為士紳，改變或保持現有的社會身份和地位。認為清代中國社會上層只包括所有在職、候選或已退休之官吏和具有任官資格之進士、舉人和貢生，而不應包括無任官資格的生員和監生，雖然生員和監生的地位，與一般平民有所不同。¹⁰⁵

¹⁰³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化，1995），頁 214。

¹⁰⁴ 陳青松，〈漫談基隆地區傳統文學發展史（上）〉，《臺北文獻》160（2007年6月），頁 84-88。

¹⁰⁵ Ho Ping-ti (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50-51, 104-105.

張仲禮透過教育程度（學銜與官銜）、出身方式（正途或異途）與道德標準來定義「士紳」（gentry），同時，注意到其有身份與社會地位高下的區別，而將士紳分為上層（正途或異途出身的官吏、具有舉人學銜以上資格者）與下層士紳（生員、例貢、監生）。¹⁰⁶在 1960-1970 年代研究者普遍將士紳等同於社會領導階層的代名詞。

但是，這樣的定義似乎無法滿足所有的研究者。蕭公權研究十九世紀中國的鄉村，除注意到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外，同時也發現許多讀書人雖然沒有取得科舉功名，但往往因未來可能成為士紳成員而擁有一些其他平民所沒有的利益。因此，認為社會領導階層宜包含紳和士（gentry and scholars）。¹⁰⁷R.M.Marsh 研究清代中國領導階層的流動，則指出社會領導階層應包括有科舉功名之士紳、大地主和富商三者。¹⁰⁸

孔復禮更提出「地方菁英」（local elite）一詞，以區分士紳與地方菁英，並認為應依據地方菁英的活動能力和範圍，將菁英分為全國性、省區與地方性三層。¹⁰⁹Joseph Esherick 和 Mary Rankin 則指出，除了應該注意教育程度、道德標準、社會地位等指標之外，更應該以「影響力」（influence）作為判斷社會菁英的標準。也就是說，社會菁英不一定具有士紳的身份或社會地位，更不一定需要以學識或道德標準來衡量，凡能夠運用「策略」（strategies）在地方上建構某些「支配模式」（patterns of dominance）來發展影響力的個人與家族，都可稱之。因此，參與訴訟或領導地方建醮等祭祀活動之功能者亦包含在內。¹¹⁰

¹⁰⁶ Chang Chung-li (張仲禮),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p.3-6, 11, 13, 17, 21, 29-32, 51-70.

¹⁰⁷ Hsiao Kung-Chuan (蕭公權), *Rural China: Imperia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pp.574.

¹⁰⁸ R.M. Marsh, *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 in China*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1) pp.38.

¹⁰⁹ Philip A. Kuhn (孔復禮),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 8, 42.

¹¹⁰ Joseph W.Esherick &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p 9-13.

據蔡淵黎研究，在清代台灣社會，除了清廷委派的地方官吏外，所有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所有在職、候選或退休的大小官吏、進士、舉人、貢生、例貢生、生員及監生，均包括在社會領導階層之內。而臺灣的生員、監生和例貢生並未遭受差別待遇，一般人都將他們看成和有任官資格的進士、舉人、貢生同屬一類。此外，（一）墾首、大結首、隘首和管事，（二）郊商、擁有厚資之買辦，（三）富豪，（四）鄉庄組織中之總理、董事、街庄正副、聯甲頭人、大總理、簽首、總簽首，（五）族長或族正，（六）鄉賢、耆老、名士碩儒、著名塾師或文人，（七）臨時辦理地方公務之總理、董事，（八）與各種社會領導人物關係密切之家族成員，亦是社會領導階層的一員。¹¹¹總結而言，社會領導階層係指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以及沒有科舉功名的富商、地主和儒士等。¹¹²其中，具有功名的文人最為官府所重，例如林維朝 1887 年考取秀才後，1892 年便被嘉義知縣鄧嘉縝委以團防事宜，1894 年又被推薦為打猫西堡團練分局長，擔負地方防務重任。¹¹³

日治後，受到殖民政治、經濟體制的影響，臺灣社會逐漸變遷，漸由傳統社會轉型為過渡性殖民社會，亦即是帶有同化意味的現代化取向社會。社會領導階層在此時期是指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等方面地位較重要或表現傑出者。¹¹⁴至少包括接受殖民政府紳章，或被總督府納入基層行政和治安組織中的臺人，包括總督府評議員、州（市街庄）協議會員、縣廳及辦務署參事、街庄區長、街庄助役、官衙任職者、保甲（良）局長、保正，以及三師（醫師、律師和教師）、賣捌人，廟中的首事等，但常有一人兼具多種身份的情形。

依前述定義，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多屬社會領導階層或社會菁英的一員，因其具備漢學素養，在鄉里間為人所敬重，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即使其在清

¹¹¹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組成〉，《史聯》2（1983年1月），頁25-32。

¹¹²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5。

¹¹³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24。

¹¹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5。

代並未具有功名，亦成為執政者不得不仰賴的對象，故以頒授紳章、讓其出任基層地方行政公職等手段籠絡之。

不過，在社會領導階層中尚包含若干不具備漢詩文寫作能力但地位重要的豪富有力者，故仍應與傳統文人有所區隔，不能一概而論，例如辜顯榮，雖早年曾向鹿港進士黃玉書請益，修習漢學，¹¹⁵但並未有漢詩文作品傳世，故並非傳統文人；歷任臺北州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貴族院議員的許丙，亦非傳統文人。

1920、30年代詩社林立，許多參與詩社活動的傳統文人仍具有保正、方面委員或街協議會員的頭銜，但有部分文人不具公職的頭銜，只是單純的商人，例如蕭永東從事冰塊和魚類買賣，許五湖經營日常雜貨店，林明江是棉布商，¹¹⁶吳維岳曾任職多家會社，並入霧峰林梅堂家為書記，最後經營雜貨業，¹¹⁷他們只能算是受過新式教育又具備漢文素養的文化人，若算是菁英，亦屬於較低層級。

總括而言，具備書寫專長並擔任基層公職的傳統文人，可謂是地方上的領導階層及菁英，但沒有寫作漢詩文作品的領導階層及菁英，自然不是傳統文人。反之，許多參與詩社活動的傳統文人，雖以漢文書寫為創作主軸，但其社會地位難以領導階層或菁英稱之。因此，漢詩文作品為創作者才是本論文探討的對象，不論其是否兼具其他身份。

三、傳統文人的分類

傳統文人是一個龐雜的群體，除以漢詩文寫作為其共通性外，彼此間仍存在著頗大的差異。

¹¹⁵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鹿港：鹿港鎮公所，2000），頁24。

¹¹⁶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臺北：臺灣詩人名鑑會，1936），頁377-378。

¹¹⁷ 吳維岳，《七十年回憶錄》（南投：吳醉蓮，1961），頁1-37。

以地域而言，日治時期臺灣的三大詩社—瀛社、櫟社、南社，正好分處北中南三地，領導三個地區的傳統文人群。蓋臺北為臺灣總督府所在，臺南為前清府城，至於中部由於鹿港在清代文風已頗盛，加上霧峰林家的獎助，知識份子思想的進步甚至比北部及南部的人還要領先，¹¹⁸亦是文化重鎮。同時，北部有《臺灣日日新報》、中部有《臺灣新聞》、南部有《臺南新報》，各自成為當地文人發表漢詩的重要園地。因此，傳統文人依地域可分為北中南三群。至於花蓮、臺東和離島澎湖，亦有文人及詩社的活動，只是數量少了許多。¹¹⁹

依過去的既定印象，北部的瀛社詩人較為親日，因其創社之初受到日本官方的支持；¹²⁰積極出資贊助瀛社活動的林熊祥、顏雲年等人與日人關係亦十分友好；多名社員且為《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其言論立場常附和執政者。¹²¹至於中部的櫟社則較具有民族意識，社員林幼春、林獻堂、蔡惠如等人均積極投入民族運動。但此種看法近來已遭受修正，黃美娥指出，櫟社本身實屬文學社團，成員之間的民族意識係因人而異，王石鵬和蔡啓運較傾向日本；¹²²而瀛社的成員複雜，亦不乏如張純甫般具有民族意識者。¹²³所以傳統文人的政治立場與其地域並未有直接的關係，即使同一詩社的文人，其政治立場亦不一致。

¹¹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頁 12。

¹¹⁹ 關於花蓮、臺東、澎湖的文人及漢詩作品，可參閱黃洪炎，《瀛海詩集》，頁 423-437。

¹²⁰ 林佛國回憶瀛社創社的緣由時，曰：「日據時代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同人為謀保存國粹並發揚光大，遂有籌設瀛社之議，經該報守屋善兵衛社長同意，正式聲請，囑該部尾崎秀真接洽，立得兒玉總督面允。」林佛國，〈瀛社簡史〉，收於瀛社創立六十週年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瀛社創立六十週年紀念集》（臺北：瀛社，1969），頁 11。

¹²¹ 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頁 341-379；其後收於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263-267。

¹²² 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 期，民國 92 年 7 月，頁 222-246。其後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343-380。

¹²³ 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頁 341-379；其後收於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263-264。

除了親日文人、民族運動文人外，還有一種遺民型文人，這類文人極度緬懷清國，且在日治初期具有不仕新國的行爲表現，例如洪棄生、許夢青、林癡仙、林幼春、王松等。然而隨著日人統治日趨穩固，遺民文人也各自出現相異的肆應之道。洪棄生、許夢青畢生堅拒日人拉攏；林癡仙先是耽於酒色，而後則爲民族運動奔走；林幼春由消極隱居而積極抗日，卻擔任霧峰區長，與日人也有妥協的一面。¹²⁴所以，即使均自認爲遺民，其行爲仍有不小的差異。

其次，傳統文人之間也存在著社會階級的差異。林獻堂出身臺灣中部首屈一指的大家族霧峰林家，是臺人的意見領袖，平日常與總督及臺中州知事交往，1945年更被指定爲貴族院議員，其影響力遍及全臺，甚至達於日本；桃園的簡朗山亦是貴族院議員；基隆的顏雲年除富甲一方外，亦是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議員，均是金字塔頂端的臺籍菁英。相對的，張麗俊只是保正及豐原街協議會員，日常只與警察等基層日籍官吏有接觸的機會，其影響力限於居住地，屬於鄉里型的傳統文人；同屬櫟社成員而與張麗俊友好的袁炳修和葉篤軒亦與張氏的地位類似。

再者，在傳統文人群體中，除舊學出身外，也有受過新式學校教育者。這些具備新式學歷的文人，其政治立場、對現代西洋文明的態度等是否與其他文人有顯著的歧異，確實頗堪探究。

再次，日治時期女性文人已開始嶄露頭角，例如王香禪、張李德和（1893-1972）、黃金川（1907-1990）、洪浣翠、蔡旨禪（1900-1958）、吳燕生（?-1976）等人，她們的詩作常見諸於報刊，絲毫不讓鬚眉。其中，王香禪爲臺北艋舺人，藝妓出身，早年學詩於趙文徽，¹²⁵文徽授以《香草箋》，她便朝夕詠

¹²⁴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遺民詩人的應世之道—以新竹王松爲例〉，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纂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頁 233-234。其後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321-322。

¹²⁵ 趙文徽（1854-1927）：號一山，又號劍樓，臺北板橋人。年少時鄉前輩賴洪喜其爲人爽朗，令從之習詩文、長短句。曾應科舉，惜落第，遂無意仕進，從此潛心岐黃，行醫教讀於家。日治後遷居大稻埕，設帳授徒，署其塾曰「劍樓」，四方從學者頗眾。曾迺碩總纂，王國璠編纂，

誦、刻意模仿，而以「詩妓」聞名遐邇。¹²⁶張李德和為雲林西螺人，1910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技藝科（專收本島女生），1912年與嘉義醫生張錦燦結婚。1923年任鷗社顧問，1926年成立琳琅山閣詩仔會，翌年創設鴉社書畫會及自勵會，1930年加入春萌畫會，又成立連玉詩鐘，後又增設書道會、畫會、圍棋會、音樂會等。1933至1943年間，其畫作多次入選臺展、府展，成為活躍於嘉義文壇的女文人。¹²⁷

黃金川，臺南鹽水人，黃朝琴之妹，有「三臺才女」之譽。14歲時隨母親遷居日本東京，18歲返台，師事施梅樵，專心研究詩學。19歲時，連橫曾譽其「初學吟哦，雛奉聲清，已非凡鳥，若更加閱歷，其造就未可量也。」¹²⁸1919年與高雄首富陳中和之八子陳啓清結婚。1930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詩集《金川詩草》，係目前所知臺灣第一位出版詩集的女詩人。1992年其家族重新編訂其詩集，交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正續合編金川詩草》。¹²⁹

洪流翠，新莊人，為林瑞騰的妾，自14歲起就會作詩，亦能篆刻，以擅吟詠聞名，¹³⁰作品曾收於《台灣詩薈》中，¹³¹是霧峰林家林家首屈一指的才女。連橫曾誇其詩「無語不香，有詞皆秀」，並說「其錦囊，時貯佳句。」¹³²

《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頁188-189。

¹²⁶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00；邱旭伶，《臺灣藝姐風華》（臺北：玉山社，1999），頁163。

¹²⁷ 江寶釵、張婉英編輯，〈張李德和生平表〉，收於江寶釵編，《張李德和詩文集下》（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頁601-608；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4），頁253-260。

¹²⁸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下》，頁482。

¹²⁹ 許俊雅，〈三臺才女黃金川及其詩〉，收於黃俊傑編，《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高雄：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1994）；林翠鳳，〈黃金川的詩學養成及其《金川詩草》內容探討〉，《東海中文學報》13（2001年7月），頁195-205。

¹³⁰ 洪流翠即下厝的廈門奶，養父早年在淡水河邊開米店，後舉家遷至廈門，嫁民國海軍中將陳季良妻，生子施漢材（陳瑚），後因陳季良被調至駐蘇聯大使館任武官，音訊全無，改嫁林瑞騰。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63-64。

蔡旨禪為澎湖馬公人，曾問學於陳梅峰，¹³³並師事於宿儒陳錫如，國學基礎甚佳，1924 年以〈澎湖文石〉參加西瀛吟社的徵詩，獲元掄冠。書畫亦負盛名，持扇奉箋求其書寫者所在多有。¹³⁴1935 年更以「優曇花」入選臺展東洋畫部。¹³⁵1946 年加入櫟社，成為該社創立以來第一位女社員。¹³⁶吳燕生則是吳子瑜的千金，肄業於北平中國大學，¹³⁷曾以女性的身份，參與東山詩會和櫟社的集會。¹³⁸

由上所述，傳統文人可依地域、政治立場、社會階級、學歷、性別等略予分類，但同類型的文人間仍存在者或多或少的差異，難以一概而論。

¹³¹ 洪流翠的「繡餘雜詠」收於《臺灣詩薈》第 19 號；「詠物四首」收於《臺灣詩薈》第 20 號。詳見連橫編，《臺灣詩薈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422、493。

¹³²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下》，頁 482。

¹³³ 陳梅峰：1857 年生，澎湖湖西鄉沙港人，1882 年考上秀才。一生致力於國學之傳承，除在廈門、高雄旗津開館授徒外，在沙港開杏園堂私塾數十年。1900 年獲紳章，1903 年任澎湖廳參事，翌年任第六區區長，1905 年辭職，1923 至 1932 年任湖西庄庄長。西瀛吟社成員。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353。

¹³⁴ 蔡罔甘，《旨禪詩畫集》（臺北：龍文書局，2001），書前介紹；魏秀玲，〈蔡旨禪及其《旨禪詩畫集》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頁 14-34。

¹³⁵ 賴明珠，〈閩秀畫家筆下的圖像意境〉，收於《異象與美學—臺灣女性藝術展》（臺北：臺北市立圖書館，1998），頁 30。

¹³⁶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6 年 1 月 26 日，未刊稿。

¹³⁷ 吳燕生先嫁蔡漢威（蔡伯毅子），離婚後再招贅，育有一男二女。戰後曾代表臺灣參加第二、三屆世界詩人大會。鐘義明，《臺灣的文采與泥香》（臺北：武陵，1992），頁 187。

¹³⁸ 吳燕生曾以來賓的身份，參加 1934 年 5 月 5 日在霧峰萊園舉行的櫟社春季小集。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臺北：莊垂勝，1943），頁 2；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187。

第二章 傳統文人對殖民政治之肆應

第一節 對總督府施政之因應

一、日治初期的出處進退

1895 年，清廷割臺的消息傳抵臺灣後，臺民極為震驚和悲憤，吳德功〈乙未八月有感〉寫道：

陸沈猶未睹神州，海外干戈動不休。正朔於今更鳳曆，蓬瀛從此判鴻溝。
心傷禾黍頻增感，變起滄桑孰解憂。太息中朝和議定，難將覆水挽回收。¹

基於民族意識，深受儒家「漢賊不兩立」思想影響的傳統文人，在臺灣割讓確定後，部分選擇投筆從戎，加入全臺各地風起雲湧的義軍。洪棄生即與許夢青、施仁思²等人，擔任中路籌餉局委員；³謝道隆也參丘逢甲組織的團練，協助招募誠信十營義軍，並出任誠字正中營之首。⁴至於蔡啟運，因與丘逢甲誼屬中

¹ 吳德功，〈乙未八月有感〉，收於吳德功，《瑞桃齋詩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122。

² 施仁思（1858-1897）：字香藻，號子芹，鹿港人。1891 年赴福州鄉試，中式舉人，與鹿港庠生許咸中（許夢青之父）交情甚篤。乙未之變，與鹿港武進士許肇清，偕同鹿港士紳組成義勇軍，八卦山之役吳湯興、徐驥犧牲後，知事無可為，只好攜眷內渡。後因抑鬱成疾，於 1897 年 6 月病逝。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頁 94；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 42。

³ 林熊祥等監修、徐坤泉等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2），頁 106；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頁 94；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 51。

⁴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頁 60-63。

表兄弟，亦參贊軍務。⁵不過，各地的反抗旋被弭平。洪棄生在《瀛海偕亡記》詳載日軍燒殺擄掠和人民逃亡的情景：

至則占民房，掠雞牛，搜軍器。民之移家者，擔簦躡屨，扶老攜幼，累重載舟，紛紛蔽海而浮，妓女勾婦，亦有去者。風雲慘淡，日暮則道路無人，有聞扣戶聲，則闔室皇皇，相驚以番兵來矣，其駭異之情如此。⁶

吳德功亦以「十室九無人，存者惟婦女」、「兵燹兼疫癘，輾轉溝壑死」、「門巷甚蕭條、垣墉都傾圮」⁷來形容戰後殘破蕭條的情景。在此情勢下，不少文人選擇內渡。

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條規定，中、日兩國換文之後兩年內，臺人得自由決定去留。因此，割讓之後不願居臺者可變賣家產返回大陸。迨至 1896 年 12 月，據生員陳洛估⁸計，以農、工為業者幾悉數留臺，富商大賈內渡大陸者亦不過十之一、二，惟貴族及紳士之家，留在臺地者十居其五，返歸中國者亦有五成。士紳半數返歸大陸，乃因欲繼續追求科舉制度下的功名及官職，若留在臺灣，則唯有降為平民；而以教授漢文為業的師儒，唯恐臺島將永無漢文學塾，日後生計將發生困難，亦選擇回歸。此外，許多士紳除在臺有田園房舍外，在中國

⁵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 77。

⁶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6。

⁷ 吳德功，〈乙未之冬合家寄寓甘井外甥林水生家因入城一行爰賦五古十韻〉，收於吳德功，〈瑞桃齋詩稿〉，頁 129。

⁸ 陳洛：泉州人，1878 年來臺，居於艋舺，時 15 歲。日治後，隨時處宜，1897 年授佩紳章，翌年經理艋舺鹽務支館，1899 年任臺北縣參事。1911 年去世。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5。

大陸的祖籍亦有事業住家。⁹因此，許多具有秀才以上功名或以漢文為業的傳統文人，例如進士陳登元、丘逢甲、蔡德芳、許南英、施士洁等紛紛內渡。¹⁰

然而，內渡者中有些人只為躲避戰亂，待局勢稍定，便又回臺，例如楊仲佐¹¹、王石鵬¹²、王松¹³、胡南溟¹⁴，而霧峰林家的林幼春和林獻堂，為保全家族在臺灣的產業，在情勢穩定後也必須回臺；¹⁵一些家中年邁長輩仍留臺灣者，為盡孝道，亦須歸來，例如施梅樵因祖母雙眼失明而返臺服侍；¹⁶亦有因在大陸祖

⁹ 「明年五月ノ期限ニ臺地ノ士民去留如何ニ對スルノ意見」，〈三八：治臺ニ關スル陳洛ノ上申〉，《公文類纂》，明治 29 年，乙永，第 7 卷。

¹⁰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27-28。

¹¹ 楊仲佐於臺灣改隸時，隨父內渡，數年後返臺，居於臺北。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頁 315。

¹² 乙未時，王石鵬選擇避亂閩南，至 1897 年秋天，聞臺灣兵氣已銷，始奉親東渡回臺，寓居竹塹東南名勝古奇峰附近。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2003 年 7 月），頁 222-246。其後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345。

¹³ 甲午戰後，王松攜眷返回泉州，無奈海上遇盜，被其搜刮所有，幸賴他人伸援，得歸晉江。而後聞臺灣亂事稍定，便再東渡回新竹。邱菽園，〈贈王君友竹序〉，收於王松，《友竹詩集》（臺北：龍文，1992），頁 13-14。

¹⁴ 乙未時，胡南溟隨其父內渡，僑寓廈門，但其母及新婚妻子並兩弟留在臺灣，翌年胡氏獨自返台。盧嘉興，〈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收於古亭書屋編，《臺灣文化集刊第一集》（不載出版項），頁 31。

¹⁵ 乙未割台時，霧峰林家大家長林朝棟決定內渡，並要求族人採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林幼春乃隨族人赴泉州避難，但不久即迫於生計而重返霧峰；當時年方 15 的林獻堂，則奉祖母羅太夫人之命，率全家 40 餘口，內渡避難於泉州晉江縣，但所攜資財有限，生活甚為困窘，1896 年林獻堂又帶族人回臺。然除生計之外，為保全家族在臺的龐大財產，是林氏家族不得不返臺的原因。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頁 58、68；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頁 16-17。

¹⁶ 蔡壽星在替施梅樵《捲濤閣詩草》寫序時，曾提及：「乙未割臺，君與余重晤於晉江客席，談論之餘，歔歔嗚咽。君有祖母雙瞽，自鹿港寄書促歸。君事祖母孝，不敢滯留，遂片帆東渡矣。」〈捲濤閣詩草序〉，收於施梅樵，《捲濤閣詩草》（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頁 7。

籍地謀生困難而選擇返臺者，謝道隆、林湘沅即屬此種情形，¹⁷其中，謝道隆於乙未割臺後，僅攜其妻呂氏及長子春池避亂閩粵，將其餘子女寄在佃農家，準備事定後再接回全家；無奈故鄉廣東大埔縣生活困難，加之其門生張麗俊修書告其：「由今以觀，日本雖嚴整其霜威，土匪先難逃其電察，柳營之役，既蒙海含〔涵〕，梓里之民，漸傾葵向，……似可釋然矣。」且其在臺家族家中無主，家事難支，¹⁸遂決意返臺。

林維朝亦於 1895 年西渡大陸，其原因之一爲了科舉功名。1894 年 7 月甲午戰爭爆發，其仍欲趕至臺南搭船赴大陸參加秋闈，惜因中途遇雨而誤了船期。¹⁹他曾言：「髫年學業志功名，冀得鵬搏萬里程」，自然不願因政權更迭而讓半生的努力毀於一旦。其次，是目睹臺灣匪氛日熾，日搶夜劫，雞犬不寧之狀。例如 1895 年 7 月，臺南的黑旗軍劉永福曾加派一營兵勇，欲至大莆林與日軍交戰，但被沿途庄民誤以爲是叛勇而中途截殺。之後又聞西螺、土庫、嘉義縣城先後陷落，知大勢已去，遂決意內渡。²⁰然而，內渡後因經濟並不寬裕，「食指繁多力莫支」、「家破財空似范貧」，還曾兩度回臺籌措資金，又因被懷疑持有銃器，險被日警逮捕；加上其母、其妻接連傳染鼠疫，其母更因思鄉心切、鬱鬱寡歡而過世；又念及家中祖產及墳塋無人照顧，終於在 1896 年 9 月回臺。

21

¹⁷ 臺灣割讓時，林湘沅隨其父及眷屬內渡避難，後因謀業不易而攜眷返臺。盧嘉興，〈日據時期爲臺灣倡設詩社的林湘沅〉，收於古亭書屋編，《臺灣文化集刊第一集》，頁 25-38。

¹⁸ 張麗俊之所以修書，乃因 1895 年時，謝道隆之宗叔謝永發希望道隆回臺，故託張麗俊執筆勸說，以謝永發的名義寄出。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40-41。

¹⁹ 林維朝，〈勞生略歷〉，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76。

²⁰ 林維朝，〈勞生略歷〉，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88-94。

²¹ 林維朝，〈勞生略歷〉，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102-132；林維朝，〈東山旅次，風雨感懷，涕下垂膺，是夜率成十四絕抒寫悲情，奈舊稿遺失，過後追思，彷彿猶記十則，姑存之以誌當時之苦況云〉，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142-144；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29。

還有於 1897 年 5 月 8 日「臺民去就決定日」之後數年才返臺者，林癡仙於乙未之變後，先避難泉州，1897 年短暫回臺，停留數月，該年 8 月再度出境赴泉州，後轉遊上海，迨 1899 年才結束漂泊生涯，正式返臺定居。²²林仲衡則避難泉州，更在福州、上海、北京、日本等地展開長達 15 年的離鄉之旅，直至 1910 年才歸來。²³

由於傳統文人多屬社會領導階層，其去留及向背未定，選擇閉門讀書或寄情詩酒以消極抵制日本殖民政權者亦不少，²⁴故日治之初總督府採取一系列措施，以籠絡其心，包括頒授紳章、舉辦饗老典、舉行揚文會，並任命其為地方參事、區長，將其納入統治體系。

其中，紳章的頒授，依民政局長水野遵的構想，是要以類似勳章的東西，區別士紳與一般人民，如同日本幕府時期為安撫鄉土所行的禮遇，來對待臺紳，規定授予有學識或資望者，1897 年首批共有 371 人獲頒。²⁵

饗老典是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為籠絡士紳耆宿，而仿效清代鄉飲酒禮之制的活動。第一次舉行為 1898 年 7 月 17 日在總督府舞樂堂，召集臺北縣下各辦務署管內 80 歲以上之男女耆宿 314 名與會。其後於彰化文廟、臺南兩廣會館及鳳山、大目降（新化）、阿公店（岡山）、麻豆等地陸續舉辦，共招待 600 餘名。²⁶

揚文會亦是兒玉源太郎總督拉攏臺灣知識階層的手段，於 1900 年 3 月 15 日在臺北淡水館（即原登瀛書院）舉行，邀集臺灣各地具有進士、舉人、貢生、

²²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頁 38-41。

²³ 黃美娥，〈中國、日本、臺灣：櫟社詩傑林仲衡詩歌的空間閱讀〉，收於陳嘉瑞、廖振富主編，《中臺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70-178。其後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277-286。

²⁴ 日治之初選擇退隱的傳統文人，在臺北地區即有陳鸞升、陳寶田、張國瑜、趙文徽、郭靜蓉、陳丙寅等人。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31-32。

²⁵ 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臺北：大路會事務所，1930），頁 88-89。

²⁶ 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辭典》，頁 1363，呂紹理撰，「饗老典」條。

廩生等科舉名銜者參加，共 72 人出席。會中兒玉總督期勉文人各展抱負，申述己志，以振興文教為名目，徵其平日抒發懷抱之文章，作為治台之參考。故出席文人依總督出題之策問作策議文章，包括〈修保廟宇者（文廟、城隍廟、天后廟等類）議〉、〈旌表節孝（孝子、節婦、忠婢、義僕）議〉、〈救濟賑恤（養濟院、育嬰堂、義倉、義塚、義渡、義井等類）議〉等三篇。除舉行文會外，總督府並招待與會者參觀臺北各官衙和學校等機構。²⁷彰化詩人吳德功亦參與該會，並將見聞寫成《觀光日記》一書。²⁸

同時，利用日、臺共有的漢學淵源，獎勵扶持詩社的發展，日籍官員曾多次與臺籍文人聯吟唱和，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1896.3~1900.2）、臺中縣知事村上義雄（1896.8~1898.5）、新竹縣知事櫻井勉²⁹（1897.5）均是著名的例子。迨兒玉、後藤來臺主政後，更將這股官紳酬唱的風潮推到最高峰，³⁰重現清季唐景崧在官署主持斐亭吟會的盛況。

²⁷ 余亦皋等，《揚文會策議》（出版資料缺，1900）。

²⁸ 吳德功，〈觀光日記〉，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遊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吳德功此次之行，對於日本的近代文明因此有進一步的認識，故在字裡行間充分表現了對殖民政權的推崇。此後，他對日本當局的配合度更加提高。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中國學術年刊》18（1997年3月），頁317-344。後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363-404。

²⁹ 櫻井勉（1843-1931）：號兒山，日本但馬國出石藩士櫻井一太郎之長男。幼入藩校修習「和漢學」，以才學著稱。1868年初，膺任出石藩之貢士，是年秋任藩學弘道館校長。1871年廢藩置縣後，歷任松島縣權參事租稅權助、內務省地理寮五等出仕兼地租改正局五等出仕、內務大書記官、地理局長、山林局長等職。1889年出任德島縣知事，後罷官，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後又起用為山梨縣知事。1897年派任為臺灣新竹縣知事，翌年5月依願免職返回日本。1901年派任為神社局長。晚年投入實業界，幾度來臺，曾籌組新竹製腦株式會社，並任社長。五十嵐榮吉編，《大正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87），頁514；詹雅能，〈櫻井勉與日治前期的新竹詩社〉，《社會科教育學報》6（2003年7月），頁6-7。

³⁰ 關於日治之初紳章授與及官紳聯吟的詳情，可參閱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一九〇五年〉。

此外，亦有傳統文人被日本當局延攬，從事方志纂修。1989年，曾逢辰³¹和鄭鵬雲³²奉新竹縣知事櫻井勉之命，被委以「事務囑託」，纂修新竹縣志。惜翌年地方官制變更，縣廳廢止，而匆匆結束，僅完成《新竹縣志初稿》四卷。³³

前述活動，臺灣知名的文人參與者眾，即使是向來較具民族意識的櫟社，也有陳瑚、陳貫、莊嵩等成員於饗老典舉行時，作〈慶饗老典〉詩相呼應。³⁴1905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新官邸「鳥松閣」落成，王松、謝道隆和之後加入櫟社的蔡惠如、王石鵬、陳貫、莊雲從、蔡啓運、呂厚菴、林耀亭、林文華、林獻堂、葉篤軒、王學潛、林癡仙、林載釗、袁炳修、張麗俊、鄭汝南、陳懷澄、連橫等人均與其唱和，並留下多首歌詠的詩作，³⁵例如蔡惠如讚譽後藤「鯤海屏藩坐鎮雄，青蒼得地貫長虹。收將幾筆佳山水，寫入詩情畫意中。」³⁶王學

³¹ 曾逢辰（1858-1929）：字吉甫，號鏡湖，又號南豐逸老，新竹人。1879年取進新竹縣學附生，後以教書為業，先後開館於貓兒碇後面庄、鳳岡等地。1895年，日人命其為貓兒碇庄長，未幾而辭。1898年受聘於新竹公學校，擔任漢文教師，4月授佩紳章。1898年冬，應新竹縣知事櫻井勉之命，編《新竹縣志初稿》。為竹社副社長，晚年任「亂彈會」詞宗，指導新竹公學校與女子公學校教師，研習漢學與詩文。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28；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頁123。

³² 鄭鵬雲（1862-1915）：字毓臣，號北園後人，新竹人。幼受業於潛園名儒林奕圖，1883年取進臺北府學，1894年補食廩餼，撥入海東書院肄業。1897年授配紳章，任新竹廳囑託，辦理文書事務。受新竹縣知事櫻井勉器重，推派出席揚文會。1901年赴北京，謁肅親王，上書條陳興革意見，卻未見回音。後回臺灣，1913年赴福州管理瀛僑會館，遂客死異鄉。1903年收錄臺籍人士或與臺灣有關者的作品，編成《師友風義錄》，共收詩127家，270餘首。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24；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91-92。

³³ 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92、123。

³⁴ 《慶饗老典錄明治三十二年》（出版資料缺，1899），頁54、56。

³⁵ 尾崎秀真編，《鳥松閣唱和集》，頁47-48、51、56-58、62、66、69-70、73、76-77、80、82、87、91、128。

³⁶ 尾崎秀真編，《鳥松閣唱和集》，頁48。

潛則曰：「萬甲蟠胸老氣雄，興酣落筆欲吞虹。烏松有幸題高閣，永耀鯤溟鰲島中。」³⁷

1915年，張麗俊高齡80歲的老母親應邀參加總督安東貞美為慶祝大正天皇即位而命臺中廳長枝德二在臺中舉行的饗老典宴。出席者獲賜金、銀彩扇兩枝，龜形、鶴形糕和雞蛋糕一盒，又贈金2圓。³⁸事後張麗俊妥善保存饗老典邀請函和儀式須知，可見其對此事的重視。³⁹然而，是否因此就能得出傳統文人與總督府關係融洽，並滿意日本統治的結論？若仔細探究相關文獻，事實恐未必盡然，傳統文人的進退舉止實包含無數的矛盾。

依吳文星的研究，許多傳統文人形式上接受總督府的尊崇或參與其提倡的藝文活動，實質上卻始終拒絕任何基層殖民行政職務或協助推動各項殖民措施，臺北地區獲頒紳章的72人中，其後選擇退隱者就高達28人，⁴⁰其他地區獲頒紳章的傳統文人態度亦與臺北地區相似。舉例而言，1879年高中舉人的鹿港文人莊士勳，乙未割臺時赴泉州避亂3年有餘，後返鹿港。雖於1900年以臺中縣總代的身份出席揚文會，⁴¹且於1902年獲頒紳章，⁴²卻終日閉門讀書，不問世事，堅不受日人之聘。後為生計之故，乃應霧峰林家之邀，前往講學。⁴³1915年6月林家頂厝大少爺林紀堂因被總督府選為孝廉，且獲頒褒狀，乃請莊士勳代寫謝函，不料即使再三拜託，仍遭其拒絕。林紀堂以為莊士勳對其接受日人褒狀頗有鄙視之意，故將此事置之度外。⁴⁴由此可見，莊士勳雖接受總督府頒發

³⁷ 尾崎秀真編，《烏松閣唱和集》，頁73。

³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1），頁259。

³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25-326，附件二、三。

⁴⁰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34-35。

⁴¹ 莊士勳參加揚文會的文章收於，《揚文會策議》，頁19。

⁴²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207。

⁴³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76。

⁴⁴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7月7日，未刊稿。

的紳章，但他對日本殖民者的態度並未因此改變，只願意「養老於花竹泉石之間」。⁴⁵

至於接受紳章又擔任基層行政職務者，也未必凡事皆與殖民者的立場一致。以林烈堂為例，他於 1901 年出任臺中廳參事，翌年 8 月獲頒紳章，⁴⁶卻極不看重紳章的價值，其子林垂凱回憶，烈堂常指著紳章說：「極沒有趣味，臺灣總督府騙臺灣人。」⁴⁷往後更為臺中中學的設立大力奔走。

其次，傳統文人出席揚文會，或與日籍官員相酬唱，可能只是基於對吟詠漢詩的興趣，並以文人的身份為榮，因此即使是向來對殖民政權素無好感的趙文徽和洪棄生，⁴⁸也列名於揚文會。雖然在此一公開的應酬場合，難免留下對日方歌功頌德的詩作，吾人似不宜以這些應酬文字作為討論其立場的唯一根據。事實上，若將傳統文人於揚文會等應酬場合之詩作與其私下的作品相比較，常發現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曾逢辰作〈慶饗老典〉四首，其中，二首如下：

東瀛盛典禮稱觴，饌玉陳時祝壽長。翁媪滿堂華髮白，融融樂會際虞唐。
年老娛時酌兕觥，杖鳩游處快平生。仙堂玉宴恩施普，絃管流音同磬笙。

49

將饗老典形容成仙堂玉宴般的盛典，並將之歸功於日人的恩施。但其另作〈偶感〉一詩如下：

⁴⁵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07。

⁴⁶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83。

⁴⁷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 8。

⁴⁸ 據傳日治後，辜顯榮因與趙文徽熟識，故屢勸其出仕，但文徽敬謝不敏。日人慕其名，屢加徵聘，皆堅辭。文徽並告誡其諸子曰：「汝等有食日人粒粟者，非吾子也。」可見其民族立場的堅定。曾迺碩總纂，王國璠編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頁 188。

⁴⁹ 曾逢辰，〈慶饗老典〉，收於《慶饗老典錄明治三十二年》，頁 70。

霖雨長蒼苔，秋懷鬱不開。落花浮水面，知自故園來。⁵⁰

「秋懷鬱不開」、「知自故園來」等句，實隱含著思念故國的哀愁，與其〈慶饗老典〉詩中展現的歡愉氣氛全然不同。

另一方面，某些向來被視為具有抗日色彩的文人，若仔細觀察其行為，也顯示其間存在著矛盾。乙未之役時曾隨表弟丘逢甲組織團練，積極參贊戎機，事敗後避亂閩粵的謝道隆，回臺後也曾參與烏松閣的詩會，亦是葫蘆墩烏牛欄第一保保正和保甲協議會長，⁵¹同時還任葫蘆墩公學校學務委員。⁵²然而，謝氏也有佯狂遁世的一面。他在大坑偏遠山區築有小東山別墅，1906年4月完工後，常招詩友聚會；⁵³又因精湛輿之術，於1907年3月在大甲溪右岸鍋都科山自營生墳，似乎想在無法解脫的大環境中，尋找一個自在的安身立命之所。生墳完成後，屢邀林癡仙、陳懷澄、莊雲從、袁炳修、張麗俊等吟友前來遊玩宴飲，「席上飛觴醉月，庶幾不醉無歸」，並有藝妓歌唱和畫詩寫真，故鄰庄來觀的男女老幼常聚滿坟前。⁵⁴他並徵集諸文人吟詠生墳之作，請林癡仙編成《科

⁵⁰ 蔡汝修編，《臺海擊鉢吟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頁168。

⁵¹ 謝道隆於1907年8月20日辭去烏牛欄第一保保正之職，在此之前，他曾於1906年11月1日以保正總代的身份，出席臺中農會在葫蘆墩支廳召開的支會，宣讀祝詞，亦是保甲協議會長。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32、254、281。余美玲所言「日人也一度邀他任烏牛欄第一保正之職，但為謝頌臣所拒」，實與事實相違。余美玲，〈從《小東山詩存》探析謝頌臣之生平與交遊—以櫟社詩人圈為主〉，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8-9日，頁4。

⁵² 謝道隆曾以學務委員的身份，出席葫蘆墩公學校於1907年3月30日舉行的落成式，並宣讀祝詞。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201。

⁵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50。

⁵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243、274-275。

山生壙詩集》傳世。⁵⁵值得注意的是，與謝道隆唱和者，亦包含日人佐佐木景明⁵⁶、葫蘆墩公學校校長三田愛藏。⁵⁷可見謝道隆徘徊於出世與入世之間，行為準則不一，而讓外人難以理解。

由謝道隆之例可知，意識形態對立的日臺雙方，可以透過漢詩文進行交流，因此，即便是自號為「滄海遺民」、名所居為「如此江山樓」的王松，亦與日籍人士多所往還。他的《臺陽詩話》係由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書前並有日本漢學家初山衣洲⁵⁸之序；他對總督府書記白井新太郎、新竹支廳長櫻井勉、民政長官水野遵等人的評價亦高，並作詩稱頌，以致日人認為他並非「殷頑」型的遺民。⁵⁹

此外，部分顯揚於日本殖民行政系統的傳統文人亦有某些作為發人深省。例如洪以南 1897 年 9 月任辦務署參事，同年 12 月授佩紳章，1904 年擔任臨時

⁵⁵ 《科山生壙詩集》係由林癡仙命人抄寫，再分體編纂而成，印刷事宜亦由林癡仙負責。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9 年 4 月 16 日、20-21 日，5 月 9-10 日、22 日，未刊稿。

⁵⁶ 佐佐木景明，日本宮城縣人，曾任鹽水港廳警部、北門嶼支廳長。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灣新報社，1907），頁 132。佐佐木景明所作的〈題謝頌臣先生生壙四首〉，收於林癡仙編，《科山生壙詩集》（臺中：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印刷，1909），頁 15。

⁵⁷ 三田愛藏：1899 年 10 月 7 日由臺中公學校教諭轉任葫蘆墩公學校校長，並於 1915 年 3 月 31 日離職。其夫人也在 1900 年 1 月 4 日開設女學校，共有 14 人入學。他曾於 1911 年 8 月 16 日，應謝道隆之邀，至謝氏的東山別墅參加午宴。葫蘆墩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未刊稿，1931），頁 260、262；《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505 號，明治 33 年 1 月 9 日，頁 3；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96。

⁵⁸ 初山衣洲（1855-1919）：日本著名漢學家，原名逸也，號衣洲，日本東京人。少時，曾學詩於森春濤，長游於東京成島柳北之門下。1898 年應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之聘，來臺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深獲信任，居於總督別邸「南菜園」，曾以南菜園為中心，創「穆如吟社」。時開雅集，東邀士紳互相唱酬，以收攬本島人之心，對日後本島詩社之成立有很大影響。1904 年因就華北保定練軍之聘，出任其翻譯官數年。歸國後定居於大阪，興崇文社以誘掖後進，益以詩酒自娛。留臺期間曾輯《南菜園唱和集》一書。《臺灣文學辭典》試用版，張端然撰，「初山衣洲」條。

⁵⁹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遺民詩人的應世之道—以新竹王松為例〉，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頁 233-260。

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1914 年被選為淡水區長。⁶⁰然而，此位與官方關係如此密切的文人，卻以〈畫蘭冊〉為題到處徵詩。⁶¹所謂〈畫蘭冊〉，典出鄭所南所畫之「露筋蘭」，鄭氏為元初南宋遺民，故畫蘭時不畫土，云土為番人所奪。洪以南此舉似有以遺民自期的意味，但若與他長期擔任公職的生涯相對照，則頗有突兀之處。

然而，亦有部分文人堅拒與日人合作。例如施梅樵與洪棄生相似，終生拒絕與日人合作，寧可流離轉徙，到處設帳授徒。其號蛻奴，意為立志去倭奴之恥。因此，雖為清時秀才，改朝換代後，遂無所成，困頓潦倒，而有懷才不遇之嘆。臨終前，梅樵告其子姪：

余生不逢辰，洊經禍亂，歷劫滄桑，為珠崖之棄民，作東晉之傖父，半籌莫展，一事無成，生平心血，僅留數卷詩歌。所謂不能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而只載之空言，其即此意乎？爾等不可不為余傳，使祖宗知余遭時不遇，非余之不肖也。⁶²

一語道出棄民生不逢時，致一事無成，僅能以文字為重的無奈悲憤心情。

許夢青的處境也類似，據載乙未之後，日惟飲酒行吟，以抒悲憤。每飲必醉，狂歌痛哭，或醉臥廟階，旦醒始回；或閉戶孤吟，三日不出，鄉黨皆以怪人目之。更以「身淪棄地，誓不教蕃校，不領蕃錢」為由，回絕日人之聘。⁶³改

⁶⁰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44-45。

⁶¹ 莊嵩有〈題洪以南畫蘭〉一詩，曰：「空谷佳人絕代姿，寫來應不合時宜。筆端饒有牢騷意，一段幽情在楚詞。」收於莊嵩，《太岳詩草》（臺北：龍文，1992），頁 21。王石鵬則作〈題洪以南畫蘭帖〉，曰：「所南翁去以南來，今古畫蘭兩異才。無限美人香草感，心花怒向筆端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637 號，明治 43 年 6 月 11 日，頁 1。

⁶² 施讓甫，〈鹿江集編後語〉，收於施梅樵，《鹿江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頁 137。

⁶³ 許常安，〈先大父劍漁公事略〉，收於許劍漁，《鳴劍齋遺草》（高雄：大友書局，1960），頁 33。

朝換代對此種文人而言，無疑是人生的最大悲劇。

綜合上述，除施梅樵、許夢青等極為堅持民族意識者外，大多數傳統文人與總督府的互動充滿許多看似互相衝突、又令人難解的地方。即使是接受紳章、出席官紳聯吟、甚至擔任基層行政職務者，也未必對殖民政權均有正面的評價，故對其不能以「御用紳士」一詞簡單概括而加以指責。相反地，以遺民自居、自築生壙者，往往也與日本官方有一定的往來，亦不宜籠統地將其歸類為具民族氣節者而大加贊揚。總之，傳統文人與日本殖民政權之間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以下從他們對總督府推行國（日）語、新式教育、斷髮易服等施政的回應，詳究兩者之間的關係。

二、對普及日語政策的回應

總督府領臺不久即制訂日語普及政策，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途徑，積極展開日語教育，企圖達成消滅臺語、普及日語的目標。1896 年先在全臺各地設置「國語傳習所」，1898 年發佈「臺灣公學校令」，以地方經費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同時，將傳統的書房納入管理，規定其應逐漸加設日語、算術課程，企圖使其變成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⁶⁴

對於日語普及政策，洪棄生採取全然抗拒的態度，堅決不學日語，無論在家或在外，始終使用本地閩南方言，直到去世都不會講日語。而為使其子不受日本同化，他甚至不讓兩個兒子入學公學校。⁶⁵然而，其他的傳統文人則有不同的回應。

或許認為傳統舊學已不合時宜，而進入總督府の日語教育體系，亦是一條可作為晉升之階的坦途，許多具有秀才、廩生等功名的傳統文人，紛紛入學國

⁶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305-311。

⁶⁵ 程玉鳳，《洪棄生傳》，頁 101。

語傳習所，例如臺南秀才謝汝銓、嘉義秀才黃服五、⁶⁶宜蘭秀才蘇壁聯⁶⁷均是著名的例子。⁶⁸

其次，無功名但具有傳統儒學教養的士子也多有入學者，例如陳瑚、李春盛、蘇孝德⁶⁹入國語傳習所；⁷⁰徐杰夫⁷¹則在思前顧後之餘決定順應時事，於 1903 年志願就讀嘉義公學校國語（日語）速成科。⁷²亦有文人更上層樓，入學國語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例如陳貫、莊嵩、莊雲從、鄭濟若、魏清德、黃春潮、林佛國均畢業國語學校；黃旭東、林玉書畢業總督府醫學校。此外，亦有

⁶⁶ 黃服五：斗六人，1889 年登第府試，取錄優等選中，列舉雲林縣學秀才。乙未之變後，隨時處宜，早悉文明利器，1897 年 4 月畢業於嘉義國語傳習所，後任法院雇員，同年 7 月轉用辦務署雇員。1902 年 8 月授佩紳章，10 月陞任斗六廳判任通譯，1911 年解職。「國語傳習所明治三十年年未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15 年保存；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63-264。

⁶⁷ 蘇壁聯：宜蘭人，25 歲時應縣試，考取秀才。國語學校甲科畢業，後任宜蘭法院通譯，1902 年 4 月授佩紳章，翌年轉任宜蘭公學校教師。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66。

⁶⁸ 國語傳習所畢業生的名單可參閱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 303-306，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單」。

⁶⁹ 蘇孝德（1879-1941）：字朗晨，號櫻村，嘉義人。1897 年 4 月畢業於嘉義國語傳習所甲科。1904 年補用嘉義廳通譯，1907 年 4 月任嘉義區長兼山仔頂、臺斗坑兩區長，翌年獲紳章，1913 年 10 月解職。網羅嘉義廳下羅山吟社、玉峰吟社、鷗社等十詩社組織為嘉社，被推為負責人。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35-236；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65-66。

⁷⁰ 陳瑚 1897 年畢業於苗栗國語傳習所，李春盛 1898 年畢業於臺中國語傳習所。「元新竹縣學事取調書類」，《台北縣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永久保存；「臺中國語傳習所第二期卒業式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15 年保存。

⁷¹ 徐杰夫（1873-1959）：號楸軒，官章念榮，嘉義山仔頂人。1908 年任山仔頂區長、農會委員、土地整理委員。1912 年授佩紳章，翌年任嘉義廳參事，同時任嘉義區長，1920 年任臺南州協議會員。此外，1914 年獲選為嘉義銀行副頭取，其後升至頭取，亦是臺灣南部海產株式會社取締役、大正無盡會社監察役、嘉義電燈會社監察役、臺南製冰會社社長。1911 年與林玉書、蘇孝德、林維朝等人共組「羅山吟社」，設有例會，以詩會友。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32；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91-93。

⁷²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91。

塾師除自己入學外，還將學生一併送入國語傳習所，例如呂鷹揚⁷³在乙未之後，因「慨然達觀時勢，早悉文明利器」，為勵眾蟬脫舊習，故 1897 年桃園國語傳習所大料坎分教場成立後，便「斷然閉鎖家塾，令其子弟悉入學於分教場。」⁷⁴秀才沈夢達⁷⁵也自廢書房，鼓勵學童入公學校就讀，⁷⁶顯示其體認到在新時代學習日語的重要。

進入總督府教育體系就讀的傳統文人大抵均有不錯的日語程度，據載陳瑚自乙未之變後即立志急習日語，漸至於能與人寒暄，頗強人意；莊雲從向以諳大和字馳名；⁷⁷陳貫亦能翻譯早稻田中學規則，作為臺中中學設校之參考；⁷⁸至於施家本，雖因故未能完成國語學校的學業，卻因講得一口好日語，又會做「和歌」，而獲總務長官下村宏的讚賞。施家本對於日本的古典文學也極有興趣，尤其喜愛閱讀德川時期風行一時的《徒然草》，甚至將自己手抄的詩集署名《徒然草堂詩抄》。⁷⁹

傳統文人學習日語，除了己身出路的考量外，亦與體認到具備多國外語能力方能立足於競爭激烈的現代世界有關。王石鵬曾言：

⁷³ 呂鷹揚：字希姜，桃園大料坎人。1893 年考試中式，取錄優等選中，補為廩膳生，設筵授徒。1897 年任辨務署參事，授佩紳章，1899 年任大料坎街街長，後為桃園廳參事。亦為桃園吟社社長。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97-98；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書前作者姓名錄。

⁷⁴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97。

⁷⁵ 沈夢達（1867-1903）：鹿港人，秀才。1902 年 8 月授佩紳章，翌年 3 月卒。據廖振富研究，他是櫟社萌芽初期，尚未正式組織化時的社員，與林癡仙、呂厚菴時相唱和。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15；廖振富，〈櫟社與鹿港之淵源及其相關作品探析〉，收於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253-254。

⁷⁶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15。

⁷⁷ 林癡仙有〈次和雲從見贈韻〉一詩，稱莊雲從「多藝文諳大和字」。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143。

⁷⁸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4 年 4 月 5 日，未刊稿。

⁷⁹ 葉榮鐘，〈詩人施家本一記一個未完成的天才〉，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71-272。

吾觀二十世紀之時代，固學問競爭之世界，而亦為言語發達之世界，人群之口音者無論矣，甚至鳥音猿語，亦莫不為博言家所探討。人無學問固不足以生存，無言語又不足以行遠，故東西文明之士，多者能通各國方言，少者亦諳一二種，所到之處，可藉以觀國風、察民情，而無扞格難申之患。⁸⁰

強調東西文明之士，多能通各國語言，臺人亦不該落於人後。連橫亦云：

夫世界進步日趨大同，學術思潮已無國境。我輩處此文運交會之際，能用固有之華文可也、能用和文可也，能用英、法、俄、德之文尤可也；則用羅馬字以寫白話文亦無不可。但得彼此情素互相交通，雖愛世語吾亦學之。⁸¹

由上顯示，只要能夠促進溝通，日、英、法、俄、德文均可拿來運用，即使是以羅馬字拼寫的白話文或世界語，連氏也願意學習。

在各種外語之中，日語是日常生活中接觸最頻繁的，若能習得日語，可與統治者溝通無礙，日常生活較為方便，也可以從日本接收現代化的資訊，與世界接軌。因此，不願自外於世界潮流的士紳便自覺有學習日語的必要。

林紀堂學習日語便頗為積極。1915年3月某日，神山又十郎警部補與紀堂閒聊時，談及臺人學習日語的問題。神山提及臺人說日語，口音多欠自然。紀堂認為他「雖老年，亦要研究國（日）語，請神山君於禮拜日及有暇時間，勿吝玉趾到我敝處，多少教我可否。」而得神山允諾。⁸²其後神山果如約而至，並

⁸⁰ 王石鵬，〈送謝介石東上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935號，明治37年10月11日，頁1。

⁸¹ 連橫，《雅言》，《連雅堂先生全集》，第5冊，頁21。

⁸²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3月31日，未刊稿。

將上課時間訂為每週一及週四晚間七時至九時，首次上課時還攜來一本《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⁸³供紀堂研讀。當天下課後友人賴捶頭來訪，告訴紀堂近來各處研究日語者頗不乏人，甚至新聞社的漢文記者亦多往各公學校的夜學學習日語。紀堂聽後甚為喜悅，表示「雖老亦當勉強學習國（日）語較為妥善，亦多多方便處。」⁸⁴由此看來，紀堂認為學習日語乃趕上時代潮流之舉，深自慶幸未落後。

據〈林紀堂日記〉，紀堂至少持續學習日語三個月（因 1915 年 7 月 4 日迄年底的日記缺，無法得知下半年他是否繼續學習），這一段期間神山依約扮演好日語家庭教師的角色，紀堂亦積極配合，午後無事時常不忘複習日語，⁸⁵並曾託霧峰林家使用人林坤山代買臺南林久三發行的日語學習書 3 本，⁸⁶可見其用心。⁸⁷唯 5 月中旬時因連日降雨，神山表示夜間前來教授頗為不便，而中斷數次，⁸⁸但自 5 月 15 日雨晴後，課程又重新開始。⁸⁹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具有民族意識的傳統文人亦不排斥日語。日治初期林癡仙便不抗拒日語。過去由其詩集《無悶草堂詩存》的詩作勾勒出來的癡仙形象，是對中國仍深具感情，無奈處於日人統治之下，平日只得藉作詩吟詠抒發家國淪亡的苦悶，甚至縱情酒色，尋求一時歡愉的遺民型文人。其心境正如

⁸³ 此書作者為川合真永，由臺北的臺灣語通信研究會於 1913 年出版，屬語言教材，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有收藏。

⁸⁴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4 月 5 日，未刊稿。

⁸⁵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4 月 9 日，5 月 20 日，未刊稿。

⁸⁶ 林久三著有多本供臺人研讀的日語教科書，包括《日臺會話入門》（臺南：林寫真館，1907）；《日臺會話初步上卷》（臺南：補生堂，1909）；《日臺會話指南》（鳳山，1909）；《警察會話編》（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4）；《台灣適用衛生會話新編》（臺南：臺南地方法院內臺語學會，1914）。其中，《日臺會話初步上卷》和《警察會話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有收藏。

⁸⁷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4 月 28 日，未刊稿。

⁸⁸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5 月 13 日，未刊稿。

⁸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5 月 15 日，未刊稿。

〈次韻答紹堯〉詩中所述：

無心用世惟耽酒，有口逢人便說詩。醉不願醒歌當哭，此生當賣幾多癡？
悠悠身世且隨緣，飲酒看花自得仙。若向紅塵求解脫，幾身修到火坑蓮。

90

然而，私底下癡仙卻有強烈的企圖心想學好日語，並非全然遺世獨立。他曾作〈春日雜感，次粵臺秋唱韻〉8首，其中第6首提及「誰能苦學鮮卑語，博校人前戲潑寒」，⁹¹即是形容想學日文，又恐遭嘲笑的矛盾心境。依其日記所載，1906年間癡仙曾先後覓得三位教師教他日語。

第一位是諳大和字的櫟社社友莊雲從。癡仙〈次和雲從見贈韻〉詩中提及雲從「已許異書親口授，莫違相約惹相思。」⁹²此處「異書」即是指日語，顯示癡仙對學日語頗為期盼。在1906年7月22日，其日記有「雲從教余《日臺會話大全》⁹³一節」的記述，⁹⁴可知莊雲從果然依約至癡仙住處教其日文，⁹⁵而癡仙甚為重視此事。到28日雲從才辭歸，欲回大甲，不過當日溪水暴漲，以致無法如期動身，但並未至林宅教癡仙日語，故癡仙在日記記下「未審何故不來敝

⁹⁰ 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169。

⁹¹ 林癡仙，〈春日雜感，次粵臺秋唱韻〉，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159。

⁹² 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143。

⁹³ 此書作者為水上梅彥，由東京民友社於1897年出版，屬語言教材，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有收藏。

⁹⁴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年7月22日，未刊稿。

⁹⁵ 當時林癡仙居於新田。根據林癡仙子林陳琅的回憶，癡仙的經濟狀況不盡理想，因為霧峰林家的名聲大，所以在交際方面不能太差，應酬、住旅館、坐車等都要求第一流，加上朋友來來去去的花費，造成入不敷出，所以癡仙後來不住霧峰，先搬到新田，再搬至詹厝園（今屬夏田村）。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陳琅先生訪問記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33。

處，以踐教習日語之約也」，⁹⁶對於日語課程一直懸念著。其後，警察池田喜三郎亦曾教癡仙空海四十八字詩，並約定巡邏本庄時必來教其日語一次，癡仙認為此人當誠實不欺。⁹⁷此外，保正簡本之子簡永祿⁹⁸當時就讀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適逢暑假返家，癡仙亦拜託他每三、五日來新田一次，教他《日臺會話大全》，而獲其允諾。癡仙乃喜曰：「余於雲從、池田後又得一師矣。」⁹⁹由上可知，癡仙學習日語的態度甚為積極，主動覓師，雖未知成效如何，但其決心已十分明確。

除了學日語，依〈林癡仙日記〉所載，癡仙也隨眾慶祝天長節，並曾代賴紹堯作天長節七律一首，¹⁰⁰與向來學界熟知的遺民詩人形象顯然有所差距。

過去被認為終身不說日語的林獻堂，事實上學習日語也頗為勤奮。林忠曾說林獻堂從來沒有學過日語，無論在任何場合，就是與日人首長講話，也從不講日語，而由人翻譯。¹⁰¹葉榮鐘亦說林獻堂「不說日語，不喝味噌汁，不穿下駄（木屐），過純中國式的生活，從不依靠日人的威光圖謀升官發財。」¹⁰²此種說法一直被學術界沿用，張正昌即曰林獻堂「終身不學日語，而寧肯自帶通

⁹⁶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年7月28日，未刊稿。

⁹⁷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年8月1日，未刊稿。

⁹⁸ 簡永祿：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屆畢業生，1911年畢業。景福基金會編，《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3。

⁹⁹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年8月2日，未刊稿。

¹⁰⁰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年10月26日、31日，未刊稿。

¹⁰¹ 林忠，〈追念獻老〉，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624-625。林忠強調林獻堂不講日語，其實也有他的用意。蓋林忠戰後被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派為臺灣區電台接收專員，兼臺灣台台長，便利用自己編著的國語廣播教本，透過收音機進行國語教學工作。林忠後來聽聞林獻堂極熱心學習國語，每到了國語廣播時間，便以要學聽國語為由，不接見訪客。因此，為與林獻堂學習國語的專注相對照，便說他在日治時期不說日語。林忠，《臺灣光復前後之回顧與自傳》（臺北：皇極出版社，1987），頁49-51。

¹⁰² 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頁73。

譯。」¹⁰³劉峰松替黃富三《林獻堂傳》寫序時，亦強調林獻堂「畢生不說日語、不著和服。」¹⁰⁴

不過若細查其日記，獻堂 1937 年 5 月有東京之行，故他從 1 月 2 日起每日均擬定進度複習宇井英所著之《國語教本》，¹⁰⁵抵達東京後，從 8 月 18 日起更聘荒木秋子為家庭教師，教其讀《國語教本》。¹⁰⁶持續至翌年 7 月底，均排定計畫，反覆複習《國語教本》的內容，平均每日一小時以上。獻堂自認年紀已長，記性不佳且善忘，故非加倍努力不可。¹⁰⁷

林獻堂雖長時間學習日語，但或許如他所言，由於記性不佳，成效並不理想，最大的問題是，即使多讀，亦不能自由談話。¹⁰⁸有感於學習語言必須應用，方能進步，某次他邀其媳曾珠如、溫成章、長山愛、林氏密等人開一雜談會以練習日語。¹⁰⁹其後，直到 1938 年 12 月他仍持續複習《國語教本》不輟，¹¹⁰但從 8 月起研讀時間從每日一小時以上，改為利用早餐前的零碎時間，時數有所減少。¹¹¹

休息五個月之後，1939 年 5 月 2 日起，林獻堂又開始複習日語，直到 9 月間，總計密集學習日語將近兩年半。

¹⁰³ 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雲動》（臺北：益群書店，1981），頁 74。

¹⁰⁴ 劉峰松，〈館長序〉，收於黃富三，《林獻堂傳》，頁 2。

¹⁰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20。

¹⁰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316。

¹⁰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27、109、184。

¹⁰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366。

¹⁰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54。

¹¹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316。

¹¹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184。

雖然林獻堂仍無法聽講日語自如，也常以不識國語為由推辭一些雜務，¹¹²但應該已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1940年9月7日，他曾以日文寫信給莊垂勝，討論詩學。據莊垂勝之子林莊生閱信後表示，從此信看來，林獻堂不但會讀、會寫日文，所用文詞也相當高格，以此類推他對日文之聽與說兩方面應毫無困難。¹¹³

簡單的日語聽說對林獻堂確實沒有太大的困難，1941年11月在楊國喜與陳雙美的結婚宴上，他甚至以日語宣讀介紹詞，長達15分鐘，¹¹⁴苦學畢竟仍有成效。由上可見林獻堂對日語並不排斥。

此外，秀才出身的櫟社社長傅錫祺也曾於1915年2月1日至12月25日入潭仔墘公學校附屬夜學會，學習日語二期，為時將近一年。¹¹⁵1921年6月由於參加同仁會分會例會，也有公學校教諭特別傳授日語。¹¹⁶而他平常也非常關心公學校男子部和女子部之國（日）語研究會會員的出席狀況。¹¹⁷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文人並未因接觸日語而忽略漢文的重要性，除了早年接受儒學教育受到深刻的影響外，漢文也是他們參加詩社與同儕或日本官員酬唱的社交工具，林獻堂也常勉勵自己研究日語後，須多讀漢文方為上策，切不可漢文無用。¹¹⁸

¹¹² 1941年1月中村法務課長、田中高級參謀希望林獻堂組織一俱樂部，以備有事時幫助總督府，林獻堂以不識國語，而又身體衰弱辭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3。

¹¹³ 林莊生推測，林獻堂一直以臺語與日人周旋，可能是他的矜持，因他不願用第二流、第三流的日語跟日方交談。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1992），頁392-393。

¹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374。

¹¹⁵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375-376。

¹¹⁶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年6月18日，未刊稿。

¹¹⁷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年9月22-23日，10月24日，未刊稿。

¹¹⁸ 林獻堂，〈林獻堂日記〉，1916年2月22日，未刊稿。

三、支持新式教育

由前述可知，不少傳統文人學習日語甚勤，甚至進入國語學校就讀，將其當作晉升和吸取新知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有前往日本留學者，例如林仲衡為秀才，約於 1901 年入日本中央大學求學，¹¹⁹雖然未見林仲衡取得文憑的紀錄，但可證明他有相當的日語能力，對日本也未採取漢賊不兩立的態度。此外，黃欣為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畢業，¹²⁰鄭汝南也曾赴日求學。

如有友人赴日進修，傳統文人亦大多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鄭汝南赴日前，傅錫祺曾勉勵他「早將新智識，歸饗舊親朋。」¹²¹認為赴日求學可獲得新知識，而這些知識是臺灣不可或缺的，故必須早日歸來，分享故舊親朋。陳瑚則期待鄭汝南學成歸來時，知識上能突飛猛進，故曰：「他日歸閣里，應非舊阿蒙。」¹²²傅錫祺亦形容林仲衡前往東京求學的理由是「環球智識日求新，恥作驢駒老此身！」¹²³由於世界知識的進步日新月異，故不宜再守著舊學終老。因此，傳統文人普遍視留日為獲取新知最便捷的手段，並不因民族意識的考量而有所責難。

其次，許多傳統文人對於公學校也頗為支持。1898 年 7 月，總督府發佈「臺灣公學校令」，以地方經費設立六年制公學校，以取代國語傳習所。然而，上階層家庭每稱公學校為「番仔學校」，故不願讓其子弟入學而習夷狄之學，仍多選擇書房。因此，公學校擴充甚緩，入學率直至 1915 年仍不及 10%。

¹¹⁹ 林仲衡，《仲衡詩集》，書前作者介紹；黃美娥，〈中國、日本、臺灣—櫟社詩傑林仲衡詩歌的空間閱讀〉，收於陳嘉瑞、廖振富主編，《中臺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72-176。其後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280。

¹²⁰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頁 124。

¹²¹ 傅錫祺，〈送鄭二汝南偕林五階堂留學東京〉，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52。

¹²² 陳瑚，〈送汝南留學東京〉，收於陳瑚，《枕山詩抄》（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22-23。

¹²³ 傅錫祺，〈送中衡東京遊學再次癡仙韻〉，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12。

¹²⁴不過，亦有抱持不同看法者，例如舊學出身且未學過日語的張麗俊，便放心讓其子進入公學校就讀。¹²⁵他也常參與葫蘆墩公學校¹²⁶舉辦的活動。

1907年3月30日葫蘆墩公學校新校舍於落成時，官方曾邀集地方人士，席開多桌，舉辦宴飲，張麗俊即是座上賓。當日晚間還施放煙火慶祝，因此各庄男女群集公學校觀賞，人潮之多有如雲堆霧擁，幾無可容膝之處，張麗俊認為此舉可說是臺中廳下學校落成式未曾有之盛況。¹²⁷在官方的規劃下，公學校的出現成為地方上的一大盛事，也增添一般民眾的信心。

1911年5月20日他參加父兄參觀會，感想是教師與生徒逐級教授，循循善誘，教法頗良；¹²⁸他也多次前往畢業典禮觀禮。¹²⁹當時公學校校長三田愛藏辦學備受肯定，與地方人士關係良好，當其任職10週年、15週年時學生家長均舉辦祝賀會，張麗俊便是15週年祝賀會的發起人之一，當晚施放日本煙火12發、臺灣煙火22層，並有梨園及布袋戲班的演出。¹³⁰1915年4月當三田校長欲離任回東京時，學生家長舉辦餞別會，席開12桌，張麗俊亦參加；三田離臺當日，送行的學生有八百餘人，學生家長不下百人，張麗俊亦在其中，可見三田校長之得人心。¹³¹

¹²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315-318。

¹²⁵ 張麗俊次子張世藩、三子世垣均畢業於葫蘆墩公學校，其後世藩畢業於臺灣總督府臺北工業學校建築科，世垣畢業於臺北農業試驗場林業科。〈清河堂張氏族譜〉，未刊稿。

¹²⁶ 葫蘆墩公學校：1896年5月設臺中國語傳習所，1898年借用棟東上堡岸裡大社南門外文昌祠開設臺中國語傳習所葫蘆墩分教場，當年入學授業者共32人。11月1日設置葫蘆墩公學校，1901年6月1日校舍移到媽祖宮，並於1906年開始建設新校舍。葫蘆墩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頁260-263。

¹²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200-202。

¹²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58。

¹²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31、188；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23、168、313。

¹³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20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22、23、25-26。

¹³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169-170、

以張麗俊為首的家長，對公學校畢業生的前途亦甚為關心。1927年豐原街管內公學校畢業生共有211人，加上高等科補習生37人，前往臺中參加中學校入學考試，竟無一人及第，地方父老大感震驚，故創立兒童保護者會，向校方施加壓力，要求提升教育水準，張麗俊亦是發起人之一，參與會則之訂定，磋商會和發會式均未缺席。¹³²

張麗俊之外，許多傳統文人的子女均接受新式教育，且取得文憑。林朝宗¹³³的10個兒女中，受中學以上教育者8人，長男林鼎乾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部。¹³⁴黃純青三子黃得時，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科，四子黃當時，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¹³⁵謝道隆之子謝秋涓、¹³⁶謝秋濤，¹³⁷袁炳修之子袁

173-174。

¹³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183-187、194。

¹³³ 林朝宗：1875年生，潮州內埔人。幼習漢學，日治之後轉業漢醫。歷任內埔公學校學務委員、保正、內埔庄協議員、大和產業組合長等職。暇輒攻詩。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458；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374。

¹³⁴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374。

¹³⁵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130；李泰德，〈文化變遷下的臺灣傳統文人—黃得時評傳〉，頁29-31。

¹³⁶ 謝秋涓：謝道隆第三子，臺北醫學學校第七屆畢業生（1908）。1909年到大連醫院就職，其後在奉天省衛生官醫院任醫官，精於外科手術，但因醫院裁員而辭職，乃在奉天大南門開設百川醫院。1921年10月在黑龍江成立百川醫院，由於醫術精明患者不少。以後又到新京開設醫院，戰後轉赴北京，1949年過世。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2（2004年12月），頁15-17。

¹³⁷ 謝秋濤：謝道隆第四子，臺灣總督府醫學學校第十一屆畢業生（1912）。1912年11月入東京傳染病研究所，歷任奉天省警官補習所日語及衛生學教官、奉天紅十字會醫學校教員、黑龍江省官醫院總醫官、吉林省陸軍軍醫院兼吉林防疫所所長、吉林陸軍醫務傳習所所長、奉軍兵站總督部上校醫官、鎮威上將軍公署諮議、東省兵工廠醫院院長、山海關鐵路醫院院長等職。滿洲國成立後任奉天省公署警務廳衛生科長，1939年獲得盛京時報主辦的科學盛京獎，1945年4月派充奉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院長。戰後回臺灣，卒年不詳。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頁16-18、51-52。

錦昌，¹³⁸傅錫祺之子傅春魁，¹³⁹均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12年4月，出身豐原的謝秋濤、袁錦昌和張慶雲¹⁴⁰自醫學校畢業返鄉時，在車站前候迎的親友及公學校師生共百餘人，並有大鼓鬧十陣。¹⁴¹可見一般民眾將取得新式高等文憑視為地方上的光榮。

再者，日治時期由於臺灣教育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及充分且公平的教育機會，特別是總督府並沒有為臺灣人設置中等普通教育機關，在1919年臺灣教育令頒佈之前，僅設有國語學校以培養師資及公私業務人才，醫學校以造就醫事人才，另設農事試驗場及工業、林業、糖業講習所等作為職業教育機關。¹⁴²故經濟能力許可的傳統文人為免其子弟將來無法與日本人競爭，常將其從小即送往日本求學。林獻堂的三子攀龍、猶龍及雲龍均在日本就讀小學校。¹⁴³張玉書

¹³⁸ 袁錦昌：臺中潭子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一屆畢業生（1912）。其後歷任多職，包括在豐原開回春醫院、在上海開業、在行駛南中國線的郵船蘇州丸上當船醫。1925年起在基隆開業，1931年當盛京丸的船醫，1933年6月在滿洲國新京開錦昌醫院，後病逝於滿洲。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頁43-45。

¹³⁹ 傅春魁：臺中潭子，1892年生。1914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16年在潭子庄開設成春醫院，1927年至瓜哇泗水開成春藥房，1936年回臺，再開成春診療所於故鄉。1931年加入櫟社為社員。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327；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375、378、380。

¹⁴⁰ 張慶雲：豐原人，1892年出生，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一屆畢業生（1912）。後入臺中醫院任職，1913年2月於豐原街開設存安堂醫院。為豐原吟社成員。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227。

¹⁴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195-196。

¹⁴²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12。

¹⁴³ 林攀龍自幼赴日，就讀小日向尋常小學校，再讀高等師範附屬中學、第五高等學校，192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是年5月赴英國牛津及法國索爾本巴黎大學留學。林猶龍9歲赴日，就讀小日向台町尋常小學校，繼續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經東京商科（今一橋大學）大學豫科，而本科，畢業於1926年。林雲龍8歲赴日讀東京青柳尋常小學校，經東京府聖學院中學，於1924年讀法政大學豫科，1930年3月畢業於法政大學政治科。林獻堂之女林關關9歲赴日入住嘉納治五郎家，自此在日本受教育直到淑德高等女學校二年級，因祖母念孫心切而回台，繼續在長榮女中讀完高中學業。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471；興南新聞社

也在林獻堂的建議下，將養子張深切送至東京傳通院礪川小學校就讀，並寄居教務主任長鹽的家。¹⁴⁴林紀堂也將長子魁梧及次子津梁送往日本求學。¹⁴⁵林仲衡長女林雙隨則自 7 歲起便入學東京麴町區富士見小學幼稚園，8 歲便進入東京穩原小學校就讀，並寄宿於「清和女塾」。小學二年級時，其妹林雙鸞亦來東京求學，並同住。¹⁴⁶

1910 年當林獻堂攜其子至東京求學時，莊嵩特別賦詩送行，曰：「新培桃李及時栽，送子從師萬里來。莫道文明輸入少，故鄉風氣待君開。」¹⁴⁷頗有期許之意。由於這些小留學生從小接受日語教育，對臺語不太嫻熟，常發生與父母言語無法溝通的情形，例如林雙隨 16 歲首次返臺探望生病的母親莊秋藻時，因不太會講臺語，還需要透過翻譯才能與其母交談；¹⁴⁸林魁梧和林津梁的家書亦以日文書寫，其父紀堂雖學過幾個月的日語，仍無法直接透過文字與其溝

編，《台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232、449、463；〈故高林關關女士告別禮拜〉（臺北：台北濟南基督長老教會，1996）。

¹⁴⁴ 張深切著，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主編，《張深切全集卷 3 我與我的思想》（臺北：文經社，1998），頁 74。張深切小學校畢業後，1919 年升入豐山中學，1922 年轉學至青山學院中等部，但因學業並不順利，於 1923 年底前往上海。黃英哲，〈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收於張深切著，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主編，《張深切全集卷 12 張深切與他的時代（影集）》（臺北：文經社，1998），頁 24-26。

¹⁴⁵ 林紀堂約於 1011 年年送魁梧及津梁至東京，就讀誠之小學，並住在校長田中先生家中，此事係透過臺中廳長枝德二居間介紹。〈倦游而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125 號，明治 44 年 11 月 20 日，頁 3；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3 月 14 日，未刊稿；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 84。

¹⁴⁶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店：國史館，2005），頁 40-41。

¹⁴⁷ 莊嵩，〈獻堂將率兩令嗣留學東京賦此送行〉，收於莊嵩，《太岳詩草》，頁 36-37。

¹⁴⁸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頁 40-44。

通，必須依靠翻譯才能讀信，回信也需翻譯代勞。¹⁴⁹這恐怕是傳統文人為讓子女從小就能與世界潮流同步所付出的代價。

此外，傳統文人子弟亦不乏畢業於日本高等學府者，除林獻堂三子從小留日，並畢業於日本大學外，林幼春長子林培英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經科；¹⁵⁰林耀亭次子林湯盤畢業於明治大學法科；¹⁵¹李春盛三子李國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¹⁵²鄭肇基長子鄭鴻源東京帝大畢業；¹⁵³黃純青次子黃及時畢業於東京商科大學（現為一橋大學）；¹⁵⁴楊仲佐三子楊佐三郎畢業於京都關西美術院；¹⁵⁵吳克明¹⁵⁶長子吳景箕畢業於東京帝大文學科，次子吳景徽為京都帝大醫學博士，三子吳景謨為名古屋帝大醫學博士，¹⁵⁷均是傳統文人第二代留日的著名例子。至於無子嗣的余塘，因疼愛其姪余伯湘（其弟余仲民長子），乃將一生辛勞所得，栽培其就讀九州帝大醫學院。¹⁵⁸

¹⁴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4月28日，7月3日；1916年3月2日，未刊稿。

¹⁵⁰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頁462。

¹⁵¹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昭和9年版，頁232。

¹⁵²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409。

¹⁵³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昭和9年版，頁144。

¹⁵⁴ 李泰德，〈文化變遷下的臺灣傳統文人—黃得時評傳〉，頁29。

¹⁵⁵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380。楊佐三郎更於1932年赴法國巴黎研習繪畫，楊仲佐乃作〈豚兒三郎留學巴里詩以勉之〉，鼓勵其認真求學，以重振家風。其詩如下：「寸陰尺璧莫蹉跎，業欲求精在琢磨。唱霸西人惟物理，東洋道德不輸佗。」「為學真如初製鐵，千槌百鍊始成鋼。箕裘似我多慚愧，重振家風念勿忘。」楊仲佐，《網溪詩集後編》（台北：自刊本，1937），頁31。

¹⁵⁶ 吳克明：雲林斗六人，1887年中秀才。日治後歷任斗六辨務署參事、斗六區長、斗六廳參事等職。1908年與王雪農合資創辦斗六製糖合資會社，6年後合併於日本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晚年從事農地開墾。詩文造詣亦不凡，詩作死後其子吳景箕編成《碩軒詩文遺稿》，部分詩文刊載於《詩報》。賴郁文，〈斗六豪門中的陶淵明—吳景箕的古典詩〉，收於鄭定國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頁101-106。

¹⁵⁷ 賴郁文，〈斗六豪門中的陶淵明—吳景箕的古典詩〉，收於鄭定國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頁104。

¹⁵⁸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245。

另一方面，傳統文人也希望教育制度能有所改革，臺人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機會能增加，鑑於臺灣尚無一所臺人的中學，1913年林烈堂、林獻堂等人發起募款，共198人聯名向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請願，要求設置臺灣人可以就讀的私立中學校。¹⁵⁹

據若林正丈的研究，林獻堂原極為鼓勵臺人子弟赴日求學，並於1912年以霧峰林家為中心募集了十萬餘圓，希望成立「勸學會」，以保護、指導留學子弟為旨趣。但因該年總督府得到東洋協會的補助，在東京的東洋協會專門學校（現拓殖大學）校地內興建台灣留學生專用的高砂寮（5月開工，9月落成）。因此「勸學會」設立的意義減弱，乃轉而致力於設立私立中學。¹⁶⁰

陳懷澄、林癡仙、林幼春等人對於私立中學的籌設也很盡力。他們常在一起商議籌辦中學事宜，¹⁶¹更分工合作，林癡仙撰寫〈中學校募集序〉和〈籌設中學啓〉，林幼春草上督府書，陳貫則譯早稻田中學規則。¹⁶²林癡仙四處奔走，風塵僕僕至牛罵頭、三角仔、樹仔腳、吳厝等地，向蔡遜庭、呂汝玉、林秀榮等人募款，其中，樹仔腳林秀榮的態度頗為無理，癡仙亦只能默默承受。¹⁶³他也請託廖西東印信函，寄給各區長和參事，向其勸捐中學所需款項。¹⁶⁴顏雲年、呂瑄星、徐杰夫、林仲衡、李春盛、林耀亭、黃茂盛、黃玉階、林文華、吳德功、陳紹年、許梓桑、陳瑚、張玉書、洪以南、曾席珍、莊伯容、¹⁶⁵林玉書、蘇孝德、林維朝等許多傳統文人乃慷慨解囊，貢獻一己之力。¹⁶⁶

¹⁵⁹ 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頁75；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65-67。

¹⁶⁰ 若林正丈，〈總督政治と台灣土著地主資産階級—公立台中中學校設立問題、一九一二—一九一五年〉，收於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2001），頁351、353。

¹⁶¹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年11月6日；1914年4月2日，未刊稿。

¹⁶²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年10月24日；1914年4月5日，未刊稿。

¹⁶³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年11月15-16日、18日；1914年1月6日，未刊稿。

¹⁶⁴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年11月22日，未刊稿。

¹⁶⁵ 莊伯容（1864-1932）：號逸翁、景陵，嘉義人。1881年歲舉秀才。1900年任嘉義辨務署參

由於眾人的努力，總督府最後同意於 1915 年 5 月 1 日設立臺中中學校，但改私立為公立，由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中的地方稅來負擔，而校地、校舍等經費則由臺灣人支付。¹⁶⁷

四、斷髮易服

關於傳統文人對斷髮易服的回應，例如洪棄生將頭髮視為對前朝效忠的表現，對新時代的種種變革採取抗拒的態度，故堅不割辮，拒著洋服，以遺民自高，日人強去其辮，遂披散長髮，著寬博大褂，出輒手搖蒲扇，從容過市，見者無不驚異，視為怪誕。¹⁶⁸棄生並作〈蓄髮詩〉，敘其寧留「不歐不亞亦不倭」的辮髮，任人笑罵，躲避「獐吏」的取締。¹⁶⁹

王采甫¹⁷⁰亦有類似的態度，譏嘲追求文明維新者斷髮易服後不過是洋冠胡服，僅具外表，若未能操日語，徒然引人嘲笑。他曰：

大呼世界唱文明，一片隆隆斷髮生。真箇維新成別調，洋冠胡服盛聯盟。

事，翌年為嘉義廳參事，1902 年授佩紳章，1907 年任嘉義衛生組合長。為羅山吟社社員。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35；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60-63。

¹⁶⁶ 捐款名單詳見立於臺中一中正門校庭的〈本校創立紀念碑〉，碑文收於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65-66。

¹⁶⁷ 若林正丈，〈總督政治と台灣土著地主資産階級—公立台中中學校設立問題、一九一二—一九一五年〉，收於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頁 337-339。

¹⁶⁸ 日本名作家佐藤春夫於 1920 年來臺觀光，曾途經鹿港，對於洪棄生，有如下的記載：「他是個性情古怪的人，寧可說是頑迷的人，儘管是很有教養的人士，卻依然留著現今中國苦力也少見的辮髮，不僅如此，穿著寬袖子的舊式衣服，手持一把大扇子。」河原功著，葉石濤譯，《佐藤春夫的殖民地之旅》，收於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臺北：遠景出版社，1985），頁 299。

¹⁶⁹ 洪棄生，〈蓄髮詩〉，收於洪棄生，《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3），頁 332。

¹⁷⁰ 王彩甫：名承烈，字人俊，采甫為其號，臺北艋舺人，瀛社社員，亦擅畫。

維新聞唱表同情，種種頭髮忽改易。宴會莫能操國語，令人空笑大愁生。

171

然而，許多社會領導階層將斷髮視為代表「文明」或「時髦」，是順應西化時潮的時代變革。洪以南認為，「環球五洲之大，其未斷髮者惟支那及朝鮮而已，今則斷髮之風潮已漸湧湃，誠欲取世界之大同也，臺灣顧可獨異乎。」¹⁷²黃玉階以為「斷髮之風，盛行全球，吾於五年前逆料及此，何也？謂二十世紀乃維新之世界，文明風化，所及殆遍，勢使然也。」¹⁷³加之 1910 年之際，中華民國成立，滿清滅亡，中國因受革命的影響而興起剪辮之風，韓國併入日本後，韓人亦爭斷結髮，受此風潮影響，不少傳統文人接受斷髮。¹⁷⁴例如蔡惠如斷髮後，莊雲從讚美他：「愛汝文明除舊弊，鏡中新鑄好頭顱。」¹⁷⁵

早在 1911 年初，大稻埕區長黃玉階與謝汝銓共同發起「斷髮不改裝會」，參與者包含多名瀛社成員，例如林湘沅、黃玉階、楊仲佐、魏清德等人。¹⁷⁶該會理念是辮髮不合時潮、不衛生、不便，且有礙於同化，亟須剪除，惟為免購置洋服增加經濟負擔，故可暫不改裝。¹⁷⁷據稱除文人本身斷髮外，其子弟亦受影響，而自願斷髮。例如謝汝銓之三子師舜，年僅 5 歲，見其父已斷髮，便終

¹⁷¹ 王采甫，〈戲贈友人〉，收於邱秀堂編，《鯤海粹編》（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0），頁 29。

¹⁷² 〈斷髮不改裝會贊成員本島人總代洪以南答辭〉，《臺灣日日新報》，第 3854 號，明治 44 年 2 月 12 日，頁 2。

¹⁷³ 〈祝詞〉，《臺灣日日新報》，第 3854 號，明治 44 年 2 月 12 日，頁 2。

¹⁷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280-283。

¹⁷⁵ 莊雲從，〈贈惠如〉，收於王建竹編，《台中詩乘》（臺中：臺中市政府，1976），頁 169。

¹⁷⁶ 〈發起人之實行剪髮者〉，《臺灣日日新報》，第 3853 號，明治 44 年 2 月 13 日，頁 3。

¹⁷⁷ 〈紀元節斷髮不改裝會舉行盛況〉，《臺灣日日新報》，第 3854 號，明治 44 年 2 月 12 日，頁 2。

日吵鬧不休，要求斷髮，後乃允其所請；楊仲佐次子鏡秋和三子佐三郎也自請斷髮。¹⁷⁸

林紀堂亦於 1911 年在東京斷髮，¹⁷⁹可能是受當地西化進步的風氣所感染；1913 年他攜其妻再度赴日旅遊，其裝束已是斷髮服洋裝，其妻則已解纏，並穿流行衫裙，故輿論以元禮同舟、雲英共載盛讚其開明。¹⁸⁰1915 年 5 月 25 日，林紀堂甚至專程請其友人林榮泰¹⁸¹從萬斗六來其宅，如此大費周章，只為勸林榮泰斷髮。¹⁸²傅錫祺亦於 1912 年 5 月 1 日，與其四子傅春鏡同在臺中斷髮。¹⁸³1912 年自福建返臺省親掃墓的許南英，目睹歡迎他的文人故舊已鮮見辮髮，而深感錯愕，乃嘆道：「斷髮從吳俗，焚心抱杞憂。」¹⁸⁴可知臺灣傳統文人斷髮的普遍。

然而，傳統文人即使因追求文明而選擇斷髮，然因漢人民族意識的影響，內心仍不無掙扎。林癡仙有〈髮〉一詩，表達內心的痛苦：

大好頭顱斫與誰，心長髮短不勝悲。半生寂寂羞看鏡，萬事茫茫泣染絲。
 叫月禿鷓聲最苦，經霜髡柳態先衰。江山滿目空搔首，風景全殊總角時。

185

由於辮髮長期以來是身體的一部份，一旦消失了，不安全感立即浮現。尤其可

¹⁷⁸ 〈編輯日錄（2月9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3851 號，明治 44 年 2 月 10 日，頁 3。

¹⁷⁹ 〈倦游而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4 年 11 月 20 日，第 4125 號，頁 3。

¹⁸⁰ 〈觀光內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2 年 10 月 8 日，第 4791 號，頁 6。

¹⁸¹ 林榮泰：居於臺中萬斗六，藥舖主，亦為什貨、煙草商，店號名聚豐號。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中廳》，頁 431；〈林紹堂、吳鸞旂、楊吉臣、林榮泰敘勳二關スル件〉，《公文類纂》，明治 30 年，甲種永久保存，第 5 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¹⁸²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5 月 25 日，未刊稿。

¹⁸³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375。

¹⁸⁴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107。

¹⁸⁵ 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下》，頁 229。

怕的是，在異族統治下某些固有的事物似乎也會如同辮髮一般消失，更讓癡仙悲傷抑鬱。較年輕的蔡子昭亦有類似的感覺，其詩曰：

頭顱牽挂已全無，不覺今吾是故吾。莫笑伊川成短髮，禿鷲露頂滿街衢。¹⁸⁶

張玉書雖不排斥斷髮，與莊雲從相同，認為新鑄的好頭顱方為重要，剪盡千莖並非迂腐，其〈斷髮〉一詩如下：

星星垂鬢感模糊，剪盡千莖豈是迂。三握周公太多事，不如新鑄好頭顱。

187

但根據其養子張深切的回憶，1913年時，張玉書為追求維新，決定將其子弟的辮子全數剪除。要剃髮時，全家人跪在祖先排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最後張玉書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張深切的辮子，使勁一剪。事後好像殺了人般，茫然自失，揮淚走出門外。¹⁸⁸由此可看出張玉書內心的掙扎，但在民族意識與腦袋維新兩者的拔河中，他仍選擇維新，以跟上時代潮流。

斷髮在傳統文人間後來已成為風潮，甚至改裝也日益普遍，欲不從眾已有困難。起初張麗俊對於斷髮也頗為猶疑。早在1911年2月11日，其所居的葫蘆墩街民即一起勵行斷髮。¹⁸⁹1911年2月間袁錦昌曾來信勸其斷髮，但他認為斷髮不便者多，而便者少，例如改裝後衣服費增多，也可能不好看，以致引人笑柄等。因此在官方尚未強制的情況下，礙難從命，故覆信婉拒。其文如下：

¹⁸⁶ 蔡子昭，〈斷髮〉，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81。

¹⁸⁷ 張玉書，〈斷髮〉，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80-81。

¹⁸⁸ 張深切著，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主編，《張深切全集卷1 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上）》（臺北：文經社，1998），頁84-85。

¹⁸⁹ 葫蘆墩公學校編，〈豐原鄉土志〉，頁4，〈鄉土史年表〉。

據來書云，立會剪髮有老成者，有少年者，既云立會，則非官長、先生之命，從違聽人自便矣。自予思之，剪髮不便者多，而便者少也，蓋剪髮不改裝似不合維新之態，若改裝則衣服之費頗多，此不便一也。剪髮必成立，方不冒文明之諱，欲成立而醫學之精頗難，此不便二也。兼之剪髮有好相、有不好相，好相者人不我議，不好相者人咸笑之，此不便三也。剪髮之便者不過晨興免辮髮而已，子姑從三便而違一便，子自圖之，何必予贅也。¹⁹⁰

然而到了翌年 9 月 25 日，事情有了轉變。因當日為張麗俊之師謝道隆的生日，張麗俊乃前往謝府向其賀壽，祝罷，道隆子謝春池即剪髮，並邀張麗俊同剪。雖然張麗俊先前對剪髮甚為抗拒，但因謝、張友誼深厚，不剪似有不恭。加之當時在場的櫟社成員林癡仙、黃旭東、傅錫祺、林載釗等人均力勸，言櫟社社友至今未剪髮者僅張氏與陳基六兩人，況今日笙簫酒宴已備，剪髮何等之光榮。在同儕的壓力下，張麗俊自知不免，遂請理髮匠將留數十年之辮子消薙大半。據其日記所載，當時諸友環列而觀，來幫忙者超過 30 人。理髮畢，謝春池攜來洋服讓張麗俊換上，方才入席與眾人同飲。¹⁹¹由此可見，至 1912 年，櫟社社友幾已全數斷髮，而林癡仙非但已走出斷髮的傷痛，更成為鼓勵友朋斷髮者，其改變不可謂不大。

五、小結

綜上可知，日治之初許多傳統文人選擇內渡，然因故鄉謀生不易、家族仍留臺等諸多因素，在臺灣局勢稍定後，便又紛紛回臺，選擇成為日本帝國的臣

¹⁹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13。

¹⁹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269-270。

民。然而，基於現實考量，傳統文人的行為常出現一些矛盾，例如雖接受日本頒發的紳章、出席揚文會，但在詩作中又流露出對中國的思慕，也拒絕協助日本官方施政。反之，即使是自號為「滄海遺民」的王松、自掘生墳避世的謝道隆，仍與日籍官紳有所交流。這些行為看似矛盾，但也顯示其已接受日本統治，企圖在理想與現實間取得平衡。

另一方面，傳統文人亦希望能趕上時代，與世界文明同步，因此總督府的施政若與現代性相關，他們也不吝支持，例如學習日語、接受新式教育、改髮易服等等均是。由日記史料可知林癡仙、林獻堂等人均曾積極學習日語，因為透過日語除了可與日本官紳交流外，亦可間接接觸到西方的文化。傳統文人也不排斥新式教育，就讀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甚至至日本留學者所在多有，他們的子女多半亦進入新式教育體系，甚至從小送至日本當小留學生。至於改髮易服，雖與民族意識有所抵觸，卻是現代化的象徵，所以其經歷一番掙扎後，亦紛紛以新面目示人。

因此，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除少數如洪棄生者堅持民族大義、華夷之防外，其餘均在接受日本統治的政治現實下，尋找自己的生存之道。他們並且樂意透過日本，而與現代化接軌，故配合日本部分的施政，然而這未必表示他們樂意同化於日本。

第二節 與日籍人士之互動和日本經驗

一、與日人之關係

前節已提及，日治之初總督府透過官紳聯吟及將傳統文人納入基層行政體系的方式，試圖取得其合作。因此，傳統文人與日人官紳日常必定有不少互動；即使是堅持不應日人之聘的文人，在日本統治下，亦無法避免與日人接觸。本節首先探究傳統文人與日人的互動，以及對其的好惡。

(一) 漢詩的交流

日本政府派遣來臺從事殖民事務的官員不少具備漢學素養，他們由於與傳統文人有同樣的文化修養，因此彼此可以透過漢詩進行對話。1896年9月13日，民政局長水野遵¹⁹²與土居香國¹⁹³邀請陳洛、李秉鈞、¹⁹⁴劉廷玉、¹⁹⁵黃茂清¹⁹⁶

¹⁹² 水野遵（1850-1900）：日本名古屋人。1871年奉命赴清國留學，1873年底任海軍通譯，乘艦至淡水，與樺山資紀共同展開調查行動。翌年牡丹社事件起，又以臺灣蕃地事務都督西鄉從道之隨員來臺。1895年5月以辦理公使身份負責接收臺灣事宜，為總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長，1897年7月去職返日。其後任貴族院議員，1898年4月發起組織「臺灣協會」，並出任幹事長。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

¹⁹³ 土居香國（1850-1921）：原名通豫，字士順，又號香國花史，日本土佐人。1895年6月以日本駐臺總督府陸軍局郵便局長身份來臺，後任民政部郵便局長。暇餘之時瀏覽山水，與名家唱和，觸物感情，以詩記之。1897年9月返日。寓臺期間，頗多佳構，後將其集之為卷，題為《征台集》。《臺灣文學辭典》試用版，張麗芬撰，「土居香國」條。

¹⁹⁴ 李秉鈞（1844-1904）：臺北人。1872年取進縣學秀才，1892年再赴會試，登第紅榜選中，補為貢生。1897年授佩紳章，1900年任臺北縣參事，1903年任臨時舊慣調查會事務囑託。1904年因病過世。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20-21。

¹⁹⁵ 劉廷玉：臺北文山大坪林人。日治初期任保良局長，以忠誠稱。1897年授佩紳章，1899年任臺北地方法院顧問，1907年任深坑廳參事，1910年過世。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51。

¹⁹⁶ 黃茂清：臺北艋舺人，生員。日治後，任職於艋舺保良局，幫辦收籍安撫諸般事務。1987年任

等人夜宴歡吟。接著，9月22日水野遵又與官紳多人於鯤艸龍山寺共開觀月之宴，共有36人參加。1896年12月成立的「玉山吟社」，是日治之初臺灣最早的漢文詩社，即是水野遵、土居香國、加藤重任、¹⁹⁷館森鴻等日人所倡，他們常邀黃茂清、李秉鈞、陳洛等臺人與會，以聯絡感情。¹⁹⁸此社對臺灣詩社活動之延續與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其文學意義值得正視。¹⁹⁹

此後，總督兒玉源太郎、田健治郎、內田嘉吉；民政長官後藤新平；²⁰⁰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臺中縣知事村上義雄、新竹縣知事櫻井勉等均以此種方式與傳統文人建立情誼。此種懷柔策略不僅化解傳統文人對於漢文學存廢的憂慮，也進一步確認漢詩及漢詩人在文壇中的地位，並鞏固傳統文人在社會上所享有殊榮的身份。²⁰¹

臺北辨務署雇員，獲授紳章。1900年補任大稻埕公學校教師。1907年因病逝世。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24。

¹⁹⁷ 加藤重任（1851-1904）：字子遠，號雪窗。日本常州人。士官學校畢業，曾參與甲午戰爭。1895年以軍人身分來臺，曾擔任臺北屯兵少尉、台北縣庶務課長等職。1898年離臺，1900年又再度來臺，擔任臺北縣囑託、土地調查局編纂。後病逝於台北，友人館森鴻為其編《雪窗遺稿》行世。《臺灣文學辭典》試用版，張麗芬撰，「加藤重任」條。

¹⁹⁸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185-187。

¹⁹⁹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年11月），頁6。

²⁰⁰ 1899年6月，兒玉源太郎總督之別業「南菜園」完成後，邀全臺詩人召開聯吟大會，並集結成《南菜園唱和集》；田健治郎總督於1921年招待全臺詩人於其官邸聚會吟詠，後編為《大雅唱和集》；內田嘉吉總督於1924年元旦以〈新年言志〉七絕和日本天皇敕題，並向臺人徵集和詩，編成《新年言志》；1905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官邸「烏松閣」落成，賦詩兩首以徵島內外詩人唱和，後輯結成《烏松閣唱和集》。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頁154-157；施懿琳，〈從《采詩集》看臺日漢詩人的互動模式與書寫話語〉，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頁364。

²⁰¹ 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49。

同時，亦有許多日本漢詩人來臺任官或擔任記者，例如館森鴻、小泉盜泉、²⁰²豬口鳳庵、尾崎秀真、²⁰³鷹取岳陽、²⁰⁴久保天隨²⁰⁵等人，他們常與臺灣文人唱和，甚至共同參與詩社活動。此外，日治初期的《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皆設有「文苑」欄以刊載日人文士的漢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

²⁰² 小泉盜泉（1867-1909）：名政以，字子潔，盜泉為其號，日本奧州盛岡人。1900年來臺，任職《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任臺南廳事務囑託，後調臺北警察本署。1904年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秘書，大受賞識，倚為左右手。在臺時曾參與「穆如吟社」與「淡社」，均是以北台灣為主要活動場域，且以日本文人為主體的詩社。後藤任滿洲鐵道總裁時，亦前往襄贊。後因健康因素，加上對人生的落差與失望，於壯年時期自殺。有《盜泉詩稿》行世。胡巨川，〈小泉政及其《盜泉詩稿》析論〉，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頁431-433；謝崇耀，〈小泉盜泉及其漢詩探析〉，《臺北文獻》160（2007年6月），頁21-68。

²⁰³ 尾崎秀真（1874-1949）：字白水，號古村，日本岐阜縣人。1901年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兼漢文版主筆，1911年起兼任總督府囑託，1922年4月轉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1932年3月與谷河梅人共同受聘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1935年出版《臺灣文化史說》。在臺長達四十餘年，二次大戰結束後才返回日本。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頁367-368，葉碧苓撰，「尾崎秀真」條。

²⁰⁴ 鷹取岳陽（1869-1933）：名田一郎，岳陽為其號，日本岡山縣人。1876年10月畢業於岡山縣閑谷漢文科，11月入東京二松學舍漢文學科、日本英學館英文學科就讀。1888年12月任岡山日報社編輯，1908年12月任臺中廳農會囑託，1909年3月任任阿猴廳文書編纂事務囑託，1911年9月任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勤務、編纂事務囑託，1917年12月兼任博物館、民政部殖產局囑託，1928年3月退職。1916年編纂《臺灣列紳傳》一書。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頁1366，王淑津撰，「鷹取田一郎」條。

²⁰⁵ 久保天隨（1875-1937）：原名久保得二，天隨為其號，日本東京人。1899年7月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10月入大學院（研究所）就讀。1907至1910年任法政大學講師，其後歷任遞信省囑託、經理學校囑託、宮內省圖書寮事務囑託、大東文化學院講師等職。1927年11月獲頒文學博士學位，1929年3月出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5月和尾崎秀真等共同擔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委員，1932年辭去臺北帝大教職。工漢詩，在臺時與同好創「南雅吟社」，並將之吟詠之詩結集成《南雅集》一書。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頁76，葉碧苓撰，「久保天隨」條；《臺灣文學辭典》試用版，張麗芬撰，「久保天隨」條。

「拾碎錦囊」欄則以詩話的方式，講述日本漢詩家、詩作的故事，成為介紹日本漢文學的推手。²⁰⁶

傳統文人對日人文士的看法，可以用魏清德為例說明。他認為日本之漢學家往往私淑中國的名儒碩彥，因此日臺雙方存有同文同種的相似性，故「何處不可披胸襟露熱誠而同化之？」²⁰⁷

即使是地方上基層的警察或雇員，亦有以通曉漢詩、棋藝等素養為利器，與地方上的文人打好關係。1906年擔任臺中廳雇員的味戶秀雄，為調查建物用地而與擔任下南坑第一保保正的張麗俊有所接觸，因味戶稍有文墨，張麗俊乃與其談論詩文，彼此相談甚歡；²⁰⁸1908年任葫蘆墩警察的本多氏，亦擅吟詠，當他至張麗俊宅欲攤派壯丁防疫臨時費時，便兼詠〈秋感〉，而贏得張麗俊的好感，並將其詩作抄錄在日記中。²⁰⁹1930年任霧峰警察久保基樹²¹⁰則熱愛下棋，經常與林獻堂對奕，²¹¹甚至參加其組織之圍棋會。²¹²

日本皇室成員若來臺巡視，對於臺灣原有的知識階層也不忽視，1923年皇太子（即後來的昭和天皇）行啓臺灣時，臺中州的吳德功、傅錫祺、王學潛、林耀亭即以學者身份獲賞賜御果子，傅錫祺將此事記於年譜中，而引以為榮；

²⁰⁶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頁9-10。

²⁰⁷ 潤菴生，〈南清遊覽記錄〉（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830號，明治44年1月19日，頁1。

²⁰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95。

²⁰⁹ 本多的〈秋感〉，其詩如下：「天涯落拓舊交非，運轉萍浮事事違。夜雨三更人不寐，秋風八月雁將歸。」「詩酒聊解胸中恨，狂放常招世上譏。一紙鄉書報何處，白蘋江畔碧鱸肥。」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89。

²¹⁰ 久保基樹：1888年生，日本長野縣人。1923年來臺，任臺灣總督府巡查，以後歷任臺中州警部補、警部、大甲街協議會員、大肚庄長等職。《臺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頁120。

²¹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251、252、257、280。

²¹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358；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31。

²¹³林耀亭還曾因對農事有功，受日本農會總裁守正王殿下²¹⁴賜茶於宮邸，更於1935年11月5日受邀參列在東京新宿御苑舉行的觀菊會。²¹⁵

在此種環境下，傳統文人的詩社活動常有日人來賓參與。1909年4月3日臺中廳長佐藤謙太郎、臺中廳總務課屬山田孝使、總務技手鷹取田，曾出席在林瑞騰宅瑞軒舉行的櫟社詩會，²¹⁶其中山田及鷹取兩人甚至想加入櫟社為社友；²¹⁷翌年4月23日櫟社廣邀北中南各地文人參加，於瑞軒舉行的詩會也有日人安江五溪、永鳥蘇南參與，²¹⁸故傅錫祺賦詩曰「神仙也許來三島」。²¹⁹往後的櫟社詩會經常有日人的蹤跡，柳田陵村、臺中廳長枝德二（1909.10.~1915.12.，後調臺南廳長）、臺中廳庶務課長佐佐木忠藏均是座上賓；曾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的初山衣洲離臺數年後，於1914年再度來臺，櫟社乃於4月27日在臺中新莊仔蔡蓮舫別邸，召開歡迎會，諸人並作〈贈衣洲〉之詩。²²⁰

不少傳統文人與日人官紳具有私人情誼。例如林耀亭與臺中辦務署長關口隆正、柳田陵村、臺中廳長枝德二、民政長官下村宏等人往來密切，並多次與總督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臺中廳長佐藤謙太郎等人以詩唱和。²²¹

²¹³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377。

²¹⁴ 守正王殿下：朝彥親王第四子，1874年出生。為元帥陸軍大將，功四級，軍事參議官。澤本健三編，《市町村別日本國勢總覽8》（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9二刷），頁4。

²¹⁵ 林獻堂，〈弔辭〉，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附之〈哀輓錄〉，頁11。

²¹⁶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5。

²¹⁷ 傅錫祺在〈櫟社雅集〉中云：「不料有人同臭味，從新願結鷺鷥盟。」他並自註：「廳內之山田孝使及鷹取田亦願加盟為社友。」傅錫祺，《鶴亭詩集》，頁10。

²¹⁸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6。

²¹⁹ 傅錫祺，〈櫟社庚戌春會〉，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頁27。傅錫祺在此句之後自註：「有內地人安江五溪、永鳥蘇南二氏列席。」

²²⁰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8、10。

²²¹ 參閱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之詩題，〈謝臺中辦務署長關口隆正贈水晶印〉、〈送柳田陵村先生赴任北斗郡〉、〈贈枝德二先生〉、〈呈海南博士〉、〈次蔗庵前總督瑤韻〉、〈次川村總督草山即事原韻〉、〈奉和佐藤謙太郎君紀元節韻〉，頁1、30、82、88、103、143-144。

林維朝與擅作漢詩的新港公學校教諭坂根十二郎也常以詩酒相唱和，兩人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其〈贈呈教諭坂根先生〉曰：

挹君丰采讀君詩，御李今朝恨晚遲。飲酒揮毫稱韻士，通今博古信良師。

222

兩年後，坂根轉勤臺南，維朝特別作餞別詩贈之：

聚首絳帷閱兩年，同聲相應倍欣然。方圖雅範常趨侍，無那文旌遽遠遷。
唱徹驪歌情愴惻，斟來別酒意纏綿。琴聲重聽知何日，雲樹蒼茫悵各天。

223

對於離別的不捨溢於言表。新港支廳長平盛香也數次贈詠蘭詩與林維朝，林維朝並合其韻。²²⁴透過漢詩，拉近了兩人的關係。

莊伯容則與嘉義廳長岡田信興交情深厚。乙未之後，莊伯容賦閒在家，潛研醫道琴書而不忤不求，以野鶴閒雲自娛。1898年岡田信興任臺南縣嘉義辨務署署長，聞其才學過人，特地慕名拜訪。莊伯容雖不諳日語，但岡田之漢文造詣頗深，兩人以筆談交換意見甚洽，乃成爲摯友。1900年莊氏更因岡田之薦，擔任嘉義縣辨務署參事。翌年改地方建制爲嘉義廳，岡田續任嘉義廳長，莊伯容則任嘉義廳參事。1906年3月17日，嘉義發生大地震，災後莊伯容首倡立碑追悼紀念受難者，因無前例使岡田頗爲躊躇，惟經極力懇求後，終獲准立碑於

²²² 林維朝，〈贈呈教諭坂根先生〉，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146-148。

²²³ 林維朝，〈坂根先生轉任臺南離筵餞飲詩以送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164。

²²⁴ 林維朝，〈次平盛香支廳長詠蘭原韻〉、〈平支廳長再以詠蘭詩見貺賦此贈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180、182。

嘉義公園內。輿論認為紀念碑得以建立，實因莊伯容與岡田廳長間友誼甚篤所促成。²²⁵

北部的瀛社詩人與日人官紳的往來更是密切，以謝汝銓為例，他交際的對象包含總督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民政長官下村宏、賀來佐賀太郎、後藤文夫、木下信、基隆廳長橫澤次郎、臺北廳長加福豐次、臺北州知事相賀照鄉、高田富藏、吉岡荒造、高橋親吉、新竹州知事梅谷光貞、臺中州知事太田吾一，臺南州知事片山三郎、臺灣神社宮司山口透等人，為數甚多。²²⁶

田健治郎總督履任之初，黃純青作歡迎詩如下：

冬日田男可愛哉，文官總督履新來。精神矍鑠姿瀟灑，儒雅風流王佐才。
精神物質總無偏，急務實施教化先。取法不師英法屬，政綱炯眼異前賢。

227

對田氏推崇備至，而總督更將此詩謄錄在其日記中，想必深得其心。魏清德與連橫更將田健治郎總督諭告譯成漢文，可見兩人與總督府有一些互動。²²⁸

此外，一些較具民族立場的傳統文人，也與日人在詩學上有所交流。林幼春雖被葉榮鐘形容為「始終不和日人打交道」、「不屑與日本人周旋」，²²⁹但他

²²⁵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60-61。

²²⁶ 參閱謝汝銓，《雪漁詩集》其中的詩題，〈督憲內田竹窗先生〉、〈督憲伊澤多喜男先生〉、〈督憲上山蔗庵先生〉、〈督憲川村亞洲先生〉、〈藩憲下村海南博士〉、〈藩憲賀來米南先生〉、〈藩憲後藤文夫先生〉、〈藩憲木下信先生〉、〈基隆廳長橫澤次郎先生〉、〈太守加福豐次先生〉、〈太守相賀照鄉先生〉、〈太守高田富藏先生〉、〈太守吉岡荒造先生〉、〈太守高橋親吉先生〉、〈太守梅谷光貞先生〉、〈太守太田吾一先生〉、〈太守片山三郎先生〉、〈臺灣神社宮司山口透先生〉，頁 41、57-59、68。

²²⁷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91。

²²⁸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459。

與施梅樵均曾與久保天隨互相唱和；²³⁰林幼春且曾因其子之師荒井教學認真，循循善誘，而特別贈詩與之。²³¹林幼春也曾帶領數名總督府和臺中廳的官員拜訪林紀堂，欲參觀其後園，²³²足見他與日人也有打交道。至於王松，曾作詩稱頌總督府書記白井新太郎、新竹支廳長櫻井勉、民政長官水野遵；當其去世時，櫻井勉、三屋清陰、佐佐木忠藏均作詩憑弔。²³³

（二）公務上的應酬往來

除了漢詩的切磋，有些日本官吏是以治績或人格特質贏得傳統文人的敬重。張麗俊便對葫蘆墩警察樋口氏的辭世感到哀傷，因他平時甚受民眾愛戴，故張麗俊感嘆「善人天不與壽，謂之何哉！」²³⁴1915年7月他往方玉榮運送組合候迎安東貞美總督時，見總督放下身段，下車與迎接人員答禮，因此舉殊為少有，故張麗俊感嘆，自他任保正17年來，迎送長官何止一人，未有如此謙卑者。²³⁵

事實上，日本官員出巡時傳統文人常送往迎來，地方官員到任或離職，文人也會設宴款待，這些是身為社會領導階層所無法規避的義務。社會地位高者如林獻堂，常有與總督會面的機會，總督甚至是他家座上客，例如1930年8月石塚英藏總督偕其女登新高山（玉山）後，即順道訪問林家，林獻堂敘禮曰：

²²⁹ 葉榮鐘，〈臺灣民族詩人一林幼春〉，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223。

²³⁰ 林幼春，〈久保天隨博士以閩中遊草一卷見贈敬以長句奉謝〉，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57；施梅樵，〈偕久保天隨遊紅林席上賦贈〉，收於施梅樵，《鹿江集》，頁21。

²³¹ 林幼春，〈贈荒井〉，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48。其詩如下：「吾子從君學，循循善誘之。此情何以報，言贈一篇詩。」

²³²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2月12日，未刊稿。

²³³ 櫻井勉，〈哭王友竹先生〉、三屋清陰，〈追慕王友竹先生〉、佐佐木忠藏，〈輓王先生次其絕句詩韻〉，收於王松，《友竹詩集》，頁160、161。

²³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61-62。

²³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209。

「總督閣下及令媛登新高山實為空前之壯舉，山靈特表現其陰晴風雨自然偉大以示閣下，而閣下之胸襟得以容納此自然之偉大，令人欽仰不置。」²³⁶1931年1月為答謝《臺灣新民報》獲准改為日刊，林氏又與太田政弘總督會面。²³⁷最後一任總督安藤利吉也於1945年8月4日拜訪林宅，據林獻堂推測是因安藤有南巡之行，若待在臺中恐受美機襲擊，又未曾至霧峰一遊，所以來此。²³⁸

社會地位較低者如張麗俊，常出席的就是地方巡查部長或警察課長的祝賀或送別會；²³⁹至於擔任潭子庄長的傅錫祺，當臺中州知事有所異動時，也要送舊及迎新一番。1921年1月30日，他經由閱報得知臺中州知事加福豐次辭官，當日午后即特別前往臺中慰問；2月4日又於潭子驛迎接新任知事立川連；7日列席臺中公會堂舉行的新舊知事送迎會；12日又送加福前知事至后里驛才返。²⁴⁰一連忙碌多天，事情才告一個段落。就連潭子公學校長離職，也要出席其送別會；校長離開當日，也要親自送至車站。²⁴¹

1913年冬季，民政長官內田嘉吉至嘉義視察，並召集各參事、區長開宴，予以訓勉。為此，林維朝還特地作詩奉承一番：

方伯旬宣綽戟臨，卿雲在望喜難禁。萬家生佛慈悲念，一視同仁父母心。
瓊宴宏開承意厚，名言垂訓感人深。慚無紀德如椽筆，祇獻蒼黎五袴吟。

242

²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263。

²³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26。

²³⁸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8月4-5日，未刊稿。

²³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2），頁217、290。

²⁴⁰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年1月30日，2月4日、7日、12日，未刊稿。

²⁴¹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2月22日、24日、26日，未刊稿。

²⁴² 林維朝，〈癸丑初冬內田民政長官視察行政遙臨嘉義召集參事區長諄諄訓示又承盛宴招待賦此贈呈〉，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266。

對內田可說推崇備至。然而，其中有多少是其真正的想法，有多少屬於應酬文字，他人實難以論斷。

反過來說，若文人家中有婚喪喜慶，日人地方官員也會到場致意，1921年9月傅錫祺母喪時，豐原郡守前田保、庶務課長山口孫一郎、警察課長佐佐木長藏、巡查部長高橋等日人均列席拈香。²⁴³

（三）生活中的互動

由前述，位居領導階層的傳統文人多與日人官員有所互動，表面看來，官民似乎一團和氣，但應酬之餘其平日的關係為何，則值得探究。關於此一課題，文人留下的日記提供不少線索。

與日本官員及警部補維持良好關係者首推林紀堂。他與臺中廳長枝德二往來密切，紀堂之長子魁梧與次子津梁，係透過枝德二居間介紹，才送往東京，就讀誠之小學，並住在校長田中家中。²⁴⁴枝德二便常寫信來詢問兩人在京狀況，²⁴⁵紀堂乃認為「其雇〔顧〕愛情深，令人欽佩之至」。²⁴⁶枝德二且曾以大西瓜兩粒贈之，²⁴⁷紀堂則曾送其金杯一組。²⁴⁸枝德二女兒招婿時，紀堂亦備禮金百金為賀禮，並以桃紅摹本大花腰帶和由東京買回之金製鑲珍珠鈕釦為禮。而之所以贈禮金百金，乃因其友人廖西東告知此為公定價碼，與別處頗為相

²⁴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2），頁411。

²⁴⁴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3月14日，未刊稿；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84。

²⁴⁵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年1月4日，未刊稿。

²⁴⁶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年1月18日，未刊稿。

²⁴⁷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年6月3日，未刊稿。

²⁴⁸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年1月27日，未刊稿。

當，如此方不致失禮。²⁴⁹足見紀堂與枝德二交情不錯，廳長家有喜事，送禮實屬當然。

紀堂與後任臺中廳長三村三平（1915.10.~1919.4.8.）也有不錯的關係，三村廳長也曾來信詢問魁梧的狀況，²⁵⁰並代其修書給東京田中校長，商討兩人受教育的問題。²⁵¹

此外，前後任臺中警部補吉崎三吉（東京人）與神山又十郎（埼玉縣人）與紀堂更是熟絡，兩人在任期中幾乎每日均至紀堂家中與其閒話家常。特別是從 1915 年 1 月初至 2 月底，吉崎幾乎天天至紀堂家拜訪，與其討論同化會（關於同化會之發展，詳見第四章第二節）之事。吉崎屢次詢問紀堂是否有入會，並提及該會最新的發展，更以嘲諷的言語批評熱中會務者，顯然在寒暄中含有監視之意，唯恐其加入同化會。例如吉崎於 1 月 12 日言及好事者設立此同化會，使廳長大失體面，實為可笑。據他觀察，此時林獻堂對同化會稍具戒心，惟林癡仙頗為熱狂。²⁵²1 月 19 日吉崎又云，甘得中為同化會再去東京，甚至改名換姓，改姓蔡，蔡惠如亦改姓林，如此大為可笑、可疑等。並轉述林燕卿²⁵³之言，謂林獻堂此次為同化會而奔波，倘使台人以後真能獲得參政權，入議院時，因不通日語，與啞徒無異，又何能參議。²⁵⁴1 月 27 日則放話，官方打算至每日往臺中參加同化會者的家裡搜索證據資料，故參加此會實為危險。²⁵⁵2 月 3

²⁴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1 月 25 日，未刊稿。

²⁵⁰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 年 3 月 24 日，未刊稿。

²⁵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 年 3 月 30 日，未刊稿。

²⁵²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1 月 12 日，未刊稿。

²⁵³ 林燕卿：名文榮，臺中霧峰人。1884 年清法戰爭時因功賞加縣丞銜，1888 年施九緞圍攻彰化城，因募兵 500，奉命解圍，以功賞戴五品藍翎、廣東候補知縣，1894 年補用同知。日治後，1898 年任臺中辦務署參事，1902 年授紳章，家產約 10 萬圓。林文欽，〈福建鄉試硃卷光緒癸巳恩科〉，未出版，許雪姬教授收藏，頁 3；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中廳》，頁 432；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93-194。

²⁵⁴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1 月 19 日，未刊稿。

²⁵⁵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1 月 27 日，未刊稿。

日又說同化會之有力者臉皮有五寸厚，至此時勢仍不近悟，實是如毒蛇之出沒無常耳。²⁵⁶2月7日更威脅此次同化會各關係者皆要接受調查。蔡惠如現在在東京，因吐血，未能從速回來；王學潛已到法院訊問多次；林子瑾之田產現已賣盡無存，再數十日後即有好笑事發表等。²⁵⁷

吉崎對於參與同化會者的冷嘲熱諷林紀堂不以為意，反而在日記中一一記下，似乎其亦有同感。平日他以友朋之禮對待吉崎，吉崎之母過世時，紀堂特別送去香料四金，以顯交誼；²⁵⁸當吉崎轉任他處前，紀堂還特別贈金六枚並備酒菜餞別，²⁵⁹款待之厚由此可見。至於神山，至少曾義務擔任紀堂的日語教師達三個月之久，當其喜獲麟兒時，紀堂也特地送上賀禮。²⁶⁰若其數日不來訪，紀堂還會向別的警察打探其行蹤，顯然對神山甚為關切。²⁶¹

由此可見，無論是臺中廳長或警部補，林紀堂已將其視為友人，而非僅是表面上的客套應酬。

林癡仙對日人警察亦無成見，其三位日語教師中，有一位即是警察池田喜三郎，癡仙亦不因池田是日人而與其保持距離。

林獻堂由於是霧峰林家的領袖，是總督府不能掉以輕心的人物，故經常與各種大大小小官階的日人有所往來，亦有幾人與他建立私人情誼。例如總督川村竹治總督和民政長官人見次郎自離開臺灣後，臺人即少有其音訊，但此二人1937年元旦仍寄賀年卡予林獻堂，故獻堂甚喜其猶尚念及也。²⁶²其次，林獻堂對石塚英藏總督的評價亦高，因其卸任後仍會與獻堂談及臺灣事情，不似中川

²⁵⁶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2月3日，未刊稿。

²⁵⁷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2月7日，未刊稿。

²⁵⁸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1月29日，未刊稿。

²⁵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3月4日，未刊稿。

²⁶⁰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年4月7日，未刊稿。

²⁶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年6月22日，未刊稿。

²⁶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3。

健藏和太田政弘毫無顧及。²⁶³1937年2月他便應石塚之邀，加入「臺灣俱樂部」，此會係1912年創設於東京，成員均與臺灣有關係或自臺灣退官者。²⁶⁴石塚還特別叮囑他須接觸各方面之重要人物以疏通意見，交遊不宜偏於一部份人士，方不致有好惡之事也。²⁶⁵

爲了推動設立臺灣議會，林獻堂與支持該運動的日本眾議員也有交情，選舉時更替田川大吉郎、清瀨一郎、神田正雄、永井柳太郎等人募集經費。²⁶⁶他若至東京，也常與前述諸人聚會，雜談時局，²⁶⁷雖然有時彼此意見不能一致，例如某次田川大吉郎頗輕視漢民族，謂其與印度、朝鮮、希臘同等在戰場接連潰敗，絕無復興之日，頗誇示日本海陸軍之壯盛。林獻堂則回說民族之興衰不全在武力，²⁶⁸但是互動依然熱絡。

林獻堂與日本自由主義學者矢內原忠雄的交情也頗深。兩人初次見面是1927年夏天，當時矢內原爲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在經濟學部擔任殖民政策講座，爲了明瞭臺灣統治的情形，特別利用暑假來臺灣考察。期間矢內原透過蔡培火的函介，至霧峰拜訪林獻堂。兩人共進午餐，而一見如故。²⁶⁹

1937年12月矢內原因公開演講反對戰爭，而觸怒軍方，導致被迫辭去東京帝大教職。林獻堂因向來欽仰其人格，憂其欲閉門研究而生活不足，即允諾

²⁶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273。

²⁶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80。

²⁶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398。

²⁶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43、47、58、71；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139。

²⁶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93、257、260、273、274。

²⁶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365。

²⁶⁹ 葉榮鐘，〈灌老與矢內原先生的交誼〉，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188-189。

連續 10 年，每年給予 500 圓的補助。²⁷⁰其後雖矢內原之研究費另有出處而拒補助，²⁷¹但由此可見兩人的情誼。

林獻堂去世後，矢內原忠雄特別為文追悼，文中提及他辭去東京帝大教職時，林獻堂專程前往其宅慰問，並以一深碧色花瓶相贈。此種盛情美意，令他感激不忘，所贈之花瓶成爲他喜愛之物，每每睹物思人，益發感念獻堂爲人之真誠和友情。²⁷²

林獻堂也有幾位日人朋友，其中之一爲松岡富雄。²⁷³日本戰敗後，松岡因恐名下土地全數被沒收，故想將土地改用林獻堂之名登記，又因擔心生命安全，想搬至霧峰居住，獻堂均允其所請。²⁷⁴其次，松岡又憂慮其宅會被國軍佔領，獻堂乃建議其門牌可改用其子林攀龍的名義，²⁷⁵可見兩人的交情。

此外，林獻堂次子林猶龍之妻藤井愛子亦是日人，證明他不排斥日人媳婦。愛子畢業於東京錦秋高女，來臺不久即習得臺語，穿臺灣服，熟習臺灣習俗，也常擔任林獻堂的翻譯，故很得林獻堂疼愛。不過她因臺灣化過深而爲在臺日本人所排斥，反而是始料未及之事。²⁷⁶

²⁷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413；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7。

²⁷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87。

²⁷² 矢內原忠雄，〈花瓶之回憶〉，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頁 509-510。

²⁷³ 松岡富雄：日本熊本縣人，1870~？。東京駒場農科大學、札幌預科肄業，至 1903 年以臨時臺灣製糖局囑託身份渡臺前，曾任熊本縣會議員。1906 年辭退囑託職，著手於蔗苗之培植，翌年設立松岡製糖所。1910 年 10 月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創立時，就任常務董事至 1913 年 4 月。1916 年 4 月創設松岡拓殖合名會社，1917 年任臺灣新聞社社長，此外並兼任比律賓拓殖合資會社、松岡興業、臺灣製粉、臺灣製紙、新竹製糖等要職，總督府評議會員。由於其將高爾夫運動引進臺灣，亦堪稱臺灣高爾夫之父。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中州下，頁 9。

²⁷⁴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8 月 24 日，未刊稿。

²⁷⁵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12 月 6 日，未刊稿。

²⁷⁶ 竹中信子，《植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株式會社田火田書房，1990），頁 345。

二、日本經驗

日治時期許多傳統文人有赴日本的經驗，除求學、經商外，有些是因為開會，例如魏清德於 1935 年至東京參加湯島聖堂重建後首次釋奠盛會，以及國際儒道大會；²⁷⁷有些純粹是參觀旅遊，例如嘉義林維朝於 1903、1907 年兩度偕同友人前往日本、王石鵬和鄭神寶於 1914 年參觀大正博覽會、²⁷⁸王達德²⁷⁹於 1929 年遍覽大阪、京都、東京等地的風光、張麗俊於 1935 年參加東京觀光團等，他們對於日本的印象及看法為何，乃是本節探討的另一個重點。

(一) 林維朝

林維朝 1903 年暢遊瀨戶內海、東京、京都、大阪等地，並參觀在大阪天王寺舉行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²⁸⁰其中，對東京留下最為深刻的印象，認為其勝景繁華實為第一儔，而自己以一介海外寒士能造訪，實為三生有幸；

²⁷⁷ 黃美娥，〈另類現代性—《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啓蒙論述〉，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221。

²⁷⁸ 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357-362。

²⁷⁹ 王達德（1897-1957）：字守三，號瘦鶴，又號潤堂，梧棲人。父王資深為清末秀才，惜早逝。年 14，因家貧，乃往外為傭。年 20，受聘為臺灣新聞社漢文記者。記者任內，曾赴中國和日本遊歷，分別撰成遊記〈漫遊大陸日記〉和〈東遊鴻爪〉於《臺灣新聞》連載。退社後受林獻堂知遇，延攬入彰化銀行為秘書。1947 年加入櫟社，亦名聞於畫壇，曾擔任臺灣書道聯盟鑑查員、臺中州支部審查員，遺留不少墨跡。1996 百年冥誕時，其子王炯如為其編《瘦鶴詩書集》，共 320 頁。王達德，《瘦鶴詩書集》（臺中：九荷山房，1996），頁 3、5、243-287、290-317。

²⁸⁰ 此博覽會於 1903 年 3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舉行，共吸引 4,350,693 人觀覽，展覽品分為農業園藝、林業、水產、採礦冶金、化學工業、染織工業、製作業工業、教育學術、衛生及經濟、美術及美術工藝等部門。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論述》（臺北：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5），頁 84。

²⁸¹而東京的夜市猶如不夜城，不愧是王畿名勝地。²⁸²其次，對於博覽會場展出的各種異品奇材和機械，亦感到耳目一新。²⁸³

1907年主要是參觀在東京上野公園舉行的「東京勸業博覽會」，²⁸⁴順便遊賞長崎、大阪、京都、名古屋、日光等地的風景名勝。在京都時造訪天滿宮、平安神宮、金閣寺、大佛堂、豐國神社、東西本願寺、清水寺等寺院，林維朝認為大都廟貌巍峨，極壯觀瞻，清幽絕俗，到此一遊頓覺神怡心曠，並誇讚京都之盛景為天下第一。²⁸⁵抵東京後，目睹市中街道寬潔，樓閣巍峨，電車、馬車、人力車絡繹往來，晝夜不絕，認為其戶口之殷繁、商業之旺盛，實為天下之冠。對日光東照宮的觀感是，其構造之華麗宏壯，實為目所未睹，到此一遊，萬慮俱寂，飄飄欲仙，故世人謂未到日光者，不可與言輪奐之美，並不可與言山水之奇。²⁸⁶

參觀博覽會時，他詳細記下展場共有三個會場、五個出品館（工業、農產、染織刺繡、陸海軍用品、朝鮮館），此外，尚有臺灣館、機械館、三菱館、外國館、水族館、美術館、體育館、空中觀覽車、噴水塔、演藝館等。而各館之建築備極華美，會場外各販賣店，環繞東京上野不忍池邊。每逢週日更

²⁸¹ 林維朝，〈東京偶作〉曰：「河山秀麗擁神州，勝景繁華第一儔。自喜寒微海外士，三生有幸快來遊。」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176。

²⁸² 林維朝，〈東京夜市〉曰：「銀花火樹四圍明，恍惚如遊不夜城。信是王畿名勝地，肩摩轂擊到深更。」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176。

²⁸³ 林維朝，〈博覽會即事〉曰：「異品奇材種種陳，者番耳目一番新。感心最是機械館，巧奪天工妙入神。」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180。

²⁸⁴ 此博覽會由東京府主辦，會期為3月20日至7月31日，共吸引6,802,768人參觀。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論述》，頁84、95。

²⁸⁵ 林維朝，〈東遊紀略（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845號，明治40年10月26日，頁3。

²⁸⁶ 林維朝，〈東遊紀略（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846號，明治40年10月27日，頁3。

有夜間造景，在數萬盞電燈的照耀下，銀花火樹，燦爛輝煌，猶如萬點星光上下輝映。關於博覽會的夜景，他有如下的詩句加以形容：

銀花火樹照輝煌，嘹唳仙音透碧空。到處嫦娥看逐墜，恍然身到廣寒宮。

287

同時他也一一記下每個出品館的展出品，並驚嘆日本之工業日新月異，有睹之不能盡睹、述之不能殫述者矣。甚至連米粟諸農產，他以為若與臺灣相較，也有上下之別，因為肥後及武州之米大而白，均非臺灣米所能相比。因此林氏認為日本之農業工業十分進步，即使競爭於世界亦毫無遜色。²⁸⁸

林維朝感興趣者，還有噴水塔和空中纜車。他記載噴水塔分 5 層，每層裝 6 個獅子頭，水從獅子口中噴出，與瀑布無殊，尤其夜間裝設五色電燈，最為美觀。至於空中纜車，他形容圓形如車輪，高有 60 餘尺，共有乘室 18 個，每室可坐 7、8 人，傳送電氣後則車輪迴轉，當轉至高處，則東京之山川風景了然在望，實為奇觀。²⁸⁹

此次博覽會之旅，讓林維朝對日本的文明進步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認為日本的景致和東京的繁華是天下第一，日本猶如他心目中的理想國，故歸來後即撰寫遊記，「願有志諸君，共知內地之文明，駸駸日上，共思奮發，咸與維新，以步後塵。」²⁹⁰而在參考日本經驗後，他更對臺灣未來的發展提出幾點建議：一、農業宜亟求改良，二、紡績蠶桑宜鼓勵興作，三、商業工業宜創設會

²⁸⁷ 林維朝，〈博覽會場夜景〉，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188。

²⁸⁸ 林維朝，〈東遊紀略（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847 號，明治 40 年 10 月 28 日，頁 9。

²⁸⁹ 林維朝，〈東遊紀略（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848 號，明治 40 年 10 月 30 日，頁 4。

²⁹⁰ 林維朝，〈東遊紀略（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845 號，明治 40 年 10 月 26 日，頁 3。

社，四、裹足陋習宜鼓舞革除。²⁹¹可見他以日本為典範，期望臺灣能急起直追。

（二）鄭神寶和王石鵬

關於鄭神寶與王石鵬的日本之行，兩人係於 1914 年 5 月 21 日抵達神戶，²⁹²後至上野，觀賞東京大正博覽會之各項展覽。此次博覽會會場甚多，分散各地，每一會場又有多館陳列，第一會場即有工業、林業、礦業、水產、教育學藝、動物等館舍，甚為熱鬧。²⁹³特別是第二會場的動力館與機械館陳列各種發動機，運輸館展示鐵道、軌道、索道、水運、通信等設施，可使觀賞者瞭解日本現代化實業之進步。²⁹⁴館外亦有陳列館，共 45 種；還有各式飲食店、賣店 80 餘種；嶄新珍奇的戲園也有數座。鄭神寶認為：「觀其規模宏大，建築壯麗，設備周至，誠為我國未曾有之大計劃。」²⁹⁵

此外，王、鄭兩人也前往神社、公園、圖書館、皇居宮城等處旅遊，對於日本環境的清潔甚為贊嘆，鄭神寶甚至在遙望富士山時有感而發，贊道：「故鄉無此好湖山，東都人士之有潔癖，好天然之美趣，高潔成性，瀟灑出塵，得無由此山川之靈秀所鍾乎？」王石鵬亦頗有同感。²⁹⁶鄭神寶又注意到，在搭乘電車或觀賞博覽會時，日人即使處於人眾混雜之處，亦不見衝突斥罵之聲，人

²⁹¹ 林維朝，〈東遊紀略（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849 號，明治 40 年 10 月 31 日，頁 4；林維朝，〈東遊紀略（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850 號，明治 40 年 11 月 1 日，頁 4。

²⁹² 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第 5024 號，大正 3 年 6 月 8 日，頁 4。

²⁹³ 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第 5039 號，大正 3 年 6 月 24 日，頁 6。

²⁹⁴ 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第 5045 號，大正 3 年 6 月 30 日，頁 6；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第 5047 號，大正 3 年 7 月 2 日，頁 6。

²⁹⁵ 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第 5039 號，大正 3 年 6 月 24 日，頁 6。

²⁹⁶ 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第 5030 號，大正 3 年 6 月 14 日，頁 6。

人都有相愛相讓之心，與臺人動輒生怒、拳棒相加或惡言相向的情況迥異。因此，鄭神寶公開表明日本是其遊蹤所及之地中，讓他最不能忘情而願一再前往者。²⁹⁷黃美娥認為，此次觀光之行，使鄭神寶與王石鵬真正見識了日本的國民性，以及衛生良好、工業進步等「文明開化」的一面，不僅滿足了原來對於日本上國的憧憬與嚮往，同時也在心中深化了對日本的認同。²⁹⁸

(三) 黃紹謨

雲林黃紹謨²⁹⁹曾於 1920 年與紳商 16 人，組成旅遊團體，前往日本視察，足跡遍及福岡博覽會、八幡製鐵所、嚴島神社、大阪、京都金閣寺、靖國神社、東京御所、淺草公園、上野公園、日光東照宮、橫濱、箱根等地，遊遍各地風景名勝。他自述此行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欣幸莫可言喻。而日本山川之秀麗，景物之稀奇，以及農業之改良、工業之進步，商業之發達，美不勝收，遠非臺地所能及。³⁰⁰

日本令他眼界大開之處不少，例如參觀八幡製鐵所時，驚見日本製鐵技術的先進，只要將鐵置於巨爐中，便能湧出紅泉，製成裝甲板，真是「機關巧妙奪天工」。³⁰¹東京電車的神奇與快速也讓他大為讚嘆，吟道：「電學如今用最

²⁹⁷ 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第 5011 號，大正 3 年 5 月 26 日，頁 5。

²⁹⁸ 黃美娥，〈帝國魅影—檪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357-359。

²⁹⁹ 黃紹謨（1868-1934）：字丕丞，號臥雲，斗六人。1892 年中試秀才，是歲，拔擢為龍門書院教席。1897 年獲頒紳章，翌年被委任為嘉義縣雇員，從事地方沿革、土地調查等文書事務工作，後任斗六公學校教師。1921 年任斗山吟社詞宗，1925 年任雲峰吟社詞宗，1926 年任西螺茨社詞宗。賴郁文，〈斗六雲林逸叟—黃紹謨的古典詩〉，收於鄭定國主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頁 67-97。

³⁰⁰ 黃紹謨，《東遊百詠》（雲林：出版者不詳，1920），頁 1。

³⁰¹ 黃紹謨，〈八幡製鐵所〉，《東遊百詠》，頁 3。其詩曰：「八幡製鐵巨爐中，湧出如泉滿地紅。卻怪製成裝甲板，機關巧妙奪天工。」

奇，推車一線善馳驅。分毫不藉機關力，走遍皇都只片時。」³⁰²除科技之外，黃紹謨認為臺灣的自然風光也無法與日本相較。他說箱根溫泉是最好的溫泉，好似神仙真境界，關子嶺和北投完全無法與其相提並論。³⁰³此次日本之行明顯地使他對日本大為欽慕，而認同其統治。

（四）王達德

王達德於 1929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28 日赴日旅遊，主要是至日光、箱根調養病後的身體，但足跡也遍及神戶、大阪、京都、摩耶山、東京、橫濱、江島、鎌倉、熱海等地，歸臺後並著遊記，名為〈東遊鴻爪〉，連載於《臺灣新聞》，詳細記下旅途中的見聞。

遊日期間王達德曾至神戶須磨遊園地，適逢該處正舉行展覽會，展出各地名城模型、巡遊西國三十三處靈場之人偶、電氣動物園與世界各種模型。王達德以為啓人智識不少，誠絕好之教育資料也。後至菊水樓受諸友宴，該餐廳共有 40 餘室，每室皆仿各地名勝而構造，莫不維妙維肖，使人如臨實地，如清水寺、牡丹閣、渡月橋、加茂川、宮島、日光等室。王達德形容其構築之巧妙、設備之華麗，實絕無而僅有，令人殊堪驚嘆。他也曾至阪急電車會社經營的寶塚樂園，樂園內有小兒遊戲室、和食堂、洋食堂、男女浴室、納涼臺、大中小各劇場等設施，王達德乃入上下共三層樓的大劇場觀賞少女歌劇，據載其歌曲之精妙、表情之細膩，奇趣環生，令人百觀不厭。

駐留東京時則前往早稻田大學、帝國大學、上野公園、明治神宮內外苑、京王閣、橫濱三溪園等地瀏覽。王達德與其他文人不同之處，在於他看了不少電影及戲劇演出。首先至邦樂座觀賞西洋有聲電影，這是一個新奇的體驗，看

³⁰² 黃紹謨，〈東京電車〉，《東遊百詠》，頁 13。

³⁰³ 黃紹謨，〈箱根環翠樓旅次〉，《東遊百詠》，頁 14。其詩曰：「溫泉最好是箱根，關嶺北投未足論。似比神仙真境界，何須夢想到崑崙。」

罷他形容此片之音樂歌曲，自己能發聲且音極明亮，悠揚頓挫，極宮商之雅妙。隨後又在松竹座欣賞另一部有聲片「支那街之夜」，片中有巴黎各種舞蹈，其舞技之精美、服裝之新奇，均令他嘆為觀止。

最特別的體驗是前往著名的帝國劇場觀劇。劇場樓高三層，規模及裝潢均極為氣派，王達德形容其建築係以花崗石作巨棟，簷楹天房則雕刻西式圖案，塗以泥金，飾以黃銅，上下金光閃閃，耀人眼簾，猶如瓊樓玉宇。場內觀眾各有座位，依指定號碼入座，故秩序井然。而舞臺劇之佈景例如市街、室內、柳堤、墓地等，均令觀者恍如置身實地，且善於應用電氣，故螢火飛舞，唧唧之聲不絕於耳，可謂極人工之巧妙。特別是海上天色之變幻，隨日之升，由黑而白而紅而碧，倏忽萬狀，僅數分間具有無窮變幻之妙趣，令人驚嘆。王達德還發現，帝國劇場雖有觀眾不下千人，但開演中異常肅穆，不聞聲息，使人佩服。反觀臺灣之劇場，雖在開演中，時聞咳嗽聲、喀痰聲、人語聲，譁然嘈雜不絕於耳，國民素質於此不免相形見絀。

由於王達德是《臺灣新聞》記者，故他特地前往東京朝日報館參觀，看見該社設有電光報版，如遇臨時發生重大事件，則發電光照出記事文字，以便迅速報予民眾週知，不禁讚嘆科學之進步。

至多摩川墓地時，發覺其一墳可收容七、八人或十數人，作為家族墓地。王達德以為臺人倘依此法築成家族公墓，則地不必廣而收容多，年年祭掃時且免往來奔波之勞，一舉而數利具焉；而該地風景優美，攜眷來遊者甚多，較之臺灣之墓地牛山濯濯、不見樹木，一任牛羊踐踏者，相去何止霄壤。

不過王達德偏愛觀覽名勝及自然風光，對於日本大都會的熱鬧卻頗不喜歡，當其遊完嵐山、琵琶湖，再至大阪時，見街上萬頭攢動、人車嘈雜，精神幾為之昏亂，乃有出天堂而入地獄之慨；瀏覽東京市內數日後，也有喧囂聒耳、精神瞽亂之感。然而日本風光的秀麗、文化藝術生活的豐富、國民素質的良好，已讓他讚譽有加。³⁰⁴

³⁰⁴ 王達德，〈東遊鴻爪〉，收於王達德，《瘦鶴詩書集》，頁 289-317。

(五) 張麗俊

張麗俊於 1935 年 3 月 31 日參加由《臺灣新聞》招募的東京觀光團，與吳萱草等 175 人赴日，作為期 23 天的遊覽。行蹤所及之處包括九州、大阪、京都、東京等地。期間曾遊覽嚴島神社，只見該處杉樹蒼翠參天，櫻花爛漫撒地，風景清幽雅潔，令人再三流連。

4 月 8 日至大阪後，前往日本生命保險會社，坐升降機上九層樓上俯視市街，則見街上各種車輛往來如蟻，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後至白鶴會社製酒工廠，喜歡觀看機器運轉的張麗俊，在此看到機關運轉裝酒，仍以巧妙難以言語、筆墨形容，來表達其感受；又見到大阪電車往來不絕，而出外遊玩者多是婦女，這在臺灣較為少見，便開始思考是因日本風俗如此或是當地男女均等。

4 月 13 日抵東京，他的初步印象是市街列車、電車、自動車、摩托車往來絡繹不絕，而層樓疊閣，高聳雲霄，令人目想神遊也。其後被安排至目黑區的高級餐廳雅敘園接受林熊徵、許丙之招待，餐廳精緻的裝潢讓張麗俊大開眼界，他記載道：「其華麗幽雅，不特殷戶富紳無此，即通都大邑亦鮮有此也，間數百間，後依山、前傍水，有結婚室，有宴會室，有休憩所，有招待所，俱雕刻人物山水花鳥，多用螺電〔鈿〕入就，不但室內已也，而便所亦以螺電〔鈿〕入焉。」往遊上野公園後，張麗俊的評語是位置寬敞、樹木蒼龍、珍禽奇獸、假山曲水、觀之不盡。16 日受郵商船會社招待，欣賞東京寶塚劇團的演出，平素愛戲曲的張麗俊認為，其戲臺之壯麗，布景之巧妙，登臺的男女角色多至 5、60 人，洵生目所未覩也。

4 月 17 日至日光，參拜東照宮；又至華嚴瀧，坐升降機墜下 10 丈，以觀削壁斷崖之瀑布，回升至地面後，則見雪花飛舞，是張麗俊第一次親見下雪。翌日回東京，往銀座遊觀三越、松屋百貨，坐其升降機上 8、9 層之高樓眺望市

街。後至橫濱森永製菓會社工場、麒麟麥酒（啤酒）會社工廠參觀，才結束此次行程。³⁰⁵

這次日本之旅，讓張麗俊見識日本的自然景觀之美、工場機械之進步及都市市街之繁華，依其記述，他對日本的觀感頗為正面，但是在旅途中仍發生了兩件令他不愉快的小插曲。首先是 4 月 12 日在山田縣參拜外宮時，張麗俊因為要蓋紀念印，遷延了一些時間，竟然與旅行團脫隊，不諳日語的他，心中倉皇異常，只好返步回到街上，他描述當時的心情是：「街又遠、心又荒〔慌〕」。後見電車山田線行駛來，遂坐回旅館，但至旅館又無法與服務人員應答，幸其餘團員不久前來旅館尋他，才化解了一場危機。³⁰⁶因為此次可怕的經驗，至東京後，即使他覺得市街令人目想神遊，也說因自覺遲緩，而不敢獨自漫遊。³⁰⁷可見不擅日語的張麗俊，赴日旅遊時必須亦步亦趨地緊隨旅行團，否則恐有走失之虞，因此行程無法自主。

另一件是 4 月 18 日在麒麟麥酒（啤酒）會社接受招待時，旅行團副隊長榊原辻太郎致謝詞時，竟說旅行團的臺人團員自門司登陸後，行為舉止極為無禮，導致日本人不悅云云。旅行團中的臺籍青年聽後均感不平，欲毆打榊原，但有人勸住，言聽候隊長佐藤如何處置再作定奪。不料佐藤得知此事後，決定原諒榊原。團中諸青年遂大起憤慨，堅持榊原必須道歉，否則不肯甘休。最後榊原自知理屈，道歉了事，才化解一場風波。³⁰⁸由此例可看出，當時日臺人之間地位仍未平等，部分日人仍視臺人為次等公民，故出言不遜。

與張麗俊同團的吳萱草，對日本的印象亦頗佳，盛讚其景色的秀麗，對日光東照宮、中禪寺湖、華嚴寺印象最深，讚譽東照宮「結構堂皇藝術精，三峰

³⁰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30-43。

³⁰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35-36。

³⁰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頁 36。

³⁰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42。

拱峙勢崢嶸。雕樑畫棟千般巧，曲室迴廊萬象明。」³⁰⁹回臺後並將沿途的吟詠，刊載於《臺南新報》上，以資紀念。³¹⁰

三、小結

由前所述，傳統文人與日人在日常生活上難免有所接觸，具備漢學素養的日人官紳更常藉詩文與傳統文人相往還，甚至參加詩會活動，即使是較具民族意識的王松、林幼春、施梅樵等人也有日人友人。因此，臺日雙方共同的文化資產—漢詩，確實是溝通兩方往來的良好橋樑。

另一方面，擔任保正、庄長等基層行政職務的文人由於職責所在，常需對日人官員送往迎來，臺日兩方之間有一定的交情。林紀堂和林癡仙甚至向日人警察學習日語。尤其是林獻堂，交往的對象從總督、眾議員到在臺工作的日人，有一定情誼者為數不少。由此可見，傳統文人對日人並未全然排斥，彼此仍可成為朋友。

在傳統文人的日本旅遊經驗方面，林維朝、鄭神寶、王石鵬、黃紹謨、王達德、張麗俊等人赴日參觀旅遊後，對於日本的自然風光之美、都市的繁華熱鬧、工業機械和農業的進步、國民的良好素質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維朝認為日本在農工商及女權方面值得臺灣借鏡之處甚多。

在他們的行程中，參觀博覽會往往是旅遊的重點，此與臺灣總督府的宣導不無關係，蓋總督府和日本民間都希望藉此機會讓臺灣人民能見識殖民母國的各种建設，以增心悅誠服、慕心向上的效果。³¹¹結果林維朝、鄭神寶和王石鵬果然因此深化了對日本的向心力。

³⁰⁹ 吳萱草，〈東遊百詠東照宮〉，《臺南新報》，第 12266 期，1936 年 2 月 26 日，頁 8。

³¹⁰ 吳萱草所著之〈東遊百詠〉，連載於《臺南新報》，第 12104 期，1935 年 9 月 15 日，至第 12267 期，1936 年 2 月 27 日。

³¹¹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136-137。

不過參加旅行團的張麗俊卻碰到副團長榊原對臺灣人出言不遜的事件，後榊原雖道歉了事，卻顯示傳統文人欽慕嚮往日本的上國文明同時，部分日本人仍視臺灣人爲次等公民。

第三節 對日本統治的看法

一、接任公職之初的掙扎

由於具備讀寫能力的傳統文人多是地方上的領導階層，因此從日治初期起，總督府便持續以紳章頒授、基層行政參與、官紳唱和、表彰節孝等一連串手段進行懷柔籠絡，許多傳統文人乃出任基層的地方公職，例如傅錫祺擔任潭子庄長前後共 16 年（1920-1935）；³¹²陳懷澄主持鹿港街政達 12 年（1920-1932）；³¹³張麗俊擔任豐原下南坑第一保保正近 20 年（1899-1918），又連任 3 次豐原街協議會員（1926-1931）。³¹⁴

然而，吟詩弄月的文人與催租收稅、協助地方事務的公職人員，在角色上有極大差異，一方是極度地風雅而不食人間煙火，另一方是徹底地入世，必須執行上級交付的命令。況且在清代，士紳的社會角色包括任官、地主、經商、儒醫，以及替人寫碑文、家譜、讚頌詞或出售書法字畫等，上可通統治階層的政治權力，下可攬極高的社會地位，頗受人尊崇；³¹⁵而錢糧事務卻是在衙門辦事的胥吏之例行公事。在傳統讀書人的觀念中，胥吏地位向來不高。是以，傳統文人初接受派令之時，心態上難免無法調整，但因「長官簡命洵難卻」，³¹⁶不得不接受派令，傅錫祺便說自己是「無才勉就催科吏」，³¹⁷陳懷澄更公然署「催科吏」三字於軒燈，³¹⁸文人間彼此更互相譏嘲。

³¹²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376、380。

³¹³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 55-56。

³¹⁴ 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的史料價值〉，頁 3-7。

³¹⁵ 張維安，〈近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士紳與商人階層文獻之檢討〉，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 187-189。

³¹⁶ 徐心銘，〈耀亭知友新任臺中區長〉，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 105。

³¹⁷ 傅錫祺，〈六十初度感賦四首〉，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183。

³¹⁸ 傅錫祺，〈陳懷澄社友挽辭二首〉，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227。

1920 年出任苑裡庄長的陳瑚，於該年作〈戲贈鶴亭〉一詩予新任潭子庄長傅錫祺，曰：

詩人又作催租吏，風月江山領一區。潭水洛津相隔遠，如何依樣畫葫蘆。
案牘紛披放鶴亭，榮歸羞對草堂靈。灞橋詩思應消盡，武邑絃歌或可聽。

319

清楚點出風花雪月的詩人與掌理一區的催租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但如今卻要兩者兼容，作詩的雅興恐會消耗殆盡。傅錫祺回應道：

惱人敗興自催租，起繼中郎長一區。私淑我為新弟子，笑君先已畫葫蘆。
無能畫壁賭旗亭，尚有歪詩寫性靈。得句未應輸昔日，來時請念與君聽。

320

自謙還能寫歪詩，而且所作未必遜於昔日，自認還能保有詩人身份。

陳貫亦勉勵傅錫祺，吟道：「擊鉢催詩喜擊箋，催科應不斷吟緣。一身社長兼區長，風月江山荷兩肩。」³²¹期許他同時做好櫟社社長和潭子庄長，將風月與江山扛在兩肩。傅錫祺則回覆：「文章官樣寫花箋，敢斷仙緣結俗緣。歲歲春秋佳日會，與君仍聳兩吟肩。」³²²自嘲寫公文乃是文字遊戲，只是斷了仙緣結俗緣，但當春秋佳日仍要參與詩社集會。對於陳瑚、陳貫和傅錫祺三人間的互相調侃，鹿港街長陳懷澄戲謔道：「運租袁虎也催租，卻怪詩人長市區。

³¹⁹ 陳瑚，〈戲作鶴亭〉，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102。

³²⁰ 傅錫祺，〈次韻戲答枕山〉，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101-102。

³²¹ 陳貫，〈戲贈鶴亭〉，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102。

³²² 傅錫祺，〈次韻戲答豁喧〉，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102。

潭水不清房水濁，毋庸開口互胡蘆。」³²³認為傅錫祺和陳瑚實是半斤八兩，毋須取笑對方。由傳統文人間的互相嘲弄可看出，公餘之時他們仍不失詩人應有的幽默，寫詩應可消除現實環境的壓力。

林幼春對傳統文人出任地方長官一事，抱著遠較前述諸人嚴肅的態度。他告誡陳瑚和傅錫祺，「一網豫防全打盡，試看茄子結葫蘆」，要其注意避免受到日方籠絡後，立場動搖，導致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又云：「同舟仙侶皆高唱，獨有林逋掩瑟聽」，³²⁴明言前述數人出任公職，即使多數人皆祝賀，但他仍不以為然。

不過，一般輿論仍對傳統文人擔任公職有所期許。林耀亭出任臺中區長後，蔡梓舟恭賀道：「管領中臺第一區，江山風月足歡娛。」³²⁵王竹修³²⁶亦云：「首屈中臺領一區，澤民經濟出純儒。」³²⁷林琢如³²⁸則告訴他：

獨善何須學許巢，且將松菊暫時拋。出身原為蒼生計，在職休教素志淆。
名重縉紳光列祖，世居桑梓愛同胞。告成及早歸田里，造就兒孫起鳳蛟。

329

³²³ 陳懷澄，〈枕山豁軒二昆仲以詩贈傅社長先承寄示率和三什雖曰自嘲亦聊以解嘲也〉，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102。

³²⁴ 林幼春，〈次枕山贈鶴亭韻〉，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 34。

³²⁵ 蔡說劍，〈贈耀亭先生〉，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 110。

³²⁶ 王竹修：字虛菴，號養拙，臺中市人。評閱詩章，人極折服。各處課題徵詩無不如期以應，而應之者多獲售，或選一二級，故全臺無不知臺灣有王竹修先生者。為東墩吟社社長，後因老疾力辭，改任顧問。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211。

³²⁷ 王竹修，〈贈耀亭先生守拙別居〉，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 112。

³²⁸ 林琢如：為林耀亭之姪子。林耀亭過世後，林琢如撰〈耀亭叔父行述〉，收於《松月書室吟草》書末所附〈哀輓錄〉，頁 7-8。

³²⁹ 林琢如，〈耀亭知友新任臺中區長〉，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 105。

意指擔任區長乃光宗耀祖之事，又可服務蒼生；若嚮往獨善其身的生活，將來亦可盡早歸田。林耀亭的回應為：「布衣隨分心常足，軒冕邀榮志易消。名實未孚期共諒，官民能諒慰同胞。」³³⁰林氏認為大家若能體諒他的處境，以致政通人和，亦可慰於同胞。

二、擔任公職之表現

基層公職的工作極為繁瑣，以保正張麗俊而言，其職責包括參加支廳長主持的保甲會議、執行約束清潔、施種春痘事項、迎送官府人員、報導相關慣習、指揮修路或巡邏等公工、協助政府調查工作等。³³¹

由於事務紛繁，張麗俊分身乏術時，工作要委由其長子代勞，其家也成為保民的集合地，種痘即在他家舉行，可謂吃力不討好。此外，保正還需攤派上級的募捐、參加政府發起的團體。1906年4月，張麗俊被迫繳交義勇艦金10圓。他嘆道：「嗟乎出此金者，不出不能已，欲出又難支，真所謂割肉醫瘡，無可如何者也。」³³²翌年1月，役場又派人來募愛國婦人會³³³會員，他知勢不能辭，乃讓其妻何氏燕入會。³³⁴再者，保正為無給職，上級又一再強調「凡為

³³⁰ 林耀亭，〈敬次香莎立軒心銘炳侯琢如諸先生原韻奉答雅意〉，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104。

³³¹ 關於張麗俊在保正任內執行的公務，可參閱洪秋芬，〈日治初期葫蘆墩區保甲實施的情形及保正角色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4（2000年12月），頁211-268。

³³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40。

³³³ 愛國婦人會：創始於1901年3月2日，為了軍事援助，以皇室中的上流婦女組成之團體。創會宗旨由下田歌子起草，第一任總裁是閑院宮載仁親王妃智惠子，第一任會長是岩倉具定公爵夫人久子。以後歷任總裁都推戴皇族，且全皇族都是名譽會員。日俄戰爭發生，會員大量增加，到1906年末有56萬人，到1919年突破100萬人。1933年在全國設立該會分會愛國處女團、愛國少女團、愛國子女團。1942年2月與大日本國防婦女會合成大日本婦女會。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日本近現代史辭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90六刷），頁4-5。

³³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59-160。

保正者乃是名譽之人，不可藉端妄取保內之財。」³³⁵又言「保甲費保正不得加收，亦不得多開，而筆墨貸金，一年政府定開壹員而已，而且買時要給領收證，逐月造報焉。」³³⁶如此不免捉襟見肘，張麗俊為此氣憤難平，他認為似此當保正如盜賊一般，不若歸支廳辦理焉。³³⁷此外，有些保正另有政府給予的一些經營權或利權，如煙草仲賣、阿片專賣、豬屠費等，但張麗俊從未獲得此種利權，不免頗有微詞。³³⁸

1906年張麗俊曾回顧自己的保正生涯，回憶自1899年任保正以來，已歷七年，「三年前雖有保正之名，尚少保正之事；三年後法網愈密，規約愈加，事無大小，屬保正之責者，難以枚舉。」乃有「予也何能，而堪當此」之嘆。³³⁹

除保正外，張麗俊於1926年10月起任豐原街協議會員。當時《臺灣民報》曾指出，街庄役場所選之協議員，俱是無學問、無知識之流，其中僅有一、二名有學問、有知識，開會時敢對議案提出質詢，但經二年任滿便更迭，而能續任者全係御用、無能之徒。³⁴⁰對於此項質疑，張麗俊亦深有所感，認為《臺灣民報》切中選舉之弊，頗入人肺腑。故當舉行任命授與式時，即自嘲為無學問、無見識者，而不出席。³⁴¹由此可知，張麗俊任為街庄評議員只是官方

³³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67-68。

³³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98。

³³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98。

³³⁸ 由於張麗俊未如其他保正般享有專賣利權，1913年葫蘆墩區長乃將其煙草專賣所獲得的利益金40圓交與張麗俊，做為貼補。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353。

³³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4。

³⁴⁰ 《臺灣民報》的社論指出，臺灣街庄制雖說是自治，其實乃有名無實，在該制度下所設置的協議會，也是不成體統。但若能選舉有學識並通曉日語者為協議員，也可以得到相當效果。可惜現今的評議員多半是不合用的舊人物，重名望而輕識見，加之全為官選，能連任者不是御用的，便是被去勢的。〈街庄協議會員的人選〉，《臺灣民報》，第123號，大正15年9月19日，頁2。

³⁴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94-95。

的橡皮圖章，不過既受派任也只能勉力從事。

正式參與議程後，張麗俊指出，對於議案的討論，協議員的諮問只是形式，案件早已內定，只是通知議員而已。其中，若有不合理的議案，即使議員發言抨擊，官員也只推三托四，並不肯修正。況且議員中沒有幾人能了解其內容，也沒有幾人敢發言。因此，臺人議員對於議案都是起立贊成通過。³⁴²可說一語道破街庄協議會徒具虛名。

潭子庄長傅錫祺平日忙於公務，以致疲於奔命。依其日記所載，他要負責戶稅賦課、視察灌溉區域分配、水圳修繕、廟宇改建、巡查病所家屋門窗、負責道路修繕、舉行街庄事務研究會等會議，以及監督農業基本調查，還要與日籍官員送往迎來，幾乎終日不得閒。³⁴³

1901 年出任霧峰區長的林獻堂，當時年僅 20 歲，日後回憶這段經歷，表示：「其時纔弱冠，勉盡桑梓責。冠履常倒置，詩書雜簿籍。新犢耕荒園，駑馬聘沙磧。終非能適任，六年解轅軛。」³⁴⁴顯示其初任此職之辛苦。

然而，擔任基層行政首長，亦是實現己身理想、服務鄉里的大好機會。1913 年 7 月，嘉義山仔頂區下路頭庄提防被溪流沖潰，住民家屋流失，人畜受害匪淺，幸賴山仔頂區長徐杰夫不分晝夜，捐錢及多方奔走救濟難民，百姓方得以安居。其後，徐杰夫升任為嘉義廳參事兼嘉義區長，在職長達 12 年。³⁴⁵陳懷澄在鹿港街長任內建樹頗多，不但維護漢學、校勘文字、解決乞丐問題、改良婚喪風習等不遺餘力，更集資 20 餘萬圓籌建公會堂及創辦學校、開築產業道路、計畫「市區改正」，對於地方的建設頗有貢獻。³⁴⁶1924 年起出任西螺街長的廖重光，於 1934 年西螺市區改正時，率先拆毀自宅，並參考其他都市，修築

³⁴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48-150。

³⁴³ 參見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4 年，未刊稿。

³⁴⁴ 林獻堂，〈述懷〉，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 15。

³⁴⁵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92。

³⁴⁶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 55-56。

三線道路，使人車各行其道；建造排水溝，使西螺延平老街幾乎與大溪、三峽、鹿港齊名。³⁴⁷

1900年林維朝擔任新港街長，適逢1901、1902兩年旱魃為災，又爆發瘟疫和大地震，地方住民死傷慘重。他乃不分晝夜，協同日警投入救災行列，而領悟到唯有積極入世，才能一展抱負，為民眾謀更多的福利，遂戮力從公，為新港的建設打下良好的基礎。³⁴⁸故徐杰夫曰：「時百廢待舉，凡交通、教育、產業、行政諸大端，其賴先生之贊襄者不少。」³⁴⁹例如1906年林維朝首先捐款，並向總督府申請許可募捐，以重修毀於該年地震的新港奉天宮，1917年該廟遂重修完成，雕龍畫棟，錯采鏤金，廟貌更勝以往，奠定新港日後發展為宗教重鎮之基礎。³⁵⁰

林維朝似乎頗能勝任街長及傳統文人雙重角色。上任後他仍可「頻向荒園闢草萊，廣求花卉手親栽」，並能「偷閒高臥北窗下，展玩新詩學子才。」³⁵¹1912年他一度為了調養糖尿病而暫時辭職。自稱此舉是為「留取殘軀報聖朝」，³⁵²反映出他替日本盡忠的態度。

由前述事例得知，傳統文人唯有出任地方基層首長，才能落實心中治理藍圖；而在日人統治之下，臺民亦需有人為其喉舌、替其興利除弊。故對出任地

³⁴⁷ 程大學總主編、呂建孟等撰稿，《西螺鎮志》（雲林縣西螺鎮：雲林縣西螺鎮公所，2000年），頁3-88。

³⁴⁸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一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0-31。

³⁴⁹ 徐杰夫，〈壽序〉，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408。

³⁵⁰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一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2。

³⁵¹ 林維朝，〈役場即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170。其詩曰：「頻向荒園闢草萊，廣求花卉手親栽。月移清影緣堦上，風送暗香入戶來。三徑每因延客掃，一樽聊為納涼開。偷閒高臥北窗下，展玩新詩學子才。」

³⁵² 林維朝，〈壬子仲春退職書懷〉，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228。其詩曰：「秋雨相如病未消，年來神思日蕭條。暫辭職務醫銷渴，留取殘軀報聖朝。」

方公職者，實不宜以民族大義為由，予以苛責。

然而，擔任基層首長或議員畢竟是辛苦的差事，曾任佳里庄長和臺南州協議員的吳乃占，辭任時便有如釋重負之感。吟曰：

十有餘年轉眼空，喜無大過敢論功。只今案牘勞初捨，日似神仙興不窮。
歸去來兮對北楹，功名利祿總無爭。閒來多飲深藏酒，舞綵狂歌得意鳴。

353

以從此可過神仙般生活，飲酒並舞綵狂歌為喜。廖重光在西螺街長滿期離任後，寫道：

碌碌奉公卅六載，愧無才學贊皇猷。諸君助我情非小，世德周家仰作求。
且喜今春任滿期，微軀孱弱勢難持。讓賢時到不容緩，鈞譽沽名那敢為。

354

因已奉公卅六年，故自謙身體孱弱，讓賢刻不容緩，實以離任為喜。³⁵⁵至於傅錫祺潭子庄長退職時，庄眾贈他書有「澤徧里黨」四大字的木匾額，亦有民眾送他寫有「不愧鄉評」四字的木框紙匾，³⁵⁶可見其政績深獲好評。

三、對日本統治的看法

³⁵³ 吳乃占，〈辭任州議員及庄長留別諸友〉，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327。

³⁵⁴ 廖重光，〈昭和丙子年夏五月西螺街長滿期辭職感賦〉，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355。

³⁵⁵ 林維朝，〈壬子仲春退職書懷〉，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228。原詩如下：
「秋雨相如病未消，年來神思日蕭條。暫辭職務醫銷渴，留取殘軀報聖朝。」

³⁵⁶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380。

對於日本的統治，堅決反日的洪棄生有嚴厲的指控，其〈次韻梁任公贈臺灣遺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提及「警吏穿長房肆威，催科闖戶且攘臂。籍沒田園不可堪，擾傷市獄更已矣。保甲橫施何足言，毆撻亂加尤莫比。法律神明中外同，獨至臺灣法妄抵。此間言論不自由，口尚須緘況敢指。阜財無處挹南薰，噍殺時來驚北鄙。曩年屠戚焚山林，至今遍地生荆杞。」³⁵⁷其餘傳統文人的看法如何亦值得細究。

張麗俊雖已認命於日本的統治，但對其仍有法令過嚴及稅重的抱怨。1907年2月，葫蘆墩支廳內的皮箱深夜失竊，其中現金被取之一空，箱子被棄於路上。張麗俊的反應是「吁！當此世界法似霜威，還有人敢如此罔法耶！」³⁵⁸林野調查後，無主林地收歸國有，他認為是政府酷待人民，若無轉圜餘地，人民至此慘不可言矣。³⁵⁹

法律過嚴之外，警察的執法亦有可議之處。例如1928年9月有豐原警察吃冰不付冰錢，還毆打賣冰者，並拖入警察課再打。張麗俊嘆曰：地方官吏如此非為，使人寒心。³⁶⁰1934年10月11日又發生「三壯丁不敬事件」。當日陸軍大將梨本宮殿下³⁶¹由臺中北上，坐貴賓特別臨時列車經過豐原站時，有壯丁三人立於派出所門前遙看。此事被護送大將的臺中州警務局長慶谷隆夫得知，便打電話通知豐原郡役所，指責壯丁之不敬。豐原警察課長武山寧法得知後大驚，乃交代下屬即刻查明三壯丁為何人。³⁶²又，1935年中部大地震後，日本天

³⁵⁷ 洪攀桂，〈次韻梁任公贈臺灣遺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收於王建竹編，《臺中詩乘》，頁115-116。

³⁵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72。

³⁵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416。

³⁶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428。

³⁶¹ 梨本宮殿下：即守正王，為朝彥親王第四子，陸軍元帥大將。澤本健三編，《市町村別日本國勢總覽8》，頁4。

³⁶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頁490-491。

皇以 100,000 圓賑恤臺中、新竹二州之災，罹難者每人可得 10 圓、傷者 6 圓、家屋小損者 1 圓，豐原人張建用因嫌領下賜金過少，出言不敬，遭當局拘留，提出悔過書後，當局還不肯甘休。³⁶³充分顯示警察的嚴苛。

在稅額方面，家屋稅由 1906 年納 1 圓，漸升至一季納 5 圓，至 1907 年一季增為納 11 圓以上。張氏認為，似此剝削，稍有資產者殆難供苛政之催求矣。³⁶⁴而 1915 年家稅一期應納 35 圓 20 錢 8 厘，比 1914 年增加 10 餘圓。他乃抱怨：「嗟乎！財政愈難，稅率愈加，真有無肉可醫瘡者矣。」³⁶⁵

林獻堂 60 歲時寫的〈述懷〉一詩，詩中提及：「施政每偏重，不脫愚民策。交通與水利，誰說非利澤。教育則何如，故步如疇席。民權重自由，言論加壓逼。」³⁶⁶雖肯定總督府推行的交通和水利建設，但認為臺人未獲得平等的受教權，且欠缺言論自由。施梅樵亦認為在日本統治下缺乏言論自由，1922 年他 53 歲生日時，即有「近來時事惟緘口，當作浮雲轉瞬過」之嘆。³⁶⁷

對於日本鎮壓原住民，林獻堂也頗有微詞，〈討蕃〉詩中寫道：「螻蟻生機迫，鯨鯢血壘新。蛛絲三面網，保種望深仁。」³⁶⁸期望日本當局能網開一面，不要趕盡殺絕。對於總督府訓練原住民表演傳統歌舞，展現理蕃成效，卻讓田野荒廢的措施，他也頗為不滿，故曰：「獨教蕃童工舞唱，強留沃野長蒿萊。」³⁶⁹

³⁶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52-53。

³⁶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240。

³⁶⁵ 張麗俊 1915 年的資產額為 11,400 圓，攤家稅一期為 16 圓 30 錢，加上特別稅 1 圓 95 錢 6 厘、公學校負擔金 16 圓 95 錢 2 厘，合計為 35 圓 20 錢 8 厘。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203。

³⁶⁶ 林獻堂，〈述懷〉，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 15。

³⁶⁷ 施梅樵，〈壬戌生日誌感〉，收於施梅樵，《捲濤閣詩草》，頁 64。

³⁶⁸ 林獻堂，〈討蕃〉，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 34。

³⁶⁹ 林獻堂，〈遊花蓮步柏壽宗兄原韻〉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

四、傳統文人的認同

關於認同一詞，美籍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解釋為，指的是某個人與某種獨特的價值之間的聯繫，這種價值是由某種獨特的歷史孕育出來的，是屬於他自己那個民族的，認同的是那個族群一以貫之的內在精神。因此，認同就是在個人核心裡面的一個「安頓」過程，也是在其民族文化核心裡面一個「安頓」的過程。³⁷⁰

然而，要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認同，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日本統治臺灣後，先是規定兩年內臺人可以自由選擇國籍，兩年後確認了留在臺灣的臺人為日本籍。不少傳統文人雖在割臺之初選擇內渡，但又因生活的考量，而回到臺灣，接受異文化的日本統治。以現代國家、國民的基本概念而言，傳統文人效忠日本毋寧是義務；然而深受漢文化浸淫的他們不免對隔岸以漢民族為主的中國有一份依戀，而擺盪在中日兩國間。

大抵而言，選擇繼續定居臺灣的傳統文人，在現實上已接受日本的統治，許多人也應聘進入公職體系，成為統治體系的一環，但是如前所言，他們的行為仍有諸多矛盾之處。以傅錫祺而言，擔任潭子庄長達 17 年，替日本戮力從公，期間曾多次獲得官方的褒獎。在 60 歲所撰的〈生平紀要〉中，記載 1923 年日本皇太子行啓臺灣時，其以學者資格獲賜御果子；1935 年日本領臺 40 年，每州選一優良街庄，贈一古銅大花瓶作為表揚，臺中州惟潭子庄獲贈；1936 年臺灣地方自治協會會長森岡二郎（總督府總務長官），特表揚自治功勞者每州一人，臺中州下傅氏獲得表揚，獲頒銀盃一組。³⁷¹傅氏記述這些功績，似乎頗引以為榮。但在其〈六十初度感賦四首〉之第二首，則提及「他日豫謀提墓字，

集卷二遺著軼詩》，頁 35。

³⁷⁰ Erik H.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W.Norton, 1968, P.22.

³⁷¹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377、380。

可能姓氏冠遺民」，並自註「擬題曰『遺民鶴亭傅錫祺先生之墓』等十一字」。³⁷²不過，真正的遺民是不會以接受殖民政府的表揚為榮的，顯示其矛盾。

傅錫祺之例也表示傳統文人雖承認自己是日本籍，但並未自覺是日本人，仍堅持自己是漢民族。民族界線之所以分明，實與總督府對臺民的差別待遇有關。駒込武指出，在文化上日本的國民統合包含臺灣人，但在政治上的國家統合則排除臺灣人。日本人認為臺灣人的血統不是日本人，且欠缺日本文化素養，因此不能享有與日本國民相同的待遇，但是又認定接受日語教育的臺人在文化意義上是日本人，所以這些人應該對日本國家盡忠。此種看法和做法充滿矛盾，一方面將臺灣人包攝於內，另一方面又將臺灣人排除在外。³⁷³

因此，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正處於後殖民論述者巴巴（Homi K. Bhabha）所謂的「含混的矛盾」中，對於殖民者並非全然的依從或對立，而是有著一種含混而充滿張力的互動關係，使得被殖民者的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呈現含混矛盾的樣態，而無法以傳統「屈從／對抗」的觀念予以截然二分。如同韓國學者尹海東依韓國被日本殖民的經驗，發現殖民地人民對於殖民者，在抵抗與協力的交叉點存在著「灰色地帶」（grey zone）。亦即從殖民地的公共領域來看，日治時期的韓國民眾為了追求生活等方面的現代性，會顯露出親日的一面，但為了維護民族或國家利益，又會在精神上抗日。³⁷⁴

基本上，傳統文人既接受被日本統治的事實，為了繼續生存，只好在殖民體制下尋求適應。不過，每個人的適應方式不盡相同，有些與總督府較親近，有些則保持距離；即使是同一人，其行為也有互相衝突之處，處於一種「灰色地帶」。然而謀生及尋出路仍是生活的最高指標，而凌駕於認同之上。如同易勞逸（Lloyd E. Eastman）研究抗戰時期淪陷區和國、共、日三不管地帶後指

³⁷² 傅錫祺，〈六十初度感賦四首〉，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183。

³⁷³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7，第2刷），頁70-74。

³⁷⁴ 尹海東著、藤井たけし譯，〈殖民地認識の「グレーゾーン」日帝下の「公共性」と規律權力〉，《現代思想》30：6（2002年5月），頁132-147。

出，廣大中國的鄉村農民缺乏認同和國家觀念，未必對抗戰感到休戚與共，只以求生存為最高原則。³⁷⁵又如同戰後臺灣回歸中華民國統治，臺籍菁英不管滿意這個結果與否，都必須接受這個政治現實，而與國民黨政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互動，但其內心對執政者的真正想法仍是晦暗難明，也往往因人而易。

五、小結

傳統文人由於是地方上的領導階層，日本政府乃以頒授紳章、讓其參與地方行政等手段懷柔籠絡之，使其地位高於一般百姓。然而，文人與催租吏這兩種角色畢竟大相逕庭，接任之初，傅錫祺、陳瑚、陳貫等人心理均有一番掙扎。上任後，因保正、庄長等基層公職工作極為繁瑣，地方上的收稅、調查和各種造橋鋪路的建設都要事必躬親；若擔任協議會員，又僅是橡皮圖章，無法真正發揮反應民意的作用。加之日本的統治又有法令過嚴、稅收過重之感，傳統文人不免有所微詞。然而，在異族統治下仍須有台籍菁英出任基層公職，替地方民眾謀福利，並從事基層建設工作。因此，對於出任公職的傳統文人，不宜以民族大義為由予以苛責。

總結而言，傳統文人普遍接受被日本統治的政治現實，接受自己是日本籍，但仍認為自己是漢民族，而非日本人。其與殖民者的互動，呈現個別差異而難以一概而論，即使是同一人，行為也常呈矛盾現象，難以用絕對的親日或反日反日簡單概括。

³⁷⁵ Lloyd E. Eastman, "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 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1945"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75-303.

第三章 傳統文人之中國情懷與印象

第一節 對清代臺灣之緬懷

一、對劉銘傳的追思

傳統文人雖普遍接受被日本統治的政治現實，進而擔任基層公職的職務，日常生活中也未排斥與日籍文士相唱和。然而，由於漢人血統的親近性，從小深受漢學經典薰陶，對血緣文化上的祖國中國仍懷著孺慕與憧憬，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微妙的關連。本章的重點在於討論此種對中國難以割捨的情懷和其實際赴中國所得的印象。

首先，傳統文人對於清代統治臺灣的政績，經常表示肯定。特別是對在臺灣從事現代化建設的劉銘傳（1838-1897）更是表露懷念。

劉銘傳早年投身淮軍，剿捻成名。1884 年清法戰爭時奉命督辦臺灣軍務，擊退進犯滬尾的法軍。翌年臺灣設省，出任福建臺灣巡撫，任內大興洋務，建樹頗多，包括調整府廳州縣、剿撫生番、丈田清賦、築砲臺、興建鐵路和電線等，1891 年離臺。¹

日治時期臺灣的漢詩頗多描寫劉銘傳的作品。1911 年梁啓超應林獻堂之邀訪臺，4 月 2 日抵臺中，出席在林瑞騰瑞軒舉行的櫟社晚宴。席間應邀出詩題，即以〈追懷劉壯肅公〉為題，不拘體、不限韻，命眾人吟詠。²翌年櫟社為慶祝成立 10 週年舉行大型詩會，會前曾向全臺詩友公開徵詩，〈追懷劉壯肅〉亦是其中一個詩題，³共得詩 90 首，收於《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中。⁴1922 年《臺

¹ 王傳壽，《劉銘傳：臺灣現代化的推動者》（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0）；葉振輝，《劉銘傳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² 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頁 4；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35-37。

³ 〈編輯謄錄（五月廿五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4206 號，明治 45 年 5 月 26 日，頁 6。其啓示曰：「櫟社代表賴君紹堯來翰，以該社訂六月十六日，開十週年祝賀大會，會場定阿罩霧

灣》雜誌也以〈劉銘傳〉作為該刊物第一期公開徵詩的題目，後共刊出七律 23 首。⁵茲分析前述徵詩作品中傳統文人眼裡的劉銘傳。

傳統文人大抵均高度推崇劉銘傳在臺灣的事功，例如胡南溟頗為讚許清法戰爭時劉銘傳克敵的表現，並對後來清法議和感到遺憾：

黑海濤雄一劍寒，北風吹斷（原註：指澎湖失守）鼓帆乾。七星屯衛中丞府，八卦旗高上將壇。一戰功成收滬尾，三軍血涌飲樓欄。中朝竟出和戎策，萬里孤臣老據鞍。⁶

趙雲石⁷也推崇劉銘傳的武功，譽其為「一代中興舊名將，重洋闖寄老英雄」。⁸

陳基六則大力贊揚劉銘傳推行新政和防務上的貢獻，誇其「清丈田園建火車，餉源裕後練兵加。蒞臺防務誠周到，不愧當年政治家。」⁹林國賓¹⁰亦云：

庄萊園。豫出宿題，追懷劉壯肅（銘傳），不拘體韻。笨港進香詞，七絕。翌十七日開擊鉢吟會，屆期擬邀瀛社社友列席。」

⁴ 廖振富，〈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收於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178。

⁵ 徵詩啓事見於《臺灣》第 3 年第 1 號，入選作品發表於第 3 年第 3 號。

⁶ 南溟，〈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0 影印），無頁數。

⁷ 趙雲石（1863-1936）：名鍾麒，字麟士（一作麟生），號雲石，別署畸雲，晚號老雲，以號行。1887 年應歲試，補廩生嗣食餼，1888 年起前後三次內渡，參加福建鄉試，皆未及第。1889 年參與浪吟詩社，1906 年南社成立，被推為副社長。1907 年任「以成社」社長，主孔廟聖樂。1909 年接任南社第二任社長。1930 年與其子趙雅福、連橫等人籌辦《三六九小報》，致力於漢文化傳承。其詩風格富貴豔麗，以詠物見長，書體亦甚著名。吳毓琪，《南社研究》，頁 171-172。

⁸ 趙雲石，〈劉銘傳〉，收於《臺灣》3:3（1922 年 6 月），頁 44。

⁹ 陳基六，〈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¹⁰ 林國賓：桃園人，字子純。

「鐵道圖交通，生蕃勤撫育。清賦與辦〔辦〕防，刷新人耳目。」¹¹蔡子昭亦曰：「六年政績開蕃甸，一夜軍聲走佛蘭。」¹²黃守謙¹³則云：「歐風文物採精良，籌畫爭雄在自強。」¹⁴陳織雲亦吟：「撫蕃未就先清賦，航路乍開又鐵車。」¹⁵稱許劉銘傳在臺灣的現代化建設。

傅仲輝¹⁶更細數劉銘傳在臺的施政，認為其政績可以垂萬年：

良臣兼良將，劉公非偶然。蜺旌到臺島，無負國承宣。銳意開疆城，加增府與縣。修文造國器，偃武防備焉。清丈改租制，田園開陌阡。撫蕃亦邦本，恩威亦濟全。御重而致遠，汽車力萬千。千里通消息，電信作郵傳。煥然新政治，法役淨烽煙。臺海金湯固，惟是公之賢。嗟哉公已歿，政績垂萬年。時事感滄桑，回首憶當前。¹⁷

陳瑚也肯定劉銘傳的貢獻，其追懷〈劉壯肅公〉一詩，描寫劉氏清法戰爭擊退法軍，以及在臺灣推行的新政，認為劉氏足以光耀青史：

¹¹ 林國賓，〈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¹² 蔡子昭，〈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¹³ 黃守謙：桃園人，字式垣，桃社成員，後加入瀛社。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書前作者姓名錄。

¹⁴ 黃守謙，〈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¹⁵ 陳織雲，〈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¹⁶ 傅仲輝：北斗人，螺溪吟社社員，亦是漢醫，為當代著名詩人林亨泰之外祖父。廖振富，〈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收於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183。

¹⁷ 傅仲輝，〈追懷劉壯肅五古〉，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憶昔甲申歲，法夷寇南瀛。公自平髮逆，久嘆脾肉生。英雄乘時勢，繫越更請纓。四郊刁斗急，虎帳夜不驚。勝敗乃常事，深謀功竟成。遂令彼金人，畏懼岳家兵。莫云修武備，海島便昇平。百年開草昧，政教未風行。凶蕃賴以撫，田賦賴以清。汽車行陸舟，電火不夜城。……斯人已不見，治蹟猶分明。創始畀後人，文獻有餘榮。……¹⁸

施家本也有類似敘事式的作品：

光緒甲申役，西羌寇我壘。皇師出遠征，詔起將軍視。國家多事日，閒居士所恥。笑揖故山雲，旌旗海南指。雞籠一奮戰，胡虜心遽死。遐荒遍妖氛，頓洗天河水。草木感恩沾，諸番馴鹿豕。冶鐵通道衢，臺隍鞏防備。混沌二百年，光彩自茲始。惜遭食肉妬，壯圖竟中止。¹⁹

陳懷澄的看法亦同，認為劉銘傳「治臺政績推先覺，藉藉名聞竹馬童。」²⁰林芹香²¹亦說其「中興勝代誇儒將，郢治臺疆頌政聲。」²²張麗俊亦讚曰：「如公偉烈與豐功，治績宏開遍海東。」²³

由於劉銘傳政績卓著，不少傳統文人認為他可以與鄭成功、藍鼎元等臺灣歷史上的知名人物相提並論。林湘沅詩云：「論定新朝分外榮，有人為比鄭延

¹⁸ 陳滄玉，〈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後收於陳瑚，《枕山詩抄》，頁9-11。

¹⁹ 施嘯峰，〈追懷劉壯肅公〉，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後收於林幼春編，《櫟社第一集》，頁165-166。

²⁰ 心水，〈劉銘傳〉，收於《臺灣》3:3（1922年6月），頁44。

²¹ 林芹香：臺南佳里人，名泮。為知名作家林芳年之父。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頁8。

²² 林芹香，〈追懷劉壯肅公〉，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159。

²³ 張升三，〈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平。英靈地下應無恨，人物流傳兩大名。」²⁴趙雲石的看法亦同：「延平而後推人物，功業文章兩瑋瑰。」²⁵均認為鄭成功與劉銘傳是臺灣史上的兩大人物。鄭作型²⁶則曰：「大名已自重鯤島，善政端因效鹿洲。」²⁷陳基六亦言：「千古臺陽兩偉人，鹿洲以外屬君身。」²⁸林佛國也云：「團練撫墾更清賦，鹿洲之學公寔行。」²⁹鄭、陳、林三人均指出劉銘傳的施政係承接藍鼎元的藍圖而來。由上顯示傳統文人對劉銘傳的高度評價。

傳統文人懷念劉銘傳治臺政績的同時，不免對於臺灣隸屬於日本的政治現況有所感慨，特別是臺灣遭清廷割讓不久，劉銘傳即去世。例如北郭園後人³⁰云：「六載深謀資敵國，一時邊議罷輪臺。朱〔珠〕崖割棄英雄逝，往事傷心擲酒杯。」³¹所謂「六載深謀」，是指劉銘傳在臺灣 6 年的經營，而直接將日本稱為「敵國」，呈現出其民族立場。「一時邊議罷輪臺」典出漢武帝的「輪臺之詔」，由於武帝長年發動與匈奴的戰爭，導致國內糧食虛耗，人力衰減，晚年乃下詔罪己，宣布停止一切的戰爭，與民休息，並罷除西域輪臺（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臺縣）的屯戍。「朱〔珠〕崖割棄」則

²⁴ 林湘沅，〈追懷劉壯肅（銘傳）〉，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²⁵ 趙雲石，〈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²⁶ 鄭作型：嘉義人，羅山吟社社員，曾於 1910 年 4 月 24 日至臺中林瑞騰瑞軒，參加櫟社主辦的北中南詩人大會。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6。

²⁷ 鄭作型，〈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²⁸ 陳基六，〈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²⁹ 林佛國，〈追懷劉壯肅公有引〉，收於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臺北：林珮貞，1984），頁 18。

³⁰ 北郭園後人：即鄭神寶，號幼香。

³¹ 北郭園後人，〈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典出漢朝廢珠崖郡，放棄該地。珠崖位於今海南島，漢武帝滅南越國後在當地設郡，但由於連年反亂，漢廷無力顧及，乃有此舉。此處的罷輪臺、朱〔珠〕崖割棄都是比喻臺灣遭清廷割讓。

林癡仙亦對臺灣割讓導致劉銘傳六載的建設形同徒勞而感到痛心。云道：

燦爛黃金新世界，等閒擲過恆河外。空費經營一片心，彎弓六載扶桑挂。
萬事人間總可哀，騎麟被髮莫歸來。匆匆海底揚塵後，聞說昆明亦劫灰。

32

其中，「海底揚塵」指臺灣淪日，「昆明亦劫灰」則指中國亦遭逢巨變，清廷覆亡，中華民國正式成立。顯示其在感嘆臺灣處境的同時，亦心繫中國政局的變化。此種情況與黃溥造³³所書的「我來懷古空長嘆，眼底河山棋局換。中原惆悵王氣殘，誰是公才排大難？驅車忍過合肥城，落日長江腸欲斷」³⁴類似，除了憂心臺灣外，更對中國的時局憂心不已。可見傳統文人多半具有相當的故國情結。

至於傅錫祺，則以劉銘傳原擬設為省治而闢建的大墩城，日治後城郭盡毀為著眼點，形容劉氏事業後繼乏人、江山易主的悲哀。云道：「二十年前草昧開，大墩鼎足立三臺。可憐轉瞬盧龍賣，城郭難尋舊址來。」³⁵

劉銘傳在臺灣的施政並非毫無缺失，例如清賦執行草率，不得其人而用，丈量方法也不完備，以致引發施九緞事件；撫番的實際成效有限，原住民的生活

³² 林癡仙，〈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後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下》，頁226。

³³ 黃溥造：員林人，字鏡軒，田中蘭社、興賢吟社社員，曾於1912年6月15日至霧峰萊園，參加櫟社成立10週年大會。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8；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6。

³⁴ 黃溥造，〈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³⁵ 傅錫祺，〈追懷劉壯肅〉，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45。

空間縮小後憤而反抗，造成「番害」增多；由於湘淮之爭，與臺灣道劉璈不合，導致施政重北輕南；³⁶在財政上也出現極大缺口，導致日後新政無以為繼。³⁷何以傳統文人仍對其懷念不已，並給予好評呢？此種情形可以用哈伯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之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理論來解釋。哈伯瓦赫認為，人們頭腦中的過去並不是客觀實在的，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人們如何建構和敘述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當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憶是為現在的需要服務的，因而也是斷裂的。³⁸由於臺灣已淪為日本殖民地，傳統文人自然在無形中美化劉銘傳治臺的政績，以與其漢人意識相符合。

劉銘傳的施政有重北輕南的現象，照理而言，南部文人對其評價會較有保留，然而胡南溟和趙雲石兩位南臺重要的文人，對於劉銘傳也是給予一致的肯定。因此，可以說推崇劉銘傳是傳統文人思念故國的一種表徵，故刻意忽略其施政上的缺失，而選擇記憶其有貢獻的部分。³⁹

劉銘傳之外，亦有傳統文人讚頌在鳳山知縣任內（1837-1841）引下淡水溪水源開圳灌溉而有政聲的曹謹。⁴⁰歐陽維謀⁴¹詩云：

³⁶ 許雪姬，〈邵友濂與臺灣的自強新政〉，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 1-34。

³⁷ 劉銘傳新政的缺失，可參閱許雪姬，《洋務運動與建省——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頁 113-120。

³⁸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³⁹ 伊凡·普理查（Evans Pritchard, 1902-1973）曾提出「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理論，認為隨著時間的變動，某一群體會因為認同的關係而產生「結構性失憶」，以發現或創造新的集體記憶，以凝聚新的認同。E.E. Evans Pritch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

⁴⁰ 曹謹（?-1845）：字懷樸，河南河內人。1807 年丁卯科解元，1837 年正月任臺灣鳳山縣知縣。初至鳳山時，發現鳳山雖有田園萬甲，但水利未興，如遭旱災，飢荒立至而不能免。於是招集紳董，商築水圳，決開九曲塘，築提壩，疏引下淡水溪水，以資灌溉。經兩年之興築乃成，潤田 3,000 餘甲。民感其德，命名曰曹公圳，並立碑以紀念之。1841 年陞任淡水同知，翌年獲補海寇三起，得鎮道之敘優。1844 年平息漳泉械鬥的擴大，並提倡文風。逝後，竹塹城人士，祀於德政祠，鳳山縣亦於鳳儀書院建祠祀之。1876 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奏准祀名宦祠。童勝男兼修，林

隨車膏雨蒞瀛東，來覆黃雲鳳邑中。德著循聲開水利，名書信史建圳功。
潤成沃野農村富，灌就良田稼穡豐。獨得賢勞丕績顯，流傳後世頌曹公。⁴²

二、對清代治臺歷史遺跡的感懷

除了追思政治人物外，與臺灣歷史有關的遺跡也是傳統文人常感嘆的對象，例如清法戰爭時劉銘傳重修的滬尾砲臺，便引發傳統文人的睹物思人。滬尾砲臺原建於光緒初年，1884年清法開戰後重修，由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率領部隊駐守。該年8月，法軍自基隆轉攻淡水，戰事頗為激烈，砲臺被毀。戰後，臺灣巡撫劉銘傳聘德國工程師重建砲臺兩座，這兩座砲臺正門上方的門額為劉銘傳親筆所題，一為「北門鎖鑰」，一為「保固東瀛」。日治後，施家本曾造訪當地，只覺人事全非，乃嘆到：「海天俯仰悲陳跡，人物消沈感昔時。一片蒼茫夕陽渡，牛羊原上草離離。」⁴³桃園詩人鄭指薪在〈登淡水舊砲臺〉詩中也抒發類似的情懷：「石室摧殘塹壘存，留供樵木弔黃昏。霸圖已逐江山改，鎖鑰空鐫鎮北門。」⁴⁴砲臺如今幾已不存，在江山改易後，徒留劉銘傳所題的「北門鎖鑰」四字，更是令人有無限的傷感。

即使只是探訪靠海的滬尾，也常常引發傳統文人的故國之思。林癡仙在〈滬尾〉詩中云：「江邊柳樹繫歸舟，十載重來怕上樓。望斷鷺門衣帶隔，鳥

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718-719。

⁴¹ 歐陽維謀：號裕修，澎湖人。澎湖水產專修學校畢業，後任和發合資會社專務，藏修詩社社長。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415。

⁴² 歐陽維謀，《追慕曹公》，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416。

⁴³ 施家本，〈過滬尾舊砲臺遺址〉，收於林幼春編，《櫟社第一集》，頁165。

⁴⁴ 鄭指薪，〈登淡水舊砲臺〉，收於賴子清編，《臺灣詩海》（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頁120。

飛不到水悠悠。」⁴⁵此處的鳥，係癡仙自擬，表露出想回歸大陸，但現實上卻又不能的無奈心情。林獻堂更是明白寫道：「觀音山上白雲飛，潮打長堤帶夕暉。江海茫茫何處好，神州吾欲御風歸。」⁴⁶其中「神州吾欲御風歸」一句，清楚點出他的漢族意識和對中國的嚮往。

高雄的旗後舊砲臺亦然。旗後砲臺位於旗津區旗港段的旗後山上，建於康熙年間，乾隆以後，日漸塌毀。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欽差大臣沈葆楨命駐防副將王福祿督造新式砲臺，王氏乃聘英籍技師設計建造。係一座「目」字形的長方形砲臺，主要牆垣由紅磚及三合土築成，共分三區，門額題「威震天南」四字。1885年劉銘傳撫臺時，又聘德籍工程師修建，成爲一座近代的西洋式砲臺。甲午戰爭時遭日軍攻佔，擊毀砲臺城門額「威震天南」前兩字，進而佔領打狗港。⁴⁷傳統文人目睹此砲臺，自然聯想起臺灣遭割讓的往事，而有所感觸。傅錫祺吟曰：

鎖鑰南門壯大觀，珠崖一棄水聲酸。斷甑斑剝描蝌蚪，穴壁彎環認彈丸。
出沒牛羊春草長，淒涼瓦礫夕陽殘。平生銅狄摩挲意，悄立山頭欲去難。⁴⁸

「珠崖一棄水聲酸」係描寫臺灣遭割讓的苦情。詩中感嘆砲臺如今已斑駁，埋沒於牛羊出沒的青草間。此外，在其〈打狗〉一詩中，「夕陽憑吊旗山壘，廢壁猶留舊彈痕」，⁴⁹也抒發類似的情懷。王石鵬則云：「人從鳥道尋秦劫，地

⁴⁵ 林癡仙，〈滬尾〉，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176。

⁴⁶ 林獻堂，〈滬尾〉，收於林獻堂，《灌園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33。

⁴⁷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高雄市志卷十三文物志》（高雄：高雄市政府，1986），頁94；黃耀能總纂，蔣忠益、曾玉昆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九文化志文獻古蹟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7），131-132。

⁴⁸ 傅錫祺，〈高雄舊砲臺〉，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97。

⁴⁹ 傅錫祺，〈打狗〉，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17。

割牛皮憶漢官。夕照蒼茫苔蘚碧，遺磚彈跡不堪觀。」⁵⁰亦同樣從砲臺的遺跡，憶及臺灣淪日的傷感。施梅樵亦撫今追昔，不勝歎噓：「海疆藉此作屏藩，當日將軍此駐鉞。依山築臺禦外侮，波平浪靜風雲歇。河山戰後失堯封，細柳營中人跡絕。殘磚剩瓦埋塵埃，虎帳而今作鼠穴。」⁵¹

乙未之前曾參觀過砲臺並觀巨砲演放的許存德，⁵²日治之後重遊故地，心有所感。他曰：「何期數年間，山川忽易位。版圖既更改，形勢隨變異。……河山猶昔日，舊壘盡廢棄。……卒使南天門，剝落無隻字。憑吊甫歸來，一嘆三比置。」⁵³

至於安平，過去是鄭成功登陸趕走荷蘭人的地點，日本統治下，傳統文人睹物思情，亦頗有所感。林維朝曾依清代恆春知縣何如謹憑弔延平郡王的原韻，稱許鄭成功「割據彈丸力未優，傷心難復舊神州。更從絕島開生面，富國強兵立遠謀。」然而日治後，人事全非，乃以「故址荒涼作牧場，低徊無限感滄桑」表達內心的遺憾。⁵⁴傅錫祺亦曰：「七鯤遙望立安平，不絕風濤作怒鳴。百里江山重易主，那堪鹿耳話騎鯨。」⁵⁵林癡仙則云：「茫茫天塹海門開，無復長鯨跋浪來。卻憶鄭家全盛日，荷蘭城畔受降來。」⁵⁶在參謁延平郡王祠後，林癡仙對鄭成功的功業記述如下：

⁵⁰ 王了庵，〈高雄舊砲臺〉，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 97。

⁵¹ 施梅樵，〈旗山舊砲臺懷古〉，收於施梅樵，《捲濤閣詩草》，頁 76。

⁵² 許存德，名素，號菊隱，存德為其字，鹿港人。乙未改隸後，營商維生，但晨昏猶溫習經史。其子稼秋醫學校畢業後，開設竹塘醫院，特闢可園以奉養。故存德日惟種樹藝菊，每值菊花盛開，即招吟侶，拈韻賦詩，詩境因此大進，著有《可園吟草》。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290。

⁵³ 許存德，〈旗山舊砲臺懷古〉，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291。

⁵⁴ 林維朝，〈依何大令如瑾原韻憑弔延平郡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224-226。

⁵⁵ 傅錫祺，〈安平〉，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16。

⁵⁶ 林癡仙，〈安平〉，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179。

東洋出現新天地，一夜騎鯨鹿耳門。荷蘭名王豎降幡，水師仍習昆明戰。
軍食初營渭上屯，婆娑世界真天府。經綸草昧暫偃武，西來遺老如歸
市。……今日海邦三易主，開山廟貌尚馨香。⁵⁷

從追思鄭成功，到嘆息臺灣江山又已易主，此種情懷正是傳統文人具有漢人意識的表徵。

三、小結

分析傳統文人與劉銘傳有關的詩作，顯示他們對於劉氏在臺的事功均有極高的評價，但在肯定的同時，也對臺灣淪日的現況有所感嘆。其次，清代治臺的遺跡也常引發傳統文人的追思，頗有今非昔比之感。可知其仍有濃厚的故國情懷，故將對中國的思念投射在曾在臺灣勵行新政的劉銘傳及諸多歷史遺跡上。雖然劉銘傳在臺的施政並非全無缺失，但文人只記憶自己願意記憶的部分。

然而，有部分傳統文人由於認同日本，認為臺灣在日本統治下已達文明進步之境，應可告慰劉銘傳在天之靈，故追憶往昔非但不覺傷感，反有欣慰之意。例如林文華⁵⁸云：「維新政策想當年，時勢推移世運遷。於今島治誇寰宇，應慰劉公未了緣。」⁵⁹林佛國曰：「毗耶改未半世紀，治化駸駸已同軌。文物昌明寶庫開，九原有知公應喜。」⁶⁰此處的毗耶，應是毗舍耶。南宋時期

⁵⁷ 林癡仙，〈謁延平郡王祠〉，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155-156。

⁵⁸ 林文華：大里杙人。1907 年 4 月 3 日加入櫟社，後因不出社費，於 1919 年之前喪失社員資格。與林紀堂交情極深，常代其處理活期存款、支票等事宜。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4、14；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4 月 22 日、24 日、29 日。

⁵⁹ 林文華，〈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⁶⁰ 林佛國，〈追懷劉壯肅公有引〉，收於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頁 19。

汪大猷知泉州，曾遣軍民屯戍澎湖，以防毗舍耶侵襲。雖然梁嘉彬力持毗舍耶為今日的臺灣，但多數學者認為毗舍耶是菲律賓的 Visaya 族。⁶¹不過此處林佛國所謂的毗耶應是指臺灣。林國賓亦云：「臺灣一乾坤，政治數三傑。成功闢草萊，後藤善施設。回憶廿年前，中有劉壯肅。」⁶²在讚美鄭成功和劉銘傳的同時，也推崇後藤新平的施政，言下之意，對日本的統治頗為滿意。魏清德在緬懷劉銘傳的同時，更不忘提及「臺灣此日號昇平，萬般物質耀文明。」⁶³值得注意的，從上述詩作可看出他們肯定日本統治的立場，凸顯出傳統文人之間的差異性。

⁶¹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91 四版），頁 90-101。

⁶² 林國賓，〈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⁶³ 魏清德，〈追懷劉壯肅〉，收於《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01，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無頁數。

第二節 對中國時事之關切

一、與中國在文化上的交流

日治時期臺灣雖與中國分離，然而兩地在文化上仍常有交流。例如中國的戲班經常來臺灣巡演，造成極大的迴響；⁶⁴報章雜誌上也常介紹中國政治、經濟、文學最新的發展。1920年代後，蔣渭水的文化書局、莊垂勝的中央書局、連橫的雅堂書局、張純甫的興漢書局、黃茂盛的蘭記書局紛紛引進中國圖書至臺灣販售，傳播中國的新思潮。⁶⁵特別是經營蘭記書局的黃茂盛，與上海和北京的出版社時有往來，進口之書籍包括經史、子書、詩文、字典、讀本、尺牘、醫書、古典小說，以及孫文演說集，胡適、陳獨秀等人之著作。⁶⁶依黃美娥研究，黃氏除了是知識的零售者外，更是協助臺人學習漢文知識的代理人或商人，且一定程度扮演仲介中國漢文圖書知識的人物，為臺灣與中國之間建置了漢文流通的網路，促使臺灣得以擁有與中國較為同步的漢文讀書市場。⁶⁷以霧峰林家為例，即固定訂購《新民叢報》、嚴復的《天演論》、林琴南的翻譯小說、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中國最新的書刊，⁶⁸可同步接收中國的資訊。

此外，中國的文人、書畫家也常來臺訪問，受到臺灣傳統文人的重視。其中以 1911 年梁啟超來臺最為人所知，當時梁啟超曾至霧峰萊園作客，諄諄勸告

⁶⁴ 關於日治時期中國戲班來臺巡演的情形，可參閱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臺北：南天：2000）。

⁶⁵ 日治時期文化書局、蘭記書局、中央書局、雅堂書局所販售的中文圖書書目，可參閱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 456-483。

⁶⁶ 何原功著、張文薰譯，〈臺灣出版會與蘭記書局〉，收於封德屏總編輯，《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出版、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發行，2007），頁 57-58。

⁶⁷ 黃美娥，〈從蘭記圖書目錄想像一個時代的閱讀／知識故事〉，收於封德屏總編輯，《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76。

⁶⁸ 葉榮鐘，〈詩人施家本—記一個未完成的天才〉，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72。

林獻堂和林幼春等人不可以「文人終身」，必須努力研究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想等學問，並開列東西方名著 170 餘種供其參考。⁶⁹林獻堂與梁啓超交誼深厚，收藏有梁啓超的照片，⁷⁰並將梁啓超所題的萊園十二絕句懸掛於五桂樓 20 餘年，後因怕損害，特別命裱褙師鑲以玻璃。⁷¹足見其珍視的程度。不過，1930 年 10 月，林榮初⁷²寫信告知林獻堂，梁啓超之子梁亞聲因經濟困難服藥自殺，請林獻堂念在舊情的份上予以救濟。但林獻堂認為梁亞聲是個浪蕩子弟，只因其父梁啓超之遺產歸其母管理而不能自由取用，遂自殺，故拒絕其請。⁷³

四川書法名家楊草仙於 1927 至 1930 年間多次來臺開書法展，與臺灣文人多所交流。1927 年 9 月來臺時，已高齡 89 歲，仍精神矍鑠，攜帶 20 餘幅作品來臺展出。⁷⁴9 月 28 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社公開揮毫，持大筆，於白布上寫一「福」字，表示為臺灣祈福，吸引多名日人官紳及臺灣文人前來參觀。⁷⁵此後曾寓居新竹北郭園，鄭神寶為其在新竹舉行送別會及作品訂購會，⁷⁶1934 年林獻堂也資助

⁶⁹ 葉榮鐘，〈林獻堂與梁啓超〉，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184。

⁷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250。1933 年 6 月 24 日，警察來問林獻堂是否收藏有梁啓超的墨跡和照片，林獻堂乃以照片示之，故知他有收藏。

⁷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4。

⁷² 林榮初（1877-1944）：新竹人，字震東，號傳爐，又號潛園小主人，為林占梅嫡孫。少時先後受教於張麟書、張鏡濤等人。乙未之後，獨撐大局，掌理家族龐大基業。竹社成員，與鄭神寶齊名。1912 年 4 月，曾參與於霧峰萊園舉行之櫟社 10 週年紀念大會；1918 年 9 月，參與在臺中伯仲樓舉行之櫟社和鰲西詩社合辦之聯合會。與謝介石相交頗深，曾應其之邀往滿洲國遊歷。又與黃郛相與往還，故能來往於大陸各地。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8、12；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138-139。

⁷³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354。

⁷⁴ 〈楊草仙氏來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9825 號，昭和 2 年 9 月 3 日，頁 4。

⁷⁵ 〈楊草仙氏椽筆揮毫盛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9853 號，昭和 2 年 10 月 1 日，頁 4。

⁷⁶ 顏娟英，《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87、90-92、103、110-111。

其在霧峰革新青年會館辦揮毫會。⁷⁷楊草仙雖為中國人，但廣為臺灣文化界人士熟識，胡南溟稱其「九十老翁翁不老，百花潭上占春魁。」⁷⁸其拿一、二十斤重的大鐵筆寫書法可謂之一絕。楊草仙晚年與其子楊芳潔移居新加坡，由於極注重養生，勤打太極拳，至 112 歲時仍能提筆揮毫，曾贈林忠一幅字，內書「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⁷⁹作為其座右銘。

主張三無主義（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⁸⁰於 1934 年 8 月來臺，至臺中時曾與林獻堂、吳子瑜、王石鵬、林仲衡、王達德等多名文人餐敘，席間談東洋文化，⁸¹眾人互相吟詠唱和。林仲衡乃作詩贈江亢虎，誇其：「雄辯滔滔氣如虹，海涯難得把杯同。夢中一管生花筆，文藝重興總屬公。」江亢虎亦和其韻，誇讚臺灣諸子：「回首神州方黯淡，海東文物屬群公。」並賦詩贈同席諸人：「冠蓋繽紛醉月樓，一觴一詠足風流。中原文物今消歇，便欲乘桴海盡頭。」林仲衡的和韻為：「縱談同上酒家樓，莫學清衫淚暗流。今日騷壇零落盡，海隅遺老數從頭。」⁸²由於中、臺兩地傳統詩文漸次沒落，堅持文言文者猶如遺老，相見自然有惺惺相惜之感。

江亢虎後至霧峰訪林獻堂，參觀大花廳，遊萊園，並在霧峰青年會館演講

⁷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172、176、181。

⁷⁸ 胡南溟，〈送別楊草山仙翁〉，收於陳漢光編，《臺灣詩錄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頁 1305。

⁷⁹ 林忠，《臺灣光復前後之回顧與自傳》，頁 71-72。楊草書贈與林忠之字幅的照片，則附於書前頁 20。

⁸⁰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陽人。早年就讀北京東文學堂，1901 年赴日考察，回國後被袁世凱聘為北洋編譯局總辦。1910 年經日本到比利時、美國等地遊歷。次年回中國，在上海組織三無主義研究會，後改為中國社會黨，雖贊成共和，但攻擊辛亥革命，1920 年以中國社會黨人身份列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三代表大會。1922 年在上海創南方大學，自任校長。1927 年亡命美國、加拿大，1934 年來臺遊歷。1940 年任汪政權考試院院長，戰後被捕，1954 年亡於上海獄中。李盛平主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頁 188。

⁸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36。

⁸² 林仲衡，〈席上贈江亢虎博士〉、江亢虎，〈和韻〉、江亢虎，〈席上賦贈諸公〉、林仲衡，〈席上和江亢虎博士瑤韻〉，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75。

「東西文化之比較」，⁸³其主張復興舊文化以救中國及廢白話而用文言的看法，林幼春亦甚表贊成。⁸⁴

江亢虎訪臺期間引起一陣旋風，久仰其名的曾秋濤⁸⁵認為能見其一面，實是三生有幸。⁸⁶謝尊五⁸⁷則期許江亢虎能在文化事業上立下事功，作詩曰：「大名鼎鼎早登臺，歷劫雖多志未灰。……才華人競傾葵藿，文化君應闢草萊。畢竟起衰資卓識，奏功何必待將來。」⁸⁸但張深切卻指責江亢虎為無血、冷血、頹廢主義者、無志氣、猶太人、開倒車選手。⁸⁹顯示江亢虎在新舊文人陣營中均受到重視，並引起討論。江亢虎後來出版《臺游追記》，記載他訪臺的經過。⁹⁰

一些較不知名的中國文化人，也與臺灣的傳統文人有交流。例如福建工業學堂監督施景琛和福建商業學堂監督陳名訓，曾於 1911 年來臺視察，櫟社成員蔡惠如和林季商特別設宴招待，並邀櫟社諸子作陪。傅錫祺在席上賦詩曰：「盈盈一水隔君居，握手言歡見面初。昔日鄉鄰今異國，對卿杯酒感何如。」⁹¹詩中充分表露對於一水之隔的福建人士如今竟成外國人的遺憾，以及此次見面的欣喜。1920 年廣東記者團一行 16 人至臺中視察時，臺灣文社也特別設宴招待於臺中公園之香園閣，席間傅錫祺的詩詠道：「一家自笑成胡越，四海誰知總

⁸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36。

⁸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54。

⁸⁵ 曾秋濤：字壽三，新竹人。少時師事曾逢辰，後參加竹社，並創立來儀、漁寮兩吟社。歷任庄協議員、保正兼聯合會長、新竹水利評議員等職。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69。

⁸⁶ 曾秋濤之〈呈江亢虎博士〉曰：「灌耳如雷仰大名，奇緣有幸等三生。」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69。

⁸⁷ 謝尊五：字夢春，號靜軒老人，臺北人，生員。1925 年遊北京，返臺後曾任公學校教師，並設教里中 30 餘年。戰後執教於省立成功中學。為鷺洲吟社、瀛社社員，曾任汐止灘音吟社詞宗。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04；「臺灣漢詩資料庫作家資料列表」。

⁸⁸ 謝尊五，〈呈江亢虎博士〉，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04-105。

⁸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97。

⁹⁰ 江亢虎，《臺游追記》（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35）。

⁹¹ 傅錫祺，〈合昌樓上賦呈施涵宇陳杰生〉，收於傅錫祺，《鶴停詩集上》，頁 41。

兄弟。」⁹²與前引詩的「昔日鄉鄰今異國」，流露出同樣的感慨。除了傅錫祺外，席上林幼春、林耀亭亦有賦詩，⁹³顯示傳統文人對廣東記者團的重視。

1933年湖南人余壽鏞來臺遊歷時，以賣字籌其旅費，也曾二度拜訪林獻堂。林獻堂贈其筆資禮5圓，及林癡仙之《無悶草堂詩集》；余壽鏞則勸林獻堂蒐集可資模範的人物，以修臺灣史，兩人有不錯的互動。⁹⁴

二、對中國局勢的關切

傳統文人對中國時事一向保持強烈的關切，特別是一世文人，由於出生成長階段是清領時期，接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的薰陶，日治之後，中國仍是他們思想與文化意識中的祖國。同時，由於他們多有閱報的習慣，財力佳者如林紀堂，家中即訂有報紙，甚至地方警察還常至其宅借閱報紙；⁹⁵財力一般者如張麗俊，也經常到豐原信用組合等公共場所閱報，了解時事。⁹⁶因此，舉凡義和團事件、革命運動、民國成立、袁世凱擅權誤國、軍閥割據、北伐統一等中國局勢的變化，均是其注意的焦點，也是吟詠的題材。

⁹² 傅錫祺，〈庚申夏五（夏曆二十八日）廣東記者團陳新吾、陸見如、袁振英、蘇守潔、高根剛、黃毓梧、黃芸白、鄭嘯菴、李思薇、司徒冷觀、吳俊笙、李翰卿、李祝多（鶴仙）、劉伯銘、李駢伯、李家仁等十六氏為視察而來臺中臺灣文社友為開茶話會於公園之香園閣余亦與會席上賦呈〉，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103-104。

⁹³ 林幼春，〈香園閣席上呈廣東記者團諸公〉，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33；林耀亭，〈香園閣雅集呈廣東記者團陳新吾先生一行〉，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14。

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22、227。

⁹⁵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2月13日、19日，5月6日；1916年2月19日，5月15日，未刊稿。

⁹⁶ 例如張麗俊於1927年6月6日，至豐原信用組合，看《大阪新聞》。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211；1930年1月1日，至豐原信用組合，看《新高新聞》。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144。

1900年，山東民間的鄉社組織義和團⁹⁷在慈禧太后的袒縱下，於京、津製造排外事端，殺害教士，燒毀教堂及教民房舍，英、俄、德、法、美、日、義、奧等國乃決定派軍至北京救援。6月21日，清廷下詔宣戰，遂引發八國聯軍進陷北京，並於8月14日佔領。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率宮中2,000多人倉惶出奔至西安，最後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簽訂辛丑和約。⁹⁸

對於此一險讓清廷覆亡的變局，傳統文人自是感嘆再三。林癡仙曰：「喧喧笳鼓震皇畿，擾擾攙槍犯紫薇。舜階昔聞群獸舞，堯天今有九鳥飛。」⁹⁹將清廷的紫禁城，比做「舜階」、「堯天」，惋惜其為群魔和烏鴉所佔，反映出其忠君思想。呂厚菴則云：「壯麗神京數百年，衣冠解體忽戎旃」、「寂寞六宮鳴野雉，陰沈九廟鎖烽煙」，¹⁰⁰直指這是讓清室傾頹、衣冠解體的大事，感慨哀傷之情溢於言表。陳瑚於該年中秋節寫下「東望都城雲霧遮，可憐有國不如家。遙知今夜故宮月，不奏管絃奏胡笳。」¹⁰¹將洋人視為胡人，表達對列強佔領北京的心痛。由此可見傳統文人對滿清皇室仍抱有濃厚的感情，視之為中國正統的代表，對其遭受列強欺凌，有滿腔的悲憤。

然而，隨著革命運動的興起，不少文人又將孫文領導的革命黨視為振興中國之希望所寄。1907年5月，浙江光復會的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事後被捕遇害。¹⁰²10月16日櫟社舉行的雅集，即以「徐錫麟刺恩銘」為

⁹⁷ 義和團的起源，可參閱周錫瑞著，張俊義、王棟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⁹⁸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1五版），頁136-141。

⁹⁹ 林癡仙，〈聞警〉，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64。

¹⁰⁰ 呂厚菴，〈書警（感義和團之變）〉，收於呂厚菴，《厚菴遺草》（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頁18。

¹⁰¹ 陳瑚，〈庚子義和團之變清帝蒙塵西安中秋對月感而有作〉，收於陳瑚，《枕山詩抄》，頁13-14。

¹⁰² 徐錫麟的生平，可參閱徐和雍，《徐錫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肖然山，《徐錫麟傳》（臺北：國際文化，1991）。

詩題，¹⁰³可惜社員作品今已不存，但已顯示櫟社對此事的關注。對於徐錫麟，呂厚菴有詩弔云：

九世復仇立志強，公羊義例讀精詳。皖城一砲先聲發，保種捐軀最可傷。

¹⁰⁴

莊嵩對徐錫麟亦極為推崇，1907年作〈徐錫麟刺皖撫恩明〉詩四首，曰：

一擊能教群眾懼，空談無補笑康梁。但令舉國知排外，休說徐公是自戕。
博浪雖然椎誤中，皖江一擊自非常。孫文義幟方西舉，暗殺何妨此濫觴。
肯容異族日囂張，革命應知勝保皇。一死能為天下計，漢家兒女本堂堂。
江山半壁欲斜陽，正義居然起學堂，外侮久成心腹患，除奸休說是相戕。

¹⁰⁵

詩中明確表達支持革命之立場，並批評康、梁等人立憲保皇為空談無補。至於暗殺亦屬無妨，因不容異族囂張，展現出強烈的漢人民族意識。

其後，清廷因鐵路國有政策大失人心；1911年5月成立新內閣，又被譏為「皇族內閣」，輿論譁然，遂導致武昌起事。革命黨人擁新軍協統（旅長）黎元洪為鄂軍都督，組織軍政府。起事成功後，1911年12月29日，孫文由各省代表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立。¹⁰⁶

對這一連串戲劇化的轉變，張玉書頗感詫異，他曰：「聞道中原逐鹿忙，

¹⁰³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4。

¹⁰⁴ 呂厚菴，〈弔徐錫麟〉，收於呂厚菴，《厚菴遺草》，頁45。呂厚菴於1908年去世，故此詩應作於徐錫麟遇害後不久。

¹⁰⁵ 莊嵩，〈徐錫麟刺皖撫恩明〉，收於莊嵩，《太岳詩草補遺》（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57-58。

¹⁰⁶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書局，1992九版），頁62-69。

連天烽火起蕭牆。乍收鐵道爲官業，忽報成都作戰場。倡首何人除弊政，傾心舉國立新章。興衰畢竟因時異，眼看曼殊國祚亡。」¹⁰⁷傅錫祺在其〈生平紀要〉中，特別於 1911 年條下記載：「陽曆 10 月 10 號，中國辛亥革命，黎元洪在湖北反正，各省相繼獨立，未幾清帝遜位。」¹⁰⁸視此事件爲破天荒的大變局。

傳統文人對於孫文大抵均極爲贊許，1912 年林癡仙作有〈孫逸仙〉三首，曰：

早重民權唱自由，黃袍加體視如疣。漫將拿破崙相比，專制終為法國憂。
共和新國耀寰球，名冠中華四百州。纔學征誅還揖讓，亦為堯舜亦為周。
新君丹穴不須求，一舸迎歸自美洲。掃盡五千年帝政，佇看黃種出人頭。
¹⁰⁹

同年傅錫祺亦作〈孫文〉一詩，云：

一生志復有明讎，游說年年未肯休。鼎革功成身便退，自王畢竟勝商周。
¹¹⁰

值得注意的是，義和團事變時同情清室的林癡仙，此時也認同孫文重視自由、民權的理念，稱讚其讓位之舉可與堯舜相比。並強調共和國的建立足以耀寰球，而五千年帝制的終結正代表黃種人的出頭，顯示其對中國政權的認同隨著局勢變遷而有所轉移。林子瑾則認爲孫文和黃興的革命成功地完成以前鄭成功所未能實現的驅除異族、恢復漢人政權的理想。因此鄭成功若地下有知，應該會對後繼有人感到欣喜。他的〈鄭成功〉一詩提及：

¹⁰⁷ 張玉書，〈聽客談中華時事感賦〉，收於林幼春編，《櫟社第一集》，頁 177。

¹⁰⁸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375。

¹⁰⁹ 林癡仙，〈孫逸仙〉，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下》，頁 225。

¹¹⁰ 傅錫祺，〈孫文〉，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62。

一線延明賜姓朱，臺澎割據勢終孤。千秋倘有英靈在，喜看孫黃覆曼殊。

111

至於把持大總統權柄的袁世凱，¹¹²傳統文人對其評價不一。辛亥革命後，清廷任命袁氏為內閣總理大臣，希望他能平定革命軍；但革命軍因袁為漢人，希望他迫清廷退位。袁世凱乃一面利用革命軍以脅迫清廷，一面以軍力壓迫革命軍與其談判，進而謀取民國大總統之位。南北議和後，1912年2月12日，清帝在袁氏的勸誘下退位，孫文乃辭職並薦袁世凱以自代，南京臨時參議院乃選舉袁氏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¹¹³

對於袁世凱的種種心機，林癡仙譴責他「負恩倒把太阿持」，又「欺人寡婦與孤兒」，欺負清室太甚，以為其執政足以使「千古綱常掃地」。¹¹⁴陳貫的看法較中庸，稱袁氏「慷慨登壇擁節麾，一身關係漢安危」，¹¹⁵認為他是維繫時局的重要人物，對其有所期待。而傅錫祺指出袁世凱迫使宣統皇帝退位，乃順應民意之舉，不必加以指責，且未耗一兵一卒卻使河山歸漢，猶勝孫文、黎元洪之軍事力量，¹¹⁶顯示看法的各不相同。

迨袁世凱於 1915 年 12 月受「國民代表大會」推戴為「中華帝國皇帝」，

¹¹¹ 林子瑾，〈鄭成功〉，收於林幼春編，《櫟社第一集》，頁 158。

¹¹² 袁世凱在民國後的作為，可參閱 Ernest P.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¹¹³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68-70。

¹¹⁴ 林癡仙，〈袁世凱〉，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下》，頁 225。

¹¹⁵ 陳貫，〈袁世凱〉，收於陳貫，《豁軒詩草》，頁 35。

¹¹⁶ 傅錫祺，〈袁世凱〉，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61-62。詩云：「民氣方張帝運衰，鄉關奉詔故遲遲。覺羅三百年天下，頓喪河陽再起時。及覆無常未可嗤，背君是即順民時。河山容易收歸漢，勝卻孫黎十萬師。」

並改民國 5 年為洪憲元年，¹¹⁷乃引起魏清德、林幼春等人強烈的批判。最初在推戴的過程中，魏清德即直指袁世凱「以國體變更問題，諛託民意，實則無非壓迫民意，偽造民意，詐欺民意，恐嚇民意。」¹¹⁸林幼春作有〈洪憲改元感賦〉三首，諷刺袁世凱「國猶可竊誠奇傑」，感嘆「事有難言是共和」，並指責其為「九鼎神奸」，其竊國之謀，猶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茲引兩首詩作如下，以見其憤慨之氣：

當塗象魏轟嵯峨，八柄何年劫太阿。伯益竟成遷禹業，重華猶唱贊堯歌。
二陵風雨攀髯近，九鼎神奸變相多。今日路人心共見，不堪回首話銅駝。

殿上重賡復旦歌，丹書鐵券下鑿坡。國猶可竊誠奇傑，事有難言是共和。
帝友似聞招四皓，封人今又說三多。眼中琴朕干戈朕，獨奈孤兒寡婦何。

119

同年 12 月 15 日，原國民黨人李烈鈞、前湖南都督蔡鍔、雲南將軍唐繼堯組織「護國軍」，誓師討袁，而屢獲勝利。林幼春對此大感興奮，認為袁世凱咎由自取，是「獨夫自結千秋局」、「家賊橫挑一室戈」，因舉世不容才遭討伐。

120

袁世凱最後因眾叛親離，羞憤而死。黃水文¹²¹最後總結袁世凱的一生，稱

¹¹⁷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124-134。

¹¹⁸ 潤庵生，〈旅閩雜感（其六）〉，《臺灣日日新報》，第 5609 號，大正 5 年 2 月 7 日，頁 4。

¹¹⁹ 林幼春，〈洪憲改元感賦〉，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 28-29。

¹²⁰ 林幼春，〈洪憲改元感賦報言蔡鍔起義雲南東南義師響應〉，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 29。

¹²¹ 黃水文（1914-？）：號梅溪。曾留學經史，返臺後在賴雨若門下研讀經書，又在賴惠川之閩紅館精研韻學，並跟林東令習畫，又受林玉山指導膠彩畫。曾任縣立嘉義中學教師達 32 年。「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作家資料列表」。

其「滅外扶清扮盡忠，野心竊國唾奸雄。中華稱帝號洪憲。八十三天一命終。」¹²²語多指責和不滿。

1917年7月1日，張勳在康有為、安徽省長倪嗣沖等人的支持下，於北京擁立溥儀復辟，大總統黎元洪逃進日本公使館。但兩天後段祺瑞便在天津南郊的馬廠組織討逆軍，7月12日攻入北京，溥儀再次退位。¹²³對於幫助張勳的康、倪兩人，林維朝極為不滿，抨擊康有為：「有為畢竟無能為，日暮途窮忍逆施。」¹²⁴批評倪嗣沖「首禍猖狂」、「稱兵犯闕法難容」。¹²⁵對於整起事件，他的感想如下：

康張合是莽優伶，一劇癡狂唱復清。鑼鼓登場方扮演，萬人攻擊寂無聲。
京兆曾聞纔五日，覺羅復辟一週間。推原禍始唯康聖，叛國千秋詆漢奸。

126

將為期一週的復辟視為與王莽登基相同的鬧劇，並指責康有為為罪魁禍首，是叛國的漢奸。

其後，中國的軍閥混戰與南北分立仍持續引起傳統文人的關切。¹²⁷1920年傅錫祺在歡迎廣東記者團來臺中視察的宴席上的賦詩，即有「大地風雲猶急變」一句，並自註「南北相持未息，而段祺瑞又將與曹錕（直督）戰，南派內

¹²² 黃水文，〈袁世凱〉，《黃水文詩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145。

¹²³ 張勳復辟運動的來龍去脈，可參閱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141-353。

¹²⁴ 林維朝，〈康有為〉，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50。

¹²⁵ 林維朝，〈倪嗣沖〉，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52。

¹²⁶ 林維朝，〈燕京復辟〉，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50。

¹²⁷ 軍閥混戰的情形及對政治的影響，可參閱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79）。

訃，北派亦內訌。」¹²⁸蓋之前孫文以護法為號召，在廣州另立軍政府。而由北方安福系國會選出的總統徐世昌，提議召開的南北和平會議，因南方主張恢復國會、取消中日密約而未獲共識。隨後直系的曹錕又與皖系的段祺瑞爆發戰爭。¹²⁹

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的軍隊包圍紫禁城，迫使溥儀取消皇帝尊號並倉皇逃亡。¹³⁰對此，1927年吳子瑜在怡園舉行的詩會中，也以〈廢帝〉為題進行吟詠，傅錫祺吟道：「誰將帝制力推翻，名號空留已不尊。回首山呼人拜舞，宮袍淚點有新痕。」¹³¹描寫溥儀於民國成立後雖仍保留名號，卻已不受尊崇的悲淒。

1928年蔣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中國出現統一的局面，呈現一股新氣象，似乎富強有望，張麗俊乃作〈祝中華民國南北統一〉一詩賀之，其詩如下：

萬里江山一統稱，三民主義眾歡迎。蒼生霖雨施南國，大陸風雲淨北京。
政令鄰邦當認定，利權漢族自經營。封疆界據全球半，內外平和息戰爭。

132

期望中國從此能維護自己的利權，並永保和平。同時，也有不少文人給予蔣氏

¹²⁸ 傅錫祺，〈庚申夏五（夏曆二十八日）廣東記者團陳新吾、陸見如、袁振英、蘇守潔、高根剛、黃毓梧、黃芸白、鄭嘯菴、李思薇、司徒冷觀、吳俊笙、李翰卿、李祝多（鶴仙）、劉伯銘、李駢伯、李家仁等十六氏為視察而來臺中臺灣文社友為開茶話會於公園之香園閣余亦與會席上賦呈〉，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103-104。

¹²⁹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194-196。

¹³⁰ 關於溥儀的經歷，可參閱李國雄口述、王慶祥撰，《伴駕生涯：隨侍溥儀33年紀實》（北京：工人，1989）。溥儀另有日記流傳，愛新覺羅·溥儀遺稿、李淑賢提供、王慶祥整理註釋，《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¹³¹ 傅錫祺，〈廢帝〉，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124。

¹³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407。

高度的評價。張達修¹³³曰：

志繼孫文力未殫，澄清宇內豈辭難。南陳虎旅軍心壯，北掃梟雄賊膽寒。
十載宏功成革命，三民巨任誓披肝。將軍此日威華夏，萬里山河混一看。

134

指出蔣介石繼承孫文志業，以弘揚三民主義爲己任，北掃梟雄成功，澄清宇內而造成河山一統之局。蕭先呼¹³⁵的看法亦類似，詠道：「計畫三民掃北軍，此番功業紹孫文。九江攻下聲威振，正立中原第一勳。」¹³⁶可見不少文人仍對強盛的中國心存期待。

可惜日後中國仍持續面臨內憂及外患的問題，局勢益不堪問。黃幼卿乃感嘆：

中原時局不堪聞，地似香瓜任剖分。一統河山無淨土，廿年事業等浮雲。
貪官尚說廉能吏，匪賊翻稱義勇軍。半壁東南將破碎，有誰收拾繼孫文。

137

¹³³ 張達修（1906-1983）：號篁川，別署少勳、醉草園主人，南投鹿谷人。19歲學詩文經史於王則修，後加入南投南陔吟社。1928年應坪頂庄林宗慶之聘，於庄中教授漢文。三年後，至集集設教。後因王則修之薦，赴日爲神戶富商莊玉坡書記，因莊氏經商失敗，乃返臺擔任臺灣新聞社編輯。1942年至上海，戰後始返臺。戰後歷任臺中女中教員、竹山初中校長、彰化縣政府秘書、彰化自來水廠廠長、臺灣省政府民政廳秘書、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委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等職。1963年創立中興吟社。張淑玲，〈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頁105-106。

¹³⁴ 張達修，〈蔣中正統一中國〉，《臺南新報》，第08975號，1927年1月，頁10。

¹³⁵ 蕭先呼：嘉義布袋人，以詩聞名。

¹³⁶ 蕭先呼，〈蔣中正統一中國〉，《臺南新報》，第08976號，1927年1月，頁6。

¹³⁷ 黃幼卿，〈謹步許君山先生四十感懷原韻〉，《臺南新報》，第11681號，1934年7月，頁8。

由字裡行間反映出黃氏對中國遭逢列強瓜分、貪官污吏充斥、盜匪橫行等亂象的沈痛心情。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開戰，傳統文人面臨文化上的祖國與現實上的統治者為敵的局面，雖感嘆中國人民遭受戰爭的茶毒，卻又無法批評日本侵略的不當，只能持續關心局勢。王竹修對此極感痛苦，曰「蘆溝橋畔起兵戈，恰值雙星渡愛河。痛哭時艱枯兩目，更無餘淚灑銅駝。」¹³⁸其中，「痛哭時艱枯兩目」一句，最能呈現其心情的沈痛。林玉書則認為，中日同種同文，國又相比鄰，理應唇齒相依，常相輔佐，不應鬩牆相爭，導致生靈塗炭，期能共傾肝膽以期和平。¹³⁹

然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殖民者開始強力地以政治干預文學，文學作品的內容必須與皇國政策相符合。為此，創刊於1935年5月9日的《風月》（曾停刊兩次，後更名《風月報》），於1941年7月改名《南方》，以配合日本當局南進政策，並宣揚東亞共榮共存的思想。戰爭時期日本當局之所以仍容許漢詩的創作和發表，主要是打算以漢文作為進出華南、南洋一帶的工具，為其思想戰重要的憑藉。¹⁴⁰

因此，戰爭時期，有不少歌頌日軍戰勝的漢詩，例如鄭金柱¹⁴¹的〈從軍行〉曰：「王師轉戰北華間，乍奪堅城娘子關。最是旭旗高掛日，歡呼聲憾太行山。」¹⁴²駱子珊¹⁴³的〈祝海南島戰捷〉云：「皇軍連勝日傳來，又奪瓊州氣壯

¹³⁸ 王竹修，〈七夕無雨〉，《詩報》，第258號，昭和16年10月20日，頁10。

¹³⁹ 林玉書，〈蘆溝橋〉，《臥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56。

¹⁴⁰ 施懿琳，〈決戰時期臺灣漢詩壇的國策宣傳與異聲—以《南方》雜誌（1941-1944）為觀察對象〉，收於許俊雅編，《講座 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2004），頁564-569。

¹⁴¹ 鄭金柱：號木村，臺北人。營布商，為鷺州吟社成員。常自費出題徵詠，評選獎贈。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93。

¹⁴² 鄭金柱，〈從軍行〉，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93。

¹⁴³ 駱子珊：字網川，號鐵花，臺北萬華人。任職臺灣倉庫株式會社松山出張所主任，為瀛社社員和高山文社幹事。好蒐集趣味品，與同好組織東瀛雪鴻會，每月定期開例會，各展所藏。收於黃

哉。建國佳辰逢報捷，邦家慶事式雙開。」¹⁴⁴王石鵬則作〈銃後國民〉，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若未能親臨戰線，也需協助後援。其詩云：「臨陣無緣作義兵，筆揮墨舞過餘生。匹夫本有安危責，後援何妨試共鳴。」¹⁴⁵甚至櫟社社長傅錫祺也作〈從軍〉詩二首，讚揚日軍的英勇，其詩如下：

礮聲轟冀北，民氣沸瀛東。舉國爭先起，斯心敵愾同。
決延常勝譽，誓奏凱旋功。能向沙場去，人生算不空。

生有設弧事，長從投筆戎。敵前爭上陸，彈隙勇翔空。
赫赫扶桑國，泱泱武士風。進狼籌拒虎，終至哭途窮。¹⁴⁶

林仲衡也作〈破敵〉詩，參加東墩吟社的擊鉢吟：

短兵相接奮雄師，不怕長蛇陣勢危。肉彈攻城拼一死，果然海國好男兒。

¹⁴⁷

然而，在一個思想控制的年代，上述作品代表多少文人內心的想法，實不無疑問。因此，對於戰爭時期的詩作，實宜持較為保留的態度。

三、對中國新聞的抄錄

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01-102。

¹⁴⁴ 駱子珊，〈祝海南島戰捷〉，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02。

¹⁴⁵ 了庵，〈銃後國民〉，《詩報》，第 164 號，昭和 12 年 11 月 4 日，頁 8。

¹⁴⁶ 傅錫祺，〈從軍〉，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214。

¹⁴⁷ 仲衡，〈短兵〉，《詩報》，第 164 號，昭和 12 年 11 月 4 日，頁 8。

詩詞之外，傳統文人的日記提供了另一個他們關心中國時事的證明。張麗俊和林獻堂的日記中常記載中國重要時事，這些新聞都是他們閱報後的抄錄、摘要或心得。張麗俊的日記從辛亥革命開始記起，1911年11月8日的日記中提到他閱《臺灣日日新報》，見清國北京被革命軍陷落，各處省垣亦多被佔領，故認為這次清國寔難再振矣。¹⁴⁸11日的日記又寫道：「是日，見新聞報革命黨首黃興，受大都統之推戴式。清國遭此大變，幾不可救藥矣。」¹⁴⁹顯示其對清廷覆亡的關心。

中華民國成立後，1915年日本對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張麗俊起先從報上得知，由於袁氏及各大臣不肯承諾，以致交涉累月，而有動武之虞，後來由於雙方讓步而得以解決，但未知後日還有否變卦。¹⁵⁰1924年9月他從友人陳贈處得知二十一條的內容，驚覺條文的嚴苛，並全數抄錄於日記。張麗俊認為：「此條件果有此事，真是國恥，則中國權利全無，亦不成為中國矣。」¹⁵¹足見他站在同情中國的立場。

1927年蔣介石領軍北伐，張麗俊對戰況頗為關注，在日記中收錄報載的戰情，國民軍佔領南京、顧維鈞退位、孫傳芳預備逃脫等，¹⁵²以及革命軍攻入北京時，張作霖坐火車欲退回奉天卻慘遭炸彈攻擊。張麗俊認為張作霖係一時之雄，其若死亡，徒讓帝國主義者胡為。¹⁵³1928年中國南北統一後的首次雙十國慶，張麗俊作〈祝中華雙十節國慶日聯〉之對聯賀之，其聯曰：「十節慶成雙日月重光推上國 三民稱統一河山萬里屬中華」，¹⁵⁴表達他對中國統一的欣喜。

¹⁴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135。

¹⁴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136。

¹⁵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185。

¹⁵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257-259。

¹⁵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179、209、211-212、225。

¹⁵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373。

¹⁵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432。

國民政府五院成立後，張麗俊日記抄錄報載五院院長和副院長姓名。¹⁵⁵1929年孫文遺體自北京西山移靈，葬於南京紫金山，張麗俊在日記上讚譽孫文為中華民國第一偉人，記云：「原是寒儒，首倡三民主義〔義〕，打破帝國主義〔義〕，致大清國始祖順治滿州〔洲〕人入中華為漢民族皇帝，傳至第十代宣統帝三年歸民國，計二百六十六〔八〕年天下，一旦退歸滿州〔洲〕，寔由孫先生出身犧牲，社會磨折頓挫，經三十年不改初心。」¹⁵⁶表示：「葬禮時各大國俱派大使至南京大禮堂弔輓，歷代帝王恐未有如此之光榮也。」¹⁵⁷

1930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聯合反對蔣介石，另成立政府於北京，雙方爆發戰事，是為中原大戰。¹⁵⁸張學良也成立政府於奉天，統一的局面又告瓦解。張麗俊感嘆中華民國又分裂成三國，¹⁵⁹並曰：「中華首腦如此不合，自相魚肉，國體殘傷，人民塗炭，何以威列強而安百姓乎。」¹⁶⁰

隔年九一八事變爆發，9月19日張麗俊即在日記中記下夕刊新聞的號外，曰：「昨夜日本私自出兵萬人，暗襲中華東三省滿州長春地方。」¹⁶¹指出：「事件的起因在於滿鐵利權的爭奪。」¹⁶²張麗俊持續關切此事變的後續發展，紀錄日華關係惡化、國際聯盟要求日本退兵等動態。¹⁶³總結道：「中華與日本為滿洲事件，日本出強硬手段，將吉林、長春、黑龍江三省要地出兵佔領多處，而中華副司令張學良只守國際聯盟不戰條約，故理事會自起事至今開會不知若干次，雖命日本當退兵，日本不遵其命，中華恃國際聯盟，而理事會愈會愈冷淡，終

¹⁵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434-435。

¹⁵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54。

¹⁵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54。

¹⁵⁸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2）。

¹⁵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265-266。

¹⁶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173。

¹⁶¹ 應是日本藉口柳條溝鐵路被炸，強佔瀋陽，而非長春。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588。

¹⁶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428。

¹⁶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437、439、443-444、450、456-457。

不可恃；而且國內各首腦爭雄，山東韓復榘、山西閻錫山、馮玉祥死灰復燃，舊軍閥孫傳芳等欲扶段祺瑞出為盟主，創新政府於天津，反蔣介石、張學良，而廣東派陳友仁、孫殿英等前為日華滿洲事件，既與南京政府總司令蔣介石和會，今又唱獨立，吁！外侮未平內亂又作，等何時中華有平和之日也。」¹⁶⁴

日本佔領東三省後，1932年又攻擊上海，日強華弱的態勢明顯，但蔣介石看似無所作為，張麗俊不知他是因未握大權，抑或別有妙策。¹⁶⁵此後他持續留意上海事件的發展，但他對報紙的報導也非全盤接收，根據連日來報紙都報導日軍得利，攻某處佔何地，現忽刊駐上海公使重光葵¹⁶⁶對上海市長吳鐵城¹⁶⁷及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要求停戰。他認為既連連得勝不該提出停戰要求，想必是日軍進退不能，「已陷入羝羊觸藩之勢。」¹⁶⁸日記中對中日戰局的最後記載，是提

¹⁶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463-464。

¹⁶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494-494。

¹⁶⁶ 重光葵（1887-1957）：日本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日本大分縣人。東大畢業後進入外務省服務，1931至1932年擔任中國公使，上海事變停戰協定簽約前，因遭朝鮮獨立運動者投擲炸彈而失去單腳。後任駐蘇聯及駐英大使。戰爭時任中國大使實施對華新政策。1943年任東條改造內閣外相，小磯內閣時留任並兼大東亞相。戰後成為A級戰犯，被判7年禁錮刑，公職追放解除後，1954年任鳩山內閣的副總理及外相，1956年任日本駐聯合國代表。曾當選三回眾議院議員。上田正昭等監修、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日本人人名大辭典》（東京：三省堂，2001四版），頁636。

¹⁶⁷ 吳鐵城（1888-1953）：廣東香山人。1908年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任九江軍政府參謀次長兼外交部長。1915年奉命赴檀香山主持黨務，並任華僑《自由新報》主筆。1921年任大本營中將參軍，旋獲選為中山縣縣長。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十七師師長，後任上海市長、廣東省主席、國民政府海外部長、中央黨部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後病逝於臺北。李盛平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頁300。

¹⁶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14。事實真相是上海日軍司令植田謙吉於2月18日向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提出6項要求，限於2月20日下午5時前自現防線向公共租界東西兩方各撤退20公里，並將該區域內軍事設施，永久卸除。同時日總領事以同樣要求照會上海市長吳鐵城。翌日蔡廷鍇和吳鐵城分別駁回日軍的要求。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139-140。

及國際聯盟理事會由立頓卿（Lytton，李頓）撰寫的事件報告書，¹⁶⁹結論甚不利於日本。¹⁷⁰

由前述張麗俊對中國時事的紀錄可知，他始終站在同情中國的立場。辛亥革命爆發時，雖惋惜滿清皇朝的終結，但民國成立後仍轉而支持民國，譴責袁世凱的賣國。蔣介石北伐成功後，他替中國的統一感到欣喜。中原大戰時，對中國再次陷於分裂感到遺憾，頗有恨鐵不成鋼的態勢。值得注意者為，九一八事變之後，他雖極為關心局勢的發展，但由於身為日本殖民地人民，故未對日本的侵略提出批評；在行文間，他稱中國為中華、日本為日本，而未以我國稱之，似乎以第三者的立場來看兩方相爭，但對中國流露出較多的同情，這顯示傳統文人雖接受日本統治的現實，但情感上仍無法與中國完全切割。

林獻堂日記首先提及 1927 年其旅行至倫敦時，閱報得知蔣介石兵敗，南京失守，帶著殘卒 600 人赴上海，宣布下野，他聞之不快終日。¹⁷¹之後又記下中原大戰中央軍大敗，蔣介石又將下野，並說中國事情變幻真是難測。¹⁷²林獻堂平日也常與友人雜談中國時事，蔣渭水曾與他談及中共在江西之跋扈；¹⁷³謝廉清則告以蔣介石、張學良 1931 年秋冬之間必定開戰。¹⁷⁴顯示其對中國的關心。

¹⁶⁹ 國際聯盟派遣調查九一八事變的調查團，由英、美、法、德、義五國代表組成，由英國人李頓擔任團長。1932 年 2 月在中國東北等地調查後，於 9 月 4 日提出報告書，認為「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指出九一八事變前日方「確有充分計畫以應付中日間萬一發生之戰事，此計畫於 9 月 18 日至 19 日夜見諸實行」。日軍在九一八事變中的軍事行動，不能認為是「合法的自衛手段」，「滿洲國」是日本製造的傀儡政權。1932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6 日國聯召開理事會和全體大會討論李頓報告書。12 月 12 日組成 19 國委員會，於 1933 年 2 月 28 日通過李頓報告書的建議，3 月 27 日日本政府因報告書不承認滿洲國而退出國聯。

¹⁷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151。

¹⁷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165。

¹⁷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180。

¹⁷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108。

¹⁷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126。

九一八事變後，林獻堂最初認為日本若僅因中村震太郎大尉被中國軍方所殺，¹⁷⁵即佔領奉天，未免小題大作，甚望日軍佔領範圍不再擴大。¹⁷⁶其後，得知廣東政府要求蔣介石辭退政府主席僅任陸海軍總司令，才願與國民政府合作，舉國一致對付日本。林氏認為果能如是，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¹⁷⁷可見他仍期望中國出現統一的局面。

林獻堂也曾與蔡培火、林幼春談論九一八事件的起因，林、蔡兩人皆相信此為日本軍部單獨之行動，日本內閣並未參與其中；林幼春則認為軍部與內閣同謀，不過表面上由軍部負責而已。林獻堂表示此種見解亦未嘗不是，若果真如此，日本可謂極為處心積慮。¹⁷⁸

事件隨後日益擴大，為掌握更多資訊，林氏還收聽上海廣播，得悉中國代表施肇基¹⁷⁹在國際聯盟理事會攻擊日本在滿州之強暴行為，並言中國不久將實現南北統一之政府。¹⁸⁰當收到郵差送來的報紙時，迫不及待的「急閱」，足見他對於局勢的強烈關心。¹⁸¹其後，國際聯盟理事會出面調停、滿州獨立、宣統帝在奉天即位、¹⁸²日本出兵上海¹⁸³等演變都抄錄在他的日記中。

¹⁷⁵ 1931年6月27日，日本參謀部陸軍步兵大尉中村震太郎，到滿州進行兵要地誌調查，途經禁止日本人進入的洮索地方時，雖偽裝成蒙古人，仍被關玉衡指揮下的屯墾軍第3團的中國兵識破，與同行者均被射殺。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編輯委員會，《日本近現代史辭典》，頁484。

¹⁷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299。

¹⁷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03。

¹⁷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09。

¹⁷⁹ 施肇基（1877-1958）：浙江人，民國前最後一任簡放美、亞、秘大臣。1912年任交通總長，1915年任駐英全權公使，1921年駐美，1923年任外交總長，再回任駐美。1930年起任出席國際聯盟中國全權代表兼國聯理事會中國全權代表，1933至1935年又駐美，1935年6月升格為大使。《中國現代史辭典》，頁212。

¹⁸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22。

¹⁸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35。

¹⁸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58。

¹⁸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53。

上海一二八事變後，林獻堂與莊嵩共同閱報，談論日華上海戰爭之狀況，得知日本內閣決定再派遣三師團赴上海，認為不久上海將有大戰爭。日軍攻擊吳淞砲臺未攻陷，日軍損失頗多，而由中國歸來之旅客謂日本軍艦被擊沈三艘，中國軍亦未可輕視。¹⁸⁴1933年2月底日本軍進攻熱河，戰線日漸拉長，林獻堂遂憂心日華紛爭恐非5年後不能解決。¹⁸⁵3月底日軍出關，顯示日本將佔領北京、天津，林氏預感事態糾紛將不可收拾。¹⁸⁶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林獻堂從隔日的報紙號外報導中得知此事，¹⁸⁷從此日起至8月22日止，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林氏的日記每天大篇幅摘譯報紙上關於戰局的報導，¹⁸⁸後來覺得自己日文程度不足，翻譯頗為費事，打算將此時間用來學習日語，才作罷。¹⁸⁹由上充分顯示林獻堂警覺到盧溝橋事變為空前的變局，必須密切注意。

四、小結

綜合前述，傳統文人仍保持與中國文化界的交流，除從書局進口的書籍雜誌了解其發展現況外，梁啟超、楊草仙、江亢虎等中國文化人來臺時，也受到傳統文人熱烈的歡迎。他們對於中國局勢的變化極為留意，義和團事變、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等重大事件均是其吟詠的議題。張麗俊和林獻堂的日記上抄錄不少報紙上讀到的中國重要訊息，林獻堂更在盧溝橋事變後逐日大篇幅翻譯報紙的記事，足見其重視的程度。當中國統一時他們感到欣喜，並有所期望；當中國陷於分裂戰亂時，又頗感遺憾，顯示其對中國存在難以切割的情感。然

¹⁸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79。

¹⁸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71。

¹⁸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22。

¹⁸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236。

¹⁸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236-309。

¹⁸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310。

而，身為日本臣民，對中國除了情感上的支持外，實難以有所作為；七七事變後，並未明白譴責發動侵略的日本，流露出立場上的矛盾。

第三節 對中國之實際體驗

一、中國的旅遊經驗

如前節所述，傳統文人常在詩文中流露出對清代的緬懷及對文化祖國—中國的嚮往，此種嚮往自然會成為其前往中國一探究竟的動力。例如張麗俊於1911年原打算與友人前往廈門、廣東、香港等名勝地，但因葫蘆墩支廳長長城與熊認為其並非商人，往清國諸多不便，不肯代為申請護照而作罷。¹⁹⁰可見當時臺灣人並非隨意可至中國，必須持有官廳發給的護照才能成行。¹⁹¹

閩臺間原有血緣、貿易往來等密切的關係。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政府雖給臺灣人2年期間自由選擇國籍，但最後選擇清國國籍而離開臺灣者畢竟有限。¹⁹²臺灣人雖然國籍改變，但仍必須到中國大陸去貿易、探親、進香、掃墓。此外，隨著1898年5月日本強迫清廷發佈福建省永不割讓的宣言，福建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自東北、東南對中國展開鉗形的侵略，臺灣總督府更有意取得侵略福建的主導權，雖然未成功，但臺灣人隨著日本人前往中國大陸各地有逐漸增強之勢。¹⁹³

¹⁹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39、44。

¹⁹¹ 1900年10月6日，臺灣總督府發佈外國旅行券規則，1907年10月30日再廢止前述規則重新發佈，規定臺人凡欲至中國及其他外國旅行者，事先均需填寫申請表，並附上戶口調查簿之抄本及最近半身相片兩張，以申請旅行券。梁華璜，〈日據時代臺民赴華之旅券制度〉，《臺灣風物》39：3（1989年9月），頁1-49。

¹⁹² 據楊永彬的研究指出，在此際約有100,000人離開（包括非臺籍的官吏及士兵），其後有50,000人再回臺定居，30,000人則因中國動亂及臺灣總督府的優待政策而回臺，其中離開臺灣不再回臺的有20,000人。而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則稱臺北縣有1,574人，臺中縣有301人，臺南縣有4,500人，澎湖有81人，共6,456人，離開臺灣。參見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關係—1895年-1905年〉，頁71-74。

¹⁹³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臺北：中研院社科所，1999），頁695-733；許雪姬，〈在北京的臺灣人，1937-1947〉，未刊稿。

因此，日治時期曾前往中國旅遊且留下文字記錄的傳統文人不在少數，周維金、¹⁹⁴洪棄生、傅錫祺、王石鵬、魏清德、王達德等人均有之。黃旭東於1913年旅遊上海、天津後，因病客死東京；¹⁹⁵林癡仙、林仲衡曾在日本領臺之初滯留中國大陸多年；蔡惠如、林子瑾、吳子瑜、連橫等人則長期在中國定居投資。這些曾至中國的文人對中國的實際體驗及印象為何，乃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課題。

（一）周維金、林癡仙、林仲衡

周維金於1920年前往浙江、江蘇2省旅遊2月餘，歸臺後集結其遊歷見聞詩作編為《大陸記游》一書，¹⁹⁶其詩大多是歌詠中國崇山峻嶺、巨川大河，似乎沈醉於中國秀麗的風光中，未對中國現況多作敘述。例如描寫姑蘇景色為：「姑蘇大地集華繁，風景維新實可誇。我愛小樓幽僻處，半村半郭半人家。」¹⁹⁷然而，有不少文人卻經由實地造訪，目睹中國較黑暗的一面。

張靜茹以林癡仙、連橫、洪棄生為例，分析他們的上海經驗對其身份認同追尋的影響。指出傳統文人與上海接觸確實滿足了部分情感需求，然而近距離觀看也使他們發現更多意料之外的現實，亦即是中國其實不如想像中強盛、上海光鮮亮麗的背後隱含更多墮落及黑暗、列強對中國的野心及掠奪行為比想像

¹⁹⁴ 周維金：字貢南，號省園主人，新竹人。與鄭虛一、鄭拱辰等人相善。篤信佛教，1920年至中國江浙旅遊，並至普陀山朝聖。力倡精神修養論，除撰寫多篇國民性相關論述外，更曾以〈國民性〉為題，舉辦全臺師鐘徵稿。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頁106-107；「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作家資料列表」。

¹⁹⁵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9；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452。

¹⁹⁶ 周維金，〈大陸記游自序〉，收於周維金，《大陸記游》（臺北：老古出版社，1979），頁7。

¹⁹⁷ 周維金，〈佚題〉，收於周維金，《大陸記游》，頁233。

更爲嚴重、人民缺乏團結及反省之心等，在在強烈衝擊了傳統文人的自我認同。¹⁹⁸

特別是林癡仙，目睹中國慘遭列強欺凌瓜分，又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領導，似乎難以再興，乃嘆道「神州又破碎，瓜剖議早傳。既無中流柱，何以迴狂瀾。」¹⁹⁹林仲衡亦有類似的看法，其〈題支那輿圖〉云：

憂時誰挽魯陽戈，城下頻聞割地和。不敢披圖重指點，殘山賸水已無多。
200

〈感事〉第二首又云：

艱難時事竟何如，多少人民失所於。漢室屢聞徵賈誼，秦庭未許哭包胥。
和戎自古言猶在，割地連年計總疎。無復太平全盛日，京華北望淚沾裾。
201

然而，對於中國的衰敗，自己卻完全無能爲力，失望之餘，只想覓得武陵源，安穩過生活。〈秋日感事〉一詩反映他的心聲：

故園東望戰雲屯，旅館秋風欲斷魂。黯淡灘邊沈白骨，崑崙山上哭征冤。
時艱蒿木無良策，世事關心有罪言。寄問舊時諸父老，避秦可覓武陵源。
202

¹⁹⁸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

¹⁹⁹ 林癡仙，〈歸里書懷答賴二悔之紹堯即次原韻〉，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63。

²⁰⁰ 林仲衡，〈題支那輿圖〉，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61。

²⁰¹ 林仲衡，〈感事〉，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26。

²⁰² 林仲衡，〈秋日感事〉，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70。

因此，滯留中國多年的兩人思慮再三之後，決定重回臺灣，將臺灣當成武陵源，作為永久定居之地，如同林癡仙所云：「沈吟復沈吟，五噫歸故關。直將蓬萊島，視作武陵源。」²⁰³

（二）魏清德和王石鵬

1911年1月2日魏清德與鄭神寶、鄭鵬雲一起參加「南清觀光團」，赴廈門、汕頭、廣東旅遊；復於1915年9月14日至翌年1月7日，被臺灣日日新報社派往福州擔任《閩報》²⁰⁴記者，²⁰⁵因此對福建的社會百態有所認識。在他眼中，閩省是個人民因家族專制而缺乏進取氣象、衛生及醫療落後致花柳病盛行之地，廈門的市街不潔，道路狹窄，尤其夏天下水道及豚畜鹽魚大小便的惡臭，最令人難受。²⁰⁶

至於中國，由於數千年來實行專制，以嚴酷之吏治理百姓，成為一個十分落後而為天下笑的國家。²⁰⁷今後必須改革政治、開發民智、增殖富源，方能有

²⁰³ 林癡仙，〈歸里書懷答賴二悔之紹堯即次原韻〉，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63。

²⁰⁴ 閩報：原係福州人黃乃裳經營之《福報》，1897年12月，因「東亞同文會」（設於上海）駐福州會員宗方小太郎及井手三郎之倡議，開始接辦，並改名為《閩報》。1899年5月起，由「東亞同文會」撥款補助。1900年5月起，由臺灣總督府補助，並指定前《臺灣日日新報》社長赤石定藏接辦。故其為臺灣總督府經營之報社，以擁護日本政府對福建之政策為宗旨，故不為中國人接受。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對福建省的新聞政策》，收於梁華璜，《梁華璜教授臺灣史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7），頁148-152。

²⁰⁵ 魏清德任《閩報》記者前，王石鵬曾賦〈送潤庵詞宗轉駐閩報館〉一詩贈之：「歐西烽火正紛紛，載筆南遊氣吐雲。得地羨君堪用武，交鄰有道丈斯文。八閩風月應多趣，大陸衣冠可以群。別去定添秋後感，蒼霞露白望殷勤。」《臺灣日日新報》，第5484號，大正4年9月28日，頁6。

²⁰⁶ 潤庵生，〈旅閩雜感（廿一）〉，《臺灣日日新報》，第5628號，大正5年2月27日，頁6。

²⁰⁷ 潤庵生，〈旅閩雜感（其九）〉，《臺灣日日新報》，第5612號，大正5年2月10日，頁6。

望。²⁰⁸特別是他前往香港，登上太平山之後，目睹山上到處聳立著宏壯廣大的洋樓，且某些洋樓已設有升降梯的進步景象，不禁感嘆：「如此江山，支那人之所棄置，英人之所垂涎；支那人之所失敗，英人之所成功。」²⁰⁹言下之意是香港若非割讓給英國，根本無法享有今日進步的成果，誇讚英人建設之功，而直指中國政府無能。

目睹福建的落後，魏清德反思臺灣雖然住民多為閩省漳泉移民，20年前臺灣社會之組織、文物衣冠之制度，依然為閩省分身，但如今因吸收世界文明之思想潮流而快速進步，舊時之固陋已淘汰殆盡，其中的關鍵在於日本的「文明化」治理。因此，魏氏呼籲臺人奮力留學日本，或負笈歐美，以學習高等之學問，成為國家有用新附之民。²¹⁰

1903、1925年王石鵬兩度遊歷中國，²¹¹第一次前往閩南，發覺原為鄭成功駐軍的鼓浪嶼，如今已淪為萬國公共租界地，不免心生感嘆；²¹²第二次前往上海、蘇州、南京、濟南、天津、北京等地。至天津租界時，目睹當地華洋雜處的情景，不禁惋惜乾嘉盛世已成過往；²¹³在參觀故宮後，寫出「卻笑皇居同逆

²⁰⁸ 潤庵生，〈旅閩雜感（十四）〉，《臺灣日日新報》，第 5619 號，大正 5 年 2 月 18 日，頁 6。

²⁰⁹ 潤庵生，〈南清遊覽紀錄（十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845 號，明治 44 年 2 月 4 日，頁 1。

²¹⁰ 黃美娥，〈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啓蒙論述〉，《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205-212。

²¹¹ 黃美娥，〈帝國魅影—樸社詩人吳石鵬的國家認同〉，《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362-366。

²¹² 王石鵬，〈登鼓浪嶼懷鄭延平王〉，《臺灣日日新報》，第 1510 號，明治 36 年 5 月 15 日，頁 1。詩云：「延平王氣已全無，小嶼彈丸列海隅。萬國衣冠爭競地（自註：新議為萬國公共地），四圍山水自然圖。洋樓架石凌雲起，鐵艦隨波向港輸。鼓浪有聲人不見，臨風遙憶淚沾濡。」

²¹³ 王了菴，〈天津租界〉，《臺灣日日新報》，第 9138 號，大正 14 年 10 月 16 日，頁 4。詩云：「彼疆此界任休差，胡越居然合一家。大地已無乾淨土，不堪往事憶乾嘉。」

旅，滯留仍是不多時」²¹⁴「上林花木誰爲主，付與遊人弔夕陽」²¹⁵的詩句，顯示其心目中清朝已滅亡，僅餘故宮及上林花木供遊人賞玩。目睹中國的衰敗，其祖國情懷已頗爲淡薄。

魏清德和王石鵬均受過新式教育，他們都是透過比較的觀點看中國，既與臺灣比較，也與日本比較，以「近代化」的標準衡量中國，而有較爲負面的評語。特別是魏清德，認爲臺灣住民多是福建漳泉移民，20年前閩、臺兩地社會的發展雖相似，但如今臺灣在日本治理下吸收新文明而快速進步，福建則依然停滯不前；而香港亦是在英國的治理下才進步繁榮。透過「近代化」的標準，中國社會成了落後的代名詞。

（三）傅錫祺

傅錫祺也曾於1925年6月10日至翌年6月8日、1926年9月至隔年3月10日兩度前往中國，探視其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青島開業的次子傅春鐘。第一次順道至北京協助林子瑾的商務，第二次則往遊杭州西湖，獲觀有名之四庫全書。²¹⁶不過在中國前後停留年餘的傅氏，對中國的印象是風土民情、行政甚爲劣敗。²¹⁷由於當時中國內有軍閥割據和黨派紛爭、外有列強欺凌，故他驚覺「驚人烽火滿中州」，²¹⁸在〈天津有感次林君子瑾韻〉一詩中寫道：

²¹⁴ 王了菴，〈觀燕京諸宮殿〉，《臺灣日日新報》，第9138號，大正14年10月16日，頁4。詩云：「巍峨宮威壯邊陲，四代爭雄國祚移。卻笑皇居同逆旅，滯留仍是不多時。」

²¹⁵ 王了菴，〈遊北海即西苑清之故宮在焉〉，《臺灣日日新報》，第9138號，大正14年10月16日，頁4。詩云：「帝業消沈剩故宮，離離禾黍總堪傷。上林花木誰爲主，付與遊人弔夕陽。」

²¹⁶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377-378。

²¹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56。

²¹⁸ 傅錫祺，〈臘月望日天津舟上留別林君子瑾謝君春池〉，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123。

筆誅誰復畏春秋，此輩都應付濁流。兵火蔓延無淨土，犁鋤曠廢有荒丘。
忍空民室將何為，除寄人籬不自由。後顧茫茫吾欲哭，可憐至死未知愁。

219

指出中國因戰亂土地拋荒，人民流離失所，必須居住外國租界才能得安全。

1926 年年底，吳子瑜將有中國大陸之行，張麗俊知情後，乃和其〈將遊大陸〉詩。詩中雖盛贊中國向來多名勝，鼓勵子瑜宜仔細參觀，並以自己未曾前往為憾，²²⁰但亦表示「驚心異種相魚肉，慘目同胞動甲兵」、「羞他鸚鵡堅持輩，割據瓜分淚欲盈」。²²¹顯示張麗俊雖從未前往中國，但對中國的時事一向極為關心，因此，認為中國正處於動亂與割據。

不過，對於中國動亂現況知之甚詳的傅、張兩人，並未斬斷中國的情感。傅錫祺有幾個兒子前往中國發展，他卻從未阻止他們前往。除前述在青島開業的次子傅春鐘外，六子傅春鐙於 1937 年 10 月赴滿洲參加醫師考試，²²²長子傅春魁於 1927 年赴爪哇泗水市開業前也曾在中國就業。²²³張麗俊四子張世垣和六子張世翰兩人，亦於 1927 年聯袂赴浙江就讀私立醫專。兩人最初因漢文程度不足，學習困難；後認為該醫專虛有其名，一年之中休假日多達數百餘日，實習亦只半年，故翌年即返臺。²²⁴顯示傅、張兩人並未對中國嫌惡背棄，仍然認為是個可以嘗試發展的地方。

（四）王達德

²¹⁹ 傅錫祺，〈天津有感次林君子瑾韻〉，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123。

²²⁰ 張麗俊原詩為：「君定雄飛應吐氣，吾終雌伏寔懷慚。宗邦自昔多名勝，到處流連仔細參。」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08。

²²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09。

²²²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381。

²²³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 年 5 月 27 日，未刊稿。

²²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96、324-325。

與前述諸人相較，王達德對中國的觀感更為複雜，其遊記雖記下中國混亂失序的一面，但也敘及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力，並對旅中的臺人多所注意。早先，王達德認為中華為文明古國，地大而物博，名勝古蹟冠於東瀛；況且平日閱讀書報雖略悉中國情狀，然讀古人之陳跡，不若親歷之奇聞壯觀，故早已立志往遊。至 1923 年 9 月 4 日終於一償素願，前往上海、浙杭、南京、山東、北京等地遊覽，10 月 10 日始歸臺。

遊中期間，王達德曾至杭州西湖，其山水美景讓他耳目一新、胸襟大開；參觀蘇州虎邱山留園時，發覺此園以奇石點綴其中，其穿插之雅、佈置之妙，實為罕見，故被稱為江蘇第一。此外，亦至曲阜孔子廟、濟南大明湖、北京皇城和頤和園等過去只能見於書上之地遊賞，一飽眼福。

在旅途中，王達德目睹一些中國進步、開明的景象，與他過去的刻板印象顯然有別，令他頗感意外。首先是途經南京督軍署時，適有軍隊經過，乃停車參觀。只見此一隊伍軍裝齊整，隊伍堂堂，尤其最後四、五騎皆英姿颯爽、糾糾可畏。認為：「不愧為國之干城也，倘皆盡心國事，則以禦外侮、治內亂而有餘。或訾中國軍兵無紀律，今觀之始知有大謬不然者，故百聞不如一見。只可惜中國軍隊鬩牆不息，干戈迭見，此有心人所以不得不為之長太息者也。」因此，中國積弱的原因不在於軍隊無紀律，而在於內鬥不息。

其次，當時正逢曹錕因賄選而當選總統，因此南京各地均有學生組隊遊行街市，到處演說大吹大擂，一無顧忌。王達德認為蘇督齊燮元，為曹錕最得力之部下，如此激烈反對運動，必有官憲出面制止、拘禁。不料觀其終局，非但無一人被拘禁，且未有制止者，或許是齊督軍亦知民意所趨，不敢過於壓迫。如此則就尊重民權、尊重輿論言之，不無可嘉許。

再者，濟南城內交通雖熙熙攘攘，但行人皆由左側通行，不須官憲約束，實為可嘉。他反思臺灣實施左行多日，雖散發傳單、張貼告示，盡力宣導，而終不見諸實行，相較之下寧無愧色。

再次，參觀北京女子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時，在四年級二部班上正逢男老師在講授歷史，黑板上之說明多用英文。因此，留下中國英文發達，連中學校女學生亦然的印象。

不過王達德對於繁華的上海則不存好感，主因在於當地風氣的奢靡。上海的腐敗官僚往往每日徵歌選舞、酒地花天，或打麻雀、或吸鴉片，濫賭狂嫖，窮奢極侈，是以歌樓妓館櫛比鱗次，戲館、影戲院、遊藝場等娛樂機關亦多得不可勝記。然而，這些人潮擁擠的聲色場所讓他感到車馬雷駭，精神幾為之昏亂。同時，上海在繁盛的背後還隱藏許多春色，例如有「合歡公司，專為男女介紹，作秘密幽會之所，輕薄男子當成是獵豔之絕好去處，遂趨之若鶩；太太、奶奶、小姐等為及時行樂，亦置婦女道德於不顧，秘密前往。還有秘密活劇，納重資便得入覽，宣淫猥褻之態即一一活現於眼前。又有男妓院（以女嫖男）、裸體寫真館、房術研究會等，種種淫孽無奇不有。」因此，他認為：「十里洋場不啻為萬惡之魔窟，而如此的社會，直可謂之齷齪社會也。」

搭乘津浦鐵路由浦口至山東時，因 5 月剛發生臨城劫車案，土匪擄去外國人數十名，導致西人多方迫索賠償，甚至要求共管鐵路。因此山東省當局頗為注意鐵路的防範，每站皆有軍兵警護，無分晝夜，車中亦有軍士往來偵察，以防匪徒混入，一路乃能有驚無險。不過王達德對於中國招安匪首孫美瑤，且授其以旅長軍階的作法深感不以為然。他認為：「孫美瑤負固深山，殺人越貨在所不恤，今一旦授之以官級、位之以軍戎，他匪難免見而羨慕，爭思效尤，以為事愈弄大，得官亦愈大，則逞而走險者，亦無所懼怕，如是匪氛便難靖，居民亦難安。」

出車站抵天津後，即有旅館接客者數十人擁至，欲強取旅客之行李。因當地旅館接客皆持住宿票，書名旅館店號及住址宿費，旅客要宿其旅館者，即取其票。他日清算宿費，接客者可得一成，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甚至須勞動警方加以驅離。在混亂中，達德乃不加選擇，隨意取一票，至旅館後才發現設備既

不周，房屋亦不潔，被枕更是穢黑不堪，恐三年未洗。凡此在在均讓他搖頭再三。

雖然目睹不少中國落後混亂的一面，但是王達德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仍深具信心。例如中國人口眾多，謀職業者無處容納，以致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的流氓日多，逞而走險者遂不勝枚舉，因此匪徒極盛。加以普通人對於技術方面多不注意，即就學校而言，投考政治、法律學者，較諸學農工商者尤多，蓋因輕視實業之故也。但他看出，近來各地人士漸知重視實業，先後提倡獎勵，讓子弟入實業學校者逐漸增加，將來自可易於謀生，遊民便可因之減少，匪徒也可不再有。

此外，江浙兩省土地肥沃，惜農民耕法未精，惟知翻犁播種，而不知施肥之法，故雖沃野千里，仍不免流於荒蕪。但王氏指出近年當局已漸知宜改善農業，設農會、畜牧場、蠶桑改良會、植棉試驗所等。

王氏中國的觀察中最特別的是他極注意在中國的臺灣人處境。他曾拜訪在南京開設肫愛醫院的臺人蘇樵山，樵山原籍埔里，渡華已 6 年，除自行開業外，兼奉職省立醫院，為外科部長；其姪日省，畢業於東京明治大學，亦服務於當地審判廳，具有相當地位。王氏乃認為中國人胸懷豁達，視臺人如同胞，凡有真學問真技術者，一至該地不愁無優越地位，實為臺人之幸。

在津浦鐵路列車上，王達德與山東農業專門學校教授張仲緝也有一番筆談。張君告訴他：「中國是英語最發達之地，從婦人子女以至郵夫、茶房無不通曉；而中國與臺灣僅隔一衣帶水，故臺人之留學者捨此莫屬。況且中國生活費極低，月僅 4、5 金，便足以度日，有志向學者可不三思焉。」接著表示：「中國之有識階級對於臺島同胞視同兄弟，若能合為一氣，無論農礦商工諸產業，儘可合力開發，以圖振興。且依臺島同胞為媒介，亦可藉以舉日華親善之實。冀中國之利權，得與臺人共之，勝被外人所奪萬萬也。」他聽後亦深以為然，並感嘆閩南當地因部分臺人倚勢非為，導致中國人之惡感，視臺人如蛇

蠟，故不知者誤以為中國各省皆如是厭惡臺人。聞張君之言，始知世間事事物物皆不可以一概而論。

王達德也曾與旅居北京的臺人柯丁丑（柯政和）談及在京臺灣留學生概況，得知北京大學有臺人學生 10 餘名，加上他校留學生約 30 餘名。因臺人欲留學者必先學普通話，而北京為教育中心點，其語言較他處為純正，是以莘莘學子留學中國者大多集於此。王達德亦聽聞，1921 年以前臺人到京者不過 5、6 人，其後組織臺灣青年會，即以該會名義與教育當局交涉，優待臺灣留學生，因為臺人初蒞此地，語言不通，欲接受同等的入學考試，殊覺為難。交涉後乃准臺人比照華僑辦理，考試時優待 10 分。有此優待辦法，其後到北京留學者日多。況且北京為學界重地，優秀教員均集於此，所受各科目極開放，無差別隱諱，故欲求真正學問捨此莫屬。²²⁵

綜合上述，王達德對於中國的觀感可說與魏清德等人截然不同，雖然他對上海奢靡的風氣難以苟同，也目睹一些中國落後失序的面向，但他仍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是有希望的，也是臺人值得前往留學的地方，臺人也可與中國合作開發當地利權，達成日華親善。雖然王達德的觀感失之片面，對於中國的流民盜匪和農業問題的解決之道也過於樂觀，所獲得的資訊也不盡正確，但忠實呈現他對中國的想法。

二、長期定居中國的傳統文人

至中國長期定居和投資的蔡惠如、林子瑾、連橫等人對中國顯然懷有更深的情感；吳子瑜則長期往來於海峽兩岸，亦視中國為一個可以發展之處。不過前述諸人在中國的成就到底如何，且其至中國久住，是否全因民族情感，則需深入探究。

蔡惠如向來被歸類為是對中國懷抱極大期望的「祖國派」，此派人士將臺灣的前途寄託於中國未來的振興，因民族意識而嚮往中國，推崇中國有 4000 年

²²⁵ 王達德，〈漫遊大陸日記〉，收於王達德，《瘦鶴詩書集》，頁 244-287。

文化，而有反日的言行出現。²²⁶1917年蔡惠如擔任在山東高密市的高密製糖會社之專務取締役，並於1919、1920年間變賣家產，攜眷內渡，定居福州倉前山，經營水產業。此後直到他去世為止的10年間，雖仍持續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因治警事件入監服刑，但其事業重心已完全轉移至中國。²²⁷且於1922年1月，與在北京的臺灣學生聯絡，參與「北京臺灣青年會」；1923年10月12日，又在上海邀集旅滬臺籍學生10餘名，成立「上海臺灣青年會」。²²⁸

不過蔡惠如在福州經營的漁業公司卻極為失敗，導致其生活窮困，因為他本是收租吃產的闊少爺，既乏經驗，尤少地緣、人緣的幫助。²²⁹甚至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亦得知其落魄的消息而打算予以救濟。²³⁰蔡惠如回歸中國後卻必須仰賴臺灣總督府的援手，無異是一大諷刺。

吳子瑜於1910年代初期赴中國，先在上海、北京經商，又到石家莊開礦，1921年回臺奔父喪。翌年回中國大陸，參加「北京臺灣青年會」，²³¹後又來臺。1924年重九復遊大陸。吳子瑜早年在北京與同居人生下一名非婚生獨生女，故取名為燕生（北京古名為燕京）。在北京經商時曾與孫中山有過一段交

²²⁶ 此種說法是日本警務局在處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對運動參與者作分類，與蔡惠如同類的，還有蔣渭水和王敏川。與之相對的，是對中國未來不抱很大期望的「待機派」，他們較不排斥日本，認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要努力謀求自身利益幸福。不過他們是因中國的現狀令人失望才有此種想法，若他日中國強盛，也可能與前者有同樣的見解，代表人物為蔡培火、林呈祿，林獻堂、林幼春亦可屬之。山辺健太郎解說，《現代史資料 21 臺灣 1》（東京：株式會社みすず書房，1971），頁 108。

²²⁷ 謝金蓉，《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99-108。

²²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69、90-91。

²²⁹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10。

²³⁰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民國 95 年），頁 450。

²³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90-91。

往，故多次捐資襄助革命，顯示其具有中國情結。²³² 1937年4月，攜其女燕生移居北京，擬寄託於吳佩孚。²³³ 因經商之故，吳子瑜從此頻繁往來於北京、臺灣、東京三地。1937年9月為與三菱會社談生意，曾赴東京。²³⁴ 1938年3月底再至東京。²³⁵ 1939年4月、1941年4月和9月、1942年4月又短暫回臺。²³⁶ 但從1943年6月起又再度回臺定居。²³⁷

吳子瑜往返中、臺之間前後近20年，傅錫祺曾以「年年鯤島與幽燕，去來常如不繫舟」，形容其多次往返臺灣與北京兩地；²³⁸ 莊嵩亦以「吳君更熱中，迢迢向北京」，指出其經常奔逐往北京。²³⁹ 吳子瑜在華北可謂相當活躍，曾大力協助張深切取得護照，讓他能順利前往北京。²⁴⁰ 曾多次試圖在中國放手一搏，甚至舉家移居，可惜由於政局動盪等因素，而未獲大利，最終仍回臺養老。

²³² 許俊雅，〈櫟社詩人吳子瑜及其詩初探〉，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頁202-252。

²³³ 林獻堂為替吳子瑜送行，特別於4月17日在萊園召開擊鉢吟會，並邀傅錫祺、王石鵬、張棟樑、張玉書、莊嵩、林幼春為陪。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141。

²³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332-333。

²³⁵ 吳子瑜與吳燕生於3月31日至4月21日，停留於東京。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83、102。

²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161；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163、338；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121。

²³⁷ 依林獻堂日記所載，自1943年6月9日起，吳子瑜即頻繁出現，此時他應已回臺定居。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年6月9日至12月26日，未刊稿。

²³⁸ 傅錫祺，〈次韻小魯同社秋仲將之燕市留別之作〉，《鶴亭詩集下》，頁265。

²³⁹ 莊嵩，〈九日懷灌園東京小魯北京〉，收於莊嵩，《太岳詩草》，頁202。

²⁴⁰ 張深切當時在臺灣被日警嚴格監控，故想前往北京發展，後被刁難甚久，才得以成行。張深切著，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主編，《張深切全集卷12張深切與他的時代（影集）》，頁136-137。

林子瑾早年即旅居北京，任吳佩孚、閻錫山法政顧問及北京特別市長江朝宗之參事、吳佩孚大帥府僑務處處長等職，頗有一番作為。²⁴¹當時汪精衛等人要拉吳佩孚出山，李燼受託為此盡力，乃託林子瑾介紹，遂得認識，其影響力可見一斑。²⁴²1912年林氏東渡日本，後轉赴上海、天津，在天津經營事業，曾與黃興共同計畫創立農業銀行。²⁴³並曾作詩贈黃興，曰：「立國宗農信不舛，況經兵燹盡荒蕪。中原病久多孱弱，養血先當服首烏。」²⁴⁴顯示其支持黃興農業立國的理念。1924年林氏因引誘同姓女子，前往北京未歸，引起爭議。由於其行為失檢，櫟社友人林幼春主張先發檄文攻擊之，若仍不知悔改，便命其退社。²⁴⁵後於1930年4月櫟社的春會中，以「渡華多年，諒無再回臺之日」之理由，正式遭除名。²⁴⁶1937年初林氏因母喪回臺，²⁴⁷但又再回北京。由於在臺的名聲已損，林子瑾最後選擇化名林鷹，終老於中國大陸。²⁴⁸其較大的作為是起草北華自治之憲法，吳子瑜則定其旗為七星旗，²⁴⁹由此看來，林、吳兩人與中國的政治頗有關連。

連橫則於清末及民國成立後，先後有六次中國之行，曾於1902年在廈門主持《鷺江報》，1905年在廈門辦《福建日日新報》，1912年赴上海編《華僑雜誌》。後因工作無著，透過在吉林法政學堂擔任教席的謝介石之邀，聯袂赴吉林。介石又介紹《吉林時報》的兒玉利多與連橫認識，連橫乃與兒玉合編《邊

²⁴¹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頁122。

²⁴² 許雪姬，〈1937-1945年在北京的臺灣人〉，未刊稿。

²⁴³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頁122-123。

²⁴⁴ 林子瑾，〈與黃興（時同計畫農業銀行）〉，收於林幼春編，《櫟社第一集》，頁160。

²⁴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174。

²⁴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195。

²⁴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44。林子瑾之母為吳杏元，即吳鸞旂（吳子瑜之父）的妹妹，故林子瑾與吳子瑜為表兄弟。

²⁴⁸ 許雪姬，〈1937-1945年在北京的臺灣人〉，未刊稿。

²⁴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341。

聲》。²⁵⁰1914年連橫在北京任清史館名譽協修，1933年攜眷至上海定居，直至去世。

連橫不再回臺的關鍵在於1930年3月他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附和臺灣鴉片特許問題，撰文刊於《臺灣日日新報》，贊成核發新的吸食鴉片牌照，²⁵¹導致輿論譁然，陳懷澄認為連橫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²⁵²林獻堂認為連橫誣衊先民，以作趨媚巴結，又獎勵人人吸食阿片，實為寡廉喪恥之輩。²⁵³最後懷澄及獻堂的看法獲得櫟社多數成員認同，連橫遂遭櫟社除名。²⁵⁴由於他在臺灣已難以立足，遂從此定居中國大陸。

三、小結

綜合前述，臺灣的傳統文人對於文化上的祖國—中國多半仍心存眷戀，因此即使前往中國需要護照，但前往者仍眾多。他們常去遊歷的地點包括離臺灣較近的閩粵、繁華的上海、故都北京，及浙江西湖、山東曲阜等名勝。不過，認為臺灣在日本統治下已處於文明開化之境的魏清德，認為中國只是個古老落後的專制國度，而流露出身為文明人的優越感。尤其閩南雖與臺灣在文化上有相同的淵源，但其醫藥衛生落後的景象更襯托出在日本統治下臺灣的進步。因此，更加認同日本的統治。

其次，當時中國正逢內憂外患紛擾之際，是以傅錫祺在前往中國後，目睹戰亂造成的殘破，只以「種種均甚然劣敗」一語形容。但他對中國的感情並未

²⁵⁰ 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5），頁52。

²⁵¹ 連橫的文章為〈附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對此回問題致本社意見書一篇如左臺灣阿片特許問題〉，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10731號，昭和5年3月2日，頁4。

²⁵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76。

²⁵³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84。

²⁵⁴ 關於連橫遭櫟社除籍一事的經過，可參見廖振富，〈論連橫與櫟社之互動與決裂—兼論櫟社「抗日屬性」之再評估〉，收於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307-376。

因此完全消散，仍有多名子弟在中國發展。王達德對於中國的評價則較持平，雖對上海奢華的風氣不存好感，卻指出中國仍有值得臺灣效法之處，對其未來的發展也抱持樂觀。

再者，對中國抱持樂觀而前往當地投資定居的傳統文人境遇多不盡理想，蔡惠如的窮困甚至驚動總督田健治郎總督打算給予救濟；吳子瑜大半生來往於兩岸之間，最後仍選擇回臺養老，他們的中國夢都在對中國有深刻的接觸後粉碎。

總結而言，魏清德、王石鵬等受過新式教育、又到過日本的文人，他們的中國印象都以負面居多。相對的，傅錫祺雖目睹中國的動亂，但血緣文化上的情感並未消失，顯示其故國情懷的深刻。不過，由王達德的記述亦可觀察到，由於中國的生活費用低廉，入學考試對臺灣學生有加分優待，成為臺灣人可以尋求發展的地方。因此，對於前往中國定居和投資的傳統文人，未必可以全然用民族意識解釋其動機，市場獲利的誘因亦是原因之一。

第四章 傳統文人對西洋新文明之迎拒

第一節 對新物質文明之追求

臺灣與西洋文明的接觸始於清末的現代化建設，但真正普及於民間則在日治時期。臺灣接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同時，也從日本接受到西洋物質文明，火車、汽車、飛機、電燈、電話、留聲機、收音機及各種新式機械逐漸為一般人民熟知，並進入日常生活之中，奠定臺灣現代化的基礎。傳統文人向來奉儒家經典為圭臬，對這些新式發明抱持何種態度，是視為奇技淫巧而敬而遠之，或是熱切擁抱，實為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首先，筆者擬以張麗俊為例加以分析，蓋其日記中留下許多與現代性文明體驗有關的珍貴紀錄，是一個極佳的個案。其次，檢視傳統文人之「新題詩」，看其如何描摹新式機械發明，感受為何。

一、張麗俊的新式文明體驗

（一）新式機械

1900年3月吳德功北上參與揚文會時，和與會士紳曾應總督府之邀，順道參觀鋸木料所及樟腦製造所，對於鋸木料時機械橫鋸、直鋸，速度之敏捷感到讚嘆；包裝樟腦時隨包隨裝的效率，亦讓他作出「真佳製也」的評價。他又聽聞機器製腦、煮煙，外國未曾開設，皆由日本博士發明，功省力薄，真令人不可思議。¹因此吳德功對於現代的科技文明充滿仰慕之情，日本當局也藉此爭取傳統文人的認同。

¹ 吳德功，〈觀光日記〉，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遊記》，頁180-181。

至於張麗俊，由其《水竹居主人日記》可知，他對於新式發明向來抱持高度的好奇和興趣，常前往豐原附近的工廠遊玩，觀看機械自動運轉的情形，作為消遣。例如 1906 年豐原製麻株式會社成立後，股東之一的張麗俊即前往遊覽，在會社中親見機器隨水力運轉如飛，極其巧妙，為前所未睹而深受震撼。此後更數度前往，一看再看，看後均在日記重複留下「難以言語形容」的字句。²1911 年 10 月，他參觀位於臺中的帝國製糖株式會社，見其運轉機械奇巧，完全超出他所能想像的範圍，遠超過豐原製麻株式會社。故他曰：「前我葫蘆墩創設製麻會社時，既見其巧矣，今見製糖會社，所謂觀於海者難為水，此語誠然乎哉。」³甚至 7 年後他再度造訪時，仍留下「其規模廣大，機關巧妙，雖親臨目睹尚不知其概，又安得以言語形容者」的評語。⁴

張麗俊也曾於 1915 年參觀羅安製造麵粉的工廠，見廠中製米粉、製大麵、揆土壘（碾米）、精米、磨麥粉、煮麥芽等種種機械安置巧妙，令人難解。在獲知羅安能不用技師而自行操作機械後，更是佩服不已，誇其智識誠有過人者。⁵1929 年 11 月他前往嘉義阿里山營林所，觀看機器裁木的情形，一樣深受吸引，在日記中記下「其機械之大、運用之巧，任是連抱大木，一經此機械通過便成零頭碎塊而已，其人工只顧機械之動息，裁木料之大小，一切免用力也。」歸後，並作〈嘉義製裁〔裁〕所〉一詩，云：「機關流轉滿床臺，連抱移來任剪裁。大小瓜分供世用，營林造就里山材。」⁶深切的體認運用機械可節省人工。

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136、202-203、224-225、276。

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124。

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66。

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213、352。

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19-120。

由前所述，可知初次接觸自動機械的張麗俊是如何瞠目結舌、大開眼界，對於這些超出他原本想像的器物，只能一再表示「言語難以形容」，甚至將觀看機器運轉當成是日常的消遣，一再前往獵奇，可知其確實深受吸引。

（二）電燈

對於能化夜晚為白晝的電燈，張麗俊亦極感興奮。電燈出現於臺灣，最早是清領時期巡撫劉銘傳於 1885 年聘請丹麥工程師裝設，起初只在衙門使用，後來臺北的主要街道亦有電燈，但數月後因費用太高，而加以縮減，只剩下衙門繼續維持，故劉銘傳的電燈事業只屬於小規模的試驗性質。⁷

日治之後，總督府廣設「電火所」，提供電燈能源。1900 年吳德功參觀電火所，並詳細記下其發光的原理：

置二鐵爐，日夜用土炭五千斤左右。日則燒炭以熬煙，夜則以燃電火也。電火用兩鐵車，一輪轉動，用皮帶牽動彼輪，二輪互轉數次而火由鐵管引入電燈。燈中數條白金線漸紅，而火即發矣。鐵管數枝：一分燃總督衙門，一分民政局衙門，一分測候所、衛生所等處也。⁸

可見他對電燈有極大的興趣。

張麗俊所居的豐原出現電燈，始於 1914 年舊臘月除夕，但張麗俊直到 2 月 3 日夜，和諸保正至區長家晚餐畢返家時，才目睹市街燈火照耀之景。豐原有此種新科技設施，張麗俊視之為墩街漸次繁昌的象徵。⁹其後，2 月 21 日夜舉辦電火開通祝賀會，由日本人捐金 80 餘圓、臺灣人捐金 150 圓，邀請梨園戲班及日

⁷ 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臺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9），頁 29-30。

⁸ 吳德功，〈觀光日記〉，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遊記》，頁 176。

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6。

人女優前來表演，並開辦筵席，有藝妓和酌婦侑酒。宴畢，張麗俊行至街上，看見臨時加裝了許多電燈門、電燈柱，照耀如同白晝，而紅男綠女處處接踵挨肩，欣賞電燈照耀的景觀猶如嘉年華會一般。當夜，張麗俊高齡 80 歲的母親亦外出觀看，張麗俊認為八旬老人而能看到平生所未睹之奇觀，堪稱幸福。¹⁰可見張麗俊認為電燈開通是千古未有之奇觀，能恭逢其盛是何等幸運之事。作〈電火〉一詩，寫道：「黑夜能教白晝同，人工巧更奪天工。微明氣管分兄弟，遠近傳繩別母公。」¹¹充分表達出他對此種能將黑夜變成白晝的新發明之讚嘆；同時，亦顯示張麗俊雖未受過新式教育，但對電燈的原理也有相當的認識。此後，電燈也運用在廟會或建醮裝飾上，豐原的彩壇或戲臺多會加點臨時電燈，更添熱鬧，張麗俊看來其光芒更勝於月亮。¹²

然而，前述電燈照明屬於城市的公共設施，除觀賞外，並未影響到張麗俊的家居生活，蓋當時電燈仍屬奢華的用品。他所居住的下南坑直到 1934 年 2 月才開始豎立電柱、牽電線，距離豐原街道裝設電燈整整相隔 20 年。張家於 2 月 25 日牽好電線，27 日正式開啓電燈，從此夜間在家中也能享受照耀如同白日的樂趣。¹³

在電力的應用方面，1934 年 11 月，張麗俊趁至臺中參加全島產業組合大會之便，前往日月潭遊玩，並參觀日月潭發電所。在解說員講解下，張麗俊了解發電之水是引濁水溪之水入淨水池，穿五大山嶽隧道入日月潭，又從潭底穿 8、9 里隧道至山頂，埋五大鐵管，水再由千尺瀉下，沖動發電機飛轉，因水力極大，故發電之量可供全島之用。¹⁴對水力發電的原理已有所認識。

¹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12。

¹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32。

¹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191；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21。

¹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378-380、384。

¹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510。關於日月潭的水力發電工程，可參閱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的電力事業〉（台北：國立政治大

(三) 交通工具

臺灣的鐵路是清末劉銘傳任巡撫時，於 1887 年開始興建的，由基隆直達新竹，全長約 63 英里。可惜 1891 年劉銘傳離任後，即宣告停工，以致工程品質不甚良好，長度亦不足。¹⁵日本領台後，1900 年成立臺灣鐵道部，展開縱貫鐵路的修築工程，由南北兩地同時進行，北部以改修臺北、新竹間之路段為主，南部以打狗為起點，往臺南延伸，1908 年全線通車。¹⁶

張麗俊對奔馳於鐵軌上的火車也極有興趣，早在臺灣縱貫鐵路完成前，¹⁷他已有搭乘火車的經驗。1906 年 6 月，他與其母至彰化南瑤宮燒金祈願，即搭乘火車，目的是要讓老母開開眼界，領略火車之巧和位於豐原、二水鐵路間的大肚溪鐵吊橋之妙。他認為 70 餘歲之老人能見此往昔未見之物實為天賜，可謂幸運之至。¹⁸他平日也常到火車站閒遊，即使未能搭乘，但能多看這種能搭載乘客的「鐵龍」幾眼也好。¹⁹

1908 年縱貫鐵路完工後，火車成為張麗俊南來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他每次坐火車，總會慎重其事地一一記錄經過的站名及站數，例如由豐原到臺南共

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¹⁵ 〈臺灣的鐵路〉，《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240 卷，明治 38 年 3 月，頁 31。

¹⁶ 林淑華，〈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51-63。

¹⁷ 在 1908 年縱貫鐵路完工前，西部鐵路分成基隆至伯公坑（今苗栗縣境內）和葫蘆墩至九曲堂兩段，伯公坑至葫蘆墩之間，則以輕便車銜接。因為伯公坑至葫蘆墩之間山谷溪流交錯，不但有大安溪、大甲溪二大河流經，需要架設許多橋樑；三叉河、后里間又有山脈連綿，需連續打通隧道，故完工較遲。〈火車全通〉，《臺南教會報》，第 275 卷，明治 41 年 2 月，頁 16；林淑華，〈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之研究〉，頁 62-63。

¹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72-73。

¹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84。

24 站，由屏東到豐原共 36 站，²⁰似乎每一段路程都不容錯過。比較特別的是 1931 年鐵道部引進高性能的 8620 型和 9600 型機關車之後，快車的速度明顯提升，²¹張麗俊某次至基隆即選擇搭乘快車，體驗奔馳的快感。他詳細記下從豐原到基隆共有 35 站，但列車只停靠苗栗、竹南、新竹、桃園、臺北、八堵 6 站，其餘均快速馳過。²²隔年他又搭一次快車由豐原往臺北，12 時 42 分出發，3 時 55 分抵達，他甚為滿意，誇讚列車之速度比 10 年前更快三分。²³

張麗俊作〈氣車〉一詩詠道：「北去南來日夜同，運輸全部遍瀛東，木牛流馬人稱巧，制象行龍技更工。」²⁴顯示其相當推崇火車這種溝通臺灣南北以機械製作的木牛流馬。

張麗俊的好友傅錫祺，在其〈生平紀要〉也特別註明，1905 年 5 月縱貫鐵路開通至葫蘆墩，從此往來甚便，²⁵推崇火車縮短南北距離的功用。

櫟社詩人王石鵬也深切體認臺灣鐵路貫通後帶來的益處。首先，可收聲氣聯絡之便，利於運兵運械，將使匪害無所遁形，足以提升地方治安之效；其次，利於流通運送豐富物產，有益農、工、商業之活絡；再者，南北昔日溝通不易，文明發達、思想融合多受阻礙，從今人文輻輳，報紙易通，將能啓發無窮智識，獲致學業上的大進境。²⁶

²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7；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24-125。

²¹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臺北：臺灣古籍，2004），頁 163-164。

²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68。

²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339。

²⁴ 張麗俊，〈氣車〉，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32。

²⁵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374。

²⁶ 王石鵬，〈祝鐵道全通式〉，《臺灣日日新報》，第 3146 號，明治 42 年 10 月 24 日，頁 9。

至於更為先進的飛機，直到 1914 年才由日籍飛行家野島銀藏在臺北、臺中、嘉義等地進行試飛，²⁷從此，此種飛行工具才漸為大眾熟知。但野島在嘉義飛行時，因風力過強和機械故障，飛機竟從低空失事墜下，野島因而受傷。²⁸因此，早期的飛行危險性相當高。

張麗俊自然無緣搭乘飛機，平日也不易目睹，但他很留意這方面的資訊，從報上得知飛機為德國人發明，偶爾有飛機自上空飛過時，他也會抬頭看，不願錯過大開眼界的機會。1917 年 8 月 5 日午間，他在屋內休息，忽聞半空中有飛機凌空而過的聲響，便急忙到庭中翹首觀之，見飛機有如鳥形紙鳶，高沖雲漢，²⁹可謂百聞不如一見。

1920 年畢業於日本千葉縣伊藤飛行學校、並多次參加飛行競賽得獎的臺灣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³⁰（謝道隆之孫、謝春池之子），畢業當年回臺進行「鄉土訪問飛行」，掀起一股飛行的旋風。並趁機凱旋返回豐原老家，當地父老在聖王廟召開盛大歡迎會，³¹張麗俊乃作〈奉文達君飛行卒業榮歸〉七律，表達他對飛行的嚮往：

蓬萊弱水渡飛仙，世界分明在眼前。浪乘長風宗子願，霄常捧日葛公懸。

²⁷ 〈本島飛行の最終〉，《臺灣日日新報》，第 4988 號，大正 3 年 5 月 2 日，頁 7；〈本島最終飛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4989 號，大正 3 年 5 月 3 日，頁 6。

²⁸ 〈飛機再墜第二次墜落田裡野島氏負擦過傷〉，《臺灣日日新報》，第 5004 號，大正 3 年 5 月 18 日，頁 4。

²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70-71。

³⁰ 謝文達（1901-1983）：臺中中學畢業後，赴日投考千葉縣伊藤飛行學校。1923 年投效中國空軍，歷任河南國民軍航空隊長、南昌機場場長、廣州航空學校教官，後任汪政權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1945 年回臺，後任臺灣省議會專門委員共 17 年。高麗鳳總編輯，《臺北人物誌》（臺北：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頁 78-83。

³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02。

鵬程萬里天嫌窄，鶴駕三臺地恨偏。問搏扶搖誰直上，欣君猛著祖生鞭。

32

1932年7月8日，根據報紙記載，一輛由臺灣民眾捐款建造的愛國飛機，由恆春起飛北上將抵臺北機場時，因機關故障而墜落，以致機體嚴重破損，駕駛受傷。張麗俊特別在日記中提及此事，足見其對飛機的好奇。³³

1936年8月16日，日軍飛行機在臺中大度山演習，開放一般民眾參觀，³⁴愛看熱鬧及新奇事物的張麗俊也不放過此一良機，立刻動身前往，而其72歲的大嫂林氏亦隨家族婦女同往，張麗俊認為年事已高的大嫂能親睹此一奇景，可謂飽眼福，亦可謂真幸福。³⁵

1930年之後，張麗俊日記中有許多關於摩托車的記載。摩托車不像火車和飛機讓他感到如此新奇，卻是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的代步工具，許多親友騎摩托車拜訪張麗俊，³⁶他自己亦有多次乘坐的經驗。³⁷不過，當時摩托車不似今日為私人所有且自己騎乘，而是如同計程車之類的出租車，可同時搭載多人，婚禮時且被用為禮車。³⁸然而，由於乘坐多人會有交通安全的疑慮，地方警察常出面取締。³⁹

³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303。

³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104。

³⁴ 此次演習是因臺中機場在16日舉行開場式，故乘機實施攻防演習。17、18兩日則在臺中州全境實施現地戰術，使民眾能學習應付空襲。〈臺中機場開場式後乘機實施空防演習屏東飛機七臺參加〉，《臺灣日日新報》，第13069號，昭和11年8月14日，頁4。

³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247。

³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172、248、316。

³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頁155、360；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7、12、211。

³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335、478。

³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303。

張麗俊亦有乘坐公車（巴士）的經驗。自 1919 年「自動車取締規則」發佈後，臺灣的公路運輸業快速發展，至 1931 年 6 月，道路里程數已達國、私鐵總和的三倍。⁴⁰1934 年 9 月 22 日張麗俊搭局營自動車，所謂局營，是指鐵道部交通局所經營。⁴¹臺中市有市營巴士，張麗俊往返臺中車站及吳子瑜怡園時也會利用，然而班次似乎並不密集，有次其等候近二小時班車仍不至。⁴²

（四）留聲機、廣播、電話

1907 年留聲機在臺灣開始流行，該年臺北和臺南已售出 62 臺，購買者多是酒樓、鐘錶店及俱樂部，其後漸普及於一般家庭。至 1912 年，留聲機的種類已有 10 數種，而曲板（唱片）有 6,000 餘種。⁴³

1908 年謝道隆向吳鸞旂⁴⁴借來一臺大留聲機，置於其泰和藥鋪中，張麗俊特別和友人往聽，欣賞「生姐唱和之聲，管弦合拍，以為洵稱絕妙也。」⁴⁵兩年後張麗俊在豐原街上的松興樓又有一次聆賞留聲機的經驗，這次聽見集正音戲

⁴⁰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頁 192。

⁴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480。

⁴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7、274。

⁴³ 〈留聲機熱〉，《臺灣日日新報》，第 4505 號，大正元年 12 月 17 日，頁 6。據葉龍彥等人的研究，臺灣的唱片工業是在 1920 年代前期萌芽，1925 年開始因推出低價唱片而較為普及，至 1920 年代末期蓬勃發展，而在 1930 年代達到鼎盛時期，「玩曲盤」成為當時社會名流和新興中產階級一項高尚時髦的嗜好或休閒。葉龍彥，《臺灣唱片思想起》（臺北：博揚文化，2001），頁 42-97；李坤城，《不插電聽唱片的時代—日治時期臺灣唱片文化發展漫談》，收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編，《聽見臺灣歷史的聲音》（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頁 5-8。

⁴⁴ 吳鸞旂：吳子瑜之父、林允卿的外甥，為臺中著名富紳。日治初期因助日軍平亂，1897 年敘勳六等，並獲佩紳章，翌年任臺中縣參事。1901 年任臺中廳參事。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80。

⁴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80。

大花、老生、小姐並管弦絲竹鼓樂等之口白與音曲，認為極其巧妙，可以用有聲無形形容之。⁴⁶

臺灣的廣播事業建立於 1928 年，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成立發射臺，在板橋建立送信所，負責發送訊號，另在淡水設立受信所，負責接收日本、中國和南洋方面的電波，在臺北市內則設有演奏所製作節目。⁴⁷但早在 1925 年，張麗俊已在豐原公學校收聽上海與東京的無線電放送，由於當時廣播系統在臺灣尚未建立，吸引了許多地方上的民眾，但由於男女雜沓以致聽不清楚，而覺得無甚見奇。⁴⁸第二次是 1932 年在呂天倫替其子辦的晚宴上，聽到無線電播放中國、東京及各名勝之地，並有演唱梨園歌曲之聲、鼓樂絲竹之音、議會之事等，俱從電箱傳入耳中，效果較前次好轉許多，故張麗俊以為是宴堪稱口饜佳餚，而耳聆佳音。⁴⁹

日治初期臺灣的電話線路僅限於軍用，1900 年後臺北、臺中、臺南設立電話局，開放民間申請裝設，但申請的 431 人全為日人。直到 1930 年，在 426 萬臺人中，僅有電話 3,737 支，可說並不普及，能裝電話者僅限於富豪階級。⁵⁰

1912 年張麗俊即使用過電話，利用電話與親友聯繫，但電話並非裝設在自宅，而是設在郵局的公共電話。⁵¹

此外，他也玩過望遠鏡。1935 年 5 月至友人張定居拜訪時，張定拿出望遠鏡，張麗俊便取來遠眺，感覺觀音山有如在目前。⁵²

⁴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407。

⁴⁷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68。

⁴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425。

⁴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33。

⁵⁰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臺灣の通信》（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35）。

⁵¹ 張麗俊 1912 年 3 月 5 日的日記記載：「晴天，往墩，到郵便局通電話與臺中襟丈林岱全，因他托〔託〕購笙竹故也。」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180。

⁵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59。

綜上所述，張麗俊對於機械、電燈、火車、飛機等西洋物質文明抱持高度的興趣，不放過任何觀賞及體驗的機會，甚至鼓勵高齡的母親和大嫂一同前往參觀，認為老人家有機會一睹此種奇景是幸運的。這些新發明引進臺灣之初並非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的事物，故備感新鮮。

二、新題詩中呈現的現代文明經驗

傳統文人對於西洋物質文明抱有濃厚的興趣，並有所接觸，因此，漢詩中有大量以寒暖計、眼鏡、望遠鏡、電線、電扇、留聲機、火車、飛機等為題的詩作，在《詩報》中此類新題材的詩作非常多，顯示傳統文人生活方式的轉變。

（一）寒暖計、眼鏡、望遠鏡

寒暖計即是目前所稱的溫度計，林獻堂的日記在記事之餘，同時記下當天的天氣及溫度，數十年如一日，顯示溫度計是他生活中的必備品。不過，當時用的是華氏，與今日不同。

傳統文人感到奇異的是小小的管中水銀上下流動，便能反映溫度的高低，林耀亭詠道：「巧製明珠置管窩，能升能降總無訛。」⁵³傅錫祺亦云：「玻黎小管界烏絲，下上寒溫感應奇。」⁵⁴正是描寫這種狀態。

不過，也有文人感嘆，溫度計雖然精巧能測知溫度，但仍無法測得人心冷暖及世態炎涼。例如謝雷明謂：「天氣寒溫猶可測，人心翻復最難評。」⁵⁵蕭林石⁵⁶亦云：「攝華妙器知寒暑，世態炎涼未測之。」⁵⁷

⁵³ 林耀亭，〈寒暑針〉，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 40。

⁵⁴ 傅錫祺，〈寒暖計〉，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90。

⁵⁵ 謝雷明，〈寒暖計〉，《詩報》，第 101 號，昭和 10 年 3 月 15 日，頁 12。

⁵⁶ 蕭林石：中壢以文吟社成員。以文吟社創於 1922 年中秋，以吳榮棣為社長。陳欣慧，〈文學與

至於眼鏡，傅錫祺〈眼鏡〉一詩寫道：「玉質比晶瑩，如龍正點睛。老年爭假借，小字辨分明。日月雙懸好，煙雲一望清。朦朧休便苦，最怕是心盲。」⁵⁸明白指出戴上眼鏡有利於閱讀小字，且可使眼前風景豁然開朗，猶如蛟龍點睛，此種功用如同許夢青云：「老來已失舊時容，每恨看花霧幾重。得汝別開新眼界，不愁山色淡和濃。」⁵⁹林仲衡亦云：「可是光明登佛界，眼前無礙又無遮」⁶⁰，均具體道出眼鏡對視力改善的幫助。林玉書年老時亦云自己「眼鏡常戴鼻」，⁶¹可見眼鏡已是普遍的生活用品。

關於望遠鏡，林子瑾云：「管底星晨如可摘，人間天上總難分」，王石鵬曰：「玻璃安置管成雙，能使遙山現客窗」、「從今眼界寬如許，海上何愁隱敵艘。」⁶²謝鐸庵⁶³則說：「千里江山來眼底，幾疑縮地法無雙」。⁶⁴均寫實地描述望遠鏡僅以玻璃巧製，卻能拉近視覺距離，產生遠方景物如在眼前的妙用，並且在戰場上還有窺探敵情的作用。徐慶榮詠道：「精微科學出歐邦，巧製雙筒鏡一雙。放眼猶如千里眼，遙遙萬物入書窗。」⁶⁵更是貼切描寫望遠鏡源出西歐，利用雙筒鏡面，可使遠方萬物如在眼前，猶如千里眼。可說是非常傳神的寫法。

文化權力的實踐—以日治時期以文吟社社群為研究對象〉，收於《臺灣史蹟研究會九十六年會友年會論文集（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7），頁 69-103。

⁵⁷ 蕭林石，〈寒暖計〉，《詩報》，第 101 號，昭和 10 年 3 月 15 日，頁 12。

⁵⁸ 傅錫祺，〈眼鏡〉，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頁 66。

⁵⁹ 許劍漁，〈眼鏡〉，收於許劍漁，《鳴劍齋遺草》，頁 36。

⁶⁰ 林仲衡，〈眼鏡〉，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28。

⁶¹ 林玉書，〈戲筆答芸友〉，收於林玉書，《臥雲吟草》，頁 166。

⁶² 王箴盤，〈望遠鏡〉，《詩報》，第 43 號，昭和 7 年 9 月 15 日，頁 16。

⁶³ 謝鐸庵：名長海，號鐸庵，苗栗銅鑼人，戰後任栗社第四任社長。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204。

⁶⁴ 謝鐸庵，〈望遠鏡〉，《詩報》，第 43 號，昭和 7 年 9 月 15 日，頁 16。

⁶⁵ 徐慶榮，〈望遠鏡〉，《詩報》，第 43 號，昭和 7 年 9 月 15 日，頁 16。

(二) 電報和電話

漢詩中的電線，就是今日的電報，林仲衡曾形容云：「機關自譯千行字，消息能通兩地心。翻喜往還歸一線，從茲四海有知音。」⁶⁶林癡仙則曰：「問答全非憑筆墨，往來似不隔河山。鐘杯路管功夫巧，從此歐洲有魯班。」⁶⁷均傳神地描述電報透過電碼，經由線路傳遞訊息的功用。

事實上，日治時期電報已成爲傳統文人與遠地親友聯絡的重要工具。1921年傅錫祺之母病危時，便是以電報通知在中國的長子傅春魁返家；⁶⁸當嘉義徐杰夫喪母時，傅錫祺也以電報簡單表達哀悼之意。⁶⁹

至於雙方可互相對答的電話，傳統文人也絲毫不陌生。1915年林紀堂即使用過電話，不過電話並非裝設在自宅。某次他要與彰化的蘇親家聯絡，乃吩咐僕人至攝影師林草處借電話，打給彰化的陳樹枝，再託陳氏轉告蘇親家，⁷⁰透過層層轉達才將消息傳遞，雖稱不上方便，但對此新發明已有所認識。

傅錫祺有〈電話〉七絕兩首，詳實地描寫電話的功能。其一云：「對語人遙隔幾層，先傳消息藉鈴聲。願教線掛通明殿，天帝親聽訴不平。」其二云：「關山隔不住人聲，百里攀談樂趣生。祇惜五分時太促，未能訴盡別離情。」⁷¹先是提及電話來時先有響鈴，而分隔兩地的人可藉之談天，樂趣橫生，後埋怨長途通話僅以五分鐘爲限，令人不無遺憾。他並推想若電話線能直通至天庭，那麼人間的不平便可直接上達天聽。陳貫形容電話：「借將一線速心胸，不管雲山幾萬重。對語寒暄如咫尺，只難親看故人容。」⁷²貼切地描述分隔兩地的友

⁶⁶ 林仲衡，〈電線〉，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128。

⁶⁷ 林癡仙，〈電線〉，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27。

⁶⁸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年5月27日、31日，未刊稿。

⁶⁹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年9月28日，未刊稿。

⁷⁰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1月24日。

⁷¹ 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100。

⁷² 陳貫，〈電話〉，收於陳貫，《豁軒詩草》，頁12。

人可藉電話敘舊寒暄，可惜缺點是看不見彼此。陳元亭的看法亦類似，云：「但得聞聲不見人，疑他鬼話聽真真。東西多少文明國，無線傳來如有神。」⁷³陳瑚則以電話與紅粉知己聯繫感情：「美人秋水隔盈盈，一線傳來換我聲。恍似長房能縮地，天涯咫尺訴離情。」⁷⁴對於電話縮短空間距離的作用，一樣津津樂道。

電話的英文音譯「德律風」（telephone）也廣為傳統文人所知，傅錫祺在哀悼袁炳修的詩句中有「德律風（電話）前珠淚湧」一句，⁷⁵可知他是友人以電話通知才獲悉袁炳修的死訊。他另有〈樵湖、季園二君觴東墩吟社友於其筱雲山莊，因薪憂不能應招，率成一律藉電話呈謝，並以似諸吟友〉一詩，由上顯示，傅錫祺因病無法參加三角仔呂家招待東墩吟社社友的詩宴，故作一律詩道謝，並以電話告知。林癡仙的日記亦載稱：「午飯時，與仲衡說電話，云明早欲來。」⁷⁶顯示電話已應用在其日常生活中，是親友之間聯絡的重要工具。

（三）電扇和電燈

炎夏時能產生涼風的電扇，也讓傳統文人感覺驚異。施梅樵云：「得汝忽知涼意到，倘逢夏日願相親。」⁷⁷邱天生⁷⁸曰：「任是炎威都不管，清風陣陣滿堂涼。」⁷⁹林玉書詠道：「一機旋轉靡停時，便覺清風習習吹。」⁸⁰陳貫則云：

⁷³ 陳元亭，〈電話〉，《詩報》，第38號，昭和7年7月1日，頁16。

⁷⁴ 陳瑚，〈電話〉，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238-239。

⁷⁵ 傅錫祺，〈哭袁炳修社弟〉，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頁32。

⁷⁶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9年4月21日，未刊稿。

⁷⁷ 施梅樵，〈電扇〉，收於施梅樵，《梅樵詩集》，頁70。

⁷⁸ 邱天生：字中南，桃園人，為新鶯吟社社員。新鶯吟社成立於1931年，社長為陳文慶。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159；陳欣慧，〈閩客疆界：以日治時期桃園地區傳統詩社的文學活動為主要考察〉，未刊稿。

⁷⁹ 邱天生，〈電扇〉，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159。

⁸⁰ 林玉書，〈電扇〉，收於林玉書，《臥雲吟草》，頁28。

「架空一線巧生涼，未許炎威入草堂。大氣斡旋憑寸鐵，不勞紈素手揮忙。」⁸¹陳懷澄詠道：「銅網疏疏一面張，炎輪乍轉便生涼。泰西機器何精巧，能送清風入煖房。」上述諸詩重點均在讚揚靠著扇頁旋轉就能產生涼風，帶來一室清涼。

關於電燈，也有許多描述，例如鄭虛一⁸²曰：「不借青藜太乙精，紅綃閃閃幻燈成。自從人巧天工奪，一線光明日月爭。」⁸³王殿沅⁸⁴云：「得氣都從熱裡過，無煙無燼一遮那。玻球風迫光仍在，綺閣筵照酣不頗。」⁸⁵均強調電燈巧奪天工，無煙無燼，不受氣候影響，能在夜裡帶來一室光明，與日月爭輝。

林獻堂日記中並未記載家中何時裝設電燈，惟 1932、1933 年的日記曾數次提及因臺中機械故障，導致電燈不亮，室中變成黑暗世界，令人難以忍受。⁸⁶可知電燈早已是他熟知的日用品，一旦故障便覺得不方便，而難以渡過漫漫長夜。1932 年的日記曾敘述某日林幼春、陳懷澄來訪，遂招待他們與莊嵩同往林竹山處看書，但因竹山室中無電燈非常黑暗，遂不得觀。⁸⁷顯示電燈仍不普及，林竹山家中亦尚未裝設電燈。

⁸¹ 陳貫，〈電扇〉，收於陳貫，《豁軒詩草》，頁 20。

⁸² 鄭虛一（1880-1930）：名秋涵，號錦帆，又號霽光，新竹人，曾祖父為鄭用鑑。乙未之役內渡，1909 年攜眷返臺，於新竹設帳成趣園。1924 年移家清水，晚年終老於故鄉。有《虛一詩集》傳世，包含〈成趣園詩鈔〉、〈山色夕陽樓吟草〉兩部分。鄭虛一，《虛一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書前作者介紹。

⁸³ 鄭虛一，〈電燈〉，收於鄭虛一，《成趣園詩鈔》，頁 76。

⁸⁴ 王殿沅（1886-1972）：字芷汀，署脫塵齋主人，嘉義市人。少時，師事林殿本，與賴惠川同學。公學校畢業後，入臺南師範學校，後執教於朴子、水上等公學校，再轉職於南靖明治製糖會社。中年後，創玉峰吟社，任社長。名其書齋曰「脫塵齋」，藏漢籍數千卷，以讀書吟哦為樂。每逢春秋佳日，則與吟友吟詠賞菊，徵逐於詩酒。晚年雙目失明，但仍吟詠不輟。王殿沅，《脫塵齋詩草》（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書前作者介紹。

⁸⁵ 王殿沅，〈電燈〉，收於王殿沅，《脫塵齋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1），頁 16。

⁸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314、315；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83。

⁸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75。

(四) 火車和公車

與火車、公車和飛機等交通工具相關的詩作不少。林仲衡有〈火車〉一詩：「奔騰直欲比飛車，縮地長房術漫誇。晝夜可來還可去，江山無礙又無遮。電輪迅速行空馬，鐵道參差畫足蛇。惆悵開窗臨眺處，匆匆過眼霧中花。」⁸⁸旨在描述火車的迅捷，誇其奔騰直比飛車，猶如風馳電掣，乘客由窗外望去，景色就像匆匆過眼的霧中花。當時林仲衡在中國，故以〈火車〉為題，不似其他在臺灣的文人稱火車為「汽車」。

1916年10月18日櫟社在萊園小集舉辦擊鉢吟便以〈汽車（火車）〉為題，⁸⁹陳貫寫道：「不須執策六龍乘，瓦特奇思天下稱。致遠全憑蒸氣力，敢同流馬一爭能。」⁹⁰已知火車的動力為蒸氣，而發明蒸氣機的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對於西洋文明頗有認識。陳瑚則曰：「千里猶庭戶，全臺一軌通。不須夸父力，全仗祝融功。衽席同登處，河山轉瞬中。飛車今可駕，創始憶劉公。」⁹¹讚揚以蒸氣為動力的火車縮短了臺灣空間的距離，並懷念將火車引進臺灣的劉銘傳。

其餘與火車有關的詩作，大多強調其快速，雪庵云：「輪迴鐵道響轟轟，一日能奔萬里程。駿馬高車減顏色，壺公縮地亦銷聲。」⁹²吳晨鐘云：「兩輪馳騁急奔騰，晝夜能兼百里程。真個如風飛鳥疾，轟轟轆轤走雷聲。」⁹³均指出火車一日能行萬里，猶如縮地術，縮短了兩地的距離。然而，潮聲的觀點則不

⁸⁸ 林仲衡，〈火車〉，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9。

⁸⁹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11。

⁹⁰ 陳貫，〈汽車（火車）〉，收於陳貫，《豁軒詩草》，頁3。

⁹¹ 陳瑚，〈汽車〉，收於陳瑚，《枕山詩抄》，頁23。

⁹² 雪庵，〈汽車〉，《詩報》，第197號，昭和14年3月18日，頁21。

⁹³ 吳晨鐘，〈詠汽車〉，《詩報》，第222號，昭和15年4月20日，頁3。

同，他認為火車「越軌變遭顛覆禍，不妨將此鑑人生。」⁹⁴將火車的行駛比喻為人生，不可出軌以免遭禍。

傳統文人對於公車的印象普遍欠佳，主因是班次不密集，常須久候。有一天施梅樵由臺中東屯要至大里，枯候許久而車仍不來，當時候車的乘客眾多，幾無立錐之地，故人人煩意亂，長嘯短嘆。他寫道：「驛亭雜沓人如蟻，無地立足反受累。中心焦躁且徘徊，恨不似鵬展雙翅。鵠候直到日西斜，乘客長嗟復短氣。」⁹⁵另一次到枋寮搭局營汽車，車上乘客甚多，爭先恐後搶座位，⁹⁶令他感到不快。

張碧峰⁹⁷和陳藻芬⁹⁸則對公車評價不錯，畢竟公車仍有便利兩地往來的作用，行百里只須一時程。張曰：「車行時刻不荒唐，客路何須問短長。縮地長房誇妙術，輸他操縱一機揚。」⁹⁹陳云：「不須牛馬自能行，巧妙機關最可驚。縮地長房欣有術，路途百里一時程。」¹⁰⁰尤人鳳¹⁰¹則將焦點放在車掌上，蓋其認為車掌指揮司機的駕駛方向，身繫乘客的安危，角色十分重要，云：「一路憑君操得通，安危是概與君同。沿途處處心須細，安全生命掌汝中。」¹⁰²

⁹⁴ 潮聲，〈汽車〉，《詩報》，第 197 號，昭和 14 年 3 月 18 日，頁 21。

⁹⁵ 施梅樵，〈由臺中將之大里候車殊久始至作此以示古戰〉，收於施梅樵，《鹿江集》，頁 8。

⁹⁶ 施梅樵，〈東行到枋寮換乘局營自動車〉，收於施梅樵，《鹿江集》，頁 40。其詩曰：「雜沓人如蟻，排行立曉暉。分明爭坐位，真似打重圍。海色連天碧，山光映石緋。多情雙白鷺，偏傍客車飛。」

⁹⁷ 張碧峰：名水龍，汐止人，灘音吟社成員，曾出席 1930 年 2 月在臺中舉行的全島聯合吟會。賴子清編，《臺灣詩醇》（臺北：蘭記書局，1935），頁 311；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63。

⁹⁸ 陳藻芬：字南村、日南，臺中大甲人，衡社社員。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頁 137；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272。

⁹⁹ 張碧峰，〈自動車〉，《詩報》，第 27 號，昭和 7 年 1 月 1 日，頁 6。

¹⁰⁰ 陳藻芬，〈自動車〉，《詩報》，第 109 號，昭和 10 年 7 月 15 日，頁 11。

¹⁰¹ 尤人鳳：臺中市人，年近不惑，始學書習字，但仍蜚聲藝苑，為東墩吟社成員。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218。

¹⁰² 尤人鳳，〈乘自動車戲叮車掌〉，《詩報》，第 6 號，昭和 6 年 2 月 17 日，頁 16。

(五) 飛機

飛機亦是傳統文人喜歡吟詠的題材，雖然他們未能有實際搭乘的機會，但憑著想像，十分嚮往此一能遨翔於天際的工具。特別是 1934 年 10 月畢業於日本立川飛行學校的楊清溪，駕駛楊肇嘉募款所購買的飛機「高雄號」，在臺灣進行為期一週的「鄉土訪問飛行」，¹⁰³所到之處均被視為英雄，因為這是一架由臺灣人駕駛的飛機。據楊肇嘉回憶，飛抵臺中後，楊清溪被歡迎的人潮高高舉起，群眾並高呼英雄！英雄！¹⁰⁴由於臺灣人中出了一位成功的飛行員，使得傳統文人對飛行更為關切，10 月 28 日林獻堂參加臺中官紳在練兵場舉行的歡迎會，¹⁰⁵翌日，楊肇嘉帶著楊清溪及另外兩位飛行員彭金國、武內康彥至霧峰拜訪林獻堂。¹⁰⁶不幸楊清溪於 11 月 3 日飛抵臺北上空，正要降落時，突遇颶風，導致飛機右旋，而頭下尾上墜落地面，機毀人亡。¹⁰⁷11 月 8 日林獻堂出席在臺中寺舉行的楊清溪追悼會，並以中部後援會代表身份宣讀弔辭，另一位傳統文人王竹修也發表弔辭。¹⁰⁸

對於飛機凌空飛行的神奇，林耀亭形容為：「風輪操縱運靈機，兩翅如鷹閃閃輝。放眼天邊紅日近，回頭腳底白雲飛。」¹⁰⁹陳貫則曰：「雲漢迢遙有路

¹⁰³ 〈臺灣の生んだ鳥人楊君が試験飛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2408 號，昭和 9 年 10 月 17 日，頁 2；〈楊君がけふ郷土訪問臺灣一周飛行の壯途へ關係者多數の見送りをうけ午前八時十五分臺北を離陸〉，《臺灣日日新報》，第 12409 號，昭和 9 年 10 月 18 日，頁 2。

¹⁰⁴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下》，頁 283-284。

¹⁰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410。

¹⁰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412。

¹⁰⁷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下》（臺北：三民書局，1967），頁 284。

¹⁰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423。

¹⁰⁹ 林耀亭，〈飛機〉，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 6。

通，鯤鵬變化奪天工。張騫已見馳靈棹，列子何須御遠風。」¹¹⁰指出由於文明進步，飛機猶如老鷹般高飛的情景。

隨著強國之間的軍備競賽，飛機廣泛被應用在軍事上，成為投擲炸彈、殺人的武器，林癡仙云：「巨砲可從天外落，宋城何待木鸞攻。」¹¹¹林維朝亦云：「航行直可凌雲起，制敵還堪擲彈弓。廿紀空中添戰史，標新立異互爭雄。」¹¹²鄭鷹秋¹¹³則說：「縱橫雲際自寬容，廿紀文明用接鋒。更有投彈稱爆擊，敵人無處可潛踪。」¹¹⁴

不少文人譴責以飛機做為殺人武器，張純甫的〈飛機行〉曰：「……殺人武器破天荒，歐西文明新格致。地有巨砲卅八珊，水有潛艇魚雷彈。……奇技陸海未足銜，鳥人新向空中戰。天上出沒飛將軍，神龍首尾倏隱見。最著威名齊柏林，英倫市上橫飛侵。……文明極度即野蠻，大陸將沈天將醉。……」¹¹⁵詩中提及飛機、巨砲、潛艇魚雷彈等陸海空武器，甚至著名的齊柏林飛船（Zeppelin Airship），¹¹⁶顯示張純甫平日對西洋文明極其留意，但對此種新科技被利用為殺人工具，可能導致大陸下沈、世界末日，則感到無比痛心。此外，張氏另作五律一首：

¹¹⁰ 陳貫，〈飛機〉，收於陳貫，《豁軒詩草》，頁 53。

¹¹¹ 林癡仙，〈飛行機〉，《無悶草堂詩存下》，頁 248。

¹¹² 林維朝，〈飛機〉，收於林維朝，《怡園吟草》（1917 年），頁 41。

¹¹³ 鄭鷹秋（1904-1982）：字邦偉，號盤漢，開台進士鄭用錫之後裔，竹社社員。戰後曾任苗栗縣南洲吟社社長、全國詩經研究會副理事長。〈鄭鷹秋先生詩選〉，<http://www.ktjh.tp.edu.tw/yang527/j1.htm>。

¹¹⁴ 鄭鷹秋，〈飛行機〉，《詩報》，第 48 號，昭和 7 年 12 月 1 日，頁 15。

¹¹⁵ 張純甫，〈飛機行〉，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上》，頁 78-79。

¹¹⁶ 齊柏林飛船：由德國軍官齊柏林伯爵（Ferdinand Graf Von Zeppelin, 1838-1917）於 1897-1900 年研製而成，在腓特烈港設廠生產。第一次大戰中各國曾動用 100 多艘飛船在戰場上空巡邏偵察。1930 年代飛船的航運事業達到巔峰，但 1937 年飛行跨大西洋歐美航線的著名飛船興登堡號（LZ129 Hindenburg）在美國紐澤西州失火墜毀，使得飛船運輸產業急速沒落，不久便被民航機取代。大衛·克里斯托編，《劍橋百科全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7），頁 1144。

不數夸追日，居然列御風。飛疑龍出沒，戰決鳥雌雄。
牛女乘槎似，魚雷潛艇同。機關休用盡，只有殺人功。¹¹⁷

感嘆西人研發各式武器，只有利於殺人。

1944年10月，美軍戰機空襲臺中大雅，傅錫祺以詩描述聽聞空襲警報後，驚惶失措，早餐未用畢即躲入防空洞避難：

汽笛連聲報敵至，警鐘繼打催待避。晨餐麤粥未及半，投箸急趨豫闕地。
飛機頭上久迴翔，其中自挾殺人器。文人膽故如鼯鼠，巨彈況恐從空墜。
砲聲斷續到耳邊，西山聞似舉烽燧。濫爆或殃及池魚，有人將以無噍類。
生死前定雖屢聞，違孽亦當盡人事。壕中蟄伏一小時，出壕此心猶動悸。
此生重吃一大驚，甲申十月之十四。¹¹⁸

由上顯示，此次空襲是他一生中受到的第二次驚嚇，而第一次驚嚇則是乙未之變的戰事。¹¹⁹流露出他對戰爭的恐懼。

（六）留聲機和收音機

不少人與張麗俊一樣，有聆聽過留聲機的經驗。林癡仙認為留聲機十分巧妙，可以「悅耳開吾心，使我輩聲情酣」，與火車、電線均是西方讓人贊嘆的

¹¹⁷ 張純甫，〈前作飛機行意有不盡收拾零句再足成五律一首〉，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上》，頁79。

¹¹⁸ 傅錫祺，〈美機來襲大雅即事〉，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306。

¹¹⁹ 傅錫祺在「此生重吃一大驚」下自註：「改隸之初，有抗於溝背者，是為第一次受驚。」傅錫祺，〈美機來襲大雅即事〉，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306。

發明。¹²⁰傅錫祺對留聲機也有翔實的描述，他曰：「四座無人歌管清，回頭猛聽匣中鳴。和盤托出旋螺巧，古調彈來印象精。入破伊涼收次第，登場角色辨分明。最宜黑幕新開處，繪影工時更繪聲。」¹²¹傅錫祺聽的是一張傳統戲曲的唱片，詩中表示雖然四座無人，卻傳出管樂絲竹之聲，各類角色一一登場。並聯想若能在播放默片電影時，輔以留聲機，便能繪影又繪聲，發揮視聽娛樂之功效。連生則詠歎科學進步，僅憑唱針接觸唱片便能傳出歌聲：「文明科學製新奇，針下能傳歌曲詩。夜半唱來愛情譜，動人情趣起相思。」¹²²

聲音能保存於唱片，透過留聲機播出的效果，也給傅錫祺帶來靈感，認為家訓似乎也可利用此種方式保存流傳，所以 1937 年 11 月 29 日他便應兒婦之請留話於留聲機之蠟盤，¹²³以便「百年以後有遺聲，憑君收我趨庭訊。」¹²⁴

1931 年林獻堂家中已有三臺留聲機，¹²⁵並且常有人上門兜售唱片。¹²⁶林獻堂的五弟階堂，1933 年家中亦有留聲機，且其所聽的唱片是以當時流行的西式舞曲為主，¹²⁷由於時代變化及階級差異，呈現出與張麗俊截然不同的音樂品味。

¹²⁰ 林癡仙，〈聽留聲機器歌即贈沈生〉，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 10-11。

¹²¹ 傅錫祺，〈蓄音機〉，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98。

¹²² 連生，〈蓄音機〉，《南方》133（1941 年 7 月），頁 70。

¹²³ 傅錫祺，〈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381。

¹²⁴ 傅錫祺，〈蓄音機〉，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98。

¹²⁵ 1931 年 5 月 2 日，臺北日星商事株式會社職員許達財，向林獻堂推銷留聲機。林獻堂以「余現有三臺不復再買」，而推辭之。故知其有三臺留聲機。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142。

¹²⁶ 經營中央書局的莊垂勝，於 1930 年 5 月 5 日，持留聲片向林獻堂兜售，後林獻堂向他買 5 片。據此推測在 1930 年，或之前，林獻堂已有留聲機。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〇年》，頁 150。

¹²⁷ 林獻堂駐，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10。

傳統文人對收音機也不陌生，王殿沅便說收音機是他的床頭良友，使他能知世界情勢的變化。¹²⁸1930年林獻堂家中開始裝設收音機，此為三媳楊雪霞帶來的嫁妝，當時架設頗為麻煩，僅架收音機之柱即用10餘人，而且耗費半日尚未完工。¹²⁹至1937年又新購一臺收音機，¹³⁰此後全家常齊聽收音機之音樂。¹³¹

(七) 鋼筆、鬧鐘、人造花

以鋼筆、鬧鐘、人造花等小東西為題的詩作亦不少，顯示這些物品已深入其生活。林耀亭形容鋼筆：「一枝空管便提攜，墨汁中藏把字題。廿紀文明資利器，論功鉛槧豈能齊。」¹³²強調其為廿世紀的利器，功能遠強過鉛筆；君穎則言：「一管中藏墨水堅，西人巧製出天然。不時伴我胸懷裡，到處題詩最利便。」¹³³強調其隨身攜帶的便利性。傅錫祺也曾在日記中記載：「買萬年筆一枝，價金五圓。」¹³⁴顯示鋼筆已是其書寫常用的工具。

關於鬧鐘，許夢青曾云：「年來懶散異尋常，欲理詩書意早慵。特恐雞鳴呼不起，枕邊時置自鳴鐘。」¹³⁵由於平日作息較為懶散，一旦想早起，仰賴雞鳴恐怕亦不濟事，故在枕邊放置鬧鐘。劉春亭¹³⁶認為鬧鐘「霜降豐山鳴九耳，

¹²⁸ 王殿沅，〈春日閑居即事〉，收於王殿沅，《脫塵齋詩草》，頁8。其詩曰：「收音機畔聽群聲，變幻能知世上情。靜裡永成佳伴侶，床頭良友慰平生。」

¹²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313、314。

¹³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104。

¹³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302。

¹³² 林耀亭，〈萬年筆〉，收於林鶴亭，《松月書室吟草》，頁22。

¹³³ 君穎，〈萬年筆〉，《臺南新報》，第07683號，1923年7月18日，頁5。

¹³⁴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年4月11日，未刊稿。

¹³⁵ 許劍漁，〈即事〉，收於許劍漁，《鳴劍齋遺草》，頁32。

¹³⁶ 劉春亭：字椿亭，基隆人，同勵吟社社員。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頁114。

春歸長樂響重霄。憑君喚起沈沈夢，絕似雞聲叫早朝。」¹³⁷強調鬧鐘早晨喚人起床的功能，猶如雞鳴一般。

傅錫祺對人造花的印象是「蜀錦齊紈折疊奇，玻璃罩裏一枝枝。有生未解飄零苦，春去春來總不知。」¹³⁸寫實地描述人造花由蜀錦齊紈折疊而成，置於玻璃罩中，不似真花隨著四季的變換而有飄零之虞。黃爾璇則曰：「綴錦爲花竹作枝，無關開早與開遲。一春不受東皇寵，自具天然絕代姿。」¹³⁹指出人造花與花季無關，始終具絕代之姿。

不過，並非所有傳統文人均認同西方的機械文明，除了前述譴責飛機等戰爭武器外，張純甫對於摩托車也無好感。他認為摩托車輪聲輾輾產生噪音，每擾人清夢；加以其經過後造成的塵土飛揚，也對飲食衛生及身體健康造成危害，所以視摩托車如惡魔。¹⁴⁰林坡的看法亦類似，認為摩托車揚起的塵土污染空氣，云道：「黃埃如霧失光明，風送輕輪路幾程。蓋盡市廛飛滾滾，怪他摩托太橫行。」¹⁴¹

儘管如此，1930年代摩托車是臺灣常見的交通工具，不少傳統文人均有搭乘的經驗，許炯軒¹⁴²形容摩托車「東西南北任縱橫，四個飛輪運轉輕，發軔能奔萬里程。」¹⁴³施梅樵也曾於雨餘炎暑半消除之時，與友人「結伴同驅摩托車」。¹⁴⁴

三、小結

¹³⁷ 劉春亭，〈自鳴鐘〉，收於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頁114。

¹³⁸ 傅錫祺，〈像生花〉，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100。

¹³⁹ 黃爾璇，〈像生花〉，收於林欽賜編，《瀛州詩集》（臺北：光明社，1933），頁185。

¹⁴⁰ 張純甫，〈摩托行〉，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上》，頁261。

¹⁴¹ 林坡，〈車塵〉，《詩報》，第186號，昭和13年10月1日，頁5。

¹⁴² 許炯軒：戰後爲竹社、竹林吟社社員。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10：3（1959年9月），頁91。

¹⁴³ 許炯軒，〈摩托車〉，《詩報》，第13號，昭和6年6月1日，頁10。

¹⁴⁴ 施梅樵，〈過稻香吟廬留宿〉，收於施梅樵，《鹿江集》，頁110。

由於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日趨現代化，傳統文人的生活也發生轉變，小至鋼筆、鬧鐘、溫度計、眼鏡、望遠鏡，大至火車、飛機、電燈、電話等各種西洋新器物紛紛進入其生活。基本上，他們對這些玩意均感到高度興趣，例如張麗俊對工廠機器的運轉、照明的電燈、急馳的火車、飛行的飛機均極為好奇，他甚至鼓勵家中年邁的老母及大嫂出門觀賞電燈及飛機演習，並認為老人家能看到此種奇景可謂幸運。傳統文人也有許多以新事物為題的詩作，大多描寫這些器物的外型及功用，證明他們對這些新發明已不陌生。如此一來，自然對引進這些器物的日本統治者會有較為正面的評價。

然而，部分文人對日新月異的物質文明仍有所保留，例如飛機被當成殺人武器，對人類存亡造成危害；摩托車帶來噪音及污染環境等，顯示其擁抱新式文明之餘，仍有所反省。

第二節 對西方觀念之看法

傳統文人由於多屬地方上的領導階層，故日本當局頗為禮遇，常招待其參觀各式新建設，加上他們透過接受新式教育、閱讀報章書籍、至外地旅行等途徑接觸不少西洋文明。然而，除了醉心於電力機械等新科技外，他們對於世界局勢、外國史地、民主自由的觀念、兩性關係等西洋文明內涵的認識為何？又對西方的精神文明抱持何種態度？乃是本節擬探討的主題。

一、外國史地知識的具備與對世界局勢的關切

不少傳統文人對外國歷史有基本認識。張純甫聽過舊約聖經上帝創造亞當及新約聖母瑪莉亞產子的故事，並將亞當比附為開天的盤谷，瑪莉亞比喻為女媧，¹⁴⁵頗有認為中西同源的意味。林子瑾翻譯英人 John Finnemore 所著的〈德國史略〉及 Lucy Cazalet 的〈俄國史略〉，連載於《臺灣文藝叢誌》；林玉閣翻譯美國人 D.H. Montgomery 的〈亞米利加史〉，亦刊載於《臺灣文藝叢誌》。¹⁴⁶蓋美、德、俄等國乃是世界新興的強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扮演重要角色，林玉閣及林子瑾翻譯其國史，正顯示傳統文人對於時事頗為關切，想一窺其崛起歷程。

1920年9月27日櫟社舉行秋會，以〈華盛頓〉為題，讓社員吟詠。¹⁴⁷由此可知，對該社社員而言，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

¹⁴⁵ 張純甫，〈古史詠〉，收於張純甫，《張純甫詩集下》，頁30-31。

¹⁴⁶ 〈德國史略〉刊載於《臺灣文藝叢誌》1年1號（1919年1月）、1年2號（1919年2月）、1年4號（1919年4月）、1年5號（1919年5月）、1年6號（1919年6月）、1年7號（1919年7月）、1年8號（1919年8月）；〈俄國史略〉刊載於1年4號（1919年4月）、1年5號（1919年5月）、1年6號（1919年6月）、1年7號（1919年7月）；〈亞米利加史〉刊載於1年2號（1919年2月）、1年4號（1919年4月）、1年5號（1919年5月）、1年6號（1919年6月）。

¹⁴⁷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17。

已是一個耳熟能詳的人物；從詩作內容可看出櫟社成員對其生平事蹟相當了解。林幼春寫道：「星旗獵獵白宮秋，開國功成第一流。舉世共和民主貴，古今王霸總低頭。」¹⁴⁸非但知曉華盛頓為美國的開國者，亦知總統府為白宮，國旗為星條旗，並歌頌共和民主的價值，推崇華盛頓不自立為王。林耀亭則曰：「手斫櫻桃氣已過，共和獨創十三州。古今王霸知多少，革命推君第一流。」¹⁴⁹林氏顯然知悉華盛頓誠實招認砍倒櫻桃樹的故事，以及他領導北美十三州進行獨立戰爭而建立民主共和的美利堅，讚揚他是第一流的革命家。林獻堂筆下的華盛頓為：「抗英七載展良籌，鐵血輸將換自由。民主不同君主制，似堪功業比伊周。」強調其抗英成功，揚棄君主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政體。由上顯示，櫟社諸子均頗為推崇華盛頓領導北美十三州脫離英國獨立，且不登基為王而建立自由民主政制。

林佛國對於歐洲近代的戰亂有相當的認識，特別是奧國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 1773-1859）、法國皇帝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所引起的漫天風雲。他曰：「近世歐洲史，干戈擾攘頻。奸雄梅特涅，怪傑拿破崙。殘破乾坤黯，彰明文物新。可憐奧太子，一死禍蒸民。」¹⁵⁰詩中的奧太子指的是奧匈帝國皇太子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or Francis Ferdinand, 1863-1914），其在塞拉耶佛（Sarajevo）遇刺後，遂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林子瑾則對愛爾蘭獨立問題有深入的了解，曾發表〈愛爾蘭之形勢〉（The Position of Ireland）一文，追溯愛爾蘭與英國的歷史關係，並由兩者地位、種族、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異，分析彼此經常衝突的原因，¹⁵¹作為臺灣與日本關係的參考。

地理方面，林仲衡曾曰：「足跡何時萬里遊，從從碧海地為球。閉關自守

¹⁴⁸ 林幼春，〈華盛頓〉，收於南強詩集，《南強詩集》，頁 34-35。

¹⁴⁹ 林耀亭，〈華盛頓〉，收於林鶴亭，《松月書室吟草》，頁 24-25。

¹⁵⁰ 林佛國，〈國際時事〉，收於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頁 15。

¹⁵¹ 林少英，〈愛爾蘭之形勢〉，《臺灣文藝叢誌》，2 年 6 號。

今非昔，尙有人寰大九洲。」¹⁵²顯然林氏已有地球爲圓的知識，並呼籲不要閉關自守，應遨遊九大洲。他另有多首以亞洲地名爲題的詩作，包括朝鮮、日本、暹羅、呂宋（今菲律賓）、婆羅、蘇門答刺、琉球、印度、波斯等地，以七言律詩簡要敘述當地的歷史及民情風俗。例如談及菲律賓隸屬美國，當地人盛行抽雪茄；琉球原受中山王統治，遭日本併吞後，只得改名沖繩；波斯人爲碧眼胡人，頭纏白布騎駱駝，信仰拜火教。¹⁵³在在顯示林仲衡地理知識的豐富。

1927年5月起，林獻堂與其二子林攀龍、林猶龍展開環球旅行，爲期一年。足跡遍及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丹麥、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瑞士、美國等地，回臺後撰〈環球遊記〉廿萬言¹⁵⁴。林獻堂曾演講其環球旅行，旅程由香港開始，經新加坡、印度、紅海、地中海，再抵英國倫敦，一路向西行，最後經東京返臺，故可證明地球爲圓形的說法。¹⁵⁵林維朝也知地球係繞著太陽運轉，且分爲五大洲，有經度、緯度之別，故詠道：「繞日循環運不窮，經緯區分五大洲。」¹⁵⁶

陳福全¹⁵⁷曾撰〈地界叢談〉一文，列舉地球爲圓形的證據，解釋赤道、南北

¹⁵² 林仲衡，〈癸卯即事〉，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51-52。

¹⁵³ 林仲衡，《仲衡詩集》，頁56-58。

¹⁵⁴ 〈環球遊記〉，自1928年8月28日起刊載於《臺灣民報》上，至1931年10月3日止，連載約4年之久。1941年應簡荷生的要求，重登於《南方》雜誌上。但翌年重刊到英國遊記部分時，談到英王喬治五世出爲賣花，皇后賣雪文（肥皂），皇室待人親切等。由於當時英國已是日本的敵國，乃有讀者投書到警務局抗議。林獻堂後來被迫寫一篇〈十五年後之感想〉，自我檢討以10餘年前之舊稿，登載於今日，殊不合時宜，才將風波化解，但連載也就此中止。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之研究〉，《臺灣文獻》49：2（1998年6月），頁156。

¹⁵⁵ 林獻堂此次演講，是因1930年4月傅錫祺潭子的新居落成，乃與櫟社友人至其家一遊。散席後，應潭子庄助役廖春華和林瑞池之要求，演說前年西遊的狀況。不過演講內容林獻堂在自己的日記中並未多加敘述，反而是出席的張麗俊將詳情記在日記中。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12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202-203。

¹⁵⁶ 林維朝，〈鄭成功 地球〉，收於陳素雲主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30。

¹⁵⁷ 陳福全（1891-1960）：字壽石，一字松菴，號笑仙，別署鯤洋遯叟，新竹人。早年就讀於新

極、經緯線的的涵意，並介紹世界六大洲的名稱、陸地面積、海岸線長短、海拔高度、重要山脈和河川名稱等，猶如世界地理導論。¹⁵⁸此外，盧曜廷作〈處女地〉一詩，提及「媲美哥倫布，方看大陸新」，¹⁵⁹蔡子昭則謂：「當年不有科倫布，大陸何由現美洲」，¹⁶⁰顯然兩人均知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 or Cristobal Colon, 1451-1506）發現美洲新大陸之事。

王學潛認為華人的探險精神更甚西人，舉張騫入斗牛能窮青陸黃墟外為例，強調華人探索新世界的成就。¹⁶¹但以張騫毫無根據的傳說來與哥倫布的成就相較，難免予人夜郎自大之感。蔡如笙則表明不相信張騫的事蹟屬實，認為張騫與哥倫布兩者無法相提並論，曰：「不信張騫事可憑，一帆飛渡碧雲層。如何探險哥倫布，海盡星河歷未曾。」¹⁶²顯然較重視實證。

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更是引起傳統文人的關切。林幼春有〈美總統威爾遜〉、〈德皇威廉二世〉、〈俄皇尼哥拉士二世〉、〈聽人談歐戰故事〉四首詩，述及第一次世界大戰。詩中言及德奧義三國同盟中，德國實為盟主，而德國日修武備，故世傳德皇有統一世界的野心；俄國則自彼得大帝以來向為列強所畏忌，但與德國交戰造成兩敗俱傷；美國總統威爾遜結束戰爭有功，是億萬

竹第一公學校，同時就學於西門名儒莊炯南，奠定漢學基礎。平素專攻漢學易理，旁及天文曆算，曾組「臺灣陰陽學會」。閒時吟誦詩文，彰化崇文社課題，屢列前茅。又好醫道，免費為人診斷開方。1924 至 25 年間，臺灣新舊文學之爭激烈，發表〈白話文適用於臺灣否〉一文，支持舊文學派，反對採用白話文。戰後 1948 年當選西區民代表，1951 年競選新竹縣議員失敗，從此退隱不出。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154-156。

¹⁵⁸ 陳福全，〈地界叢談〉，《臺灣文藝叢誌》，1 年 7 號（1919 年 7 月）、1 年 8 號（1919 年 8 月）、1 年 9 號（1919 年 9 月）、1 年 10 號（1919 年 10 月）、1 年 12 號（1919 年 12 月）、2 年 1 號（1920 年 3 月）、2 年 2 號（1920 年 5 月）、2 年 4 號、3 年 1 號（1921 年 1 月）、3 年 3 號（1921 年 3 月）、3 年 4 號（1921 年 4 月）。

¹⁵⁹ 盧曜廷，〈處女地〉，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417。

¹⁶⁰ 蔡子昭，〈探險〉，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 271。

¹⁶¹ 王學潛，〈探險〉，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 271。

¹⁶² 蔡如笙，〈乘槎路〉，《詩報》，第 235 號，昭和 15 年 11 月 2 日，頁 10。

人中之第一人，惜戰後處置方法有所失當，成為日後爭端再起的禍因。¹⁶³

林獻堂極為注意一次大戰敗後德國逐步整軍經武、對外擴張，最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1938年9月林氏至東京上野觀看介紹德國的影片，感覺歐戰後德國雖一敗塗地，但不過10年之經營，其海、陸、空軍之整備便頗為可觀，可謂臥薪嘗膽、有志竟成，希特勒可稱之為人傑。¹⁶⁴因此，對整軍經武的希特勒評價頗高。其後，他密切注意報紙上德國的動態，從捷克危機、德軍進攻波蘭首都華沙、入侵荷蘭及比利時、法國投降、美德開戰等日記均一一記錄，¹⁶⁵可見他對時局的關心。

傅錫祺對歐洲的時局也很關心，1939年中秋節作〈乙卯中秋〉一詩中，有「圓滿誰圖及亞歐」一句，並作註解曰：「一昨年來事變未息，九月一日德又伐波，俄繼之，英法援波，歐戰又起。」¹⁶⁶翌年戰事益發蔓延，他乃作〈歐洲第二次大戰經年未息感作〉，其中有「解求日巧殲人具，盍覓天然果腹方」一句，批判歐洲人發明殺人武器日求精巧，但於穀類及副食物之外竟不能研發天然果腹之良方，完全將科學文明用錯地方。¹⁶⁷到了1941年，歐戰及日華戰爭均未息，他的「新年還看未殘碁，勝負終當屬阿誰。天自高高無可問，擬將先兆問著龜」之句，¹⁶⁸充分流露出企盼和平的無奈。

由前述可知，不少傳統文人對歐美的史地有基本的認識，特別是有出國留學經驗的林子瑾和林仲衡。林子瑾翻譯文章發表，促進西洋史知識的流傳。櫟社諸子普遍知曉華盛頓在美國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對其不自立為王而行君主共

¹⁶³ 林幼春，《南強詩集》，頁32-33。

¹⁶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227。

¹⁶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頁244；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318、329；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138、170、173；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294。

¹⁶⁶ 傅錫祺，〈乙卯中秋〉，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208-209。

¹⁶⁷ 傅錫祺，〈歐洲第二次大戰經年未息感作〉，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228-229。

¹⁶⁸ 傅錫祺，〈元旦試筆〉，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235。

和頗表推崇。傳統文人也相當關心世界局勢，兩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擴張所引發的騷亂亦是其讀報時的重點。

二、兩性關係

臺灣早期的男女兩性關係相當保守，年輕男女交際不能公開，不能一同行走，也不能相對說話。在劇場裡，男女的座位亦分開，即使是年輕的夫婦，看戲時亦不能同席。未婚女子若與男性有所互動，馬上會遭致輿論強烈的批判。故吳濁流說，那是一個男人和女人秘密地談話就被視為通姦的時代。¹⁶⁹

然而 1920 年代後，日本正值大正民主的自由開放時期，臺灣也受到此種風氣影響。新知識青年透過日文雜誌、文學作品等之閱讀，吸收新思潮，他們為追求「文明」、「進步」，乃鼓吹自由戀愛。無論是《臺灣日日新報》或《民報》均刊載許多與自由戀愛有關的文章。¹⁷⁰

迨至 1930 年代，臺灣部分年輕都會女子的衣著打扮和行為舉止更趨西化，一般人以「黑貓女」稱之。同時，西方的社交禮儀跳舞，也流行於臺灣。在宴會場合，隨著留聲機宣洩而出的西式音樂，男男女女相擁起舞蔚為時尚。據報載，當時都會青年多沈醉於跳舞，大稻埕的年輕仕女每於夕陽西斜之際，熱狂舞蹈，跳舞俱樂部、跳舞研究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¹⁷¹林幼春描述當時舞會的情況如下：

長裙短袖大方家，楊柳隨風勢不差。更著弓彎時樣履，果然步步印蓮花。

¹⁶⁹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 81。

¹⁷⁰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株式會社勁草書房，2001），頁 192-194。

¹⁷¹ 〈稻市藝妓，熱狂跳舞，月謝金十五圓〉，《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3 月 3 日，第 11094 號，頁 4。

將迎又拒雉情驕，欲集翻翔燕舞超。贏得座人心骨醉，一時迴抱沈郎腰。

172

形容跳舞的女子穿著長裙短袖的服飾及高跟鞋，猶如楊柳般隨風搖擺，搖曳生姿；同時一手抱著男性舞伴，又迎又拒，讓人看得心醉。或許因為如此，有關參加跳舞研究會的青年男女關係淫亂的醜聞不時傳出，引起地方當局的重視。¹⁷³傳統文人因受儒家思想薰陶，向來遵從孔子古訓，認為「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雜坐」（與青樓女子交際為例外）、「叔嫂不通問」，對於此種社會新風尚抱持何種看法呢？

以見多識廣、曾至歐美旅遊的林獻堂為例，他對跳舞抱持相當保留的態度。1927年林獻堂曾在柏林咖啡店的跳舞場見音樂一奏，男女一對一對即相擁而舞，甚至有年輕女子跳舞時面頰倚男子之肩，忘情唇吻，令他大開眼界。尤其當時柏林婦女之服裝流行短至膝上，跳舞時若轉身稍急，或被微風吹動，其衣裙掀起，不免春光外洩，林獻堂覺得真是難看。¹⁷⁴其後至漢堡參觀跳舞場時，竟有少女兩人來邀舞，林獻堂因素未練習，唯有敬謝不敏，少女被拒後頗現愧赧之色。林獻堂以為西方習俗之跳舞，皆男子主動邀請女子，少有女子求之男子者，該名少女可能因其為東方人，又未有舞伴可共舞，故特別前來周旋，不料竟被拒絕，可能以為林獻堂看不起她。對此林獻堂頗感過意不去，但他真的不擅舞技，也無能為力。¹⁷⁵

¹⁷² 林幼春，〈跳舞詞〉，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53。

¹⁷³ 〈跳舞場許可再調查，當局取締規則起草中，因須摩子事件一頓挫〉，《臺灣日日新報》，昭和6年7月10日，第11222號，頁4。

¹⁷⁴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382。

¹⁷⁵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385；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222。

在日內瓦與旅居當地的林小眉¹⁷⁶聚會時，因小眉夫人¹⁷⁷曾受荷蘭之高等教育，能說 5、6 國之語言，又擅長跳舞，故晚餐後同赴跳舞場。小眉力勸林獻堂跳舞，但獻堂認為自幼所受男女授受不親之舊禮教，至今尚盤據腦中，突然改變觀念，男女相抱於大庭廣眾之中跳舞，實無此勇氣，故自笑冬烘而拒絕之。¹⁷⁸可見林獻堂無法拋開傳統的舊觀念，接受此種西式風俗，對於學習跳舞也毫無興趣。但長年居住歐洲的林小眉，觀念已經改變，認為跳舞只是一般社交禮節，無須大驚小怪，其夫人也擅長跳舞。

其餘的文人對於跳舞的看法，多半與林獻堂類似。林仲衡認為跳舞女子在光天化日下，公然迴轉身軀，擁抱男伴，行為有違倫常；而跳舞場所中追求自由戀愛的青年男女雙雙相擁起舞，在他看來就如同野鴛鴦一般。¹⁷⁹張友石¹⁸⁰亦指責跳舞場所將二十世紀的摩登女子聚集於一堂，其衣著暴露，「露胸襟弗捉，羅袖不須長」，恐有害於風化；陳伯犀「豔看社交態，廿紀少年狂」的詩

¹⁷⁶ 林小眉（1893-1940）：名景仁，字健人，板橋人，板橋林家第二房林爾嘉長子。終生未受正規教育，但有傲人的詩才及通日、英、法三國語文。曾任株式會社新高銀行董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監事，並主持家族企業訓眉記，後因故經營失敗，乃隨父母赴瑞士 7 年。1931 年得鄒魯之介，謁安徽省主席兼豫鄂皖邊區剿匪總司令劉鎮華於新鄉，被任為豫陝晉邊區綏靖督辦公署上校參議。1932 年滿洲國成立後，任外交部政務司歐美科科長。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7（2007 年 9 月），頁 95-96。

¹⁷⁷ 林小眉夫人為南洋蘇門答臘橡膠王張煜南之女。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頁 258。

¹⁷⁸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 419。

¹⁷⁹ 林仲衡，〈觀跳舞感作〉，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72；林仲衡，〈聚英樓觀跳舞作〉，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77。

¹⁸⁰ 張友石：為創辦於 1935 年的新竹「三孝人家」詩社社員。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二）〉，《臺灣文獻》10：3（1959 年 9 月），頁 90。

句則譴責豔舞女子以豔粧麗服勾引年輕男性；洪玉明¹⁸¹則認為跳舞是日本的末俗，造成世風日下，男女舉止輕佻。¹⁸²

傳統文人對於跳舞呈現的男女社交自由的排斥與恐懼，可以以張麗俊作為代表。張麗俊向來認為男女在公開場合的行為宜遵守分際，他曾在車中遇見殷戶林尊五與一娼女名阿好者，互相調情、頻送秋波，便斥其為「儼然一對野鴛鴦」，並說滿車之人見兩人如此顏厚，直欲絕倒。¹⁸³因此，他對於男女相擁起舞更是無法接受。

1932年6月26日晚間，張麗俊於豐原「豐國樓」參加生平唯一的一場跳舞會。當日他至「豐國樓」參加「沙鷗聯吟會」詩會，得知晚間有跳舞會，便留下觀看。不料舞會開始後，張氏一見便大為駭異，因所謂跳舞會，是每回有妙齡女子5人與少年男子5人互相攬住，在樓上進退周旋盤桓。張麗俊不禁嘆曰：「歐洲以此跳舞為文明，男女授受且不親，似此互相擁抱，體統何在，可謂文明極而變野蠻矣，此風何以吹入臺灣矣，若長此以進，男女不近於禽獸者幾希矣。」¹⁸⁴隨後即搖頭拂袖離去。

雖然張麗俊生性風流，鎮日與歡場女子周旋嬉戲，但男女公然擁抱起舞，他仍認為是完全無法接受的行為，故以野蠻、禽獸等字眼斥責此種風氣。然以今日觀點視之，張麗俊顯然對於男女關係有兩套標準。

不過，並非所有文人均視跳舞如毒蛇猛獸，除前述遊歐多年的林小眉外，林獻堂之弟林階堂也是跳舞的愛好者。他常跑至臺中跳舞，樂不思蜀而忘歸；¹⁸⁵50歲的生日宴後，也依自己喜好舉辦跳舞會，極一時之盛；¹⁸⁶他還會拉著林獻

¹⁸¹ 洪玉明：字夢樓，臺北人。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1。

¹⁸² 洪玉明，〈跳舞女〉，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253；張友石，〈跳舞女〉，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268；陳伯犀，〈跳舞女〉，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268。

¹⁸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51。

¹⁸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94-96。

¹⁸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232、257；林獻

堂去臺中娛樂場所觀看跳舞。¹⁸⁷林獻堂較張麗俊開放及圓融之處，在於他本身雖排斥跳舞，但如純粹觀看，作為餘興，倒是可以接受。不過，當林階堂想在霧峰組織跳舞會，並聘舞女3人時，林獻堂便大加反對，理由是怕紊亂風俗。¹⁸⁸

1929年王達德前往日本旅遊時，也曾多次至跳舞場觀賞跳舞，但他只是客觀地記下所見所聞，而未加任何批判。例如在神戶時，「到跳舞場一觀，舞女十餘名，淡妝濃抹，燕瘦環肥，各盡其妙。音樂一奏，男子爭挽其所愛而起舞，聞每回一角半，女得六而主人得九，然僅三四分鐘耳。」抵東京後又參觀日美跳舞場，見「舞女卅餘人，並肩而坐，有衣薄紗洋裝者，有著花豔和服者，均極豔麗，粉白黛綠，體態輕柔。音樂既奏，男女對對起舞，或徐或疾，進退自如，能與樂聲相拍合。」其顯然不認為男女共舞有違倫常。而他至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附屬植物園遊玩時，見對對男女攜手同行，或比肩坐綠陰下，細語喁喁，也不認為這是世風日下的象徵，反而說其親暱之狀令人豔羨，頗為羨慕。¹⁸⁹可見王達德對於男女交際有較開明的觀念。

不少傳統文人反對自由戀愛。張純甫認為近來青年多仿效西歐，提倡自由戀愛，但是女性往往受到欺瞞，還是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比較安全。¹⁹⁰作詩曰：「青年比比襲西歐，戀愛精神醉自由。有力黃金尚無力，勸君此後莫輕投。」¹⁹¹勸告青年切莫效法西歐風氣而自由戀愛。林獻堂對於自由戀愛也有所保留，林紀堂三子林松齡與其妻神倉敏子雖因戀愛而結合，但兩人的長子林慎一發燒時，敏子竟可以棄之不顧，而外出與男子飲酒行樂，甚且聽說夜間招男

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42。

¹⁸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428。

¹⁸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266；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77。

¹⁸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130。

¹⁸⁹ 王達德，〈東遊鴻爪〉，收於王達德，《瘦鶴詩書集》，頁297、301、303。

¹⁹⁰ 張純甫，〈五月雨〉，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下》，頁17-18。

¹⁹¹ 張純甫，〈聞小魯兄如夫人端午日服毒自殺賦此吊之並慰小魯〉，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下》，頁52。

子來其宅已不止一次，故林松齡決定要離婚。¹⁹²兩人於 1938 年 9 月 21 日辦妥離婚手續，敏子取得 7,000 圓贍養費後，同意斷絕與林松齡及所生二子的一切關係。¹⁹³對此林獻堂感慨再三，嘆道：「噫！自由結婚之結果亦如是也。」¹⁹⁴「噫！自由戀愛，自由結婚，自由離婚，使人感慨無量。」¹⁹⁵言下之意還是媒妁之言較牢靠。

不過，並非所有文人觀念均如此保守，署名寄客者便認為自由戀愛是天生自然之事，反而批評當時社會存在的婚姻論財及將新娘當成商品買賣的現象，其詩曰：「自由戀愛本先天，何事姻婚計論錢。惡習未除人事苦，大安兌販擬三千。」¹⁹⁶女詩人蕭金珠更是極為嚮往自由戀愛的浪漫，詠道：「兩人意愛卻黃金，惟有真誠情自深。請看鴛鴦雙此翼，白頭到老不儂心。」¹⁹⁷認為惟有自由戀愛才有真誠的愛情，兩人方能比翼雙飛、白頭偕老。

至於同姓結婚，向來是臺灣民間的禁忌，更不為文人接受。王竹修甚至認為應將贊成同姓結婚者編入「獸足」，驅入深山中使與生番為伍，或與鹿豬同遊，任其無禮無義，嘗糞如草，久而披毛戴角，因其根本不配為人。¹⁹⁸如前章所述，林子瑾只因引誘同姓女子前往北京，從此聲名狼藉，非但遭櫟社除名，更得長期避居中國。事實上，與女性傳出緋聞對傳統文人而言並不具殺傷力，但與同姓結合就觸動了社會禁忌。

當林攀龍欲娶同姓親族女子林雙吉為妻時，開明的林獻堂也大表反對。他認為同姓結婚之例尚未開啓，何況近親，此事若行，實大有悖倫理道德，影響一般不少。故與其妻楊水心商量非嚴重警告使其作罷不可，後更以斷絕父子關

¹⁹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23。

¹⁹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34、239。

¹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34。

¹⁹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39。

¹⁹⁶ 寄客，〈人身買賣〉，《臺南新報》，第 08016 號，1924 年 6 月 15 日，頁 5。

¹⁹⁷ 蕭氏金珠，〈自由戀愛〉，《詩報》，第 114 號，昭和 10 年 10 月 1 日，頁 8。

¹⁹⁸ 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嘉義：蘭記圖書部，1927），卷五，頁 39-40。

係相要脅，可見其態度的強硬。¹⁹⁹最後，林獻堂允諾補助林雙吉前往南京留學的學費，每月銀 50 圓，並支付其旅費，作為交換條件，才消弭了一場風暴。²⁰⁰

由前可知，傳統文人對於男女社交、自由戀愛等社會風氣多採取排斥的態度，甚至視之為毒蛇猛獸，並未隨時代的進步而改變，此點與熱切地吸收西方物質文明有極大的不同。

三、科學新知的吸收

許多傳統文人對追求西洋科學的知識頗為積極，林癡仙雖是前清秀才，從未接觸過新學，卻曾向東京富山房書局及橫濱新民社訂購《漢文地球儀》、《漢譯酒井物理學教科書》、《日清對譯算術教科書》等書籍，作為自修之用。²⁰¹而以販售中文圖書為主的蘭記書局，其圖書目錄亦包含《人體生理論》、《中西合纂婦科大全》、《生育研究實驗優生學》、《藥物與驗方》等介紹醫學新知的書籍，顯示傳統文人對新學的渴求。²⁰²

此外，也有文人努力將所吸收的新知散播給其他的文人，當時以提倡漢文或登載漢詩為目的的中文刊物，均刊登不少與自然科學相關的文章。例如《臺灣文藝叢誌》登載吳賜斌〈天文學說〉，介紹何謂遊星（行星）、慧星、流星，說明地球自轉原理和運行速力，並解釋潮汐和日、月蝕的現象；²⁰³許子文〈科學叢談〉，主旨在天氣，述及天氣預知法、動植物與天氣之關係；²⁰⁴櫻公

¹⁹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94。

²⁰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171、201。

²⁰¹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3 月 30-31 日，未刊稿。

²⁰² 黃美娥，〈從蘭記圖書目錄想像一個時代的閱讀／知識故事〉，收於封德屏總編輯，《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77。

²⁰³ 吳賜斌，〈天文學說〉，《臺灣文藝叢誌》，1 年 4 號（1919 年 4 月）、1 年 5 號（1919 年 5 月）、1 年 6 號（1919 年 6 月）。

²⁰⁴ 許子文，〈科學叢談〉，《臺灣文藝叢誌》，1 年 9 號（1919 年 9 月）。

〈科學雜俎〉，介紹英國最新研究成果，言馬來爪哇產之一種猿猴，為人類始祖之一；²⁰⁵無遮〈科學雜俎〉，談及法國發明的新式風車，不受風向影響、低噪音，其力又五倍於尋常風車；²⁰⁶高魯〈愛因斯坦與相對論〉，則引介相對論的學說。²⁰⁷

連橫的《臺灣詩薈》則連載林履信的一系列文章，討論一元論、地球之生成、人類發生諸考、生物進化之理法、自然的環境之變遷與生物之盛衰、歐西學問、憎新主義（*misoneism*）與愛新主義（*philoneism*）等問題；耿光〈說火星〉一文，更提及火星上的「運河」及火星人的智慧。²⁰⁸這些刊物的主要讀者均為傳統文人，但竟有如此多的篇幅與地球科學、生物有關，顯示傳統文人對這方面有相當的興趣。同時，不少傳統文人接觸過新式教育，對於歐西的科學現況並不陌生。

因此，傅錫祺已知曉何謂哈雷慧星，他在〈哭袁炳修社弟〉詩中有「慧星偏犯少微星」一句，並自註慧星是指哈禮〔雷〕慧星²⁰⁹；張純甫明白月蝕的成因是被地球遮蔽，而非古人所說的是災異的象徵，並說迷信因此被打破，文明人不畏天時；²¹⁰詩會時作詩鐘，也有以「達爾文」為題，²¹¹足見提倡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是傳統文人耳熟能詳的人物。

然而，並非所有文人均對西洋科學全盤接收，洪棄生認為「能將東學心求真，豈覺西方法獨美。」²¹²林癡仙亦曰「邇來震旦新學興，說富言強士驚驚。

²⁰⁵ 櫻公，〈科學雜俎〉，《臺灣文藝叢誌》，3年3號（1921年3月），頁27-29。

²⁰⁶ 無遮，〈科學雜俎〉，《臺灣文藝叢誌》，3年4號（1921年4月），頁25-25。

²⁰⁷ 高魯，〈愛因斯坦與相對論〉，《臺灣文藝叢誌》，5年3號（1923年），頁2-3。

²⁰⁸ 耿光，〈說火星〉，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上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頁461-464。

²⁰⁹ 傅錫祺，〈哭袁炳修社弟〉，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頁32。

²¹⁰ 張純甫，〈月蝕〉，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下》，頁275-276。

²¹¹ 〈東海鐘聲八〉，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上冊》，頁663。

²¹² 洪棄生，〈次韻梁任公贈臺灣遺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收於王建竹編，《臺中詩乘》，

侏離講習紅毛文，糟粕六經誰復顧。」²¹³指出西學廣為追求富強之士所重，學習西語的風氣亦盛，傳統的六經反被視為糟粕，對此他頗不以為然。不過，如前所述，林癡仙曾訂購不少數理書籍，顯示其對西方科學仍有學習的興趣，並非全然排斥。他只是主張在引進西學之餘，亦不能廢罷漢學。

呂厚菴的看法亦類似，他曰：「爭攻孔教戈操室，一染歐風氣吐蜺。學界盛衰關國運，中原北望寄幽思。」²¹⁴對於西學日盛、孔教備受攻擊感到不敢苟同，仍期待漢學能振興。王竹修則對物競天擇的「天演論」深感懷疑，嘲笑相信此學說者為無主見的木偶，故曰：「我笑世人多木偶，敢從天演競生存。」

215

張達修也對世之談學說者，動輒鼓吹西學，提倡歐風，而謂東學固步自封、守舊不化，甚且鄙夷之，而深感不能苟同。他從書法、文學、宗教、社會學等方面分析，認為西學源於東學。書法上，倉頡制字，沮誦右行、肱盧左行，今西人書皆右行與沮誦無異，是書法之源於東學者。文學上，《尚書》中有〈誓命〉、〈訓誥〉，西學中亦有〈申命〉、〈會誓〉，名異而實同也，是文學之源於東學者。宗教上，耶教之創為天堂之說，雖與佛教之地獄異，然耶穌、摩西之十誡。實剽竊佛氏之精言，是宗教之源於東學者。社會學上，墨氏首倡兼愛，今西人亦重平等，平等即兼愛之所擴而充也，是社會學之源於東學者。此外，他又認為東學凌駕於西學之上，因其重仁義道德。仁以博愛，義以合宜，道以率性，德以修身。惟西學則不然，以仁義道德為虛位，以格致進化為極工。試觀蘇格拉底（Socrates，470-399B.C.）之理學談、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1820-1903）之社會學、大利司之格致科、達爾文之進化論，立意翻新，思想百出，以證之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之沉潛純粹者，其相越詎不

頁 115-116。

²¹³ 林癡仙，〈送姪幼春過海游學〉，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108。

²¹⁴ 呂厚菴，〈感懷次邱先根工部粵臺秋唱原韻〉，收於呂厚菴，《厚菴遺草》，頁 22。

²¹⁵ 王竹修，〈傀儡〉，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 136。

遠。²¹⁶雖然張達修的說法充滿穿鑿附會，但亦可看出他尊崇漢學傳統的苦心。

由前所述，傳統文人多有吸收西歐進步的科學理論之興趣，並不加以排斥。然而，他們畢竟深受儒學的陶冶，極為不滿社會上部分人士獨重西學，而將儒學棄如敝屣的作法。

四、西洋學說的容受

步入二十世紀後，自由民主觀念、馬克斯主義等西洋學說紛紛被引進臺灣，不少傳統文人亦有所了解。櫟社成員所作的〈華盛頓〉一詩，已可見他們十分推崇領導美國獨立成功，確立共和民主政制的華盛頓。1903年林仲衡作〈癸卯即事〉一詩，亦云：「今日紛紛談革命，共和世界自由時」，認為當時是一個高舉共和自由的旗幟、起身革命的年代；在〈贈坂垣伯〉詩中則提到：「三百萬人齊下拜，馬頭擁出自由神」，²¹⁷稱許坂垣退助為自由神，對其功業頗為推崇。林子瑾談到臺灣民主國抗日失敗時，則論道：「終是亞洲民主國，前賢成敗莫輕論。」²¹⁸肯定其劃時代的意義，並呼籲眾人莫因失敗論英雄，而否定前人的努力。由此亦可得知林子瑾對民主的追求與嚮往。至於馬克斯主

²¹⁶ 張達修，〈東西學源流得失參考大略論〉，收於張達修，《醉草園詩集》（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頁435-437。

²¹⁷ 林仲衡，〈癸卯即事〉、〈贈坂垣伯〉，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52、62。

²¹⁸ 林子瑾，〈詠臺灣抗日軍旗〉，收於王建竹編，《臺中詩乘》，頁196。

義，則被吳景箕²¹⁹視為毒蛇猛獸，欲除之而後快，他云：「即今孔孟教陵夷，楊墨兼行馬克斯。安得陳琳為草檄，²²⁰掃他邀孽起雄師。」²²¹

林獻堂支持自治的意念非常堅決，特別是 1927 年至世界上最小的自治國家摩納哥公國一遊後，更有所感觸。認為「摩納哥公國，其土地之小，其人民之寡，其出產之稀微，竟能治理其國家若是，可見世界上無一土地、無一民族不可獨立的，唯視其自治能力如何呢。」²²²在其〈秋雨〉詩中，也表示：「底事涼風吹更急，決明²²³獨立恐難期。」²²⁴主要形容決明子遭受涼風摧殘而難以成長茁壯，但亦隱喻臺灣難以獨立的悲愴。林獻堂支持殖民地獨立建國，1943 年 10 月菲律賓脫離美國獨立時，他在日記寫道，菲律賓多年來尋求獨立而不可得，今日不要求而得之，其人民心理不知如何歡喜。²²⁵可知他對民族自決和獨立的嚮往。

²¹⁹ 吳景箕（1902-1983）：字考肅，一字鳳起，號鳴皋，雲林斗六人，為吳克明長子。17 歲時東渡日本留學，入群馬縣高崎中學，31 歲畢業於東京帝大文學科，後返台。任家中經營之慶豐商行會計，並任雲峰吟社社長。戰後任斗六初級中學校長兩年，旋掛冠求去。1955 年出席全國詩人大會，1961 年參加日本雅友吟社，1970 年應邀出席日本東京湯島聖堂斯文會孔子祭暨斯文會創立 90 週年典禮，並發表演說。賴郁文，〈斗六豪門中的陶淵明—吳景箕的古典詩〉，收於鄭定國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頁 99-133。

²²⁰ 陳琳：字孔璋，廣陵射陽（今江蘇淮南縣東南）人，為東漢建安七子之一。董卓之亂後，避難冀州，入袁紹幕僚。袁紹的軍中文書，多出其手，最著名的為〈為袁紹檄豫州文〉，文中歷數曹操的罪狀，詆斥及其父祖，極富煽動力。此處吳景箕詩句中的「安得陳琳為草檄」，即典出於此。

²²¹ 吳景箕，〈偶成〉，收於吳景箕，《蓴味集》（1935），頁 9。

²²²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 348。

²²³ 決明（*Cassia Tora*），豆科植物，一年生草本。莖高 2、3 尺，葉羽狀複葉，夏季自葉腋生花，花冠五瓣，花後結莢果，長 5、6 寸。其種子為決明子，是常用中藥。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辭海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 臺十四版）》，頁 1657。

²²⁴ 林獻堂，〈秋雨〉，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 34。

²²⁵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 年 10 月 14 日，未刊稿。

林獻堂對民主也有所體認，特別是他參觀美國白宮時，發覺其美麗宏大遠不及臺灣總督官邸多矣，其渺小甚至僅類富豪之室。他認為共和國之元首乃國民之公僕，故不敢絲毫自侈以示尊嚴，因此不得不令人歎羨平民政治樸素之風。其乃真實行平等而非徒作美名。²²⁶故葉榮鐘認為林獻堂之所以注意民主政治，乃環球旅遊中耳濡目染之結果。²²⁷

林癡仙參觀延平郡王祠時也說：「國能獨立無大小，蜂蠆有毒誰敢害。」²²⁸意謂只要能自保，即使是小國也能獨立於世上，隱指臺灣也能追求獨立之意。

爲了宣揚民族自決的觀念，《臺灣文藝叢誌》刊載〈東方寶玉〉一文，說明錫蘭（Ceylon，今斯里蘭卡，Sri Lanka）位居印度洋中，當地人口土著約居其半，餘爲印度人、白種人、阿拉伯人，1831年成爲英國殖民地，由英政府派總督統治。但錫蘭的殖民地議會早已創設，近年來英國政府更許錫蘭人以完全自治權利，土著有參政權，總督的獨裁權亦大加消滅，有與臺灣處境相對照之意味。²²⁹

在地方自治方面，蔡梓舟譯述〈自治談〉一文，指出日本之自治制取範於德國者甚多，而自治須以愛鄉心爲基礎，倘不愛自己所居之地，則愛國之心不能發動。²³⁰臺灣文社第12期徵文，以〈地方自治論〉爲題，由陳瑚負責評選。獲得第五名的陳味翁言及：「且吾觀民主立憲國，如美之十三州，終分爲四十餘州，然無非由地方之自治，以臻於至善之隆盛。即如德之君主立憲國，始雖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431-432。

²²⁷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114。

²²⁸ 林癡仙，〈謁延平王祠〉，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155。

²²⁹ 阿嬌，《東方寶玉》，《臺灣文藝叢誌》，3年1號（1921年1月），頁4。

²³⁰ 蔡梓舟（說劍），〈自治談〉，《臺灣文藝叢誌》，2年5號（1920年），頁5-11；2年6號（1920年10月），頁10-14。

由聯邦制，而合十餘州，然無非由地方之自治，以臻於至善之隆盛。」²³¹闡明實行地方自治可使國家富強。

雖然受到民主自由風氣的薰陶，然而，臺灣當時卻處於殖民地的地位，在六三法（三一法、法三號）體制下，實行總督的專制統治。因此，傳統文人中亦不乏投身民族運動者。最早是參與 1914 年的同化會，該會由日人坂垣退助伯爵發起，主張由人種問題與外交關係來看，亞細亞各國必須團結以謀自保，故中日兩國必須提攜。由於在地理上臺灣與中國僅一衣帶水之隔，又同屬漢民族，所以若欲與中國人親交，需先與臺人和睦相處。因此在臺日人必須尊重人權，善待臺人，保護臺人的生命財產。雖然其重點在於中日兩國提攜，但善待臺人的說法則是臺人前所未聞的，有助於台灣人地位的提高，乃大受好評。²³²

1914 年 11 月中旬，坂垣將同化會的宗旨寄發給全臺各廳下之區長（臺人）、保正及其他地方有力人士。強調同化乃臺灣本島一般官民之輿論，若欲使臺人與官吏及在臺日人互忘形骸，而有渾然同化之實，必須先有交際之機關，此即該會設立之由來。²³³雖然表明僅是交際機關，但其中寓含臺人可享受與日人同樣權利待遇的論點，卻激起傳統文人參與的熱情。

林獻堂、林癡仙、蔡惠如、王學潛、林子瑾等人均為同化會大力奔走，其行蹤並受到日警監控。其中，該年 12 月 11 日林獻堂在臺中臺中座（戲院）由坂垣親自出席的同化會說明會上演說。據載臺中各地專程趕來聽講者甚眾，會場幾無立錐之地。²³⁴然而，在臺日人為保持其壟斷殖民地利益的特權，自然不

²³¹ 陳味翁，〈地方自治論〉，《臺灣文藝叢誌》，2 年 1 號（1920 年 3 月）。

²³²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37。

²³³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38-40；山辺健太郎解說，《現代史資料 21 臺灣 1》，頁 102。

²³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127-128；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40-41。

肯和臺人提攜共享，而視此會為毒蛇猛獸。最後於 1915 年 1 月 23 日被總督府命令解散。²³⁵

被日警視為對同化會最為熱狂的林癡仙，在該會被勒令解散前，曾親赴日本，拜訪坂垣退助以一探究竟。據其日記所載，癡仙於 1915 年 1 月 16 日出發，從基隆搭船赴日本，18 日在船上接坂垣無線電一通，即刻回電。20 日抵神戶港，22 日與甘得中往訪坂垣，翌日聞臺灣各廳長辭同化會評議員之職，同化會徵收文件被取消，25 日再訪坂垣。²³⁶惜癡仙並未記下其感受及心情的轉變，但同化會化為幻影的打擊，對癡仙想必非常之大，回臺後不久便抑鬱而終。²³⁷

其次，也有不少傳統文人投入臺灣文化協會。該會為日治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啓蒙運動與民族運動團體，以助長臺灣文化發達為目的。其幹部中，林獻堂為總理，林幼春為協理，鄭汝南、蔡惠如、陳貫、林載釗、林佛樹、林仲衡為理事、王學潛、黃欣、張棟梁、楊仲佐、魏清德、林子瑾曾任評議員。²³⁸

文化協會成立後，於新竹州苑里、大湖，臺中州草屯、彰化、北斗、員林、社頭，臺南州嘉義，高雄州屏東、岡山和臺北等地廣設讀報社，陳列臺灣、日本國內和中國的各種新聞雜誌以供閱覽。其次，舉辦臺灣通史講習會、通俗法律講習會、通俗衛生講習會、通俗學術講座、西洋歷史及經濟學講習會等各種文化講習會。1924 至 1926 年間於霧峰林家萊園開辦夏季學校，講授課目包含哲學、憲法、經濟學、西洋文明史、科學概論、外國事情、社會學等。此

²³⁵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51-52。

²³⁶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5 年 1 月 16 日、18 日、20 日、22-23 日、25 日，未刊稿。

²³⁷ 不過癡仙公子林陳琅堅信癡仙是遭人毒害的，當時癡仙罹患感冒，一位陳姓醫師自願前來看診，但癡仙服下他開的處方不久，便發現情形不對，嚷著：「有人要害我、有人要害我。」遂藥到命除。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陳琅先生訪問記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 133。

²³⁸ 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頁 75-77，表五「臺灣文化協會幹部名單」；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336-338。

外，舉辦多次文化講演會。²³⁹在在顯示已有部分傳統文人具備開明的觀念，樂於吸收新知識，並積極將其理念傳佈給一般民眾。

再者，林獻堂積極領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蔡惠如、林幼春、林子瑾、林階堂等人也投入其間。²⁴⁰此一運動旨在要求臺灣設置議會，賦予臺灣住民特別參政權，以監督臺灣總督的施政。從 1921 年起至 1934 年為止，14 年間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 15 回請願。林獻堂為達成目標，廣結日本政要，多次奔波於臺日兩地，付出極大的心力，惜最後因局勢不容許再有作為而停止。²⁴¹運動進行期間，豐原地區的文人楊漢欽、²⁴²張慶雲、吳水木²⁴³等，特別至臺中餞別將赴東京請願的洪元煌、蔡培火、李山火²⁴⁴等人，²⁴⁵顯示該運動獲得不少傳統文人的支持。不過，王學潛的理念是完全自治，故與前述諸人意見不合，甚至

²³⁹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340-352。

²⁴⁰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 210-223，附錄六：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係人物表。

²⁴¹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 71-162。

²⁴² 楊漢欽：1887 年生，1911 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後任臺中刑務所監獄醫，1913 年在豐原開設四知醫院，1922 年任豐原信用組合監事。豐原吟社成員。唐澤信夫，《臺灣紳士名錄》（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19；景福基金會編，《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3。

²⁴³ 吳水木：1900 年生，豐原人。1913 年公學校畢業，1924 年任豐原製紙製材會社取締役，1927 年任豐原商工會副會長，1930 年任豐原街助役，後為豐原街協議員。亦為豐原吟社成員。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3），臺中州下，頁 102。

²⁴⁴ 李山火：彰化花壇人，在臺灣文化協會中十分活躍，後整理家業，帶數萬金赴漳州發展，卻被土匪綁架 9 個月，後給數千元了事。與國民黨左派接近，發行刊物，態度較激烈，遂被驅逐。後脫身到廈門，因臺共事件發生，被日本廈門領事送回臺灣監禁，1935 年 2 月才獲釋。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 330。

²⁴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13。

以言語譏誚請願同志。²⁴⁶儘管彼此對台灣前途的看法不盡相同，惟證明舊學出身的王學潛亦有自治的新思想。

在此同時，辜顯榮、林熊徵等人為打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 1924 年 6 月以「本島人」有志一同的名義向臺灣社會大眾提出申議，表示該運動非臺灣人之輿論，後在辜顯榮家中集會，成立「有力者大會」。為反制此親日組織，該年 7 月 3 日，林獻堂、林幼春、鄭汝南、蔡惠如等人特別組織「無力者大會」，分北、中、南三地同時舉行。中部大會由林幼春、蔡惠如、葉榮鐘擔任辯士，選林獻堂為座長。會中，林獻堂侃侃而談，講到隱微要點處，會員鼓掌之聲如放連環鞭炮一般。林幼春則將有力、無力雙提並論，指出：「財勢者有力也，但恃財勢夜行後門，攢得官營事業，聚利肥家，無力者有勢不敢凌人，有財不敢自重，似此比較，何異冠履倒置。」說到痛切處，會員拍掌如裂帛，不難想見其民族意識。²⁴⁷

在前述氛圍下，張麗俊即使從未接受過新式教育，亦未積極投入民族運動，但亦不排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曾多次至豐原聖王廟和慈濟宮，聆聽東京臺灣青年團、蔣渭水、律師布施辰治、²⁴⁸臺灣農民組合簡吉和趙港、連溫卿等人的演講。認為蔣渭水的演說旁徵曲遠，證近稽古，說到精彩處，鼓掌之聲如連響爆竹，乃將其與戰國時的蘇秦、張儀相提並論；對於簡吉的演講則形容切中時弊，且旁敲側擊，令人心領。²⁴⁹1923 年 7 月他出席豐原地方人士為赴

²⁴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37。

²⁴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21-224。

²⁴⁸ 布施辰治（1880-1953）：日本宮城縣人。1902 年畢業於明治法律學校，旋為司法官試補，一生傾向人道主義，故半年即辭職任律師，為米騷動等社會事件辯論，另方面從事普選運動。1921 年參加組織自由法曹團，1927 年來臺係為辯護二林事件。1931 年為了對日本共產黨公判鬥爭，任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辯護團幹事長，為司法當局所憎，翌年奪其律師資格。1933 年入獄 3 個月，1939 年被關 2 年。白井勝美、高村直助、鳥海靖、由井正臣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頁 915-916。

²⁴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32-233、437；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74、185-186、247-

東京請願台灣議會歸來的蔡培火等人舉行的歡迎會。²⁵⁰當廖進平因散發臺灣議會要求獨立、撤廢總督獨裁的行政之傳單而被捕後，他認為是當道大驚小怪，神經過敏。²⁵¹1930年3月2日更應邀親自登台演說，以「知覺容忍」四字為題，分析人生在社會之必要。²⁵²由此可知張氏已具有進步的觀念。

傅錫祺亦然，他雖如張麗俊未積極參與民族運動，但其〈演說〉一詩，生動地描寫文化協會辯士口若懸河的場景，並呈現對其所傳播的觀念之認同。其詩如下：

慷慨登壇拍手中，從頭一氣吐長虹。蚩蚩迷夢何時醒，貫耳雷聲為震聾。
詞源三峽瀉無窮，一氣呵成有始終。自具婆心因苦口，未容馬耳射東風。

253

1935年4月，總督府正式發佈關於地方制度改革的新法令，確立選舉制度，規定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半數由州知事官選、半數民選。採有限制選舉，需年滿25歲男子、營獨立生計、居住該市街庄6個月以上、年納市街庄稅5圓以上者，才具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但已使傳統文人首度有了選舉的經驗。蕭慶壽²⁵⁴曾描述選舉時「看板名標滿市頭」的盛況，對於選出的議員也有相當期許：

議員半喜歸民選，不待官方訓座開。一票清清良績舉，聯邦評判好聲來。
襄其善政賴賢才，不憚披金別玉來。婦女皆知權可貴，千鈞一票耀吾臺。

248。

²⁵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73-74。

²⁵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358-359。

²⁵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176。

²⁵³ 傅錫祺，〈演說〉，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172。

²⁵⁴ 蕭慶壽：字德宏，桃園龍潭人。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207。

林朝宗則曾陪同高雄州議員李才祉下鄉選舉，搭乘摩托車拜訪選民，體會到群眾頂禮又歡呼的滋味：「摩托車驅遍四區，逢人頂禮又歡呼。殷勤履歷從頭敘，當選才知德不孤。²⁵⁶」關於南屯庄協議會員選舉戰況的激烈，何天佑有如下的詩作：「陳林廖賴盡登壇，²⁵⁷謀奪高標忘寢餐。此日南屯成戰地，攻防布陣總堪觀。」²⁵⁸

據張麗俊指出，當時全臺產生參選協議會員熱潮。在豐原當地，呂大椿²⁵⁹召集有志參選協議會員的 12 人，在慈濟宮前舉行講演會，²⁶⁰一如今日的政見發表會。開票後，張麗俊記下參選者的得票數，足見他對生平第一次參加投票選舉的重視。他分析張慶雲落選的原因，是自恃票數多而掉以輕心，加上助選員不得其人所致。不過，他認為勝敗均無妨，因得之不足為榮，不得亦不足為辱，不過是四年之名譽罷了。²⁶¹

²⁵⁵ 蕭慶壽，〈步黃純青先生選舉韻〉，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207。

²⁵⁶ 林朝宗，〈與高雄州議李才祉君運動有感〉，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375。

²⁵⁷ 臺中州大屯郡南屯庄第一屆協議會員計 12 名，其中 6 名官選，6 名名選。所謂「陳林廖賴盡登壇」，即指陳榮烈、林金聲、廖朝樹、賴堂、賴錦泉 5 人當選為民選庄協議員，另一名民選當選者為張聘三。陳端堂監修，王建竹主修，《臺中市志卷三政事志行政篇》（臺中：臺中市政府，1977），頁 210-212。

²⁵⁸ 何天佑，〈南屯庄協選舉詞〉，《風月報》102（1940 年 2 月），頁 25。

²⁵⁹ 呂大椿（1891-1956）：字默庵，為呂鶴巢之養子。幼習漢學，後入臺中州農事講習所，同時也在神岡役場服務，又入苗栗法雲寺習佛。1930 年在豐原開彬彬書店，1933 年 12 月廢業。1934 年在豐原街建居士林，以振興佛教。戰後參選第一屆臺中市市長，惜落選。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中州下，頁 206。

²⁶⁰ 演講會於 1935 年 11 月 18 日舉行，但候選人中，只有張慶雲、林祚爐、林桂清、林進川等四人出席，張聯桂、廖進殿、翁炳焜、林柳枝、陳阿福、熊阿木、高等九平則缺席。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35。

²⁶¹ 此次選舉，林祚爐 212 票，林貴清 138 票，林進川 111 票，陳阿福 134 票，高井九平 131 票，張聯桂 127 票，陳水潭 105 票，林柳枝 95 票，廖進殿 93 票，熊阿木 92 票，以上 10 人當選。落

黃純青的〈選舉十詠〉詳盡且傳神地描寫選舉過程，舉凡候選人登臺演說發表政見、助選員在路上積極拉票、開票後幾家歡樂幾家愁、當選者的責任等，均有所描述，其詩如下：

改隸於今四十春，地方制度又翻新。議員選舉方針變，半數官權半數民。
為民為國願分憂，舍我其誰用我求。出馬堂堂稱候補，題名看板立街頭。
議員公選例新聞，權利初張第一回。今日方知民可貴，連朝志士叩頭來。
意氣揚揚上演臺，高談政見連宵開。願為公僕謀民福，聽眾爭先入座來。
路上相逢運動員，徽章認識挂胸前。東奔西走忙何事，到處吹噓訪有權。
得票開函發表時，當雖可喜落休悲。兵家勝敗尋常事，捲土重來信有期。
匹夫有責勝朝鮮，選舉成功少棄權。甚願關心自治者，倍加努力促完全。
粉身碎骨言猶在，犬馬協勞力可任。寄語榮冠當選者，毋忘公約負初心。
政壇論戰年年開，濟濟議員上舞臺。傍聽關心防變節，大家監視入場來。
官黨囂囂民黨鳴，自由論戰貴公平。黨爭毋國前車鑒，願戒效尤誤眾生。²⁶²

雖然西方式的選舉在臺灣掀起熱潮，但仍有部分文人對平等、自由、個人主義等西方思想採取全然否定的態度，並認為趨利競爭的功利主義是導致歐戰的原因，例如基隆的一峰云：「主平等則亂尊卑，尊自由則背禮法，行個人則骨肉無親，利爭競則私欲望重，惟彼但計利而不計害，知我而不知人，此歐洲大戰之所由起，而醉心歐化者不悟也。」²⁶³可謂保守主義的代表。

五、小結

選者張慶雲 91 票，僅一票之差，翁炳焜 58 票。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37-138。

²⁶² 黃純青，〈選舉十詠〉，《臺南新報》，第 12249 號，1936 年 2 月 9 日，頁 8。

²⁶³ 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7，頁 5。

部分傳統文人對於西洋史地和國際局勢已有相當認識，並努力吸收西洋的科學新知。例如櫟社詩會曾以〈華盛頓〉為題，從與會諸子的詩作中可見已相當了解華盛頓的事蹟，推崇華盛頓建立自由民主的政制；1927至1928年林獻堂遊歷歐美各國，回台後將所見所聞寫成〈環球遊記〉；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局也引起傳統文人的關心；以傳統文人為主要讀者的《臺灣文藝叢誌》，也有多篇介紹自然科學的文章。此外，不少傳統文人吸收民主自由的理論，林癡仙和林獻堂在詩文中流露出對自治、獨立的嚮往。在反思臺灣所處的地位後，不少文人參與臺灣文化協會，並聲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西方強國將科技文明運用於戰爭，而不思改善民生的舉措，也引起傅錫祺等人的撻伐。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傳統文人的兩性觀念仍極為保守，對於自由戀愛和男女社交公開抱持著反對的態度，尤其將1930年代盛行的社交禮儀跳舞，視為毒蛇猛獸，反映出傳統儒家男女授受不親的思想仍有強大的影響。此外，張達修等人不能認同部分人士獨重西學的作法，乃挺身而出為舊學辯護。

第五章 傳統文人生活觀念與習慣之改變

第一節 婦女觀念之改變

一、以高道德標準要求女性

深受儒家經典薰陶的傳統文人，心目中理想的婦女形象起初仍是具備三從四德，能孝敬翁姑又勤於相夫教子的賢內助，鄭虛一便勉勵其長子的繼室必須勤儉守家規，與丈夫相敬如賓，並成為家務得力的輔佐。¹林癡仙則常講述古烈女樂羊子妻及姜詩妻龐氏的故事，²給其妻謝氏端聽，³希望其妻能有所效法，後謝氏果然未讓林癡仙失望。

謝氏在癡仙赴科考前即屢勸其苦讀，以光耀門楣，每逢大比之年，更親至神前焚香祈禱。乙未之變後，因舉家內遷，顛沛流離，癡仙母陳夫人舊疾復發，幸賴謝氏呵護備至，方轉危為安。尤有甚者，謝氏因自己不孕，主動替癡仙蓄小星（納妾），癡仙完全蒙在鼓裡，直至某日歸家，驚見有陌生的少婦奉茶，才知此一安排。妾生之子夭折後，為延續香火，謝氏乃抱同姓兒為螟蛉子，並視如己出，完全以傳宗接代為念，不知妒忌為何物。平日勤儉持家，勤於簿記，癡仙頗稱讚其賢。⁴

¹ 鄭虛一，〈示長兒繼室阮氏盛治〉，收於鄭虛一，〈山色夕陽樓吟草〉，《虛一詩集》，頁145。其詩曰：「但期勤儉守家規，相敬如賓永倡隨。知汝讀書爛女戒，好將內政助吾兒。」

² 樂羊子妻的故事出自《後漢書》〈烈女傳〉，她批評樂羊子行路拾遺的錯誤，勸誡其不可貪小利而失大節，使樂羊子知錯即改。她亦告誡樂羊子不可中途廢學，說明求學必須專心致志，持之以恆，使樂羊子深受感動，完成學業。姜詩妻龐氏以孝順婆婆馳名，每日均至離家6、7里的江邊打水，供婆婆飲用。某日突遇大風，龐氏未能即時趕回家，婆婆又急著要喝水，因此遭丈夫責備並慘遭休妻。但龐氏並未心懷怨恨，反而借住鄰居家，日夜紡織，以賣布的所得購買食物，孝敬婆婆。其夫得知後，乃召其回家，兩人重歸於好。

³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年6月24日，未刊稿。

⁴ 林癡仙，〈哭內子謝氏端〉，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下》，頁236-238。

此外，夫死之後必須守節，不幸遭污辱則須以身殉，如此才堪為婦女的表率。施梅樵就認為一旦婚約成立，即使是嫁入貧苦人家，婦女亦不能有異志；若遭夫婿離異，則須毀容或斷臂。甚至婚前若未婚夫亡故，也必須形容憔悴，「頭插定盟簪，耳掛定盟珥」，以未亡人自居，永保貞節。總之，婦女必須將節烈視為份內之事，從一而終，才算明大義。⁵

在前述觀念影響下，具備貞、孝、節、烈等德行的女子常成為傳統文人歌頌的對象。所謂貞女係指「女未字在母家守貞者；若已字未嫁而夫死，赴夫家守貞者，曰貞婦。孝女為自誓在家守貞，奉養父母終老者；出嫁後孝養舅姑代替危難、婦代夫危難者，均為孝婦。節婦為年 30 以前夫死，而守節至 50 歲者；或年未 50 身故，而守節已六年者。烈婦指夫死以身殉夫者；至於遭遇盜賊強暴捐軀殉難者，婦曰烈婦，女為烈女。」⁶

林幼春、賴紹堯、傅錫祺、顏雲年、黃服五、徐杰夫等人曾頌揚鄭貞女。該貞女乃新竹鄭拱辰之千金，名王釵，號慧修，因其祖父奉佛，故孝於祖母，長齋不嫁，至 26 歲時去世。⁷還有一位陳貞婦，為牛罵頭蔡年亨之養母，過門前其夫即亡故，但仍矢志養姑，並養族子年亨以延夫祀，故深受傅錫祺推崇。⁸另蒙多位文人寫詩紀念的吳鸞，是臺南吳乃占之女，與某青年訂婚後，仍嚴男女之防，未婚夫對此大為不滿，而迫其作伴旅行，吳女不從所請，竟遭離緣，羞憤之餘上吊盡節。林耀亭乃詠嘆：「願教輕薄頹風泯，長使冰霜勁節堅。就義

⁵ 施梅樵，〈家嫂郭孺人六旬悅辰敬賦〉，施讓甫編，《鹿江集古詩部》，收於《梅樵詩集》，頁 13-14。

⁶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2-24。

⁷ 林幼春，〈鄭貞女詩〉，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 22；賴紹堯，〈新竹鄭貞女詩〉，《悔之詩鈔》，頁 7；傅錫祺，〈新竹鄭貞女詩〉，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56；環鏡樓主人，〈弔鄭貞女慧修〉，收於環鏡樓主人，《環鏡樓唱和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株式會社，1920 年），頁 107；黃服五，〈追弔鄭慧修貞女〉，收於《鷗社藝苑初集》（嘉義：鷗社，1951），頁 94；徐杰夫，〈貞女詩〉，收於《鷗社藝苑初集》，頁 111。歌詠鄭貞女的詩作，並編成《鄭貞女輓詩》（出版地、出版時間不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⁸ 傅錫祺，〈壽陳貞婦五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頁 97。

從容遺烈在，貞魂應繞法華巔。」⁹吳子瑜曰：「填海冤禽魂不滅，懷清貞女玉無暇。況當婦道凌夷日，得汝堪推守禮家。」¹⁰王則修則云：「青絲繫頸寧無怨，白璧持躬未有暇。伉儷難諧拼一死，延陵不愧大方家。」¹¹

林幼春第三子林太平的未婚妻許燉煌亦是一位貞婦。林太平曾至上海求學，後在臺北當記者。1930年親自照顧罹患惡性肺炎的母親，而不讓弟妹靠近，因怕他們被傳染。據林幼春言，太平「舉凡摩搔扶掖之勞、湯藥食飲之細、痰唾溲溺之穢，無不躬自任之。」¹²但不幸自身竟遭感染。其母過世後，更是困頓憔悴，形銷骨立，而於1932年12月19日亡故。¹³

太平的未婚妻許氏與太平同齡，起初女方父母見太平有病，不允婚姻，後經努力才成功。當太平病重時，其未婚妻許氏即欲飲石碳酸自殺，與太平共赴黃泉，幸未遂；¹⁴太平去世後，仍打算至林家守節，不願改嫁，經蔡培火的勸誘才打消該念頭。¹⁵由此可略窺當時的道德標準對女性的行為產生的制約。

二、蓄妾及流連花叢為常態

⁹ 林耀亭，〈吊吳鸞女士〉，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44-45。

¹⁰ 吳子瑜，〈弔吳鸞女士〉，《台南新報》，第8925號，1926年12月11日，頁6。

¹¹ 王竹修，〈弔吳鸞女士〉，《台南新報》，第8925號，1926年12月11日，頁6。

¹² 林幼春，〈孝子傳〉，轉引自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89。

¹³ 林幼春，〈孝子傳〉，轉引自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89；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504。

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448。

¹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511；蔡培火著、張漢裕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頁241-242。

傳統文人雖以高道德標準要求女性，但本身卻擁有三妻四妾，例如林幼春有二妻（元配、繼室）二妾，¹⁶陳懷澄亦有妾名美玉，應林瑞騰之請到黃竹坑別莊教林家子女漢文時，更攜妾自隨。¹⁷施家本則因父母之命很早就完婚，但行為依然放蕩，後來結識一名女子，至他去世為止一直是其外室。¹⁸

由於妻妾環伺，家庭不免引發風波。謝道隆之妾蔡紫薇即在謝氏夫婦亡故後，率其子謝秋汀與謝家長子謝春池爭財產，後經張麗俊調解，擬定財產分配承諾書，才化解一場風波。¹⁹至於蔡惠如與吳子瑜更因與愛妾之間的感情糾葛，而廣受時人矚目。

蔡惠如除原配張氏寬外，另有兩妾，一原是其母的丫環，稱為「素蘭姊」，一為女伶出身。²⁰據傳女伶出身之妾與惠如相識於 1910 年，當時她隨著戲班到霧峰萊園演出，慶賀林獻堂祖母羅太夫人 80 大壽，除蔡惠如外，亦與林幼春結識，三人因此傳出一段轟動地方的緋聞。²¹女伶成為惠如的妾後，備受寵愛，惠如因治警事件坐牢時，曾特別作詞相贈，言及「十七年間親愛，到今朝，更覺情癡。蒼天祝，宵宵魂夢，左右不相離。」²²可見用情之深。蔡惠如晚年不幸罹患腦溢血，據曾前往探視的蔡培火言，他往生當日因疑女伶與他人有

¹⁶ 林幼春原配為莊能宜，為莊嵩之妹，但 18 歲即過世，生林正熊。後又娶賴書為繼室，生林培英。兩妾一為王理（臺北奶），生林太平、林逢源、林長洪，後因肺病去世；一為何氏查某（新港奶）。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施璇璣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 76；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 88-89

¹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56。

¹⁸ 葉榮鐘，〈詩人施家本—記一個未完成的天才〉，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67。

¹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79、80、86、95、104。

²⁰ 謝金蓉，〈生平導論：從清水走向民族運動的舞台〉，收於謝金蓉編，《蔡惠如和他的時代》，2005），頁 114。

²¹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11。

²² 鐵生，〈滿庭芳獄中歲暮寄妾〉，收於《臺灣詩薈上冊》，頁 563。

染，遂大怒到發狂，雖已半身不遂，猶對其打罵不休，最後執女伶之手不放而至於死，²³可見這名愛妾是他死前唯一的牽掛。

吳子瑜的愛妾姓張名蘭英，東山詩會時常伴其左右，負責準備文具招待與會文人墨客。子瑜譽其平日常分奴婢之勞，不以閒暇自放，不蓄私財，不暴人短，更以校外生畢業於早稻田高等科及日本女子大學。²⁴後來因吳子瑜染指下女阿笑，蘭英嫉之，為之改雇，乃與子瑜衝突，遂服揮發油自殺身亡。此事曾登上新聞版面，文人學士亦多作輓詩、輓聯弔之，²⁵使吳子瑜顏面無光，為了自己的風流付出代價。不過他並未記取教訓，隔年又再娶二妾，享盡齊人之福。²⁶

至於張麗俊雖未納妾，但與情婦徐氏妹感情甚篤，兩人相交長達 28 年。由於徐妹本為他人婦，初期兩人來往十分隱密，後來徐氏與張麗俊家人日漸熟識，便時常至張家小住；又由於徐妹之夫後來不住家中，張麗俊也將徐妹之家視為他在葫蘆墩（豐原）的公館。徐妹過世後其喪葬幾乎全由張麗俊負責，可見兩人愛戀之深。²⁷情婦之外，張麗俊亦常與煙花女子相往還，從 1935 年 5 月 14 日的日記，即可略窺其交往複雜的程度：

²³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頁 94；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 149。但依謝金蓉的說法，蔡培火對蔡惠如的遺詞用句，是同時代人士留下的文字紀錄裡，最不客氣的一位，例如他曾批評蔡惠如「這個人沒什麼可取的地方」、「一生的事業無一項有成就」，因此其所言蔡惠如執女伶之手不放，以致於死的說詞，恐係經過渲染的道聽途說。謝金蓉，〈生平導論：從清水走向民族運動的舞台〉，收於謝金蓉編，《蔡惠如和他的時代》，頁 111-112。

²⁴ 吳子瑜，〈張蘭英墓誌銘〉。然吳子瑜此篇墓誌銘，並未陳述張蘭英的真正死因，反而說自己雖少生病，但每病輒劇，故蘭英嘗謂：「設有不測，願先主君赴地下！」不料竟踐約而去。吳子瑜又感嘆道：「輓近道德淪亡，於女界尤甚，而姬獨能潔身以死，比之悍潑淫奔者，何啻雲泥之隔？苟不記之，曷以慰泉下靈？」推崇張蘭英具備婦德。但吳子瑜此種說法，顯然有掩蓋事實，替自己脫罪之嫌。

²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42。

²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27。

²⁷ 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台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

晴天，往豐原漫遊，到詹氏好方，探問震災人物無損之幸。他又言姜氏秀又來問，欲適我，我之意如何。坐有頃，別到林氏員方，仍問全上。他數年前與我有舊，因戲謔之言激我，後又紹介游氏菊來伴我，因與顛倒一番。有頃出，在富春園午餐。午后欲歸，王氏香又留偃午，三時乃歸。今日俱與女流盤桓，何奇遇之多也。²⁸

可見張麗俊猶如萬人迷一般，極受豐原當地女流青睞。

事實上，傳統文人多將周旋於眾美人之間視為風雅之舉，林癡仙、蔡啓運、莊雲從、施梅樵等人均以沈湎酒色聞名。林癡仙常出現於妓筵歡飲中，身不離席，口不絕談，²⁹與莊雲從、陳懷澄、張棟梁、蔡啓運、林仲衡、林瑞騰諸詩友聚會時，也總會招藝妓到場彈唱，³⁰故在其詩作中，有大量自述酒色生涯或與妓唱和的作品，不無逞才與自命風流的用意；³¹蔡啓運則被描述成「每對鶯花倍有情，到處春風詩酒樂。」施梅樵也以「賦性風流，不拘小節」著稱，他稱自己「英雄第一無聊賴，日日銜杯對美人」。³²據曾受教於施梅樵的葉榮鐘回憶，施梅樵執教於書房時，下午常常宣布停課，原因是他要召妓；而其屋內也常有半老徐娘逗留。³³

當時文人的聚會每不乏藝妓侑酒唱曲助興，例如謝道隆自築生壙後，每逢佳期輒邀詩友前往吟詠，其間總有藝妓相陪，林載釗乃賦詩笑稱：「侑酒墳前

集》，頁 69-121。

²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53。

²⁹ 林幼春，〈叔父癡仙先生無悶草堂詩存序〉，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7。

³⁰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8 月 18 日、26 日。

³¹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頁 143-149。

³²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頁 103-105。

³³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335-336。

有麗姝，玉山醉倒遣花扶。不知百歲神遊後，依舊風流似此無。」³⁴1926年11月，稻江著名詩妓貞花前來臺中，吳子瑜爲此特別邀集櫟社諸友，召開臨時擊鉢會，以一睹佳人風采，貞花更特別作〈貞花遊東山贈子瑜〉詩。³⁵此外，出外訪友、踏青也會攜妓同行，1930年3月林獻堂與林資彬、洪元煌等人同遊草山，即有藝妓繡鳳、阿桂作陪，共作一日清遊。³⁶

由於時常出入溫柔鄉，在傳統文人的詩集中常見歌詠藝妓的豔詩，林仲衡即有贈與寶卿、美琴、圓圓、花月痕等不同校書的詩作，也有描寫在葫蘆墩、彰化、鹿港等地尋歡的作品。³⁷林維朝於1902年作詩贈秀枝女校書，詩中言：「年來最怕惹相思，邂逅逢卿不自持。露水姻緣寧註定，胡爲一件便情癡。」遣詞用字頗爲露骨。³⁸1912年也贈詩與芍卿女校書，對其淪落風塵的境遇頗爲同情：「一朵梨花帶雨寒，紅綃時染淚痕斑。憐卿薄命遭淪落，再抱琵琶舊調彈。」³⁹

在《東寧擊鉢吟》中充斥著以從良妓、妒妓、病妓、詩妓、俠妓、醉妓、瞽妓、啞妓、老妓、雛妓、歌妓等各式各樣妓女爲題材的擊鉢詩作。⁴⁰1930年創刊於臺南的《三六九小報》更闢「花叢小記」專欄，⁴¹每期介紹一位藝妓的生平事略和容貌特徵，多數並附有照片。在此種環境下，容貌出眾並具有才學的名妓成爲傳統文人愛慕及追求的對象，傳說藝妓葉香與林癡仙曾有一段情，而爲

³⁴ 林載釗，〈題謝頌臣先生生壙其三〉，收於王建竹主編，《台中詩乘》，頁181。

³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117。

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98。

³⁷ 林仲衡，《仲衡詩集》，頁186、187、202。

³⁸ 林維朝，〈壬寅二月贈秀枝女校書〉，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172。

³⁹ 林維朝，〈賦贈芍卿女校書〉，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230。

⁴⁰ 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18、32、44-45、51、72、73、75、101、250、269、270；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30、107-108、283。

⁴¹ 「花叢小記」後來數度易名爲「花間瑣語」、「花國芳訊」、「花叢琴韻」、「青樓瑣語」等。

人津津樂道；⁴²臺北藝妓王香嬋更先後與羅秀惠、謝介石、連雅堂滋生情愫，最後下嫁謝介石，易名香禪，成為滿洲國外交部總長夫人及駐日大使夫人。⁴³

隨著時代演進，聲色場所的形態也產生變化，1930年代出現新興的咖啡館，成為名人雅士時髦的聚會場所，《三六九小報》曾載：「……尋芳買醉，現已舍酒樓而趨咖啡店矣。燈紅酒綠，粉膩脂香，燕瘦環肥，左宜右有。群花招展，肉屏風也。蠻腰巧折，天魔舞也。唱片妙響，流行曲也。心身陶醉，五色酒也。時代人之官能。於是乎享樂之亂舞，盛哉咖啡店，尖端時代之寵兒也。」⁴⁴有美酒美色，又能聽到流行曲，難怪咖啡館成為熱門的去處。

服務於咖啡店的女服務生稱為「女給」（女招待），工作是端送飲料和食物，並且免費陪客人同席談天，於是女給繼藝妓之後，成為文人追逐的目標，林鷺洲曾詠女給，云：「人前未敢苦相留，宛轉歌聲略帶羞。形跡生涯娼妓異，不容雲雨在樓頭。」⁴⁵言其格調較高，賣藝不賣身，與娼妓迥然有別。《風月報》及其前身《風月》，內容便是以女給的贈詠及寫真為主。紗籠奧稽女給美惠子曾被如此形容：「身軀瘦小，肌膚映玉，聰慧活潑，酒籌歌板，壓倒群芳，其應酬手腕，女給中堪稱第一。」⁴⁶1934年10月臺中東本願寺住持藤澤辦謝恩會，更招日臺咖啡女給同往參拜，以表示日臺名花之融合；⁴⁷翌年，女給甚至在臺中公會堂聯合演劇，據說人眾擁擠，幾無立錐之地，⁴⁸由此可見當時女給受歡迎的程度。

⁴² 楊雲萍，〈無悶草堂詩存未收作品舉略〉，收於楊雲萍，《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板橋：臺灣風物雜誌社，1993），頁596-597。

⁴³ 廖毓文，《謝介石與王香禪》（臺北：南華出版社，1956）；邱旭伶，《臺灣藝姐風華》，頁160-170。

⁴⁴ 《三六九小報》，第282號，昭和8年4月23日，頁4。

⁴⁵ 林鷺洲，〈女給〉，《詩報》，第276號，昭和17年7月24日，頁20。

⁴⁶ 晴雨，〈美惠子〉，《風月報》19（1935年8月），頁4。

⁴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88。

⁴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312。

林獻堂常偕友至臺中月宮、紅風車、西湖、富士等咖啡館飲酒休憩，某日特地前往大屯咖啡尋找蔡季蓀之女、賴宗棠之媳，因賴、蔡兩家原為富戶，家道中落後，蔡女無法謀求溫飽而淪落為女給，林獻堂深感可憐。⁴⁹又有一次在月宮咖啡勸女給桃戒煙，而桃聞言後立刻不吸，林獻堂大為感佩，隔年再度相見時，對其大為褒獎。⁵⁰上述事例，顯示咖啡館是文人常去的社交場所，不過林獻堂在娛樂應酬之餘，仍表現出比常人多的人道關懷。

傳統文人常出沒歡場，因此若對衛生措施稍有閃失，極易感染隱疾。林癡仙就曾為淋病所苦，他在 1906 年 6 月 18 日的日記寫道：「淋痔復發，加以頭暈眼花，頗覺委頓。」⁵¹坦承自己罹患淋病，並且說是復發，可見之前早有病史。此後他每日均至臺中安田稻實的醫院看病，服用藥丸，並以外用藥水及藥膏擦拭，⁵²甚至禁飲冰水，以免藥效不彰。⁵³經過一番折騰，至 30 日總算大致復原，遂停止用藥。⁵⁴不過數日後病情又急轉直下，這次他改往臺中醫院求醫，⁵⁵至 7 月 18 日才正式痊癒。⁵⁶為求徹底斷根，癡仙於痊癒後又買淋油來服用，持續服用一週後才停止。⁵⁷故他曾作詩自嘲道：「風流誤我費針砭，藥裏床頭日日添。」⁵⁸

⁴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84。

⁵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10；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12。

⁵¹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6 月 18 日。

⁵²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6 月 20 日、22 日、23 日、24 日。

⁵³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6 月 25 日。

⁵⁴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6 月 30 日。

⁵⁵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7 月 10 日。

⁵⁶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7 月 18 日。

⁵⁷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7 月 19 日、28 日。

⁵⁸ 林癡仙，〈病中戲作〉，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178。

當癡仙至臺中醫院接受治療時，碰巧遇見林獻堂也在醫院，蓋與癡仙均受淋病之苦也，⁵⁹兩人在這種場合巧遇，是否尷尬外人不得而知，不過由此可知林獻堂早年亦頗風流浪漫。葉榮鐘曾說林獻堂年輕時常駐足於臺中的秦樓楚館，甚至在好友的慫恿下到豐原去作狎妓之遊，⁶⁰這與他中晚年時處理男女關係的嚴謹，顯然有別。⁶¹

張麗俊則於 1932 年感染梅毒，導致跨下生橫絃，行步不便，拖延年餘，後至醫院手術方癒。⁶²最慘的是，當時他已步入老年，卻染此少年人不名譽的病症，因此，住院時有部分親友不願前來探視。對此張麗俊頗感委屈，他認為自己雖然風流，但亦必有相當婦女方敢與之交，並非不顧名譽品格的無恥之人。⁶³風流與下流之別，他心中其實是有一把尺，然而即使相交之婦女經過選擇，仍招引惡疾上身。

綜合上述，傳統文人認為為人妻者應該賢淑、貞節，然己身卻畜養婢妾，甚至流連風月場所，夫妻雙方的地位相差懸殊。對此，正房妻子似乎只有隱忍一途，因為嫉婦為七出之律之一。舉例而言，蔡啓運雖已有一妻兩妾及兩奴婢，但仍陶醉於青樓美色。其妻林次湘，雖富有文采亦能詩，只能將無奈的心情寄託於文字，其〈調外〉一詩寫道：「一樹梨花獨挺姿，驚風耐雨幾多時。無情最是痴蝴蝶，忙裡尋春過別枝。」⁶⁴即是其無言的抗議。

⁵⁹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年7月10日。

⁶⁰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14。

⁶¹ 林獻堂終身未納妾，但晚年與林家女傭施秀玉滋生情愫，秀玉並替其產下一子。不過獻堂的生活大抵仍算嚴謹。林博正主講、林蘭芳紀錄，〈說我霧峰林家〉，《臺灣文獻》57：1（2006年3月），頁76-77。

⁶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236-237、261-263、265-266。

⁶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270-271。

⁶⁴ 林次湘，〈調外〉，收於鄭鵬雲編，《師友風義錄》（臺北：廣文書局，1981），頁31。

三、婦女觀念的改變

上述對婦女的傳統觀念，隨著時代的進步，慢慢出現變化。1920年代起在臺灣風起雲湧的文化啓蒙運動，使得婦女問題在島內開始受到關注，1923年臺灣文化協會將「尊重女子人格」一款列入其年度新設事業中，⁶⁵其後並於全臺各地舉辦數次以討論婦女問題為主軸的大型演講會。⁶⁶《臺灣民報》中觸及婦女問題的文章數量也極多，對婦運人士及相關活動之報導也很熱心。⁶⁷傳統文人如林幼春，本身即為臺灣文化協會協理及《臺灣民報》社長，鄭汝南、洪元煌、蔡惠如、陳貫、林載釗、林仲衡曾任文協理事，王學潛、黃欣、楊仲佐、魏清德、林子瑾曾為評議員，⁶⁸思想多少會受到衝擊。

此外，部分文人因曾赴國外旅遊，視野也更為開闊，林維朝於1907年前往東京參觀博覽會，發覺日本婦人或肄業於學校，或從事於農工商業之間，各有職事，無異男人，究其因皆是不纏足之故，故回臺後大力鼓吹婦女解纏。林維朝並提出纏足有四大害：一、女子身軀柔弱，纏足後必大傷元氣，是以纏足會導致傷身；二、女子原有操持家務之責，纏足後行走尚且需人攙扶，無法親操井臼，是以纏足會妨礙其職務；三、若遇戰爭或火災，纏足之女子由於寸步難移，必無法逃難，是以纏足會傷其生命；四、纏足者無能力耕作於田間，是以纏足會妨礙農事。⁶⁹

⁶⁵ 臺灣文化協會本部，〈臺灣文化協會會報〉，《臺灣民報》，卷2號4，大正13年3月11日，頁15。

⁶⁶ 〈（臺灣近情）彰化盛開文化演講〉，《臺灣民報》，卷3號3，大正14年1月21日，頁3；〈婦女問題大講演〉，《臺灣民報》，第116號，大正15年8月1日，頁9；〈通霄大甲的婦女講演〉，《臺灣民報》，第117號，大正15年8月8日，頁8；〈基隆婦女問題講演會〉，《臺灣民報》，第135號，大正15年12月12日，頁6。

⁶⁷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23。

⁶⁸ 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75-77，表五臺灣文化協會歷任幹部名單。

⁶⁹ 林維朝，〈東遊紀略（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850號，明治40年11月1日，頁

林獻堂於 1927 年 5 月偕其二子攀龍、猶龍展開歐美之旅，曾至英國眾議院旁聽，驚覺議員中有 8 名女性，其中一人甚至是女優（女明星）。⁷⁰又從報上得知，該名明星議員在議會夏季休會期間，仍舊重返舞臺，繼續其演藝事業。⁷¹當時，臺灣非但婦女無參政權，遑論向來被視為玩物的女優能獲選為國會議員，因此林獻堂頗感訝異，認為這是東西方特異之處。至丹麥時，則注意到當地政府為婦女設有特別教育機關，教授烹飪術及家政學，是以丹麥婦女個個都持家有則，烹飪技術亦超等絕倫。⁷²英國婦女可出任民意代表、女優有社會地位、丹麥設立婦女學校等情形，均促使其反思臺灣婦女的處境。

不過傳統文人對婦女的看法原就存在個別差異，並非人人均隨著時代有所改變，例如林獻堂原對婦女即有較為開明的觀念，而張棟梁則較保守。文協於 1927 年 2 月修訂會則時，張棟梁便極力反對男女平等的條款，他告訴林獻堂，既主張男女平等，若他有 10 甲土地，豈非必須分 5 甲給予女子不可，否則就是不平等；而且臺灣婦女甚為驕悍，若再主張平等，則將不可收拾。但林獻堂告訴他，以財產來解釋男女平等實為謬誤，闡釋平等應以人格為著眼點，若視婦女為人，就要尊重其人格，此才是平等的大意；而婦女驕悍，是其未受教育所導致，並非不能平等之原因。⁷³但整體而言，傳統文人已日漸重視與婦女有關的議題，崇文社⁷⁴多次徵文的主題均與女性有關，描寫新時代女性的漢詩作品也為數不少。茲略述傳統文人的婦女新觀念如下：

4。

⁷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140；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 296。

⁷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162。

⁷²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 392。

⁷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65。

⁷⁴ 崇文社：原本只是一個祭祀文昌帝君的神明會，1917 年彰化塾師黃臥松因憂心道衰文敝，乃募集社員，重修倉頡、沮誦牌位，於春、秋兩季，祭拜文昌帝君、倉頡等神明。翌年「因憤慨風俗頹壞，人心不古」，黃臥松遂與賴和、吳貫世倡議徵文，召集以彰化為中心的中南部文人正式籌

首先，重視女子教育。1895年起，日本藉由〈高等女學校章程〉和〈高等女學校令〉的發佈，正式將婦女教育納入教育體系。同時，日本透過在北京發行的中文報紙《順天時報》，將女子教育的理念傳播至中國。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服部宇之吉則多次向慈禧太后進言興辦女學的重要性。⁷⁵在台灣方面，日治之後，女子教育正式列入學制，1919年女子教育設施正式確立，設有女子高等普通學校；1922年進而設立高等女學校、家政學校等。⁷⁶

由於總督府的宣導，傳統文人逐漸體認女子教育的重要，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相關言論。崇文社社長黃臥松⁷⁷即云：「嗚呼！二十世紀號文明，人生最患無教育，學問豈在重男兒，且夕咿唔勤閨閣，化行俗美不待言。」⁷⁸王則修則倡言女子不受教育將有不孝公婆、不知廉恥、無才德、無智慧、失忠義之虞；若受教育則可開其知識、長其才力、有大家風範。⁷⁹因此傳統文人家中的年輕女子不乏接受新式教育，甚至赴日留學。林獻堂之女林關關 9 歲即赴日本，寄居嘉納治五郎家，自此在日本受教育，直到就讀淑德高等女學校二年級，因祖母念孫心切而回臺，繼續在長榮女中完成高中學業，畢業後入東京女子大學就讀，

組該社，以黃臥松為社長，經費由地方人士自由樂捐。其徵文活動持續至 1941 年，長達 25 年之久。施懿琳，〈日治中晚期臺灣漢儒所面臨的危機及其因應之道—以「崇文社」為例（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 272-273。

⁷⁵ 陳延媛，《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5），頁 78-80。

⁷⁶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頁 58-70。

⁷⁷ 黃臥松（1876-1944）：彰化人，號筆俠，幼時曾拜陳百川為師，後為漢文塾師。一人獨撐崇文社大局，每月徵文的投稿，都由其親自謄錄，並聘請文宗，詳加評審。日治後期易名為廣本富松。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頁 70-76。

⁷⁸ 黃臥松，〈南投廳下阿冷社蕃婦羅馬斯那威〉，《廖孝女詩集附二蕃烈婦》，收於黃臥松編，《彰化崇文社十五週年紀念圖》（嘉義：蘭記書局，1931），頁 12-13。

⁷⁹ 王則修，〈女子教育論〉，收於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頁 2-4。

二年級時又應祖母之要求而回臺；⁸⁰莊嵩的姪女施翩翩也於 8 歲時就學東京，據稱考試常名列前茅。⁸¹

女性傳統文人亦了解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張李德和在長女張玉英赴日本就讀女子大學前夕，對於女兒不讓鬚眉深以為傲，並勉勵其學成歸國後能報效故鄉，吟道：「乘風不讓男兒志，破浪偏誇姪女胞。無限前途須自重，學成歸顯故山岫。」⁸²黃金川則作〈女學生〉一詩，期許負笈東京的女學生能刻苦向學，不可將天賦糟蹋，曰：

詎甘綉閣久埋頭，負笈京師萬里遊。雌伏胸愁無點墨，雄飛迹可遍寰球。
書深莫被文明誤，學苦須從哲理求。安得女權平等日，漫將天賦付東流。

83

顯示其觀念之進步。

其次，提倡男女平等。王則修認為國家之戶口中，男女各居其半，若重男而輕女，則國家產生半數無用之人，即少半數有用之人，而家何能富？國何能強？⁸⁴陳永諧進一步主張女子應有參政權，強調：「男子有參政權，女子亦有參政權，夫然後全國之內，無一人不得其平，舉國之人，無一人不得其所。有平等之民，斯為平等之國。」⁸⁵

⁸⁰ 〈故高林關女士告別禮拜〉，臺北濟南基督長老教會，1996年。

⁸¹ 莊嵩，〈哭表姪女施氏翩翩並序〉，收於莊嵩，《太岳詩草》，頁 69-70。

⁸² 張李德和，〈長女留學臨別賦示〉，收於江寶釵編，《張李德和詩文集上》，頁 55-56。

⁸³ 黃金川，〈女學生〉，收於陳黃金川，《金川詩草》（臺北：陳啓清先生慈善基金會，1991），頁 36。

⁸⁴ 王則修，〈女子教育論〉，收於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頁 7。

⁸⁵ 陳永諧，〈國民性涵養論〉，收於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1，頁 8。

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不少文人檢討納妾蓄婢的習俗，陳材洋⁸⁶認為蓄妾會引發家庭風波，養婢會導致主婦虐待，皆是不重人道之生成平等也。⁸⁷張達修進而提倡一夫一妻制，認為蓄妾之家庭頻生變故，臺人應引以為鑑，主張「上古一夫一婦，肅肅雍雍，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初未嘗有嬖妾之目。迨中古以後，納妾之風盛行，寵妾之事亦相繼而起。」⁸⁸林獻堂由於家族成員大多妻妾成群，更是經常目睹蓄妾的弊害，例如其堂兄林澄堂亡故後，其妾簡輕煙和賴麵為了分財產，竟連鏹甕、碗盤、椅棹等亦互相爭奪，引發一場風波；⁸⁹某次其弟林階堂之妻施金紗要求生活費用每月增加 60 圓，階堂竟大怒，以最下流之語怒罵之，幾至動粗。林獻堂不禁感嘆：「唉！有妾之家庭無處無此風波，可不慎哉！」⁹⁰

同時，也有人質疑詩會時召妓陪酒的風習，筆名百舌籠者認為全臺聯吟大會與其在臺中公會堂舉行，並招藝妓陪酒，不如在臺中公學校舉行，借用童子捧茶攤箋為宜，⁹¹也是一種反省。王達德對於為貧所驅而淪為娼妓的女子更是深表同情，認為細民謀生匪易，當局對此可憐社會若無妙策以善其後，恐墮落之女子會更多。⁹²

此外，部分文人不再重男輕女，女兒若有才華亦引以為榮。吳子瑜的獨生女吳燕生因能詩，頗有乃父之風，故深受寵愛，子瑜常帶其出席櫟社詩會，並讚其「掌珠女勝兒豚犬，不愧延陵舊世家。」⁹³意指成器的女兒遠勝不肖的兒

⁸⁶ 陳材洋：1868 年生，名湛恩，字材洋，鹿港人。光緒年間中進彰化縣學為生員，日治後為鹿港大治吟社社員。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頁 88。

⁸⁷ 陳材洋，〈舊慣取捨論〉，收於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5，頁 36。

⁸⁸ 張達修，〈寵妾弊害論〉，收於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8，頁 41。

⁸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180、182、183。

⁹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172。

⁹¹ 《台南新報》，第 08653 號，1926 年 3 月 14 日，頁 10。

⁹² 王達德，〈東遊鴻爪〉，收於王達德，《瘦鶴詩書集》，頁 302。

⁹³ 吳子瑜，〈長女燕生志在中國詩以助之〉，收於王建竹編，《台中詩乘》，頁 223。

子，一樣能延續家學風範。吳燕生戰後曾代表臺灣參加第二、三屆世界詩人大會，成為頗負盛名的女詩人。⁹⁴

第三，肯定職業婦女。1920年代前後一些婦女開始投身職場，雖然大多侷限在看護婦（護士）、產婆、教員、女工及服務性質的公車車掌、交換姬（電話接線生）、女給（女招待）等，但已呈現出新興的氣象。任看護婦、產婆、教員必須學有專精，即使是當交換姬和車掌也要具備公學校畢業的學歷，⁹⁵因此，職業婦女的出現是日治時期女子教育日漸普及的成果。其中，交換姬和車掌是臺灣開始有民用電話和公車後才出現的新職業，女性以其輕柔的聲音和柔軟的身段，快速地攻佔這塊新領域。惟應徵者甚眾，錄取不易。1933年臺北汽車欲甄選10名臺日籍女性車掌，應徵者達100人以上，以致落選者超過三分之二。⁹⁶

傳統文人頗為注意這群職業婦女，並以此作為吟詠的題材。周文俊⁹⁷曾以〈職業婦女〉為題賦詩，顯示職業婦女已是當時頗受矚目的新族群，他吟道：「炊事從茲仗小姑，獻身社會不能無。妾家自有扶持願，薄俸還堪助丈夫。」⁹⁸雖然炊事必須依賴小姑，似有虧主婦的職守，但頗為肯定其獻身社會，並以薪資幫助丈夫養家。當時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成為醫生及律師，由於仍屬鳳毛麟角，自然成為傳統文人讚嘆的對象。林玉書形容女律師是「不讓鬚眉獨佔先，裙釵也許護民天。法廷拓出新生面，雄辯時開舌底蓮。」⁹⁹劉崧甫¹⁰⁰以為女醫師的出現，是男女平等的結果，因為「今日女權推並等，杏林莫怪

⁹⁴ 鐘義明，《臺灣的文采與泥香》，頁170。

⁹⁵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217。

⁹⁶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220。

⁹⁷ 周文俊：字國彬，嘉義義竹人。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頁222。

⁹⁸ 收於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頁222。

⁹⁹ 林玉書，〈女律師〉，收於林玉書，《臥雲吟草》，頁53。

¹⁰⁰ 劉崧甫：1898年生，字曉峰，臺中北斗人。漢學修習後，入二林公學校，1918年畢業，同年4月任九塊厝保甲聯合會書記。1920年任大城庄會計役，1922年辭職。1924年起，連續8年任庄協議會員。1932年任《臺灣新聞》北斗駐在記者，1938年任《高雄新報》二林出張所所長。1939

有桃花。」¹⁰¹許水金¹⁰²則推崇女醫師的醫術，他云：「術有華陀仁董奉，蒼生應拜似觀音。」¹⁰³此外，即使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護士，如果兢兢業業，也能獲得文人的肯定，楊存德¹⁰⁴即形容護士：「情同慈母轍臨床，助檢寒溫好處方。最是留神觀病勢，婆心無暇顧梳妝」。¹⁰⁵

至於交換姬和車掌，也引起文人莫大的興趣。涵卿有〈交換姬〉一詩，云「玉手纖纖按電筒，路途雖遠話能通。願較女士須留意，莫誤將西接到東。」¹⁰⁶期許她們即使做簡單的接線工作，也應兢兢業業，不出差錯。茂松則曰：「年少分明耳聽聰，為傳電話遍西東；時時姊妹分班守，免得宵來語未通。」¹⁰⁷描述交換姬日夜輪班的情景。在車掌方面，失名云：「行止頻教負職任，左持車券右收金。憐她嬌小知生計，堪作車中模範箴。」¹⁰⁸描述車掌盡忠職守，忙著收票及收零錢，堪為模範。曉庵則曰：「長裙短髮衣開襟，轆轤聲中倩影臨。昇降有權休賤視，七香車上載千金。」¹⁰⁹直言車掌負責乘客上下公車之權，亦不應賤視。由此可見，走出家門的婦女慢慢獲得傳統文人的認同。

嘉義文人余塘的次女余奇花也投入職場，教授裁縫。奇花畢業於東京品川區目黑杉野女學院家政系，1942年在嘉義市開設「嘉義服裝洋裁講習所」，設

年當選民選協議會員。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422；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312。

¹⁰¹ 劉崧甫，〈女醫〉，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311。

¹⁰² 許水金：字涵卿，新竹人。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167。

¹⁰³ 許水金，〈女醫〉，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167。

¹⁰⁴ 楊存德：字達三，新竹市人。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182。

¹⁰⁵ 楊存德，〈看護婦〉，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182。

¹⁰⁶ 涵卿，〈交換姬〉，《詩報》，第167號，昭和12年12月19日，頁10。

¹⁰⁷ 茂松，〈交換姬〉，《詩報》，第167號，昭和12年12月19日，頁10。

¹⁰⁸ 失名，〈女車掌〉，《詩報》，第110號，昭和10年8月1日，頁9。

¹⁰⁹ 曉庵，〈女車掌〉，《詩報》，第110號，昭和10年8月1日，頁9。

帳授徒，余塘對此欣慰有加，可見其已體認婦女如學有專長而具相當才幹，是一件可喜之事。¹¹⁰

第四，贊同女子體育。體育是指以身體活動為手段的教育，語出英文的 physical education，直譯為身體的教育。廣義的體育與體育運動涵意相同，包括身體教育（即狹義的體育）、競技運動、身體鍛鍊三方面。¹¹¹若以體育活動（physical activity）來看，臺灣民眾是接受日本統治以後才開始涉獵新式的、西式的、現代式的體育活動。

隨著公學校設立體操課程，臺灣女性開始接觸體育。不少學校最初實施遊戲或戶外活動等簡便的運動，激發女學生的體育興趣，例如遠足、修學旅行、登山、團體操等。其後，課程進化為體操與競技訓練，使女學生的身體日趨強健，養成運動習慣，甚至代表學校參加校際、地方或全臺性田徑賽或球賽，不再是深居閨閣、弱不禁風的女子。¹¹²

部分開明的傳統文人對婦女的運動表現給予喝采。例如林仲衡某次前往臺中公園，看到婦女不僅能騎自行車，還能泛舟、騎馬，不禁讚嘆「女流體育誰爭及」。同時，也因自己只知埋頭讀書，在體育方面不及婦女而覺得汗顏。¹¹³黃水沛¹¹⁴出席中華中學女子籃球選手歡迎會之後，也認為文明教育不應只注重文事，若要講求武備，首先要重視體育；而女子以籃球強身，將來可為國家生

¹¹⁰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245-246。

¹¹¹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頁350-351。

¹¹²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2000年6月），頁1-75。

¹¹³ 林仲衡，〈台中公園泛舟即事〉，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157-158。

¹¹⁴ 黃水沛（1884-1959）：字春潮，臺北大龍峒人。1903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後任臺北郵便局事務員達9年。1912年任三井物產會社社員，1920年在臺北組織臺北興殖株式會社，任專務取締役。1925年組織臺北州米穀商同業組合，任專務理事。1934受大日本米穀會表彰。漢學造詣深，擅長漢詩五、七古和律詩，1917年組織星社，執其牛耳。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131-132。

下健兒，堪稱黃金母。¹¹⁵張麗俊曾數次前往豐原女子公學校觀看女子運動會，雖然在日記中對運動會的項目和內容無所著墨，但亦無批判之意，顯然也接受女性從事運動的風氣。¹¹⁶

第五，鼓勵女性文人。異於過去視無才女子為有德的觀念，許多傳統文人開始欣賞富有文采的女性，並且不吝給予獎勵扶持。連橫即頗為仰慕藝妓王香禪，香禪曾向其請益詩學，連橫告其運典構思、敷章定律應先學玉溪，遂以《義山集》授之，¹¹⁷後香禪讀之大悟，詩風為之一變，連橫便常刊登她的詩作於其創辦的《臺灣詩薈》上，並且對其才學多所讚美，稱譽王香禪的詩斐然成章。¹¹⁸1924年臺北吳瑣雲女士邀集同志設立漢文研究會後，因其以女流之身出面結社，社會上對其存有疑慮者頗多，但連橫認為今日之女子非復舊時之女子，應與男子同負社會盛衰之責，況且研究漢文尤為正當，故深嘉其志，而祝其會之成。¹¹⁹張李德和入選臺展後，¹²⁰林玉書也獻上誠摯的祝福，並確信臺灣的巾幗界已經開始揚眉吐氣。¹²¹

¹¹⁵ 黃水沛，〈中華中學女子籃球選手歡迎會感作〉，收於黃水沛，《黃樓詩》（臺北：龍文，1992），頁40。

¹¹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42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126。

¹¹⁷ 《義山集》為唐朝詩人李商隱的詩集。李商隱（約813-858），字義山，號玉溪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泌陽）人。連橫以《義山集》授王香禪，是希望她以李商隱為師。

¹¹⁸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上冊》，頁100。

¹¹⁹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上冊》，頁180。

¹²⁰ 張李德和於1933年以畫作「庭前所見」，參加臺灣教育會主辦的第七回臺展，第一次獲得入選。1936年再以「木瓜」，再度入選第十回臺展。1938年以「閑庭」，入選臺灣總督府文教局主辦的第一回府展。1939年以「蝴蝶蘭」得第二回府展特選，翌年第三回府展再以「扶桑花」亦得特選，1941年第四回府展仍以「南國蘭譜」獲得特選。因連續三屆獲得特選，1942年第五回府展以「鳳凰木」參展時，便獲得「無鑑查推薦」特點，而轟動臺灣畫壇。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256-257。

¹²¹ 林玉書，〈祝德和女史臺展入選〉，收於林玉書，《臥雲吟草》，頁36。

林獻堂鼓勵婦女向學更是不遺餘力，曾於 1925、26 兩年在霧峰分別舉辦「霧峰婦人國語漢文研究會」及「婦女研究會」，傳授當地婦女漢文與日語等一般知識。¹²²當時林瑞騰之妾洪浣翠以擅吟詠聞名，林獻堂常與其切磋詩學，並與林瑞騰同步其韻。¹²³當他得知浣翠有心深入研究漢文，也深表贊成，並加以勉勵；¹²⁴並借予《飲冰室文集》及林琴南翻譯之小說，供其研究學問。¹²⁵

林獻堂與澎湖蔡旨禪也有一段淵源。1927 年旨禪至霧峰林家頂厝擔任家庭教師，乃與林獻堂成爲詩友，林不僅爲其改詩，也常和其詩，故詩藝日益精進。她前後在霧峰滯留 6 年，1934 年想至中國廈門美術學校研習美術，但欠缺經費，幸獲林獻堂資助百金方得以成行。¹²⁶1939 年旨禪再隨呂鐵州學畫，每年束脩 120 圓，亦由林獻堂獎資助。¹²⁷總之，蔡旨禪能在文壇及畫壇有一席之地，林獻堂實有功焉。

第六，鼓勵妻女參與公眾活動。由於林獻堂的觀念開明，其夫人楊水心乃成爲活躍的婦女，1932 年 2 月曾前往香港、廈門旅遊，¹²⁸1937 年 2 月更至東京遊歷，¹²⁹雖然楊水心出國有他人作陪，旅途中也有人招待，但出國的目的並非陪同夫婿，在當時實不多見。此外，她亦時常到臺中參加「臺中婦女親睦會」的活動，且擔任理事長。該會係臺中地區著名紳商的夫人所結成，包含醫師郭東周夫人、陳焯夫人謝吻（後改名謝綺蘭）、體仁醫院院長陳朔方夫人、陳逢

¹²²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一八九七～一九四七》（臺北：自立報系，1989），頁 172-175。

¹²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101。

¹²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13。

¹²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99。

¹²⁶ 許雪姬總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十四人物志》（澎湖縣馬公市：澎湖縣政府，2005），頁 104-106。

¹²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86。

¹²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83、90。

¹²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66。

源夫人郭希韞¹³⁰、彭華英夫人蔡阿信¹³¹等，用意在聯絡感情交換知識，力求婦女生活之進步。¹³²1930年10月7日臺中婦女親睦會成立當天，楊水心擔任議長一職，由於楊氏先前缺乏主持會議的經驗，前二天乃先在家中預演，由林獻堂及其子林猶龍指導，¹³³可見林獻堂對於家中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抱持積極肯定的態度。除楊水心之外，楊雪霞（林雲龍之妻）、陳淑寬（林烈堂之妻）、林碧霞（林烈堂次女）、林呂雨（林垂明之妻）、吳素貞（林資彬之妻）等霧峰林家女性也參與臺中婦女親睦會，¹³⁴顯示其家風相當開放。

林獻堂本身也參與「臺中婦女親睦會」的活動，1930年年底，他親赴臺中市民館的會場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婦人之天職」，認為相夫、教子、治家、交際為婦人的四大要務，共講90分鐘；¹³⁵隔年2月，婦女親睦會假霧峰林家開會，楊水心致開會詞後，獻堂引導與會婦女至萊園登樓拜墓，並在考槃軒前休憩，由於尚有時間，獻堂乃談小說，講《佛國寶》一段；¹³⁶9月該會召開一週年總會，獻堂亦出席，並以「忍耐」為題發表演講，¹³⁷持續以行動支持這個婦女團體。

¹³⁰ 郭希韞：台南人，1909年畢業於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後任教於台南第二公學校，當時臺灣的女教師仍如鳳毛麟角。1913年元月嫁陳逢源。謝國興，《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一八九三～一九八二）》（臺北：允晨文化，2002），頁32-39。

¹³¹ 蔡阿信：1920年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為臺灣最早的女性醫師，1926年在臺中開設清信醫院。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台中州下，頁13-14。

¹³² 〈婦人智識階級團結！台中婦人親睦會成立〉，《臺灣新民報》，第333號，昭和5年10月4日，頁3。

¹³³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332；楊水心，〈楊水心日記〉，1930年10月5日，未刊稿。

¹³⁴ 張耀錡提供，〈昭和五年拾月七日台中婦女親睦會發會式紀念〉相片，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書前照片部分。

¹³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415。

¹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64。

¹³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04。

儘管傳統文人有前述觀念上的革新，然而其對婦女的衣著及在公開場合的行爲舉止仍持較為保守的看法。1930年代有所謂「跳舞時代」，都市中不乏穿著西式摩登洋裝、舉止較開放的年輕女性，被稱爲「黑貓女」。對於黑貓女的穿著打扮，張純甫形容云：「股健裙用短，腕脆袖則寬。衣衫不嫌薄，白玉映中單。無領開襟胸，坦懷出心肝。每蕩少年魂，亦耐眾人看。」¹³⁸表示她們短裙低胸的裝扮，每使少年郎心神蕩漾。加上其常以「文明女」自期，要求社交公開，追求身心的解放和自由，看在傳統文人眼裡，無異是亡國妖孽，乃紛紛表達譴責之意。鄭坤五¹³⁹的〈黑貓女〉一詩寫道：「烏員名少女，獸化在年輕。白璧失貞操，黃金易愛情。族分家豹類，技學野狐精。得勢添威武，胭脂虎忽成。」¹⁴⁰將這些時髦女性描寫成容易喪失貞操的拜金狐狸精。薛玉田¹⁴¹的看法亦然，他有〈時世粧〉一詩傳世：「極巧窮工筆莫描，香閨舉動亦輕佻。分明鄭衛風行日，裙襖釵細色色嬌。」¹⁴²批判這些濃妝豔抹的女子舉止輕浮，猶如鄭魏遺風再現。王則修亦感憂慮，提出建議：「故今者，欲端婦人之風化，革女界之陋習，必自爲夫者戒其婦，使之長短合度，勿爲妖冶之可羞；爲父者斥其女，使之寬窄合宜，勿爲冶容之可醜。」¹⁴³然而，傳統文人的呼聲仍難以抵擋社會的時尚。

¹³⁸ 張純甫，〈五月雨〉，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下》，頁 17-18。

¹³⁹ 鄭坤五（1885-1959）：字友鶴，號虔老，駐鶴軒主人。乙未之役時，隨父返回故鄉福建漳浦，畢業於漳浦中學，父亡後，舉家返台，居於鳳山九曲堂。1902年任臺南地方法院鳳山出張所通譯，1920年任大樹庄庄長，1924年離職。1924年6月以「雞聲茅店月」畫作在東京榮獲第五回日本畫會主辦東洋藝術院賞金牌。曾主編《臺灣藝苑》、《光復新報》、《原子能新報》等刊物，1944年出版《鯤島逸史》，爲以臺灣歷史爲主軸的章回小說。戰後1946年任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國文教師，亦任教省立屏東女中，1950年退休。林翠鳳，〈鄭坤五及其《九曲堂詩集》初探〉，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頁 37-51。

¹⁴⁰ 鄭坤五，〈黑貓女〉，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410。

¹⁴¹ 薛玉田：字種藍，屏東人。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書前姓名部分

¹⁴² 薛玉田，〈時世粧〉，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 187。

¹⁴³ 王則修，〈婦女服裝分別論〉，收於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頁 1。

四、小結

傳統文人最初大多以高道德標準要求女性，認為三從四德是賢內助必備的條件，但本身卻常三妻四妾，且以出入風月場所為風雅，詩會時更不乏藝妓侑酒助興。

迨至 1920、30 年代，傳統文人漸次體認女子受教育的重要，並提倡男女平等，也認同職業婦女及擅長運動的女性，開明如林獻堂者甚至資助女性文人，並鼓勵家中女性參與社交活動。然而，無疑的傳統文人之間仍存在著個別差異，例如張棟梁仍抱持男女不平等的觀念。同時，為文論說與實際行為之間仍存在落差，因此納妾、出入風月場所的習慣並未隨之淘汰，直至戰爭時期舉辦的詩會仍可見藝妓侑酒。¹⁴⁴

其次，贊成女子受教育、主張男女平等者，仍大多固守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認為女子讀書後方能有良好的婦德，才能興國齊家、強國強種，在此基礎上即可尊重其人格。並非鼓勵女子與男子齊頭並進，在社會上一爭雌雄。

¹⁴⁴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日記〉，1943 年 7 月 16 日，12 月 26 日，未刊稿。

第二節 休閒娛樂兼容中西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節奏產生相當劇烈的轉變，都市人口的增加及都市化的趨勢促使生活形態改變，星期制的出現為人們提供了休閒生活的時間背景，鐵路和公路的建設，以及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的出現，則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此外，殖民政府還創造一個有利於休閒娛樂的環境。首先，將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從西方所學到的賽馬、看電影等休閒活動引進臺灣來，使臺灣民眾有機會接觸到西式的娛樂。其次，以官方的力量規劃旅遊活動，並推動相關配套措施，鼓勵民眾從事休閒活動。例如舉辦共進會、博覽會等展覽，以吸引參觀人潮，創造商機；並發行《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等旅遊手冊，規劃旅遊路線；甚至對乘坐火車前往海水浴場或廟會的旅客給予優待票。¹⁴⁵影響所及，臺灣人漸漸具有現代休閒生活的概念，傳統文人的休閒娛樂也出現中西兼容的多元風貌。

呂紹理曾以《臺灣人士鑑》為研究素材，探討 1930 年代臺灣士紳階層休閒生活的傾向，指出當時士紳最喜愛的休閒活動有讀書、旅行、音樂、園藝、象棋、圍棋等靜態活動，同時，愛好高爾夫、網球、棒球、賽馬等西式運動者也為數不少，出現中西兼容的現象。¹⁴⁶雖然傳統文人與士紳階層是兩個部分重疊又不完全一致的群體，但若細讀傳統文人發表的漢詩和日記，可發現其休閒趣味實包含新舊中西等不同趣味。

一、傳統中式娛樂

¹⁴⁵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346-356。

¹⁴⁶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頁 155-166。黃慧貞亦以《臺灣人士鑑》為場域，分析上流階層的興趣。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板橋：稻鄉，2007）。

(一) 園藝與飼養動物

賞花是傳統文人普遍具有的雅興，在詠物詩中，花木一直是吟詠的主要題材，林仲衡即有詠牡丹、芍藥、海棠等各種花卉之詩作多首，集成《吟香集》行世。¹⁴⁷

除了觀賞，亦有不少以蒔花種草為樂者，瀛社詩人楊仲佐在海山郡中和網溪營建別墅，闢園名「曼陀園」，遍植蘭菊。據載菊花種類多達 200 種，數量多達 5,000 株；種蘭更是耗盡心力，為隔水防蟻，常常三日一遷移、五日一更徙。¹⁴⁸當時網溪蘭菊聞名全臺，1935 年臺北園藝同好會舉辦菊花展，獲得優等賞的 30 餘盆中，楊氏所植者即佔 14 盆。¹⁴⁹楊氏又極好客，花開佳節往往廣邀賓客，置酒高會，前往賞花之雅士絡繹不絕，林癡仙、林獻堂均曾是座上賓。¹⁵⁰此外，更開放大眾參觀，1927 年花季來園遊客更多達 30,000 人。¹⁵¹此種花酒盛會持續長達 30 年，直至楊仲佐年近古稀後才漸終止。¹⁵²

¹⁴⁷ 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205-226。

¹⁴⁸ 楊仲佐，〈灌園雜詠〉，《網溪詩集後編》，頁 6。其詩云：「種菊五千株，種類多二百。」
「蘭根性本甜，隔水為防蟻。三日一遷移，五日一更徙。」

¹⁴⁹ 〈臺北菊花展優等賞楊仲佐氏佔卻半數〉，《臺灣日日新報》，第 12788 號，昭和 10 年 11 月 5 日，頁 4。

¹⁵⁰ 林癡仙有〈楊宅賞菊醉後作〉一詩，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下》，頁 221-222。林獻堂則於 1929、1932 年兩度前往網溪別墅賞花，並詢問仲佐種蘭、菊之法。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 311；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45。

¹⁵¹ 〈臺北楊仲佐氏昆仲網溪別墅菊花開放三日起至來十七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9887 號，昭和 2 年 11 月 4 日，頁 4；〈網溪別墅菊花觀客達三萬餘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9898 號，昭和 2 年 11 月 15 日，頁 4；〈網溪別墅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1347 號，昭和 6 年 11 月 13 日，頁 4；〈網溪別墅近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1355 號，昭和 6 年 11 月 21 日，頁 4。

¹⁵² 傅錫祺有〈楊子仲佐以余種菊卅載，今年近古稀，恐力不能勝，行將告罷，本年花卻不劣，以詩代柬，望同好各位辱臨一睹，花神有知亦當感為知己也為題，賦五古十七韻索和，次韻答

林紀堂對園藝也極有興味，自宅後方空地與別墅均闢有花園，種植蘭花、菊花、茉莉、睡蓮、本山松等，閒暇時常修整花木或栽植花苗，自得其樂而不以為苦。¹⁵³這些花木均是紀堂不惜貲財蒐購而來的，平日若赴臺中辦事，常順道至花店或植木屋逛逛，看有無佳種可採，¹⁵⁴或購買蘭花。¹⁵⁵為了追求更好的品種，更將觸角伸到日本，向神戶育種園購買菊花種苗及芍藥苗木，¹⁵⁶並常託旅居東京友人柯秋潔，¹⁵⁷代為採購花木。¹⁵⁸當時郵政業務不似今日發達，紀堂願意如此勞師動眾，實不難看出他對花藝的熱情。林竹山對於花藝也素有興味，故紀堂常與他討論種菊之法，並曾送不同顏色菊種給與竹山。¹⁵⁹

此外，呂厚菴素有陶潛癖，其筱園山莊以菊花爛漫馳名，櫟社諸友人常前往觀賞；¹⁶⁰林瑞騰的瑞軒以荷花和芍藥著稱；¹⁶¹洪以南的逸園栽植櫻花；¹⁶²吳子瑜的怡園遍植菊花，¹⁶³均是愛好園藝的著名例子。

之），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266-267。證明楊仲佐為愛花人，且種菊長達卅載，至年近古稀才行將告罷。

¹⁵³ 林紀堂日記中常見「午後無事在後園移植茉莉花以作花籬耳」、「午後無別事在後園種菊而已」、「午後無別事在草庭前花下移蘭而已」的記載。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2月10日，5月17日；1916年1月3日，未刊稿。

¹⁵⁴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1月24日，未刊稿。

¹⁵⁵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2月15日，未刊稿。

¹⁵⁶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1月18日，2月15日，未刊稿。

¹⁵⁷ 柯秋潔：幼年於士林習靜齋書塾習漢文，後進入劉銘傳所辦的電報學堂，並奉職於臺北水陸電報總局，任司報生。日治後，1895年10月畢業於芝山巖學堂，後隨學務部長伊澤修二赴日觀光與遊學，亦是臺灣第一位獲得教員證書者，任教於國語學校、公學校。林獻堂的子女留學東京時曾蒙其照顧，故他於1940年足折後，林獻堂特別贈其200圓及龜鹿二仙膠3兩，供其療養。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頁39；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41；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1905年〉，頁79、82-83。

¹⁵⁸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3月10日，未刊稿。

¹⁵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5月9日、16日，6月13日，未刊稿。

¹⁶⁰ 林癡仙，〈筱雲山莊看菊贈厚菴秀才〉，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86；呂厚菴，〈癡仙錫祺同過筱雲山莊看菊癡仙有詩即次其韻〉，收於呂厚菴，《厚菴遺草》，頁27-28；陳錫金，〈哭厚菴〉，收於呂厚菴，《厚菴遺草》，頁50-51；袁炳修，〈哭厚菴〉，收於呂厚

在飼養動物方面，最引人矚目的是林紀堂，他在別墅裡飼養著火雞、玉燕、斑紋錦雞、白鷺等多種鳥禽。其中，玉燕是專程託神戶友人柯復順挑選，再由臺中運送店運抵的；¹⁶⁴斑紋錦雞亦購買自東京，由於稀有珍貴，還曾出借給臺中農會，作為 1916 年共進會的展覽品。¹⁶⁵此外，還有雌雄成對的食火雞及珠雞，也是由東京千里迢迢購得的。數量最多的是火雞，紀堂擁有火雞數十隻，從 1915 年 1 月起陸續添購，由於對飼育之法頗為注重，¹⁶⁶繁殖甚為成功，其蛋乃成為餽贈親友的最佳禮品，午後無事時觀賞火雞也是他生活中一大樂事。¹⁶⁷有時火雞也作為祭拜祖先的祭品或待客的盤中飧，¹⁶⁸飼養的目的不全然是玩賞。

令人驚奇的是紀堂還養鹿。1916 年 1 月 28 日託林榮泰¹⁶⁹代買雄鹿，¹⁷⁰其後太平庄林鳳鳴再贈母鹿一隻，配成一對。¹⁷¹此外，別墅還養蜜蜂，為了養

菴，《厚菴遺草》，頁 52-53。

¹⁶¹ 林癡仙，〈三月十三日瑞軒觀新荷花〉，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171；林癡仙，〈瑞軒觀芍藥再詠〉，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頁 192-193；賴紹堯，〈瑞軒看芍藥〉，收於賴紹堯，〈悔之詩鈔〉，頁 8；黃旭東，〈瑞軒觀芍藥〉，收於林幼春編，《櫟社第一集》，頁 122-123。

¹⁶² 林仲衡，〈在洪以南逸園觀櫻花〉，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58-159。

¹⁶³ 陳貫，〈怡園賞菊〉，收於陳貫，《豁軒詩草》，頁 51。

¹⁶⁴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2 月 5 日、6 日，未刊稿。

¹⁶⁵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 年 4 月 12 日，未刊稿。

¹⁶⁶ 紀堂向商人購買七面鳥時，均會特別留意飼養的問題。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1 月 9 日，2 月 15 日，未刊稿。

¹⁶⁷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3 月 26 日、28 日，未刊稿。

¹⁶⁸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 年 1 月 2 日，未刊稿。

¹⁶⁹ 林榮泰：居於臺中萬斗六，藥鋪主，亦為什貨、煙草商，店號名聚豐號。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中廳》，頁 431；〈林紹堂、吳鸞旂、楊吉臣、林榮泰敘勳二關スル件〉，《公文類纂》，明治 30 年，甲種永久保存，第 5 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¹⁷⁰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 年 1 月 28 日、29 日，未刊稿。

¹⁷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6 年 2 月 24 日，未刊稿。

蜂，紀堂託友人自東京購買養蜂器及相關書籍，¹⁷²可見其頗為投入。在各種鳥禽、鹿、蜜蜂環繞下，紀堂的別墅有如一小型動物園。

林資彬¹⁷³也是一位愛好動物之人，其嗜好為乘馬和狩獵，¹⁷⁴他在南投國姓水長流的別墅即飼養著鹿、兔、鴿、白孔雀、小綠鸚等動物及鳥禽，池塘中還有草魚。¹⁷⁵資彬每次到水長流度假總是樂不思蜀，常待上一個月才回家。¹⁷⁶可惜二次大戰時遭到美軍轟炸，一匹馬及十餘隻家禽被炸死。¹⁷⁷

（二）棋藝

圍棋和象棋是傳統文人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除了娛樂的目的外，亦能顯現出文化涵養，故以〈觀奕〉、〈觀棋〉、〈奕棋〉為題的詩作俯拾皆是。¹⁷⁸以林獻堂為例，他於 1930 年曾組織「圍棋會」，召集林幼春、林階堂、莊嵩，以及子姪輩林培英、林資瑞、林金昆、林六龍、林猶龍等人，每月集會一至二次，彼此切磋棋藝，地點在霧峰林家、林幼春宅或保甲事務所等處，由會員輪流值東。¹⁷⁹值得注意的是，日人警部補久保基樹¹⁸⁰對圍棋亦有興趣，林獻堂常

¹⁷²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5月5日，未刊稿。

¹⁷³ 林資彬：林輯堂子，曾任霧峰庄助役、霧峰信用組合組合長，經營霧峰宏業株式會社。

¹⁷⁴ 臺灣新民報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448。

¹⁷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87。

¹⁷⁶ 林吳帖，《我的記述》（臺中：財團法人素貞興慈會，1970），頁17。

¹⁷⁷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1月19日，未刊稿。

¹⁷⁸ 湯阿添，〈觀奕〉，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172；王鵬程，〈觀奕〉，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319；黃登彩，〈觀奕〉，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350；盧曜廷，〈觀棋〉，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418；杜友紹，〈觀棋〉，收於賴子清編，《台灣詩醇》，頁250-252；卓肇昌，〈奕棋〉，收於賴子清編，《台灣詩醇》，頁251。

¹⁷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249、358、430；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1、49、66、104、173、205、237、278、306。

¹⁸⁰ 久保基樹：1888年生，長野縣人，1932年渡台，任台灣總督府巡查，以後續任台中州警部

邀其下棋，¹⁸¹後來也參加此會；¹⁸²某次集會時臺中州大屯郡役所庶務課屬廣瀨研二引介一二段高手名羽廣清太郎；¹⁸³林獻堂也曾出席本因坊秀哉¹⁸⁴的圍棋歡迎會。¹⁸⁵顯示如同漢詩一般，臺灣文人與日人官吏也因共同熱愛棋藝，而展開交流。

林獻堂也喜歡下象棋，常與莊嵩研究《橘中秘棋譜》，討論破局之法。¹⁸⁶後因感於青年無正當之消遣，多沈迷於賭博，為提倡正當娛樂，乃於 1932 年 7 月 9 日在霧峰一新會館召開象棋競技會，共有 20 餘人出席。¹⁸⁷事後並將對局的實戰圖，登載於《臺灣新民報》，以鼓舞同好。¹⁸⁸同年 10 月 3 日趁度假之便，

補、警部、大甲街協議會員、大肚庄長。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頁 120。

¹⁸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251、252、257、280、291、357。

¹⁸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358。

¹⁸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49。

¹⁸⁴ 本因坊秀哉（1874-1940）：圍棋 21 世本因坊，最後世襲制的本因坊名人。本名田村保壽，東京人，1884 年入村瀨秀甫（18 世本因坊）塾，1897 年四段，1905 年 7 段，1908 年 20 世本因坊秀元退任後，由秀哉繼任，同時昇八段。1914 年被推舉為名人，1924 年創立日本棋院，被推為元老。1926 年與脫離棋院另組棋正社的雁金準一對決，雁金因時間用完而輸。1937 年秀哉自棋界引退，將本因坊之名銜交給日本棋院，繼承此名號者要用選手棋戰制來決定，此後才有本因坊戰。朝日新聞社編，《朝日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4），頁 1452。

¹⁸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415。

¹⁸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75。

¹⁸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79。

¹⁸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310。

又於關子嶺舉辦象棋會，並將參賽者依實力評定段級。¹⁸⁹翌年 1 月 14 日，復於中州俱樂部召開象棋段級評定會，評定各方象棋好手的等級。¹⁹⁰

在象棋的風氣逐漸炒熱後，林獻堂遂於 1933 年 2 月 11 日與《臺灣新民報》合作舉辦全島象棋大會，並先於 1 月底在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地舉行評定段級之小會。¹⁹¹在賽前舉行的籌備會中，林獻堂被選為比賽審查委員長，其餘同好則出任選舉審查委員及籌備委員等職。¹⁹²此外，亦召開象棋審判委員會，訂立競技規則 10 餘條，以示慎重，¹⁹³並向社會大眾公開募集捐款。¹⁹⁴

比賽最後延至 3 月 11 日在臺中公會堂舉行，報名者原有 320 餘名，因天氣寒冷，到場出賽者共 210 餘名，減少三分之一。開幕時，林獻堂簡述此次象棋大會之目的：一、自來看輕象棋，而不以象棋為一種藝術；二、臺人無高尚之娛樂而流入於麻將之賭博；三、欲獎勵此藝以精益求精。¹⁹⁵經過一番激戰後，13 日比賽結束，來自高雄的陳番奪得第一。¹⁹⁶此次可謂臺灣全島性象棋比賽的

¹⁸⁹ 之所以將參賽者定等級，是要為後來的全島象棋大會預作準備。當日評定的等級如下：三段許文烈；二段施爾錫、何文模、陸古森、梁朝樞；一級陳按察、劉明智、詹國、黃意誠；一級江秋陽；三級林獻堂、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收於葉榮鐘著，《臺灣人物群像》，頁 125。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04-405。

¹⁹⁰ 當日評定的等級如下：三段黃溪木、林鈞；二段胡初輝；初段林振憲、顏榮楷；一段柯禎、張新炎。〈中州象棋大會定段及一級者〉，《臺灣日日新報》，第 11775 號，昭和 8 年 1 月 18 日，頁 4。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21。

¹⁹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3。

¹⁹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52。

¹⁹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80。

¹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98。

¹⁹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02。

¹⁹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04。

嚆矢。¹⁹⁷《三六九小報》乃讚譽道：「者回臺灣新民報社，在中部舉行全島象棋爭霸戰，於臺灣文化闡發上，時可謂大有意義之舉。」¹⁹⁸

此後 1934、1935 年又舉辦第二、三屆比賽，¹⁹⁹均引起不小的迴響，有推廣象棋的作用。

（三）觀賞戲曲及廟會活動

日治時期臺灣有不少梨園戲班，每逢中元普渡或媽祖壽誕等節慶常在寺廟前開臺演劇，雖然劇目通俗，且以一般善男信女為主要觀眾，但對於部分居住於鄉里間的傳統文人而言，此種娛樂仍具有相當吸引力，是生活的一大調劑。以張麗俊為例，他平日最愛往豐原慈濟宮或聖王廟觀看梨園演戲，²⁰⁰也常至豐原座觀賞江雲社或和美庄梅蘭社的女優演出。²⁰¹甚至當陳源水新組的戲班要開演時，他還替此戲班命名為「慶陽春」。後來「慶陽春」成為豐原地區很受歡迎的戲班，開演時觀眾常人山人海。²⁰²

當時也有許多中國戲班前來臺灣巡演，張麗俊也常前往觀賞，並興致勃勃地比較各戲班受歡迎的程度，1913 年 2 月的日記寫到：「憶自葫蘆墩破天荒演正音劇，大昨年三慶班最搏觀者贊賞，昨年金福聯班次之，今年老德勝班又次之也。」²⁰³若有特別精彩的演出，其日記中常仔細描述，1927 年 3 月他看罷舊賽樂的正音戲後，形容其布景變幻，宮殿、樓臺、園亭、家屋、山水、花木、

¹⁹⁷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簡歷〉，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2。

¹⁹⁸ 倅庵，〈彈亂〉，《三六九小報》，第 278 號，昭和 8 年 4 月 9 日，頁 4。

¹⁹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79-84；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56-57。

²⁰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29、39、75。張麗俊在廟前玩梨園的次數極多，此處僅是略舉。

²⁰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45、323。

²⁰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02-103。

²⁰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331。

家需物品，無一不肖像入妙，令人不可思議。²⁰⁴1929年2月看過慶興京班的演出後，對於女花旦閻鳳霞、閻鳳雲印象最為深刻，認為此二姊妹「見之殊令人傾心悅目焉。」²⁰⁵同年7月欣賞上天仙閣班後，則誇讚其文武齣目喜怒哀樂傳神，令人擊掌，武藝尤超過京班數倍。²⁰⁶顯示張麗俊確實樂在其中，且頗有心得，對於布景、演員的表現等均有自己的評論。

袁炳修、葉篤軒與張麗俊私交甚篤，他們也愛看戲班的演出。袁炳修多次與友人公開募金，邀請戲班在豐原演出；²⁰⁷葉篤軒更親自粉墨登場，與慶陽春正姐玉寶同臺合演，²⁰⁸對於地方戲曲熱愛的程度自不待言。

林維朝對於戲曲也極有興趣，對新港當地的北管劇團「舞鳳軒」也獎勵有加，推崇其為民俗藝團的龍頭。蓋「舞鳳軒」的曲路嚴守傳統，不要花腔，有「新港路」之稱，為新港贏得「北管巢」的美譽。²⁰⁹林維朝並有〈觀劇〉一詩，顯示其對劇班演出的悲歡離合情節頗為入迷，其詩曰：

扮來男女演紛紛，曲調新翻響入雲。摹仿神情臻妙處，聚觀不厭到宵分。
悲歡離合般般演，忠佞賢愚一一分。幾許古人都在眼，勝他軼事僅傳聞。

210

張麗俊對於媽祖壽誕、盂蘭盆會等熱鬧也有濃厚的興趣，每逢豐原地區建醮或迎聖母，他常置身於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品評某庄之祭壇較佳，或某人之

²⁰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168-169。

²⁰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8。

²⁰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66。

²⁰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234-235；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81。

²⁰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238。

²⁰⁹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3。

²¹⁰ 林維朝，〈觀劇〉，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22。

豬較大，而樂在其中。²¹¹尤其他身兼慈濟宮修繕會總理，更須參與廟會慶典的籌畫，1935年豐原大地震之後即負責做三獻，安排梨園演出，並放煙火，以叩謝平安。²¹²此外，他亦常至外地參與各種祭典。1921年12月張氏往東勢角觀賞5天清醮，由於來自各地的參觀者絡繹不絕，故從豐原出發的輕便車非給予津貼不肯行駛，張麗俊遂選擇步行。抵達後，他不厭其煩地一一細數當地祭壇、戲臺、豬羊的數量，詳細記載於日記中。²¹³

1924年11月4日，張麗俊與數十名友人專程搭火車至臺北，參與大稻埕慈聖宮慶建成清醮5天。此清醮是當時的一大盛事，當地各紳民團體均不惜鉅款建造醮壇，其內外均以彩色電燈裝飾，大小不下千個，紅、綠、白三色燦爛奪目，全街幾成不夜之城。²¹⁴其中，臺北茶商公會所提供的三官壇，壇內陳列唐宋以來古玩和明清近代名人書畫，又配置約200坪的庭園，修築池臺水閣。還邀桃園女優演戲，設置免費茶館，宣傳臺灣茶，極具可看性。²¹⁵據載大稻埕人山人海，北上每班列車皆客滿，臺北的旅館亦幾乎客滿，旅人幾無安身之處。依張麗俊的記載，稻江會場的醮壇多達10餘座，高3、4層，多花費數千金，運用人工費時數月才搭成。壇前還有噴水池、假山，羅列各種奇珍異寶，夜晚在電燈照耀下如同白晝。顯示傳統的民間建醮已與新科技的電燈相結合，營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光景，令張麗俊大開眼界而驚嘆不已。他認為此種繁華美麗為向所未見，言語也難以形容，筆紙更無法記載！²¹⁶

²¹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10、25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125-127、364；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16、110、114。

²¹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140-141、142、146、159。

²¹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442-443。

²¹⁴ 〈稻江醮壇一瞥談燦爛輝煌幾成不夜書畫古董搜羅殆盡〉，《臺灣日日新報》，第8792號，大正13年11月4日，頁4。

²¹⁵ 〈三官壇之設計〉，《臺灣日日新報》，第8789號，大正13年11月1日，頁4。

²¹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278。

隔日普濟陰光，雖然各團體均於醮壇前陳列海陸珍饈，吸引許多民眾圍觀，幾至水洩不通。²¹⁷然而，張麗俊卻埋怨豬羊供品僅約 10 餘付，牲醴、粿品亦甚少，而大感失望，認為不如豐原的小小盂蘭會。²¹⁸

除張麗俊之外，對廟會活動感興趣的傳統文人尚有不少。陳懷澄、林癡仙、袁炳修、傅錫祺曾在葫蘆墩建醮時特別前來，參觀各處神壇與戲臺，並觀賞白字戲。²¹⁹白字戲又稱囡仔戲，是由兒童所演的童子戲，以南管配樂，因歌詞均用臺語白字（土語），故有此稱。²²⁰林耀亭於臺中區長任內為刺激商店買氣，發起恭請北港朝天宮、臺南大天后宮、鹿港天后宮、梧棲朝元宮、彰化南瑤宮媽祖到臺中駐留 40 天的活動，並選擇其中 4 天祭媽祖。報紙對之詳加介紹，形容當地各商店競奇鬥麗，為未曾有之盛會。由於遊客眾多，火車更加開班次、車資打折以因應，活動非常成功。²²¹1926 年 12 月竹社的鄭養齋、曾逢辰、鄭神寶等人亦選擇新竹城隍廟慶成清醮之時機，²²²邀集全臺欲來觀賞的吟友，舉辦擊鉢大會。²²³

據宋光宇的研究，1920 年前後，臺灣都市地區的建醮和迎神活動呈現出與鄉村地區不同的風貌，一地之大神有慶，就會邀請其他地方的大神來共襄盛

²¹⁷ 〈慈聖宮建醮最終日全街大施餓鬼〉，《臺灣日日新報》，第 8795 號，大正 13 年 11 月 7 日，頁 4。

²¹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79。

²¹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127。

²²⁰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眾文圖書，1980），頁 127。

²²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50；〈臺中媽祖祭預聞〉，《臺灣日日新報》，第 6068 號，大正 6 年 6 月 8 日，頁 6。

²²² 新竹城隍廟落成祭於 1926 年 12 月 9 日午前 10 舉行，新竹州知事古木章光和簡朗山等數百名官紳列席。〈新竹城隍廟落成祭〉，《臺灣日日新報》，第 9560 號，大正 15 年 12 月 12 日，頁 4。

²²³ 〈全島詩人大會〉，《台南新報》，第 08918 號，1926 年 12 月 4 日，頁 10。

舉，茶商和藥行也利用節慶期間進行大拍賣的促銷活動，並推出極富宣傳意味的藝閣，故熱鬧異常，傳統文人乃深受吸引。²²⁴

然而，迎神賽會為眩眾人之耳目，每耗費大量人力與金錢，也引起不少文人撻伐。黃純青〈嗟孟蘭盆會〉寫道：「豪奢七月紛普度，尙鬼南人迷未悟。道場水陸廟門多，泥沙金錢皆不顧，……盤盂碗碟列長筵，海錯山肴用無數。獸禽殺盡供犧牲，大者羊豚小雞鶩。……」²²⁵斥責爲了普渡而大量殺生獻祭，並造成鉅額金錢耗費。黃水沛亦云：「法筵事鬼破囊監，可有哀鴻食與頒。」²²⁶指責辦法事只知事鬼，卻不知救助無以維生的貧民。王竹修也批評信徒甘破慳囊事迷信，是不知人世哀鴻的表現。²²⁷趙劍泉²²⁸亦有類似的看法，除了抨擊孟蘭盆會浪費，只知施陰不濟陽外，並質疑惡鬼是否真能超渡，直指其迷信。²²⁹

林維朝擔任新港街長期間，也倡言廢除當地的孟蘭盆會。蓋因主事者講究排場，極盡奢靡，相互較勁，常導致輪值的商家倒閉。他說：「媚鬼神以求福，理斷而所乖也，倘鬼神有靈，欲加譴責，余當深受之。」²³⁰

林獻堂向來反對迷信，對民間宗教法會也不太感興趣，²³¹只看了幾次迎城隍的熱鬧，但未多作逗留²³²。1930年9月林氏往霧峰街上看普渡時，發覺不甚

²²⁴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2（1993年4月），頁321-323。

²²⁵ 收於黃純青，《晴園詩草》，頁8。

²²⁶ 黃水沛，《黃樓詩》（臺北：龍文出版社），下卷，頁20。

²²⁷ 王竹修，〈孟蘭盆會〉，《詩報》，第69號，昭和8年11月1日，頁7。其詩曰：「無遮大會肉屏風，爭荐牲醢怕不豐。甘破慳囊事迷信，那知人世有哀鴻。」

²²⁸ 趙劍泉（1894-1962）：名雅福，號劍泉，又號小雲或少雲，另號榕庵主人，臺南人，趙雲石之子。曾任《臺南新報》記者，南社幹事，桐侶吟社顧問，以成社副社長，《三六九小報》發行人兼主編。吳毓琪，《南社研究》，頁209-210。

²²⁹ 趙劍泉，〈孟蘭盆會〉，收於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220。

²³⁰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32-33。

熱鬧，反而認為這是因街民漸有自覺之故。²³³以上在在顯示傳統文人之間的差異。

（四）踏青、郊遊與旅行

在風景優美之地吟風弄月向來就是傳統文人的雅好。1908 年以後由於縱貫線鐵路通車、公路建設擴展，使得臺灣南北往來更加方便。執政當局亦有心推展臺灣島內的觀光事業，1927 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臺灣日日新報》舉辦公開票選「臺灣新八景」活動，選舉辦法是先經民眾以明信片投票，依票數產生前 20 名的候選地，再由專業人士組成審查委員會決定正式的八景。最後名單於 8 月 27 日公告，新臺灣八景為八仙山、鵝鑾鼻、太魯閣峽、淡水、壽山、阿里山、日月潭、基隆旭崗，臺灣神社和新高山（玉山）則被列為特選。²³⁴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旅遊成爲時興的休閒活動。加上詩會的舉行常與踏青、觀月、啖荔等餘興相結合，因此，臺灣各地的名勝幾乎都留下傳統文人吟詠的足跡。

從傳統文人歌詠臺灣風景的漢詩來看，當時臺灣有幾個景點是文人必遊之處，分別是劍潭、圓山、草山（今陽明山）、日月潭、阿里山、安平古堡、赤崁樓、鵝鑾鼻等地。其中，草山、日月潭、阿里山直至今日仍是臺灣最著名的

²³¹ 據曾任林獻堂秘書的葉榮鐘回憶，他只在林獻堂家看過一、兩次七月普渡拜拜的行事，但不久就絕跡了。而且不信選流年、排八字、擇日這一套。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18。

²³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229；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410；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81。

²³³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312。

²³⁴ 宋南萱，〈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38-44。此外，八卦山、草山北投、角板山、太平山、大里簡、大溪、霧社、虎頭埤、獅頭山、新店碧潭、五指山、旗山被選爲臺灣十二勝。

觀光景點；安平古堡和赤崁樓則以古蹟馳名；鵝鑾鼻位於臺灣的極南，有最著名的燈塔。張達修曾以詩句形容鵝鑾鼻燈塔指引船隻的功用：「鵝鑾有鼻聳南端，燈塔凌空映翠巒。午夜迷津憑指引，好教航海報平安。」²³⁵由於極有特色，故能吸引傳統文人造訪。

此外，泡溫泉也廣受文人喜愛，北部的北投和南部的關子嶺均是搶手的地點，張棟梁曾云：「北投關嶺慣勾留」。²³⁶北投溫泉區由於鄰近臺北，若乘坐火車經過圓山、士林兩站即達，交通便利。據指出，湯瀧溫泉有治療神經痛、痙攣、慢性肝炎、中風、月經失調、慢性子宮炎等病症的療效。加上北投附近又有大屯山，登高可遠眺新竹以北和金包里、基隆等地，亦可至紗帽山採蘭、竹子湖賞櫻，故成爲知名名勝。²³⁷林癡仙曾嚮往北投溫泉許久，後來總算偕同友人到訪，體驗溫泉的滋味，感覺不僅瑕垢剔除淨盡，精神也爲之一快，乃有詩作如下：

十載聞泉名，北望神長往。今朝七星墩，入眼慰渴想。茲山實焦源，磺煙噴萬丈。狀流十里間，石流瀑聲響。潤下反炎上，德合水火雨。人言療百病，濯濯體輕爽。同行五六人，爭浴汗流顙。予亦試探湯，隨波聊俯仰。果然精神快，豈特瑕垢蕩。……²³⁸

關子嶺溫泉區位於今臺南縣白河鎮東側山麓間，原名「鐵國」，因當地山勢險阻，閉鎖如銅牆鐵壁。1898年屯駐嘉義的日本步兵，無意中發現滾水溪（白河溪上游，即今流貫溫泉街之小溪流）河床旁有溫泉冒出，日人乃著手進行開發。由於泉質很好，治療風濕成效奇佳，旋即聲名遠播而成爲臺灣最知名

²³⁵ 張達修，〈鵝鑾鼻燈塔〉，收於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315。

²³⁶ 張棟梁，〈草山雜詠〉，收於林幼春編，《櫟社第一集》，頁1。

²³⁷ 平田源吾，〈北投溫泉誌〉（臺北：天狗庵，1909），頁29-34。

²³⁸ 林癡仙，〈北投溫泉〉，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頁34。

的溫泉之一。²³⁹林維朝描述當地的自然風光為：「峰迴路轉繞雲煙，蠟屐登臨意快然。等是桃源風景好，數家雞犬翠微顛。」²⁴⁰當地號稱靈湯的溫泉，林耀亭有如下的詩句形容：「水白溫猶沸，泉靈味亦滋。神怡心曠處，療疾免求醫。」²⁴¹林緝熙²⁴²亦有詩描述登關子嶺泡湯的情景：

漫勞車馬趁朝墩，且向靈泉沿一盆。信足漸高仙草路，回頭猶認白河村。
雲橫玉枕山如睡，春在湯池水正溫。我自塵心皆洗盡，無須世外覓桃源。²⁴³

林獻堂若逢空閒，也常至關子嶺的溫泉旅館小住數日，享受山居生活的樂趣。²⁴⁴他雖然身為臺人領袖，足跡遍及全臺，不過最常去的度假勝地仍是關子嶺，足見當地的魅力。

張麗俊曾數度至全臺各地旅行。1908年10月北上至大稻埕、林本源花園、圓山、大龍峒等地遊玩，在他眼中大稻埕是人物紛紜、車輪輻輳的大都會。²⁴⁵1914年9月底他復至臺北，往遊總督府官舍、花園，並參觀市街，驚覺繁華景象大異昔時，大稻埕市街也有一番更新，顯示數年之間臺北市容已明顯的進步。隨後至北投溫泉沐浴，誇讚其光景實難以用言語形容。²⁴⁶此後數年間

²³⁹ 張溪南編，《關子嶺》（臺中：三久出版社，1999），頁24-25。

²⁴⁰ 林維朝，〈關子嶺雜詠〉，收於林維朝，《怡園吟草》（1917），頁9。

²⁴¹ 林耀亭，〈關子嶺溫泉〉，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12。

²⁴² 林緝熙（1887-1962）：字荻洲，嘉義市人。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後任教於朴子公學校，再轉職於曾文明治製糖會社。為羅山吟社、玉峰吟社社員。與王殿沅為總角交，中年後與賴惠川交契。晚年吟詠終其生。林緝熙，《荻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書前作者介紹。

²⁴³ 林緝熙，〈遊關子嶺〉，收於林緝熙，《荻洲吟草》，頁7。

²⁴⁴ 例如1932年5月22日至30日，即在關子嶺靜養8天，期間泡溫泉、下棋、按摩、觀書、讀詩、閱報，享受清閒的樂趣。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218-229。

²⁴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111-114。

²⁴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99-100。

張麗俊又數度北上，目睹臺北城層樓高閣，電燈照耀如同白日；也至萬華遊龍山寺，認為該寺有高大、堅壯、華麗三絕，可謂全島獨一無二；亦雇出租自動車往草山磺泉沐浴。²⁴⁷總之，常居鄉里的張麗俊，進入臺北城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到處充滿新奇。

此外，他曾於 1926 年 2 月至臺南，往觀武廟、天后宮、赤崁樓等處；²⁴⁸1928 年 12 月至高雄旗後，觀新編入臺灣八景之「壽山觀海」及前清砲臺、燈臺等古蹟。其後，繼續南下，參觀臺灣八景的鵝鑾鼻燈塔；²⁴⁹1929 年年底往遊屏東、壽山、龍潭、關西等地；²⁵⁰翌年 9 月遊基隆，至田寮港，上旭崗觀日，此亦是八景之一；²⁵¹同年 11 月遊嘉義，至關子嶺、烏山頭嘉南大圳、阿里山等知名景點，這些地方都是長久以來張麗俊想至而未至之處，如今總算一償宿願。²⁵²

1931 年張麗俊參加臺南、臺中州組合役員的旅行團，至角板山遊覽，看佐久間左馬太紀念碑。此碑係 1930 年 9 月由臺灣總務長官人見次郎所建，用泉州白石築成，高丈餘，書其治臺功績，建築費達 16,000 圓。他亦順道參觀原住民的聚落，觀看兒童上算術和音樂課的情形，發覺原住民孩童的應答也頗敏捷。²⁵³歸後，作〈遊角板山即景〉詩二首，其中提及「回想荒烟蔓草地，也教兒女學琴書。」²⁵⁴頗為肯定日本當局對原住民的教化。

²⁴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頁 321；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80；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6-7。

²⁴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9-10。

²⁴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57-458。

²⁵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21-124、132-133。

²⁵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69。

²⁵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95-299。

²⁵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465-467。

²⁵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467-468。

較特別的是，1935年10月張麗俊至桃園參觀石門大圳，認為此山稱為石門，確實名符其實，因兩片石峰聳峙千仞，圳水入口由峰下穿石隧道至溪街對面，方由溪崁傍開圳。而兩岸及圳底均用水泥築造，其隧道內之堅固不言可知。他的感想是，有此天然形成之位置，又有此巧妙之人工，若仍是清政府管理，恐永為原住民埋伏獵人頭之所，桃園旱乾之地便無法變成水田三千餘甲。²⁵⁵顯示張麗俊對建設水圳的日本政府有極高的評價。

由上所述，日治時期傳統文人常造訪臺灣南北各地的知名景點，享受旅遊的樂趣。不過，他們參觀的地點，似頗受執政當局的制約，如官方選出的「臺灣八景」、嘉南大圳和石門大圳工程、原住民教化成果的展示等，難免因此而肯定日本在臺灣的建設。

狎妓出遊、前往聲色場所尋花問柳，也是傳統文人常從事的娛樂，前節已有論述，茲不復贅。

二、西式娛樂

（一）體育活動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降，大力提倡西式體育活動，領有臺灣後，也將西方的各種運動引進臺灣，例如高爾夫、桌球、網球、棒球、撞球等。總督府在全臺選定數個地點開設海水浴場，提倡游泳運動，體育可說是臺灣民眾體驗西方文明的一個面相。據資料顯示，不少傳統文人也熱中於體育活動。

林紀堂每日早飯後，帶其三子林松齡至別墅運動，已是例行公事。²⁵⁶午後若無事，也常獨自運動一番。²⁵⁷並託在東京的友人柯秋潔代買運動鞋，²⁵⁸在鞋

²⁵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123-124。

²⁵⁶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1月4日、7-9日，未刊稿。相關記載甚多，此處只是列舉。

²⁵⁷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3月23日，未刊稿。

類的選擇上要求專業。雖然林紀堂並未在日記言明做何種運動，據推測可能是散步或體操之類，顯然已有健身的觀念。

林獻堂常接觸高爾夫、乒乓球、撞球等運動，也有觀賞棒球比賽的經驗。高爾夫於 1917 年經由臺灣新聞社長松岡富雄之手，自菲律賓引進臺灣，松岡透過贈送球具予民政長官下村宏，漸次推展此種運動。當時榮獲日本高爾夫業餘錦標賽冠軍的三井物產公司參事井上信正好到臺北出差，透過他的傳授，日人官員對高爾夫漸有認識。1919 年 6 月 1 日，臺灣首座高爾夫球場在淡水建造完成，即通稱的「淡水球場」或「淡水老球場」，其正式名稱爲「臺灣高爾夫球俱樂部」（TGCC: Taiwan Golf Country Club）。該地原爲陸軍用地，平時甚少使用，其後，日人陸續在臺中、臺南、花蓮、高雄、臺北關建多座高爾夫球場。

259

高爾夫運動在今日具有貴族色彩，擁有球場會員卡者非富即貴，遑論日治時期。當時一套士普齡牌球桿約 500 圓，普通牌子也要 300 圓，但高雄最熱鬧的鹽埕埔一棟 2 層樓店鋪僅 800 圓。²⁶⁰以林獻堂的財力和身份，有機會打高爾夫不足爲奇。另一方面，也因地緣因素，臺中大肚山蓋有高爾夫球場，該球場位於今臺中縣市交界處的遊園南路監理站旁，1926 年啓用，是臺灣第二座高爾夫球場。臺中高爾夫俱樂部於 1928 年成立，此後歷任總督、民政長官等總督府高層官員，以及州廳地方官員皆加入爲會員。²⁶¹

²⁵⁸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 年 3 月 22 日，未刊稿。

²⁵⁹ 周明德，〈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七十年回顧—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簡史〉，收於周明德，〈海天雜文〉（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 39-44、48。

²⁶⁰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5），頁 232-233。

²⁶¹ 三卷俊夫，〈臺灣ゴルフ沿革志〉，收於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頁 583-619。

1931年5月1日，林獻堂第一次與其子猶龍與雲龍至大肚山球場打高爾夫，由於是初次嘗試，故擊多不中，由第一洞至第五洞約費一小時之久。²⁶²但隨後便玩出興味，為節省舟車勞頓的時間，乃在萊園耗時月餘興建迷你高爾夫（ベビゴルフ）球場。²⁶³7月6日完工後，即在萊園召開迷你高爾夫之會，共有日人警部補和林家親友30餘人參加。²⁶⁴其後每逢訪客前來，林獻堂總邀其在自家球場較量一番。²⁶⁵1931年8月至翌年7月間，在萊園一連舉辦三次迷你高爾夫競技大會，參加者第一次49人、第二次27人、第三次28人，林獻堂並自備獎品獎勵前10名，²⁶⁶將此種貴族化的運動，透過改良的迷你方式，與更多同好分享。

當時的高爾夫與現在相同，是官紳重要的交際活動。1931年11月8日，林獻堂曾應彰化銀行專務取締役坂本素魯哉之約，前往大肚山球場，與吉市醫院負責人吉市米太郎和1928年榮獲全臺高爾夫冠軍的賴墩²⁶⁷等人球敘。²⁶⁸1932年5月1日，亦應坂本之邀，至大肚山與臺中州知事竹下豐次（1932.3-1935.1）等日人名流打高爾夫。²⁶⁹

²⁶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141。

²⁶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157、180、203、209。

²⁶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213。

²⁶⁵ 曾與林獻堂球敘者，包括臺北帝大教授杉山茂顯、律師遠山景一、楊肇嘉、楊景山、謝廉清等人。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228、242、282。

²⁶⁶ 三次迷你高爾夫競技會舉行的時間分別是1931年8月15日、1932年2月7日、1932年7月16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256、258；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60、290。

²⁶⁷ 賴墩：1871年生，臺中北屯人。1907年任保甲聯合會長，1917年得紳章，1912年任臺中協贊信用組合長，1919年為臺中樂舞台公司長，1922年任臺中市協議會員，1928年為臺中商工協會會長，1932年任臺中製冰公司長。亦為臺中乘馬會長、臺灣愛馬會員和中部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理事。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頁432；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中州下，頁13。

²⁶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50。

²⁶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93。

此外，1933 年間林獻堂多次邀猶龍、愛子及林紀堂子津梁、松齡等子姪輩，前往大肚山球場打高爾夫，並以兩人為一組的方式，舉行分組競賽，優勝者可獲頒銀杯，²⁷⁰顯示他相當熱中該運動。

林獻堂也愛打乒乓球，1939 年旅日時，常與其孫女惠美與晴美打乒乓作為消遣；²⁷¹他亦愛撞球，至關子嶺度假時，每不忘至玉突（たまつき，即撞球）場撞幾回。²⁷²

日治時期網球稱為庭球，大多是指軟式網球。林獻堂雖不常打，僅偶爾略為練習，但常觀賞他人對打。²⁷³霧峰一新會館前築有網球場，1935 年 10 月 20 日落成當天舉辦網球比賽，共有來自臺中及霧峰變電所的 10 餘人參加，分為 9 組競賽。結果一、二名均由來自臺中的選手獲得。²⁷⁴1938 年 8 月旅居日本期間，林氏也曾興致勃勃乘巴士要看網球比賽，抵達才知比賽日期為明日，故感到「頗為敗興」，²⁷⁵顯示他對網球的興趣。

林獻堂對於觀賞棒球也饒有興味。1928 年進行環球之旅時，於 5 月 1 日與其子猶龍在洛杉磯觀賞美國職棒比賽。由太平洋海岸聯盟（Pacific Coast League，簡稱 PCL）的洛杉磯天使隊（Los Angeles Angeles）對抗舊金山海豹隊（San Francisco Seals）。²⁷⁶並在遊記中記下兩隊各局的得分，且註明由於裁判

²⁷⁰ 1933 年 4 月 6 日的比賽，由松齡提供銀杯一個，作為優勝者的獎品。結果由津梁奪冠，獲贈銀杯。林獻堂著，許雪姬、林獻堂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0、136、140。

²⁷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 282、286。

²⁷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408。

²⁷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250、287、366。

²⁷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72。

²⁷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02。

²⁷⁶ 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805。

不公，導致舊金山海豹隊抗議，以致引起喧鬧。²⁷⁷足見林獻堂看球頗為用心，也看得懂，並非只是湊湊熱鬧。

此外，1938年11月在日本期間林獻堂出席觀看早稻田及慶應大學臺灣留學生的棒球比賽。²⁷⁸蓋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的對抗賽，向來是東京六大學野球聯盟最具票房號召力的盛事。²⁷⁹在此氛圍下，兩校的臺灣留學生也組隊互相對抗。1940年6月5日，林獻堂應楊肇嘉長子楊基椿²⁸⁰之邀，答應出席16日舉行的早大、慶大棒球賽。但該日日記中查無相關記載，不知林獻堂是否如約前往觀看。²⁸¹

其餘的傳統文人對棒球和撞球亦有濃厚的興趣。1936年《詩報》曾以〈野球〉為題公開徵詩，獲得廣大迴響，在入選的作品中，王則修以「一擊挺如飛，得勝歸優點，輪班赴打圍」來描述其規則。²⁸²謝汝銓也曾至圓山觀賞棒球比賽，詠道：「左右分強翼，後先接短兵。高投神鬱勃，猛襲氣縱橫。匍伏機無失，犧飛勢不驚。生還堅可陷，封殺壘能平。」²⁸³形容比賽時兩隊對決緊張的情景。

詩集中常見與撞球相關的題材，歐陽維謀形容打撞球是：「臺上鋪氈綠，團團轉四球。五人爭二勝，六侶結雙儔。縮後如星轉，推前似箭流。嬌聲傳點數，一擊可消愁。」²⁸⁴施學文²⁸⁵則曰：「比賽球場喜不禁，爭雄直到日西沈。」

²⁷⁷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454。

²⁷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304、306。

²⁷⁹ 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使研究》，頁806-807。

²⁸⁰ 楊基椿：楊肇嘉長子，1916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學法科畢業。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383，〈楊肇嘉〉。

²⁸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頁162、172。

²⁸² 王則修，〈野球〉，《詩報》，第137號，昭和11年9月17日，頁12。

²⁸³ 謝汝銓，〈觀野球〉，收於謝汝銓，《奎府樓詩草》上卷，頁15。

²⁸⁴ 歐陽維謀，〈撞球〉，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416。

²⁸⁵ 施學文：字鳳石，溪胡人，溪湖菱香吟社成員。自公學校時代起即潛心研究漢文、漢詩，後攻

殷勤吩咐司球女，算點還期要小心。」²⁸⁶由此看來，球場中有司球女嬌聲計分，加以其喜愛撞球，因此，爭雄每至日西沈。

游泳是新興的運動，當時游泳池仍不普及，早期游泳場所是天然的海水浴場。前往海水浴場成爲社會的風尚後，傳統文人不免前往一觀，目睹人們徜徉於海水之喜樂，帶給他們極大的震撼。

1929年9月林獻堂前往南寮海水浴場，在海埔競走，並入浴四、五十分鐘，直呼是一大快事；²⁸⁷1934年8月與親友組團至通霄海濱，參加由當地驛長主辦的觀月會。林氏入海游泳時，正值明月初升、海潮正返，濤頭因被月光所照，其白乃如銀，他在逐浪浮沉之餘，享此美景深覺有趣。²⁸⁸林玉書亦沈醉於海水浴，其詩曰：「二三知己主和賓，浴罷清波更寫真。安得浮生長樂此，人間何處有紅塵。」²⁸⁹張純甫則認爲：「此會無礙又無遮，老眼於今醒亦醉。」²⁹⁰「人不能來我卻來，裸裎廣席夢無猜。」²⁹⁰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陶醉於無邊春色之中。黃水沛認爲游泳盛行是文明教育重視體能所致，可一洗過去文弱的風氣。他在海水浴場目睹男女共泳的情景後，認爲這與古時夷狄之風相近，但既然現在講究自由，也就無須口誅筆伐。其〈臨海旅舍觀海水浴〉一詩如下：

文明教育體偏強，一洗文弱舊時先。裸體翻波人而魚，身手男兒誇乙乙。
女子胸部亦豐盈，雜泳其間情逾密。我聞夷狄有異風，浴河男女自擇匹。
文極斯野野斯文，物理之極反其必。此風既長愛自由，何勞誅意董狐筆。

讀藥物學，開設德生西漢藥房。閒暇時時常與騷人詞客聯袂遊山玩水。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263。

²⁸⁶ 施學文，〈撞球〉，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263。

²⁸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241。

²⁸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32。

²⁸⁹ 林玉書，〈西仔灣海水浴即景〉，收於林玉書，《臥雲吟草》，頁28。

²⁹⁰ 張純甫，〈沙灣觀水泳大會〉，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上》，頁91；張純甫，〈蒲月望後二日雨少濤新芳雪庵崎頂海水浴〉，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下》，頁92-93。

顯示黃氏觀念相當開明。至於施梅樵生性怕水，一望汪洋後只能謹慎自防。²⁹²

由上顯示，日本當局開設海水浴場，並與鐵道局合作，舉辦觀光促銷的策略頗為成功，林獻堂、林玉書和黃水沛已能享受逐浪浮沈的快感，但不黯水性的施梅樵對汪洋仍望之卻步。

由於運動風氣已開，觀賞運動會成為傳統文人休閒生活的一部份。1898 年各地公學校紛紛成立，各校年中行事當中常有運動會，甚至同一地區的小、公學校舉行跨校聯合運動會。1900 年代起，運動會成為各地小、公學校每年重要的活動，而且運動會的規模不斷擴大，不僅開放給家長參觀，並讓社區民眾一起共襄盛舉，因此，參觀者常多達數千人，甚至於超過萬人，有如嘉年華會，有助於運動風氣之普及。²⁹³

1914 年 11 月 22 日，大嵙崁公學校舉行運動會，桃園吟社社長兼大嵙崁街長呂鷹揚趁機廣邀詩人與會，賦詩助興，詩題為〈健鬥〉，²⁹⁴以表達對運動會的支持。張麗俊雖不擅於運動，卻愛觀賞運動會，幾乎每年均會至公學校「玩」運動會。²⁹⁵顯示張麗俊雖未親身嘗試體育活動，但將其當成與廟會和戲曲一般，是一種好玩的事物，而樂於去觀看，證明他並未排斥運動。與張麗俊

²⁹¹ 黃水沛，〈臨海旅舍觀海水浴〉，收於黃水沛，《黃樓詩》，頁 28-29。

²⁹² 施梅樵，〈鄉友招遊海水浴場即景〉，收於施梅樵，《鹿江集》，頁 127。

²⁹³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 294-329。

²⁹⁴ 〈運動會及敲詩〉，《臺灣日日新報》，第 5188 號，大正 3 年 11 月 27 日，頁 3。

²⁹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146-147、293；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287；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134、428；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31；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78；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26。

相似的是傅錫祺，在日記中雖然找不到他運動的記載，但他也曾觀看臺中高等普通學校的運動會，並往葫蘆墩觀賞豐原郡體育會之大運動會。²⁹⁶

1934年櫟社秋季小集，即以〈秋季運動會〉作七絕詩題，可見該社詩人普遍已有參與運動會的經驗。張麗俊之作如下：

葭蒼露白景清幽，紅綠兒童聚一邱。冀得青年成大學，先教體育把身修。
水光雲影兩悠悠，廣袤庭前競勝優。進退周旋群兒戲，錦標奪得喜聲咻。

297

內容生動地描述參加運動會的兒童奪得錦標後的欣喜。顯示張麗俊已有青年若要成材，須先學習體育以修身的進步觀念。

張長春曾描述其觀賞賽跑比賽後的觀感，云：「萬里馳驅不計遙，雄心制勝氣沖霄。御風自是霜蹄健，拍掌聲中奪錦標。」²⁹⁸忠實地寫出賽跑的速度感和刺激。有幾位傳統文人以〈運動會〉為題發表詩作，陳述其觀賞運動會後的感想。鄭香秋云：「環球到處競爭場，性習都歸一改良。優勝不宜天演任，擒王射馬挽弓強。」黃守謙曰：「維新以後醫文弱，都在菁莪造就良。」黃全興則說：「我國精神敦尚武，莫將訓練等尋常。」²⁹⁹均表示現今已是弱肉強食、高度競爭的世界，故臺灣人應該棄文弱而尚武德，方不致因物競天擇而被淘汰，此種觀點與日治之前文人普遍重文輕武，相差何止道里計。

林獻堂主導的「霧峰一新會」亦將「運動會」列為該會每年必辦的活動（詳見下章）。因此像林獻堂這般見識較廣、思想較開明的文人確實已體認到運動的重要。

²⁹⁶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年1月9日，11月6日，未刊稿。

²⁹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503。

²⁹⁸ 張長春，〈賽跑〉，收於賴子清編，《台灣詩海》，頁110。

²⁹⁹ 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221。

(二) 觀賞展覽會、電影

日本當局在臺灣舉辦博覽會的主要目的是要向世人呈現其殖民統治的成功，此種大規模將各地特產及奇珍異寶匯聚於一堂的展示活動，對臺灣民眾也有極大的吸引力。以張麗俊而言，每日的生活不外乎是自下南坑的家到豐原街採買物品，與朋友閒聊或與青樓女子周旋，識見有限，博覽會是使其眼界大開的良機，故他表現出高昂的興趣。

1916年4月16日，張麗俊前往臺北參觀「臺灣勸業共進會」。該會是為紀念始政20週年而辦，號稱是「世界性的南洋博覽會」，是日本統治臺灣以來第一次大開門戶，讓日本國內及其他各國參觀臺灣的大型展示活動，因此總督府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財力進行準備。³⁰⁰

主要會場（第一會場）在新建的臺灣總督府廳舍之一、二、三、四樓，³⁰¹羅列臺灣各地和北海道、樺太、朝鮮和滿洲等日本各殖民地的物品。廳舍內有180尺高的高塔，附有電梯，方便觀賞者自由升降，一覽臺北景觀。第二會場在殖產局林業試驗場的苗圃，邀集華南、香港、法屬中南半島、暹羅、英屬印度、馬來半島、爪哇、菲律賓等地的物產參展，並設有演藝館，故盛況空前。³⁰²

張麗俊在日記中鉅細靡遺地記載各展覽室參展的地區和展出的物品，從第一室陳列的罐貯麻豆、第二室米類，至第四十七室鐵道部出產品，均不厭其煩一一筆記，顯示其觀看之仔細，³⁰³特別是旋轉機模型及阿里山作業所模型，特別吸引他的注意。³⁰⁴而且他參觀的重點除物件外，也在充作場地的總督府官

³⁰⁰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216-217。

³⁰¹ 總督府大樓此時尚未完工，工程期長達7年（1912至1919），耗資300餘萬。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221。

³⁰² 〈臺灣勸業共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5594號，大正5年1月23日，頁4。

³⁰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21-325。

³⁰⁴ 此從張麗俊參觀後，作有〈旋轉機模型〉與〈阿里山作業所模型〉兩詩可見。詩收於張麗俊

衙，他認為官衙由於權充會場，才能任人縱覽，不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何能到此？因此特別領略一番。³⁰⁵第一會場觀罷，又至位於苗圃的第二會場，據其日記所載，展出各處牛豬、機器、工場、白鶴、孔雀珍禽、映火燈、噴水池等奇觀，種種狀況難以筆記。³⁰⁶隔日並搭火車至基隆的第三會場，觀賞各式鹹水及淡水魚，魚類的名稱亦一一記下。³⁰⁷

此次的行程帶給張麗俊相當難忘的經驗，各種新式機械及噴水池、映火燈等新奇玩意帶給他強烈的震撼，因此他離開臺北前，特別前往會場購買臺灣勸業共進會紀念玻璃杯一付，並寫上自己的姓名；³⁰⁸甚至事隔一個月後，他還將報紙上關於共進會的出品物件與觀覽人數的統計資料一一抄錄於日記中。³⁰⁹

關於此次共進會，張純甫作有〈共進會竹枝詞〉20首，對於會場的高閣十層九曲迴及展出的蕃俗及機械等，均有描寫，強調：「欲識文明新氣象，爭先共進會中看」，³¹⁰認為要了解最新文明的脈動，有必要參觀共進會，其所受的衝擊應不亞於張麗俊。

1926年3月底，臺中共進會在皇太子行啓紀念館、公會堂、物產陳列館等地舉行，張麗俊亦於4月5日前往參觀。雖然各地來參觀者眾多，導致火車、汽車、輕便車均無座位，各旅館盛況空前亦宣告客滿³¹¹。但張麗俊看罷，發覺展出的物品多是10年前在臺北總督府衙所曾見之物，無甚新奇，亦無甚珍異，並以五嶽歸來不看山形容自己的感受。³¹²

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38。

³⁰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27。

³⁰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25。

³⁰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25-326。

³⁰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28。

³⁰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40。

³¹⁰ 張純甫，〈共進會竹枝詞〉二十首，收於張純甫，《張純甫全集詩集下》，頁255-259。

³¹¹ 〈臺中共進會彙報〉，《臺灣日日新報》，第9300號，大正15年3月27日，頁6。

³¹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25、27。

1936年10月10日，「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在臺北舉行，張麗俊於23日與豐原水利組合成員組團搭火車北上，抵臺北後，因其續絃妻楊氏梨跌倒受傷，未即詳覽即敗興返家。³¹³是以在他看過的博覽會中，仍以1916年的臺灣勸業共進會讓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此後反而有點彈性疲乏。

不過，仍有許多傳統文人對「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留下深刻印象，畢竟此次展覽在50天會期中，共吸引3,346,972參觀人次，與日本1903年大阪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相比並不遜色，³¹⁴是臺灣空前的盛事。臺北「天籟吟社」社長林述三，於10月27、28兩日在蓬萊閣舉辦全島詩人大會，共有600餘人與會，第二日的吟會中並以〈博覽會紀盛〉為題，讓詩人抒發見聞。³¹⁵其中蔡希顏之作為：

珍異森羅富，咸收眼界中。江山文藻豔，海國物華豐。
車走雷聲鬧，樓成蜃氣工。巴黎開最始，創憶破崙翁。³¹⁶

顯示博覽會參展商品珍貴且豐富，展場壯麗，令人目不暇給。曾笑雲則強調展出的商品五光十色，使人眼界大開，詩云：

商家割據雄，陣面各精工。物化心增廣，人臨眼欲窮。
五光兼十色，萬紫復千紅。欣得場開放，外邦赴閱同。³¹⁷

除了博覽會，前往動物園觀看動物，或看雜耍歌舞表演，也是熱門的活動。1925年12月張麗俊專程至臺中參觀珍禽異獸，有星虎、駱駝、駝鳥、豪

³¹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122、125。

³¹⁴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269-270。

³¹⁵ 〈全島聯吟大會概況〉，《詩報》，第118號，昭和10年12月1日，頁1。

³¹⁶ 希顏，〈博覽會紀盛〉，《詩報》，第118號，昭和10年12月1日，頁5。

³¹⁷ 笑雲，〈博覽會紀盛〉，《詩報》，第118號，昭和10年12月1日，頁5。

豬、狽猿、鳳凰等平日難得一見的動物，³¹⁸還有許多他不知其名者。同日又觀大舞戲，看表演者立球上行走、倒豎飲茶、戲鞦韆、馬上行走等，精彩萬分。³¹⁹他也曾至豐原座觀熊虎猿犬諸獸類及魔術表演等。³²⁰

1915年圓山動物園落成後，也成為北部文人常去的場所。林培張³²¹認為動物園內各類動物應有盡有，五光十色可供欣賞，到此一遊更勝遨遊九州。³²²黃水沛曾帶其子造訪，見園中兒童一會戲象獅，一會餵鸚鵡，好不快樂；並感嘆園中鳥獸有人餵食，居亦有定所，故風雨未為憂，待遇似較人為佳。³²³林玉書參觀動物園後，盛贊此地「飛潛毛角會公開，極水窮山備且該。」不過，他認為世界上尚有許多為非作歹的狐鼠輩，也該置於園中與鳥獸為伍，故云：「世上儘多狐鼠輩，云胡不列此間來。」³²⁴

電影是日治時期新興的休閒。20世紀早期的活動寫真其實只是無聲電影，但已讓傳統文人感到驚異。陳瑚看了日俄戰爭的電影後有如下的記述：

白紗一幅映燈光，燦爛如晝照華堂。紛紛裙屐來如織，快睹極東爭戰場。
此中奇幻開天地，炮烟彈火吐毫芒。陸地激鬥方壯烈，鐵船又戰太平洋。

³¹⁸ 此處的動物種類是張麗俊於日記中記下的。豪豬又稱箭豬，屬齧齒目，身上帶有尖刺，身長約60至90釐米；星虎則不知所指為何；鳳凰則是傳說中的鳥類，張麗俊不可能目睹，應是誤記或看錯。

³¹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333。

³²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435。

³²¹ 林培張（1864-1941）：字植卿，又字次逋，號芷庭，嘉義竹崎街人。清光緒中進嘉義縣學，後補增生。日治後設塾訓蒙，加入羅山、南嘉、網珊等吟社。大正年間，轉充臺灣新聞社漢文部校對，移寓臺中，署居所曰「寄廬」。與施梅樵、蔡子昭等人交情深厚。林培張，《寄廬遺稿》（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書前作者介紹。

³²² 林培張，〈遊動物園〉，收於林培張，《寄廬遺稿》，頁54-55。其詩為：「不憚名山大澤收，羽毛鱗族盡搜求。五光十色供清賞，較勝遨遊歷九州。」

³²³ 黃水沛，〈星期日偕小兒玉簪游圓山動物園〉，收於黃水沛，《黃樓詩》，頁13。

³²⁴ 林玉書，〈動物園〉，《臥雲吟草》，頁33。

虎擲龍拏在一紙，死傷勝敗須臾耳。旌旗烽燧現眼前，不愁地隔千萬里。
幻燈至此妙入神，千秋猛士長不死。廿紀風雲戰局新，流傳何必垂青
史。……³²⁵

大意為透過電影，即使相隔千里，日俄戰爭的慘烈亦如在眼前，而科技發達至此，戰局的流傳無須仰賴文字記錄。張麗俊電影也同感驚奇，1908年1月在豐原聖王廟觀看日本人演的電影，認為其間幻術精妙難以言語形容，³²⁶他也看過介紹前清故事及日俄戰爭的相關紀錄片。³²⁷日本當局不斷放映日俄戰爭的紀錄片，目的在於宣揚國威，傳統文人沈迷於新科技之餘，似乎不免受其影響，故陳瑚稱日本軍人為「千秋猛士」。

早在1915年，已有警察向林紀堂推銷電影票，打算攤派他買15張，每張30錢。³²⁸因此，林紀堂對電影並不陌生。

林獻堂亦是電影的愛好者，常至臺中樂舞臺、臺中座、大正館、娛樂館等戲院看電影，所看的影片包括中、日、西片，他並將看過的片名一一記於日記中，可見其熱愛的程度。林獻堂與知名影星李香蘭更有數面之緣。1941年1月李香蘭來臺勞軍，15日接受臺灣新民報社的招待，林獻堂為陪賓。³²⁹17日林獻堂搭火車回臺中，碰巧與李香蘭同車，在臺中車站目睹數千影迷迎接李香蘭，擁塞幾無立錐之地的盛況。³³⁰18日李香蘭至臺中陸軍病院演出，慰問傷兵，林獻堂亦是座上嘉賓。之後，林獻堂贈李香蘭一個銀竹蔑作為紀念；李香蘭則專程至霧峰拜訪，林獻堂乃設宴款待。³³¹

³²⁵ 陳瑚，〈觀日露戰爭活動寫真有感〉，收於陳瑚，《枕山詩抄》，頁17-18。

³²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314。

³²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286。

³²⁸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3月10日，未刊稿。

³²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30。

³³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36。

³³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38；葉榮鐘，〈林獻堂

吳子瑜則在臺中經營天外天劇院，曾公開播放「人間仙子」、「木蘭從軍」³³²等片。³³³張麗俊也有多次觀影的經驗，1926年4月在聖王廟看臺灣文化協會播映的宣導影片，內容包括「北極探險隊之遭遇」、「倫敦市街之繁華」、「滿洲炭礦及鐵礦之豐富」、「丹麥工業概況」、「山田和塚本教育之方法」等，使他眼界大開；³³⁴1927年9月在豐原座欣賞「王允獻貂蟬」影片；³³⁵1929年亦在豐原座看「金玉緣」，見林黛玉精神酷肖，大觀園繁華如在目前。³³⁶

1931年《臺灣新民報》引進中國有聲片「野草閒花」³³⁷來臺巡迴放映，引起極大轟動，林獻堂和張麗俊均曾往觀。該影片播放時以留聲機放出聲音，並

先生年譜》，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145。

³³² 「木蘭從軍」由侯曜編導，梁林光攝影，李旦旦、辛夷等主演，民新影片公司1928年出品。評論指出，在爭拍古裝片的熱潮中，此片為比較認真、比較下功夫者，攝影組輾轉於南京、漢口、信陽、居庸關等地，耗時半年才完成。而為了表現古代戰爭的宏偉氣勢，更動用三萬名臨時演員，在中國電影史上實屬空前。陳景亮主編，《百年中國電影精選第一卷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164-167。

³³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96；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4年4月29日，未刊稿。

³³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34。

³³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255。

³³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34。

³³⁷ 「野草閒花」由孫瑜編導，黃紹芬攝影，阮玲玉、金焰、劉繼群主演，聯華影業公司1930年出品。影片描寫音樂學院畢業的富家少爺黃云（金焰），因不滿家庭包辦其婚姻，而離家出走，在街頭遇上從北方災區流落上海的賣花女麗蓮（阮玲玉）。麗蓮天生一副好歌喉，在黃云的幫助下，成了一名歌唱家。兩人相愛並訂婚，後因家庭干預，歷經重重波折，最後圓滿結合。影片還搭配了孫瑜和其三弟孫成璧創作的主題曲「尋兒詞」，由金焰和阮玲玉合唱，事先由大中華唱片錄成唱片，然後在電影放映時，配合演員開口唱歌的畫面，播出唱片，在臺灣乃被宣傳成有聲電影。片中展現了近代崛起上海十里洋場的景觀，風格浪漫、新穎、獨特且有現代感，因此吸引了許多青少年學生觀眾。陳景亮主編，《百年中國電影精選第一卷上》，頁183-185；陳文平、蔡繼福編著，《上海電影100年》（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頁94-95。

非真正的有聲電影，故觀眾頗為不滿，群起攻擊。³³⁸由上可知，電影已進入傳統文人的生活。

（三）西式音樂

直到 19 世紀末，音樂在臺灣漢人社會中仍是生活各層面不可分割的一體組織，音樂是廟堂上儒家典禮的一部份，是宗教儀式的要項，是戲曲演出不可或缺的組成，是廟會、鄉野市集裏各色娛樂之一，從未單獨存在。³³⁹日治後，隨著公學校唱歌和師範學校音樂課程的開設，西洋音樂開始滲入臺灣社會。加上基督教來臺傳教後，禮拜時信眾齊唱聖詩，並有司琴者以風琴伴奏，使西式的樂曲和樂器漸為臺人所知。因此，學習和欣賞西式音樂乃成為文明進步的指標之一。此外，日治時期留聲機的引進、廣播電臺和收音機日漸普及，使音樂的保存與傳播有了新的媒介，音樂也成為傳統文人休閒生活的一環。

林獻堂本身擅長三絃，年輕時常獨自在藤椅上拉三絃，³⁴⁰並曾應邀在音樂會上登臺表演，³⁴¹但對西洋音樂也有所涉獵。其子姪輩（如林鶴年、林垂凱）及家中年輕女眷（如林關關、藤井愛子、楊雪霞）多學習鋼琴、小提琴等西洋樂器，³⁴²鋼琴家高錦花³⁴³即是其媳愛子的鋼琴教師，每週一次由臺南專程搭車

³³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220、223；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4030-404。

³³⁹ 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啓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頁 868-869。

³⁴⁰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簡歷〉，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2。

³⁴¹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 26、138；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257。

³⁴² 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啓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收於許雪姬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頁 853-854。

³⁴³ 高錦花（1906-1988）：日本武藏野音樂學校畢業，主修鋼琴，為鋼琴演奏家，夫為陳明清。

來霧峰教琴。³⁴⁴最讓人驚異的是林獻堂自身也會彈鋼琴，其 1942 年 1 月 27 日的日記記載：「十一時登樓，奏ピアノ（piano，即鋼琴）進行曲兩條，二十年所學今日重奏，手指如柴已不能協韻矣。」³⁴⁵顯示早在 1922 年左右林獻堂已學過鋼琴，雖然多年來疏於練習，已頗生疏，但仍能彈出進行曲 2 首，實為不易。

爲了對音樂有更深入的研究，林獻堂邀集霧峰當地的同好，於 1930 年 8 月 15 日組成「霧峰音樂會」，參與者有林水來、³⁴⁶陳傑夫、江連鼎、³⁴⁷林梅堂、³⁴⁸何添丁、王烈嗣、林金生、³⁴⁹林雲龍等 20 餘人，均爲其親友。³⁵⁰此會訂每週一、四研究漢樂，³⁵¹每週學習新譜一曲，³⁵²每月並有公開的表演活動。³⁵³同年 9 月 27 日，林獻堂三子雲龍舉行結婚式及婚宴，「霧峰音樂會」的成員到場表演

高昭義，《臺南高長家族族譜》（臺北：自刊本，1996），頁 191-194。

³⁴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217、264；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81。

³⁴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頁 39。

³⁴⁶ 林水來：臺中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校畢業，在霧峰開長惠醫院。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頁 457。

³⁴⁷ 江連鼎：大屯郡北屯庄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正科畢業，曾任霧峰庄助役，也任臺中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臺中州芭蕉信用組合理事。《臺灣人士鑑》，昭和 9 年版，頁 69。

³⁴⁸ 林梅堂：爲林燕卿子，與林資彬等合組霧峰產業株式會社，後因經營事業失敗，其地賣給一新會建會館。

³⁴⁹ 林金生：林少梅（林朝斌）的過房子，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後任霧峰農會總幹事，戰後爲萊園中學教務主任。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壯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 126-127。

³⁵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273。

³⁵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278。

³⁵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288。

³⁵³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309、336。

餘興節目，作為祝賀，其間有漢樂合奏、口琴合奏、獨唱和鋼琴獨奏等。³⁵⁴顯示團員音樂素養兼容中西，頗具造詣。

霧峰地區還有口琴會及管弦樂團的組織，³⁵⁵每逢公開演奏時，林獻堂也常前往聆賞。³⁵⁶霧峰庄能有管弦樂團，誠屬不易，³⁵⁷可看出當地音樂風氣之盛及人才之多。

其次，林獻堂與陳信貞、高慈美、³⁵⁸高約拿、林澄藻、林澄沐、林秋錦³⁵⁹等臺灣近代著名音樂菁英常有往來。據高雅俐研究指出，上述菁英多半是基督教徒，雖然林獻堂並非基督徒，但由於其長子林攀龍赴日期間受洗為基督教長老教會教友，故其家族與教會人士互動密切。³⁶⁰例如 1932 年 11 月 3 日，林獻

³⁵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322。

³⁵⁵ 霧峰管弦樂團由林以義創設，並身兼團長，林以義為霧峰人士林錦順之子，平素對於家鄉事物即頗為熱心。樂團約在 1932-1933 年間成立，樂器皆購自日本或德國，練習處早期設於林以義家族所擁有的「紅樓」（現已不存），而後設於萊園中學（今明台中學）。此團雖號稱為「管弦樂團」，但實為「鼓號樂團」，演奏樂曲多偏向爵士樂風。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頁 873-875。

³⁵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402；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195。

³⁵⁷ 臺灣音樂史上首度出現西式管弦樂團，為 1920 年由張福興所創辦的「玲瓏會」（レイロー會）。團員背景多為當時臺北醫專、臺北師範學校和社會上愛好音樂之人士，約有 40 至 50 人。練團地點為張福興艋舺家中。該團並在臺北醫專大禮堂舉辦過音樂會，可惜於 1923 年解散。陳郁秀、孫芝君，《張福興—近代臺灣第一位音樂家》（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 50-51、134。

³⁵⁸ 高慈美：1914 年生，日本下關梅光女學院、東京音樂大學畢業。1934 年參加臺灣鄉土訪問音樂會，1935 年參加賑災音樂會，1937 年與李春生曾孫李超然結婚。1950 年起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長達 34 年。高昭義，《臺南高長家族族譜》，頁 358。

³⁵⁹ 林秋錦（1910-2000）：臺南人，東京上野音樂學校畢業，回臺後任長榮中學音樂教師。曾參加臺灣鄉土訪問音樂會和賑災音樂會。戰後任臺灣省交響樂團合唱指揮，並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臺南家專音樂科任教。陳郁秀，《百年臺灣音樂圖像巡禮》（臺北：中國時報出版社，1998），頁 64。

³⁶⁰ 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

堂夫人楊水心慶祝 50 大壽時，許多音樂人特地前來致意，並舉行小型音樂會，會中陳信貞、劉燕奏鋼琴；李金土拉小提琴，林進生伴奏；柯明珠獨唱，高錦花伴奏。³⁶¹

林獻堂也曾多次出席臺灣音樂家演出的大型音樂會。1933 年 9 月，參加臺灣新民報社招待讀者的音樂會，參與演奏者有陳溪圳、林我沃、陳清忠、姚贊福、駱先春、鄭鴻源、林秋錦、陳信貞等人；³⁶²1934 年出席由江文也領軍，高慈美、林澄沐、翁榮茂、林秋錦、柯明珠等人組成的鄉土音樂訪問團在臺中公會堂舉行的音樂會；³⁶³1935 年墩仔腳大地震後，蔡培火召集蔡淑慧（小提琴）、林秋錦（女高音）、高慈美（鋼琴）、陳信貞（鋼琴）、林澄沐（男高音）等人組織賑災救恤音樂團，巡迴全臺演出募款，8 月至霧峰座登臺，林獻堂亦前往觀賞。³⁶⁴此外，三浦環、關屋敏子、林氏好等臺日演唱家的音樂會，林獻堂也未缺席，³⁶⁵可見音樂欣賞是他休閒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綜合前述，林獻堂由於交遊廣闊，平素與學習西洋音樂的音樂家多所交流，常出席音樂會；霧峰當地音樂風氣亦盛，除有管弦樂團外，他另成立「霧峰音樂會」，因此，西洋音樂在其休閒生活中確實佔了一定比例。

（四）彩票與賽馬

活》，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頁 859-866。

³⁶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50。

³⁶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65。

³⁶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14、317。

³⁶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281。

³⁶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323；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59、61。

1906年9月22日，臺灣發行公營彩票，頭彩彩金高達50,000圓，開創臺灣先例，在日本帝國領土內也是破天荒之事。臺灣總督府之所以有此創舉，乃因謀求臺灣財政獨立，故仿效歐洲樂透彩的方式發行彩票，每張有10小張同號，價格5圓，每一小張50錢，並指定全臺17位臺灣人士紳和8位日本人負責批發事宜。³⁶⁶此消息一經傳出，彩票熱馬上席捲全臺，人人均想一夕變身成富豪，即使是傳統文人亦無例外。呂厚菴曾言彩票只需以5金買得，令他喜不自勝；³⁶⁷張麗俊也與袁炳修、謝春池等友人共25名，每人出金1圓，合資購買彩票5枚。³⁶⁸12月15日開獎時，張麗俊閱報後發現與友人合資購買之號碼均未中。³⁶⁹但第二期開賣後，仍再接再厲購買10小枚，但隔年2月開獎時仍未中獎。³⁷⁰

彩票在傳統文人間引發的熱潮，可從臺南廩生蔡珮香³⁷¹所發表的〈臺灣彩票歌〉略見端倪：

官書煨煨下如煎，僉曰富籤得自天。頭彩金五萬，二彩金十千，三彩四彩五彩六彩七彩隨次編。一張票，賣五圓。……官命郵局報紙傳，市民聞之口垂涎，渾如小蟻附腥羶。中者喜若狂，望者神如顛，男婦偃僂傾囊為解纏，車雲汗雨來爭先。……自云中頭彩，可以購園田，築臺榭，得嬋娟。……³⁷²

³⁶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彩票制度之探討〉，《師大學報》33（1988年6月），頁283-300。

³⁶⁷ 呂厚菴曾作〈彩票〉一詩，內容如下：「富籤似把試場臨，灰盡名心起利心。一紙直如操左券，五金買得喜難禁。」收於呂厚菴，《厚菴遺草》，頁43。

³⁶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27。

³⁶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48。

³⁷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49、180。

³⁷¹ 蔡珮香（?-1931）：字夢蘭，號南樵，臺南人。曾任臺南第二公學校教師，1922年入《臺南新報》操筆政。南社社員。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頁15、24、50；吳毓琪，《南社研究》，頁396。

³⁷² 〈詞林〉，《台灣日日新報》，第2646號，明治40年3月1日，頁1。

高額的彩金確實對一般大眾產生極大的吸引力。不過，臺灣彩票在發行 5 期之後，即因日本民眾亦踴躍購買，造成日本國內資金不斷向臺灣流出，迫使總督府遽然終止發行。³⁷³

關於賽馬，近代賽馬制度起源於英國，原帶有練武的意味，後來逐漸加入娛樂性質以期推廣至社會大眾。日本在臺灣推行賽馬運動，目的在於「普及馬事思想及促進馬匹的繁殖和品種改良」，以利於國防軍事之用途和提升一般民眾對馬的鑑識能力和興趣。³⁷⁴

1928 年具有賭博性質的賽馬活動首度在臺灣出現，由臺北武德會馬術部的緒方竹治、近藤滿夫等人在圓山運動場舉辦，並且發售一枚 50 錢的馬票。由於臺灣總督府認為賽馬對馬匹品種的改良及馬事思想的普及具有正面的功用，此後全臺各地均有不同團體主辦的賽馬比賽，1931 年各團體整合，成立「臺灣賽馬協會」，總督府隨後於 1938 年制訂「臺灣賽馬令」，規定交付金錢予贏得馬票者，賽馬的環境趨於完備。³⁷⁵

此種來自西方的休閒活動，在當時也獲得了不少傳統文人的關注，成為上層階級的一種風雅。傅錫祺有「競馬」七言絕句二首，描寫賽馬時的情景：

玉勒雕鞍部署齊，爭誇捷足畫橋西。未能馳逐疆場去，且慰頻年伏櫪嘶。
不甘人後落恆蹊，勝負終當視馬蹏。滿望先鞭能快著，回頭駑駘隔雲泥。

³⁷⁶

³⁷³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彩票制度之探討〉，頁 283-300。

³⁷⁴ 金光太郎，《競馬ノ意義》（臺北：臺北競馬研究會，1934），頁 1；大西一，《競馬の話》（臺北：臺北州畜產組合聯合會，1936），頁 8-14。

³⁷⁵ 戴振豐，〈日治時期台灣賽馬的沿革〉，《台灣歷史學會會訊》16（2003 年 5 月），頁 1-17。

³⁷⁶ 傅錫祺，〈競馬〉，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頁 64。

1929年11月林獻堂前往臺中競馬場觀賞賽馬，並買馬票參與投票，結果三勝二負，僅損失手續費15錢，算是一個不錯的體驗。³⁷⁷1935年應「臺中馬事協會」副會長中津德治之邀，加入該會為正會員，繳納會費150圓。³⁷⁸此後多次偕同林瑞騰、林資彬等人觀賞賽馬，也不忘買馬票賭賭運氣，³⁷⁹甚至到日本東京時亦不忘順道觀賞當地的賽馬。³⁸⁰

在賽馬成為熱門的休閒活動後，每回賽事常吸引數千名觀眾，一回買馬票勝負之金額多至3、4萬圓，成為一大賭博，³⁸¹目睹賽馬日漸變質，不少文人發出感嘆，黃純青批評道：「貪夫藉此賭金錢，贏者歡娛輸者哭。典盡衣裳與釵環，流連忘返經信宿。」³⁸²林鍾英之「觀競馬感賦」亦云：

聚觀逾千人，列馬棋局布。幾人具巨眼，能繼伯樂顧。良多射倖心，以馬充賭具，爭先恐落後，買票作孤注。當局十抽二，終敗占多數，猶作邯鄲夢，正業誰肯務。³⁸³

抨擊觀賞賽馬者不務正業和懷抱投機僥倖之心。不過賽馬活動仍持續進行，至1942年以後由於戰事吃緊才成為絕響。

三、小結

³⁷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313。

³⁷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316。

³⁷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371、379。

³⁸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346。

³⁸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234。

³⁸² 黃純青，〈觀秋季競馬會〉，收於黃純青，《晴園詩草》，頁7-8。

³⁸³ 林鍾英，〈觀競馬感賦〉，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139。

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休閒娛樂大抵仍以園藝、棋藝、觀賞戲曲及廟會活動、踏青和旅行為主。不過隨者總督府將西式文明移植入臺灣，西方的球類運動和游泳、展覽會、電影、音樂逐漸為人熟知，甚至具有賭博性質的彩票和賽馬也出現在臺灣，傳統文人的娛樂活動因此更為多元和西化。林獻堂除能打乒乓球、撞球外，還能打高爾夫和觀賞賽馬，看電影也是其日常不可或缺的休閒。張麗俊亦常觀看公學校的運動會，並赴臺北參觀博覽會。傳統文人休閒活動的內涵或多或少有所轉變。

然而，擅長寫作漢詩表情達意的傳統文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調劑仍是參加詩會。

第三節 詩社活動及其性質之轉變

日治時期全臺詩社林立，總數高達 370 餘個以上，形成全臺「詩社林立」的特殊現象。³⁸⁴ 早期學者多將詩社的存在視為是傳統文人延續漢文與維繫民族意識的表徵，特別是中部的櫟社，由於部分成員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蔡惠如積極投入民族運動，而被視為具有抗日的色彩。但近來研究者多認為詩社之所以能風靡，與統治當局的刻意籠絡有關。施懿琳認為，這是統治者藉由日臺雙方共享漢文化的模式來進行對臺人思想的轉化。³⁸⁵ 因此，在傳統書房備受打壓的同時，詩社的數目才能不減反增。其次，黃美娥指出，由於日人文士將強調作品優美典雅、側重精神愉悅的「風雅」美感經驗傳入臺灣，並予以推廣，詩社活動乃標榜「吟社風流」，³⁸⁶ 加上隨者臺灣社會日趨現代化，一般民眾對休閒娛樂及生活美學日益講究，傳統詩社的通俗化面向日漸濃厚，其活動常結合踏青、登山、賞魚、玩景等各式餘興及慶典一起進行，由於大眾化及娛樂遊戲性的增強，參與詩社成為人們消遣時間的一種時尚，才能成就如此的盛況。³⁸⁷ 本節筆者試圖以櫟社及豐原吟社成員張麗俊的詩社活動為例，探究詩社的屬性及其在傳統文人娛樂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張麗俊於 1907 年加入櫟社後，³⁸⁸ 便積極參與櫟社大小活動，至 1937 年因腦中風行動不便才告終止。在豐原吟社方面，張麗俊非但是基本成員，並擔任詞

³⁸⁴ 黃美娥近年來查閱日治時代報刊發現當時以詩社、吟社或詩學研究會為名的詩社群體，總數超過 370 個以上。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184，註 3。

³⁸⁵ 施懿琳，〈從《采詩集》看台日漢詩人的互動模式與書寫話語〉，頁 364。

³⁸⁶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頁 17-20。

³⁸⁷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157-162。

³⁸⁸ 依《櫟社沿革志略》的記載，張麗俊於 1907 年 7 月 8 日加盟櫟社，然而在張麗俊該年 7 月 8 日的日記中，卻找不到絲毫與櫟社有關的記事，不禁令人產生疑竇。直到 8 月 20 日的日記才有「又全謝先生到役場閒坐，錫祺邀捺入櫟社志願書」的文字敘述。所以若以張氏的日記為準，他於 8

宗，身負指導之責，地位舉足輕重。此外，他亦多次參與中部聯吟大會及全島聯吟大會。因此，以張麗俊的詩社活動為例，可略窺一般傳統文人參與詩社的情形。

一、櫟社相關詩會

(一) 櫟社的成立與活動

櫟社係林癡仙於 1902 年所倡，³⁸⁹成立動機是有感於日治後漢學成爲棄學，傳統文人亦成爲朽木棄才，故召集同好切磋詩文，爲延續漢文盡力。其表示：「吾學非世用，是爲棄材；心若死灰，是爲朽木。今夫櫟，不材之木也，吾以爲幟焉。其有樂從吾遊者，志吾幟。」³⁹⁰林幼春和賴紹堯聞其言乃贊之，不久，蔡啓運、陳瑚、呂厚菴、陳懷澄、陳基六亦同聲相應。1906 年訂定櫟社規則 17 條，正式組織化。³⁹¹

櫟社結成之初，帶有相當程度民族意識，因此曾受到日人警察的關切。1911 年 12 月 16 日，有地方特務詢問張麗俊，櫟社成員屬於支廳管內共有幾人，社長爲何人，一年集會幾次等問題。張麗俊答曰，支廳管內有林癡仙、傅錫祺、林載釗、呂瑄星、黃旭東、袁炳修和其本身。此外，呂厚菴已身故，社

月 20 日才向櫟社提出入社申請，正式獲准加入應該在此之後。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254。

³⁸⁹ 林癡仙自 1899 年返台後，已有創辦詩社的構想，常與林幼春、賴紹堯、呂厚菴、沈夢達等人相唱和，惟當時並未有櫟社之名，尚未正式組織化，亦未有紀錄留存。1902 年之後，櫟社活動才大有可記，因此，遂謂創始於此年。林幼春，〈櫟社沿革志略序〉，收於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廖振富，〈櫟社與鹿港之淵源及其相關作品探析〉，收於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254。

³⁹⁰ 林幼春，〈櫟社二十年問題名碑記〉，收於林幼春編，《櫟社第一集》，頁 43。

³⁹¹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1。

長蔡啓運亦已去世，³⁹²今尚未選舉新社長。每一年開會一次，會費大約 3 圓。³⁹³顯示當局亟欲掌握櫟社活動動態。

櫟社的主要活動為每年一次的春、秋雅集，通常於開會前 7 日，由社長發書柬，或於報紙刊登廣告，以通知會員，會員若不能前往，需於開會前通知社方。如有議事，需半數以上社員出席。³⁹⁴惟早期一年兩會並未成為定例，一年之中常只召開一次春會或秋會，1911 年 12 月 16 日張麗俊的日記便明白記載櫟社一年只開一次春會，³⁹⁵有時甚至沒有任何集會。1921 年以後，一年兩次聚會才成為常態。不過，1930 年代後，由於社員日漸凋零，僅存者又多近暮年，林獻堂認為只春、秋兩季集會過於疏遠，乃於 1933 年秋會提議增加冬、夏二季集會。社長傅錫祺遂裁示自 1934 年 1 月起開始實行。³⁹⁶然檢視相關記載，夏會僅於 1934 年 6 月 17 日舉行過一次，且當天因下雨，參加者不多；³⁹⁷至於冬會，則從未付諸實行。是以櫟社的集會仍以春、秋會為主。

其次，櫟社每逢 10、15、20、30、40 週年舉行紀念大會。社員之間為聯繫感情，常舉辦壽椿、祖錢、洗塵、慰安、追悼會。此外，櫟社曾聯絡中部和全臺各詩社，舉辦規模浩大的中部聯吟會及全島聯吟會。³⁹⁸

³⁹² 蔡啓運之後，由賴紹堯擔任社長。1917 年賴紹堯去世，改選傅錫祺為社長。其後，1929、1932 年數度改選，均由傅錫祺連任。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11-12、32；傅錫祺，《增補櫟社沿革志略》，頁 2。

³⁹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147。

³⁹⁴ 張德懋藏，〈櫟社規則附會議錄〉，大正 8 年 9 月 1 日，未刊稿。1910 年瑞軒春會開會前，張麗俊即曾接獲社方開會通知單，希望其能將出席與否之情況於一禮拜前告知傅錫祺。張德懋藏，〈櫟社庚戌春會紀念箋〉，未刊稿。

³⁹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147。

³⁹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320。

³⁹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433；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42；傅錫祺，《增補櫟社沿革志略》，頁 3。

³⁹⁸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頁 72-92；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頁 2。

前述各項活動，凡是社員均有參加的義務，依照 1919 年櫟社規則第 24 條規定，社員不出席總會連續 3 回以上者，即視同退社。³⁹⁹然而，社員出席集會不踴躍者仍為數不少，例如連橫曾連續 8 年未出席集會，吳上花入社 10 年開會皆未出席，葉篤軒和莊雲從一因缺席過多，一因得精神病，以致無法履行社則，均被迫退社。⁴⁰⁰特別是 1933 年之後，依張麗俊觀察，由於陳懷澄得老年癡呆症，林耀亭多被家事牽纏，陳貫每辭病不至，林仲衡因私利太重，林竹山入社而不出席詩會相關活動，開會時參與的人數更少。⁴⁰¹然而，張麗俊除非有要事在身，向來有役必與，茲略述其參與櫟社活動的情形如下。

（二）1910 年代張麗俊的體驗

1910 年 4 月 24 日，張麗俊至臺中林瑞騰的瑞軒參與櫟社春會。這是他首次出席櫟社集會。⁴⁰²此次詩會特點是櫟社廣邀全臺各地詩人共 53 名與會，決議往後北中南三地詩社，每年開一次總會，逐年輪流作東，以成一大同之詩界。會中以〈庚戌櫟社春季大會〉為課題，⁴⁰³令主賓吟詠。晚間 7 時開宴，特別邀請北

³⁹⁹ 張德懋藏，〈櫟社規則附會議錄〉，大正 8 年 6 月 15 日，未刊稿。

⁴⁰⁰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頁 14-16，「1902-1949 櫟社成員表」。

⁴⁰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320；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07-108。關於櫟社諸友缺席之因，張麗俊曾記載「陳懷澄起心經之病」，所謂心經之病即神經病。但傅錫祺〈陳懷澄社友挽詞〉第五句「縱向長康分一絕」，作者自註：「君患痴疾」；林獻堂〈懷櫟社死病諸友記鶴亭、了庵二詞兄〉，亦曰：「沁園人事患多忘」，故陳懷澄之病應為老年癡呆症。傅錫祺，《鶴亭詩集下》，頁 227；林獻堂，《灌園詩集》，頁 2。

⁴⁰² 1907 年 10 月 28 日，櫟社在賴紹堯宅舉行秋會，張麗俊因身為保正，必須參加台灣神社前的遙拜式而缺席。1909 年 4 月 3 日，林瑞騰瑞軒舉行櫟社春會，張麗俊因左眼眼疾亦欠席。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279；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163。

⁴⁰³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所載的課題為「櫟社庚戌春會即事」。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6。

妓 5、6 人前來服侍。近 10 時席散後，與會文人或剪燭敲詩，或彈琴和曲，或散步觀燈，或臨池賞月，極為風雅浪漫，直至 12 時方各自就寢。翌日午後，擅長書法的來賓洪以南、鄭鴻猷和櫟社社員王學潛、鄭汝南等人，各書聯扇作為櫟社大會之紀念。晚間開宴，仍令北妓 5 人作陪，並將聯扇抽籤分送，方結束此一盛會。⁴⁰⁴

1911 年 4 月 2 日，櫟社在臺中林瑞騰的瑞軒舉行歡迎梁啓超來訪的詩會，張麗俊亦出席。當日中午，他先與櫟社友人在臺中車站迎接梁啓超，並隨梁氏到其下榻的丸山旅館，投名片行禮，再回瑞軒。晚宴時，梁啓超致詞表示，台灣之風土民情，他早已想領略，惜無知己之人，現他與林獻堂君相契，才能與大家晤面；又逢櫟社開會，殊屬幸運，但今夜酒席中俱文雅之人，只好談風月，國家政治不必提及。眾人俱鼓掌稱快，後請梁氏出詩題，即以「追懷劉壯肅公」為題，不拘體，不限韻，讓與會者吟詠。翌日，再以「新荷」、「詠詩」為題，作兩次擊鉢吟。⁴⁰⁵

擊鉢兩字源於《南史》王僧孺傳：「乃共打銅鉢之韻，響滅時詩成。」⁴⁰⁶所謂擊鉢吟，依張麗俊自己的解釋，為「出詩題，或詠物，或詠史事，限鐘點交卷，僉二人為左右宗師，謄錄者將各人詩抄集二本，付宗師選舉元、眼、花、臚四名，次選翰六名，又次選錄十名，各有輕重賞品，餘則不取，亦不賞也。」⁴⁰⁷一般擔任左右詞宗者，多為德高望重較受推崇之士，或由來賓出任。

雖然櫟社成員林幼春曾攻擊擊鉢吟非詩，只是用以學詩之工具；因為詩要真，非出自衷心之言即非詩，而擊鉢吟多非出自衷心之言。⁴⁰⁸不過依黃美娥的

⁴⁰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345-349。

⁴⁰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35-39。

⁴⁰⁶ 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 38。

⁴⁰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34-35。

⁴⁰⁸ 林幼春此段話，發表於 1931 年 11 月 22 日櫟社 30 週年紀念大會上，詳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365。不過這是 19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之後，舊詩界自我反省才有的言論，櫟社早期曾積極提倡擊鉢吟。關於擊鉢吟的演變與後來的變質，是一

研究，擊鉢競吟「元、眼、花、臚……」之評比結果，可使舊文人重溫舊式科舉揭榜之刺激與榮耀，⁴⁰⁹具有遊戲娛樂的效果，並有獎品可拿，不似作詩只能唱和，缺乏緊張及競爭感，擊鉢吟遂成為詩會的重頭戲。

1912年6月15日，張麗俊至霧峰萊園參加一連四日的櫟社10週年紀念大會。自林獻堂於1910年入社後，櫟社詩會便常於霧峰萊園召開，該園為林獻堂之父林文欽所創設，以擁有五桂樓、擣衣澗、荔枝島、木棉橋、萬花庵、夕佳亭、小習池、千步磴、望月峰、考槃軒等十景而遠近馳名。張麗俊係初次造訪，依其描述，萊園距霧峰林家約半里，入園後轉過彎即「擣衣澗」，其上有「木棉橋」，橋西為「小習池」，中有浮嶼，上築戲臺並種荔枝，即「荔枝島」。「五桂樓」則為一洋式樓層，新鮮華麗，因石欄杆畔栽植梅桂而得名。至於「考槃軒」僅茅屋數椽，為兒童讀書養氣之所，軒南有一四垂亭，即「夕佳亭」，亭中置獨腳石、月棹、不動椅，可供人遊玩少憩。由亭而上，則為「千步磴」，重巒疊嶂直接「望月峰」、「萬花庵」。張氏遍覽園中景色後，不禁發出「此間山水宜人，風景殊佳，所謂天上神仙府，人間富貴家，此語誠然乎哉！」的感嘆，⁴¹⁰該園景色之秀麗可見一斑。

張麗俊對萊園的景致如此讚嘆並不令人意外。日本眾議院議員神田正雄於1931年來臺拜訪林獻堂時，⁴¹¹亦說林家邸宅之宏壯富麗，實遠勝平時所聞；而萊園結構之豪華精緻，並不遜於北京皇族或高官顯爵之府第，尤其背面山崗之林家廣大墓地，環境清幽極盡林園之美，實令人嘆為觀止。⁴¹²

極複雜的問題，有待深入探討。

⁴⁰⁹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190。

⁴¹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221-222。

⁴¹¹ 神田正雄於1931年11月3日至霧峰拜訪林獻堂，林獻堂導之往遊大花廳及萊園。前一天林獻堂亦出席由臺中地方人士在醉月樓舉行的神田歡迎會。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43-344。

⁴¹² 神田正雄，〈林獻堂先生與我〉，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頁552。

開會當日五桂樓懸萬國旗、掛 10 週年燈並放花炮三聲以賀。會中櫟社社長賴紹堯述開會辭，蘭社社長陳紹年、竹社社長戴還浦、魏清德等人致賀詞，其後，櫟社成員林獻堂、林幼春等再致答詞。張麗俊認為林獻堂的演說條分縷晰，真足令滿座鼓掌；林幼春的講演亦是津津樂道，側擊旁敲，亦令滿座鼓掌。閉會後開筵，施放 20 餘層之煙火，並以「新蟬」為題，舉行擊鉢吟。⁴¹³

翌日上午，發表昨夜「新蟬」之元、眼、花、臚、翰，又以「暑雨」和「夏木」為題，舉行二回擊鉢吟。依張麗俊所記，擊鉢吟詠時，與會各人均認真寫作，「冀搏〔博〕高名而得厚賞焉」。⁴¹⁴顯示擊鉢吟具有的娛樂性讓傳統文人更積極參與詩會。

10 週年紀念大會原訂 18 日結束，但因大雨淋漓，以致溪流氾濫，輕便橋樑流斷數處，使張麗俊欲歸家而不得，遷延至 19 日，才乘坐由林獻堂準備的肩輿，涉水渡溪至臺中，再搭火車回豐原，誠為一次難得的經驗。⁴¹⁵

1917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櫟社於霧峰萊園舉行 15 週年紀念會。開會當日張麗俊與傅錫祺、陳基六、林載釗同行，並帶一妓女月桂，共乘五分列車前往。會中，因前社長賴紹堯去世，改選傅錫祺為新任社長，並先後以「噴水池」、「新寒」為題，舉行擊鉢吟。隔日詠「借菊」和「問梅」兩題，接受林紀堂午宴和林燕卿晚宴之招待。散會後，張麗俊與陳基六偕妓女月桂至臺中賞菊遊玩後，方返家。⁴¹⁶

（三）1920 年代詩社更趨通俗化

⁴¹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224-225。

⁴¹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225-226。

⁴¹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221-229；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8。

⁴¹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17-120；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11-12。

1926 年吳子瑜加入櫟社，由於其人性熱情、喜交遊，又逢翌年獻堂偕子西遊歐洲，故直至吳氏於 1937 年轉赴中國發展之前，櫟社常於他在臺中的宅邸怡園及東山別墅集會。⁴¹⁷東山別墅位於冬瓜山，為其父吳鸞旂之坟墓所在，該地原無甚價值，⁴¹⁸但子瑜自加入櫟社後，即勞七、八年心神，花費三、四十萬圓，從事整修墳塋及建築別墅。據張麗俊的觀察，吳鸞旂墳墓之壯麗不但冠於臺中，即臺灣亦未之有也；⁴¹⁹而別墅更廣置亭臺樓閣，植花果萬餘株，尤以荔枝為多，⁴²⁰連園中通行小徑亦用水泥印成古木形，一步一塊，到處皆然，裝飾極為用心。張麗俊曾以「滿園清香撲鼻，秀色迎眸，而野草除芟，荔枝爛漫」來形容當地的美景，並讚嘆當年石崇之金谷園亦不過如此。⁴²¹

而且，吳子瑜常於櫟社春秋雅集隔日邀請櫟社社員和他社吟友，至其別墅聚會。春季常在農曆 3 月 3 日舉行，稱為「踏青會」；秋季則在農曆 9 月 9 日重陽節舉行，稱為「登高會」。此外，每逢中秋有「觀月會」，⁴²²荔枝豐收時則有「啖荔會」。⁴²³使櫟社成員集會的次數變得既多且密，而娛樂遊戲的成分也更加濃厚。⁴²⁴

1927 年 10 月 3 日，張麗俊至吳子瑜東山別墅出席櫟社秋會，並舉行慶祝張麗俊、林耀亭 60 大壽，連橫、呂蘊白 50 大壽之壽椿會。當日全體社友均應社長傅錫祺之邀著禮服入席，以示慎重。開宴前各社友紛紛發表賀辭，張麗俊則

⁴¹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07。

⁴¹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472。

⁴¹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80；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7。

⁴²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40。

⁴²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49。

⁴²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26-427。

⁴²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223。

⁴²⁴ 關於吳子瑜的事蹟，可參閱許俊雅，〈櫟社詩人吳子瑜及其詩初探〉，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頁 202-255。

代表諸壽星起立致謝辭，後社長命眾人寬禮服開懷暢飲，席間並出詩題「菊酒」七絕，壽星張麗俊與林耀亭更被指名為左右詞宗，直鬧至深夜方就寢。⁴²⁵

翌日，吳子瑜在同一場地舉辦「登高會」，北部和南部吟友多人參加，諸友在別墅花園或高臥或閒遊或吟詩或談心，隨各人之方便。傍晚出詩題並開宴，雛妓侑酒，水路俱陳，張麗俊認為是盛會兼盛宴。⁴²⁶

1928年10月21日的登高會，櫟社社友與南北詩人近30人參加，眾人擊鉢吟詩之餘，或閒談於酒後茶前，或散步於花陰草際，張麗俊認為：「此洵一生之樂事。」⁴²⁷

1934年9月1日起一連三日，在東山別墅舉行慶賀子瑜及其嫡配蔡氏綠蘋50壽辰的祝壽會，規模更為浩大，共有櫟社成員及社外吟友30餘人參與。當吟友未至時，子瑜即先遣人至輕便車站迎接來賓的行李，散會後又派人隨同諸友到車站買車票，使張麗俊大為感動。他認為子瑜厚待30餘人三日，飲三回盛宴，分三次賞品，其費用消耗數百金，可謂待吟友厚矣；而子瑜耗費鉅資辦詩會，較之視財如命、揮金如土之富豪子弟，其別更猶如霄壤。⁴²⁸

事實上，張麗俊與吳子瑜的關係向來頗為友好，通常當櫟社的總會在東山別墅或霧峰萊園召開時，張麗俊每於上午先至子瑜位於臺中怡園的宅邸，稍作休息並用中膳，再會同諸友一同前往開會；⁴²⁹平日無事至臺中，也常至子瑜家中拜訪；⁴³⁰而子瑜出手闊綽、愛擺排場的習性，也深合向來愛看熱鬧的張麗俊脾胃，是以張麗俊對吳子瑜做出如此高的評價不讓人感到意外。

⁴²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265-266；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28。

⁴²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266。

⁴²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439-440。

⁴²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469-473。

⁴²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265、449日；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105、303。

⁴³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334。

1936 年的登高會，則改於子瑜新築的天外天劇場舉行。此劇院樓高三層，全用鐵筋混以水泥建造，據張麗俊看來，其規模之宏壯華麗足與東京寶塚相埒。⁴³¹當日有櫟社社員 9 人及東墩吟社、怡社、大冶吟社三社之詩人 15 人，共 24 人與會。擊鉢吟後，諸人登天外天三層樓上眺望，為名符其實的登高，後再下樓入觀閩班舊賽樂開演。會後則至子瑜家，受其盛宴招待，並吟詩受賞品，極其逍遙痛快。⁴³²

林耀亭主辦的詩會也極為盛大。1928 年 11 月 18 日，張麗俊至林耀亭務滋園出席櫟社秋會和林獻堂遊歐美歸來洗塵會。張麗俊漫遊該園時，認為「見養蛙池宿鷺洲圖，府翰墨林到處清幽，遊觀雅潔，登樓遠望炤山、近聽溪水，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恍王子安登滕王閣也」，足見其規模宏偉。翌日適逢林耀亭週甲，故另邀社外吟侶多人，召開擊鉢吟會。晚宴的菜餚為燕窩、魚刺、燒鰻、炸鴨、龍蝦、燉雞、炒鱉、鮑魚、海蜆、文鴿、犀舌、豬腦等，⁴³³與今日滿漢全席的菜色相較似毫不遜色。

（四）與詩友的互動

依櫟社慣例，社員出國前要替其餞行，回國後要替其洗塵，蒙冤遭難則要慰安。例如 1936 年 5 月 3 日林獻堂往中國南遊歸臺後，傅錫祺、張麗俊、林耀亭等人專程設宴替其洗塵。⁴³⁴在慰安會方面，1925 年 6 月 6 日張麗俊與櫟社友共 10 人，至霧峰林獻堂家，參加林幼春與蔡惠如之慰安會，因二人參加臺灣議

⁴³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43。

⁴³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273-274；傅錫祺，《增補櫟社沿革志略》，頁 4。

⁴³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50-451。

⁴³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211。

會期成同盟會，而被逮捕下獄。此次集會本擬出題詠詩，由於氣氛哀傷，乃以談心代替吟詩。⁴³⁵

然而所謂慰安，似乎只限於參與公共事務而受害者，因張麗俊曾於 1918 至 1919 年間，因被誣陷而兩度入獄，被囚禁將近 7 個月，⁴³⁶在獄中或出獄後都未見任何櫟社詩友表達關心慰問。若細究之，張麗俊之所以未獲慰問，可能因其下獄一事有損櫟社的形象之故。幸好後來被判無罪，否則不僅乏人慰問，且有慘遭除名之虞。

張麗俊每逢櫟社其他成員有婚喪喜慶時，常親臨現場表達祝賀或哀悼，藉以維繫彼此間的感情，茲舉其大要如下。

1911 年 7 月 13 日，張麗俊與櫟社友王學潛、林癡仙、連橫往好友傅錫祺家，賀其令堂七十晉一榮壽及長子傅春魁完婚。宴席中鼓樂管弦齊奏，杯盤餚饌並進，一副熱鬧景象。⁴³⁷1928 年 10 月 20 日，至霧峰林家祝林仲衡、林瑞騰嫡母楊太夫人八十一大壽。會場宮保第掛滿壽帳和壽聯，大花廳擺設 12 幅金箋大壽屏，且聘請正音劇團梨園戲班演出。午宴後，櫟社社友作擊鉢吟，因林瑞騰早已備妥賞品，極一時之盛。⁴³⁸1930 年 9 月 27 日，張麗俊與傅錫祺、王石鵬同車至霧峰，參加林獻堂三男雲龍與楊子培長女雪霞之結婚式。當日賀客約有 200 餘人，晚宴上並有漢樂、口琴、鋼琴演奏及個人獨唱等表演，以祝餘興。⁴³⁹

⁴³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60；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25。

⁴³⁶ 張麗俊第一次入獄是 1918 年 7 月 24 日至 9 月 2 日，第二次是 1918 年 12 月 11 日至 1919 年 5 月 11 日。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01-206、219-244。

⁴³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80-81。

⁴³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36-438。

⁴³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75-276；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322。

在喪事與追悼會方面，1916年10月7日，與櫟社友共12人，至臺中寺追悼林癡仙。⁴⁴⁰事實上，張麗俊加入櫟社前已與林癡仙有所往來。蓋因癡仙與其師謝道隆熟識，三五好友常在一起宴飲，⁴⁴¹張麗俊與癡仙更曾結伴入聲色場所鳳巢逍遙。⁴⁴²關於癡仙之逝，張麗俊曾嘆曰：「社會之權衡，士林之翹楚，何天不與壽，纔過不惑即赴修文之弔也。」⁴⁴³其次，1936年4月24日，往臺中參加吳子瑜妻蔡氏綠蘋之葬儀。據張麗俊記載，當日喪壇的裝飾甚為壯觀，全島文人輓詩、輓聯四面懸滿，而壇前花環排遍。男賓以林獻堂為首，女賓以臺中州知事日下辰太夫人為首。出殯時送葬者所乘的出租車多達29部，人力車亦有數十輛。儀式畢，吳子瑜在怡園大開宴席20桌，極盡奢華之能事。⁴⁴⁴再者，1936年5月10日，與王石鵬、莊嵩、蔡子昭、張棟梁至櫟社首任社長蔡啓運之子蔡汝修家，參加蔡啓運去世25週年紀念式，並至其坟前拍照留念。⁴⁴⁵

由上可知，傳統文人這一群體透過彼此生日、婚喪喜慶、遠遊歸來或即將出遊時集會，建立社會網絡，以維繫同儕間的凝聚力。

張麗俊參與櫟社詩會近30年期間，其作品甚少得名，總共僅中元三次，首先是1913年10月19日秋會，以「老鶴」七絕，限先韻，被左宗師林幼春取狀元、右宗師陳織雲取探花。⁴⁴⁶其次是1926年6月16日春會，所詠「洗塵宴」七律，限真韻，被右詞宗王石鵬選元；「歸船」七絕，限微韻，被左詞宗陳懷澄選元。⁴⁴⁷直至1932年10月15日秋會，才以「竹風」二字六唱覺脛格第三度

⁴⁴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388-390；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11。

⁴⁴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73-74。

⁴⁴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37。

⁴⁴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242-243。

⁴⁴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207。

⁴⁴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213。

⁴⁴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425。

⁴⁴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56-57。

中元。⁴⁴⁸當日林獻堂在日記中特別寫道：「升三二十餘年來今夜破天荒中元，真是喜出望外。」⁴⁴⁹或許因為張麗俊歷年甚少中元，在林獻堂的記憶中趨近於零，因此才誤將張麗俊 1932 年的中元，誤記為破天荒中元。至於擔任詞宗，張麗俊也僅一次，即在前述慶祝他 60 大壽的壽椿會時。由此觀之，張麗俊的文學造詣在櫟社同儕中並不特別突出。不過張麗俊仍參與詩會不輟，推敲其原因，應該是在詩會中能與同輩文人聯誼，擴大自己的生活範圍與見識，並能兼及娛樂的功效，得名受賞品並非其主要的目的。

綜合前述，櫟社創社之初雖以保存漢文為宗旨，但 1910 年代其活動方式已帶有娛樂色彩，例如詩會多在霧峰萊園等秀麗的庭園召開，舉行帶有遊戲競技性質的擊鉢吟，且有藝妓侑酒等。迨 1926 年吳子瑜加入櫟社後，在東山別墅舉辦踏青會、登山會、觀月會等，其 50 大壽祝壽會，更不惜鉅資，一連三日大開盛筵招待詩友，將詩會與休閒活動緊密結合。因此，傳統文人參加詩會，除與同儕切磋文學外，亦可達到休閒娛樂的目的。以張麗俊而言，能參加在猶如天上神仙府的霧峰萊園、富麗更盛石崇金谷園的東山別墅及恍如置身滕王閣的務滋園舉行的櫟社詩會，享受主人準備的精緻菜餚，無疑是一件樂事，即使其擊鉢競技甚少得名，亦未減低他出席詩會的興致。

二、以櫟社為主導的中部及全島聯吟大會

張麗俊曾多次出席中部聯吟大會和全島聯合吟會。中部聯吟大會是臺中、員林、鹿港、南投等地的詩社輪流作東，每年舉行一次。1927、1929、1933、1935 年的會議均由吳子瑜主辦，開會地點在其臺中自宅怡園。1927、1929 兩年

⁴⁴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155-156。張麗俊在 1932 年 4 月 8 日的踏青會中，也曾以「寒食」二字蜂腰格，被左詞宗選元、右詞宗選眼，但因踏青會與櫟社春、秋雅集之性質不同，故不列入計算，詳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51-52。

⁴⁴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20。

會議的日期更刻意選在臺中市官民迎城隍遊街之時，使諸吟友可趁機觀賞各團體和各鋪號裝成書意臺閣、旗鼓競豪門麗的盛況。張麗俊表示，此誠為目不勝睹、指不勝數之盛鬧。兩次詩會均吸引四、五十位中部詩友參加，觀看廟會所獲得的愉悅似乎遠遠凌駕參加聯吟大會。⁴⁵⁰

由於舉辦聯吟會必須具有雄厚的財力，方能備辦盛宴及準備餘興節目，若非吳子瑜之流者，似無法負擔，乃出現某些詩社逃避主辦的現象。1935 年中部吟會原應於春間舉行，因適逢吳子瑜前往中國大陸，迨其 6 月回臺後才於怡園舉行；而且該次會議本應由員林地方值東，未料該處卻無一人出席，似因恐擔任輪值之故。⁴⁵¹鹿港的大冶吟社、聚鷗吟社及南投張聰憲、員林興賢吟社亦曾主辦過中部聯吟會，或許因其規模難與吳子瑜規劃的相提並論，詩友的參與意願較低，以致張麗俊均找不到伙伴同往，意興闌珊之餘只得欠席。⁴⁵²

在全島聯合吟會方面，張麗俊曾參加 1926、1930、1935 年三次全島聯吟會，這三次恰巧均由櫟社領銜主辦，且以吳子瑜出力最多。

1926 年的大會於臺中吳子瑜怡園舉行，與會者 187 人。首先由櫟社蔡子昭述開會詞，陳懷澄述開會原因，再由詞宗出詩題，交卷後開晚宴，席散方唱詩指名領受賞品。由於當時臺中市正召開臺灣中部共進會，翌日張麗俊乃順道至會場參觀，而不再赴詩會之約。⁴⁵³

1930 年的會議於 2 月 8、9 兩日在臺中公會堂舉行，以中部 17 詩社為值東，又以櫟社為首領，共 200 餘人出席。由櫟社社長傅錫祺述開會詞，吳子瑜報告收支並會則，後推薦詞宗、出詩題。傍晚開宴，聘雜伎侑酒，吳子瑜並於

⁴⁵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27-228；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74-75；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18。

⁴⁵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64。

⁴⁵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411、489；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00。

⁴⁵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5-28。

怡園備有盛宴招待詞宗。翌日，南北吟友數十人往吳子瑜東山別墅觀風景。下午中部吟友召開南北吟友歡迎會，由林幼春述開會詞並推薦詞宗，花炮聲響起後眾人齊交卷。會場燃放冲天開花炮三部，鼓樂喧天、藝妓歌曲洵一時盛事。張麗俊認為當年蘭亭、金谷亦不過如此。席散後，眾人或登墩眺月或入院尋花，各隨其志，直至凌晨二點方散寢。⁴⁵⁴

其後，3月15日開全島聯吟大會慰勞擊鉢吟，凡中部各詩社社員有出力共執事者皆招待之，共有櫟社社長傅錫祺，社員林獻堂、張麗俊等9人及他社吟友20餘人與會，會中，子瑜報告大會收支結算，錫祺選詞宗出詩題，閉會後開宴、臚唱受賞品後方散。⁴⁵⁵

1935年2月10日的大會仍以臺中公會堂為主要會場，由臺中州各吟社擔任主人，又推櫟社為主中之主，櫟社中又是吳子瑜一人籌辦，吟友則來自臺北、新竹、臺南、高雄四州，共200餘人與會。在子瑜的精心布置下，會場公會堂使人感覺位置寬敞，設備周全，場中掛諸名人書畫，為欲附贈元、眼之賞品，兩邊則排列諸吟社吟友坐席，階下又立有一綠門。擊鉢交卷後，便備晚宴，宴中特別邀請江雲社女優在座上演唱，並聘醉月樓酌婦20餘人侑酒及跳舞，與會諸人不禁飄飄然，深感樂不思蜀。由於場面浩大，此次聯吟會收支相抵不足80餘圓。⁴⁵⁶不過吳子瑜仍於會後一個月循例召開慰勞會吟擊鉢吟，但張麗俊因有事未出席。⁴⁵⁷

由前所述，中部聯吟會和全島聯吟會的排場均極為盛大，中部聯吟會的日期且刻意選在臺中迎城隍之時，方便詩友觀看熱鬧。由於舉辦聯吟會花費甚鉅，乃出現輪值者逃避主辦之情形。全島聯吟會則與女優演唱、藝妓侑酒、鑼鼓演奏、賞園觀景等餘興相結合。對張麗俊而言，這些高級娛樂並非平日所能

⁴⁵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163-167。

⁴⁵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183；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87。

⁴⁵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6-8。

⁴⁵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18。

享受到，所以從 1920 年代中期起至 1930 年代中期，參加詩會是張麗俊等傳統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大調劑，其社交及娛樂功能超過原本最應該被強調的文學性質，此種情形正可與黃美娥認為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社逐漸「通俗化」而更加流行的說法相呼應。⁴⁵⁸

三、參與豐原詩社的活動

張麗俊亦活躍於豐原當地文人所組成的豐原吟社，對鄉里文風的振興貢獻心力。豐原吟社的活動始於 1923 年，該年分別在楊漢欽的四知醫院（二次）及張麗俊自宅（一次）舉行擊鉢吟會，成員包含楊漢欽（醫師）、張慶雲（醫師）、王淑潛（塾師）、⁴⁵⁹蔡子舟（櫟社成員蔡子昭之弟）、吳水木（豐原製紙製材會社取締役）、陳錫茲、張疇五（秀才、保正）、張顏汴、林德喜（醫師）、陳振通（豐原製紙製材會社社長）、賴玉瑞等人，多屬豐原地區具有名望的領導階層。⁴⁶⁰不過舉行前述三次集會後，即未再有任何相關記錄，似乎已無疾而終。直至 1933 年 2 月，林柳枝才重新招兵買馬，再組豐原吟社，並透過王淑潛居間聯繫，欲請張麗俊擔任發起人並出為指導。張氏雖恐此次的募集步入前次虎頭蛇尾的後塵，仍欣然同意，⁴⁶¹此後該社遂展開密集的活動。

1933 至 1936 年間，豐原吟社每年均舉辦春、秋擊鉢吟會，集會地點遍及豐國樓、上南坑水源地、慈濟宮、翁子羅安磨竹木漿機關場、張慶雲臨時診察

⁴⁵⁸ 參閱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157-162。

⁴⁵⁹ 王淑潛（1888-1951）：《鹿港鎮志·人物篇》做王叔潛。名默，字墨仙，號景陶，祖籍福建南安，祖父渡海來台，遂居鹿港。向兄學國學，其詩受洪棄生、施梅樵兩秀才器重，為「大治吟社」社員。1913 年到豐原設塾教書凡 40 年，著有《培槐堂詩集》。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 59。

⁴⁶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67、103~104、121。

⁴⁶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04。

所、呂大椿居士林等地，涵蓋豐原各名勝地點及社員自宅。其聚會形式與櫟社相同，均擊鉢吟詩，並備有晚宴，且有雛妓侑酒，以助餘興。⁴⁶²例如 1934 年 12 月 16 日於豐國樓舉行的詩會，以「斷髮妓」、「酒琴」為題作擊鉢吟。晚宴時，因有一雛妓范氏愛玉侑觴，品貌俱強人意，張麗俊乃將其名作鳳頂格詩唱，又詠七律一首贈之。⁴⁶³

在社員方面，王淑潛、張疇五、吳水木、張慶雲、楊漢欽、張顏辨為 10 年前即參加的舊成員，此外，陸續再加入呂大椿（彬彬書局店主、宗教家）、林維章、翁炳坤、何其福、張金蓮、張水柳、陳三乾、張竹林、張瑞麟、王翼漢、小輕舟、林慶在、蔡葦航、吳光良、陳賀、葉引昌（櫟社成員葉篤軒之父）、王君碩、郭經洲等人。歷次雅集的參與人數大多在 7 至 15 人之間。⁴⁶⁴

在社員中由於張麗俊身兼櫟社成員，文學造詣最受推崇，而且之前已答應擔任指導，因此歷次詩會均被推舉為詞宗，或擔任出題者。此外他唱詩的成績亦佳，1934 年 4 月 22 日的擊鉢吟會中即名列第一，⁴⁶⁵與在櫟社中的表現相較，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四、小結

1920、30 年代，正是臺灣日益現代化，人民對休閒娛樂更加注重，傳統詩社的詩會與賞園、登高、觀月等餘興節目相結合，而趨向通俗化的時期。對張麗俊等傳統文人而言，參與詩社是一種可以擴大己身人際網絡的雅致休閒，無

⁴⁶² 豐原吟社的活動，目前除《水竹居主人日記》外，均不見相關記載。但其擊鉢吟會的詩作「題居士林即景」，收於禪慧法師編，《臺灣佛教詩對拾遺》（臺北：三慧講堂，1990）頁 280-285。此詩題由王淑潛任左詞宗，張麗俊任右詞宗，共收有詩作 17 首。

⁴⁶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526。

⁴⁶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313、330、409、493、52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24、88、127、261、292。

⁴⁶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409。

怪乎，張氏參加詩會後常感滿意至極，認為當年蘭亭、金谷之會亦不過如此。因此，當時詩社休閒娛樂及社交的功能頗受強調，與早期純文學性的結社有所差異。

不過詩社在維繫漢文角色亦不應被忽略，事實上，詩社的通俗娛樂色彩與其維持漢文的功能不相違背。以張麗俊而言，他透過豐原吟社聯絡當地的文人，進行漢詩的創作；同時也在豐原店員會、工友會及革新社等組織的夜學中擔任漢文的教師，講解《孟子》、《春秋》、《史記》等典籍，⁴⁶⁶而對漢文抱有使命感。要之，詩社雖具強烈的通俗娛樂色彩，但其延續漢文的功能仍不應被抹煞。

⁴⁶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56-58、62、64、72、74、80、88、90-93、96、104-105、108、124-126、132、304；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14、416-418、420、424、428、430、434、441、444、452、454、460、462、464、46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3-14、16、18、22、28、32、34、39、41、45、47、50、54、60、63、65、68、71、73、77、81、92、95、97、99、104、113、115、125、127、130、135、140、143、179-180、184、186、192、198、203-204、206、208、215、222、224、231、238-239、242、245、248、250、262、264、267、274、276、278、283、286、288、290。日記中相關記載甚多，此處僅是略舉。

第六章 傳統文人與社會教化—以「霧峰一新會」為例

第一節 「霧峰一新會」之成立及其活動

一、成立背景

霧峰一新會係林獻堂長子林攀龍於 1932 年創立，以林家成員與霧峰庄民為主要會員。林氏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又曾至英國牛津、法國索爾本巴黎大學及德國慕尼黑大學留學，故深諳近代歐洲思想趨勢，而醉心於鄉土啓蒙運動，一新會即其個人理念的實踐，¹1938 年該會停止運作之前，曾舉辦一新義塾、日曜講座、讀書會、夏季講習會、老人慰安會、兒童親愛會、婦女懇親會、運動會等各種活動，致力於提升霧峰居民的文化涵養，並從事社區親睦的工作。放眼日治時期的臺灣，沒有任何地方能如霧峰，擁有如此多采多姿的社區活動。

然而，一新會能在當時的時空出現，亦有其背景。首先，從歷史的進展觀察，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對教化民眾以提升臺灣文化的工作向來具有高度的興趣，如 1914 年樹林區區長黃純青成立「樹林同風會」，即主張革新風教、矯正陋俗、破除迷信；²1920 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於東京組織「新民會」時，則以研究臺灣所有應予革新之事項，並謀求文化之發達為目的；³翌年，蔣渭水於

¹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頁 463；秦賢次，〈林攀龍（南陽）先生年表〉，收於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臺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 305～313。

² 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思與言》29：4（1991 年 12 月），頁 7。

³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25。

臺灣文化協會創立大會中的演說，更明言臺灣人現時患了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須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方能痊癒。因此文化協會分裂前曾舉辦短期講習會、通俗學術講座、夏季學校、文化講演等活動，以啓蒙民智。⁴此種啓蒙的作法，自然影響到日後的霧峰一新會，只是誠如蔡培火指出的，文化協會是以臺灣全島為活動範圍，而一新會是從鼓舞地方做起。⁵1928年板橋林家的林履信、林柏壽、林熊光等人創立「如水社」，揭櫫「提升臺灣社會好學風氣」，設有專屬圖書館，推行體育聯誼競賽，其活動包括文學、宗教、旅行談、臺灣考古、哲學等範疇的演講，也有關於臺灣研究、社會學、法律學、外交、經濟金融及教育問題的夏季大學講習，並舉辦漢學研究會，可視為溫和的社會文化社團。而該社基於社會理想所舉辦的社會事業，包括經營平民醫院、義診、設立法律及保健相談所、營運利潤回饋社會等，具有相當理想性。⁶

其次，從地理環境觀之，霧峰地區的文化活動向來即頗為興盛：（一）霧峰林家成員林癡仙為保持漢學，於1902年組織櫟社，林家的林幼春、林獻堂、林仲衡等人亦為該社成員。⁷（二）文化協會自1924年起一連3年，夏季學校均於霧峰林家菜園舉行，由林家出資，禮聘全臺名士講學。（三）林獻堂為提高霧峰婦女的知識水準，於1925、1926年各召開一次婦女研習會議，一為「霧峰婦人國語漢文研究會」，一為「婦女研究會」，以傳授漢文與日語為目的。⁸（四）1927年霧峰成立「霧峰革新青年會」，宗旨為喚起青年自覺，打破舊有迷信、生活陋習，培植科學理論，提高文化水準，適應時代進步。⁹一新會成立

⁴ 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70、97-148。

⁵ 張炎憲總編輯，《蔡培火全集—家世生平與交友》，頁215。

⁶ 鄭麗榕，〈近代北臺灣的社會文化社團——以如水社為例(1928-1934)〉，未刊稿。

⁷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頁58-62、125-126。關於林癡仙、林仲衡及林獻堂三人詩作的研究，可參閱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

⁸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頁172-175。

⁹ 霧峰鄉鄉民代表會，《臺中縣霧峰鄉鄉民代表會誌》（霧峰：該會，1977），頁91。

後，「霧峰革新青年會」並未被其收編，¹⁰可見除林家外，霧峰地區尚有其他人士致力於文化。此外，在社會工作方面，霧峰林家也長期提供老人米給鄰里老人，並舉辦義渡。¹¹所以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可說是集前述文化和社會活動的大成，且以農村啓蒙、保存漢文爲主要宗旨，因此實有加以深入瞭解的必要。

本節以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爲主要史料，還原一新會的活動概況。因林氏爲一新會的首腦人物，對該會所辦的各種活動均積極參與，其日記中保存許多有關該會的珍貴記述。此外，一新會自行刊印的內部資料，如〈會員名簿〉、〈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霧峰一新會會則〉、〈霧峰一新會事業實施要綱〉等均尙未散佚，亦爲重要的參考資料。

目前學界關於「霧峰一新會」的研究成果，已有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¹²和周婉窈〈「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¹³二文，許雪姬之文屬於概略性介紹，周婉窈之文對該會活動的探討集中於第一年，並非全面。因此，關於該會演講的講題及教學內容等，均可再進一步分析。

二、成立與組織

¹⁰ 一新會成立後，原本「霧峰革新青年會」的委員開會決議要解散，不久又考慮與一新會合併。後林獻堂雖於「霧峰革新青年會」的總會上提議兩會合併，但未獲通過，「霧峰革新青年會」仍維持獨立運作。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300、303、306。

¹¹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2月10日，未刊稿。

¹² 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9-16。

¹³ 周婉窈，〈「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臺灣風物》56：4（2006年12月），頁39-89。

1932年2月2日，林攀龍結束長期的留學生涯自歐洲返臺，¹⁴欲在故鄉落實其提升農村文化的理想，此想法頗得林獻堂及其餘族親的支持，因此該年3月19日霧峰一新會正式成立，¹⁵其目的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及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之建設。」¹⁶大意是要從霧峰庄做起，一新眾人的生活，再將此清新之氣廣布於外，以建設新臺灣。

在組織方面，一新會設有調查、衛生、社會、學藝、體育、產業、庶務、財務等8部，各部的職掌如下：

- (一) 調查部：工作有統計、計畫與聯絡三項，負責資料的徵集與事業方法的設計、指導。
- (二) 衛生部：負責督導公眾衛生（如水溝、飲水、墓地及公共浴場之清潔）、家庭衛生（如住宅內衛生之設備及家屋建築的改良）及霧峰庄之美觀。
- (三) 社會部：掌管事務包含社會教育與社會救護兩部分。社會教育方面的工作要項是打破迷信、改良風俗、普及文字及教育助成；社會救護方面的工作則主要在救貧、施療、失業者救護、兒童保護與社會調停。
- (四) 學藝部：此部是一新會的重點，一新會舉辦的重要文化活動如一新義塾、演講會、讀書會等，均由此部負責。此外尚籌畫音樂會、棋會等活動，以調劑庄民身心。
- (五) 體育部：主要工作為主辦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及其他運動競技，並規劃遠足與旅行事宜。
- (六) 產業部：注意農業生產技術的革新、農家經濟的改善與獎勵創設自耕農，以調查、介紹、宣傳、指導、視察、品評等方法加以執行。
- (七) 庶務部：處理人事、掌印、文書收發等雜務。

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55。

¹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23-124。

¹⁶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會則〉，未刊稿；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88。

(八) 財務部：職司會費徵收、金錢出納、物品購買與預算決算等事宜。¹⁷

在領導幹部方面，一新會設有委員長 1 名，由林攀龍擔任，並有顧問及相談役（諮商員）以備諮詢，林獻堂及其夫人楊水心均為該會顧問。主要幹部稱為委員，共有 30 人，分別歸屬於前述 8 部，並自委員中選出各部主任，以統領各部。¹⁸委員每月集合 1 次，召開委員會，以負責工作的計畫與執行。¹⁹從委員名單看來，其成員包括下列三種人士：（一）霧峰林家成員，如林獻堂次子，同時亦是霧峰庄長的林猶龍為體育部主任；林金生與林正勝（林少波次子）為學藝部委員。（二）霧峰本地的領導階層，如曾任霧峰庄協議會員的林阿華、李登輝、王烈嗣、林以義、林士英及林分均為該會委員。（三）至霧峰開業或就職的外地人，如林春懷醫師²⁰、林水來醫師及李崑玉傳道師²¹等。²²其陣容可說是霧峰地區菁英的集合。委員、顧問與相談役均每年改選，但可連任，故其成員略有增刪，如蔡培火即於一新會第 2 年的第 1 回委員會中獲推薦為顧問。²³

表 6-1 霧峰一新會成立之初各部主任與委員一覽表

¹⁷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事業實施要綱〉，未刊稿；〈霧峰一新會〉，《臺灣教會公報》，第 570 卷，昭和 7 年 9 月 1 日，頁 16。

¹⁸ 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七年三月末日）會員名簿〉，頁 1-2。

¹⁹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會則〉，未刊稿。

²⁰ 林春懷醫師：彰化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校畢業，在霧峰開業懷仁醫院。能詩，是櫟社的一員，1981 年其子為其出版《春槐詩集》。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頁 456；吳醉蓮編，《春槐詩集》（霧峰：林垂青等印贈，1981），頁 355-356。

²¹ 李崑玉傳道師：臺南岡仔林人，臺南神學院畢業，曾服務於霧峰長老教會。李嘉崧，《一〇〇年來》（自刊本，1978），頁 10-12。

²² 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七年三月末日）會員名簿〉，昭和 7 年版，頁 1-2；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23。

²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48；張炎憲總編輯，《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頁 252。

部別	主任	委員
調查部	莊遂性	林猶龍、江連鼎、徐金瑞
衛生部	林春懷	李登輝、王烈嗣、莊萬生、 ²⁴ 王水
社會部	林攀龍	林水來、林以義、李崑玉、賴其昌、林戊己、 ²⁵ 陳盞、 ²⁶ 吳素貞、 ²⁷ 溫成龍、 ²⁸ 莊萬生
學藝部	江連鼎	林以義、莊遂性、林戊己、楊桂鶯、 ²⁹ 楊素英、 ³⁰ 林金生、林正勝
體育部	林猶龍	林誕生、 ³¹ 林金昆 ³²
產業部	林阿華	林士英、廖德聰、林春山、黃辛丑、林分
庶務部	廖德聰	徐金瑞
財務部	溫成龍	

資料來源：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七年三月末日）會員名簿〉。

在會員方面，一新會創始之初有會員 300 名，³³至 1934 年增至 503 人。就性別觀之，男性 342 人，女性 161 人；就地域觀之，以霧峰庄 367 人最多，此

²⁴ 莊萬生：曾任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

²⁵ 林戊己：霧峰人，臺中商學校畢，活躍於香蕉界，當時任霧峰庄助役。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頁 464。

²⁶ 陳盞：林阿華妻。

²⁷ 吳素貞：名帖，字素貞，彰化名儒吳德功姪女，林資彬的續絃妻。少女時曾組織「彰化婦女共勵會」，戰後任第一屆國大代表、臺中婦女會理事長，並創辦素貞興慈會。林吳帖，《我的記述》，1970。

²⁸ 溫成龍：曾任林獻堂翻譯。

²⁹ 楊桂鶯：林春懷醫師之妻。

³⁰ 楊素英：林階堂子林誕生之妻。

³¹ 林誕生：林階堂長子，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法學部，因腦中風於 1935 年過世。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頁 451。

³² 林金昆：林少梅次子。

外，鄰近霧峰的其他村莊，如北溝、柳樹浦、吳厝、萬斗六、坑口等地也有民眾參加，其中，以吳厝（48人）及北溝（33人）人數較多。³⁴

表 6-2 霧峰一新會會員統計表

地名別	男	女	總計
霧峰	228	139	367
北溝	31	2	33
柳樹浦	11	1	12
吳厝	36	12	48
萬斗六	17	1	18
坑口	8	0	8
臺中市	4	4	8
其他	7	2	9
總計	342	161	503

資料來源：霧峰一新會編，〈會員名簿〉，昭和九年版。

一新會除有完備的組織架構外，還有自己的會館、會歌與會旗。會館原是萊園中林梅堂的家屋，向其購買改建而成，並附有圖書室。³⁵圖書室中的藏書部分為林家的舊藏，部分為林獻堂至書局添購而來。³⁶至於會歌，起初曾公開募集，應徵者包括劉集賢等人，³⁷但林獻堂以為應徵的 28 首之中無一佳者，又請

³³ 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七年三月末日）會員名簿〉，頁 3。

³⁴ 霧峰一新會編，〈會員名簿〉，昭和 9 年版。

³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00、109。

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31、282。現部分圖書藏於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圖書館。

³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49。

林幼春另作歌詞。³⁸幾經波折後，最後採用蔡培火作詞譜曲的作品，於 1932 年 11 月 6 日在會館由蔡培火向會員親自教唱，³⁹其歌詞如下：

- (一) 霧峰地土好，灌沃亦周到，豪華非所重，重在氣節高。
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大樹根底在，風雨掃不倒。
- (二) 庄內土地井，冥日在湧泉，來源既然深，清新不變換。
願咱眾兄弟，仔細檢點看，生活若合理，親像日上山。
- (三) 臺灣美麗島，天生好圖畫，到處大城壁，因何總傾頹。
公事請關心，祖業免荒廢，竭誠倡自新，霧峰一新會。⁴⁰

會旗則為藍地三角形，中間有一顆紅心，⁴¹蓋因「心」字的讀音與「新」相近也，也有眾人合作同心之意。

綜上所述，一新會乃一由霧峰林家主導，結合地方有力人士，以霧峰庄民為主要成員的地方團體，民間的區域性團體能有此種規模確屬難得。

三、活動內容

一新會雖由林攀龍擔任委員長，但實際上由僅掛名顧問的林獻堂主導。林獻堂負責安排日曜講座的演講者，主持讀書會，在其堅持下，成立一新義塾，是所有活動的靈魂人物。因此，一新會可說是林獻堂實踐其社會教化理想的場

³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68。

³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55；張炎憲總編輯，《蔡培火全集—家世生平與交友》，頁 237-238

⁴⁰ 霧峰一新會，〈霧峰一新會會歌〉，手抄稿，未刊；賴淳彥，《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9），頁 59。

⁴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59。

域，其主要活動可分為文化事業、社會工作及休閒娛樂三部分，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文化事業

一新會既以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為目的，對文化工作自然用力最深，除定期舉行演講會、組織讀書會外，並開辦一新義塾及夏季講習會，對保存漢文及引介新知可說不遺餘力。其中持續時間最長及影響最深的一新義塾和演講活動，留待下兩節介紹，其餘詳述如下。

1、成立讀書會

讀書會成立於 1934 年 5 月 7 日，⁴²每週一定期聚會（後改為週四），以林獻堂為主導，至少進行達 83 回。⁴³參加者區分為（一）正會員，如林獻堂、林攀龍、林猶龍、林金生、呂磐石、溫成龍等人，（二）特別會員，如林戊己、林金洲、林元吉、洪浣翠、李崑玉等人，（三）旁聽者，如奧隆特務⁴⁴等三種。

讀書會進行的方式是每週由正會員負責發表其所讀之書，⁴⁵介紹一些學派及較高深的學問，以資研究討論。如林獻堂曾介紹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⁴⁶的樂利學派、倫理學派、達爾文的進化學派與《史記》各章節。⁴⁷有時則提出一個主題供會員共同討論，如「迷信打破實施具體案」、「孝與節操孰

⁴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189。

⁴³ 資料所見最後一次讀書會在 1935 年 12 月 19 日舉行，當時是第 83 回。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九年》，頁 445。

⁴⁴ 奧隆特務：臺中州大屯郡巡查。

⁴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186。

⁴⁶ 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國倫理學家、法政學家，畢業於牛津大學，1781 年任倫敦大學教授，創刊《西敏寺評論》。他力斥禁慾說及感情說，提倡功利主義，以為道德價值在於多數人之幸福，欲謀公眾幸福之增進當自法律始。林獻堂稱其功利主義為樂利主義。

⁴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06、215、235、335。

重」等。⁴⁸後來因林攀龍之提議，改為每次固定由正委員兩人演講，⁴⁹講題多為介紹國外政經的概況與學說，如溫成龍講「日本政黨史」、林培英講「羅素快樂論」、林猶龍講「美國經濟之史的發展」、呂磐石講「社會主義之分類」，⁵⁰使會員不出國門而能知天下事。

2、開辦夏季講習會

1927 年文化協會分裂前曾於霧峰萊園一連舉辦三屆夏季學校，邀集全島名士開課講學，成績頗為令人滿意，因此一新會沿襲此種作法，於 1933 年及 1934 年 8 月，連續兩年舉辦兩回夏季講習會。每回講習的時間約為兩週，以傳授西方現代知識為主，第一回有學生 78 人報名，⁵¹第二回學生數則不見記載，不過應與第一回人數相差不遠。至於講師及課程名稱則如下列兩表。

表 6-3 1933 年霧峰一新會第一回夏季講習會課程表

講師	課程名稱
林獻堂	孟子哲學
蔡培火	電氣常識
林攀龍	社會生活之考察
林猶龍	經濟原論
高天成	自然科學概論

資料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11-325。

⁴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44、251。

⁴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468。

⁵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10。

⁵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11。

表 6-4 1934 年霧峰一新會第二回夏季講習會課程表

講師	課程名稱
林獻堂	倫理學概論
蔡培火	天文常識
呂磐石	近世英國經濟思想史
林猶龍	近世英國經濟思想史
莊垂勝	哲學概論
林少聰	宇宙根本組織

資料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06。

在這些課程中，林少聰的「宇宙根本組織」，因內容較為深奧，需要有自然科學的基礎方能聽懂，超出霧峰庄民的程度，因此其所講的氧氣、氫氣、電子、原子等參加講習者皆未能瞭解；⁵²至於莊垂勝的課，因他完全照本宣科，照著講稿念，使參加講習者感到索然無味，精神因此不能集注，⁵³凡此算是小小的遺憾，然而一新會舉辦講習會的用心仍應予以肯定。

日本當局對夏季講習會的舉辦一直採取審慎防範的態度，講習會的課程名稱與教師名冊、教師經歷均需先行報備，獲核准後才能舉行，第一年的講習會是刪除葉榮鐘講授的「新聞學」後，才獲准開辦，⁵⁴蓋日方不願臺民接觸到有關思想及資訊傳播的知識，而且講習會代替國家教化民眾，自然為殖民當局所不喜。

⁵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13。

⁵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10。

⁵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288、309。

講習會開辦後，日人警部補與警察也蒞臨現場，美其名爲旁聽，事實上是監聽。⁵⁵在此種壓力下，講習還能勉力進行，甚至還舉辦參加講習者的懇親會、⁵⁶帶領講習者遠足，遠足之餘並在霧峰山中進行尋寶遊戲，⁵⁷誠屬難能可貴。

3、舉行辯論會

辯論會至少舉行 3 次，題目分別爲「產兒制限之可否」、「迷信打破之方法」⁵⁸與「先救妻乎？先救母乎？」⁵⁹其規則爲正辯、反辯各 6 名，每人以 10 分鐘爲限。第一回辯論會曾吸引近 200 名聽眾，頗爲成功，⁶⁰但這並非常態性的活動。

4、召開宗教座談會

林攀龍爲虔誠的基督教徒，1933 至 1941 年的 8 年間，曾擔任霧峰長老教會的長老。⁶¹霧峰傳道李崑玉和長老賴其昌亦是一新會的委員。基於此種淵源，乃有宗教座談會的召開。該會訂於每週三集會，⁶²由李崑玉講解基督教，但因對該主題有興趣的會員有限，參加者常只有 3、4 人，最後無疾而終。⁶³

(二) 社會與休閒娛樂活動

1、社會活動

一新會從事的社會活動包含社會救護、破除迷信、舉行各種老人、兒童、青年的親睦會等，茲分別論述如下。

⁵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11。

⁵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13。

⁵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21。

⁵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62、268。

⁵⁹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 26。

⁶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62。

⁶¹ 〈歷任長老芳名〉，收於《霧峰基督長老教會設立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14。

⁶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98。

⁶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211、220。

在社會救護方面，一新會設有社會相談所，負責提供援助庄內生活困苦或遇急事而無法解決的民眾。⁶⁴此外，對霧峰以外地區的災禍，也寄予關心。1935年4月21日臺灣發生「墩仔腳大地震」，此為日本治臺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地震，臺中州的豐原、東勢、大甲、大屯、彰化等郡受創嚴重，共有1,907人死亡；房屋全倒、半倒與破損者，共計21,354間。⁶⁵霧峰當地的災情雖然並不慘重（輕傷2人、房屋全倒與半倒5間），但為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一新會在林獻堂及楊水心夫婦領軍下，組織罹災慰問隊，攜帶募捐而來的白米、蕃薯、舊衣服等救濟品，至神岡、沙鹿、梧棲、清水等災區慰問，⁶⁶一時之間傳為美談。

在破除迷信方面，1934年春間霧峰鳳形山的共同墓地舉行清塚，枯骨被埋葬於一處，好事者乃為之建一小廟，名為有應公廟，自此每日燒香之人絡繹不絕，甚至於廟前演戲數十日。一新會認為此種迷信風俗不能默許之，便召開委員會商議，⁶⁷決定由庄長林猶龍出面禁止於墓地內作戲，並透過林獻堂召集保正及有應公廟總理加以說喻，以遏止此種風氣。⁶⁸

至於社區居民的親睦活動，一新會是依照年齡層與性別的不同，各自分別舉辦。首先是老人慰安會，1932年5月14日舉行一次，地點在萊園，共有70歲以上的老人103人參加，會中有演說、唱歌、跳舞、奏樂、變魔術等餘興節目，供老人觀賞，並分贈紀念品，可謂極一時之盛。⁶⁹其次是兒童親愛會，1932

⁶⁴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事業實施要綱〉，未刊稿，頁4；〈霧峰一新會〉，《臺灣教會公報》，第576卷，昭和8年3月1日，頁19。

⁶⁵ 許雪姬，〈一九三五年的臺中大地震〉，收於王正雄、施金桂主編，《墩仔腳大地震老照片特集》（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6-7。

⁶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143-148。

⁶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55。

⁶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64、383。

⁶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207；〈霧峰一新會〉，《臺灣教會公報》，第576卷，昭和8年3月1日，頁19。

年曾舉辦 3 次，霧峰庄內出席之兒童約有 170 餘名，主要是帶領兒童玩遊戲與說故事，並分贈玩具和餅乾，使兒童滿載而歸。⁷⁰

在青年部分，一新會曾召開「青年座談會」、「青年懇談會」、「青年雄辯會」等多次會議。座談會為雜談式的活動，也附帶作些決議，如決議青年要早上 5 時即起，於會館集合，然後往萊園運動，以鍛鍊青年的身心。⁷¹懇談會是擬定一個主題，如「英雄崇拜」，再由與會青年各抒己見。⁷²至於雄辯會則與辯論會不同，反而與演講頗為類似，乃由青年根據個人的題目發表演說。⁷³由此可見一新會對於青年的體能與智能均相當重視。

2、休閒娛樂活動

為了豐富霧峰庄民的生活，提倡正當的休閒娛樂，一新會曾舉辦運動會、週年紀念會、參觀與遠足、棋會等活動，可謂動態與靜態兼備。而在娛樂之餘，也凝鑄了社區的共同意識。

在以往娛樂事業尚未發達之時，運動會一如現在的偶像演唱會，往往是眾人爭相前往同樂的盛會。1932 年 10 月 23 日，一新會假霧峰公學校運動場，舉辦第一回運動會。競技項目包含 200 米競走、一人一腳、二人三腳、腳踏車徐行、穿越障礙、提燈競賽、化妝遊行、團體接力等，名目眾多，⁷⁴共吸引一千五、六百人前往觀賞。⁷⁵翌年 11 月 19 日開辦的第二回運動會，林獻堂親自下場參加 700 公尺徒步競爭，加上義塾學生也參與其間，因此其盛況不亞於第一回。⁷⁶

⁷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60、395、483；〈霧峰一新會〉，《臺灣教會公報》，第 582 卷，昭和 8 年 9 月 1 日，頁 18。

⁷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83。

⁷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248。

⁷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269；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68。

⁷⁴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第一回運動會節目單〉，未刊稿。

⁷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33。

⁷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431。

其次，每年每逢 3 月 19 日，一新會便舉行一連 3 天的週年紀念活動。第一年的紀念活動包括音樂演劇、書畫手藝展覽、演講、電影欣賞、燃放煙火等，⁷⁷其中以音樂演劇、電影欣賞及燃放煙火最受歡迎，吸引千餘人前來觀賞，道路爲之擁塞，⁷⁸是地方上的一大盛事。第二年也不遑多讓，有手工藝展覽、服裝設計展覽、義塾成績展覽、園遊會、花燈比賽、化妝遊行等。⁷⁹但自第三週年的紀念會起，因提燈遊行被日方禁止，慶祝的規模漸小。⁸⁰至五週年時，因時局之關係，講演、書畫展覽、園遊會等一律停止，僅剩下會務報告和會歌合唱，⁸¹頗爲可惜。

除了週年紀念會外，一新會每逢中秋節會舉行「觀月會」，在賞月之餘有會員奏樂、唱歌、說笑話以助興。⁸²歲末年終時則辦「忘年會」，同樣有歌唱、舞蹈、短劇、電影欣賞等娛樂項目，也是一新會的盛事。⁸³至於不定期舉辦的「納涼會」，其性質也類似，所謂「納涼會」是在夏夜的晚上，於林宅的庭院，安排歌唱及舞蹈的表演，邀請庄民來觀賞。⁸⁴1934 年舉行的納涼音樂會因邀請日高兒童劇團演出，並由義塾男女學生組成口琴團奏樂，吸引四、五百人觀賞，最具盛況。⁸⁵

⁷⁷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一週年慶祝會順序單〉，未刊稿。

⁷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11-113。

⁷⁹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 27-28。

⁸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98。

⁸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105。

⁸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67；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20。

⁸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515；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494；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477；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454。

⁸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20。

⁸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14。

再者，一新會曾主辦參觀與遠足。參觀地點包括由林獻堂任社長的臺灣製麻會社、羅安製紙會社、營林所、刑務所（監獄）、專賣局製酒工廠等；⁸⁶遠足地點則為黃竹坑。⁸⁷這些活動有些類似現在中小學的戶外教學，庄民放鬆身心的同時，識見也為之擴大。

再次，鑑於當時青年無消遣之機關，往往沈湎於賭博，林獻堂頗思加以挽救，乃有棋藝的提倡。⁸⁸一新會組織圍棋會，於每週日定期聚會，⁸⁹並主辦象棋競技會，⁹⁰倡導正當休閒。

會員出國或往他處就職前通常會召開「送別會」，⁹¹回國後則辦「洗塵會」，⁹²結婚則有「慶祝會」，⁹³以聯繫會員間的感情。

綜上所述，一新會透過前述的各種社會與娛樂活動，以凝聚庄民和會員的向心力，並形塑社區共同意識。其中，電影欣賞及施放煙火對農村大眾而言特別新鮮有趣，因此現場往往宛如嘉年華會。整體觀之，其活動的豐富和多樣，恐怕連今日的社區團體也難以企及。

⁸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62；〈霧峰一新會〉，《臺灣教會公報》，第 582 卷，昭和 8 年 9 月 1 日，頁 18-19。

⁸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87。黃竹坑以出創頭筍聞名，林瑞騰在當地有產業，設私塾延陳懷澄任教。

⁸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310。

⁸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78。

⁹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96。

⁹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89；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57、267；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47。

⁹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94、469；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178。

⁹³ 1934 年 7 月 18 日，一新會委員林碧霞和日曜講座講師林時喜雙雙傳出喜訊，故開慶祝會。林攀龍因與曾珠如結婚，1935 年 3 月 31 日也舉行慶祝會。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81；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13。

四、小結

一新會乃霧峰林家頂厝林獻堂父子主導，加上當地菁英通力合作而組成的社區團體，其活動多采多姿，幾乎天天都有活動，遍及文化、社會及休閒娛樂各層面，包括日曜講座、一新義塾、讀書會、辯論會、老人慰安會、青年座談會等。在一年之中，週年紀念會、觀月會、運動會、忘年會等亦按照時間依序舉行。在一新會存在的 6 年期間，霧峰地區人民的日常生活均被其左右。其對霧峰的貢獻正如創立週年時，莊嵩的祝詩：「頽風一掃了無餘，促進文明戮力初。行見萬般都美化，清新氣已滿鄉閭。」⁹⁴所以若說它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具地方色彩的社會教化團體，實不為過。且從其讀書會的討論內容和夏季講習會開設的課程來看，一新會也引進不少西方近代思想及科學新知；而其舉辦的活動例如運動會、歌舞表演等，也均具有現代性，顯示林獻堂對新式文明的強大包容和適應。也因為一新會包含新鮮、進步的元素，才能廣受霧峰庄民的支持。

綜觀一新會的活動，與臺北的「如水社」頗有相似之處，兩者均舉辦能啓迪民智的演講、開辦夏季學校、從事漢文教學、重視體育活動，不過「如水社」曾成立附屬醫院，以嘉惠平民，⁹⁵此為一新會所無。然而，一新會是以整個霧峰庄為活動範圍，從事社區總體營造工作，從地方做起，不像「如水社」具有都會色彩。

值得注意者為，該會委員長雖是林攀龍，但許多活動的主其事者和背後的靈魂人物則是林獻堂，故從一新會的會務可清楚看出林獻堂社會教化的理念。

⁹⁴ 莊嵩，〈一新會創立週年書此致祝〉，收於莊嵩，《太岳詩草》，頁 169。

⁹⁵ 鄭麗榕，〈近代北臺灣的社會文化社團——以如水社為例(1928-1934)〉，未刊稿。

第二節 婦女教育之重視

霧峰一新會雖非婦女團體，甚至並未設立婦女部，也沒有明確的婦女政策，卻致力於婦女地位的提升與知識的啓蒙，會中女性幹部與會員亦頗為活躍。有鑑於此，本節擬探討女性參與一新會的情形及該會的婦女教育活動。

一、女性幹部與會員

在一新會的委員中，女性為數不少，例如王水、陳盞、吳素貞、楊桂鶯、楊素英等 5 人為第一屆委員，佔全體委員 16.67%。⁹⁶第二屆時，陳盞、吳素貞、楊桂鶯、楊素英留任，並新選陳玉盒、洪瑞蘭、張月珠、楊桂桃、林碧霞等人，女性的比例大幅提升為 29.03%。此後女性委員人數仍有增加，並各自負責特定的工作，詳見表 6-5、6-6。整體而言，在委員會中女性雖未佔多數，但已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

表 6-5 霧峰一新會歷年男女委員人數統計表

年度	男性委員人數	女性委員人數	總計	女性所佔比例
1932	25	5	30	16.67%
1933	22	9	31	29.03%
1934	24	9	33	27.27%
1935	27	10	37	27.03%

⁹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23。

第六章 傳統文人與社會教化—以「霧峰一新會」為例 323

資料來源：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七年三月末日）會員名簿〉，頁 1-2；霧峰一新會編，〈（昭和八年五月現在）會員名簿〉（霧峰：該會，1933），頁 1-2；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昭和十年度各部分擔委員〉（霧峰：該會，1935）；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19。1936 及 1937 兩年的資料散佚。

表 6-6 霧峰一新會歷任女性委員一覽表

姓名	職稱	身份	學歷
王水	第一屆衛生部委員	產婆	*
陳盞	第一屆社會部委員； 第二屆學藝部委員； 第三、四屆財務部委員	霧峰庄協議會員林阿華之妻	*
吳素貞	第一、二、三、四屆社會部委員	吳汝翰之女、吳德功姪女、林資彬之妻	就讀公學校 3 年、彰化高女手工藝科講習生、一新義塾肄業
楊桂鶯	第一、二、三、四屆學藝部委員	林春懷醫師之妻	一新義塾肄業
楊素英	第一、二屆學藝部委員	林階堂長子林陸龍之妻	*
陳玉盒	第二屆衛生部委員	*	*
楊桂桃	第二、三、四屆衛生部委員	產婆	一新義塾
張月珠	第二屆社會部委員； 第三、四屆體育部委員	臺中市慎齋堂住持	一新義塾肄業

	員		
林碧霞	第二屆社會部委員	林烈堂次女	日本小學校、一新義塾
洪瑞蘭	第二屆社會部及學藝部委員；第三、四屆衛生部委員	霧峰公學校教員楊東波之妻、產婆	*
曾珠如	第三、四屆社會部委員	林攀龍之妻	彰化高女
林碧霜	第三、四屆社會部委員	林水來醫師之女	霧峰公學校、一新義塾
何秀眉	第三、四屆學藝部委員	何添丁之女，擅裁縫，後成為臺中太陽堂老闆娘	*
林瑞珠	第四屆學藝部委員	*	一新義塾
陳木霞	第六屆委員	*	霧峰公學校、一新義塾
林雙意 ⁹⁷	第六屆委員	林季喬之女	就讀鼓浪嶼之小學3、4年、一新義塾

資料來源：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七年三月末日）會員名簿〉，頁 1-2；霧峰一新會編，〈（昭和八年五月現在）會員名簿〉，頁 1-2；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昭和十年度各部分擔委員〉；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19。

第五屆（1936）及第六屆（1937）委員的資料散佚，但由林獻堂日記中關於一新會委員相關活動的記載中得知，至第六屆時陳益、吳素貞、楊桂鶯、楊桂桃、張明珠、洪瑞蘭、林碧

⁹⁷ 林雙意：林季喬女兒，母為李真瑜。嫁蔡漢基醫師，婚後與夫同赴上海，戰後回臺。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雙意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 12-15。

霜、何秀眉、林瑞珠等人仍連任為委員，此外並加入陳木霞及林雙意為委員，但各委員的詳細職務均不詳。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37、63。

在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中可找到吳素貞、楊桂鶯、張月珠就讀一新義塾的紀錄，但在霧峰一新義塾塾友會編，《霧峰一新塾友會會則》（霧峰：該會，1937）的畢業生名錄中，未見此三人姓名，故為肄業。

*：相關資料欠缺，難以查考。

由表 6-6 可知，部份女性委員是霧峰林家的家族成員，例如吳素貞是林資彬之妻，楊素英為林階堂長子林陸龍之妻，曾珠如為林攀龍之妻，林碧霞是林烈堂次女，林雙意為林季商之女；另一部分則是當地領導階層的家眷，例如陳盞是霧峰庄協議會會員林阿華之妻，楊桂鶯是林春懷醫師之妻，洪瑞蘭是霧峰公學校教員楊東波之妻，林碧霜為林水來醫師的掌上明珠。此外，楊桂桃是產婆，張月珠是臺中市慎齋堂住持。

她們之中不乏接受過新式教育者，曾珠如畢業於彰化高女，林碧霜及陳木霞畢業於霧峰公學校，⁹⁸林碧霞畢業於日本小學校，自幼即在於家庭教師的教導下，擅長英文、廣東話與國語。⁹⁹楊桂桃及林瑞珠則畢業於「霧峰一新會」創辦的「一新義塾」，¹⁰⁰學成後繼續回饋該會。

遴選委員時，有人推薦洪浣翠擔任委員，浣翠雖富文采，然因她是林瑞騰的妾，乃引發林資彬、林陸龍等林家保守族人的反對，反對的理由為妾沒有當

⁹⁸ 林碧霜及陳木霞分別於 1928 及 1930 年畢業於霧峰公學校。谷瑞儉編，《臺中縣霧峰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霧峰：臺中縣霧峰國民小學，1997），頁 87、88。林碧霜後與曾珠如的弟弟曾威甫結婚。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陳耿昕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冊篇》，頁 141-142。

⁹⁹ 林碧霞後嫁張煥珪的堂弟張天錫，育有一子。天錫辭世後再嫁羅萬。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冊篇》，頁 66-67

¹⁰⁰ 霧峰一新塾友會編，〈霧峰一新塾友會會則〉。

委員的資格。林獻堂對此頗不以為然，極力替洪浣翠辯解，指出蓄妾制度雖然不好，不過這是傳統文化的缺失，並非是妾本身的罪過，浣翠雖然為妾，其人格亦當被尊重。其後洪氏雖然知難而退，由楊素英遞補其位，¹⁰¹不過她在一新會中依然頗為活躍，曾數次擔任日曜講座演講員。由此可見林獻堂的思想中已存在男女平等及尊重女性人格的想法，因此，在其主導的一新會中即使為妾者亦可扮演一定的角色。

在會員方面，一新會成立之初有會員 300 人，其中，女性 67 人，佔 22.33%，¹⁰²當時輿論曾謂：「婦女們來參加男子的團體，而且像這回的盛況，可說是過去所罕見的現象。」¹⁰³1934 年會員增為 503 人，其中，女性 161 人，佔 32%，以出身霧峰者最多，達 139 人，約佔女性總數 86.34%，吳厝居次，有 12 人，其餘則來自鄰近霧峰的北溝、柳樹浦、萬斗六等村莊，人數均少於 10 人。¹⁰⁴

二、婦女教育活動

(一) 召開婦人茶話會、婦女懇親會

1932 年 4 月 6 日，一新會召開第一回「婦人茶話會」，楊水心、吳素貞、洪浣翠、楊桂鶯、王水、陳盞等一新會女會員計 20 人列席，並有林獻堂、林攀龍、李崑玉等五名男子參與談話。席間與會男性鼓舞女子應急起直追，不要落後於男子；並鼓勵她們學習白話字，以吸收新知。此議得到全體與會女性的一致贊成，乃即刻安排李崑玉、賴其昌、潘瑞和三位長老教會傳道，分別於下

¹⁰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19。

¹⁰² 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七年三月末日）會員名簿〉，頁 3。

¹⁰³ 〈一新會發會式，在青年會館，婦女亦參加〉，《臺灣新民報》，第 408 號，昭和 7 年 3 月 26 日，頁 5。

¹⁰⁴ 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九年六月現在）會員名簿〉。

厝、吳厝庄及霧峰禮拜堂等三處教授，¹⁰⁵25日更在吳厝舉行白話字教授之開幕式。¹⁰⁶據載，十餘日後熟諳白話字者已不少，令李崑玉大為讚美。¹⁰⁷

同年5月2日召開第一回「婦人會」，出席者多達百餘人，該會具有同樂性質，有魔術表演與口琴演奏供婦女觀賞，與會諸人並共作「點山豬目」之遊戲，不過重點仍在演講。林獻堂的講題「演說之方法」，係應張月珠及吳素貞之要求而講，大意在教導女性應如何演講。演說內容分成說明、批評及感想三部分，各舉例證闡述之。此次大會的特色為除林獻堂、林攀龍外，演講者多為女性，主持人（張月珠）與開會（吳素貞）、閉會（李真瑜¹⁰⁸）致詞者亦為女性。¹⁰⁹

其後，11月21日舉行「婦女親睦會」，性質亦類似，出席有婦女50餘人、男子10餘人、兒童10餘人，合計70餘人。開會詞與閉會詞分別由楊水心與楊桂鶯擔任，其次林攀龍講婦女親睦會之精神，陳懷澄講漢學之必要。與會的女會員則施展出十八般武藝，何秀眉演奏風琴、張月珠以「婦女之努力」為題發表演說，並獨唱一新會歌、擅長詩文的洪流翠吟詠其所作的「詠黃竹坑」之詞、林瑞騰的六位女兒（小泉六姊妹）也上臺吟詩。自娛娛人之餘，也培養婦女鑑賞藝術的能力。¹¹⁰

隔年（1933）4月19日舉辦「婦女懇親會」，由洪瑞蘭主持，林碧霞致開會辭，共有男女50餘人出席。該會重點在訓練婦女即席演講的能力，先由林攀龍擬定8個演說題目，再以抽籤的方式決定每人的講題（但演說者也有男

¹⁰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56。

¹⁰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85。

¹⁰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213。

¹⁰⁸ 李真瑜：林季商第四妾，季商共有6個妻妾，真瑜以貌美馳名，最為得寵。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秀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23-24。

¹⁰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94。

¹¹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474。

性)，題目頗為有趣，且呈現跳躍性思考，如楊桂桃講「拿破崙、大里杙、一新會」、楊桂鶯講「我的戀愛觀」；亦有與婦女切身相關的議題，如溫成龍講「男女交際的考察」、林階堂講「臺灣女性美論」。¹¹¹同年 10 月 27 日「婦女懇親會」又再舉行一次，參加者 80 餘人，主持者為張月珠，林碧霜與林紫雲分致開會詞與閉會詞。會中楊水心暢談如何打破迷信，林獻堂講「有備無患」。除演講外，亦有跳舞表演與摸彩等餘興節目。¹¹²1934、1935 年繼續舉辦類似的活動。¹¹³

基本上，一新會主辦的婦女活動均為寓教於樂，目的在於培養女性會員演講的能力，¹¹⁴並透過聽講接收新知，因此才有許多女性能在日曜講座上一展身手。

（二）舉行日曜講座

林獻堂認為啓蒙運動最善之法莫如講演，因為社會大眾以不識字者居多，即使識字，欲盡讀各種書籍也大不易，¹¹⁵因此一新會乃開設日曜講座，每週定期於霧峰青年會館舉辦講演會，進行農村啓蒙的工作。該講座於 1932 年 4 月 23 日舉行第一回，最初是星期六晚間進行，稱為「土曜講座」，其後，為了讓一新義塾（詳後）的學生也能前來聽講，自 1933 年 6 月 11 日起改於週日晚間開

¹¹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62。

¹¹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416。

¹¹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13；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2、223。但後期會議的規模較小，僅有 30 餘人參加。

¹¹⁴ 一新會創始之初，張月珠曾向林獻堂建議成立一個研究會，以培養女性的演講人才，頗得其認同。其後雖然專職的研究會未能成立，但一新會所舉辦的婦女集會均特別著重婦女演講能力的訓練。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筠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82。

¹¹⁵ 林獻堂，〈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序〉，收於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霧峰：該會，1936），頁 1。

講，¹¹⁶名稱也改爲「日曜講座」，前後持續長達 4 年，至少舉行 200 回，最後一次有資料可查者爲 1936 年 2 月 23 日。¹¹⁷日治時期臺人自行舉辦的演講會能持續如此長的時間，實屬難能可貴。

由於每一次日曜講座通常都安排一男一女兩位講員，因此女性演講者至少佔一半，而在 200 回演講中曾登臺開講的女性還多於男性（56 人：44 人），實屬不尋常的盛況。曾至霧峰庄參觀的基督教長老教會陳瓊琚牧師，¹¹⁸在霧峰市街看見張貼於路邊與門樓前的講座廣告海報時，即感到非常驚奇，因爲傳單上列出的演講者竟是男女各半！他自認跑遍臺灣各地，見慣了重男輕女的事例，從未見過女性能如此出頭，因此深受感動。¹¹⁹由此可見，女性演講者的活躍確實是一新會的一大特色。

擔任講座講臺的女性演講者中，以張月珠（共講 14 回）、楊水心、吳素貞、洪瑞蘭（以上 11 回）、林碧霜（10 回）、楊桂鶯（9 回）、施專真¹²⁰（8 回）、林碧霞、林瑞珠、陳木霞（以上 7 回）、曾珠如（6 回）、楊桂桃、林時喜、林雙盼¹²¹、林錦屏（以上 5 回）、洪浣翠、林雙意、謝有¹²²（以上 4 回）

¹¹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243。

¹¹⁷ 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頁 43。〈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詳列 200 回演講的講題及講員，編成之時，日曜講座應仍持續進行，故一新會應舉辦 200 回以上的演講才是，惜 200 回以後的演講並無記錄留存。

¹¹⁸ 陳瓊琚牧師：大甲人，日本同志社大學部英文學科畢業，其後歷任私立淡水中學教師、臺北神學校舍監、北部日曜學校部會委員、淡水教會日曜學校校長等職，致力於青年宗教教育的工作。《臺灣人士鑑》，昭和 9 年版，頁 123。

¹¹⁹ 〈對霧峰一新會的所感〉，《臺灣教會公報》，第 571 卷，昭和 7 年 10 月 1 日，頁 24。

¹²⁰ 施專真：即施德欽、施阿選，北溝青銅林靈山寺道姑。

¹²¹ 林雙盼：林季商女兒，母爲郭玲瑜。後赴大陸，定居北京，改名林岡。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雙意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 12-13。

¹²² 謝有：1931 年畢業於霧峰公學校。谷瑞儉編，《臺中縣霧峰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頁 88。

等最為常見，她們均為一新會的幹部或會員，偶爾也邀請會外人士演講，如葉陶及外籍神職人員林安姑娘¹²³均曾演講一次。

至於女講員的講題，多與婦女議題有關，首先是新觀念的提倡，如林雙全¹²⁴講「現代婦人之主張」、洪浣翠講「男女平等」、吳素貞講「婦女教育之必要」、洪瑞蘭講「家庭改造與妻之財產權」；其次是傳授育嬰之法，鼓勵婦女成為賢妻良母，如王水講「妊產婦及初生兒之衛生」、李春蔭講「幼兒之教育」、林紫雲講「賢母良妻之教育」；再者是談及女子的社會責任，如林碧霜講「女子社會奉仕」、謝有講「新婦人之使命」。再次為旅行心得，如楊水心講「香港旅行談」、施專真講「福州旅行談」，當時出國不易，此類講題很能吸引大眾。此外，洪瑞蘭「性教育的實行方法」等較為前衛的講題也包含其中。¹²⁵

一些男性講員的講題也與婦女有關，如賴其昌講「女權」、溫成龍講「婦人與職業」。不過，陳懷澄曾以「男女不平等」為題，在日曜講座發表演說，鼓吹男女不平等為當然，又言女性善嫉妒而好虛榮。此種論述與一新會向來主張的男女平權完全背道而馳，林獻堂在臺下聽了大為駭異，為免聽眾誤解，急忙上臺進行消毒。林獻堂指出男女不平等皆由制度、習俗使然，非智能之不能平等；次說明制度平等、機會平等之重要，以闡明平等原則，方才散會。¹²⁶由此可見，林獻堂對於演講者是否傳達正確的觀念極為重視。

¹²³ 林安姑娘：即 Miss A.A.Livingston，1913 年來臺，1940 年離臺。她曾在彰化創立一所女子小學校，因日本政府干涉太多而停辦。以後轉到長榮女子中學執教，並於 1933 至 1937 年任校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迫離臺。楊士養編著，《信仰偉人列傳》（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頁 473。

¹²⁴ 林雙全：林瑞騰之女。

¹²⁵ 關於日曜講座女性講員的姓名與講題，參閱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頁 3-43。

¹²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20。

日曜講座的演講內容未有文字紀錄留存，以致無法進一步分析講員的思想內涵和主張，然僅由講題觀之，亦可知她們已有男女平等的觀念，主張婦女應受教育並擁有財產權，並應對社會有所貢獻；產婦衛生與育兒知識的教授，也極具實用性。然而，同時又鼓吹婦女宜扮演好傳統賢妻良母的角色，似乎略嫌保守。不過其尊重女性人格及權益的理念，在 1930 年代的時空環境下仍是相當進步及開明。

當時臺灣社會女性登臺演說並非司空見慣的事情，因此曾至日曜講座演講的郭朝成牧師，¹²⁷對於一新會女性勇於演講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認為霧峰庄的女性有的沒唸過多少書，卻能勇敢的輪流上臺，站在文人學士等幾百名聽眾前演講，真是讓人感動！反觀其教會中的姊妹，遇到有人邀她當祈禱會的主持人，或是主日學的司會，往往堅辭不敢。¹²⁸由此觀之，一新會的婦女確實落落大方，而能成為農村啓蒙的尖兵。

依資料所見，每回日曜講座前往聽講的民眾人數不一，情況好時有一、二百名，¹²⁹，有時遇下雨，聽眾僅三、四十人，¹³⁰一般是維持五、六十人到近百人。無論是演講或聽講，霧峰婦女受益於此講座應不少。

（三）舉辦巡迴講演與通俗講演

除了每週一次的日曜講座，一新會還舉行巡迴講演與通俗講演。巡迴講演是應霧峰鄰近村落的會員邀請，不定期至其居地演講；通俗講演則每月固定一

¹²⁷ 郭朝成牧師：原為傳道，1927年10月12日於草屯教會升格為牧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頁477。

¹²⁸ 〈土曜講座〉，《臺灣教會公報》，第571卷，昭和7年10月1日，頁18。

¹²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82、207、495；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21。

¹³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67。

次，地點在霧峰戲園。¹³¹巡迴講演通常由林攀龍帶隊，率領男女講員五、六名至北溝、萬斗六、坑口、吳厝等地開講，彌補當地居民因距離較遠，難以參加日曜講座的遺憾，張月珠、吳素貞、楊水心、林碧霜、林時喜、曾珠如為最常出現的女性講員，¹³²她們幾位是日曜講座的固定班底，並時常下鄉巡迴。其中，吳素貞曾單槍匹馬至後壠仔菜堂宣傳一新會之精神，前後演講三次，而頗獲好評，¹³³其膽識較現代婦女實不遑多讓。鄉間聽眾對巡迴演講的反應頗為熱烈，某次在萬斗六的講演便有 300 位民眾前來聆聽。¹³⁴

至於通俗講演也曾造成盛況，第一次通俗講演於 1932 年 4 月 1 日舉行，吸引三、四百名聽眾，在廖德聰、林金生、林攀龍、林以義、溫成龍等男性講員之後，吳素貞也以「打破迷信」為題登臺講演。¹³⁵吳氏出身彰化名門望族，因家規謹嚴，為避免男女雜處，僅讀了 3 年公學校，其漢學基礎多為自修得來，¹³⁶所學仍有不足，因此演講前她先將講稿讓林獻堂過目，請其稍作潤色和修正。不料林獻堂閱罷後頗為嘉許，認為雖非透徹之議論，亦頗有可取之處。¹³⁷對於打破迷信，吳氏的論點為，當前婦女的依賴性仍然很強，不只衣食住各方面仰靠丈夫，連日常俗事也都要依賴神明指點，對神佛簡直可謂無所不求，殊不知神明只不過是一尊木偶罷了！她認為臺灣婦女就因為過度迷信，以致無暇也無心關懷社會事務，久而久之便成為社會的負擔。因此她呼籲婦女要即早覺醒，莫在迷信之中白費光陰，應將有用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社會，以促成社會的

¹³¹ 〈霧峰一新會〉，《臺灣教會公報》，第 576 卷，昭和 8 年 3 月 1 日，頁 19。

¹³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95、214、429；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391、420、424、460；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09、249、365。

¹³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85。

¹³⁴ 〈霧峰一新會巡迴講演盛況〉，《臺灣新民報》，第 948 號，昭和 8 年 10 月 10 日，頁 2。

¹³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49；〈霧峰一新會開文化通俗講演〉，《臺灣新民報》，第 410 號，昭和 7 年 4 月 9 日，頁 4。

¹³⁶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 2-7。

¹³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41。

進步。吳素貞演說的內容可說極有見地，因此獲得滿場一致好評。輿論普遍認為在絕大多數婦女猶仍習慣受宗教麻痺自己的時代裡，吳素貞的見解相當進步。¹³⁸此次講演的成功，為吳素貞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日後她成為一新會最著名的女辯士，不過通俗講演活動由於與日曜講座性質接近，不久即停辦。

（四）入學一新義塾

1933年5月15日一新義塾正式成立（其設立經過詳見下節），開塾之日有學員126人，其中，女子70餘人，男子40餘人，女性佔多數，¹³⁹此後每年均招收新生。教材則為《六百字篇》、¹⁴⁰尺牘、四書、古文析義、《高等漢文讀本》等。¹⁴¹一新會中許多女性幹部和會員，如林碧霜、林碧霞、張月珠、楊桂鶯、林時喜、楊桂桃等人，有的由於未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有的即使已擁有霧峰公學校畢業文憑，但為了充實漢文學養，也報名參加。¹⁴²除了語文的研讀外，吳素貞並教其他女學員染布、製造人造花與刺繡，¹⁴³林獻堂之媳藤井愛子也傳授洋服裁縫，¹⁴⁴女學員因而能習得手工藝的技術。

¹³⁸ 〈中洲噴水〉，《臺灣新民報》，第410號，昭和7年4月9日，頁5。

¹³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01。

¹⁴⁰ 六百字篇，為漢字的習字書，每一個漢字均附有白話字的標音與造詞舉例。詳見王守勇，《六百字編》（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25）。

¹⁴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96。

¹⁴² 一新義塾的女學生中，畢業自霧峰公學校的有葉針、林碧霜、何玉爐、曾蕙娥、王雀屏、林紫薇、陳木霞等人，故一新義塾的性質類似今日的社區大學，入學者並非全為不視之無的文盲。霧峰一新塾友會編，〈霧峰一新塾友會會則〉；谷瑞儉編，《臺中縣霧峰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頁87-88。

¹⁴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64、68、489、490；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85。

¹⁴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70、75。

此外，義塾也安排課外活動，例如學員曾前往櫟社社員吳子瑜的東山別墅遠足。¹⁴⁵1935年10月當臺北隆重舉行「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時，義塾甚至安排22名女學生及11名婦女組隊前往參觀，顯示其充實婦女智識的苦心。¹⁴⁶

一新義塾的運作能步上軌道並有相當成效，林獻堂實居首功。他對義塾極為關心，有空時常前往視察，以瞭解學員學習的情況，若逢教師有事請假，更親自前往代課，¹⁴⁷更不厭其煩親自批改女學生的作文、日記等家庭作業。¹⁴⁸此外，因感學員所讀之書有字音訛誤、解說悖謬情況，每逢週日召集義塾女學員，幫其複習一週來之所學，並鼓勵其發表口頭讀書報告，¹⁴⁹其中表現佳者，則安排於日曜講座上演說，如張月珠曾講「五千圓之琴」而頗受好評，¹⁵⁰隔週立即以相同的題目登上日曜講座的講臺，¹⁵¹奠定女學員演講的實力。雖然此種課後輔導因部分女學員感覺壓力過大，對於報告讀書心得心懷驚懼而難以持續，¹⁵²仍充分顯示林獻堂的用心。

表 6-7 一新義塾週日複習會女學生讀書報告講題一覽表

時間	姓名	講題
----	----	----

¹⁴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50。

¹⁴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377、382。

¹⁴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53、355。

¹⁴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59、266、278、279、283、298。

¹⁴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07。林獻堂起先也想幫男學生複習功課，只是男學生對這種假日課後輔導反應冷淡，故日後參加者均為女性。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13。

¹⁵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52。

¹⁵¹ 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頁15。

¹⁵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69。

1933年六月十八日	林時喜	點鼠賊
1933年六月十八日	林碧霜	運動與休息
1933年六月十八日	陳珠英	良馬對
1933年六月十八日	江吻	愛蓮說
1933年六月十八日	林玉秀	勤訓
1933年六月二十五日	葉針 ¹⁵³	南濟雲乞師
1933年六月二十五日	林碧霞	忍耐
1933年六月二十五日	張月珠	五千圓之琴
1933年七月二日	楊桂桃	科侖布
1933年七月二日	賴杏	四行
1933年七月二日	林玉霞	儉訓
1933年七月二日	曾秀容	鮑氏子
1933年七月九日	林碧霜	貓說
1933年七月九日	林瑞珠	察理
1933年七月九日	林錦屏	童子賣文
1933年七月九日	王雀屏 ¹⁵⁴	盲魚

資料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43、252、258、269。

此外，一新義塾畢業生為謀求塾友間之親睦與援助母塾之發達，曾組織「霧峰一新塾友會」。¹⁵⁵儘管如此，林獻堂認為學問不進則退，畢業後能繼續

¹⁵³ 葉針：1929年畢業於霧峰公學校，曾在日曜講座演講3回。谷瑞儉編，《臺中縣霧峰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頁87；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

¹⁵⁴ 王雀屏：1930年畢業於霧峰公學校，曾在日曜講座演講3回。谷瑞儉編，《臺中縣霧峰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頁87；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

研究者甚鮮，雖欲研究，若遇不識之處亦無人可問，進而鼓勵畢業生組織「一新義塾塾友研究會」，每週二定期集會，以聯絡感情及切磋學問，林獻堂本人親自指導，¹⁵⁶第一回開會出席的 11 人中，女性 8 人，佔壓倒性多數。¹⁵⁷

1938 年一新義塾結束之前至少有 74 名畢業生，其中，女性 51 名，一新會的女性幹部和會員，如林碧霜、林碧霞、楊桂桃、林瑞珠、陳木霞、林時喜、林雙盼、林雙意、葉針、王雀屏等均堅持到底，光榮畢業。¹⁵⁸

（五）舉辦並鼓勵婦女參與運動會及週年紀念會

一新會舉辦的運動會最大的特色就是婦女的參與，首屆運動會在楊水心領軍下，共有 30 名一新會婦女參加競賽，甚至連林家婦女亦不惜拋頭露面，參加持球競走、提燈競賽等趣味競賽，因此造成轟動。¹⁵⁹霧峰庄的婦女可說不分年齡和階級，同樂於其中。

翌年（1933）11 月 19 日開辦第二回運動會，亦有張月珠、曾珠如、林碧霜、林紫雲等女性參加化妝遊行，據載其盛況更勝於第一回。¹⁶⁰至於第三回運動會，則有義塾女學生名為「傳書鳩」的舞蹈表演和遊戲，¹⁶¹替大會增色不少。

其次，每年 3 月 19 日，一新會舉行的週年紀念活動，展售的手工藝、服裝及園遊會飲食攤位販賣的菜餚點心，均是一新會婦女會員的精心傑作，至於負責販賣和招待的則是林家的婦女，所以扶老攜幼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值得一

¹⁵⁵ 霧峰一新塾友會編，〈霧峰一新塾友會會則〉。

¹⁵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三年》，頁 120，4 月 5 日。

¹⁵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三年》，頁 135，4 月 16 日。

¹⁵⁸ 〈霧峰一新義塾塾友會會員名簿〉，收入霧峰一新塾友會編，〈霧峰一新塾友會會則〉。

¹⁵⁹ 林獻堂駐，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33。

¹⁶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443。

¹⁶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78、384。

提的是，在化妝遊行行列中，以婦女裝扮成社會各行各業的人士為先導，其中扮裝對象有政府官員、法院判官、商人、民意代表等，其最初目的可能只是女扮男裝博君一笑而已，然而卻開啓遊行婦女更積極投入社會的雄心，例如裝扮成民意代表的吳素貞戰後果真當選為國大代表。¹⁶²

透過運動會與週年紀念會的籌畫參與，一新會的女性會員因此步出家門，投身社區事務，達到敦親睦鄰的目的，進而自娛娛人，並能藉機發揮己身才華，展售親手製作的手工藝品和點心，從中獲得成就感，使生活的內涵更加豐富。此外，霧峰地區一般婦女藉由觀賞此種盛會，不但增加見識及生活樂趣，也容易凝聚社區共同體的意識。

一新會舉行的各種集會幾乎都可見女性的蹤跡。如林獻堂組織的讀書會，洪流翠、張月珠、吳素貞、林碧霜、楊桂鶯、曾珠如等人便經常參加；甚至連參加老人慰安會的 103 位老人中，老太太也佔三分之二以上。¹⁶³因此透過一新會，霧峰地區的婦女無論老少均聯繫在一起。

綜上所述，一新會中的婦女在霧峰地區傳統文人林獻堂的指導下，同時扮演學習者與傳授者兩種角色，她們在婦女懇親會及一新義塾中學習演講與寫作的技巧，充實漢學的根底，再於日曜講座與巡迴講演中滔滔雄辯，將習得的新知傳授給更多農村婦女。充實文化涵養之餘，對於運動會、園遊會等社區活動也積極參與，從此其生活不再侷限於家庭，其意義不容忽視。

三、一新會對婦女的影響—以吳素貞為例

一新會之所以能有多采多姿的婦女活動，主要仰賴女性成員積極投入，這些女會員不乏傳奇人物，例如張月珠為臺中市慎齋堂的住持、¹⁶⁴施專真為青桐

¹⁶²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 27-28。

¹⁶³ 林獻堂駐，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07。

¹⁶⁴ 臺中市慎齋堂為張月珠的祖母所設，月珠自幼寄養於齋中。其後因兄弟計較財產，告到法院，由吳素貞協助取得慎齋堂的所有權，因此月珠與吳素貞形同莫逆。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

林靈山寺的道姑，她們兩人稱職地扮演出世與入世兩種不同的角色；具備詩文書畫能力的洪流翠，在下嫁林瑞騰為妾之前，為中華民國海軍中將陳季良之妻，並育有一子陳瑚。其後，洪氏為與其子團聚，前往中國尋找前夫，中日戰事爆發後，遂不得歸臺，引起軒然大波，並導致日警的高度注意；¹⁶⁵曾珠如與吳素貞則在戰後雙雙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至南京參加正、副總統選舉，並與蔣宋美齡有一面之緣。茲以吳素貞為例，略窺一新會對參與婦女的影响。

吳素貞，名帖，素貞為其字，乃彰化名儒吳德功的姪女，父親為吳汝翰。自幼好學，喜讀書，然因其父認為公學校男女混雜、不成體統，就讀有違大家閨秀的清譽，而僅受 3 年正規的學校教育，其後便留在家中由父親傳授《女論語》，自學不倦。少女時期為謀求學識增進，1925 年與就讀彰化高女的友人數名成立「彰化婦女共勵會」，且聘請教師指導，為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獨立的婦女團體，會員間除學問切磋外，並舉辦演講，向大眾宣揚理念。¹⁶⁶吳素貞於此時期奠定詩文基礎，乃獲准進入彰化高女手工藝科當講習生，進修刺繡、染印、造花等技術，結業後任共勵會講師，指導前來習藝的婦女。

吳氏 27 歲時成為林資彬的續絃，進入霧峰林家大門，不料此一門當戶對的婚姻卻開啓她人生中的黑暗期。由於資彬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除了在外惹草拈花取樂外，家中妾婢成群，終日嬉戲酒色無度，對其冷淡異常。加上小妾又先產下一男，她還得忍受群妾的譏諷，直到後來也產下男嬰，大房正妻的地位

〈林正方先生訪問紀錄〉，1995 年 8 月 28 日、1997 年 1 月 10 日，於臺北市仁愛路林宅，未刊稿。

¹⁶⁵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 63-65。

¹⁶⁶ 「彰化婦女共勵會」成立於 1925 年 2 月 8 日，由彰化地區的智識階級婦女所組成。由於與彰化文化協會關係密切，被日本當局視為文協指導下的青年運動團體，故常遭打壓。該會向州廳提出的以普及日文、羅馬字、禮儀等為目的的通俗文化講座，均未獲許可。但仍舉辦了幾次演講會，吸引數千民眾到場聆聽。也組織體育會，有會員 40 餘人，各自依其所好選擇運動項目，以鍛鍊體魄。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一九二〇—一九三二）》，頁 529-536。

才穩固。由於婚姻的不幸，曾考慮自殺，但又放心不下未成年的兒女，只得作罷；想要離婚，律師告訴她目前的社會習俗不允許女子提出離婚，只得忍氣偷生。然而，一新會成立後一切都有了轉變。

吳素貞在一新會中被推舉為社會部委員，擔任手工藝教學和演講庶務等工作，因此重新燃起少女時期服務社會的熱情，也找到了生活的重心。她積極參與一新會的各項活動，為提高霧峰文化與啓發婦女智識而奔走，這些工作帶給她莫大的樂趣和成就。例如某次她預備以「納妾陋習的革除」為題演講，由於其本身就是納妾制度的受害者，講題一經發表，馬上造成轟動，因為大家知道她會有許多精彩的言論，因此演講當日共有 200 餘名聽眾前來聽講，連林資彬也被朋友們強行拉來。素貞隨後在臺上痛陳蓄妾陋習遺害社會、損毀人權等罪過，造成無數婦女過著暗無天日的痛苦生活，抒發心中的不滿。又有一次參加辯論會，題目為「先救妻乎？先救母乎？」大意是如果母親與妻子同遭落水，在此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你要先救何人。素貞發言道，應該先救妻子！引起滿座譁然，她乃解釋因為母親愛護兒子勝過自己生命，一定不願其子陷於失妻之苦，必定希望他的兒子救其妻。不過隨後她話鋒一轉，指出目前臺灣社會一妻多妾，死了一個妻，還有許多妾，不然也可以重娶一個，所以還是不必救妻，救母親要緊，因為母親只有一個。可見吳素貞總是把握每次發言機會，抨擊蓄妾陋習不遺餘力，主張提高婦女的人權。因此加入一新會使吳素貞從苦難的婚姻跳脫出來，由豪門怨婦轉型為關心社會的進步婦女。

一新會對吳素貞日後人生的影響非常巨大，首先她將自己演講中尊重女權的理念落實到生活中。在林資彬亡故後，依照臺灣傳統，其遺產只能由兒子繼承，女兒沒有財產繼承權，最多只能酌量送一些作為嫁妝。然而，吳素貞認為如果她仍屈守封建，與她在一新會時期提高女權的演講相較，無異是自打嘴巴，因此力排眾議，讓女兒也有財產繼承權。

其次，一新會開啓她服務社會的熱誠。一新會時期的吳素貞，是該會最著名的女講員，能在數百名聽眾前演講而毫無懼色，同時她又深入霧峰各地，鼓

勵一向閉戶不出的婦女與她一同參加社會服務，¹⁶⁷這些工作使她產生爲民喉舌的念頭，戰後乃出馬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並獲得當選。任內吳素貞曾利用職務之便親口向蔣宋美齡陳情，要求將政府接收的一部分日產作爲婦女教育的基金，得到蔣宋美齡的允諾，不愧爲臺灣婦女的代表；隨後又參加臺中市婦女會，被推舉爲理事長，理事長任內主持新會館的興建事宜，並替受虐婦女仗義執言。晚年又創辦素貞興慈會，以獎助清寒學生與救濟貧民爲會旨。¹⁶⁸

吳素貞的後半生可說完全投入社會工作，成爲臺中地區知名的婦女領袖。她之所以能有此成就，或許與她身爲霧峰林家的貴夫人有密切的關係，不過更重要的是一新會時期的訓練與經歷奠定了她日後從事婦女工作的基礎。

四、小結

綜上所述，一新會鼓勵婦女不再蟄居於家庭，積極參與運動會、園遊會等社區事務與進入一新義塾學習語文、練習演講、充實知識。並舉辦婦女懇親會、婦女親睦會等例行聚會以聯繫婦女間的感情，提供具有才藝的婦女表演的舞臺。此外，透過日曜講座及巡迴演講積極散佈理念，致力於婦女地位的提高與新觀念的傳授。由於日曜講座的講員每次通常是一男一女，不少婦女乃有在大眾面前陳述己見的機會，霧峰婦女勇於演講在外地訪客的心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在當時的時空下實屬難得。尤其諸如日曜講座、一新義塾等活動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日曜講座 4 年、一新義塾 5 年），顯示這些活動普遍獲得當時社會的接受與認同。

其次，雖然霧峰一新會的女性幹部，大抵是霧峰林家的成員（楊水心、吳素貞、林碧霞）及當地領導階層的家眷（林碧霜、楊桂鶯、洪瑞蘭），即所謂

¹⁶⁷ 在霧峰一新會成立之初的 67 名女會員中，有 21 位是經由吳素貞的介紹才加入的，包括日後頗爲活躍的何秀眉、施專真等人。霧峰一新會編，〈會員名簿〉，昭和 7 年手抄版（與印刷版內容不同）。

¹⁶⁸ 關於吳素貞的生平事蹟，詳見林吳帖，〈我的記述〉，頁 2-64。

小資產階級的婦女。不過在全數 116 名女性會員中，仍以庶民婦女佔多數；況且諸如運動會、週年紀念會等活動常吸引千餘人前來觀賞，這些觀眾亦是以一般農村婦女為主。因此，不宜將一新會視為具有階級色彩的社團，霧峰林家及當地領導階層只是以身作則，產生示範作用。該會的理想是從霧峰庄做起，以建設清新新臺灣，類似今日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絕非僅將教育對象鎖定於資產階級的婦女。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一新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有其侷限，她們仍受林獻堂等進步男性的指導，本身較缺乏自主性；會中最高只能擔任委員，主任一職仍是男性的專利。不過，當時女性的知識水準普遍較男性低落，若非林獻堂有較為進步的兩性觀念，開放相當的空間（以日曜講座的安排來看，等於是保障名額）與提供必要的訓練，讓女性在社區文化啓蒙工作中貢獻心力，女性實不可能有機會在一新會中扮演如此吃重的角色。

一新會不像新文協、臺灣農民組合等團體設有婦女部，¹⁶⁹但是，並不表示他們不注重婦女，相反地，他們將婦女視為與男子相同，同樣是需要啓蒙的對象，不需要單獨設部。由此觀之，反而是一種男女平等的表現。

綜括而言，霧峰一新會提供婦女一個學習進修的場域，其課程除語文訓練外，亦包含織染、刺繡等手工技藝，對體育和音樂（力與美）也頗為注重，因此一新會的女性可謂才、學、健康兼備。而且她們透過公開演講，將習得的新觀念傳播給更多婦女，構築更龐大的社區教育網絡。此外，亦使婦女擁有一個參與公眾事務的舞臺，例如吳素貞即因積極投入一新會的活動而獲得極大的成就和樂趣，遂從不幸的婚姻中跳脫而出，並因此建立她日後服務社會、從事婦

¹⁶⁹ 1923 年臺灣文化協會將「尊重女子人格」一款列入其年度新設事業中，其後並於全台各地舉辦數次以討論婦女問題為主軸的大型演講會。迨文化協會分裂，在新文協會則第七條中，明確規定設置婦女部。1926 年成立的台灣農民組合，亦於 1928 年 2 月設置婦女部，由葉陶擔任婦女部長。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一九二〇—一九三二）》，頁 320、328-329、340。

女工作的志向，成爲著名的婦女領袖。由此觀之，霧峰一新會在婦女教育方面確有貢獻，應該給予相當的肯定。

第三節 漢文教育之堅持

一、一新義塾的設立

除致力於婦女教育外，一新會也致力於保存漢文。日治之初，總督府雖然確立日語普及政策，惟鑑於漢文為臺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難以遽然廢除，乃對漢文採漸廢政策，一方面容許漢文教育的主要機關書房繼續存在；另一方面在公學校設漢文科。¹⁷⁰因此，傳統文人紛紛開設書房謀生，¹⁷¹或至公學校擔任漢文教師，為延續漢文而努力。例如呂喬南於彰化、鹿港、草湖等地設帳授徒，晚年復回鹿港文開書塾任教；¹⁷²王淑潛 24 歲起在豐原設塾教書，凡 40 年；¹⁷³鄭虛一設帳於新竹成趣園之守默窩，培植鄉黨及宗族後進；¹⁷⁴曾逢辰為新竹公學校漢文教師。¹⁷⁵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公學校漢文科改為選修科目。許多學校全然不顧社會需要，未經家長同意，便廢除漢文科。¹⁷⁶此後，以教授漢文為主

¹⁷⁰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335。據 1898 年公學校規則規定，漢文被置於讀書、習字、作文等課程中施教，並延聘一些受尊敬的書房教師及學者擔任教席。1903 年，修改公學校規則，漢文獨立為一科，其教學目的在使學生理解普通之漢字、漢文，能夠處理日常之事務，教學時則用日語解釋。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277。

¹⁷¹ 1898 年全臺有書房 1,707 所，教師 1,707 人，其中除新竹廳 280 人出身不詳外，餘 1,427 人中，計有舉人 1、生員 147、廩生 7、童生 758、增廩生 1、貢生 5、份生 3、監生 2、無功名者 503 人，顯示童生最多，佔 53.12%。至 1904 年，傳統教育出身者仍居絕對多數，佔 99.07%，其中童生佔 31.77%，無功名者佔 62.51%。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268。

¹⁷²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頁 102。

¹⁷³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 59。

¹⁷⁴ 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144。

¹⁷⁵ 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123。

¹⁷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335-336。

的書房紛遭取締或禁止。¹⁷⁷迨至 1930 年代初期，日人指稱漢文教學阻礙「內地延長主義」，且違背「國民教育」之方針，對舊式的書房更是從嚴管理，地方教育當局與警察配合，對「未經許可及不良書房」嚴加取締，施以罰款、中止教學、解散或關閉等處分。一時之間不少書房教師頓然失業而陷於困境，導致怨聲四起。¹⁷⁸同時，全臺公學校的數量不足，無法就學的兒童為數不少，且漢文已改為選修科，不受重視，故兒童畢業後不能寫淺白之書信，凡欲作事每引以為苦。¹⁷⁹因此，林獻堂極為注重教育體制外的漢文教育，以補官方教育的不足。

1930 年林獻堂出面協商，聘請在霧峰地區開設聳翠山房書塾的林竹山，擔任林紀堂么子蘭生的漢文教師；¹⁸⁰平日他親自教其三子雲龍漢文字音，¹⁸¹足見他認為讓林家子弟接受漢文教育極為重要。

其次，林獻堂也不吝資助擔任漢文教師者或是研究漢文的團體。臺南南社社員洪坤益¹⁸²有意鼓吹漢文通信教授，創「漢詩函授研究會」，請他援助，他立刻應允；¹⁸³林仲衡和蔡子昭打算創設一漢文研究會，並擔任講師，他即刻給予 50 圓補助金，¹⁸⁴其後資助 20 圓。¹⁸⁵1932 年 9 月林氏赴東京時，先後拜訪拓相永井柳太郎和首相齋藤實，建議儘速施行義務教育、公學校漢文改為必修

¹⁷⁷ 總督府取締書房的理由是：一、書房的存在會導致公學校兒童入學數遞減，二、書房專教漢學，破壞日臺人融合，阻止日臺人的親善。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279。

¹⁷⁸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26：1（1988 年 5 月），頁 107。

¹⁷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370。

¹⁸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19、52。

¹⁸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211。

¹⁸² 洪坤益（1892-1947）：字鐵濤，號黑潮，南社及春鶯詩社社員。年屆中年時曾向胡南溟學詩，1919 年於臺南市創「漢詩函授研究會」，1930 年參與籌組《三六九小報》，並在該報執筆撰文。常參與擊鉢詩會，每榜上有名。吳毓琪，《南社研究》，頁 204-205。

¹⁸³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 239。

¹⁸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79、194。

¹⁸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28。

科。¹⁸⁶同年 11 月他從報上得知高雄州禁止漢文書房 48 處，導致 2,000 餘名學生無處可學，48 名教師無處就職，極為痛心，¹⁸⁷而打算振衰起弊。

一新會成立之前，1930 年霧峰已有漢文研究會的組織，莊嵩擔任講師，分為男子及婦女兩部，在霧峰青年會館上課，¹⁸⁸此為一新義塾的前身。一新會成立後，仍持續不輟，並納入該會活動的一部份。期間莊嵩曾因全年束脩僅 480 圓，不敷其生活所需，而萌生辭意，後林獻堂答應加薪至 720 圓，但他仍覺不足。直至林獻堂與何添丁協調，調薪至 800 圓，並由何氏出面募集不足之數後，才獲解決¹⁸⁹。1933 年 1 月 17 日，漢文研究會舉行盛大結業典禮，表現優異的學生獲頒精勤賞品。¹⁹⁰不過該會並未向當局申請認可，因此，當地警部補曾提出警告。但會員廖進平認為，以一新會會員而研究學術，無申請認可之必要；廖德聰亦言，萬一申請認可而被駁回，可能從此不能再開會。於是決定不向當局提出申請。¹⁹¹

為取得當局同意，1933 年 2 月該會加開日語課程，以潘瑞安¹⁹²為教師，並改名為漢文國語研究會，於 20 日舉行開會式，¹⁹³共有學生女子 60 人、男子 30 人。其課程安排為：全無漢文、日語素養之女子，上午教授國、日語各一小時；稍識日語、漢文之女子，則下午各一小時；男子則在夜間上課，因其白天

¹⁸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372、374；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124。

¹⁸⁷ 林獻堂駐，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70。

¹⁸⁸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頁 123；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370。

¹⁸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409；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3。

¹⁹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25。

¹⁹¹ 林獻堂駐，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99。

¹⁹² 潘瑞安：1908 年畢業於葫蘆墩公學校。羅玉瑛等編，《臺中縣豐原市豐原國民小學創校百週年校友芳名錄》（豐原：臺中縣豐原國民小學，1997），頁 2。

¹⁹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51、70。

多有職業。¹⁹⁴然而，柳澤道太郎警部補以未申請認可為由，24日即命令該會必須中止。林獻堂得知後，甚為不快，甚至憂慮至終夜不能成眠。¹⁹⁵

在此情勢下，只得正式提出申請，申請人用林攀龍的名義，¹⁹⁶林獻堂並與莊嵩、林攀龍和溫成龍協議，將書塾名稱訂為一新義塾，修業年限訂為4年。¹⁹⁷不過既有漢文的教授，當局對之充滿疑慮，設立申請書屢屢遭到擱置，直到當局確認義塾晝間女子、夜間男子皆有安排學習日語之時間，且每週達到16小時，¹⁹⁸才於該年5月9日核可。¹⁹⁹林獻堂獲知義塾得到認可時，欣喜不已，認為這是一新會的一大事業，霧峰文化將因此助長不少。²⁰⁰

二、一新義塾的運作

一新義塾的課程規劃，是男女依程度分為四組上課，女子一組，上午9時起至11時止，上日語、漢文；女子二、三、四組，下午1時半起上日語，3時起至5時止上漢文；男子四組同時上課，7時半起上日語，8時起至10時上漢文；又週一、週三、週五三日增教算術。開學後，女子四組均有入學者，而男子僅二、四組而已。²⁰¹此外，女學生還可學習手工藝，並安排有遠足及校外教學。

¹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78。

¹⁹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76。

¹⁹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88-89。

¹⁹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91。

¹⁹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40、141。

¹⁹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92。

²⁰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92。

²⁰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96。

關於上課日期，除農曆新年及一新會舉辦夏季講習會時停課數日外，大抵全年無休。²⁰²至於學生來源，除自由報名外，也麻煩保正招募。²⁰³1935年時，學生數達到125名之多。²⁰⁴

漢文教師莊嵩有事請假時，林獻堂總是花心思尋找代課教師，他自己與櫟社社友陳懷澄、張棟梁都曾代過課。²⁰⁵當時陳懷澄在黃竹坑教林瑞騰女兒雙全、雙璧、雙靨、雙安及林季喬女兒雙盼、雙意等18人漢文，²⁰⁶距離霧峰頗近，是代課的適當人選。代課時林獻堂並提供自宅供其住宿。²⁰⁷陳氏在義塾曾講解《孟子》並敘及文字起源及四聲反切，林獻堂有空時常前往聽講。²⁰⁸不過，尋找代課教師也曾使林獻堂焦頭爛額。某次莊嵩生病，林獻堂屬意林金生、林資瑞代課，但兩人卻屢次來辭，故改找櫟社同仁張棟梁，託其代課。得棟梁承諾後，金生又言他與資瑞願擔任教學。獻堂乃感嘆其反復無常真是費事。²⁰⁹

1934年5月義塾成立一週年，特別舉行祝賀式，林獻堂致詞勉勵學生，讀書必先立志，學方能有成，書當熟讀而深思其中奧義妙理，始有所得。譬如採掘金鑛若不努力，金則永眠於地中。此外，並舉行漢文和日語的演習會，學生參與者20餘人，²¹⁰向外界展示一年來的學習成果。

²⁰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62、73、322。

²⁰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99。

²⁰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201。

²⁰⁵ 張棟梁於1934年10月1日至12月2日在一新義塾代課。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76、452。

²⁰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456；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6。

²⁰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338。

²⁰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341、343、348。

²⁰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52。

²¹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198。

1934年12月9日，召開義塾父兄會，讓家長能瞭解子弟學習狀況，學校教育能與家庭聯絡。由潘瑞安報告學生出缺席狀況，莊嵩解釋教學方法，林攀龍演講義塾精神。會後並舉辦學藝會，學生或說書或談感想或說日語，成績頗有可觀。²¹¹每年年終舉行結業式，頒發獎品予全勤的同學。²¹²故其運作模式，與目前的中小學頗為類似。

爲了能趕上時代，1935年義塾進行改革，自該年4月起新塾生採男女共學制，並加授體操、修身兩科，且固定座位。²¹³

同時，日本當局仍持續留意義塾的狀況，大屯郡役所庶務課視學長嶺朝良及霧峰公學校長山の端都曾前來視察，²¹⁴而義塾之上課時間和學生數目若有變更，也必須向郡役所提出報備，²¹⁵且上課時間須依認可實施。²¹⁶此外，郡役所來文要求一新義塾於諸祝、祭日²¹⁷須舉行儀式，對學生訓話。因此，1934年6月17日臺灣始政紀念日時，即舉行儀式，8時半首唱日本國歌，接著，依序爲教師莊嵩

²¹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458。

²¹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477；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109；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115。

²¹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16。

²¹⁴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82；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191。

²¹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87、339；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191、228；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201。

²¹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100。

²¹⁷ 所謂祝日即四大節，分別是1月1日（四方拜）、2月11日（紀元節）、4月29日（天長節）、11月3日（明治節）。祭日是1月3日（元始祭）、3月21日（春季皇靈季）、9月23日（秋季皇靈祭）、10月3日（神武天皇祭）、10月17日（神嘗祭）、10月28日（臺灣神社祭）、11月23日（新嘗祭）、12月25日（大正天皇祭）。臺灣青年皇民鍊成研究會編，《皇民鍊成臺灣青年必攜》（臺北：精文出版部，1942），頁首。

訓話、唱始政紀念歌、來賓李崑玉來賓致祝辭、合唱塾歌。²¹⁸11月3日明治節²¹⁹時，也舉行儀式，教師潘瑞安講述明治節之大意；²²⁰翌年天長節²²¹亦然，有祝賀式，並唱日本國歌及天長節歌。²²²顯示當局的控制頗為嚴密。

由前所述，義塾不僅必須教授日語，其行事也需配合日本的節慶及祝祭日，但在能傳授漢文的前提下，林獻堂對於當局的要求總是一一配合。但是當局的疑慮並未解消，對於義塾及義塾所屬的一新會仍多所刁難。從1933年4月開始，長嶺視學及山の端校長便一再表示希望一新會能加入臺中州的教化聯盟。²²³臺中州教化聯盟設於1933年3月26日，主要目的在謀求聯絡提攜，以實施各種社會教化施設。²²⁴當局的主要目的顯然要將一新會置於控制之下。

雖然因林攀龍認為官民合作的教化事業少有成功之例，而斷然拒絕加入，²²⁵然而，事件並未落幕。隔年一新會申請開辦夏季講習會時，當局又遲遲不予受理，且明白提出以加入教化聯盟作為辦理夏季講習會的交換條件。對此，林獻堂頗為不快，他認為教化聯盟與一新會皆為教化團體，若受壓逼而加入，精神上會受莫大之傷害，故斷然不能加入。²²⁶然而，日方施加的壓力日增，一新會最後迫於無奈，只得召開臨時委員會討論是否加入，大多數委員在衡量大局下，遂決定加入。²²⁷

同時，時局也日趨險峻。1936年6月發生祖國事件，對一新會產生重大衝擊。該年3月林獻堂至上海，在華僑聯合會的歡迎席上曾曰：「此番歸來祖國

²¹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42。

²¹⁹ 明治節：以明治天皇的冥誕11月3日為明治節。

²²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418。

²²¹ 天長節：昭和天皇的生日，4月29日。

²²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149。

²²³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46、307。

²²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南天，1939），頁1032-1033。

²²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317、396。

²²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00、302。

²²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22。

視察」，引起日本軍方不快。臺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認為林獻堂認中國為祖國，而不認日本為祖國。林氏返國後，6月17日參加在臺中公園舉行的始政紀念日園遊會時，荻洲乃唆使流氓賣間善兵衛掌摑其臉頰。²²⁸事件發生後，包括日曜講座與讀書會在內的許多活動都停止舉行，²²⁹一新會可說已土崩瓦解，僅剩一新義塾勉強持續。不過，義塾學生熱心讀書者也日漸減少，缺席者甚多，令林獻堂深感遺憾。²³⁰

接著，當局也開始加緊對林家的壓迫，先是林松齡與林鶴年²³¹只因酒後在郵局鬧事，竟被拘留達19日，這一期間既不釋放，也不送檢察局。²³²日警且揚言霧峰林家之人皆傲慢，警察前往拜訪皆辭不見面，此後不論何人，將以處置松、鶴之法而處置之。²³³不久，林資彬也被警察課留置，家宅亦被搜查，因日警懷疑他私藏軍械武器，²³⁴甚且明言因林資彬為林獻堂一族之人，不能輕易釋放，將嚴重處置。²³⁵當時情勢極為緊張，甚至有人認為霧峰林家從此將被滅族。²³⁶

在此種局面下，1937年5月起林獻堂只得避居日本，²³⁷對於一新會僅存的唯一事業——新義塾自然無力顧及。最後，因日本政府全面禁止漢文教學，《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三報紙從1937年4月1日起

²²⁸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51年1月12日，未刊稿；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14-315。

²²⁹ 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缺1936年，因此對於日曜講座與讀書會停辦的詳情，造成查考上的困難，然因1937年的日記已完全無這兩種活動的蹤跡，故可判斷其停止於1936年。

²³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86。

²³¹ 林鶴年，林紀堂第四子，戰後曾任第一、三、五屆臺中縣縣長。

²³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61、85。

²³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71。

²³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65。

²³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93。

²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74。

²³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180。

廢除漢文版，《臺灣新民報》亦在荻洲立兵的壓迫下，於 6 月 1 日跟進。²³⁸義塾只得自該年 10 月 4 日起停止漢文教學，²³⁹陷入慘澹經營的困境。

最後義塾學生僅餘 10 餘名，教學內容也僅剩每日兩小時的日語，意義已不大，雖然林獻堂於 1938 年 3 月初仍力主繼續維持，以待他日進行改革，然而，仍於該年 9 月畫下句點，²⁴⁰一新會正式落幕。

三、成立「一新詩文研究會」

一新會另一項與延續漢文有關的次級團體是「一新詩文研究會」。與一新義塾以全無漢文素養，或僅略識漢文的男女為招生對象不同，「一新詩文研究會」係以具有漢文基礎，並有寫作漢詩能力者為對象的集會。

該會之成立起於 1935 年 10 月霧峰的開業醫林春懷建議一新會的學藝部組織一詩文研究會，而深獲林獻堂的支持，而於該月 26 日正式成立。林春懷擔任幹事長，林資瑞、莊銘瑄、蔡柏樑等人為幹事，林獻堂、林幼春、莊嵩為詞宗，負責評選詩作，林攀龍、林猶龍、林少聰則為顧問，會員共有 20 餘人，開會的事務所則設在林春懷的懷仁醫院。²⁴¹

「一新詩文研究會」的活動方式，是由詞宗出課題，會員在家寫作完畢後，再交給詞宗批改，評定高下。因此，是林獻堂等櫟社前輩指導年輕後輩漢詩寫作的結社。第一回課題係林獻堂所擬，題為「一新詩文研究會成立有感」，東韻七絕，限三日交卷。²⁴²其後，尚有「秋螢」、「閱報」等題，每回收到的詩作約三、四十首，林獻堂常忙於評詩、選詩，會員的參與堪稱踴躍。

²³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121。

²³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354。

²⁴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61、221。

²⁴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68、371、377。

²⁴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82、399。

²⁴³此會延續年餘，直至 1937 年 1 月仍有紀錄。²⁴⁴雖然留存的相關資料不多，但對於霧峰當地漢學的延續應有一定影響。

林獻堂延續漢文的努力並不限於一新會。他在霧峰創設的愛佃設施—坑口農事自治村中，²⁴⁵特別聘請劉集賢教農民漢文，每月平均給 10 圓薪資。²⁴⁶不過，此舉顯然與總督府普及日語的政策相違，1934 年 2 月乃遭大屯郡役所命令中止，林獻堂聞訊後大感不快，²⁴⁷但仍陽奉陰違繼續進行。直至 1935 年 12 月因郡視學再次阻止及學生學習不熱心，不得已才宣告結束。²⁴⁸顯示即使是農民，林獻堂亦認為應要學習漢文，因漢文為臺灣人必備的基本知識。

四、組織「詩學習作」和「讀詩會」

一新會結束後，林獻堂仍不放棄漢文的傳承。1940 年 6 月因腳斷而留居東京時，即聯絡旅居東京能詩、或對漢詩有興趣的臺人，組成「留東詩友會」，進行詩學的研究，會員包括林漢忠、楊子培、陳茂源、陳虛谷、甘文芳、葉榮鐘、高天成、賴天生、賴員、黃桂華等人。此會共集會 7 次，至 10 月底林獻堂回臺後才結束。²⁴⁹

²⁴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99、410、450。

²⁴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24。

²⁴⁵ 坑口農事自治村成立於 1933 年，是日治時期台灣著名的農業模範部落。在林獻堂與日本當局合作下，實施建設堆肥豬舍、獎勵使用深耕犁、經營共同秧田、設置共同水路等事業，並舉辦各種講習會及品評會等。林猶龍，《坑口農事自治村事業概況（附農事自治村規約書）》（台中：大安產業株式會社，1935），頁 10-23。

²⁴⁶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458；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53。

²⁴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65。

²⁴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429。

²⁴⁹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頁 38-40。

回臺後，1940年12月底，他為鼓舞諸姪輩學作詩，進而研究漢文，乃組成「詩學習作」。此團體不稱社，亦不稱會，會員每10日作一課題，交給林獻堂批改。成員包含林瑞騰、林春懷、林培英、林金生、林金昆、林正紀、林資瑞、楊天佑、蔡柏樑、林陳琅、傅春魁、莊垂勝、莊銘瑄、王寶書等人，以楊天佑總其事，莊銘瑄副之。²⁵⁰

成員除林瑞騰較老成、林春懷為霧峰當地的開業醫外，多為霧峰林家的年輕子弟，例如林資瑞為林紹堂幼子、林培英為林幼春長子、林金生為林少梅長子、林金昆為林少梅次子、林陳琅為林癡仙之子；或是林家的書記及其家人，例如莊垂勝為莊嵩之四弟，曾任林獻堂秘書，莊銘瑄為莊嵩之三子，王寶書為林階堂書記。²⁵¹至於楊天佑（本名楊添財）則是林獻堂夫人楊水心之弟。

第一回課題為「歲暮感懷」，成員交卷後，林獻堂批改極為認真，其中瑞騰、資瑞、金生之作頗清順，陳琅則尚未達清順，柏樑則多有未妥，更為不及。對後兩者，獻堂詳加指導。親自教導銘瑄，並鼓勵他若從此繼續努力，10年後則堪為指導者。獻堂認為子弟皆頗熱心，若能繼續一年，定當進步不少。²⁵²

隨後，林獻堂又積極吸收新會員，再增加李春盛、洪元煌、游見龍、連德賢4人，²⁵³也向楊雪霞、蔡旨禪、邱啓明、王達德、張達修、許文葵、王友芬提出邀約。²⁵⁴此後，林獻堂除自己定期出課題，也請櫟社社友傅錫祺幫忙。²⁵⁵會員瑞騰、培英、金生、正昌也常前往林宅與其談詩，或請其改詩，獻堂總不

²⁵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頁358、360、362、364。

²⁵¹ 林獻堂於1940年12月27日的日記記載：「王寶書現為五弟之書記，他亦能詩。」故知王寶書為林階堂之書記。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頁364。

²⁵²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頁363-367。

²⁵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21。

²⁵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頁367-368；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19。

²⁵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204。

厭其煩詳加解釋，令後輩頗有所得。²⁵⁶南投的吳維岳雖未參加，但也來信向獻堂索取詩題，打算自行練習。²⁵⁷

現今留存的「詩學習作」詩題共有 10 餘回，包含「元旦試筆」、「迎年菊」、「探梅」、「喜雨」、「養蠶」、「春日山行」、「書齋初夏」、「柳絮」等，活動至少維持至 1941 年 6 月。²⁵⁸

同時，林獻堂有意中興櫟社。他向來就認為櫟社的存在可以延續漢文的命脈。1935 年 9 月底獻堂打算攀登玉山，途經樂樂時，發覺沿路有不少櫟樹，乃想起莊子謂此樹無用，但其皮卻可為酒瓶塞，成為今日之大用。而櫟社亦然，本以詩為無用，卻不知今日之漢文得以延一線曙光，實有賴該社。²⁵⁹1941 年櫟社成員多已凋零，僅存林獻堂、傅錫祺、張棟梁、王石鵬等「四大金剛」。1941 年 3 月 19 日乃召開櫟社臨時總會，加入林春懷、傅春魁、莊垂勝、王鵬傳、林金生、林資瑞、林培英、蔡柏樑、林陳琅、莊銘瑄為新社員。²⁶⁰前述 10 人，除王石鵬之子王鵬傳外，均為「詩學習作」的成員，可見林獻堂培植後進早有計畫。

不過新成員的漢學根基多半不深，僅有數回「詩學習作」的經驗，必須加強訓練。於是，傅錫祺擬訂計畫，決定每月第一個星期日下午 4 時至 7 時半，舉行「讀詩會」，以研讀陸游的《劍南詩鈔》為主；並要求新社員凡 1、4、7 每日讀七絕 4 首，2、5、8 日每日讀七律 2 首，3、6、9 日每日讀五律 3 首，遇

²⁵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 123、134-135、209。

²⁵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 97。

²⁵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 3、19、51、56、97、134、180、204。

²⁵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35。

²⁶⁰ 傅錫祺，《增補櫟社沿革志略》，頁 5。

10 或 31 日則複習，有餘力者可自由讀其他詩文。²⁶¹讀詩會於該年 4 月 6 日開始進行，前後進行 10 次，最後一次於 11 月 19 日召開。²⁶²

表 6-8 讀詩會歷次活動一覽表

時間	地點	集會內容	參加者
1941.4.6.	霧峰林獻堂宅	讀《劍南詩鈔》，傅錫祺接受眾人質問。	獻堂、錫祺、春魁、垂勝、春懷、瑞騰、金生、金昆、資瑞、陳琅、正昌、玉廉、柏樑、銘瑄、培英
1941.5.25.	臺中楊子培宅	讀陸放翁七絕 52 首、七律 26 首、五律 39 首，有不知其意者，錫祺爲之解釋。	獻堂、資瑞、陳琅、正昌、柏樑、錫祺、石鵬、玉廉、友芬、金生、垂勝
1941.6.8.	臺中楊子培宅	研究二旬間所讀陸詩七絕 24 首、七律 12 首、五律 18 首	獻堂、資瑞、陳琅、金生、正昌、柏樑、培英、銘瑄、錫祺、春懷、元煌、垂勝、玉廉、木耳順
1941.7.6.	臺中陳朔方體仁醫院	垂勝讀七絕 24 首，金生讀七律 12 首，培英讀五律 18 首，有未解者互相質問。	獻堂、銘瑄、柏樑、錫祺、啓明、垂勝、玉廉、木耳順、金生、培英、元煌、德林、鵬傳
1941.7.20.	臺中初音町垂勝宅	讀放翁七絕 24 首、七律 12 首、五律 18 首。	獻堂、培英、金生、資瑞、陳琅、銘瑄、柏樑、

²⁶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 112。

²⁶²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頁 44-45。

			錫祺、啓明、棟樑、鵬傳、玉廉、耳順、德林、朔方、垂勝
1971.8.10.	臺中初音町垂勝宅	讀陸詩七絕 24 首、七律 12 首、五律 18 首。	獻堂、資瑞、金生、陳琅、銘瑄、柏樑、錫祺、耳順、德林、棟樑、玉廉、垂勝
1941.8.31.	霧峰林獻堂宅	讀陸放翁七絕 24 首、七律 12 首、五律 18 首。決議此後廢讀五律，改讀杜詩五古。	獻堂、垂勝、玉廉、耳順、德林、棟樑、春懷、銘瑄、柏樑、資瑞、陳琅、金生
1941.9.21.	臺中陳朔方體仁醫院	杜詩背誦，銘瑄、柏樑合讀「北征」，春懷讀「發秦州」，繼續讀陸詩七絕 24 首。	獻堂、春懷、金生、資瑞、陳琅、銘瑄、柏樑、錫祺、垂勝、春魁、玉廉、耳順、朔方
1941.10.12	臺中大東信託樓上	資瑞、陳琅背誦杜詩五古「鐵堂峽」、「鹽井」、「寒峽」、「青陽峽」、「法鏡寺」、「龍門鎮」六首；垂勝讀陸詩七律 18 首。	獻堂、資瑞、陳琅、正昌、錫祺、垂勝、玉廉、耳順、培英、友芬、子瑜、棟樑
1941.11.9	臺中大東信託樓上	陳琅背誦杜甫「詠懷」五百字，銘瑄讀陸詩七絕，柏樑讀七律。	獻堂、陳琅、正昌、銘瑄、柏樑、鶴亭、垂勝

資料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 135、193、210、242、259、280、305、323、344、379。

五、「漢詩習作會」的舉行

1942年3月開始，林獻堂又籌組「漢詩習作會」。聚會日期是每月第一、三週的星期六下午3時，地點在一新會館圖書室，參加者或作唱詩或作絕句，並指派一人發表演說，談其所讀之詩。會員除林獻堂外，包括林春懷、林金生、林培英、林資瑞、林陳琅、林正昌、莊銘瑄、高春梅、蔡柏樑、王寶書、楊天佑等人，並非全為櫟社的新社員，大多是「詩學習作」的成員，僅高春梅為新人。該會可說是「詩學習作」和「讀詩會」的綜合體。其中金生、陳琅被推選為幹事。²⁶³傅錫祺則應林獻堂之邀，擔任該會的指導者，故每逢集會日，總風塵僕僕自潭子搭車前來霧峰，為漢詩的傳承盡力。²⁶⁴

在往後的集會中，曾有不少來賓出席與會員一起吟詠，包括臺北的李逸鶴、黃景南；彰化應社陳虛谷、陳渭雄、楊笑儂、吳蘅秋；自中國大陸歸臺的吳子瑜也參與過三次，使後輩會員獲益良多。²⁶⁵

然而，由於二次大戰戰局日熾，詩會也受到影響，傅錫祺即曾因警戒警報未解除，而無法前來。²⁶⁶因此，自1942年7月中旬第9回例會後，集會由隔週星期六的定期聚會改為不定期。²⁶⁷依林獻堂日記所記，此會共進行14回，至該年8月底止，其間錫祺與子瑜曾任詞宗，但未必親臨霧峰，有時以通訊閱卷的方式進行。²⁶⁸不過直至隔年2月，仍舉行幾次擊鉢吟會，參加的成員亦類似，只是已不具漢詩習作會之名。²⁶⁹

²⁶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63、65。

²⁶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80、108、121。

²⁶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94、108、154、175。

²⁶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175。

²⁶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179。

²⁶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187、195、201、206、217。

²⁶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217；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年2月19日，未刊稿。

表 6-9 漢詩習作會及其相關集會一覽表

時間	集會內容	參加者
1942.3.7.	獻堂與春懷為詞宗，作「漢詩」第一唱。	獻堂、春懷、金生、陳琅、正昌、柏樑、天佑、銘瑄、春梅
1942.3.22.	春懷講話，繼作七絕，題曰「春早」二蕭韻。	獻堂、錫祺、培英、資瑞、陳琅、正昌、春懷、天佑、柏樑、銘瑄、春梅
1942.4.4	獻堂與逸鶴為詞宗，作擊鉢吟，題為「曝書」先韻七絕。天佑講話，談其所讀蘇詩。	獻堂、金生、培英、陳琅、資瑞、正昌、天佑、寶書、銘瑄、春梅、臺北李逸鶴、黃景南
1942.4.18	金生講話，談崔顥之詩〈黃鶴樓〉。作擊鉢吟，題為「養花」七絕魚韻，詞宗楊天佑、王寶書，左取春梅為元，右取渭雄為元。	獻堂、錫祺、金生、資瑞、陳琅、正昌、寶書、銘瑄、春梅、天佑、彰化應社陳虛谷、陳渭雄、楊笑農、吳蘅秋
1942.5.2	培英講吳梅村詩一篇。作擊鉢吟，題曰「歸舟」麻韻七絕，銘瑄、春梅為詞宗，鶴亭、天佑為左、右元。	獻堂、錫祺、子瑜、洪元煌、連德賢、金生、資瑞、培英、正昌、陳琅、春懷、柏樑、銘瑄、春梅、天佑
1942.5.16.	柏樑談其所讀白居易詩十餘首。開擊鉢吟，題曰「禽聲」東韻七絕，左、右詞宗培英、銘瑄，取銘瑄、榮鐘為左、右元。	獻堂、天佑、金生、培英、正昌、陳琅、春懷、柏樑、銘瑄、春梅、榮鐘、玉廉

1942.6.6.	作「野望」七絕東韻，榮鐘、銘瑄為詞宗。	獻堂、錫祺、子瑜、見龍、德賢、培英、正昌、資瑞、寶書、春懷、柏樑、銘瑄、春梅、垂勝、榮鐘、天佑
1942.6.20.	作「讀書消夏」江韻，詞宗春懷、一泓。	獻堂、春懷、柏樑、耳順、金生、資瑞、正昌、陳琅、天佑
1942.7.4	作「觀畫」支韻七絕，左右詞宗獻堂、耳順。	獻堂、子瑜、耳順、培英、金生、資瑞、陳琅、正昌、春懷、柏樑、銘瑄
1942.7.19	作「景薰樓夜話」微韻七絕，將寄與錫祺評選；又共擬五律課題「暴風」，限至三十日交卷。	獻堂、春懷、培英、陳琅、銘瑄、春梅、柏樑、寶書、坤山
1942.7.27.	作「撲蚊」魚韻七絕，詞宗錫祺。	獻堂、春懷、培英、金生、資瑞、陳琅、正昌、天佑、柏樑、銘瑄、春梅
1942.8.3.	作擊鉢吟，題曰「觀棋」齊韻七絕，詞宗錫祺。	獻堂、陳虛谷、垂勝、春懷、培英、天佑、金生、陳琅、銘瑄、錫祺
1942.8.12.	作擊鉢吟，題曰「捉蛙」佳韻七絕，詞宗錫祺。	獻堂、春懷、金生、培英、資瑞、柏樑、銘瑄、坤山
1942.8.23.	作擊鉢吟，題為「聞鐘」灰韻，將使子瑜為詞宗。	獻堂、春懷、金生、培英、資瑞、陳琅、正昌、柏樑、銘瑄、坤山
1942.11.24.	本預定作擊鉢吟，因人數少，乃改作宿題「鬥雞」七絕十一真韻，明後日交卷，詞宗錫	獻堂、培英、銘瑄、春梅、柏樑、正昌

	祺。	
1943.2.19.	作「元宵無月」支韻七絕之詩	獻堂、春懷、金生、陳琅、正昌、 銘瑄、柏梁

資料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 65、80、94、108、121、135、154、165、175、180、187、195、201、206、217、301；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 年 2 月 19 日，未刊稿。

林獻堂於 1943 年又思振衰起弊，重組「漢詩習作會」，改以讀書和作詩為主，因於每週五召開，又稱「金曜會」。所讀之書是《史記》各列傳，會員並立規約，規定每週五集會時交出詩作，最少者一首，若不交卷，須出金 1 圓作為會費。會員包括春懷、寶書、金生、培英、資瑞、柏樑、銘瑄、正昌、天佑、春梅及獻堂等人，林瑞騰、劉集賢則為旁聽者，作詩與否任其自由。²⁷⁰可見成員與過去大都相同，僅是聚會的內容有所變革。

在成員之中林培英曾作「可人」第五唱四聯，其中佳者有二聯，林獻堂甚喜其進步之速。²⁷¹不過，由於每週集會一次，次數過於頻繁，許多成員後來常因雜務而缺席，王寶書更因不出席又不交詩多達 10 回，而決議聽其自由退會。²⁷²至第 14 次集會，僅有獻堂與天佑、柏樑、陳琅 4 人參加，其餘諸人培英喪子，²⁷³銘瑄病瘡，正昌住富士溫泉，金生、資瑞因組合事忙，皆不出席亦不交詩，而春懷沒有任何理由亦不交詩。²⁷⁴不過林獻堂仍勉力維持，至該年 10 月 22 日，第

²⁷⁰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 年 3 月 5 日、12 日，未刊稿。

²⁷¹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 年 4 月 6 日，未刊稿。

²⁷²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 年 5 月 21 日，未刊稿。

²⁷³ 林培英的長子林中秀於 1943 年 6 月 1 日，因腹痛過世。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 年 6 月 2 日，未刊稿。

²⁷⁴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 年 6 月 4 日，未刊稿。

33 回集會時，獻堂認為立約會員開始頗熱心，後漸次冷淡，近來有作詩者只有3、4人而已，遂提議解散，眾人皆同意，而正式劃下句點。²⁷⁵

綜合上述，從1940年12月開始的「詩學研究」，至1943年10月底結束的「漢詩習作會」，林獻堂為了提昇林家子弟及有志者的漢詩水準，並重振櫟社，整整努力了將近3年，其間集會內容屢有調整，並延聘傅錫祺前來指導，顯示其企圖心。惜因成員日漸疲乏，而使集會虎頭蛇尾，終至解散，但獻堂的用心仍值得肯定。

在受獻堂指導的後輩中，個人詩學的成就日後各不相同，曾加入櫟社的林陳琅，晚年接受訪問時表示他不是很了解櫟社的事，似乎年輕時習詩之事已經淡忘；²⁷⁶莊銘瑄則於戰後出任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研究委員、瀛社副社長、網溪詩社顧問、中華詩學雜誌社副社長等職，並有詩集《紅梅山館詩存》行世，是戰後頗負盛名的漢詩人；高春梅為莊銘瑄之妻，亦是知名的女詩人，著有《雪芬小草》，莊、高兩人的詩集合編為《紅梅山館詩文集》出版。²⁷⁷莊氏夫妻能有此等成就，其基礎應是當年參加「漢詩習作會」時奠定。

除了舉辦詩會，林獻堂對當時僅存的漢文雜誌《風月報》、《南方》、《詩報》亦不吝給予金錢上的資助，因他認為當此漢文將廢絕之時，若力之所能及，即當加以援助。²⁷⁸自1943年3月8日起，更每日親自教其孫博正讀《初等實用漢文讀本》，²⁷⁹使其具備漢文基礎。

六、林獻堂的理念

²⁷⁵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年10月22日，未刊稿。

²⁷⁶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陳琅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136。

²⁷⁷ 莊幼岳、高雪芬合著，《紅梅山館詩文集》，書後著者簡介。

²⁷⁸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頁361；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108、314。

²⁷⁹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年3月8日-5月5日。

獻堂如此重視漢文的傳承，實與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漢文教學的時局有關。不過，他也有值得注意的一些想法。1935年5月林獻堂與臺中州知事竹下豐次談論漢文之必要，林氏表示臺灣人口每年增加10餘萬人，將來必有人滿之患，²⁸⁰欲解決人口問題，必使其往華南、南洋發展，往華南、南洋發展，非識漢文不可；而日常生活亦須漢文。竹下則認為學校若增設漢文科，會妨礙日語普及，是絕對不可行，若云日常必須，則暫時忍耐以等待日語普及即可。林獻堂回稱：他並不奢望學校能增設漢文科，只盼望書房能獲得認可及研究會不受干涉，使20歲以上未識日語之人得以略識文字。²⁸¹5月底林獻堂與總務長官平塚廣義會面時，亦重申前意，力言漢文教育之必要，但平塚僅言南洋發展，而不言漢文之獎勵。²⁸²

同年12月底，林獻堂接受大阪每日新聞臺中通信部主任大久保久雄訪問，談及新年新希望時亦表示，最重要者是教育，以臺灣人口每年增加10餘萬人，若再30年則將近千萬，必有人滿為患之日。現時總督府盡力獎勵日語普及，身為日本國民能說日語雖甚利便，但若僅因人民能說日語，便認為統治成功是大不然。認為當局對於島民施以實用的教育，使其能具備前往華南、南洋謀生之學問，實為當務之急。²⁸³

1937年4月，報紙全面廢除漢文欄（《臺灣新民報》在6月），林獻堂的反應是臺灣人大多數不能讀日文，欲涵養精神、灌輸文化非漢文不可，驟然廢除漢文，無異是倒行逆施；而臺灣人前往華南、南洋謀生亦從此失去矣，豈不

²⁸⁰ 依陳紹馨研究，1930年臺灣人口為4,592,912人，1940年為5,981,543人，總人口在1896至1943年的48年間增加一倍半，成長甚為快速。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頁97、99-100。

²⁸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11。

²⁸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20；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129。

²⁸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468。

哀哉。²⁸⁴月底，獻堂拜訪總督小林躋造，再次強調臺灣有人滿之患，宜開一華南、南洋發展之路。但總督拿九州與臺灣作比較，認為臺灣似無人口過剩的問題，但華南、南洋之發展可未雨綢繆。²⁸⁵

由此可見，林獻堂認為臺灣正面臨人口爆炸的問題，日後向華南、南洋拓殖，乃勢所必行，故漢文為不可或缺，普及漢文實有助於臺灣人口對外移植；且不識日文的臺人日常生活亦需漢文。但日本當局雖認同向華南、南洋發展的想法，但不認為實行南進就須推廣漢文，而且增設漢文課程會阻礙日語的普及，故兩者無法達成共識。

除林獻堂外，其餘傳統文人亦極重視漢文的傳承，前已提及陳懷澄於 1932、33 年在黃竹坑教授林家年輕女輩漢文；張棟梁則於 1939 年間在何厝經營書房，但至 1943 年 1 月遭州當局下令解散；²⁸⁶1906 年新港地區唯一傳習漢文的登雲書院因地震倒塌後，林維朝便在林家古厝怡園開館授徒。²⁸⁷王開運平日常一再訓示子女漢文極為重要，將來必有所用；²⁸⁸至於傅錫祺，其子姪雖均接受新式教育，但 1921 年，他仍趁其回家過暑假時，親自教授漢文。惟他們的學習態度欠佳，讓錫祺感嘆猶如朽木不可雕，漢文課程遂不到一月即終止。²⁸⁹但他傳授漢文的熱忱並未減退，該年 10 月 6 日又為林金鐘、呂通銘、廖春華、簡滄海、林耳順、林西陸諸人講《孟子》。²⁹⁰

不過，傳統文人致力於漢文教學，除了文化上的使命外，對於部分不擅日語者而言，漢文亦是他們唯一謀生的工具。例如陳懷澄結束黃竹坑的教職後，

²⁸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121。

²⁸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146。

²⁸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 93；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 年 1 月 18 日，未刊稿。

²⁸⁷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36。

²⁸⁸ 王紹齋，〈王開運先生事略〉，收於王開運，《杏庵詩集》（臺北：王駿嶽，1988），頁 7。

²⁸⁹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 年 7 月 8 日-26 日，未刊稿。

²⁹⁰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21 年 10 月 6 日，未刊稿。

生活無著，打算在霧峰謀一教職；²⁹¹張棟梁則在 1937 年 2 月拜託林獻堂，想在林烈堂處當家庭教師兼辦庶務，因他曾會見郡視學，知道書房的來日無多。²⁹²因此，漢文的廢止對未接受過新式教育的文人而言，確實造成其生計上的影響。

七、小結

林獻堂開辦「一新義塾」，組織「一新詩文研究會」、「詩學習作」、「漢詩習作會」等團體，並吸收新成員以振興櫟社，顯示其將延續漢文視為是最重要的使命。考其動機，除了因應漢文日漸遭打壓的危機感之外，亦認為漢文是日後臺人向華南、南洋發展不可或缺的工具。其餘傅錫祺、陳懷澄等傳統文人亦積極延續漢文。顯示即便傳統文人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吸收西洋的各種學說，熱中於體驗新科技及西式運動，但仍盡力捍衛代表漢人文化命脈的漢文。

²⁹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6。

²⁹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81。

結論

傳統文人係指曾受漢學教育，在日治時期仍堅持以傳統漢詩文為主要創作者。他們多屬社會領導階層，是社會風氣的引導者，為社會觀瞻之所繫，亦是漢文命脈的維繫者，在以漢人為主體的臺灣社會相當重要。

關於文人身份的認定，至少需具備下列條件之一：一、是詩社或文社的成員，或曾參與詩、文社的活動。二、漢詩文作品曾刊登於報章，或收錄於時人編纂的詩集，或見於詩會的徵詩或課卷。如此，才算獲得社會輿論的承認。

根據本論文初步探討之結果，乙未割臺之初雖然許多傳統文人內渡躲避戰亂，但由於故鄉謀生困難、為維護在臺產業等因素，基於現實考量，迨局勢稍定後便又回臺，選擇成為日本帝國的臣民。由於具備讀寫能力的傳統文人多是地方領導階層，其言行對一般百姓具有影響力，因此，日治之初總督府便以頒授紳章、參與基層行政、官紳唱和、表彰節孝等手段加以懷柔籠絡，多數傳統文人也接受當局的禮遇，以確立高於一般平民的地位，但其行為則出現一些矛盾。例如莊士勳雖接受紳章，卻拒絕日人之聘，且對林紀堂被選為孝廉之事感到鄙夷；謝道隆自築生墳，看似佯狂遁世，卻出任烏牛欄第一保保正和葫蘆墩公學校學務委員；傅錫祺擔任潭子庄長長達 17 年，協助日方處理地方事務，卻仍以遺民自居。顯示傳統文人雖接受日人統治的政治現實，但其漢人民族意識並未消失，以致出現不少矛盾難解的行為。

在日人的籠絡下，擔任基層公職的傳統文人甚多，但這並非名譽職，日常工作可謂相當繁瑣。以傅錫祺而言，要負責監督灌溉區域分配、水圳修繕、廟宇改建，還要與日人官員送往迎來，幾乎終日不得閒；擔任保正的張麗俊則要負責維護清潔、指揮修路巡邏、安排種痘期日、報導相關慣習、迎送官府人員等。由於工作繁瑣，因此平日難免有怨言。

不過，對於總督府推廣日語、普及公學校、斷髮易服等施政，傳統文人大多配合。其之所以配合，在於認為接受新式教育、斷髮易服是文明或現代化的

表徵，而學習日語則可與現代潮流接軌，故不因民族意識的考量而抵制。例如詩人林癡仙學習日語頗為熱心，先後要求櫟社社友、警察等擔任其日語教師；林紀堂亦曾請警察至其宅教他日語；林獻堂學習日語也頗為勤奮，曾買日語讀本自習，每日至少一小時，乃能以日文寫信，並以日文宣讀結婚介紹詞。

接受新式教育的傳統文人為數不少，例如林佛國、魏清德、陳貫等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黃旭東和林玉書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傳統文人的子女亦競相接受新式教育，例如謝道隆之子謝秋濤、袁炳修之子袁錦昌、傅錫祺之子傅春魁均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林幼春長子林培英、林耀亭次子林湯盤、黃純青次子黃及時、楊仲佐三子楊佐三郎均留日，畢業於著名大學。在斷髮易服方面，1911年瀛社即有多名成員參加「斷髮不改裝會」，向社會大眾鼓吹斷髮；至1912年櫟社成員幾已全數斷髮，可見他們內心並未抗拒斷髮。

傳統文人與日人時有往來，特別是漢詩的交流切磋，即使是一些較具民族立場的傳統文人亦然，林幼春與施梅樵均曾與久保天隨互相唱和；林幼春特別贈詩給其子之師，以表達謝意。在日常生活中，與日人官員互動良好，例如林紀堂與臺中廳長枝德二關係良好，其二子透過枝德二之協助，前往東京入學；林維朝與日人教師常以詩酒相唱和。至於林獻堂，則與多位總督和不少日人名流有深厚的交情。

曾前往日本旅遊的傳統文人為數不少，其中，許多人是前往日本參觀博覽會，並欣賞日本的名勝風光。例如1903年林維朝參觀大阪天王寺舉行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1907年又至東京上野公園觀看「東京勸業博覽會」；王石鵬和鄭神寶則於1914年參觀大正博覽會。由於博覽會是日本帝國向全世界展示國力，總督府和日本民間也希望藉此機會讓臺灣人民能見識殖民母國的各種建設，因此大力鼓勵臺人赴日觀覽博覽會。¹前往日本的傳統文人看到日本精心安排的一面，同時，對其自然風光之美、都市的繁華熱鬧、工業機械和農業的進步、國民的良好素質均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因此深化對日本的認同。

¹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論述》，頁136-137。

關於傳統文人的中國情懷，首先表現在緬懷清代臺灣，有許多詩作以劉銘傳為題材，高度肯定其推行新政及防衛臺灣的貢獻，並流露出江山易主的喟嘆。雖然劉銘傳在臺的施政並非一無缺失，但傳統文人卻選擇替其隱惡揚善，只記憶自己願意記憶的部分，顯示他們對清廷治台的懷念。

其次，日治時期臺灣與中國在文化上仍有密切的交流，蔣渭水的文化書局、莊垂勝的中央書局、連雅堂的雅堂書局、黃茂盛的蘭記書局均引進中國圖書至臺灣販售。因此，傳統文人得以知悉中國時事動態，並表現出高度的關切，舉凡義和團事件、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等中國近代史上重大變革，均成為其吟詠的題材，張麗俊與林獻堂甚至在日記中仔細抄錄報紙上有關中國時事的新聞。然而，身為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除了關切，也無法有所作為。

長年處於戰亂的中國，在基礎建設和人民素質上自然難以和臺灣相比。曾赴中國的王石鵬、魏清德等人均對中國印象不佳，認為當地醫療衛生落後。傅錫祺則表示中國的風土民情、行政均頗為劣敗，但其中國情懷並未因此而完全消散。蔡惠如雖因嚮往中國，而變賣家產至福州定居，卻因事業失敗，以窮困收場。吳子瑜雖於 1937 年移居北京，但也因未獲大利，最後仍選擇回臺終老。

關於對西洋文明的迎拒，傳統文人對溫度計、眼鏡、望遠鏡、鬧鐘等小東西，乃至工廠中的機器、電燈、火車、飛機、留聲機、電話、電報等西洋新發明均有高度的興趣，甚至讚嘆不已，漢詩中有大量以現代新事物為題材者。由於西洋文明進入臺灣與總督府的現代化建設有關，使得傳統文人接受現代性的同時，無形中合理化日本的統治。

傳統文人擁抱西方物質文明的同時，對西方的精神文明亦有不少思索，特別是男女社交自由、自由戀愛等西方觀念被不少文人視為毒蛇猛獸。尤其對 1930 年代社會風行的跳舞提出不少抨擊。傳統文人認為女子豔妝麗服，並與男子相擁起舞，有違風化，與禽獸無異。然而，有不少文人注意國際時事，具備西洋的歷史地理知識，並努力吸收科學新知，也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進而反思臺灣的地位，而投入同化會、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

活動。大體而言，傳統文人大多不解外語，其對西方思潮的認識多透過翻譯作品，或是中文的評介文章，而無法有深入的理解。²

由於接觸現代的文明，傳統文人的生活觀念與習慣也出現改變。首先是婦女觀念的改變，早期傳統文人多以高道德標準要求女性，例如三從四德、夫死守節之類，然而本身卻三妻四妾，並以出入風月場所為風雅，蔡惠如和吳子瑜更因與妾的感情瓜葛而滋生一些風波。後來開始有主張女子應受教育、男女平等、肯定職業婦女、贊同女子體育的言論出現，不過仍多侷限於男主外、女主內的框架中，而且文人之間仍存在著個別差異。傳統文人日常娛樂除了園藝、棋藝、觀賞戲曲及廟會活動、旅遊等傳統娛樂外，也流行看電影、參觀展覽會、聽留聲機、賽馬等西式消遣，甚至在海水浴場游泳、打撞球等。一些本身不運動的文人亦喜愛觀賞運動會，顯示雖未身體力行，但並不排斥體育。

在傳統文人的娛樂中，參觀博覽會、前往獲票選為「八景」之地旅遊等，均是觀看官方刻意展示的部分，因此容易肯定日本在臺灣的建設。例如張麗俊遊覽石門大圳後，認為此地若仍歸清政府治理，將永為原住民活動之所，不可能出現如此巧奪天工的工程，而高度評價建設水圳的日本政府。

傳統文人最重要的休閒仍是參加詩會，向來研究者多將詩社活動視為是傳統文人延續漢文與維繫民族意識的表徵，實際上未必盡然，1920年代以後傳統詩社的詩會與賞園、登高、觀月等餘興節目相結合，而漸趨向通俗化，其社交及娛樂功能大於文學性質。儘管如此，其延續漢文的一面仍不應完全被抹殺。

關於傳統文人與社會教化，由「霧峰一新會」舉辦的活動中，顯示婦女積極的參與。該會主辦過多次婦女集會，旨在鼓勵婦女向學及培養演講的能力。在日曜講座 200 回的演講中，女性演講者甚至還多於男性，女講員的講題多與婦女議題有關，提供婦女一個絕佳學習的舞台。一新義塾首重漢文教學，1937

² 以林獻堂而言，葉榮鐘認為他雖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但是平時讀書甚勤，對於歐美的文物史地有廣泛的涉獵，對西方的思想雖有相當的理解，但因不解外國文字而未能深入。葉榮鐘，〈林獻堂先生簡歷〉，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2。

年 4 月 1 日全面廢止公學校的漢文課程，導致一新義塾關閉，但是林獻堂仍持續致力於延續漢文，顯示在傳統文人心中漢文仍是最重要的堅持。此外，「霧峰一新會」亦引進不少西洋的新思潮，其慶祝活動亦以運動會、音樂歌舞表演等新形式出現。

過去提及傳統文人，常強調其堅守民族大義、義不臣倭、排斥西洋文明等。然而，本研究發現，多數傳統文人在改朝換代後均配合時勢的變化調整步伐，力求適應。例如日治之初嘉義秀才黃服五、宜蘭秀才蘇壁聯入學國語傳習所，徐杰夫志願就讀嘉義公學校國語（日語）速成科。這種對局勢的適應，林紀堂表現得尤其明顯，對莊士勳的批評，他回應道：「此人之腐儒輩，於此可見一斑〔斑〕，不識時勢之人，僅知自己為清時舉人，而不知世界之變遷耳。」³顯示林紀堂認為掌握時勢變遷，並配合潮流作一些改變，為極其重要之事。這種順應時勢和知曉世界變遷之觀念，亦即一方面必須接受日本統治的現實，另一方面必須趕上世界現代化的腳步。

與林紀堂想法相似的傳統文人為數不少，因此，他們接受日本的紳章和表揚狀，擔任基層公職，協助日人治理地方。同時，支持新式教育、學習日語、積極吸收西洋文明、斷髮易服等。

不過，傳統文人雖力求調適，但只接受有助於改善生活的新發明或能調劑身心的西式娛樂，對與傳統思想有所抵觸的活動和觀念仍頗為排斥。例如張麗俊極為讚嘆能使夜晚變為白晝的電燈、縮短空間距離的火車、節省人力的工廠機械，也愛觀賞運動會，但對男女相擁跳舞完全無法接受；林獻堂以打高爾夫、玩撞球、看棒球、游泳、賽馬為日常消遣，但對自由戀愛仍有所保留。於此可見，傳統文人已將追求現代化置於首位。

同時，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推行各種現代化建設，部分傳統文人由於認同現代化，進而肯定日本的統治。例如魏清德認為臺灣住民多是漳泉移民，但台灣在日本治理下吸收新文明而快速進步，反觀福建卻依然停滯不前。林文華

³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1915年7月7日，未刊稿。

和林佛國亦頗為推崇日本的施政，分別稱許日本治臺「於今島治誇寰宇」、「文物昌明寶庫開」。此外，傳統文人頗為重視日本官方給予的榮譽，例如傅錫祺將歷次獲得的官方表揚，紀錄於所撰的〈生平紀要〉中；林獻堂替林耀亭寫弔辭時，亦不忘提及 1935 年林耀亭受邀出席於新宿御苑舉行的觀菊會，是其最為光榮而終身不忘之事。⁴至於謝汝銓則與多位總督、民政長官均有交際往來，與官方關係頗為友好。

由於總督府對臺民實施差別待遇，多數傳統文人並未自覺是日本人，林獻堂、蔡惠如均為同化會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積極奔走，且組織「無力者大會」反擊辜顯榮、林熊徵呼應日本當局看法的「有力者大會」；張麗俊雖未積極投入民族運動，但多次出席聆聽相關的演講；傅錫祺則作詩稱讚文化協會辯士口若懸河，並認同其所傳播的觀念。1930 年 3 月，當連橫站在日本當局立場，支持臺灣鴉片特許政策，贊成核發新的吸食鴉片牌照時，陳懷澄即指責連橫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林獻堂則痛斥連橫誣蔑先民，為寡廉喪恥之輩，明白顯示傳統文人的漢人意識。

如前所述，張麗俊肯定日本興建石門大圳等現代化建設，卻又心向民族運動；傅錫祺重視日本官方授予的榮譽，卻又自稱遺民；陳懷澄擔任鹿港街長達 12 年，協助日人治臺，卻又批評附和日本當局立場的連橫無恥和無氣節。顯示傳統文人與日本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並非全然的依從或對立，而是依其自身的觀念或需求，有其彈性，在抵抗與合作之間存在著灰色地帶。

除了個別行為的矛盾外，在政治現實環境與漢民族身份的拉鋸下，傳統文人的回應方式並不相同，有人與執政者較親近，有人較疏離，有人至中國定居投資。不過，最重要的是在新時代能維持生存，而非完全拘泥於民族意識的考量。

傳統文人最大的共通點是對漢文的堅持，特別是 1922 年新「台灣教育令」公布，公學校漢文科被改為選修科目後，危機感日生。他們透過參與詩社、設

⁴ 林獻堂，〈弔辭〉，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附之〈哀輓錄〉，頁 11。

塾授徒的方式，延續漢文的命脈。此外，傳統文人係透過彼此生日、婚喪喜慶、遠遊歸來或即將出遊時舉辦集會，建立社會網絡，以維繫同儕間的凝聚力。

臺灣的主權由清廷移交給日本，傳統文人無疑是最難適應的一群，特別是未曾接受新式教育者，畢生努力的科舉文章一夕之間淪為棄學，其處境的艱難實與接受日本教育者在戰後所處的挑戰相似。據統計，日治時期公務員總數 84,559 名，其中，臺灣人 46,955 人。但 1946 年時，在臺灣省公務員 44,451 人中，臺灣人僅有 9,951 人，約 36,000 名臺灣人失去公職，主因是他們不會說國語。⁵由於受過日本教育的臺灣人，在現實上不可能再接受正式的國語教育，無法掌握新語言的讀聽寫而形成語言斷層，導致整個世代被犧牲。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變成文盲。在文學創作方面，在日治末期成名的臺灣作家中，鮮有人能改用中文寫作。⁶日治初期的傳統文人同樣面臨政權更易和語言轉換的問題，不少人乃順應時事進入國語傳習所就讀，以謀取發展。不過較幸運的是，因他們多為領導階層，而成爲日人籠絡的對象，未被徹底犧牲。

日治時期傳統文人以漢文相聯繫，同樣的，戰後漢文也成爲與來臺的外省官員、文人溝通的工具。例如 1946 年蔣介石總統 60 歲華誕時，臺灣各界祝壽委員會進行徵詩以表祝賀，林獻堂、黃純青、謝汝詮、魏清德等人即被聘爲評選人，於臺灣省參議會樓上會商評選。⁷1953 年曾今可⁸編集的《臺灣詩選》

⁵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 116-120。

⁶ 周婉窈，〈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頁 114-115。

⁷ 曾今可，〈編者序〉，收於曾今可編，《臺灣詩選》（臺北：中國詩壇，1953），頁 12。

⁸ 曾今可：名國珍，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對日抗戰期間曾任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負責各戰區及敵後的文化宣傳工作。抗戰勝利後，來臺擔任上海《申報》駐台特派員，並兼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講師。1946 年夏天因於報端抨擊「臺北號」走私問題，而被陳儀逮捕，後被軍方保釋。後任正氣出版社總幹事，主編《正氣月刊》。1948 年任臺灣省通志館主任秘書，翌年省通志館改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仍任主任秘書。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

中，除收錄臺灣文人吳萱草、吳燕生、林佛國、曹秋圃等人的詩作外，亦收有于右任、孔德成、張大千等來臺外省人士的作品。⁹顯示臺灣文人已藉由共通的文字與外省籍人士互動，一如日治時期他們與日本文人的交流。

曾今可為戰後初年推動本省和外省文人交流的重要橋樑。其主持的《建國月刊》（1947年創刊，每期有「臺灣詩壇」，後改為《臺灣詩報》獨立出版）、《臺灣詩報》（1949年創刊）中刊登舊體詩，作為本省詩人與外省詩人共有的園地。在《臺灣詩報》的「臺灣詩壇理監事名單」中，林獻堂、黃純青為理事長，黃水沛、謝汝銓、魏清德、林佛國等人為理事。曾今可認為日治時期是臺灣詩學的全盛時代，而給予高度肯定；且曾因批評陳儀而入獄，其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熟諳日文，故容易與臺人親近，鼓舞了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人的士氣。¹⁰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是漢文的延續者，同時，多屬社會領導階層，擔任基層公職者協助日本當局治理地方，對社會的穩定相當重要。他們也是社會教化者，例如林獻堂透過「霧峰一新會」，將自己吸收到的新學說和新觀念傳達給鄉里民眾。因此，日治時期這一立足於傳統、但不排斥吸收新事物的群體極為獨特且重要。

不過，傳統文人畢竟是一個龐雜的群體，雖對漢文有共同的熱愛，但思想觀念每人均不相同。以對劉銘傳的懷念而言，林癡仙談到劉銘傳，會對台灣淪日的現況有所感慨；但滿意日本統治的林佛國，則認為日本的現代化建設可告慰劉氏在天之靈。再以對婦女的觀念為例，林獻堂向來較開明，常鼓勵其妻參與公共活動；但張棟梁和陳槐庭則反對男女平等。張棟梁認為台灣婦女驕悍，陳槐庭以為女性善嫉妒而好虛榮，張、陳兩人的性別偏見並未隨時代的進步而消失。要之，日治時期傳統文人在臺灣社會中雖處於同一象限，但每人所在的

詩壇（1945-1949）》，收於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 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頁291-292。

⁹ 曾今可編，《臺灣詩選》，頁4-5、66-67、69、117-119、176、216-217。

¹⁰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頁291-296。

座標位置不相同。是以，本文所描述者僅代表傳統文人的一些共相，未必適用於每一個傳統文人。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之課題，仍有不少問題可探討，例如傳統文人對儒學的看法和對新文化運動的回應、女性傳統文人的思想及其表現等即是。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姓名 (字號)	生卒年	住地	教育背景	公職經歷	職業	參加 詩社
顏雲年 (吟龍)	1874-1923	基隆	書塾修讀漢籍， 曾應童子試未 中。	1896 日軍瑞芳守 備隊通譯、瑞芳 警察署巡查補、 1921 臺灣總督府 評議會員。	1914 承包藤田組 金礦探掘，1918 購買藤田組瑞芳 金礦權，共組臺 北炭鑛株式會 社，1920 易名臺 陽鑛業株式會 社。1918 與三井 財閥合資創設基 隆炭鑛株式會 社。	瀛社
許梓桑 (迺蘭)	1874-1945	基隆	淡水縣庠生。	1920 基隆區長、 1921 基隆街助 役、1937 臺北州 會議員、州協議 會員。		瀛社、 大同吟 社
洪以南 (文成、 逸雅、墨 樵)	1871-1927	艋舺	1895 秀才。	1897 辦務署參 事、1907 臺北廳 參事、1914 淡水 區長。		瀛社
黃茂清		艋舺		日治之初任職艋 舺保良局、1987 臺北辦務署雇 員。	1900 大稻埕公學 校教師。	

* 日治時期曾發表漢詩、文作品，並參與詩社活動的傳統文人為數眾多，此處僅列出在文壇較活躍和生平事蹟較詳細者，遺漏必多，望讀者諒囑。

李秉鈞 (子桂、 石樵)	1844-1904	艋舺	1872 秀才，1892 會試中式，補為貢生。	1900 臺北縣參事、1903 臨時舊慣調查會事務囑託。	1900 公學校教師、《臺灣日日新報》編輯。	
陳洛 (淑程、 菊町)	?-1911	艋舺	秀才。	1899 臺北縣參事。		瀛社
吳昌才	1883-?	艋舺		1901 臺北縣事務囑託、1911 艋舺區長、1927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瀛社
黃朝桂 (丹五、 應麟)	1851-1916	艋舺		艋舺街長、區長。		瀛社
王承烈 (人俊、 采甫)		艋舺	秀才			瀛社
倪炳煌 (希昶)	?-1951	艋舺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		雖非律師，但長年從事司法工作。	高山文社、瀛社
駱子珊 (網川、 鐵花)		艋舺			臺灣倉庫株式會社松山出張所主任。	瀛社、高山文社
王慶忠 (溫和)		大龍峒		保良總局董事、1897 臺北縣參事、臺北廳參事。	食鹽販賣。	
陳復禮 (克恭)	1880-?	松山	幼習漢學。	松山庄長、松山庄協議會員	松山信用組合長、松山自動車公司長、臺北養豚組合長。	
王少濤 (雲滄、 肖陶、小 維摩、木 瓜庵主人)	1884-1948	土城	師事趙一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		任教臺廈間達 10 年。	瀛社、詠霓詩社、劍樓吟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77

趙文徽 (一山、 劍樓)	1854-1927	臺北 板橋	科舉落第，無意 仕進。		漢醫、書房教 師。	劍樓吟 社
黃玉階 (莫華)	1850-1918	臺北	隨黃邦習文。	1900-1917 大稻 埕區長、1910 兼 大龍峒區長。	漢醫。	瀛社
林述三 (纘、怪 星)	1887-1957	臺北	幼學於廈門玉屏 書院、從父林文 德習漢文。		於稻江開設礪心 齋書房。	瀛社、 研社、 星社、 天籟吟 社、松 鶴吟社
楊仲佐 (嘯霞、 網溪)	1875-1968	臺北			《臺灣日日新 報》記者	瀛社
魏清德 (潤庵)	1886-1964	臺北	1906 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師範部 畢、普通文官考 試及格。	臺北市社會事業 委員、市學務委 員。1935 臺北州 協議會員、臺北 州會議員。	中港公學校訓 導、1910《臺灣 日日新報》編 輯，後升漢文部 主任。1915 臺灣 勸業無盡會社監 察役。	詠霓詩 社、瀛 社、竹 社、星 社、南 雅吟社
黃水沛 (桂舟、 春潮)	1884-1959	臺北	少時與從陳維英 婿黃覺民習經 史。1903 年臺灣 總督府國語學校 國語部畢。		公學校教師、臺 北州米穀同業公 會常務理事。	星社、 瀛社
林馨蘭 (湘沅、 六四居 士)	1869-1923	臺北	生員，兩度鄉試 未中。		《全台日報》、 《台南新報》、 《臺灣日日新 報》記者。1918 太平公學校漢文 教師、書房教 師。	南社、 瀛 社、 星社、 萃英吟 社
謝汝銓 (雪漁、 奎府樓 主)	1871-1953	臺北	22 歲成秀才、臺 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畢。	任職總督府學務 課，參與編輯 《日台會話辭 典》，後任總督 府警察官練習所 教務。	《臺灣日日新 報》漢文版、 《風月報》主筆	瀛社

林佛國 (澤生、 石崖)	1885-1969	臺北	1903 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師範部 畢。	1924-1930 臺北 州協議會員。	深坑公學校訓 導、1909《臺灣 日日新報》記 者、漢文部總編 輯。1918 創設景 美購買販賣利用 組合，任組合 長。	瀛社
曹秋圃 (容、澹 廬)	1895-1993	臺北	師事何浩廷、陳 作淦。		1912 在桃園開塾 授徒、1916 回稻 江教漢學書法、 1935 廈門美專書 法講師、1940- 1946 日本頭山書 塾和大藏省附屬 書道振興會書法 講師。	瀛社
劉廷玉		大坪 林		日治初期任保良 局長、1899 臺北 地方法院顧問、 1907 深坑廳參 事。		
李種玉 (稼農)	1856-1942	三重	1879 秀才，1882 補廩生，1893 拔 貢生。	1895 保良局幫辦 事務囑託、1897 三重埔保良局 長。	1900 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教務囑 託，1920 日本文 部省中學教師漢 文科檢定考試及 格，改聘為助教 授。	鷺洲吟 社
林清敦 (崇禮)	1890-?	鷺洲	關渡黃君修門下 習漢學、16 歲入 公學校。	1910 土地整理委 員、二重埔區 長、鷺洲庄協議 會員、1922 鷺洲 庄協議會副議 長。	三重埔信用組合 長	鷺洲吟 社、瀛 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79

李騰嶽	1895-1975	鷺洲	1917 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1940 獲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博士學位。師事張西袞、陳作塗及蔡宜甫諸氏，其詩學於趙一山。		台北醫院小兒科醫師、1920 於台北市太平町開業。	星社
林青山		新店		街協議會員。	棉布商	南雅吟社
黃炳南 (純青、晴園老人)	1875-1956	樹林	幼從王作霖受業，9 歲入樹林村塾，18 歲應縣試不第。	樹林區長、鶯歌庄長、臺北州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創樹林造酒公司、樹林信用利用購買販賣組合。	詠霓詩社、瀛社
李燦煌 (碩卿、石鯨、秋麟、退嬰)	1882-1944	樹林			於基隆市開設「保粹」書房、為顏雲年西賓。	瀛社、小鳴社、鼎社
林知義 (問漁、寒柏、遂園未叟)	1874-1937	五股	1891 赴府試，考取紅榜第 9 名，列舉臺北府學秀才。鄉試未中。	1907 五股區長兼貴仔坑區長、1908 五股坑區長。	1920 私立臺灣商工講師、1921-1927 臺北第三高女教務囑託。	瀛社
黃景南 (雲谷、潛廬、世外逸人)		台北三峽	師事顏笏山、林述三、杜仰山。			
黃全發 (小泉)	1876-?	桃園	12 歲入書房。	1899 桃園辦務署第五區長役場書記、1903 第三區長役場書記、1909 直轄第四十六保保正、1915 竹圍區長、1920 桃園街協議會員、1921 中路第一保保正及保甲聯合會會長。	1918 年竹圍信用組合長、1921 埔仔信用組合專務理事、1931 埔仔信用組合長。	

380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呂鷹揚 (希姜)		桃園 大料 崁	1893 中式，取錄 優等選中，補廩 膳生。	1897 辦務署參 事、1899 大料崁 街街長、桃園廳 參事。		桃園吟 社
李傳亮 (子明、 夢蘭)	1895-?	桃園 大料 崁	1909 八塊公學校 畢，後於葉連 三、呂七賢二氏 門下苦學。	1919 大料崁煙草 賣捌所業務擔當 人、1931 大溪酒 類賣捌所書記、 町會長、保正。	在大溪街經營活 版及文房具業、 1934《台灣日日 新報》地方通信 員、1938《台灣 新民報》駐在 員、1935 年經營 大溪印刷社。	南雅吟 社、崁 津吟社
黃樹林 (澍霖)	1898-?	桃園 大料 崁	1911 大料崁公學 校畢，旋就崁儒 呂希姜及林維龍 研鑽漢學。	街協議員、1935 大溪街方面委 員。	1920 大華興業金 融公司理事兼會 計役、米商、洋 雜貨商、大溪信 用組合理事、大 溪茶葉會社取締 役、大溪郡漁業 組合監事、1935 《新高新報》大 溪支局長，兼營 大溪印刷所、 1936 經營黃益興 洋雜貨商。	桃社、 南吟 社、崁 津吟社
王松 (友竹、 寄生、滄 海遺民)	1866-1929	新竹	曾習漢學，但未 能考上秀才。		任鄭香谷書記	
林榮初 (震東、 傳爐、潛 園小主 人)	1877-1944	新竹	受教於張麟書、 張鏡濤等人。			竹社
黃贊鈞 (石衡、 立三居 士)	1874-1952	新 竹， 後移 臺北	15 歲赴宜蘭童子 試，取前列第 7 名。		於公學、報界服 務。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81

劉克明 (篁村)	1884-1967	新竹	1903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中學教師漢文科檢定及格。	1928 總督府翻譯官，1931 退休。	國語學校附屬公學校訓導、1908 國語學校助教授。	詠霓詩社、瀛社
鄭鵬雲 (毓丞、毓臣、北園後人)	1861-1914	新竹	受業林維丞，光緒年間取進新竹縣附學生，1894 年補食廩餼，撥入海東書院肄業。	1897 新竹廳囑託文書事務，與曾逢辰合纂《新竹縣志》。		竹社
鄭養齋 (以庠)	1872-1939	新竹	光緒間臺北府學廩生。			竹社
鄭神寶 (幼香)	1881-1941	新竹	幼讀漢學	1918 新竹區長、1919 新竹廳參事、1920 新竹州協議會員、1930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新竹製糖、信託、拓殖等會社重役。經營鄭珍記興業株式會社。	
曾逢辰 (吉甫、鏡湖、南豐逸老)	1858-1929	新竹	1879 新竹縣學附生。	1895 貓兒碇庄長、1898 年與鄭鵬雲合編《新竹縣志初稿》，後又修《新竹廳志》。	書房教師、1898 新竹公學校漢文教師。	竹社
王石鵬 (箴盤、了庵)	1877-1942	新竹	1898 新竹國語傳習所畢、臺北師範學校。	1906-1912 新竹廳雇員。	1916 《臺灣新聞》漢文部記者。	奇峰吟社、竹社、櫟社、東墩吟社、零社
鄭秋涵 (虛一、錦帆、霽光)	1880-1930	新竹			書房教師	竹社
張純甫 (津梁、興漢、筑客)	1888-1941	新竹			初業商，後設帳授徒，屋號「堅白屋」。1926 講學稻江，名其樓曰「守墨」。	竹社、星社、松社、柏社、瀛社

382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鄭肇基 (伯端)	1884-1937	新竹	幼習漢學。	1920 新竹街助役、1923 新竹州協議會員。	記興業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華南銀行、新竹電燈株式會社等會社之取締役或監察役。	
陳福全 (壽石、松菴、笑仙、鯤洋、遯叟)	1891-1960	新竹	新竹第一公學校畢、師事西門名儒莊炯南。			
吳景祺	1900-?	新竹	師事鄭家珍。		1919 創共榮信組。	耕心吟社
曾秋濤 (壽三)		新竹 舊港	入鳳岡書屋，師事吉甫。	庄協議員、保正兼聯合會長振興會長、新竹水利組合評議員。		竹社、來儀吟社、漁寮吟社
蔡見先 (啓運、振豐、應時)	1855-1911	新竹 出生，遷居苑裡。	1891 取進新竹縣學。	1897 苑裡辦務署參事、1907 苑裡區長。		鹿苑吟社、櫟社、奇峰吟社
陳瑚 (滄玉、枕山)	1875-1922	苗栗 苑裡	1897 苗栗國語傳習所畢。	1902 苑裡庄長。	1898 大甲公學校教師、1901《臺灣新聞》漢文部編輯記者。1902 創大甲帽蓆株式會社，又設苑裡帽蓆株式會社。	櫟社
陳貫 (聯玉、豁軒)	1882-1936	苗栗 苑裡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科畢。	苑裡庄助役、苑裡庄長。	公學校教員、《臺灣新聞》記者。	櫟社
鄭濟若 (聰楫)		苑裡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學校畢。			櫟社、詠霓詩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83

邱雲興	1887-1952	苗栗 銅鑼	1910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	1914 內湖區長 1920-1934 苗栗郡銅鑼庄長、新竹州協議會議員。	公學校訓導、銅鑼信用組合長、苗栗信用組合理事、大和拓殖株式會社社長、通霄物產株式會社取締役、邱光忠土地合資會社長。也經營赤糖及製材業。	栗社
林朝崧 (俊堂、癡仙、無悶道人)	1875-1915	霧峰	秀才			樂社
林資修 (南強、幼春)	1880-1939	霧峰		1913-1919 霧峰區長。		樂社
林資銓 (仲衡、壺隱)	1877-1940	霧峰	1893 秀才、東京中央大學肄。			樂社、東墩吟社
林朝琛 (獻堂、灌園)	1881-1956	霧峰	幼時入家塾蓉鏡齋，就蒙師何趨庭受業。	1901 霧峰區長、1911 台中廳參事、1921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945 貴族院議員。		樂社、留東詩友會
林朝璇 (紀堂、大勳)	1874-1922	霧峰				
林竹山 (作敬)	?-1941	霧峰			在霧峰開設聳翠山房書塾。	樂社
黃旭東 (炎盛)	1854-1913	葫蘆墩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		漢醫	樂社
張麗俊 (升三、南村)	1868-1941	葫蘆墩	13 歲入漢學從師，前後受漢學教育達 15 年之久，期間受業於魏文華、李瀾章、謝道隆等人。	1899-1918 下南坑第一保保正、1926 豐原街協議會員，共連任 3 次，計 6 年之久。	在豐原店員會、工友會及革新社等組織所辦的夜學教授漢文。	樂社、豐原吟社

袁炳修 (槐蔭)	1862-1910	葫蘆墩			葫蘆墩公學校教師	樂社
楊漢欽	1887-?	葫蘆墩	1911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		臺中刑務所監獄醫、1913 在豐原開設四知醫院、1922 豐原信用組合監事。	豐原吟社
呂大椿 (默庵)	1891-1956	葫蘆墩	自幼修習漢學。台中州農事講習所、日本駒澤大學畢。	神岡庄役場	1930 在豐原街開彬彬書局、1934 在豐原街建居士林。	沙鷗聯吟會
張慶雲	1892-?	葫蘆墩	1912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		臺中醫院醫師、1913 於豐原街開設存安堂醫院。	豐原吟社
吳水木	1900-?	葫蘆墩	1913 公學校畢。	1930 豐原街助役、豐原街協議員。	1924 豐原製紙製材會社取締役，1927 豐原商工會副會長。	豐原吟社
呂敦禮 (鯉庭、厚菴)	1871-1908	神岡三角仔	1893 臺灣縣學秀才。			樂社
呂蘊白 (瑄星)	1878-1955	神岡三角仔	7 歲入漢文書房。		設帳授徒、米商。	樂社
謝道隆 (頌臣)	1852-1915	潭子	1875 秀才。	區長、公學校學務委員。	教書為業、開泰和藥鋪。	
傅錫祺 (鶴亭、澹廬老人)	1872-1946	潭子	1893 秀才。	1913 潭仔墘公學校學務委員、1921 潭子庄長，前後計任 17 年之久。	書房教師，兼台中新聞通訊記者。1901《台中每日新聞》(後改稱《臺灣新聞》)漢文欄主筆，前後 18 年。	樂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85

傅春魁	1892-?	潭子	1914 台北醫學學校畢。		1916 在潭子庄開設成春醫院，1927 至爪哇泗水開成春藥房、1936 回臺，再開成春診療所於故鄉。	櫟社
林載釗 (望洋)	1884-1928	頭家厝		潭子助役。	《臺灣新聞》報社、通譯。豐原革新會漢學教師	櫟社
王學潛 (卿淇)	1868-1927	牛罵頭	廩生。	1897 庄長、1901 年任台中地方法院囑託。	與蔡惠如等創協和製糖株式會社、竹林會社，並創牛罵頭信用組合。	櫟社、中州吟社
蔡惠如 (鐵生)	1881-1929	牛罵頭		臺中區長。	創協和製糖會社、牛罵頭及員林輕鐵會社。1915 變賣家產，攜眷內渡，定居福州，經營水產業。	櫟社、鰲西吟社
陳錫金 (基六、塾村)	1867-1935	牛罵頭	光緒年間邑諸生。	高美區長。	漢醫、清水製冰株式會社監察役、臺灣新聞社記者。	鰲西詩社、櫟社
葉篤軒 (仁昌)		東勢角		台中法院通譯。		櫟社
劉魯 (天喜)	1880-1955	東勢	師事劉吉芙習漢學。		塾師。	
莊龍 (雲從、南村)	1884-1925	大甲	臺北國語學校師範部畢。		公學校教師、1906 台中《臺灣新聞》記者。	詠霓詩社、櫟社、衡社
魏品三 (文光)		大里杙	秀才			櫟社

林文華		大里 杙		大里杙區長、區 書記。		櫟社
王達德 (守三、 瘦鶴、潤 堂)	1897-1957	台中 梧棲			台灣新聞社漢文 部記者，退社後 受林獻堂之推介 任彰化銀行秘 書。	櫟社 (戰 後) ¹
林炳煌 (耀亭、 守拙、樹 德居士)	1868-1938	樹仔 腳	1893 秀才。	1897 台中辨務署 參事、樹仔腳區 庄長、台中地方 法院事務囑託、 台中區長、台中 市協議會員。		櫟社
林子瑾 (大智、 少英)	1878-1954	台中	福建法政專科學 校、早稻田大學 法政科畢。			櫟社、 零社
吳子瑜 (少侯、 小魯)	1885-1951	台中		台中市協議會 員。	春英會社、大東 信託會社副社 長。	櫟社、 東山詩 會
王竹修 (虛庵、 養拙)		台中	光緒年間邑庠 生。			東墩吟 社、東 山詩會
張賴玉廉 (雪堂、 讓友、鐵 夫)	1900-1961	台中	幼隨傅錫祺、王 竹修、林月潭研 習經史。		書房教師	櫟社
王少箴 (鵬傳)		台中	台北師範學校師 範部乙科畢。			櫟社
陳紹年		田中	秀才。	台中州參事。		鹿江吟 社、田 中「蘭 社」

¹ 王達德，《瘦鶴書畫集》，頁 7-8。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87

吳德功 (汝能、立軒)	1850-1924	鹿港	1874 秀才、歲貢生。	彰化辦務署臺中廳參事、臺中地方法院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事務囑託、臺灣總督府史料評定委員會評議委員。	1898 台中師範學校教師。	
莊士哲 (仰山)	1850-1918	鹿港	廩生。	1898 辦務署參事、1902 鹿港區長。		鹿苑吟社
莊士勳 (竹書)	1856-1918	鹿港	1879 舉人。		霧峰林家西席、在鹿港文祠開設夜校。	鹿苑吟社
鄭鴻猷 (澄川、贊侯)	1856-1920	鹿港	1884 生員，1887 取進府學一等第 10 名增生。			大治吟社
呂喬南 (竹巢)	1864-1918	鹿港	邑庠生。		在彰化、鹿港、草湖設帳授學，晚年回鹿港文開書塾任教。	鹿苑吟社
洪棄生 (攀桂、一枝、月樵)	1866-1928	鹿港	1889 秀才。			鹿苑吟社
沈夢達 (祝澄)	1867-1903	鹿港	秀才。			櫟社
施梅樵 (天鶴、雪哥、蛻奴、可白)	1870-1949	鹿港	1893 秀才。		書房教師	鹿苑吟社
蔡青筠 (文達、耕雲)	1868-1927	鹿港	貢生。		1894 受雇於林朝棟之「福裕源」。1900 返回鹿港，購置土地、投資彰化銀行。	大治吟社

388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許夢青 (荊石、 劍漁、蔭 亭)	1870-1904	鹿港	1891 秀才。		書房教師。	鹿苑吟 社
陳子敏 (勉之)		鹿港			1931 至埔里櫻社 教國學。	大治吟 社
許素 (存德、 菊隱)	1868-1929	鹿港			日治後轉而從商	香草吟 社
陳懷澄 (槐庭、 心水、沁 園)	1877-1940	鹿港		1919 鹿港區長、 1921 鹿港街長、 台中州協議會 員。		櫟社、 鹿苑吟 社、鹿 江詩 會、大 治吟社
莊嵩 (伊若、 太岳)	1880-1938	鹿港	1902 台中國語學 校師範部畢。		鹿港公學校教 師、1908 霧峰林 家西席、霧峰革 新青年會及一新 義塾漢文教師。	櫟社、 大治吟 社
鄭玉田 (汝南、 天淘、少 舫)	1876-1933	鹿港	曾留學日本。		《臺灣新聞》記 者。	櫟社
施家本 (肖峰)	1886-1921	鹿港	臺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肄。		鹿港公學校教 師、台中郡民事 調停翻譯、1913 霧峰林家書記、 1915-1920 林獻 堂秘書兼翻譯。	櫟社、 大治吟 社
蔡子昭 (世賢、 天弧)	1888-1936	鹿港			霧峰林家書記。	櫟社
丁寶濂 (式周、 蓮溪)	1867-1929	鹿港	廩生		鹿港公學校教 師、霧峰林家西 席。	鹿苑吟 社、鹿 江詩 會、櫟 社、大 治吟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89

許嘉恩 (逸漁)	1887-	鹿港			1941 掌教和美道東書院、書房教師	鹿江詩會、大治吟社
朱啓南	1889-1974	鹿港			書房教師	大治吟社、東山詩會
王淑潛 (默、墨仙、景陶)	1888-1951	鹿港			1913 至豐原設塾教書，凡 40 年。	大治吟社、豐原吟社
蔡梓舟 (說劍)		鹿港				鹿江詩會、大治吟社、台中中州敦風吟社、東山詩會
陳湛恩 (材洋)	1868-?	鹿港	彰化縣學生員。			大治吟社
蔡柏樑 (香宇)		鹿港	師事林竹山。			櫟社
施江西 (性澄)	1899-1981	鹿港	1921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後入熱帶病專攻科，專研熱帶醫學一年。	嘉義市會議員。	1922 台中醫院內科醫官補、在鹿港與其兄江東開辦開四方醫院，懸壺濟世達 55 年。	大治吟社、聚鷗吟社、新聲吟社、東山詩會
許五頂 (幼漁、培風)	1892-1953	鹿港	台北醫學校畢、師事洪棄生。		在和美開汎愛醫院。	芸香吟社、大治吟社、道東書院詩社

390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施廉 (讓甫、 頑夫)	1900-1967	鹿港	日本早稻田大學 文科肄、師事叔 父施梅樵。		1937 北斗郡消費 米組合主任、台 灣食糧營團北斗 區分所主任大城 漢文學會講師、 二林漢文研究會 教師。	大治吟 社、聚 鷗吟社 社長、 淬礪吟 社、東 山詩會
許文葵 (原名媽 葵)	1900-?	鹿港	台中第一中學校 畢。	台中州知事專屬 通譯、福興庄 長。		櫟社 (戰 後)
施一鳴 (炳揚)	1901-1951	鹿港	上海聖約翰大學 肄。			大治吟 社、洛 江吟 社、道 東書院 詩社
施性湍 (瀧如、 雪濤)	1905-1937	鹿港	其雇工施春華在 夜間從朱啓南習 詩文，日則轉授 與性湍，於是漸 通詩禮。又從施 梅樵學詩。			大治吟 社、聚 歐吟社
張棟梁 (太公、 子材)		彰化 快官			台中市榮町開景 星藥房、1939 在 何厝經營書房。	櫟社
黃臥松 (筆俠)	1876-1944	彰化			書房教師。	崇文社
林春懷	1889-1967	彰化	1917 臺灣總督府 臺北醫學校畢。		日本赤十字臺灣 支部醫院內科實 習、霧峰開業懷 仁醫院。	櫟社
詹作舟 (阿川、 潛園)	1891-1980	彰化	台北醫學校畢、 師事黃倬其。	1928 年擔任永靖 庄協議會員	1917 年至永靖開 設生春醫院。	興賢吟 社、應 社(戰 後) ²

² 張瑞和編，《詹作舟全集》，書前作者簡介。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91

吳上花 (筱西)	1893-?	彰化	7歲入書房，15歲起同伯父吳德功研究四書五經。彰化公學校畢。	彰化街協議會員。		櫟社
王友芬 (蘭谷)	1905-?	彰化	台灣高等商業學校畢。		入台灣新民報社，歷任基隆支局長、廈門支局長。1939回台，任台中支局長。	
洪以倫 (由愷、多此)	1870-1925	彰化 芳苑			於彰化天公壇講授詩學，又受聘到北斗螺溪吟社教授詩詞，主講磺溪麗澤會及同志青年白沙社。	白沙吟社
林糊 (鐵骨生)	1904-	彰化 福興庄	1916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	溪湖庄協議會員。	嘉義醫院、於溪湖庄開長春醫院，1921年移至員林街開業。	興賢吟社
張玉書 (笏山)	?-1939	草鞋 墩			雙冬村黃春帆掌櫃、草屯辦腦館、中部拓殖株式會社社長。	櫟社、東墩吟社、中州墩風吟會
洪元煌	1883-1958	草鞋 墩	草鞋墩公學校畢。	1920 草屯庄協議會員、台中州會議員。		詩學習作、櫟社(戰後)
李春盛	1880-1950	草鞋 墩	1898 台中國語傳習所畢。	草鞋墩公學校學務委員、草鞋墩支廳第二保保正、1920 草屯庄協議會員、台中州協議會員。	1899-1904 南投公學校及草鞋墩分校教員、1902兼總督府農事通信委員。	

連德賢 (竹林、 俊堂、思 齊)	1907-1986	草屯	師事莊嵩及江斗南。		1927 營盤口設塾，亦曾於青蛙寮、炎峰里等地教學。	南陔吟社、漢詩習作、櫟社(戰後) ³
吳維岳 (步初)	1892-1967	南投	1910 南投公學校畢。1917 初學作詩，與友人共組南陔吟社。		台中合昌商會、合昌製糖廠、南投信用組合、碧沙製糖公司。1922 因張玉書之薦，入霧峰林梅堂家為書記。1923 霧峰信用組合書記、1927 中部拓殖株式會社書記、1929 吳鸞旂拓殖株式會社書記、1930 兼任台灣日日新報駐南投通信員，後移居台中，經營雜貨業。	南陔吟社、萊園讀書會、東山詩會、櫟社(戰後) ⁴
黃洪炎	1896-1944	南投名間	1914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1927 年至早稻田大學當校外生，鑽研政治經濟科。1918 起向莊嵩學漢文。	1917 南投廳通譯兼南投廳屬、1921 南投郡中寮庄長。	集集、皮子寮、草屯各公學校教師、1931 草屯街信用購買組合理事、1932 入台灣新民報社。	
賴紹堯 (悔之)	1871-1917	員林	邑庠生。	1906 彰化大庄區庄長。		櫟社
黃溥造 (鏡軒)	1889-1959	員林			興賢書院教席。	田中蘭社、興賢吟社

³ 簡榮聰，〈典型在夙昔—連德賢先生詩集序〉，收於連德賢，《連德賢先生百年冥誕紀念集》，頁 9-11。

⁴ 吳維岳，《七十年回憶錄》，頁 1-37。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93

吳克明		斗六	1887 秀才。	斗六辨務署參事、斗六區長、斗六廳參事。	1908 創斗六製糖合資會社，6 年後合併於日本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晚年從事農地開墾。	
黃紹謨 (丕承、臥雲、雲林逸叟)	1868-1934	斗六	1892 年秀才。	1896 嘉義縣雇員。	雲林國語傳習所教師、斗六公學校教師、設「臥雲齋」授徒。	斗山吟社、雲峰吟社、西螺菸社
黃服五 (偶鶴、鶴伍)	1870	斗六	1889 年秀才、1898 嘉義國語傳習所畢。	1897 法院雇員、辨務署雇員、1901 斗六廳雇員、1902 斗六廳判任通譯。		斗山吟社
張卓 (立卿、冠英)	1899-1975	斗六	1921 東京立教中學畢、東京立教大學遊學。	1930 台南州方面委員。	1926 經營品芳堂藥鋪。	斗山吟社、菸社
吳景箕 (考肅、鳳起、鳴皋)	1902-1983	斗六	幼從黃紹謨學漢文、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		慶豐商行會計。	雲峰吟社
曾席珍	1873-?	北港		1901 辨務署參事、斗六廳參事、1909 嘉義廳參事、北港街協議會員。	經營恒茂商行，從事煙草、販糖業。擔任北港朝天宮管理人達 24 年。	汾津吟社
龔顯昇 (買牛翁、竹林)	1889-1964	北港			斗南教授漢文、高雄經營木材、嘉義經營藥廠	汾津吟社
王東燁 (槐庭、季琮)	1893-?	北港	8 歲入私塾，受教於蔡木升、蔡然標、陳少圃。北港公學校畢。		1913 年創怡昌行染布廠、台南中華進口商會計、嘉義經濟食堂和撞球店會計、1930 北港保正蘇錦助理。	汾津吟社

394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廖重光 (伯陽、菊友、菊癡)	1875-?	西螺	師事葉有聲、蔡壽星、邱錫熙。1898 雲林國語傳習所甲科課程修畢。	1920 虎尾庄長、1924-1936 西螺街長。	1901 西螺公學校教師，1919 升為教諭。1936 西螺信用組合理事	西螺莢社
邱水謨 (雲雄、聽濤生)	1910-1984	雲林口湖	九歲入求得軒書齋，拜董拱為師。		書房教師。	鄉勵吟社
余塘 (蓮舫、武巒)	1870-1948	嘉義		警視廳書記。	書房教師。	羅山吟社
林玉書 (臥雲、香亭)	1882-1965	嘉義	幼習漢學、1897 嘉義國語傳習所畢、1903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		嘉義醫院醫師、1907 在嘉義開慎德醫院。	麗澤吟社、茗香吟社、羅山吟社、嘉社、琅琳山閣
蘇孝德 (朗晨、櫻村)	1879-1941	嘉義	1987 嘉義國語傳習所甲科畢。	1904 嘉義廳通譯、1907-1913 嘉義區長兼山仔頂、台斗坑區長。		羅山吟社、嘉社
莊伯容 (逸翁、景陵)	1864-1932	嘉義	1881 秀才。	1900 嘉義辨務署參事、1901 嘉義廳參事、1907 嘉義衛生組合長。		羅山吟社
徐杰夫 (楸軒)	1873-1959	嘉義山仔頂	秀才、1903 嘉義公學校國語速成科畢。	1908 山仔頂庄區長、1913 嘉義區長、嘉義廳參事、1920 臺南州協議會員。	1911 嘉義銀行理事、1914 嘉義銀行副頭取，其後歷任頭取、組合長、評議員等。又任臺灣南部海產株式會社取締役、大正無盡會社監察役。	羅山吟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95

林培張 (植卿、 次逋、芷 庭)	1864-1941	嘉義 竹崎	清光緒中進嘉義 縣學，後補增 生。	嘉義南區區長。	臺灣新聞社漢文 部校對。	羅山吟 社、南 嘉吟 社、網 珊吟社
蘇友讓 (少泉)	1879-1943	嘉義	從斗六吳秀才學 詩。		布行學徒、斗六 街做山產生意、 嘉義開德豐材木 商行。	嘉社
王殿沅 (芷汀、 脫塵齋主 人)	1886-1972	嘉義	師事林殿本，與 賴惠川同學。臺 南師範學校畢。		朴子、水上等公 學校教師，再轉 職南靖明治製糖 會社。	羅山吟 社、玉 峰吟社
林緝熙 (荻洲)	1887-1962	嘉義	臺南師範學校 畢。		朴子公學校教 師、明治製糖會 社，並歷任溪 湖、南靖、蒜頭 等糖廠，主持會 計。	羅山吟 社、玉 峰吟社
林建寅	1887-1955	嘉義	1908 臺灣總督府 大目降糖業講習 所畢。	嘉義廳翻譯官。	林裕本堂（林季 裔）經理。	
賴尚益 (惠川、 頤園、悶 紅老人)	1887-1962	嘉義	師事嘉義總爺街 嚴本林門下。			玉峰吟 社、小 題吟 會、鷗 社
黃文陶 (竹崖)	1893-1970	嘉義	1917 台灣總督府 醫學校畢、1925 入台北醫學專門 學校病理研究科 深造、1932 京都 帝國大學外科醫 學博士。醫務之 暇從王藻如、黃 丕承學詩。	嘉義市協議會 員。	台中市私立同仁 醫院醫師、西螺 開上池醫院、 1933 在嘉義開上 池醫院。	炎社、 鷗社、 1934 年 4 月 7 日主辦 全島詩 人大會
林純卿 (曙村)	1876-1933	嘉義 東石		港墘區庄長。		羅山吟 社

林維朝 (德卿、翰堂)	1868-1934	嘉義 新港	師事林逢其、 1887 秀才。	打貓保甲局評議 員、1900-1912 新港區街庄長、 1908 嘉義廳參 事、1920 台南州 協議會員。	新港公學校教 師、1903 經營德 美煉瓦(磚) 窯、1907 在打貓 西堡後底湖經營 舊式糖廠、1909 在打貓南堡海豐 仔創設舊式糖 廠、1910 打貓北 堡輕鐵春龍公司 長、1914 嘉義銀 行頭取、1916 成 立嘉昌商行、 1928 經營新隆益 商行。	觀音吟 社、羅 山吟 社、嘉 社
洪大川 (龍波)	1907-1984	嘉義 新港	師事林維朝與新 竹吳蔭培。		書房教師。	淡交吟 社、莢 社
周文俊 (國彬)	1898-	布袋		1918 年任奉職義 竹庄。		岱江吟 社、竹 音吟社
林榮 (林友 笛、旋馬 庭主人)	1893-1986	朴子	1912 朴子公學校 畢。	1913 嘉義廳衛生 試驗室囑託， 1919 南勢竹區書 記、庶務、財 務、總務主任， 1920 布袋庄役場 書記、庶務係主 任、財務係主 任，1938 四湖庄 役場書記。	東石自動車會社 會計主任。	樸雅吟 社
蔡國琳 (玉屏、 春巖)	1843-1909	臺南	16 歲入泮，23 歲補廩生，1882 舉人。	台南縣參事、 《台南縣志》纂 修委員。		南社
趙鍾麒 (麟士、 雲石、畸 雲、老 雲)	1863-1936	臺南	16 歲入泮為庠 生，25 歲補廩膳 生，1888 起三次 鄉試未中。	1896 兵器沒收委 員、憲兵隊備 員。1898 台南地 方法院通譯。		南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97

胡殿鵬 (子程、 南溟)	1863-1933	臺南	光緒年間生員。		1898《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通信記者、1902《台南新報》記者、《全台報》記者	南社
羅秀惠 (蔚村、 蕉麓)	1865-1943	臺南	光緒年間舉人。		1897 台南國語傳習所教務囑託、1899-1902 台南師範學校教務囑託、《台澎日報》漢文部主筆、《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	南社、瀛社
連橫 (雅堂、 劍花)	1878-1936	臺南			《台閩日報》、《台南新報》、《臺灣新聞》漢文部記者。	浪吟詩社、南社、櫟社
連城璧 (德裕、 應榴)	1877-1934	臺南			書房教師	南社、西山詩社
王則修 (佛來、 文德)	1867-1952	臺南 大目 降	1889 參加歲考，取列一等第一，補廩食餼。		1905 於台南市米街經營麻袋、1916 入臺灣新報社任漢文記者、大目降設帳授徒、1920 清水王家聘為西席、1940 封塾廢教。	虎溪吟社
黃得眾 (拱五、 瘦菊)	1877-1949	臺南			書房教師、1906《台南新報》記者。	南社
謝維巖 (瑞琳、 籟軒、石 秋)	1879-1924	臺南	年 13，以幼童入泮。		1906《台南新報》漢文部記者。	南社

吳萱草 (穆堂、 牧童)	1889-1960	臺南	幼習漢學。		經營協吉號、主持佳里自動車業務。	南社、 嶼江吟 社、蘆 溪吟 社、佳 里白鷗 吟社、 佳里琅 環詩社
黃欣 (茂笙、 南鳴、固 園主人)	1885-1947	臺南	公學校畢、閒暇時向胡南溟學習詩詞、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畢。	1918 台南市西區長、1920 台南州協議會會員、1921 臺灣府評議會會員。	嘉義廳下竹園庄經營農業及魚塭、有限責任學甲漁業信用組合監事、嘉義銀行取締役。	南社
王開運 (杏庵)	1889-1969	臺南市	1910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	1928 市協議會會員、1930 高雄州路竹庄長。	大社公學校訓導、1917-1927 臺灣銀行行員、1927 就職大東信託為台南支店長代理。	
吳乃占 (吉夢)	1881-	臺南北門	公學校畢。	台南縣巡查補、台南州區書記、佳里庄長、台南州協議會員、佳里庄協議會員。	佳里漁業組合理事、專務理事、臺永義芳株式會社相談役、監察役、臺灣竹材會社社長、臺灣新聞佳里出張所長、騰雲自動車商會會長。	白鷗吟 社
邱明山 (克俊)	1882-	臺南市	幼習漢學、曹洞宗國語學校。	1899 由鹽水港辨務署入嘉義廳。	1904 辭臺糖，從事糖商，後入鈴木商店台南支店，1915 入事業部，1928 組織昭和產業。	
黃溪泉 (谿荃)	1891-1860		台南第一公學校畢。			南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399

洪坤益 (鐵濤、黑潮)	1892-1948		12 歲前在書房接受童蒙教育，20 餘歲學詩，受業於胡南溟。1904 入台南第一公學校。		1929 於台南市西門町創漢詩函授研究會、參與籌組「三六九小報」。	南社、春鶯吟社
趙雅福 (劍泉、亞雲、少雲)	1894-1962	台南			《台南新報》漢文部記者、《三六九小報》發行人兼主編。	南社、桐侶吟社、春鶯吟社、以成社
吳耀林 (松茂)	1905-1992	北門		將軍庄協議員		將軍吟社
陳丁科 (啓勳)		北門	少就外傳專攻漢學。		於旗山經紀西漢藥材。	月津吟社
蔡清元 (利貞)	1901-	高雄市	1925 嘉義農林學校畢。	高雄市方面委員。	1936 創東亞飲料株式會社，任專務取締役。	
黃才樹 (漱泉)		高雄市	1916 公學校畢。		大雅公學校教師、1927 台灣帽子移輸出商永和商行主任 1936 在高雄市從事飲料業。	大雅吟社
王天賞 (獎卿)	1903-1994	高雄旗後	打狗公學校畢業，曾赴日本、上海遊學。從陳梅峰、陳錫如習詩文。	1933 起歷任高雄商工會議所議員、高雄市會議員。	1917 起任職於無盡株式會社高雄支局、台灣倉庫高雄支店、台灣新民報社。	壽峰詩社
陳皆興 (可亭)	1899-?	高雄苓雅寮	高雄第二公學校畢。幼時入書房，成年後隨陳梅峰、陳錫如習漢學。	保正、街方面委員、鳳山郡教化委員、鳳山街協議會員。	1915 服務於旗後新泰記行、1925 經營大同醬園、1928 設立鳳山製冰合資會社。	旗津吟社
劉聲濤 (小陋室主人)		左營	公學校畢。	方面委員、農事實行組合長、左營庄協議會員。	經營聯豐製米所。	

400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鄭坤五 (友鶴、 虔老、駐 鶴軒主 人)	1885-1959	鳳山 九曲 堂	漳浦中學畢，後 返臺，入鳳山國 語傳習所日語速 成科。	1902 台南地方法 院鳳山出張所通 譯、1920 大樹庄 庄長，後因以詩 諷時政遭革職。	1927 《臺灣藝 苑》編輯，亦任 《三六九小報》 顧問。	
蘇文禎	1902-?	岡山 路竹	1925 台北醫學專 門學校畢。		高雄醫院醫師、 1926 在路竹經營 育生醫院、公 醫、專賣局和交 通局囑託醫、路 竹新興煉瓦 (磚)會社長。	
鄭進登	1883-	東港			米商、高雄州米 穀評代議員。	興亞吟 社
何達 (雪峰、 悟生)	1896-?	東港	東港公學校畢， 後習漢文 4 年。	街協議會員。	1913 入台灣商工 銀行，1926 任東 港出張所次席， 1928 轉鳳山支 店，1932 退社。 同年 9 月組東港 信組，任專務理 事信組專務、食 鹽元賣捌人。	
何只經 (慎生、 雪鶴)		東港	台北第一師範 畢。		教師。	
陳寄生 (逸雲、 靜園)	1896-?	東港 佳冬	林邊公學校畢， 後向陳鑑堂習漢 學。	庄協議會員、保 正、方面委員。	高雄州青果同業 組合評代議員、 佳林漁業組合專 務理事。	興亞吟 社
林朝宗 (惠生)	1875-	潮洲 內埔	向其父前清秀才 林際春習漢學。	保正、內埔庄協 議員。	漢醫，兼習西 醫。內埔公學校 學務委員、1917 大和信用組合參 事，後被選為組 合長、老東勢共 同苗代組合長。	
吳紉秋 (幸齋)	1903-?	林邊				興亞吟 社
林又春	1901-?	林邊				興亞吟 社

附表 主要傳統文人表 401

林明江 (逸樵)	1910-?	林邊			營棉布商兼洋服部	興亞吟社
陳添和 (逸民)		林邊				興亞吟社
莊贊勳 (仁閣)		宜蘭		1897 宜蘭救民局、1909 宜蘭廳參事。		
連碧榕 (城青)	1878-	宜蘭	1886-1897 年習漢學。	宜蘭街協議會員、方面委員、街保甲聯合會長、郡保甲協會長。	書房教師、藥種商、後於花蓮港玉里長良開墾水田、1928 成立東台振業合資會社兼營澱粉工廠。	
吳爾聰 (睿智、啓東)	1871-1956	澎湖	少從陳梅峰習經史，弱冠與童子試，赴院試，皆名列第一。		講學馬公、望安、沙港，先後 28 載。後在馬公、湖西教私塾 15 年。	西瀛吟社
陳梅峰 (精華)	1868-1937	澎湖	1882 年秀才。	1903 澎湖廳參事、1904 澎六區區長、1923 湖西庄長。	在沙港開杏園堂私塾數十年、晚年另任臺灣日日新報社通訊記者。	西瀛吟社
楊爾材	1882-1952	澎湖			釀酒爲業	朴雅吟社
許凌雲 (漢厚、卓夫)	1862-1944	澎湖 瓦硯	年 30 始爲生員。	1897 赤崁辨務署署長，1898 廢署解職。	塾師、1901 台南長老教會新樓中學教師、1918 林烈堂家庭教師、高再得醫師家庭教師、開存養軒書房。	
歐陽維謀 (裕修)		澎湖	澎湖水產專修學校畢。		和發合資會社專務。	藏修詩社
陳文石 (輝山)		澎湖 沙港	少小從學於祖父陳梅峰。		嘉義蘇友讓、趙石之家庭教師，安順下鯤身公學校教師，於屏東營鐵公所。	南社、嘉社

402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許五湖 (君山、逸士)	1894-	澎湖 白沙	幼時從伯父許命卿習漢文，弱冠再受業於盧耀庭。		設帳、經營食堂 日用雜貨店。	瀨南吟社
蕭永東 (冷史、古意童)	1895-1962	澎湖			冰塊買賣、魚類 經濟業	東林吟社

資料來源：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十四）》；張麗俊著、許雪姬等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一）—（十）》；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黃洪炎編，《瀛海詩集》；賴子清編，《臺灣詩醇》；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吳毓琪，《南社研究》；施懿琳，《彰化文學圖像》；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曾迺碩，《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程大學總主編、呂建孟等撰稿，《西螺鎮志》；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陳瑤塘主編，《清水鎮志增編本》；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鄭定國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龍文出版社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書前作者介紹。

徵引書目

一、一般史料

(一) 官方文書、人名錄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29 至 31 年。

山辺健太郎解說：《現代史資料 21 台灣 1》，東京：株式會社みすず書房，1971。

杉浦和作編：《第八版臺灣會社銀行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1927。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3。

唐澤信夫：《臺灣紳士名錄》，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景福基金會編：《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臺北：景福基金會，1992。

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中廳》，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

澤本健三編：《市町村別日本國勢總覽 8》，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9。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二) 報刊雜誌

- 《三六九小報》，昭和 8 年。
《風月報》，昭和 10 年至 15 年。
《南方》，昭和 16 年。
《詩報》，昭和 6 年至 17 年。
《臺南新報》，昭和 2 年至 11 年。
《臺灣》，大正 11 年。
《臺灣文藝叢誌》，1 年 1 號至 5 年 3 號。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3 年至昭和 11 年。
《臺灣民報》，大正 13 年至 15 年。
《臺灣新民報》，昭和 5 年至 8 年。
《臺灣教會公報》，明治 38 年至昭和 8 年。

(三) 日記、回憶錄、訪問紀錄

-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
吳維岳：《七十年回憶錄》，南投：作者自印，1961。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店：國史館，2005。
林吳帖：《我的記述》，臺中：財團法人素貞興慈會，1970。
林紀堂：〈林紀堂日記〉，未刊稿。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未刊稿。

-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3—1955年，未刊稿。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
-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
-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
-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

-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
-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5。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0。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0。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1。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1。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2。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2。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
- 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未刊稿。

楊水心：〈楊水心日記〉，未刊稿。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67。

（四）文集、詩集

王守勇：《六百字編》，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25。

王松：《友竹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王松：《臺陽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王開運：《杏庵詩集》，臺北：王駿嶽，1988。

王建竹編：《臺中詩乘》，臺中：臺中市政府，1976。

王達德：《瘦鶴詩書集》，臺中：九荷山房，1996。

平田源吾：《北投溫泉誌》，臺北：天狗庵，1909。

江亢虎：《臺遊日記》，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35。

江寶釵編：《張李德和詩文集》，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

余亦舉等：《揚文會策議》，出版資料缺，1900。

吳子光：《一肚皮集》，臺北：龍文書局，2001。

尾崎秀真編：《鳥松閣唱和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

周維金：《大陸記游》，臺北：老古出版社，1979。

林文欽：〈福建鄉試硃卷光緒癸巳恩科〉，未刊稿，許雪姬教授藏。

林玉書：《臥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臺北：林珮貞，1984。

林培張、王殿沅、林緝熙：《寄廬遺稿》、《脫塵齋詩草》、《荻洲吟草》，
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上）、（下）》，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林朝崧編：《科山生壙詩集》，臺中：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印刷，1909。

- 林欽賜：《瀛州詩集》，臺北：光明社，1933。
- 林資修：《南強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林資銓：《仲衡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林獻堂：《灌園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年譜·遺著·追思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 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邱秀堂編：《鯤海粹編》，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0。
- 施梅樵：《梅樵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
- 唐景崧：《詩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張深切著，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主編：《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社，1998。
- 張瑞和編：《詹作舟全集》，彰化縣永靖鄉：詹作舟全集出版委員會，2001。
-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 莊嵩：《太岳詩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許劍漁：《鳴劍齋遺草》，臺北：大友書局，1960。
- 連橫：《臺灣詩薈》，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
- 連德賢：《連德賢先生百年冥誕紀念集》，南投縣草屯鎮：連學堯，2006。
- 陳素雲主編：《林維朝詩文集》，新店：國史館，2006。
- 陳黃金川：《金川詩草》，臺北：陳啓清先生慈善基金會，1991。
- 陳瑚、陳貫：《枕山詩抄》、《豁軒詩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陳漢光編：《臺灣詩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 傅于天、呂敦禮、莊龍、賴紹堯：《肖巖草堂詩鈔》、《厚菴遺草》、《南村詩稿》、《悔之詩鈔》。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

- 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
-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傅錫祺：《鶴亭詩集（上）、（下）》，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曾今可編：《臺灣詩選》，臺北：中國詩壇，1953。
- 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 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 黃水文：《黃水文詩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 黃水沛：《黃樓詩》，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嘉義：蘭記圖書部，1927。
- 黃臥松編：《彰化崇文社十五週年紀念圖》，嘉義：蘭記書局，1931。
-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臺北：臺灣詩人名鑑刊行會，1936。
- 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
- 黃純青、謝汝銓：《晴園詩草》、《雪漁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黃紹謨：《東遊百詠》，雲林：出版者不詳，1920。
- 楊仲佐：《網溪詩集上、下卷》，臺北：楊仲佐，1937。
- 臺灣青年皇民鍊成研究會編：《皇民鍊成臺灣青年必攜》，臺北：精文出版部，1942。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遊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蔡汝修編：《臺海擊鉢吟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
- 蔡罔甘：《旨禪詩畫集》，臺北：龍文書局，2001。
-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 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5。
- 鄭虛一：《虛一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鄭鵬雲編：《師友風義錄》，臺北：廣文書局，1998。
- 賴子清編：《臺灣詩醇》，臺北：蘭記書局，1935。
- 賴子清編：《臺灣詩海》，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
- 環鏡樓主人：《環鏡樓唱和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株式會社，1920。
- 禪慧法師編：《臺灣佛教詩對拾遺》，臺北：三慧講堂，1990。
- 瀛社創立六十週年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瀛社創立六十週年紀念集》，臺北：瀛社，1969。
- 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櫟社詩會十週年大會詩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影印，2000。
- 櫟社：〈櫟社庚戌春會紀念箋〉，未刊稿，1910。
- 櫟社：〈櫟社規則附會議錄〉，大正8年6月15日，未刊稿。
- 櫟社：〈櫟社規則附會議錄〉，大正8年9月1日，未刊稿。

（五）霧峰一新會資料

-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事業實施要綱〉，霧峰：該會，1932。
-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會歌〉，手抄稿，1932。
-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第一回運動會節目單〉，霧峰：該會，1932。
- 霧峰一新會編：〈會員名簿〉，手抄版，1932。
- 霧峰一新會編：〈（昭和七年三月末日）會員名簿〉，霧峰：該會，1932。
-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一週年慶祝會順序單〉，霧峰：該會，1933。
- 霧峰一新會編：〈（昭和八年五月現在）會員名簿〉，霧峰：該會，1933。
- 霧峰一新會編：〈會員名簿〉，昭和九年版，霧峰：該會，1934。

霧峰一新會編：〈霧峰一新會昭和十年度各部分擔委員〉，霧峰：該會，1935。

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霧峰：該會，1936。

霧峰一新義塾塾友會編：《霧峰一新塾友會會則》，霧峰：該會，1937。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Erikson, Erik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W.Norton, 1968.

Esherwick, Joseph W and Rankin, Mary Backu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 Imperia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Kuhn, Philip A.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Marsh, R.M. *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 in China*.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1.

Pritchard, Evans,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 Young, Ernest P.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 Bloch, Marc 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 大西一：《競馬の話》，臺北：臺北州畜產組合聯合會，1936。
-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
- 上田正昭等監修、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日本人名大辭典》。東京：三省堂，2001。
- 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日本近現代史辭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90。
- 王正雄、施金桂主編：《墩仔腳大地震老照片特集》，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
- 王啓宗：《臺灣的書院》，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
- 王傳壽：《劉銘傳：臺灣現代化的推動者》，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0。
- 肖然山：《徐錫麟傳》，臺北：國際文化，1991。
- 竹中信子：《殖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株式會社田火田書房，1990。
- 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 臼井勝美、高村直助、鳥海靖、由井正臣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
-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鹿港：鹿港鎮公所，2000。
- 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臺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9。

- 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
-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
-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眾文圖書，1980。
-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5。
-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 李盛平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1。
- 李國雄口述、王慶祥撰：《伴駕生涯：隨侍溥儀 33 年紀實》，北京：工人，1989。
- 李嘉崧：《一〇〇年來》，自刊本，1978。
- 谷瑞儉編：《臺中縣霧峰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霧峰：臺中縣霧峰國民小學，1997。
- 周明德：《海天雜文》，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
-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 周錫瑞著，張俊義、王棟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 林文龍：《林占梅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 林忠：《臺灣光復前後之回顧與自傳》，臺北：皇極出版社，1987。
- 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
-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1992。

- 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臺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 林熊祥等監修、徐坤泉等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2。
- 邱旭伶：《臺灣藝姐風華》，臺北：玉山社，1999。
- 封德屏總編輯：《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出版、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發行，2007。
- 金光太郎：《競馬ノ意義》，臺北：臺北競馬研究會，1934。
- 施懿琳：《彰化文學圖像》，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
-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
-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
-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株式會社勁草書房，2001。
-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 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2001。
-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臺北：南天，2000。
- 徐和雍：《徐錫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 高啓進：《西瀛人物志》，澎湖馬公：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9。
-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高雄市志卷十三文物志》，高雄：高雄市政府，1986。
- 高麗鳳總編輯：《臺北人物誌》，臺北：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編：《聽見臺灣歷史的聲音》，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
- 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雲動》，臺北：益群書店，1981。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書局，1992。
- 張溪南編：《關子嶺》，臺中：三久出版社，1999。
-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
-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91。
- 莊永明：《臺灣第一》，臺北：時報文化，1995。
- 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
- 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臺北：國立編譯館，1997。
- 許雪姬：《洋務運動與建省——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 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 許雪姬總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十四人物志》，澎湖縣馬公市：澎湖縣政府，2005。
-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 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連橫：《臺灣通史》，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
-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79。
- 陳文平、蔡繼福編著：《上海電影 100 年》，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1987。
- 陳延媛：《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5。

-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5。
- 陳郁秀、孫芝君：《百年臺灣音樂圖像巡禮》，臺北：中國時報出版社，1998。
- 陳郁秀、孫芝君：《張福興—近代臺灣第一位音樂家》，臺北：時報文化，2000。
-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
-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2。
- 陳景亮主編：《百年中國電影精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陳瑤塘主編：《清水鎮志增編本》，臺中縣清水鎮：清水鎮公所，1998。
- 陳端堂監修，王建竹主修：《臺中市志卷三政事志行政篇》，臺中：臺中市政府，1977。
- 曾迺碩：《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
- 曾迺碩：《連橫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朝日新聞社編：《朝日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4。
-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
- 程大學總主編、呂建孟等撰稿：《西螺鎮志》，雲林縣西螺鎮：雲林縣西螺鎮公所，2000。
- 程玉鳳：《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 童勝男監修，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4。
-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

-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臺北：國史館，1995。
-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板橋：稻鄉，2007。
- 黃耀能總纂，蔣忠益、曾玉昆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九文化志文獻古蹟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7。
- 楊士養：《信仰偉人列傳》，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
- 楊雲萍：《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板橋：臺灣風物雜誌社，1993。
-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1993。
- 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臺北：遠景出版社，1985。
-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93。
- 葉振輝：《劉銘傳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化，1995。
-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
- 葉龍彥：《臺灣唱片思想起》，臺北：博揚文化，2001。
- 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
- 廖毓文：《謝介石與王香禪》，臺北：南華出版社，1956。
-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辭海》，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
- 蔡主賓，*《蔡廷蘭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 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
-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臺北：臺灣古籍，2004。
- 鄭定國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里仁，2005。

- 鄭喜夫：《連雅堂傳》，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 駒込武：《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7。
-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一八九七～一九四七》，臺北：自立報系，1989。
- 賴淳彥：《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9。
-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4。
-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1993。
- 謝金蓉：《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 謝國興：《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一八九三～一九八二）》，臺北：允晨文化，2002。
- 鐘義明：《臺灣的文采與泥香》，臺北：武陵，1992。
- 顏娟英：《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 羅玉瑛等編：《臺中縣豐原市豐原國民小學創校百週年校友芳名錄》，豐原：臺中縣豐原國民小學，1997。

（二）學位論文

- Lamley, Harry J. "The Taiwan Literati And Japanese Rule, 1895-191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h.D, 1964.
- 王玉輝：〈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和詩人之研究—以旗津吟社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1。

- 王惠琛，〈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 吳怡慧：〈陳貫《豁軒詩草》析論〉，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 吳淑娟：〈臺灣基隆地區古典詩歌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 宋南萱：〈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李泰德：〈文化變遷下的臺灣傳統文人—黃得時評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 林淑華：〈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 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的電力事業〉，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 武麗芳：〈日據時期竹塹地區詩社研究〉，新竹：私立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 施懿琳：〈日治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 高雪卿：〈臺灣苗栗地區古典詩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張淑玲：〈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
- 張瑞和：〈雲林興賢吟社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張滿花：〈張達修及其詩研究—以《醉草園詩集》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2004。
- 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3。
- 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郭承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陳芳萍：〈彰化應社及其詩作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 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
- 曾綯煜：〈栗社研究〉，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 1895~190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
-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 潘玉蘭：〈天籟吟社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
-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 賴郁文：〈吳景箕及其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 魏秀玲：〈蔡旨禪及其《旨禪詩畫集》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
-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三) 期刊和論文集論文

- Eastman, Lloyd E. "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 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1945"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尹海東著、藤井たけし譯：〈植民地認識の「グレーゾーン」日帝下の「公共性」と規律權力〉，《現代思想》，30卷6期，東京：青土社，2002年5月。
- 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6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12月。

- 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思與言》，29卷4期，臺北：思與言雜誌社，1991年12月。
- 向麗頻：〈清代臺南詩人施瓊芳近體詩用韻考察〉，《東海中文學報》，13期，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年7月。
- 向麗頻：〈唐景崧《詩畸》研究〉，《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7期，臺中：東海大學，2006年7月。
- 余美玲：〈從《小東山詩存》探析謝頌臣之生平與交遊—以櫟社詩人圈為主〉，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8-9日。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卷3期，臺北：思與言雜誌社，1978年9月。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26卷1期，臺北：思與言雜誌社，1988年5月。
-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彩票制度之探討〉，《師大學報》，33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88年6月。
-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5。
-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卷2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年4月。
- 周宗賢：〈大龍峒陳悅記小史〉，《臺北文獻》，105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3年9月。
- 周婉窈：〈「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臺灣風物》，56卷4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06年12月。

- 周婉窈、許佩賢：〈臺灣公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總說〉，《臺灣風物》，53卷4期，2003年12月。
- 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 林文龍：〈開臺翰林曾維楨與白沙坑福神〉，《臺灣文獻》，27卷4期，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6年12月。
- 林博正主講、林蘭芳紀錄：〈說我霧峰林家〉，《臺灣文獻》，57卷1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3月。
- 林翠鳳：〈鄭坤五及其《九曲堂詩集》初探〉，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 林翠鳳：陳肇興《陶村詩稿》的文學表現與詩史價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1期，臺中：東海大學，2000年7月。
- 林翠鳳：〈黃金川的詩學養成及其《金川詩草》內容探討〉，《東海中文學報》，13期，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年7月。
- 林蘭芳：〈傳統士紳與新科技的對話—豐原張麗俊的近代化體驗（1906-1936）〉，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5。
- 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中國學術年刊》，18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同學會，1997年3月。
- 施懿琳：〈從《采詩集》看臺日漢詩人的互動模式與書寫話語〉，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8-9 日。

施懿琳：〈決戰時期臺灣漢詩壇的國策宣傳與異聲—以《南方》雜誌（1941-1944）為觀察對象〉，收於許俊雅編，《講座 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2004。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史研究》，14 卷 2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 年 6 月。

洪秋芬：〈日治初期葫蘆墩區保甲實施的情形及保正角色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4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 12 月。

胡巨川：小泉政以及其《盜泉詩稿》析論〉，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徐慧鈺：〈高吟四座互飛觴—話潛園詩酒盛會〉，《竹塹文獻》，6 期，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1 月。

徐慧鈺：林占梅潛園雅集及其文化義涵—清中葉臺灣文士生活之一例〉，《兩岸發展史研究》，4 期，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7 年 12 月。

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啓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張勝彥：清代臺灣書院制度初探（下）〉，《食貨》，6 期，臺北：食貨月刊雜誌社，1976 年 7 月。

- 張維安，〈近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士紳與商人階層文獻之檢討〉，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 梁華璜：〈日據時代臺民赴華之旅券制度〉，《臺灣風物》，39卷3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9年9月。
-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對福建省的新聞政策》，收於梁華璜，《梁華璜教授臺灣史論文集》，台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7。
- 許俊雅：〈光復前臺灣詩鐘史話〉，《國文學報》，18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989年6月。
- 許俊雅：〈三臺才女黃金川及其詩〉，收於黃俊傑編，《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高雄：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1994。
- 許俊雅：〈櫟社詩人吳子瑜及其詩初探〉，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 許雪姬：〈邵友濂與臺灣的自強新政〉，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 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之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6月。
-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年5月。
-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卷2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4年12月。
- 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台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5。
- 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5。

- 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 卷 1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年 3 月。
-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 期，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6 年 12 月。
-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7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 年 9 月。
- 許雪姬：〈在北京的臺灣人，1937-1947〉，未刊稿。
- 陳其南：〈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收於中國海洋史論文集編委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一）》，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 陳青松：〈漫談基隆地區傳統文學發展史（上）〉，《臺北文獻》，160 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7 年 6 月。
- 陳欣慧：〈文學與文化權力的實踐—以日治時期以文吟社社群為研究對象〉，收於《臺灣史蹟研究會九十六年會友年會論文集（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7。
- 陳欣慧：〈閩客疆界：以日治時期桃園地區傳統詩社的文學活動為主要考察〉，未刊稿。
-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 6 月。
- 湯熙勇，〈海難與海外歷險經驗：以清代臺、閩往返船隻漂流越南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週二演講」，2008 年 4 月 15 日。
- 黃秀政，〈清代臺灣的書院—以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地方才俊的培育為中心〉，收於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 黃典權，〈斐亭詩鐘原件的學術價值〉，《成大歷史學報》，8 期，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81 年。

-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 卷 3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7 年 9 月。
- 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收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主編，《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中文系所，2000。
-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遺民詩人的應世之道—以新竹王松為例〉，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
- 黃美娥：〈中國、日本、臺灣：櫟社詩傑林仲衡詩歌的空間閱讀〉，收於陳嘉瑞、廖振富主編，《中臺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2。
- 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 期，臺中：東海大學，2003 年 7 月。
-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 年 3 月。
-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 期，臺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6 年 11 月。
-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收於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
- 詹雅能：〈櫻井勉與日治前期的新竹詩社〉，《社會科教育學報》，6 期，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2003 年 7 月。
- 廖千惠、許智香：〈Homu K. Bhabha 後殖民論述初探及其在教育上之啓發〉，《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1 期，花蓮：慈濟大學，2004 年 7 月。

- 廖炳惠：〈後殖民與後現代—Homi K. Bhabha 的訪談〉，收於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1994。
- 廖振富：〈傅錫祺鶴亭詩集所反映的人生抉擇〉，收於陳嘉瑞、廖振富主編，《中臺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2。
-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組成〉，《史聯雜誌》，2期，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3年1月。
-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史聯雜誌》，3期，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3年6月。
- 鄭麗榕：〈近代北臺灣的社會文化社團——以如水社為例(1928-1934)〉，未刊稿。
-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10卷3期，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9年9月。
- 賴郁文：〈斗六豪門中的陶淵明—吳景箕的古典詩〉，收於鄭定國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里仁，2005。
- 賴郁文：〈斗六雲林逸叟—黃紹謨的古典詩〉，收於鄭定國主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里仁，2005。
- 戴振豐：〈日治時期台灣賽馬的沿革〉，《台灣歷史學會會訊》，16，臺北：臺灣歷史學會會訊，2003年5月。
- 謝崇耀：〈小泉盜泉及其漢詩探析〉，《臺北文獻》，160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7年6月。
- 謝碧連：〈府城臺南父子雙進士—施瓊芳、施士洁〉，《臺南文化》，53，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2002年10月。
-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收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臺北：中研院社科所，1999。

三、網路資料

<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臺灣好！臺灣文學網）

<http://www2.nmtl.gov.tw:8090/>（《臺灣文學辭典》試用版）

<http://www2.nmtl.gov.tw/twp/>（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資料庫）

<http://cls.hs.yzu.edu.tw/cp/Home.htm>（臺灣古典漢詩）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國家文化資料庫）